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

МИД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

МИНИСТРЫ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МАНТИКИ И ЦИНИКИ

新 华 出 版 社

内容提要

随着历史档案的揭密与各位外交部长真实画像的披露，苏联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成了历史学家重新理解20世纪历史的钥匙。

列昂尼德·姆列钦是当今俄罗斯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有大量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本书是作者继《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出版后的又一部历史性巨作。

书中所写1917年以来80多年间的15任外交部长（共13人，其中有2人曾两度出任外交部长）的生动形象，自行组接成一部苏联与俄罗斯政治生活的百科全书，透露许多被有意掩盖的内幕。本书从外交到政治，由政治到历史，独有的采访资料与充满个人见解的观点，为读者提供了观察外交与国家、历史关系的多个视角。

责任编辑　尚惠敏
封面设计　王小明



ISBN 7-5011-6884-9/D · 1087
定价：52.00元

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

徐 葵 张达楠 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俄罗斯）姆列钦著；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

ISBN 7－5011－6884－9

Ⅰ．历…　Ⅱ．①姆…②徐…　Ⅲ外交人员—生平事迹—俄罗斯—现代．　Ⅳ．K835.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754 号

京权图字：01—2003—5878 号

МИНИСТРЫ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МАНТИКИ И ЦИНИКИ

Л. Млечин

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　著

徐葵　张达楠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 xinhuapub. com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神剑印刷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7 印张　插页 10 张　590 千字

2005年 1 月第一版　2005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884－9/D·1087　定价：52.00 元



1918 年，苏维埃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以缔结和平。



俄国和德国士兵不想打仗，就在前线一起跳起舞来。



1920年，独立波兰的缔造者毕苏斯基。他未让红军攻下华沙。



1939年，莫洛托夫在苏德条约上签字。后排站立的是：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里宾特洛普和斯大林。



1940 年，新的苏联大使杰卡诺佐夫到达柏林。



1940 年，希特勒接见莫洛托夫，建议两国结盟并瓜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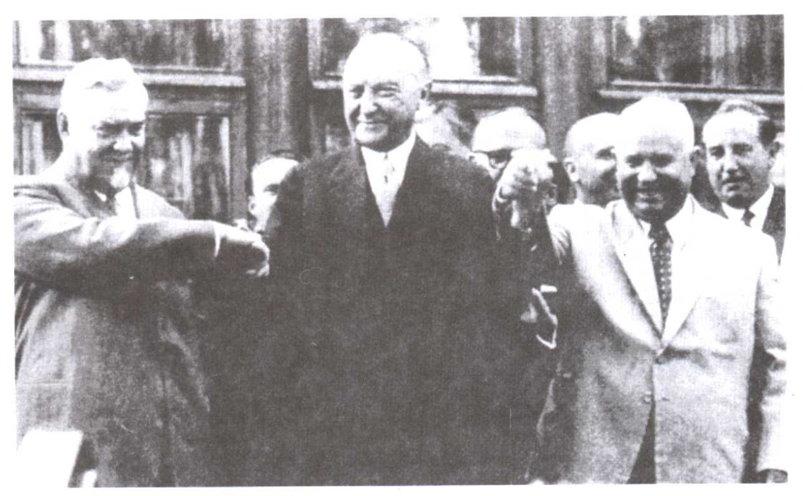
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魁北克会见。斯大林怀疑他们企图在他背后勾结希特勒。



1945年，英国新首相艾特礼、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杜鲁门刚对斯大林说，美国搞出了原子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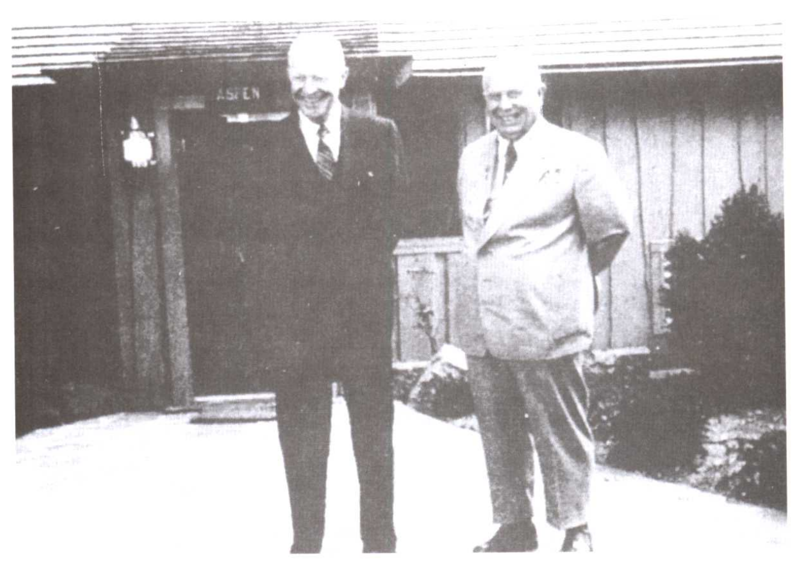
1955年，莫洛托夫和他的夫人热姆丘日娜。他非常爱她，但仕途生涯更为重要。



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在莫斯科紧握苏联政府首脑布尔加宁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手。



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来到莫斯科，企图向赫鲁晓夫证明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



1959年，赫鲁晓夫来到美国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美国给苏联领导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用拳头和脚抗议帝国主义的发言者。葛罗米柯忘记了自己的小心谨慎，模仿着头头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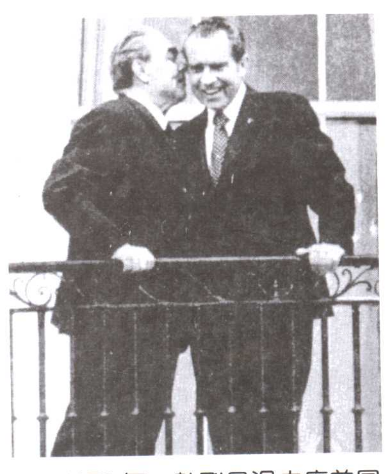
1961年，在赫鲁晓夫时期撤换了3个外交部长，但外交政策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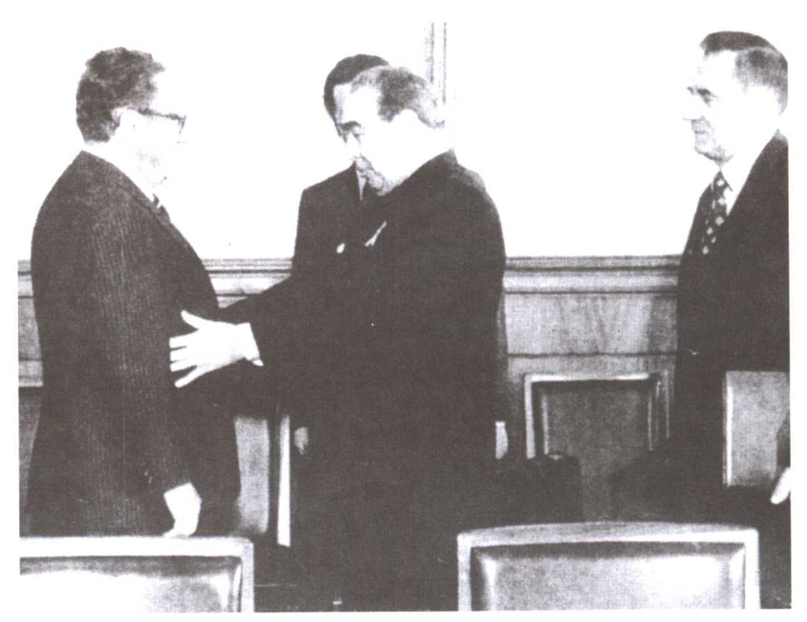
1962年，葛罗米柯请肯尼迪总统相信在古巴没有苏联导弹，却不知道美国已掌握了真实情况。再过几天世界即将处于战争边缘。



1971年，葛罗米柯在伏努科沃自己的别墅里。很少有人见过他处于这种状况。



1973年，勃列日涅夫应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邀请访问美国。



1973 年，勃列日涅夫高兴地管起外交政策，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1973 年，勃列日涅夫会见西德客人。他情绪甚高，缓和势头正盛。



1980 年，勃列日涅夫患病了，已难于履行自己的职责。缓和逐渐走向死亡。



1982年，葛罗米柯现在自己来决定外交政策了。



1983年，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认为美国和西德正在准备战争。甚至他的国际问题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也无力劝说不久前的克格勃主席。



1986年，葛罗米柯及时地支持了戈尔巴乔夫，延长了自己在政治奥林匹斯山上的日子。



1918 年，托洛茨基说，革命不需要外交。



杰出的外交家契切林。



1922年，伏罗夫斯基、李维诺夫和契切林在热那亚会议期间。



1930年，李维诺夫，苏联历史上的第三任外交人民委员。



维辛斯基（右）总检察长于1949年3月成了外交部长。图为他与马立克副部长在第6 届联合国大会上。



不附和任何人的谢皮洛夫。



“不”先生葛罗米柯。1949年。


谢皮洛夫外交部长欢迎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代表团。


谢瓦尔德纳泽会见美国《时代》杂志记者。



别斯梅尔特内赫（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不要求当外交部长。



科济列夫外交部长在宪法会议全体会议上进行登记。1993 年。



1986年的普里马科夫院士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外交生涯?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列昂尼德·姆列钦是当前俄罗斯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曾任《新时代》杂志和《消息报》副总编辑，现任俄罗斯电视中心的政治评论员和《人物档案》节目的撰稿人和主持人。近年来他发表了多部有关苏联和俄罗斯的人物和历史方面的大部头著作，在国内外出版。他的主要著作中在我国已出中文版的有3本，即《普里马科夫的仕宦生涯》（新华出版社，2000年出版）、《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和《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新华出版社，2001出版）。本书是作者进入新世纪后写的一部新作，俄文原版出版于2001年。

本书写的是苏联和俄罗斯自1917年以来80多年时间中的15任外交部长，其中2人在不同时间担任过两任外交部长，所以人数共为13人。外交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又同国内政治紧密相连，在写外交部长这类高层官员的传略和经历时自然要涉及许多重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所以，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本书叙述的不仅是外交人民委员和部长们、外交政策和外交。这还是我们国家从1917年到今天的历史的一个侧面……”俄文原版编者在本书简介中还说，姆列钦的这部新作“是一部关于苏联和俄罗斯政治生活的独特的百科全书。作者根据大量难以看到的文献材料，再现了所有这些外交部长的真实面貌，介绍了我们国家政治中过去被掩盖起来的许多方面”。这本书“不仅非常有趣地叙述了大多数人很少了解的这些高层官员的生活和活动，还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祖国历

史的一种看法”。我们觉得，这些话很好地说明了这本书的主要特点。

本书另一个特点就是材料丰富，叙述生动。我们中一些曾长期做苏联和俄罗斯研究工作的人，在翻译本书过程中也经常被书中叙述的过去无从知道的许多历史材料所吸引。作者广泛引用了苏、英、法、德、美等国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和外长的回忆录和作为许多事件的见证人的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作者自己也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外交官和他们的亲属进行过很多采访，并在书中采用了这些采访材料。作者除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外，还就一些人物和事件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也很有参考价值。

例如关于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托洛茨基。过去不要说在我国，就是在苏联，也很少有人知道托洛茨基曾是苏联第一任外交部长。这是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创的进行党内斗争中的恶劣先例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他把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政敌打下去，给他们贴上了“人民敌人”、“帝国主义间谍”等标签后，就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甚至在苏联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国际关系学院中讲苏联外交史也只从第二任外交部长契切林讲起，根本不提托洛茨基。在托洛茨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时，他进行的主要外交活动就是在布列斯特与德国谈判签订和约问题。关于这件事，我们读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说的是，托洛茨基及其帮凶布哈林等配合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黑暗勾当在党内发动了反对列宁的激烈斗争，要求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力图使尚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打击。（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239 页）现在，作者在本书中给读者指出，“斯大林制造的说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谈判，使德国人占领了半个俄国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习惯于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关心祖国的利益，而托洛茨基只想搞世界革命，为了它可牺牲俄国本身。事实上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

行动并没有违反党的决定，而是服从党的决定的。尽可能拖延谈判，不签和约——这是列宁的路线。围绕与德国人签订和约的斗争不是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的，而是在托洛茨基与要求不管一切继续打下去的党内大多数同志之间进行的……”作者分析了当时联共（布）党内的形势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多数不再服从列宁了，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托洛茨基提出的既不要战争，又尽可能拖延谈判，不签和约的建议成了惟一可能的妥协。作者还认为，当时由于托洛茨基懂得形势的危险，所以在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使列宁的观点得到了通过。如果托洛茨基对列宁的立场投反对票的话，那么德国人有可能会占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可能会保不住。

再如作者提供了 1939 年苏联和德国、斯大林和希特勒接近的许多材料，并对苏德关系的这段历史作出了他的分析。他指出苏联在 1938 年就已开始接近德国的政策。1939 年斯大林撤掉主张同英、美等国发展关系的李维诺夫，任命莫洛托夫为外长是向希特勒发出的一个信号，“主要是要使国家的对外政策有一个 180 度的转变”。在莫洛托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苏德接近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不久就出现了苏联和德国、斯大林和希特勒的亲密关系时期。书中对 1939 年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补充议定书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披露了当时苏德领导人蔑视波兰等国，图谋瓜分地盘的一些谈话。如 1939 年 8 月 23 日斯大林接见里宾特洛甫说：“独立的波兰总归是欧洲长期不安的策源地。”“不值得保留……独立的波兰：应该完全占领它”。同年 9 月 7 日，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谈话中称波兰为法西斯国家，说“在目前条件下，消灭这个国家就意味着减少一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在德军已占领大部分波兰后，苏联向波兰东部出兵时，9 月 22 日，苏军和德军曾在布列斯特为“苏德兄弟的战斗友谊”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当希特勒发动的大战已在欧洲打响后，莫洛托夫于 1939 年 10 月 31 日在为批准苏德条约而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还发表了为希特勒

思想辩护的讲话。1939 年 12 月斯大林 60 岁生日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曾致电斯大林表示热烈祝贺；斯大林回电感谢，并称颂“德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友谊”。1940 年四五月间，莫洛托夫对德国胜利进军丹麦、荷兰等西欧国家曾表示祝贺。德军侵入法国巴黎时，苏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向德军挥手表示欢迎。到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还率领了一个 60 人的庞大代表团去德国访问，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会谈的主题是讨论苏联能否参加希特勒起草的拉苏联参加德日意三国联盟的四国条约草案。莫洛托夫回国后还对德国大使说，如苏联的条件被接受，苏联准备接受四国条约草案。如果书中引用的这些材料都是实际情况的话，今天我们读到这些言论，不能不为之感到震惊，不能不为我们曾经崇拜过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当年竟会这样对待希特勒法西斯和德国侵略者，这样蔑视波兰等国家，又不能不为他在 1941 年 6 月 21 日希特勒开始入侵苏联后几天中陷入的茫然若失状态而感叹。

作者对斯大林与希特勒接近的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要同希特勒签订那些条约，是因为希特勒同意给斯大林英法两国不能给他的东西。还有苏联官方过去一直说同德国签约使苏联得以推迟战争，争取了时间，对此作者也提出了异议。他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希特勒的计划是先在西线发起进攻，拿下西欧，不可能设想他一开始就会开辟两条战线，同时向苏联发动进攻。

书中关于苏联的第七任外长谢皮洛夫的叙述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新鲜的。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为改善苏南关系于 1956 年铁托访问苏联前夕撤掉了反对改善苏南关系的外长莫洛托夫而出任外长的。他从 1956 年 6 月 1 日到 1957 年 2 月升任苏共中央书记为止担任苏联外长只有 8 个半月。我们对谢皮洛夫其人所知甚少，只知道 1957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指责他为“附和”反党集团的人。作者在本书第七章中详细叙述了谢皮洛夫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揭示当时苏共党内生活和苏联政

治生活的一个鲜明的剖面。作者认为，谢皮洛夫是苏联时代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家之一。他拿谢皮洛夫与勃列日涅夫作了比较，说论文化素养、学识和人品等，谢皮洛夫比勃列日涅夫应更有条件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谢皮洛夫秉性刚直，作风正派，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优良的口才。当李森科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而在苏联生物学界飞扬跋扈时，谢皮洛夫就敢于在斯大林面前直言李森科什么品种也没有培育出来，没有任何科学构想的事实。苏共20大后，谢皮洛夫与莫洛托夫等人没有共同思想，并不支持莫洛托夫等人，在1957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向赫鲁晓夫发难时，谢皮洛夫只是真诚地说出了他所确信的事情，针对正在形成的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批评意见，结果在后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就挨了斗，被开除出党，赶出莫斯科，发落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经济研究所去工作。书中引用的那次苏共中央全会上一些代表批判谢皮洛夫的发言，读起来使我们觉得如同听到了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上的一些发言。赫鲁晓夫由于找不出谢皮洛夫同莫洛托夫等有什么关系，所以只好给谢皮洛夫定罪为“附和”反党集团的人。一个敢讲真话、具有独立见解的、正直的苏共中央书记，由此就十分坎坷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在叙述长达28年的葛罗米柯的外长生涯时，作者对苏联从赫鲁晓夫的后半期，到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和短暂的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时期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国际政治活动和事件都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如1959年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时与赫鲁晓夫进行的有名的厨房辩论，1960年在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后在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争吵，1960年赫鲁晓夫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用皮鞋敲桌子的洋相，1962年加勒比海导弹危机的细节，包括苏联运抵古巴的核武器的类型和数字，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美核裁军谈判的一些细节，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策内幕，等等。书中对后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三个外长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三个外长的出生经历、升迁经过、政策思想、工作作风和他们处理的一

些外交事件也有详细的介绍。

以上说的本书的特点和略举的一些内容，想来可以说明，这本书具有较大的可读性，是值得一读的。

苏联解体后，我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总结苏联和苏共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推行的大国主义、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和超越经济能力、不顾人民生活的扩军备战是促使苏联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教训无疑也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研究材料，至于作者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是否都正确，这就需要读者自己来分析和判断了。我们向读者介绍这本书，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同意作者所表达的观点。

本书篇幅大，涉及的人和事纷繁复杂。我们在翻译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们热忱地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徐葵

2004年12月20日

不吉利的十三

（代前言）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只是1917年10月以来俄罗斯的第13任外交部长。可做一下比较：在这几十年中不论是内务部长，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都更换了20个以上。

在13名外交部长中，有3名院士（普里马科夫、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一名通讯院士（谢皮洛夫）。那些完全不懂外文和在任部长之前几乎没有到过国外的人也是些很有文化的人。

13个人中有2人曾二度出任外长，他们是莫洛托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任职时间最短的几名外长是潘金（不到3个月）、托洛茨基（5个月）和谢皮洛夫（8个半月）。任职时间超过所有人的是葛罗米柯，达28年。

所有部长们都说，决定政策是第一把手的特权，他们只是执行总书记或总统的意志。但这样说是耍花招。外交部长的个性对政策的形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莫洛托夫使外交政策具有教条主义和僵硬的色彩，而斯大林却没有那么教条和僵硬。谢瓦尔德纳泽在同西方建立伙伴关系方面比戈尔巴乔夫走得更远。在同一个总统叶利钦执政时，科济列夫企图把俄罗斯变成西方的盟友，而普里马科夫却抛弃了这条路线。

谢瓦尔德纳泽是由于苏联这个国家本身的解体而不当外交部长的。谢皮洛夫离开外交部长的职位高升为党中央书记。葛罗米柯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担任了很高的，但没有实权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普里马科夫在国家杜马的鼓掌赞同下从外交部长

的岗位上直接坐上了政府首脑的交椅。莫洛托夫走的则是相反的道路：从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来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

13个外交部长中有11个受到了尖锐的批判：有些人是在他们还在任职的时候，另一些人则是在他们辞职以后，甚至是在他们去世以后。他们中有几个甚至在今天还被咒骂为魔鬼和怪物。普里马科夫却是例外。他在外交部长的岗位上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崇拜者。

13名外交人民委员和部长中，有8人是被打发辞职的，或者是由于不满他们的工作而自己离开的。内务部的头头们的命运要可怕得多：6人遭枪决，2人自杀身亡；在卢比扬卡[①]的领导人中有5人被枪决，其他人则被投入监狱或遭贬黜。上帝保佑了外交部长们。甚至生命系于一发的李维诺夫，不知为什么斯大林也没有把他消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本书的所有主人翁都是可以寄予同情的。

著名的历史学家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塔尔列[②]有一次去看望同样有名的法学家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科尼[③]。科尼抱怨说人老了。塔尔列说：

"你怎么啦，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你不应抱怨。冯·白里安比你还老，但还去狩猎打老虎。"

白里安在19世纪30年代是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

科尼忧郁地回答说："是的，他很好。白里安去狩猎打老虎，

---

① 卢比扬卡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及其监狱的旧址，后一直是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的所在地，常被用作契卡和克格勃的代名词。——译注

② E·B·塔尔列（1875—1955），苏联著名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7）。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拿破仑传》、《拿破仑入侵俄国》、《克里米亚战争》等，曾多次获苏联国家奖。——译注

③ A·ф·科尼（1844—1927），俄国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国务会议成员，彼得堡科学院荣誉院士。1878年科尼主持的法庭对B·И·查苏利奇的案件作了宣告无罪的判决。著有随笔和回忆录《在生活的道路上》。——译注

但在这里是老虎猎人。”

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本书叙述的不仅是外交人民委员和部长们、外交政策和外交。这还是我们国家从 1917 年到今天的历史的一个侧面……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不吉利的十三(代前言) ……………………………………… (1)

第一部分　外交政策与革命

第一章 托洛茨基:革命不需要外交 ……………………… (3)
生日礼物 ……………………………………………………… (6)
“让他管外交事务好了” ………………………………… (13)
他为何离开布列斯特? ……………………………………… (27)
托洛茨基为什么不同德国人签和约? …………………… (30)
红军领袖 ……………………………………………………… (35)
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冲突 …………………………………… (38)
在波兰前线的灾难 ………………………………………… (44)
“请让我休假” …………………………………………… (50)
列宁的遗嘱 ………………………………………………… (56)
流放之路 …………………………………………………… (62)
墨西哥夜之梦 ……………………………………………… (71)
第二章 契切林:一位不适应现实生活的人 …………… (77)
精神上的崩溃和对神秘主义的迷恋 …………………… (79)
靠母亲的钱干革命 ………………………………………… (88)
为了内部使用 ……………………………………………… (89)
同志之间相互敌视 ………………………………………… (93)

圈在铁丝网里面的外交官 …………………………… (95)
密码电报和密码译电员 ………………………………… (98)
"破坏热亚那会议对我们有利"………………………… (104)
"他们正在瓦解,而我们将会巩固起来" ……………… (107)
"向德国人学习!" ……………………………………… (111)
德国武器在俄罗斯制造………………………………… (114)
"把肃反工作人员这帮坏蛋拉去枪毙"………………… (116)
来自卢比扬夫广场的邻居……………………………… (119)
不佩带任何装饰物……………………………………… (124)
与老鼠和蛾子作斗争…………………………………… (126)
人民委员离职养病……………………………………… (130)
只要人民委员不叛逃就行……………………………… (137)
没有发出的遗书………………………………………… (140)

第二部分 斯大林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三章 李维诺夫:枕头下的左轮手枪 ………………… (145)
帕帕沙去银行…………………………………………… (146)
被捕和回国……………………………………………… (151)
人民委员及其副手……………………………………… (155)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 (160)
没有请客的钱…………………………………………… (163)
我们中间谁是欧洲人? ………………………………… (168)
美国人不会喝酒………………………………………… (170)
60 周岁获列宁勋章 …………………………………… (173)
给阿道夫发去的信号…………………………………… (176)
人民委员部里的新人…………………………………… (178)
偶然保住了一条命……………………………………… (182)
同一辆轿车中的三位部长……………………………… (186)
与一个凶狠的老太婆的恋爱…………………………… (189)

第四章 莫洛托夫："并非人人皆豪杰" …… (194)
"人家是在给你抹黑" …… (195)
斯大林的副手 …… (198)
"难道军队里就没有破坏者？" …… (203)
往锅里啐了一口 …… (205)
"整个世界是我的囊中之物！" …… (207)
像处在党内老朋友中间 …… (212)
用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 …… (217)
谢谢约沙·里宾特洛甫 …… (223)
坚硬的干果 …… (229)
通信"恋爱" …… (232)
克里姆林宫里的晚会 …… (237)
"这不是我们该得的！" …… (242)
第一次失宠？ …… (249)
一个像人的机器人 …… (252)
"您还是个拍马屁的人！" …… (260)
战后的世界格局 …… (264)
警察四人组 …… (266)
白宫中的新人 …… (271)
别墅小聚 …… (273)
口袋中的原子弹 …… (276)
政治与福音书 …… (278)
发现部长逝世 …… (281)
第五章 维辛斯基：总检察长 …… (284)
如何分鲱鱼？ …… (285)
拉姆津教授案 …… (288)
领袖的信任 …… (290)
反对司法人民委员的检察长 …… (293)
奖励一座别墅 …… (294)

在拉脱维亚的使命……………………………………（298）
给歌唱家韦尔京斯基出主意…………………………（300）
“干杯，同志们”………………………………………（303）
朝鲜战争：错误的悲剧………………………………（305）
铁幕……………………………………………………（310）
空中走廊………………………………………………（312）
欧洲合众国……………………………………………（314）
“您只会生孩子”………………………………………（316）
没有朋友可言！………………………………………（321）
保险柜里的勃朗宁手枪………………………………（323）
第六章 莫洛托夫：他甚至连妻子都救不了……………（327）
克里姆林宫里的枪声…………………………………（327）
告密代替举杯…………………………………………（331）
“你必须同妻子离婚”…………………………………（334）
“您姓什么？”…………………………………………（339）
在特别车厢里被招募的间谍…………………………（342）
没有速记记录的中央全会……………………………（349）
三驾马车的领导………………………………………（354）
让我们好好商谈………………………………………（358）
在毯子下工作的译电员………………………………（361）
谁握过希特勒的手？…………………………………（365）
我们干吗都要去列宁格勒？…………………………（371）
洗桑拿浴轶事…………………………………………（374）
下命令让他去东方……………………………………（380）
在中央的最后一次会见………………………………（382）

第三部分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政策

第七章 谢皮洛夫：一个没有附和任何人的人…………（391）
等待逮捕………………………………………………（392）

“拉手风琴的人”和其他领袖……………………………（395）
请立即来“小角落”……………………………………（401）
一封悔过信……………………………………………（405）
世界主义与原子弹……………………………………（407）
与赫鲁晓夫散步………………………………………（414）
从中央委员会到外交部………………………………（420）
北方领土………………………………………………（425）
战争和起义……………………………………………（428）
嫉妒和怨恨……………………………………………（430）
“纨绔子弟和阿飞”……………………………………（432）
解职，开除，撵走………………………………………（438）
第八章 葛罗米柯：“不先生”的谦虚魅力……………………（444）
本可以成为一名飞行员………………………………（445）
“不适合外交工作”……………………………………（447）
失去靠山………………………………………………（450）
“我们要埋葬你们”……………………………………（453）
普鲁士传统……………………………………………（456）
为国务卿准备的燕麦粥………………………………（458）
与副总统的争吵………………………………………（461）
干杯和乘船游览………………………………………（466）
同总统的争吵…………………………………………（469）
皮鞋的故事……………………………………………（472）
加勒比海危机…………………………………………（474）
克里姆林宫的三重奏和部长…………………………（487）
用手枪顶着太阳穴……………………………………（493）
是间谍，还是外交官？ ………………………………（499）
缓和的消退……………………………………………（504）
“我不去日本”…………………………………………（506）
挤干柠檬汁的技巧……………………………………（513）

“第五号问题”……………………………………………… (519)
三驾马车……………………………………………………… (525)
“不要同他争吵”…………………………………………… (532)
“外交官用高脚玻璃杯为自己挖坟墓”…………………… (538)
已摘不下来的假面具……………………………………… (541)
买帽子………………………………………………………… (544)
充当主席角色的三年……………………………………… (547)

第四部分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九章 谢瓦尔德纳泽:当上总统的部长 ……………………… (557)
教师、教师之子 ……………………………………………… (558)
1956 年的抗议活动 ………………………………………… (560)
清道夫的作用………………………………………………… (567)
一人面对愤怒的人群……………………………………… (571)
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摩托艇……………………………… (574)
您晚上有什么安排? ……………………………………… (577)
最要好的朋友关押在监狱中……………………………… (586)
“遗憾的是,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 (588)
不知去向的坦克…………………………………………… (592)
谁丢掉了东欧? …………………………………………… (597)
血腥的四月………………………………………………… (600)
猎枪换鱼竿………………………………………………… (604)
伊拉克——科威特战争…………………………………… (606)
“我辞职!” ………………………………………………… (610)
任期三周的外交部长……………………………………… (613)
回到格鲁吉亚……………………………………………… (616)
贾巴去吃早餐……………………………………………… (617)
两次谋害…………………………………………………… (621)
作为指控证人的邓尼金将军……………………………… (623)

第十章 别斯梅尔特内赫:“不是我要担任外长的”…………… (627)
叛乱前两个月…………………………………………… (628)
给外长的私人便条……………………………………… (631)
波斯湾风暴……………………………………………… (634)
萨达姆投降了…………………………………………… (636)
照本宣科也是可以的…………………………………… (640)
最好不要在八月休假…………………………………… (645)
第十一章 潘金:“摔得头破血流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朋友面前丢脸”………………………………… (649)
两个命令………………………………………………… (649)
从见习编辑到主编……………………………………… (653)
瑞典模式………………………………………………… (655)
布拉格市中心的献身者………………………………… (658)
大门旁停着“吉尔”轿车………………………………… (662)
潘金认为必须改变同古巴的关系……………………… (665)
你要往何处去? ………………………………………… (666)
不友善的邻居…………………………………………… (668)

第五部分　叶利钦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十二章 科济列夫:铁石心肠的毛烘烘小熊 ………………… (675)
当上部长是一场灾难…………………………………… (675)
在“收容所”里服务……………………………………… (679)
“没关系,您留下来吧” ………………………………… (684)
别洛韦日森林的不眠之夜……………………………… (685)
战争与和平之间………………………………………… (687)
科尔扎科夫将军是联系人……………………………… (689)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邀请吃晚饭…………………… (691)
外交部的换班制………………………………………… (694)
分割蛋糕的时候………………………………………… (697)

喝热汤……………………………………………………………(698)
“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700)
胜利与失败同在……………………………………………………(703)
“早期的”和“后来的”科济列夫……………………………………(705)
响亮的男人吻………………………………………………………(707)
在老虎笼子里………………………………………………………(708)
周围都是敌人………………………………………………………(710)
移交事业……………………………………………………………(713)
令人羡慕的未婚夫…………………………………………………(715)
一瓶白兰地…………………………………………………………(716)
第十三章 普里马科夫:院士拒绝当将军 ……………………………(718)
失子之痛……………………………………………………………(719)
只有心脏移植她才能得救…………………………………………(721)
保健医生……………………………………………………………(725)
幼年丧父……………………………………………………………(728)
交友之道……………………………………………………………(732)
“他有时天真得出奇”………………………………………………(734)
“为那些在我们不在场时为我们干杯的人干杯”…………………(736)
总统紧急召见………………………………………………………(739)
大选前的一着好棋…………………………………………………(741)
午餐便宜了…………………………………………………………(743)
不喝酒的大使不能很好地为祖国服务……………………………(746)
有时候可以等到早晨………………………………………………(753)
第九位主人…………………………………………………………(758)
他不喜欢美国吗? …………………………………………………(760)
与“铁娘子”一对一…………………………………………………(764)
萨达姆的宫殿………………………………………………………(767)
北约东扩……………………………………………………………(770)
舞会上的灰姑娘……………………………………………………(772)

“这对我们有压力”…………………………………………（776）
他为什么同意了？…………………………………………（780）
借贷度日………………………………………………………（781）
切尔诺梅尔金东山再起……………………………………（782）
“劝说劝说普里马科夫吧！”……………………………（785）
普里马科夫做了什么？……………………………………（788）
最光荣的引退………………………………………………（791）
权力通道上的争斗…………………………………………（793）
总统冒险赢了………………………………………………（796）
“为普里马科夫——俄罗斯的希望干杯！”……………（798）
第十四章 伊万诺夫:新方针……………………………（802）
在苏沃洛夫军校受训………………………………………（803）
已消失的靠山………………………………………………（806）
最后一颗子弹………………………………………………（808）
流血的解体…………………………………………………（809）
波斯尼亚战争………………………………………………（814）
铁托曾想把科索沃交出去,但是改变了主意……………（817）
夺取科索沃的第二次战斗…………………………………（819）
不被承认的共和国…………………………………………（820）
我们应该支持谁……………………………………………（822）
是战争罪犯？………………………………………………（827）
贝尔格莱德的官老爷………………………………………（828）
不是进餐,而是谈判………………………………………（830）
外交部和安全会议…………………………………………（833）
新构想………………………………………………………（835）
当钓翁的时间还没有来到…………………………………（836）

第一部分

对外政策与革命



第一章
托洛茨基：革命不需要外交

在 1923 年 10 月的一个星期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出外打猎，双腿弄得全湿，结果感冒了。

“我躺倒了，”他在自传中写道，“在得了流行性感冒之后，开始发烧。医生禁止我起床。所以剩下的秋天和整个冬天我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这就是说，我因闹病错过了 1923 年那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辩论。可以预见革命和战争，但是无法预见秋天打野鸭子的后果。”

这场病确实是致命的。托洛茨基出发去打这次其后果对他是如此悲惨的猎的时候，是全国第二号人物，他的知名度是可同列宁相比的。当他在几个月之后逐渐康复的时候，就发现他已变成了一个遭到追逐的反对派人士，已失去了权力，并受到许多不可调和的敌人的包围。而所有这一切，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都是由于他得了一种不知其名的病而发生的。

医生要求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卧床治疗，他也努力接受治疗。当党的机关掀起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时，他正在莫斯科郊区的疗养院里治他的病，对国内发生了哪些变化了解很差。确实，对一个受着高烧折磨的、只能限于同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接触的人又能要求什么呢?

不过，不难察觉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得了重病的列宁不管医生严格的禁止，仍力图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

对其施加影响。托洛茨基得病后则喜欢摆脱一切工作，进行思考、回忆和写作。列宁急于要工作。而托洛茨基则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休息和治疗。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为补偿自己过去生活的艰辛和不便，很快就享受到了他们新的境遇的优越条件。他们去国外，主要是去德国治病，经常去疗养院，去度很长的假期。当善于细致入微地体会地位很高的病人情绪的医生们建议他们在舒适的条件下进行休养时，他们不会与医生们争论。

给托洛茨基治病的医生不能对他的病作出最终的诊断，但他们坚决地建议他到南方休养地去疗养，直到完全康复为止。1924 年 1 月 8 日，《真理报》发表了一个由 6 名医生签名的关于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的公告。他们认为，必须给托洛茨基不少于两个月的休假期，到高加索去治病。政治局高兴地给了他假期。他们的眼睛不希望在莫斯科见到他……

托洛茨基不想同医生们争论，他去了南方，到阳光明媚的阿布哈兹去了。

“通报列宁逝世的密码电报在第弗利斯火车站交到我和我的夫人手中，”后来托洛茨基回忆说，“我立刻通过直线给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个密码便条：‘我认为需要回莫斯科。何时安葬？’大约过了一小时，从莫斯科来了答复：‘葬礼定于星期六举行，你不能及时赶到了。政治局认为，根据健康状况你应去苏呼米。斯大林。’我认为，为我一个人而推迟葬礼是不可能的。只是在苏呼米，当我在疗养院的阳台上盖着毯子躺着的时候，才知道，葬礼延迟到了星期天。”

托洛茨基确信，斯大林是有意欺骗他：他不希望托洛茨基出席葬礼。托洛茨基以他的堂堂的仪表和讲演的天才，如站在列宁的棺材旁，会显示出他是列宁的明显的接班人。但斯大林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作了忠于列宁的思想的宣誓。

但是托洛茨基自己难道不应该考虑一下他必须立即回去吗？而

且不仅是为了参加权力的分配。列宁的逝世对全国都是一个严重的震动。在这样的时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不可能不在莫斯科。如果他乘火车赶不上，也可用飞机把他送到莫斯科。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安安静静地去了疗养院。

在苏呼米，托洛茨基成日地躺在阳台上，面向太阳，看着海洋和棕榈树，回忆着自己与列宁的会见，思考着他将写一本有关革命的书。而在莫斯科这时已形成了新的领导，它已坚决地决定要摆脱危险的竞争者——托洛茨基。

“有人不止一次地问过我，至今有人有时还问我：你怎么会失去权力的?”托洛茨基就这样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中的一章。他接着激动地回答说：“在这个问题的背后经常隐藏着一个从手中放掉了某种物件的想法：以为失去权力就像丢失了一块表或一本笔记本一样。”

托洛茨基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但他当然是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权力。他失去了一切——地位、名誉、支持者、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被杀害的孩子、最后是他自己的生命。而其原因自然不是他于1923年秋天得的感冒。

在那些年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是并列在一起的。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都把他们称做革命的领袖。

杰出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写道：“毫无疑问，列夫·托洛茨基在各方面要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高出数头，如果不算列宁的话。列宁自然是更巨大和更强有力，他是革命的首领，但是托洛茨基更有天才和更闪闪发光……”

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寻常的光辉人物。但是他缺少列宁和后来的斯大林所富有的东西——对权力的追求，他不是一个狂热地追求权力的人。他天真地认为，他对自己已有的权力已够满足了。他不懂得，人们到临死的时候还要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仅是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里。

生日礼物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个人关系的形成不是很简单的。在他们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初几年里，托洛茨基是很接近列宁的，那时托洛茨基被称为“列宁的棍子”。后来托洛茨基参加了孟什维克，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一直到1917年。

在侨居国外时，他们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包括为了钱而进行的争论。这些钱是通过“剥夺”（大部分是靠抢劫银行得来的）的手段搞到的，而社会民主党人不知如何分配这些钱是好。在争论时他们用的语言是很不讲外交的。在那些年月里，这是社会民主党人圈子中习惯的作风。列宁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骂人时就像一个拉货的马车夫。托洛茨基也从不欠情。

1913年，托洛茨基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现在整个列宁主义的大厦是建立在说谎和造假的基础之上的，本身包含有自我蜕变的有毒的基础。由列宁这个善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落后性的专家，这个煽动极坏的闹意气的纠纷的能手所煽起来的这些纠纷，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莫名其妙的事。”后来斯大林下命令公布了这封信。

但是列宁知道这样的政论风格的价值，如果不久前的毁灭性批评对象可成为政治盟友的话，他很容易变愤怒为仁慈。他批评过的一些人都成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助手和私人朋友。他终究是19世纪的人。他能够轻易地谈论必须枪毙那些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人，但是他并不把争论和政治分歧看成是进行敌视和镇压的理由。

1917年，托洛茨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认为过去的分歧没有什么意义。他完全支持列宁，以后他们就走在一起了。在革命后立刻举行的彼得格勒党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说：现在“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列宁的这篇讲话在改革之前没有

发表过，就是因为其中有讲到托洛茨基的这些话。

在革命年代，托洛茨基在波涛汹涌的彼得格勒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沙皇的监狱里蹲了4年，还被流放了2年。两次从西伯利亚逃跑。这增加了他在辩论中的威望。他是一个极有才能的演说家。他的演讲简直就能使人着迷。

伊万·库托尔加，一个立宪民主党的积极分子，留下了一部关于1917年的演说家的回忆录，他在其中这样写到托洛茨基："在农民大会上，他在对他极其敌视的听众中发表讲演。看来，布尔什维克的演讲人一定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确实，开始时采取防御态度的、具有立宪民主党情绪的代表们在托洛茨基讲话时每句话都要加以打断。过了几分钟，托洛茨基就以他的机灵和激情征服了听众，使他们静下来听讲。他在结束讲话时甚至听到了掌声。"

在那些年月里，托洛茨基也表现出了他的政论天才，他有很大的文学天赋。杰出的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曾积极参与了那时候的政治生活。他不无兴奋地回忆说："托洛茨基的讽刺文章写得好极了，他在这些文章中鞭挞和嘲笑自己的对手，其中包括我。真是卓越的讽刺家。"

但是托洛茨基的卓越之处不仅表现在大会上。他也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就表现出来了。1905年10月，孟什维克律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赫鲁斯塔廖夫（真名为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诺萨尔，党内假名为Ю·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当选为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但托洛茨基很快就成了苏维埃中的主要人物。

卢那察尔斯基，未来的教育人民委员后来回忆到有人曾当着列宁的面说：

"赫鲁斯塔廖夫的星正在陨落，现在苏维埃中的强人是托洛茨基。"

列宁似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那有什么，托洛茨基用他的不知疲倦的和鲜明的工作赢得了

这一点。”

在赫鲁斯塔廖夫于 11 月被逮捕以后，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很快托洛茨基本人也遭到了逮捕。无论是审问，还是囚室，都吓不倒托洛茨基。在法庭上他表现非常勇敢。

卢那察尔斯基继续回忆说，“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的威望在他遭到逮捕的时候是很大的……我应该说，在 1905－1906 年的所有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托洛茨基，毫无疑问，尽管年轻，但表现出他是最有素养的，在他身上最少侨民中所有的某种狭窄性的烙印，我已说过这种烙印那时甚至也影响到了列宁的工作，托洛茨基比其他人更多地感觉到什么是国家的斗争。在建立威望的意义上，他在革命中得到的东西最多：不论是列宁，还是马尔托夫实质上都没有赢得什么。普列汉诺夫输掉了很多东西……托洛茨基则从那时候起站到了前列之中。”

在 1917 年夏季和秋季的事件中，当列宁为躲避逮捕离开彼得堡而隐藏起来的时候，托洛茨基起了关键的作用。

1917 年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反间谍机构主任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尼基京认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是德国人出钱雇佣的特务，力图把他们囚禁起来。1917 年 7 月 1 日他签署了 28 张逮捕令。列在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列宁。

尼基京带了检察长的助手和 15 名士兵来到列宁在希洛卡街上的住所。

尼基京后来写道：“我们在街上留了两个人放哨，与 3 名士兵走上了楼梯。我们在公寓里遇到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这个女人粗野无比。我们没有用枪托打她。她对着我们大声叫喊：‘宪兵！同旧政权时代完全一样！’在整个搜查时，她不停地就这个题目发挥她的评论……正如我们所期待的，在列宁的住所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东西……”

反间谍机构通过一个给托洛茨基的亲戚修过鞋的修鞋匠知道了托洛茨基的住所。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强壮的军官索科洛夫大尉带着

卫兵去到了那里。

大约清晨 5 时索科洛夫大尉垂头丧气地未带着被捕的人就回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尼基京奇怪地问。

大尉报告说:“走进托洛茨基的住房,我遇到了切尔诺夫。他命令我向你转达,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已彻消了对托洛茨基的逮捕令。”

切尔诺夫是立宪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托洛茨基对他有救命之恩。

此事发生在彼得格勒 7 月事件的高潮中。当时有一批群众在塔夫里切斯基宫附近抓住了切尔诺夫,准备把他撕烂。但切尔诺夫走运的是,恰在这时托洛茨基不知是从哪里出现了。带着波罗的海海军士兵来到这所宫殿的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描写了这幕场景:“很难说,假如托洛茨基同志不来帮助这件事的话,群众的风暴般的骚动会持续多久。他一跃而跳上了汽车车头的前盖,用一个不喜欢等待的人的有力的长手臂一挥,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一瞬之间大家都静下来了,出现了死一般的静寂。托洛茨基用洪亮的、金属般的声音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最后提出一个问题:

“‘谁主张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请举手。’

任何人连稍稍张嘴都没有张,任何人都没有发出一点反对的声音。

‘切尔诺夫公民,你自由了。’托洛茨基庄重地说,同时把身体转向农业部长,并用手势请他从汽车里出来。

切尔诺夫已吓得半死。我帮助他下了汽车,他带着憔悴疲倦的面容,跨着摇摇摆摆的步子登上台阶,走进宫殿的前庭里去了。托洛茨基怀着对取得的胜利的满意心情同他一起走了。”

这笔债得到了漂亮的回报。切尔诺夫得知准备对托洛茨基进行逮捕后,就找到了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说服他撤销逮捕令,而他自己则立刻出发去挽救不久前救过他的人。

尼基京很生气，立即去找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洛夫采夫将军。此人正在司令部的一间小房间里睡觉。尼基京没有礼貌地推着将军的肩膀恳求说：

“请立刻让我退役。我不能，也不想再服役了。”

“等一等，等一等，”波洛夫采夫想使他安静下来，“你先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尼基京作了简单的汇报。

“是这样吗？”已完全醒来的将军惊异地说，“如果这是陆军部长的命令，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建议你一点，去找军事检察长，向他告发部长下的命令。”

两小时后，尼基京来到了司法部长的家。司法部长的职务临时由斯卡里亚金代理。他听完了反间谍局主任的话，答应立即提出抗议。

上午 11 时斯卡里亚金给尼基京打了电话，以抱歉的声调通报说，政府关于取消逮捕托洛茨基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

要逮捕托洛茨基的消息，全彼得格勒都知道了。一群愤怒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前去向反间谍局局长尼基京提出抗议，很有意思的是这批委员并不是同情布尔什维克的。

“怎么？你想逮捕托洛茨基吗？”在他们的问题中尼基京听到的甚至不是一种责备，而是某种怜悯，似乎认为反间谍局局长是疯了。

“是的。我现在还要求逮捕！”

“但是这是托洛茨基啊！知道吗，是托洛茨基啊！”代表们打断他的话说。

据尼基京讲，关于逮捕列宁的决定并没有引起这样的抗议。

此时临时政府的调查机构得出结论，认为布尔什维克企图在 7 月的头几天里掀起反对国家政权的武装起义。于是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列宁忧伤地对托洛茨基说：

“现在他们将把我们这些人都枪毙。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

时刻。”

临时司法部长和最高检察长帕维尔·马良托维奇曾下令：“根据准备于7月3日和4日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案，将列宁作为被告人逮捕。”

列宁和与他非常亲近的中央委员和《真理报》编委之一的季诺维耶夫为躲避法院和监狱隐藏到城外去了。后来成为第一任莫斯科军区司令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回忆说：“列宁不见了。而在其他人中只有托洛茨基一人毫不慌张。”

托洛茨基没有逃离彼得格勒。他给临时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说，如果你们敢于把列宁称为德国间谍，那么也把我称做间谍好了。托洛茨基要求临时政府把自己逮捕并进行公开审判。7月23日托洛茨基被捕。把他关在“十字架”监狱两个月，后来又不得不予以释放。监狱的囚禁更增加了他的威望。

有关1917年10月的一些回忆录清楚地说明：列宁为躲避逮捕而消失了。许多人指责他胆小，在决定性时刻跑走了。很可能，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被杀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理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实际上是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进行的。尼基京上校写道，‘在7月逃跑后，列宁的个人影响直线下降：他的信件经常迟到。无知的平民老百姓起来了。革命推出了自己的领袖——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比自己周围的人都要高出一大截……

平民老百姓是听托洛茨基的，大家都在发狂，发热。托洛茨基发表誓言，老百姓也发誓。群众在革命中要求看到领导人的姿态，要求见到即时的效应。托洛茨基是为革命而生的，他没有逃跑……托洛茨基的十月越来越临近了，这是由他有计划地准备好了的和在技术上设计好了的十月。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从9月25日开始就抵制克伦斯基的预备议会。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制订了计划，领导了起义，进行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托洛茨基使一个接着一个的团队转到自己方面来，坚决地一天接着一天地去占领军火库、行政办公大楼、仓库、火车站、电话局……”

在列宁不在的时候，托洛茨基起着各种主要角色的作用。他把整个首都的警备部队有步骤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10 月 21 日彼得格勒的武装部队已承认苏维埃政权，从这一天起，首都已不属于临时政府，而属于托洛茨基了。

留在临时政府一边的只剩下了彼得保罗要塞。托洛茨基去到了那里。他在这个要塞的卫戍部队的大会上发表了讲演，士兵们通过了支持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决定。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定在举行武装起义之时召开，它在托洛茨基的生日——10 月 25 日那天开幕了。他为自己奉献了这样一份礼物。

十月起义的决定性的一夜，托洛茨基是在斯莫尔尼宫三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房间里度过的。他在那里领导了军事部队的行动。加米涅夫来到托洛茨基这里，他是反对武装起义的，但认为在决定性时刻他的责任是同大家站在一起。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曾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实际组织起义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有把握地说，卫戍部队的迅速转向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有妥善安排，党应首先和主要地感谢托洛茨基。”

中央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乌里茨基在那些日子里兴奋地对卢那察尔斯基说：

“无论列宁多么能干，与托洛茨基的才能放在一起也开始变得暗淡了。”

按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来说，托洛茨基是与列宁处于同一水平的人。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只有这两个人才具有夺取政权和不丢掉政权的品质。

科学院院士、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比国内任何人都看过更多的档案材料，他说："从富有冒险精神、渴望权力和不讲仁慈的程度来看，我把托洛茨基与列宁等量齐观。这是两个有才能的人。能写，能说服人，善于找到严肃的论据。"

"让他管外交事务好了"

托洛茨基曾梦想做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政权如此快地和出人意料地落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以至于托洛茨基还来不及决定，他究竟将干什么。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建议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拒绝了。

"为什么呢?"列宁坚持说，"是您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了政权。"

但是托洛茨基懂得，这个职位应该属于取得了胜利的党的领导人列宁。

于是列宁要求托洛茨基去负责领导内务部：同反革命作斗争比什么都更重要。托洛茨基也拒绝了这个建议。除了别的理由外，他还举了自己的民族出身作为一个论据：犹太人担任这个职务不合适。列宁对反犹主义有满腔的憎恨和鄙视，因此他发脾气说：

"我们进行的是伟大的世界革命，这样的小事能有什么意义呢?"

"革命是伟大的，但是留下的笨蛋还是不少的。"托洛茨基回答说。

"然而我们是要向笨蛋看齐吗?"

"看齐倒不是，但有时也得做些小的蠢事：在开始的时候何必添加一些不必要的复杂事情呢。"

托洛茨基说，他最愿意的还是继续搞新闻工作。这时党中央书

记斯维尔德洛夫立即出来反对：

“这件事我们将交给布哈林去做。”

实际上斯维尔德洛夫也已为托洛茨基找了一件工作：

“列夫·达维多维奇要去反对欧洲。让他去搞外交事务好了。”

“现在我们有什么外交事务啊?”列宁像所有期待着世界革命的人一样耸了耸肩膀，但是想了一下表示同意。

就这样托洛茨基成了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他担任外交部长，也就是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总共不到5个月，从1917年11月8日到1918年3月13日。

我在大学生年代参加过国立莫斯科外交关系学院（外交部的干部熔炉）纪念“第一任外交部长契切林”的学术讨论会。未来的苏联外交官们当时是不应该知道第一任外长是托洛茨基的……

托洛茨基对待外交活动是有点漫不经心似的，因为当时很清楚，当今这不是主要的工作。从早到晚他忙着彼得格勒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当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向托洛茨基提出要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时，他回答说：

“让你来做这项工作有点可惜。已有波利瓦诺夫和扎尔金德在我那里工作。不值得再让老同志去那里工作了。我自己接受了这项工作只是因为可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党的工作。我的事情不多：公布秘密条约，中断关系。

当然，托洛茨基的这些话或许是有礼貌的拒绝，或许是开玩笑。但他的出发点是明显的，即革命的命运不是在外交场合中决定的。

托洛茨基说过，世界无产阶级不需要外交，劳动人民不要中介者也能相互理解。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他根本就不能理解，一个革命者怎么能成为外交家呢?在斯莫尔尼宫里，人们认为外交是一个骂人的词，而对秘密外交则一定要谴责。更何况，对世界革命的期望更使得外交变得不需要了。无怪乎列宁说：“我们的事业

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而如果革命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者之间还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呢？

摆在托洛茨基面前的是一项实际任务——使俄国摆脱战争。为此需要与交战国进行联系。此外，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从事国家管理的革命政权，仍然应该履行一定的义务，至少在世界革命到来以前。

旧的外交部不承认苏维埃政府，不准备执行它的指示。革命之后一天，皱着眉头和沉默寡言的乌里茨基来到外交部。乌里茨基后来成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并遭到了暗杀。乌里茨基出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他为外交部专员的委任状。他在外交部大楼周围走了一圈就走了。他没有再去管外交部的工作。

当托洛茨基来到外交部的时候，他向外交官们发表了很长一篇话。但是他没有在这些听众中留下什么深的印象。谁也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保住政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同布尔什维克们讲些什么客气呢？

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洛普欣回忆起，前俄国驻阿比西尼亚临时代办切梅尔津是如何试图讥刺托洛茨基的。

“你是勃朗施泰，而不是托洛茨基。你用了一个不属于你的名字，你是一个潜称者。”

托洛茨基平静地回答说，他经历了多少年的从不停息的斗争和地下状态，与之相交替的是在沙皇监狱里的囚禁，当由于需要而不得不给自己想出一个政治斗士的“战斗称号”的时候，他有足够的根据给自己起一个做秘密工作的名字，他托洛茨基在这个名字下已在政治圈里广为人知。贵族洛普欣对这个插曲感到生气，根据他的话，“切梅尔津的狂妄行为像是夸夸其谈的故意做作，令人为他感到难为情。”在有礼貌的社会中，揭露人家的假名字，指着别人的鼻子说他是犹太人出身，这是可耻的。

托洛茨基自己是这样回忆这次会见的，“我到外交人民委员部

呆的时间是不长的，因为我是在斯莫尔尼办公的。我要处理军事问题——克拉斯诺夫对我们的进攻，要参加来自工厂的代表们的会议，还有大量其他的事要做……

“我们不知道外交部的入口处和出口处，也不知道秘密文件存放在哪里，而彼得格勒苏维埃十分着急地等待着秘密文件。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那儿看看。有一次我去了那里，这不是在我们取得政权后的第一天，而是在5天至7天以后，人们告诉我，这里什么人也没有……

“我要求把来上班的人全都召集起来，后来发现，来的人数很多……我用两三句话说明，谁愿意诚实地服务，就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是我希望落空地离开了……”

于是托洛茨基要求各司的所有领导人把工作移交给他们的新的助手。

早晨，那些老外交官聚集起来开会，并决定他们将不为布尔什维克政府服务。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被一些布尔什维克讲的激进的话吓坏和刺伤了，这些布尔什维克说他们要惩办所有的沙皇官员。怎么能为想把你置于死地的人服务呢？还有另一个动机：如果布尔什维克将被推翻，又该怎么办呢？那些出走的人将会回来，并将惩办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合作的人。

托洛茨基在约定的那天没有来。来的是他在人民委员部的助手：孟什维克波利瓦诺夫和布尔什维克扎尔金德。

波利瓦诺夫是沙皇陆军部长的侄子，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而且同时上了两个系——历史哲学和东方语言。他以懂多种语言而闻名，他确实能讲许多种语言。

波利瓦诺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东方司。但他的生涯是短暂的：不久就查清，他在革命前曾参加过黑色百人团“俄罗斯人民联盟”，此外，还爱酗酒，甚至好像还吸可卡因与吗啡，常去彼得格勒的中国鸦片烟馆。他在酒醉状态中从车站月台上掉到火车下，被压断了一只手臂……

扎尔金德毕业于法国的索邦大学，是生物学博士，从青年时起就接近社会民主党人。他开始主管欧洲司。扎尔金德后来回忆他与波利瓦诺夫如何走遍了外交部一些主要官员的家，要求他们到外交部进行“决定性的谈话”。许多人他们未能看到，一些人说他们病了。有一个外交官穿着套装和皮鞋钻进了被窝，说他病得很厉害……

第二天，波利瓦诺夫和扎尔金德来到外交部，准备在万一的情况下就执行由乌里茨基签署的逮捕令。其实，这是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

“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外交人民委员的建议决定：

对前某某人……

前某某人……

前某某人……

进行逮捕并送彼得格勒交军事革命法庭。责成所有地方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所有边防权力机关采取一切措施执行本决定。”

可以把任何人的名字写到这个决定中去。但是没有必要执行这个可怕的文件。外交部的所有窗户都亮着灯，衣架上衣服都挂满了，而在楼上呈现的好像是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情景：不仅是被召唤的人，还有许多根本没有被召唤的人都出现了。外交部的人员都到齐了。

前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彼得里亚耶夫向托洛茨基的助手们介绍了各司的司长。扎尔金德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讲到官员们的工作责任，他提醒大家，这是战争时期，外交部的职能很重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它的工作不能有短暂的中断。

前外交部的领导人们窃窃私语起来，彼得里亚耶夫说，他们的决定依然未变：他们不能为这个政府服务，但准备作出妥协——办理与政治无关的日常事务：完成领事职责，管理战俘事务等。

托洛茨基派来的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高级的怠工形式，

采用这种形式这些官员们既可保留危害人民委员会的可能，也可帮助他们自己的朋友。扎尔金德用绝对的口气说，外交部的官员只有承认革命政府才能留下工作。

波利瓦诺夫大声说，“托洛茨基同志今天不能来你们这里。他在斯莫尔尼宫有急事要处理。他明天上午来。请大家10时前再次集合。”

次日托洛茨基真的来了，他的外貌令洛普欣很不喜欢：“身材干瘦，头发黑黑的，一眼看来就使人觉得极不美貌。脸上的肤色是黄黄的。尖端朝下的油油的小胡子上面是一个鹰嘴鼻。小小的尖锐的黑眼睛。很久没有修剪的、未加梳理的、蓬松的黑头发。宽阔的面颊，特别下垂的沉重的下巴。有两片薄唇的一张大嘴的长长的狭窄的边缘。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状！鬓角上的额骨特别发达，使人觉得那似乎是长角的地方。这些角状的突出物，还有大大的耳朵，加上不大的山羊胡子，这一切使我觉得这个向我走来的人很像民间幻想中描绘的一个鬼。”

许多同代人都讲到过托洛茨基的“鬼一样的”、“凶猛”的脸部表情。另外一些人则发现，与托洛茨基交往很有意思和很愉快。显然，一切都取决于这些人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

人民委员穿的是破旧的上衣、穿旧了的衬衣和皱皱囊囊的裤子。但是他讲话时声音洪亮，并很有礼貌：

“请问尊姓大名？……我是托洛茨基。”

他立即劝说洛普欣留在他的岗位上。但那位总务司司长表示坚决拒绝。

“你有什么好反对我们的？”托洛茨基紧逼着问他，“请具体回答！你难道不喜欢我们结束战争，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国有化吗？”

“结束战争我只能欢迎，”洛普欣回答，“因为我很清楚，我们没有可作战的军队。人民也对战争感到疲倦了。必须结束战争……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啊！我曾经服务于其他的原则。如果我今天背叛

这些原则，从明天起将为别的思想服务，你们一定不会对我表示尊重和信任。还有啊！请原谅我，归根结底，我不相信你们政权的牢固性。”

“你这就错了！”托洛茨基惊叹着说，“我们是惟一一个有热忱的政党！不，我们的政权是巩固的。就这样定吧。把我们的谈话搁下来。当你看到我们不会走的时候，再回来吧。”

“那么现在，”洛普欣趁着人民委员表示的良好情绪说，“平平安安地放我走吧。你不会相信，我是多么疲倦啊，从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在极其紧张地工作。你应该理解我。我相信，你在你们的政治斗争中也已十分疲劳了。”

人民委员对外交官表现的天真只笑了一笑。

“我个人，”托洛茨基回答说，“在监狱里休息了一下，我才从监狱里出来。你自由了。你想怎么利用你的自由都可以。想留在这里，就留在这里。想走，就走。甚至可以去国外。我们不会阻挠你。”

这些话是有很多含义的。事情是，11 月 3 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就给芬兰－瑞典边境（在战时这是从俄国去欧洲的惟一安全通道）的边防站政委托尔涅奥发去了一份简短的电报：“把边界临时关闭。没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特别命令，不得放任何人出入。”

稍后来了一个说明。可允许外国外交官双向出入。只有具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特许的人才有权利从俄国出去。政治侨民可不受阻碍地回俄国……

托洛茨基对洛普欣完全产生了好感，在交谈中对他说，他服从党的纪律，所以接下了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按职业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喜欢做报纸工作。

此时人民委员的新助手们要求给他们看所有的办公场所，把部里存有的钱交给他们，向他们介绍负责保管档案和密码的工作人员。

办公厅主任塔季谢夫伯爵走上前来，他为新的领导安排了一次

对整个部的参观。“办公厅主任带我们看了一下所有办公室，清楚地说明，什么地方用什么钥匙，钥匙该如何转动，等等。当时有一种担心，会不会把什么文件隐藏了起来。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当我们问他秘密文件在哪里时，他说我们关于秘密文件的概念受到了有些拜物教的影响，以为这些文件一定写在羊皮纸上等等。实际上这些强盗协议都是通过交换密码电报的方式签订的，它们的抄件存放得相当散乱，埋藏在各个文件柜里……”

后来扎尔金德把4串钥匙从洛普欣那里拿过来后，就让伯爵走了。

托洛茨基派出了两名经过考验的、会使用打字机的同志，还从巴甫洛夫团派来了警卫。在一间保险房间的入口处设了武装警卫，在那间房间里有5个大保险柜，其中放着一夹一夹厚纸夹夹着的大使报告的副本和各种条约。

1917年11月11日，《彼得格勒消息报》上公布了托洛茨基的一个命令：“外交部的官员如在11月13日上午前不来工作，将被解职并丧失获取养老金的权利。”

人民委员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1月14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前外交部工作人员的长长的名单，这些人“因拒绝服从人民委员会而被解除职务并丧失获取养老金的权利。”

托洛茨基的出发点是，外交不是一门那么复杂的科学，如果外交部的官员们不想服从新的政权，那么没有他们外交部也能过得去。

11月22日，外交人民委员向俄国在国外的所有外交代表处发了一封通电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同不同意为新政权服务？11月26日28名俄国使馆的头头“因未作答复”而被解除职务。

“西门子与舒克尔特”陆海军仪器厂的一些工人和一些士兵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在海军总司令部找到了几个密码译电员。

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中留下了一些声明愿为新政权服务的信使和服务员。后来有些停止怠工的外交官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

前外交部条法司司长亚历山大·多利沃－多布罗沃利斯基通过《我们的生活报》向同事们发表了一个呼吁大家追随他的榜样的号召书："布尔什维克推翻了联合政府，夺取了政权。在开初一瞬间，一切都在夺权这一事实面前，在已被撕毁的自由宪章的幻影面前消失了。但是我们已有时间，已有许多天来看清，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在街道上作战后手中还拿着散着热气的枪支的一群亡命徒，而是一个很大的人民党所掌握的事实上的政权。"

在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还是允许的。未来的知名作家爱伦堡在莫斯科的几家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他在文章中毫不尊敬地写到列宁："10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天真的和充满激情的青年的时候，我从布蒂尔卡监狱出来后就直接来到了巴黎。早晨刚到，晚上就参加了在'奥尔良大街'一家小咖啡馆里举行的集会。一个个儿矮矮的秃头的人，手把着一扎啤酒，他红色的脸上有一双狡猾的眼睛，看上去像是一个善良的市民，他在做演讲。四十名心情忧郁的侨民，脸上刻着贫穷、无聊和苦闷的印记，一边小心地吸着石榴糖浆，一边听他讲话。演讲者带有讽刺意味地说着'卡普里学校[①]的阴谋'、前进派分子和召回派分子的轻浮、托洛茨基分子和真理报分子的妥协、'乌拉尔的委托书'、'中央、中央'等字眼，参加这个集会的人中，如果不是来自布蒂尔卡监狱，而直接来自莫斯科的话，未必能听懂这些话……"

很快那些外交官们看到，除了要求回去为国家服务外，他们别无选择。在苏维埃俄国已没有任何别的工作，因为私人企业都被消灭了。更何况1918年在彼得堡爆发了霍乱，无业者得被迫去挖坟墓。

前外交部第二司的工作人员安德烈·萨巴宁对他的同事们说，

---

① 卡普里学校是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于1909年在意大利卡普里岛成立的一所学校。该校实际上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派别活动中心。——译注

“我们已固执够了，也已挨饿得够了。已是做工作的时候了。但是真要认真工作，就只能搞自己的本行。我将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

他和其他许多年轻的外交官一样被接受参加工作，他们很快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开始了他们的仕途生涯。

托洛茨基认为迅速公布俄国外交部档案中的秘密文件具有重大意义。他希望所有人都能看见，整个欧洲是如何被拖入血腥的世界大战的。还保存着他于11月7日在人民委员部的信纸上写给扎尔金德的一张便条：

> 我给你派去一个专门的警卫，已给他下达了最严格的指示。还必须找到一两个会打字的人，要把我们感兴趣的文件尽可能多地翻译和复写出来，把原件单独放好，对它们需要特别保管。要准确地校对复写员抄的抄件（准确的日期、人名等），要签字盖章。
>
> 原件要分开，以便把它们保存在可靠的地方（官员们可能另有相同的钥匙）。
>
> 握你的手
>
> 你的托洛茨基

文件找出来后立即就发表了。这是一些与意大利、罗马尼亚、法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尼古拉二世的信件，大使们发给临时政府的报告。根据列宁亲自指示，立刻公布了被截获的罗马尼亚武官的一个报告，其中说到科尔尼洛夫将军为了对“失败主义”进行斗争有意放弃了里加。

托洛茨基本人是憎恨秘密外交的。可是在他之后在外交领域中秘密地就一件事达成协议，而公开宣布的却是另一件事的习惯还依然盛行。

斯大林认为外交是达到完善地步的欺骗艺术：“外交家的话不应同现实有任何关系——不然还叫什么外交？讲话是一回事，事情是另一回事……诚实的外交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具有把像追随领袖一样追随他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来的才能。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士兵、电器技工尼古拉·马尔金被任命为人民委员的助手，他是一个有自学天才的、勇敢的人。他25岁，在贫困家庭中长大，很早就开始工作，热衷于阅读地下读物，因图谋烧掉自己主人的商店而被捕。在狱中同政治犯们接近。二月革命后参加了《工人与士兵》晚报的出版工作，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作为波罗的海舰队的代表进入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马尔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秩序。

托洛茨基为他的助手感到高兴："我在斯莫尔尼宫忙于总的革命任务。那时候马尔金实际上成了临时的外交部长。他立刻按照自己的方式弄清了人民委员部的机制，对出身望族的和不老实的外交官进行了清洗，按新的办法安排了办公厅的工作，没收了继续从国外通过外交信使袋带回来的走私货以帮助无依无靠的人，挑选出了最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秘密文件，由他自己负责并加上按语用小册子形式把它们出版。"

马尔金找到了几个翻译，把发现的文件编成了6本集子，由外交部出版社出版。他一个人的精力可抵上三个人。他不论做什么事情，是处理外交信件，还是修理机枪，他都非常投入。马尔金提出了把国外朋友送给外交部官员的礼品进行拍卖的想法。礼品中什么都有——从小雕像到妇女化妆用品。

与外国外交官最初的接触使新的外交官们感到十分兴奋。扎尔金德不无满意地记得，即将奉召回国的西班牙大使的秘书曾来找他，要说服托洛茨基的助手们让苏维埃政府给大使奖一枚勋章。勋章有的是——在外交部发现了大量勋章。扎尔金德把一大堆勋章摊在桌子上大方地让西班牙人随便挑。

波斯公使在新年前按传统给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各送了几瓶香槟酒和白兰地。布尔什维克们庄严地把酒倒入壁炉，第二天还要求盛情的大使表示道歉……

只同德国－奥地利使团在战俘问题上具有真正的关系，这个使

团是在签署和约后来到彼得格勒的。谁也不相信这个和约，虽然马尔金在人民委员部的大楼上挂了一幅通报战斗行动已经停止的巨大海报。

这个使团是由威廉·米尔巴赫伯爵领导的，他后来以德国大使的身份回到俄国，并于 1918 年 7 月被暗杀。当他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时，每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李卜克内西的像都皱起了眉头。

使团的人员是没有在市内自由走动的权利的。让他们居住的旅馆由脸色阴沉的、无人能加以收买的拉脱维亚射击手担任警卫。米尔巴赫经常抱怨住得太挤，但是人民委员部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外交官的抱怨不予理睬，因为对方为来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进行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也实行了同样的限制。

米尔巴赫甚至试图用纯粹人性的方式说明，他使团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年轻人”，他们需要户外活动……有一个年轻人还是遛到城里去了，他在什么地方挨了一顿揍。但对这一件事米尔巴赫没有表示抱怨。

关于战俘命运的谈判是由前外交部条法司司长亚历山大·多利沃－多布罗沃利斯基与后来主管人民委员部总务司的费奥多尔·彼得罗夫与德国人进行的。

又有一些前外交部的官员提出要回部里工作，但提了一些新政权认为是无法接受的条件。为此在外交部大楼上贴出了一张告示：“请旧官员们勿以自己工作的条件相扰”。选用了全新的一些人。向他们宣布，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不是他们，而是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人员的工资数额是定得很民主的：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工资为 500 卢布，司机 400 卢布，信使 300 卢布。

1917 年 12 月 1 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共有 30 名工作人员，到新年时超过了 100 人，1918 年 1 月已有 200 人。在人民委员部机关里聚集了各色各样的人，其中有左派立宪民主党人，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几个人因是白卫军而被逮捕，有一个保加利亚人被指控是德国间谍。

人民委员部占用的房子是皇宫广场上前沙皇的一个政府部门的大楼。人民委员本人和他的秘书处仍在斯莫尔尼宫7号房间办公。这时列宁和托洛茨基忙得不可开交。搬到莫斯科之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中甚至门对门相邻而住，两人保持着亲近的，甚至是友好的关系。

列宁从事着难以想象的事，企图用自己的命令和决定根本改变一个巨大国家的全部生活。那几年中有些文件是他们两个人一起起草的。托洛茨基写开头部分，列宁写结尾部分。他们经常进行交谈和商量。

而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此时建立了两个主要的司：一个主管东方，一个主管欧洲。此外，还有一个管战俘的司，一个向国外汇钱的司，一个条法司，一个密码部门，一个经济部门，一个印刷部门，一个签证部门，一个人事和行政部门。工作最忙的是签证部门，因为大批外国人要离开苏维埃俄国。一个立宪民主党的积极分子也离开了，用的是假护照，他出示了中国信使的护照，人民委员部的人漫不经心地给他在护照上盖了章。

苏维埃俄国当时在国外的代表处人数是很少的。未来的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伦敦开办了“俄国人民大使馆”。由第一批苏维埃外交信使给在斯德哥尔摩的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送去了给“外交人民委员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的全权代表”的委任状。

托洛茨基回忆说，“那时候没有进行任何外交谈判。我们的外交活动是在斯莫尔尼宫里不靠人民委员部的机关进行的。只是当契切林到来并被任命参加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时候，才开始了在外交部楼里的工作，挑选了新的工作人员，但人数很少……”

托洛茨基把前沙皇的外交官契切林从英国监狱里救了出来，让他在人民委员部当他的副手。契切林是因为宣传立刻停止战争的思想而在英国被投入监狱的。托洛茨基早就认识他：契切林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

在那几个月里没有进行任何正常的外交工作，因为世界各国不

承认人民委员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尚未与德国签订和约的时候，在彼得格勒的外国使团只同苏维埃政权保持某种形式上的关系。外交官们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希望劝说新政权不要对外国财产实行国有化，不要不承认自己在欧洲的债务。瑞典大使因人们把他的政府说成是资产阶级政府而表示生气。他提出强烈的抗议，强调他国家的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民主的。塞尔维亚大使希望在人民委员部得到某种理解，但是同他谈话的人谈到了“大塞尔维亚帝国主义”。他当即汇报说，布尔什维克自己就是帝国主义者，他看不到托洛茨基与沙皇外交部长萨佐诺夫之间有什么差别。

由于法国使团拒绝称外交委员部为“人民的”，于是就拒绝接受该使团发来的任何文件。法国人只得改变主意。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外国外交官相当藐视。

当美国准备给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判处死刑时，这些人在彼得格勒的志同道合者决定在美国大使馆的窗下举行抗议示威。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预先向美国大使打了招呼。此人立即向列宁提出要求保证大使馆的安全。列宁对人民委员部提出了警告：何必又一次去吓大使？

1917 年 12 月 31 日逮捕了罗马尼亚公使迪亚曼狄。整个使团要求与人民委员会主席会见。列宁表示同意。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不想在典礼大厅里安排这次会见，那里装饰着各种颜色的地毯和镶嵌在窗户之间的壁镜。列宁的办公室对举行这样的会见又太小了，但还是决定把会见安排在那里举行。多搬了一些椅子到那里去，大家就去迎接外交官了。

第一个来到的是美国大使。他作为外交使团的团长向列宁介绍了所有的外交官，他们互相握了手。然后美国大使，还有法国大使坚决要求释放罗马尼亚公使。给他们宣读了托洛茨基的一份电报，其中说到了罗马尼亚对俄国军队的进攻。外交官们不接受这种解释，不能同意把大使变成人质，认为这是中世纪的做法。塞尔维亚大使斯巴拉伊科维奇表示特别不满，他发表了一大篇讲话。这一场

景使列宁感到十分开心。他没有给外国外交官们任何保证。到此这次会见就宣告结束。这次会见给外交官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苏维埃外交政策的某些原则在最初几个月中就定下了。这就是对其他国家的主权的极度的不尊重，和对国际条约的蔑视。苏维埃领导人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国家有权进行红色干预，红军的推进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和革命的扩大”。

他为何离开布列斯特？

大家要求托洛茨基做到一条：停止战争和立刻签订和约。士兵们离开了前线，并威胁苏维埃政府：如果你们不签订和约，我们将把枪口转向你们。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自己就号召军队这样做：

“士兵同志们，停止战斗，回家去。同德国人媾和，向富人们宣战！”

这就是未来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渊源。

革命后托洛茨基立刻通过广播建议所有的交战国媾和。11 月 22 日他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宣布停止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俄国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协约国拒绝进行谈判。而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则同意谈判。它们打了败仗，希望在东线单独媾和，以便在西线继续进行战争。

托洛茨基短暂的外交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最复杂的事情——与交战的敌人谈判媾和。进行谈判的才能被认为是最高的外交艺术。谁能知道呢？也许在别的时候托洛茨基能成为一个不坏的外交家。

斯大林制造的说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谈判，使德国人占领了半个俄国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习惯于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关心祖国的利益，而托洛茨基只想搞世界

革命，为了它可牺牲俄国本身。事实上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行动并没有违反党的决定，而是服从党的决定的。尽可能拖延谈判，不签和约——这是列宁的路线。围绕与德国人签订和约的斗争不是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的，而是在托洛茨基与要求不管一切继续打下去的党内大多数同志之间进行的……

托洛茨基后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在1917年11月就已经能同德国人谈成，而且是在很有利的条件下。但是，所有人，其中包括列宁同志，都说："去要求德国人在措辞上搞得明确一些，去揭露他们，一有可能就中断谈判回来。"

12月9日，俄国代表团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开始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进行谈判。俄国代表团由阿道夫·越飞率领。他在19岁时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曾在维也纳与托洛茨基一起出版《真理报》，后来回到俄国，于1912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使他获得了释放。

在革命的日子里，越飞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了人民委员会。他被委任去进行谈判，因为他德语讲得很好。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德国和奥地利的外交家问越飞，俄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越飞兴奋地给他们谈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有经验的外交家们带着怀疑的态度听了他的谈话。他的谈判伙伴、奥地利的外交官奥托卡尔·切尔宁伯爵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布尔什维克都是些怪人。他们讲自由和普遍和平，讲和平和协议，但与此同时看来他们自己就是世界上人们所见过的那种最残忍的暴君。他们要把资产阶级都杀掉，而他们的惟一论据就是机关枪和绞刑架。"

"四国同盟"的代表在原则上同意在人民自决的基础上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提法。德国政府声明，准备召回占领军，给予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党中央的大部分人根本排除了同帝国主义大国签订任何文件的可能。列宁

对托洛茨基说，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拖延谈判，希望在德国早日发生革命变革。他要求托洛茨基本人这样去做。

在经历了沸腾的彼得格勒之后，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感到很寂寞。爱好活动的托洛茨基不想白白浪费掉时间。他让速记员坐下，给他口述十月革命札记。他在谈判时发言很有才智和说服力。但是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希望得到太多的东西：结束战争，发动德国工人阶级起义和维护俄国的威望。要同时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不管托洛茨基如何拖延谈判，需要采取具体决定的时刻还是到了。

托洛茨基和列宁也还由于另一个原因而不太想与德国人签订正式和约：人们已在谈论他们已把自己出卖给了德国人。他们处于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富有创造性的托洛茨基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公式向列宁建议：

“我们停止战争，解散军队，但不签和约。如果德国人不能够出动军队来进攻我们，这就将意味着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果他们仍然能够进行打击，我们要投降总还是来得及的。”

“如果德国人没有力量出动军队来进攻我们，这就好得不能再好了，”列宁担忧地回答说，“但如果德国人重新开战呢?”

“那时我们就将不得不签署和约。但那时所有人都将明白，我们别无出路。就此一点我们就可对那种说我们在幕后与德国政府联系的传说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在党的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要求同德国人继续作战。好激动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声明说，签订和约就是彻底的投降。未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耶夫认为，媾和将削弱西方的革命运动，导致俄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乌里茨基指出，他“不会举起手来去签这种可耻的和约”。

党不再服从了，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托洛茨基的建议成了惟一可能的妥协。

在党中央会议上斯大林说：“在和平问题上，既不清楚，又不

明确。应该结束这种状况。托洛茨基的中间观点立场给了我们摆脱这种困境的一条出路。”这一立场在会议上获得了多数票。

2月9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代表团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签署了和约。他们立刻像提最后通牒似的要求托洛茨基接受他们的和约条件。这时托洛茨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声明：“我们将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我们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们希望那时各国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将像俄国的劳动人民一样取得政权。

“我们的农民士兵应该回到他们的耕地里去，在今年春天就和平地去耕种他们的土地，革命已把这块土地从地主手中拿来交到农民手中。我们的工人士兵应该回到他们的工厂里去，不是到那里去生产搞破坏的武器，而是生产搞建设的工具，同农民一起去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不能在给数百万生灵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下签上俄国革命的字。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想按照战争掠夺的权利占领别国的土地和人民。让他们公开地去这样做吧。我们不能把暴力奉为神圣。我们退出战争，但我们不得不拒绝签署和约。”

托洛茨基为什么不同德国人签和约?

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认为接受德国人的掠夺性要求对自己是不可思议的，对俄国是耻辱。他估计，德国人不会下决心进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以为，只有在向强力作出让步，而不是在情况变得极其危急之前就表示准备投降的情况下才能同他们签订和约。

在我们今天的日子里，有名的俄罗斯外交家尤里·克维钦斯基这样评论托洛茨基的行为：“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说‘既不要和平，也不要战争’，不是因为他不听列宁的话，而是因为放弃波罗的海

国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可怕的，会给他们打上俄国利益的叛徒的烙印，会使指责列宁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的说法变得更有力量。请读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你就会明白，俄共（布）党中央专门采用‘既不要和平，又不要战争’的策略来挑动德国人发起新的进攻，促使他们接近彼得格勒，以便再一次向人民表明，除了签订和约以外已没有别的出路……”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代表团听了托洛茨基的声明后，倾向于接受事实上的和平状态。俄国代表团回到了莫斯科，相信德国人不会进攻了。

2 月 14 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听取和讨论了和平代表团的报告，完全批准自己的代表在布列斯特的行为方式。”

可是德国司令部通知说，它将从 2 月 18 日起认为德国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当德国人开始进攻时，在俄国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悲痛的。相反，有些人倒是希望德国人将摧毁布尔什维克，他们曾因德国人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而感到遗憾。

十分仇恨革命的有名女作家季娜伊达· 吉皮乌斯 1918 年 2 月 7 日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一直更了解我们，因为它一直更关注我们。它能够懂得，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对欧洲的整个肌体（是的，是的，也对德国的肌体！）都是危险的。我们是黑死病瘟疫。不能把我们孤立和隔离起来，必须消灭病菌的窝，如果需要的话，把它烧掉，而且要加紧，这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

当德国开始进攻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提议给苏维埃俄国帮助。苏维埃领导成员中一部分人是反对同帝国主义者们签订任何协议的。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如果他们提供帮助，应加以利用。列宁这样拟定了一个决定：授权托洛茨基同志去接受法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助以反对德国强盗。

然而，情况变得明确起来，需要同德国人达成协议，而且越快越好。但是德国人提出了一些明显不能接受的条件。

愤怒的列宁对托洛茨基说：

“是的，尽管我们手中什么东西也没有，但还得战斗。别的出路好像已经没有了。”

但是过了15分钟，当托洛茨基再次去列宁那里时，列宁已平静下来了：

“不，不能改变政策。”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的日记表述了这种情绪：“布尔什维克们完全失去了头脑。他们慌乱地叫喊：进行神圣战争！不，为了拯救革命的彼得格勒和苏维埃政权需要和平！不，还是要战争，我们自己宁愿都战死！不，我们不能死，要迁往莫斯科，如果他们拿下莫斯科，我们就去图拉，我们……最后又如何呢？什么都行，只是不能让出政权，不能让任何人碰政权，我们相信，德国无产阶级会……什么时候？总会有那个时候……”

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党中央拒绝同德国人签订和约，而许多人还要求拿起武器保卫革命。

现在和约的条件变得更坏了：俄国失去了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必须把卡尔斯、巴统和阿尔达汉等城市让给土耳其。承认乌克兰独立，立刻解散军队，付给德国60亿马克赔款。

列宁证明了投降的必要性，只要保住政权，任何损失都不在乎，可以放弃波兰、芬兰，承认乌克兰独立。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但他懂得形势的危险，在投票时投了弃权票。列宁的观点被通过了。如果托洛茨基对列宁的立场投反对票的话，那么德国人有可能会占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可能会保不住……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这样认为：“对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采取了多少是合适的立场。列宁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即使交出半个国家都行，但要保住政权。而托洛茨基是反对与德国人媾和的。事情不仅在于他们可能侵占的领土，事情在于赔款——黄金、原料都交给了西方，交给了德国人。领土问题在德国战败后已经解决，而赔的款没有归还，留在了那里。

“后来在几十年时间中在撰写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历史的苏联历史学家中引起愤怒的是什么呢？是中央委员们不按列宁的指示，而是按自己的想法投票……当时既还没有奴隶般的顺从，也还没有官员们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这个历史剧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观点，都认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是他们的责任。”

托洛茨基对列宁说：

“我觉得，如果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职，这在政治上会是合适的。”

“这又何必呢？我希望，我们将不会采取议会的这些做法。”

“但是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将意味着我们政策的急剧转变，会增加他们对我们的信心，使他们认为我们这次是真正准备签订和约了。”

托洛茨基提出了辞呈。根据会议记录，斯大林在中央会议上说，“他丝毫也不责备托洛茨基，他同样认为这是政权危机时刻，但仍然要求托洛茨基再等待几天。”

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仍然是一个没有遇到过血腥的革命实践的浪漫主义者和革命家。但是他和列宁很快就改变了。高尔基是第一个感觉到这一点的。他在《新生活》杂志上写道：“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周围的人已经中了权力的腐烂毒素，他们对待言论自由、人性和民主为其胜利而斗争的那些权利的可耻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应该懂得，列宁不是万能的魔法师，而是一个冷血的魔术家，他既不怜惜无产阶级的荣誉，也不怜惜无产阶级的生命。”

1918 年 3 月 13 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契切林同志为临时副外交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的辞职使他自己和列宁都感到轻松，列宁此时把一件更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了托洛茨基，要他以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组建军队。

派出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去与德国人谈判。代表团由中央委员格

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率领。随他一起前去的有内务人民委员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列夫·加拉汉与格里戈里·契切林。3月3日苏维埃代表团与“四国同盟”签署了条约。对俄罗斯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3月22日德国国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苏维埃的领导对德国没有任何仇恨。相反，布尔什维克们表现出了与德国接近的兴趣。要知道德国政府已承认了苏维埃政权，而且还建议进行军事合作，以反对白军和在俄国领土上登陆的协约国军队。

同德国的接近使布尔什维克中某些人，例如苏维埃政府派驻瑞士的代表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感到困惑不解。列宁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去安抚他：“任何人也没有要求德国人‘帮助’，而是谈好了他们德国人将在何时和如何实现他们进军摩尔曼斯克和阿列克谢耶夫的计划。这是利益的吻合。如果不利用这一点，我们将是白痴。”

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4月5日的决议，阿道夫·越飞作为全权代表去了柏林。米尔巴赫伯爵被任命为德国大使来到了莫斯科。这两位第一任大使的命运都是很悲惨的。米尔巴赫在7月里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社会革命党人一直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越飞在9年之后得了重病，被当作托洛茨基的志同道合者而解除了工作，最后开枪自杀。

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1918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说两句话，不是说德国会不会推翻布尔什维克，而是说某种内在的恐惧，突然感觉到它的气息的一种新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德国方向。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们（布尔什维克们算什么!），而是俄国的所有其他阶层，似乎都已作好了被德国吸引过去的准备，跟着德国走，德国说向那里去，就往那里去，不仅是由于恐惧而为它服务，而且是为了‘秩序’（如果德国人允诺提供的话），为了一小块面包……

我懂得，从内心懂得俄国对所谓‘德国方向’的倾心……这就

是饱受折磨的、被布尔什维克吞没了的、奄奄一息的俄国。变得愚蠢了的、糊里糊涂的、看到前面有什么就抓住什么的俄国。什么同盟者啊！同盟者远着呢！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而德国已近在这里。它可以给我们安排政权，给我们秩序，明天给一小块面包……”

但是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德国自己没有经受住 4 年的战争。要求和平的海军士兵们首先起义。11 月 4 日德意志帝国皇帝政府认为已开始的革命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破坏活动的结果，因而断绝了与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关系，要求以越飞为首的苏维埃全权代表处离开柏林。在同一天，德国政府要求同协约国媾和。

1918 年 11 月 9 日德国全国爆发了总罢工，在柏林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陆军士兵们支持海军士兵。德国宰相马克斯巴登亲王于早晨公布了威廉二世皇帝退位的消息。一小时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菲力普·谢德曼宣布建立共和国，下午 4 时共产主义的“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告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威廉皇帝夜间秘密逃往荷兰。次日，柏林工农代表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临时政府，其首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在莫斯科人们欢腾起来了。看来，世界革命的希望实现了。11 月 1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1918 年 3 月 3 日在布列斯特签订的与德国的和平条件已失去了效力和意义。宣布整个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条约及其所有条款都无效。”与此同时也废除了俄德补充条约和 8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的由俄国向德国支付大笔赔款的财务协定。

红军领袖

当布尔什维克们在 1917 年 10 月通过和平法令的时候，开始了

自发的军人复员，士兵们离开了前线。人民委员会决定在自愿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军队。在军事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一个全俄新军组建委员会。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发表了苏维埃政府将不签和约，但将把军队解散的声明以后，旧军队的瓦解加速了。第一个苏维埃最高总司令尼古拉·克雷连科发布了解散军队的命令。

在同一天，列宁指示他立刻撤销“今天发出的关于实现和平和在各条战线上全面解散军队的电报”。但为时已晚。保留旧军队已不可能。列宁当即签署了建立工农红军的命令。

但是让谁来领导武装力量呢？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和尼古拉·克雷连科是不行的。需要一个在党内特别有威望的、具有铁的意志和组织才能的人。实质上，列宁只能指望一个人，那就是托洛茨基。其他一些知名的中央委员也有这个想法。

1918年3月11日，彼得格勒中央局委员阿道夫·越飞给在莫斯科的列宁发了一个电报。那时政府已搬到了莫斯科。电报中说：“昨天彼得格勒中央局的会议一致通过了我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总军事人民委员的建议。需要询问一下中央其他委员的意见。托洛茨基同意接受这一职务。

“昨天这里组织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彼得格勒公社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今天的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大多数人反对托洛茨基和我以及布拉贡拉沃夫，决定自己负责彼得格勒，内部和外部的防务，同时也干预军事专家们的战略和军事技术安排。

“我们坚持授予政治委员们最广泛的全权，包括就地枪决叛变的将军，但不能干预他们的具有战略军事技术性质的安排。

“在这一建议失败后我们三人声明退出。很清楚，如果将实现这里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不仅在彼得格勒，而且在全俄范围内，组织新的军队和建立战斗力的事情定将完蛋，因为没有一个诚实的和尊重自己的军事专家会在这种条件下工作。

“惟一的拯救办法是立即任命托洛茨基为总军事人民委员，因

为这样他就可完全不考虑这些孩子气的胡闹……”

3月14日，托洛茨基开始执行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很快就把这个委员会更名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他的成功的时刻来到了。

托洛茨基从未在军队中服过役，对军事只有一般的概念。但是他善于学习，并立即求助于那些能向他提出正确建议的人。托洛茨基立刻采取了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军事事情应由专业人员，也就是由基干军官来管。

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宣布共和国是一个军营。决议说：“共和国的所有战线和所有军事机关都将由设一个总司令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来领导。”

它选择前沙皇军官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为总司令。瓦采季斯毕业于总参谋部学院，1917年在前线指挥第5泽姆加尔拉脱维亚步兵团，与这个团一起转到了革命一边。

托洛茨基曾写到，拉脱维亚步兵团，“这是从旧军队中留下的惟一一支部队。拉脱维亚的雇农、工人和贫农们仇视波罗的海的贵族。沙皇在同德国人的战争中利用了这种社会仇恨。拉脱维亚团是沙皇军队中最好的团。在二月政变后，他们几乎全部都布尔什维克化了，并在十月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过了一年，瓦采季斯被指责有一些可疑的想法和联系，所以把他撤了职。但是在这些指责背后没有发现任何重大的问题。也许是，他在睡前读了一本拿破仑传，并对两三个年轻的军官谈了一些有失分寸的想法……”

与瓦采季斯一起被全俄契卡工作人员逮捕的有共和国的战地参谋长，还有几个主要的参谋，时间是在1919年9月，正是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之际！很快就把所有人都释放了，由于缺乏犯罪要素，案件就作罢了，但是此事对红军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契卡分子于1918年记起了瓦采季斯过去曾接近过托洛茨基，就把这个前总司令枪决了。

托洛茨基勇敢地吸收旧军官参加红军，几乎把所有高级指挥岗位都交给了他们。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说应该更广泛地吸引“旧的指挥人员，他们或者在内心里已开始接受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或者迫于压力看到自己需要诚实地为它服务。”

托洛茨基在命令中说：“1、政委不进行指挥，而是进行观察，警惕和坚定地进行观察。2、政委要尊重诚实地工作的军事专家，保护他们的权利和人的尊严。”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估计，几乎有5万旧军官在红军中服役并参加了内战。其中有600多名前将军和总参谋部的军官。20名方面军司令员中，有17名是沙皇的基干军官，所有参谋长都是旧军官。100名集团军司令员中，有82名是旧军官。托洛茨基和蔼地对待有才能的人，很快把他们提升到高的职位，而不管他们是否是党员。对这一点许多人是不高兴的。他们认为，托洛茨基提升旧军官，脱离了革命原则。另有一些人自己想往高级职位上爬，想排挤掉自己的竞争者。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有了许多敌人。

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对托洛茨基不满的红色指挥官。

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冲突

1918年5月底，人民委员会决定派斯大林担任“俄国南部粮食事务总领导人”。斯大林在察里津住了下来，他从那里给列宁发电报说：“我要驱赶和咒骂所有需要这样做的人……请相信，我们不会怜惜任何人，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而粮食我们还是会提供的。”

斯大林参加了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军区部队的是前沙皇军队的中将安德烈·叶夫根耶维奇·斯涅萨列夫。他自愿参加红军，并想把他所负责的部队变成正规军。

斯大林不喜欢这个军区司令，因为他是旧军队留下来的——军事专家。斯大林不满意这些军人的行动，给列宁和托洛茨基写了指责旧军官们的“罪恶的疏忽大意和直接的出卖行动”的电报。

在察里津，斯大林大概在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身上具有的一种不服从任何人、要当头、由自己指挥一切的强烈欲望。他要求获得撤换和任命人员和“在南方总的代表中央军事权力”的全权。在察里津，斯大林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崇拜者，他们从斯大林那里寻找免遭托洛茨基惩处的保护。这就是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在革命后涌现的一些指挥官，他们不想服从旧军官，因为他们喜欢游击队的散漫自由，他们习惯于不服从任何人。

斯大林指控军事专家变节，撤去了斯涅萨列夫的司令职务。在北高加索军区基础上组建了南方战线，但是任命为司令的又是旧将军。斯大林把他撤掉，任命了伏罗希洛夫。根据他的命令，契卡分子逮捕了一大批旧军官，把他们关在一条驳船上，并把他们都淹死了。

而察里津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部队已经接近城市。当斯大林同自己的参谋部人员和军事专家们作斗争时，白军成功地发起了进攻，占领了北高加索，差点儿就拿下了察里津。但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继续指责军事专家要对这一切负责，要求用“共产党人更换总参谋部人员”。

托洛茨基回答他们说：“叫嚷不能使用军官们叫得最厉害的人，就是那些远离军事机构的工作的人，或者是自己比所有怠工者都更坏的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什么也不会干，晃来晃去，无所事事，而当出事的时候，就把责任都推到总参谋部人员身上。”

斯大林遇到了托洛茨基的抵制，就停止与他交往，开始用电报轰炸列宁，指责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禁止党的领导干预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军事专家的工作，从而“使前线遭殃”：“我请求，尽早把托洛茨基制止住，让他规矩些，因为我担心，如果托洛茨基重复他的荒诞的命令，把前线的一切工作都交给根本不值得信任的来自资产

阶级的所谓军事专家，他的命令将在军队和指挥人员之间造成不和，并将最终把前线毁掉……我不想再说，托洛茨基力图教训我要服从党的纪律，却显然忘记了党的纪律并不表现在形式上的命令中，而首先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中。”

伏罗希洛夫实际上拒绝服从托洛茨基的命令，他只听从斯大林。这种忠诚帮助他获得了离奇的生涯，在大清洗年代中也安然无恙。

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一起要求列宁：“必须在党中央讨论托洛茨基蔑视最有名望的党员，讨好军事专家中的变节分子，危害前线和革命利益的行为。”

托洛茨基自己也向列宁抱怨，他写道，察里津的事情是糟得不能再糟了，那里甚至不报告消息，“伏罗希洛夫可以指挥一个团，但不是指挥有5万人的一个集团军。”

中央没有支持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不得不服从托洛茨基的命令。10月2日，党中央决定：“召唤斯大林接直线电话，并指示他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在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他可来莫斯科，向中央申诉，由中央作出最后的决定。”

托洛茨基则坚持，需要把斯大林调离察里津。斯维尔德洛夫亲自前去看了他们，他知道斯大林有很强的自尊心。他们三人在路上见了面。斯维尔德洛夫谨慎地建议托洛茨基同他从察里津同车带来的斯大林谈一谈。会见是举行了，但是没有以和解告终。

“难道你想把他们全都赶走?”斯大林问托洛茨基，“他们都是些好小伙子。”斯大林所指的就是在察里津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人。

“这些好小伙子会使革命遭殃，革命不能等待他们脱离孩提的岁月。”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坚决地回答。

伏罗希洛夫要向托洛茨基证明，他只执行他认为是正确的命令，他这样做是对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冷冷地说，如果伏罗希洛夫不准确无误地执行命令和作战任务，他将被押送去莫斯科接受法庭的审判。

伏罗希洛夫看着托洛茨基的眼睛，知道他不是说着玩的。伏罗希洛夫阴沉地说，他将忠于纪律，但从此以后他就进入了托洛茨基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的行列。

1918 年底，伏罗希洛夫、夏坚科、帕尔霍缅科和第 10 集团军的另一些指挥员们写信给列宁，要求解除托洛茨基任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库洛夫。这封信在结尾写道："如果不把奥库洛夫立即从这里调走，我们在下面签名的人就对交给我们的事情的失败不负任何责任，并要求解除我们的职务。"

深感不安的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把信转给了托洛茨基，并补充说："鉴于伏罗希洛夫和奥库洛夫的关系极其尖锐，我们认为必须用别人来替换奥库洛夫。"

但是托洛茨基有不同的看法，而列宁又一次同意了他的看法。伏罗希洛夫失去了集团军司令员的岗位，而他的敌人奥库洛夫得到了提升，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 年 1 月建立了乌克兰战线。斯大林建议任命伏罗希洛夫为战线司令。托洛茨基坚决不同意，他说：得同危险的敌人作战，需要一个真正的军事首长。这个问题交到中央去讨论，中央决定，"把伏罗希洛夫完全调离军事工作"。

曾经领导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成了乌克兰战线的司令。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

而伏罗希洛夫则得到了当时并不重要的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列宁再次通知乌克兰中央："你们可任命任何人当司令，但不是伏罗希洛夫……"

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斯大林甚至威胁要辞职。对此，政治局回答说："通知斯大林同志，政治局认为，用最后通牒和要辞职的声明来加强自己工作上的要求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这样就开始了只是在托洛茨基去世后才结束的仇视。托洛茨基在排除斯大林参与作出重大的军事决定时，他还不知道，他是在同

一个什么样危险的敌手打交道。过于自信，这是他的危险的性格。

虽然列宁在10件事情中有9件总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但当政治局在托洛茨基不在的情况下通过他所不喜欢的决议时，托洛茨基仍然感到不满。他同样提出要辞去政治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与人民委员的职务："我在前线的工作条件使我不可能经常参加军事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又使我为中央采取的、我认为是冒险的和直接破坏党的代表大会已确定和通过的军事体制的一系列步骤，经常有失去在党和军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前承担责任的可能。"

列宁立刻起草了组织局和政治局的一个联合决议的草案：

"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将尽力做到自己能做的一切，以使南方战线上那项在当前是最困难、最危险、最重要的工作对托洛茨基同志更方便些，对共和国更有效些，这项工作是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选择的。

组织局和政治局将给托洛茨基同志一切机会，使他能使用一切手段以争取做到他认为需要对军事问题上的路线进行纠正的事情，如果他希望的话，将争取加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坚信，托洛茨基同志的辞职在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对共和国的最大的危害，坚决地建议托洛茨基同志不要再提这个问题，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1919年5月17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发去了一封电报："中央政治局完全支持你的决心并批准你的计划……"很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些文件都被秘而不宣地封存起来了。

当政治局中再次出现争论，而托洛茨基对所通过的决议感到生气的时候，列宁就急于把一切都协调好。1919年7月17日列宁写信给加米涅夫说："我们坚决抗议任何在我们这个声明中寻找或看到什么冒犯托洛茨基的东西的企图。相反，我们坚持强调，我们在指导思想中完全想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总的国际意义和他在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苏维埃工作和党的工作中的作用。"

列宁和中央在那几年中是一直支持托洛茨基的。但是党内有一些很有影响的人联合起来反对托洛茨基，就这样形成了所谓的军事反对派。在 1919 年 3 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军事反对派的成员们试图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开战。反对派企图在军队中保留司令员的选举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政委，使他们也能够领导军事行动，而把军事专家们都变成顾问。

托洛茨基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不得不立即赶往前线。相反，反对派的积极分子们则决定留在莫斯科以便在会上阐说他们的意见。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发言陈述了托洛茨基的论点。他主张在军队中无条件地执行纪律，反对司令员的选举制："当我们在唤醒士兵们起来反对为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制度服务的上级的时候，我们是赞成实行选举制的……"

索科利尼科夫维护了广泛利用基干军官的必要性："事情是清楚的，哪里吸引了军事专家参加……哪里就有战争的胜利。而相反，哪里……中央来的人把军事专家都召回去，或者把他们关在驳船上，像在高加索军队中所做的那样，哪里我们就遭到完全的瓦解和自己军队的灭亡……"

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军事反对派的代表们则强调，旧军官们反正是心向白军，会转到他们那里去的，因此给予他们比政委更大的权力是白费劲。反对派反对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12 月 12 日所通过的关于军队和前线司令员的权利和义务的条例。

根据这个条例，司令员在战略战术性质的问题上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还有权任命全部指挥人员。如果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不同意司令员的行动，他应该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军事反对派感到不满意的是，这样一来政委就只剩下了进行政治监督的职能，而无权进行指挥。政委制是 1917 年 10 月 20 日由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决定而实行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司令员们的行动，防止他们变节。

军事反对派的任务是在挑动列宁起来反对托洛茨基，然后把托洛茨基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但是列宁维护了托洛茨基推行的政策和托洛茨基本人，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有关军事问题的辩论材料在苏维埃时期从未公布过。列宁非常严厉地责备了反对派，并做到使反对派实际上表示投降，而托洛茨基的提纲则被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但是列宁不想同有影响的党员们争吵，因此也要求托洛茨基作出让步。1919 年 3 月 26 日，列宁、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起草了中央的一个决议草案："要求托洛茨基同志必须通过党的组织（中央组织局）解除和调动军队中的党员工作人员……指示托洛茨基同志必须尽可能更关心前线的党员工作人员，没有他们完全的同志般的团结就不可能实行党在军事工作中的政策。"

在波兰前线的灾难

列宁看到尤登尼奇将军领导的白军部队的胜利进军，准备放弃彼得格勒，以腾出力量作进一步的积极防御。托洛茨基不同意这样做，出发去了彼得格勒，把这座城市保卫住了。

为保卫彼得格勒，政治局把不久前才设立的红旗勋章授予托洛茨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夫·加米涅夫当即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召开会议，建议也给斯大林授勋。

心地简单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问道，"为什么？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给斯大林授勋章？"

"您怎么会不理解呢？这是伊里奇（列宁的名字——译注）想出来的：如果斯大林没有别人有的什么东西，他是无法活的。他对此是不会原谅的。"

斯大林没有参加在大剧院举行的授勋仪式。这是一个节日，在仪式上只有一个英雄——托洛茨基，红军的领袖。斯大林不想出席

他所憎恨的人的庆祝盛典。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他并没有注意到，敌视他的人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增加："我经常地，几乎是每走一步，都会踩上人们的个人癖见、个人交情或个人自尊的鸡眼。斯大林竭力拉拢那些被踩痛了鸡眼的人。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趣来做这件事。"

斯大林把第一骑兵集团军和它的司令布琼尼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不使它受到任何指责。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庇护的话，未来的元帅布琼尼的命运远不会那么走运。

1920 年 2 月，有名的契卡分子扬·彼得斯从罗斯托夫发电报给列宁和托洛茨基："布琼尼的军队日益腐败：进行抢劫、酗酒、司令部里有可疑的女人。有传说，发生过枪毙最有觉悟的同志的事情。

"布琼尼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他在铁路上搞的胡作非为完全是难以想象的：不断抢劫特快列车的燃料、火车头和车厢，偷盗缴获的财物。每一支部队后面都有几节车厢装满了女人和劫来的财物。"

1920 年 10 月，南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尔盖·古谢夫发电报给托洛茨基："南方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地方上收到许多报告，讲到开过的第一骑兵集团军部队的胡作非为，其表现是搞恐怖活动、抢劫、屠杀、非法没收等等。

"现摘引 10 月 15 日克列缅丘格省后方长官的电报为证：'经过切尔卡斯县的第一骑兵集团军的第 2 和第 4 师的部队在行军中对当地政权搞恐怖行动，进行抢劫，枪杀居民，甚至枪杀在红军中服役的战士的家庭成员。把全部牲口都赶走了，征用马匹，把主人的最后一匹马也掠走了。各个村子里都呼着'打死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叫喊声。有被杀害的人和许多受伤的人，其中有许多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胡作非为的结果很快就呈现出来了——那些原来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的、完全不参加盗匪活动的村子现在则相反，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充满了很大的仇恨……"

托洛茨基把电报转给了列宁。可是没有什么反应。

1920年11月18日，犹太人共产党分部中央局给列宁写了一封关于“第一骑兵军搞新的屠杀”的信：“后撤的第一骑兵集团军（第4和第6师）在自己的行军路上消灭犹太人居民，一路抢劫、屠杀。罗加乔夫（有30多人被杀），巴兰诺夫卡（近14人被杀），罗曼诺夫（人数不详），丘德诺夫（约14人），这是乌克兰犹太人遭屠杀的历史上新的一页。上述各地都被劫洗一空。别尔季切夫区也遭到了劫洗。第44师也不落后。戈洛什克和切尔尼亚霍夫全遭抢劫……”

列宁在信上批了“归档”二字。

他很清楚布琼尼是怎么一个人，但他什么也不能做。他手中没有其他的军队。而要惩罚斯大林全力支持的一个集团军的领导人是相当困难的。斯大林直到生命的晚期都庇护那些在察里津与他一起工作过和最早承认他是领袖的人。

第一骑兵集团军出来的人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领导了国家的防御工作：伏罗希洛夫元帅从1925年至1940年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科元帅在战争发生之前（1940－1941年）领导了军事部门，格列奇科元帅是1967－1976年的军事领导人。从第一骑兵集团军出来的总共有18名苏联元帅、9名兵种元帅和大将。

这不是说托洛茨基不重视骑兵。相反，他有一句有名的口号：“无产阶级，上马啊！”1920年9月20日《真理报》曾以这个口号作为标题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

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被迫交换不带人称的电报。1920年7月28日，斯大林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发电报说：“关于逐个消灭弗兰格尔指挥人员的命令准备在我们共同进攻时发布并散发。”

斯大林完成了这一允诺，在占领克里木之后在那里对白军军官进行了真正的屠杀。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同波兰作战时期。

两支武器装备很差和缺乏训练的军队的第一次交锋在1919年

2 月 14 日发生。这个日子可以认为是俄波战争的开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并入俄国帝国的波兰领土被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占领。占领者把波兰称为波兰王国，但是一切都由德国和奥地利的将军兼总督管理。

1918 年 11 月 11 日，在德国爆发革命时，波兰人解除了德国军队的武装，而把政权交给了在波兰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约瑟夫·毕苏斯基。

波兰人在失去自由几十年之后，获得了组建自己国家的机会。毕苏斯基有一个建立东方联盟的庞大计划，想把波兰、乌克兰和立陶宛都联合在这个联盟内。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实现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不论是乌克兰人，还是立陶宛人都不愿参加这个联盟。于是这个思想就变成建立大波兰的思想，它将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一部分领土并入波兰自己的疆域。当波兰军团占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时候，他们把这作为奉献给自己热爱的领袖的一份礼品，因为他就是在维尔纽斯出生、上小学和中学的。

这一事件导致与苏维埃俄国的战争。

列宁在 1920 年也是有原因要同毕苏斯基开战的。他认为，如果红军经过波兰领土到达柏林，德国将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历史学家们都清楚，德国并没有准备搞革命，即使有红军出现也很难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当时人们在莫斯科梦想着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结合。两个最大的大陆国家将能决定其他所有欧洲国家，首先是法国的命运，而在法国革命力量同样处在高涨之中。

1920 年 5 月 6 日，波兰军队在爱德华·雷茨一斯米格里将军（在毕苏斯基去世后他成为波兰军队的总司令）的指挥下，开进了基辅。在华沙是一片欢腾。

但是 5 月 26 日红军就转入了反攻，战线迅速向西推移。攻击是如此猛烈，使波兰军队纷纷丢下武器逃跑。6 月 12 日波兰军队退出基辅。7 月 11 日红军解放了明斯克，7 月 14 日解放了维尔纽斯。

7月11日英国政府建议苏维埃政府停止军事行动，与波兰进行谈判。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侯爵在地图上划出了一条对俄国很有利的边界线。在莫斯科人们是懂得这一点的。托洛茨基建议与毕苏斯基签订和约。

但是红军继续进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住它。列宁产生了能推翻毕苏斯基政府的希望，因此高傲地拒绝了“寇松的最后通牒”。

后来列宁曾公开解释说：政治局得出了结论，战争的防御阶段已经结束，已到了进攻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刺刀去试探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波兰是否已经成熟?”

1920年3月列宁写信给斯大林说，“从德国来消息说，战斗正在柏林进行，斯巴达克联盟成员已占领了部分城市。谁将获胜尚不清楚，但对我们来说，必须尽快地拿下克里木，以便腾出手来，因为德国的内战可能迫使我们向西推进去帮助共产党人。”

武装起义在德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在莫斯科人们期待着，波兰工人与农民将会等待红军的到来。

1920年4月28日中央通过了波兰战役的计划。西方战线（司令为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斯米尔加）向华沙方向推进，西南战线（司令为亚历山大·叶戈罗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斯大林）既对盘踞在克里木的弗兰格尔的军队作战，又在利沃夫方向对波兰军队作战。后来考虑，西南战线的主要力量将投入西方战线以给波兰最后的打击。

未来的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拿下华沙！拿下柏林!”的口号下指挥对波兰的进攻。这里所指的，自然不是占领几个欧洲城市，而是输出革命。在莫斯科人们谈论着“以帮助波兰实现苏维埃化为目的的革命战争”。

7月30日在比亚韦斯托克建立了以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所有有名的波兰布尔什维克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这就是苏维埃波兰未来的政府。也开始建立专门的德国

人队伍，这支队伍将成为未来的德国红军的核心。

今天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完全消灭波兰军队。但这只是一种推测。众所周知，有些军事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牌局中总能聪明地把输掉的战斗变成光辉的胜利，或者相反。

不管怎么说，西线的部队已接近华沙，看来波兰就将陷落了。为了进行最后的打击，图哈切夫斯基要求派增援部队。1920 年 8 月 2 日政治局把斯大林从波兰前线召回来，要求他准备对弗兰格尔的战斗。烦恼懊丧的斯大林十分高傲地回答列宁说："你关于划分两条战线的信已收到，政治局不应抓些琐碎事。"

斯大林拒绝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和总司令关于把第一骑兵集团军和第 12 军调去支援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顽固地要求西南战线尽快攻下利沃夫。

人们说，波兰的反攻思想出自当时领导法国驻华沙军事使团的马克西姆·威滏将军。波兰人机灵地利用了红军拉长战线的机会，向西方战线的几个集团军的结合部发起了进攻。毕苏斯基的这个胜利以"维斯瓦河畔的奇迹"之称被载入史册。红军被迫后退。

战斗行动在 9 月间仍在继续，但是华沙之战已决定了战争的命运。红军后退，十多万红军战士被俘。关于被俘的人数有很大的争论。人们举出了不同的数字：从 10 万到 16 万。根据波兰的材料是 11 万。那么其余的人又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问题还在 1920 年 9 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就向波兰驻俄国临时代办提出了："在两年时间中在波兰的 13 万俄国战俘中死了 6 万人。"

波兰人说，其余的人或者希望留在波兰，或者在战俘营中死于疾病和饥饿：当时有流行病发作。战俘营中的条件十分可怕，战俘经常遭到毒打。有些俄国历史学家认为，波兰人有意在战俘营中虐待俄国战俘致死。

列宁后来讲到了这次"灾难性的失败"。在战后，他向党内同

志解释了事情发生的原因："俄国说：让我们看看，究竟谁在战争中更强大。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整个政策的转变，是世界政策的转变。这个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主要的结果就是现在我们遭受了巨大的失败。"

1920 年 9 月 1 日政治局解除了斯大林的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列宁和托洛茨基实质上都指责斯大林要为进攻华沙和对波战争的失败负责。斯大林接受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他对此事反应非常尖锐和凶狠，对列宁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崇敬的心意。

对苏维埃俄国来说，对波兰的战争是以极不成功的结果而告终的。在 1920 年秋波兰军队胜利反攻后，莫斯科不得不接受比"寇松线"更向东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甚至比与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订的和约所确定的边界线还要往东。列宁安慰同志们说："我们作出领土上的让步，因为我们需要更快地打败弗兰格尔，而同波兰我们将再算账。"

当 10 月 12 日签订与波兰和乌克兰的里加条约时，内战事实上也就结束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胜利了，但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内战中死亡人数的材料是有很大差别的。根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们的意见，共死了 400 多万人。1918－1922 年间工农红军的总伤亡人数约 100 万，白军大约死亡了同样多的人数。还有至少 200 万人离开了苏维埃俄国，这些基本上就是持有所谓的南森式护照的人。弗里特约·南森是挪威人、著名的北极考察家、国联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他给没有祖国和护照的人颁发了个人的身份证明……

"请让我休假"

列夫·托洛茨基是以胜利者的荣耀走出战争的。他建立了军

队，消灭了反革命和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整个战争他都是在前线度过的。他的火车专列在全国各地急速地奔驶——哪里革命面临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在勇敢和果断上，谁也超不过他。

革命后到莫斯科与布尔什维克政府建立非官方接触的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柳斯·洛克哈特记得托洛茨基是怎样一个人："我曾有机会证实托洛茨基的勇敢精神。我同他在救世主教堂后面的军事人民委员部里有过一次谈话。突然他的助手在极大的惊恐状态下跑进了办公室。外面聚集了大批带着武器的海军士兵。这是由于没有给他们发津贴，或者是津贴发得不够。他们希望见托洛茨基。如果他不出去的话，他们准会把房子捣毁。

托洛茨基双眼闪闪发光立刻一跃而起，走到了广场上。他没有想去规劝他们。他狠狠地把他们骂了一通。说这是些'狗崽子，对不起在革命中起了如此光荣作用的海军'。他会研究他们的抱怨。如果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它们将得到满足。如果不是这样，他会把他们视为革命的出卖者。他们必须回兵营里去，不然他将没收他们的武器，剥夺他们的权利。海军士兵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去了，像挨了揍的看家狗一样，而托洛茨基又回到我这里来继续进行中断了的谈话……

在他保持着自制力的时候，他给人以无比强烈的印象。他极善言谈，讲起话来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

这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人……他以自己的坚决态度和明显的满足心情使自己的对手感到震惊。他能引起人们不同寻常的热情。

1918 年 5 月红军在红场上举行了一次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检阅。托洛茨基在各国外交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了检阅……在这群衣着很差的、无组织的人群中无疑有着一股巨大的活力。这一点给了我强烈的印象。"

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对付群众的这种能力。当乌拉尔师在萨拉托夫起义时，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要求托洛茨基立刻出发到那里

去，“因为您在前线的出现会对士兵和整个军队产生影响”。

当1918年7月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发动起义时，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现实的危险。他们在莫斯科有武装队伍，完全有可能夺取政权。立宪民主党人在国内也受到人们的支持。整个农村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实质上发了慌。他被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逮捕了。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对此毫无办法。

只有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毫不慌张。他把两个忠于布尔什维克的拉脱维亚团从莫斯科郊区调进莫斯科，命令他们向波波夫的叛乱队司令部开炮。几小时后，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军队放下了武器。

在那些日子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一道命令，取消一切已批准的休假。只有以下三人中的一个人签名的许可证才有效，他们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和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无疑是国内的第二号人物，在苏维埃机关中都挂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个人的照片。后来托洛茨基回忆说，“在战争年代中，实际上可以称之为无限的权力都集中在我手里。革命军事法庭在我的火车上开会，各条战线都听从我，后方听从前线，而在一定时期里共和国中所有未被白军占领的土地都是后方，都是坚固设防地区。”

列宁对托洛茨基表示完全的信任。1919年夏天，列宁做出来了对他这样一个冷静的人来说完全是奇怪的姿态。他拿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一张空白信纸，在上面写道：

“同志们！

尽管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格性质，但我如此确信，绝对地确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对事业的利益是正确的、适宜的和必要的，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个命令。

弗·乌里扬诺夫一列宁”

列宁补充说：

"我给你这样一张空白信纸，你要多少我就可以给你多少，因为我预先就批准你的决定。你可以在这张空白信纸上写上任何决定，我已用我的签字予以批准。"

最近几年不仅发现了这样一些字条，而且发现了列宁支持和维护托洛茨基使他不受党内同志的批评指责的讲话。他认为军事部门堪称模范。在列宁生前这些文件都是保密的，而在斯大林在世之时和去世以后，要讲托洛茨基的一点好处那是不可能的。

列宁亲自写给高尔基的几段话最好地说明了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态度：

"请指出另一个能在一年之内组织好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而且还赢得了军事专家们的尊敬的人来。这样的人我们是有的……是的，是的，我知道。人们就我对他的关系在那里撒谎。撒了很多谎，看来特别是撒了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很多谎。"

军队缔造者的位置是托洛茨基理应得到的位置，他的疯狂般的精力、天生的组织才能、智慧、勇气、果断和冷酷在这个位置上全都用上了。整个战争时期，托洛茨基用他的铁腕掌握着军队。但在战争之后他就好像处在工作之外似的。造成了他开始感到寂寞枯燥的印象。斗争的紧张程度下降了，一种无聊乏味的感觉攫住了他。他不能适应普通的日常工作或机关里的勾心斗角。他不知道做什么好。

列宁曾为托洛茨基寻找工作。1921 年 7 月 16 日列宁建议任命他为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那时乌克兰正在闹饥荒。可是托洛茨基不想干这项工作。列宁嘱咐撤销政治局的决定。

列宁建议他在政府中做自己的副手。他不想当副手。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已习惯于完全独立行事。但是战争已经结束，已不存在另一个这样的职位。

托洛茨基在 1922 年 1 月底给政治局写了一个声明："我想请求休假，休到二三月，因为最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间失眠和头部神经

痛强烈地使我形同瘫痪。

我曾经设想在半休息的状态下度过一个月。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请求立刻休假。我的工作效率处于最低点，一方面是因为身体不好，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本身的‘琐碎’性质：大量零散的任务，时间主要耗费在从一项任务转到另一项任务上，而且我内心深信政治局或组织局交给的几乎每一项任务由属于自己本职范围的人去做会做得更容易，更好。

除了时间的浪费以外，我在心理上不能忍受这样的工作安排，正像不能忍受被扔在楼梯上的烟头一样。

由于我的工作时间就这样被不断地，而且我认为是被毫无意义地消磨掉了，所以我经常处于忧郁不定和焦急不安之中，这完全破坏了我的工作效率。

我要求政治局给我一个月的休假。”

休假期给了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继续主管军事问题和国家安全工作，同时要写一本小册子：《在帝国主义和革命之间：从格鲁吉亚的特殊例子来看革命的基本问题》。

托洛茨基对军队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他让军队复员，并想利用武装力量来恢复经济。

从1920年到1921年在苏维埃俄国进行了一场关于未来军队的辩论。战胜了弗兰格尔的伏龙芝将取代托洛茨基主管军事部门，他认为军队应该是阶级的军队、无产阶级的军队，而军事学说必须依靠国内战争的经验。

在内战结束以后，许多军事理论家认为，红军已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不仅是伏龙芝，还有图哈切夫斯基、古谢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都这样认为。托洛茨基则持反对意见：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他挖苦地指出：“那个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帮助就可在蜡烛厂搞好生产的人，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得蜡烛的生产。”

托洛茨基在《军事学说还是臆造的军事理论》一文中号召，要

教会指战员在战场上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要自己用脑筋思考，而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看规章条令。军事历史学家们注意到，托洛茨基要求所有人都抓学习，甚至在前线的战斗间隙时间中也要注意学习。他论证说，不能认为讲究军事艺术是什么巨大的损失。军事艺术的标准就是付出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效果。

1921 年 2 月 23 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在我们党内和军界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军事学说问题的辩论。我认为，这场辩论最终会是有益的，但是现在有许多胡说八道和断章取义的东西。特别是，有人指责红军在它的'军事学说'（全部争论就是围绕这个华丽的名词展开的）中没有包括进攻性革命战争的思想……"

与职业军事人员的交往，对托洛茨基是有帮助的。托洛茨基看到，正在诞生的苏维埃军事科学对防御是不够重视的。他写道，单靠"进攻的因素还不能保证胜利"。也必须教会军队懂得防御。现在还没有根据指望世界革命的胜利。

伏龙芝急于出来反对他，甚至建议他从小册子中删去那些"颂扬防御的观点"。伏龙芝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只谈进攻。在那时候人们习惯于按照苏沃洛夫的榜样指责防御是"可耻的"，实际上"从红军中把防御思想完全抹杀了"。

在党的第 11 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军事代表的会上做了报告，正在上升的军事明星伏龙芝做了副报告。伏龙芝是乌克兰军队的司令员。在代表大会之前，列宁同他谈了一次话，列宁要他支持托洛茨基。在这以后，伏龙芝说，他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没有分歧。

但是在托洛茨基离开军队以后，军队中轻视防御的思想加强了。这种思想后来导致红军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会打防御战。指挥员们完全不懂防御战的原则，司令部不懂得什么叫机动防御战术。这些理论争论的代价在 1941 年就显示出来了。

列宁的遗嘱

1922年5月26日列宁得了中风，他的右手和双腿部分地瘫痪了，说话有困难。半年之后，12月16日得了第二次中风。斯大林在一个小范围里冷漠地说：

“列宁完了。”

斯大林有点急不可耐了。列宁虽然恢复过来了，但是已再也不能完全工作了。

全部党的工作都落在斯大林的手里。他的最亲近的助手阿马亚克·纳扎列强友好地写信给奥尔忠尼启则说：“伊里奇完全恢复过来了。允许他做一点工作。请勿念。现在情况很好。昨天科巴去过他那儿。他不得不叫醒伊里奇和拉谢娅老大娘。”

列宁很快就意识到，他没有什么人可依靠。在这几个月中列宁常常像对待自己的盟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样与托洛茨基交往。

当发生关于外贸问题的激烈争论时，列宁和斯大林的意见出现了分歧。1922年12月12日，列宁写信给自己的志同道合者：“由于我的病情的恶化，我被迫不能出席中央全会。我充分意识到，我这样对你们是多么不合适，甚至比不合适更坏，但是我还是不能发表什么言论。

今天我从托洛茨基同志那里收到了附来的一封信，我同意信中所谈的所有主要问题，也许最后几行有关国家计委的意见除外。我将给托洛茨基写信，告诉他我同意他的意见，并鉴于我生病请他在全会上维护我的立场。”

12月15日列宁通知斯大林，说他已“与托洛茨基”达成了协议，要他“维护我认为要对外贸进行垄断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一定会比我丝毫不差地维护我的观点”。这提醒了斯大林，不要造成他最怕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联盟。斯大林立即放弃了他原来的

立场，以免受到双重的打击。

不久列宁又一次要求托洛茨基帮助，实质上是建议他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求你在党中央出来维护格鲁吉亚问题。这件事现在处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查'下，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你能同意出来维护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放心了……"

列宁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地恶化了。12 月 23 日他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被认为是一份遗嘱。《信》中第一部分是比较心平气静的一个部分，涉及到扩大中央委员人数的必要性，信中还说"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1]

然后列宁口述了他的遗嘱中的主要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评论了党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与皮达科夫的个人特点。所有评述都是很尖锐的，带有揭露性的。他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称做党的两位"杰出领袖"，并设想到他们的冲突会使党遭殃。根据列宁的看法，"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2]

1923 年 1 月 4 日，列宁口述了对这封信的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 43 卷，第 337 页。——译注

② 同上，第 339 页。

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或者说，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在国内战争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了。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分歧。当提出了如何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出现了争论，有时是很尖锐的争论。其实，不论是列宁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都认为争论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事情。这对个人关系没有什么影响。

1922 年 7 月中，当时已病重的列宁对政治局中相互关系的某种复杂化情况作出反应时，写信给加米涅夫说：“把托洛茨基抛开——你暗示的就是这一点，不能做别的解释——这是最大的愚蠢。如果你们不是认为我已经耳聋眼花到毫无希望的地步，你们怎么能想出这一点呢？是些眼睛血红的孩子们。”

1921 年 3 月，列宁在第 13 次党代表大会期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说，尽管有分歧，“我与托洛茨基是会一致的”。并立即补充说：“他爱上了机关，而对政治一点也不懂”。托洛茨基知道了列宁讲到他的话也许是生气了。但是列宁讲的离真实情况并不太远……

为什么托洛茨基当列宁事实上已把他推向第一把手的角色的时候，表现如此萎靡不振和缺乏主动精神呢？原来托洛茨基是很天真的，他不认为，他会被人从权力的顶峰推下来。他确实是不想充当第一把手的角色。他喜欢充当智者的角色，从难以达到的高度去注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没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追求权力的欲望，因而他也就失败了。

列宁的遗嘱，不管人们对它如何解释，只包含有一个直接的嘱咐：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其他人不必动，尽管列宁也指出了这几位最卓越的布尔什维克中每一个人的缺点。但是斯大林是惟一的留在自己职位上的人。他把其他的人都陆续消灭了。更

---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 43 卷，第 340 页。

有甚者，后来人们开始把列宁的遗嘱看作是托洛茨基的文件，几乎就是伪造的。

列宁是把信写给第12次例行的党代表大会的，这次代表大会还是在他生前召开的。正如所有人一样，他不认为他会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会康复。但是斯大林采取了一切办法，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不能看到列宁的这封信，在列宁还活着的时候代表们可能会要求执行列宁的指示。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尖锐的话感到生气，他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也不去关心代表们是否知道列宁的信。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使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因嫉妒和生气而脸都发青了。而伏罗希洛夫则说，“这样的鼓掌欢呼简直是荒唐，只有对列宁才能这样对待。”

伏罗希洛夫看到中央委员拉狄克跟着托洛茨基走进会场时说：“托洛茨基来了，而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尾巴。”

头脑敏捷的拉狄克用一首四行诗回答了他：

伏罗希洛夫脑袋笨，

所有思想像糨糊，

宁做列夫的尾巴，

不当斯大林的跟屁虫。

前来向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表示祝贺的一些代表团都高呼：“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他们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托洛茨基从这里看到了党对他的才能和威望的承认。西方共产党人谈到托洛茨基时总的都把他当作革命的象征。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坚决地决定要摆脱托洛茨基。从第12次代表大会开始，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对托洛茨基展开了真正的斗争。

托洛茨基被人数众多的热诚的崇拜者围绕着，他不认为需要为自己准备一个有人对他进行支持的基础。他不懂得有此需要。在革命后的年代里，他已如此习惯于人们对他的鼓掌欢迎、热忱接待和称赞表扬，他真诚地相信，人们对他将永远如此。

卡尔·拉狄克于1923年3月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在《列夫·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一文中写道："俄国革命是通过它自己的这个伟大代表的头脑、神经系统和心脏行动的……托洛茨基的劳动和工作将是准备夺取整个世界的新一代工人阶级热爱和学习的对象。"

10月间拉狄克又讲了一番恭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话，他说："如果可以把列宁同志称为通过他的意志的表达主导着革命的智慧的话，那么可以把托洛茨基同志的特点称之为服从于智慧的钢铁般的意志。托洛茨基讲话时的声音犹如召唤人们去努力工作的钟声……"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革命的领袖、组织者和胜利的鼓舞者"。

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我们的队伍里早就属于具有巨大天才的人物，早就是无可争议的领袖，所以对他们的地位在革命时期的上升谁也不会感到特别惊奇。"

女作家拉里莎·赖斯纳在前线度过了内战时期，她对那时候人们的感情和情绪做了这样的描绘："与托洛茨基一起，人们会在欢乐中不感到伤痛，会射出最后一发子弹而在战斗中献出生命，托洛茨基身上具有通过他的战斗、讲话和身体姿势表达出来的神圣激情，这些东西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的光辉篇章。"

他不仅对革命的作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谢尔盖·叶赛宁见了托洛茨基后曾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人的理想类型"。

托洛茨基具有吸引人追随自己的才能，同样也有使人仇视自己的才能。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知名的党的活动家简直就恨死了他。

而托洛茨基则避开了这些人，最终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互相拜访做客，殷勤地去看芭蕾舞演出，聚在一起喝酒，并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这一切对我都不可能有吸引力。新的上层感觉到了，我不会接近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甚至没有试图吸引我参加这种生活。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一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在小圈子里

进行的谈话就停下来了，谈话的参加者带着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的神态和对我的某种敌视的心情纷纷走开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这么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开始失去权力了。”

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地位取决于列宁。列宁一去世，他这颗明星也就陨落了。

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在国内和党内谁是列宁之后的第二把手——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已经解密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列宁逝世后每天编写的专门综合报告证明，人民认为托洛茨基是接班人：“老百姓不相信托洛茨基是病了……在群众中可以看到由于托洛茨基的被排斥而表示的不满……关于党内的辩论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犯病，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说，托洛茨基同志的像被销毁了，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压榨工人的共产党人，他被捕了，呆在克里姆林宫里……”

在这些专门的综合报告中，斯大林的名字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在老百姓中有人甚至不知道他。正因为许多人认为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法定接班人，所以他引起了政治局中的同志们的恐惧和憎恨。他们都联合起来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都料想，如果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头头，他会把他们抛出党的领导机构。因此不久前的战友们就把宝押在仇视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身上。就这样他们给自己宣判了死刑，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将把他们全都消灭掉。

1923 年底托洛茨基实际上已经被孤立了。政治局的其他 6 名委员背着他开了会，大家决定，到正式会议上就把已准备好的决议拿出来。如果托洛茨基反对的话，他就会完全陷于孤立。托洛茨基曾企图抵抗，他说民主在党内已经消失了，已不可能进行讨论，党的组织已习惯于让那些不是由大家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上面任命的书记们对它们发号施令。

1923 年 10 月 5 日托洛茨基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书记的官僚主义应该结束了……党的民主应该实现自己的权

利，没有民主，党将会僵化和蜕变。”

在党内占上风的正是那些书记们，但是在党员群众中托洛茨基还是有威望的。因此政治局不得不声明：“政治局尽管在这一些或那一些个别点上不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但是要指出，那种以为在党中央似乎有同志认为政治局、中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同志积极参与下进行的看法，这是恶意的臆造……”这说明，斗争的结局还不明朗。

但是托洛茨基在1923年秋天打野鸭后得了重病，他在决定性的时刻自己退出了这场游戏。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从所有负责岗位上全都撤掉了。

流放之路

在列宁逝世后，党中央的一个委员会来到托洛茨基正在那里接受治疗的苏呼米同他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干部变动问题。托洛茨基的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的忠实助手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首先从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被撤掉了。

军医斯克良斯基还不到30岁。他积极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并被吸收为陆海军人民委员会部部务委员会的成员，他主管红军的组织和供应工作。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很快就看到了他少有的才能，就让斯克良斯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委员部中作为自己的副手。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他具有“注重实际、埋头苦干、善于识别人和认清形势”的特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能干的管理工作者，或者正如今天说的，他是一个能干的经理。列宁对斯克良斯基评价很高。

托洛茨基写道：“当我不在的时候，由斯克良斯基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他领导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日常工作，主要就是为

前线服务的工作，最后曾在列宁主持召开的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代表军事部门……他始终是准确无误、精力充沛、小心谨慎和熟悉情况的。有关军事部门工作的大多数指令都是由斯克良斯基签名发出的……可以在清晨二三点种给他打电话，斯克良斯基总是在坐在军事委员会里他的办公桌旁。”

很清楚，斯大林是憎恨斯克良斯基的，因为斯克良斯基经常要斯大林服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现在斯克良斯基被调到莫斯科毛织托拉斯去工作了。

1925 年夏天，斯克良斯基在出发去美国为毛纺工业购买新的纺织机之前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一次。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回忆起过去，突然斯克良斯基问他不久前的首长：

“请告诉我，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

斯克良斯基自己很了解斯大林，但他希望听听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个人特点的评价和对他的业绩的说明。这位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高傲地回答说：

“斯大林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平庸之辈。”

斯克良斯基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他们两个人全把斯大林看错了。

斯克良斯基在美国时因掉在湖中溺水而死亡。他的死是非常奇怪的。托洛茨基在悼词中称斯克良斯基是一架“永不停息地工作的卓越的人的机器”。

接替斯克良斯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是伏龙芝，季诺维也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任命伏龙芝是为了帮助托洛茨基，而实际上则是准备取代托洛茨基。

任命了把托洛茨基看作个人敌人的伏罗希洛夫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以取代忠于托洛茨基的穆拉洛夫。同时让伏罗希洛夫参加共和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从军队中撤掉了许多支持托洛茨基的著名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被调到全国各地。安德烈·布勃诺夫取代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担任了政治部主任，他在此之前是党中央的宣传鼓动部部长。布勃诺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从政治学习的课程中取消以《红军的领袖托洛茨基》为主题的对红军战士的一堂课。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坦率地对托洛茨基说：

“我们认为必须对你进行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把你宣布为敌人；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些方法。”

当托洛茨基躺着发烧的时候，全国都被动员起来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托洛茨基只是在 1924 年 4 月下半月才回到莫斯科，这时列宁已被安葬，而托洛茨基则已在事实上被剥夺了权力。

但是责备托洛茨基无所作为，或许这有点残酷吧？因为此时他病得连床也起不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是某种神秘的感染跟随着他，他经常发高烧。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时侯最好的医生也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

1926 年春天，政治局很不愿意地让托洛茨基去了柏林，他希望德国医生能帮助他摆脱总跟随着他的发烧。德国医生决定要给他摘除扁桃腺。不用麻醉就做了手术。医生们准备把托洛茨基的手捆起来，当时做手术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托洛茨基坚强地挺过了这次手术。过了一段时间，体温又上升了，而且怎么也降不下去。

根据医生和作家维克托·托波良斯基的意见，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患的是神经官能症。跟随着托洛茨基的寒热病是神经过敏和感情极易冲动的人易患的一种身心医学现象。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的人。人们知道，他有时候甚至会失去知觉，陷于昏迷状态。

当托洛茨基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的时候，当他准备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或挡住白军进攻的时候，他并不生病。这时候就谈不上有什么神经过敏的问题。而当战争一结束，他的生活中就出现了空白。这时他就开始生病了……

普列汉诺夫曾这样写到托洛茨基：“他具有爆炸性的性格，在顺利的情况下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多事情，但在不顺利的情况也很容易陷入冷漠，甚至茫然若失的状态。”普列汉诺夫的话证实

了上面提到的假设。

但是托波良斯基认为，给他治病的医生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老是怕治不了某种可怕的、他们没有见过的感染，这也使托洛茨基增强了患病的感觉。但是有可能给他治病的医生也是知道托洛茨基的心理特征的。不久前从档案中解密的一份文件证明了这一点。还是在 1921 年 5 月卫生保健人民委员尼古拉·谢马什科写信给列宁说："托洛茨基同志的健康状况又一次恶化了。我要求下列大夫和教授们进行一次会诊。可以看出，疾病恶化的原因有两个：1、过分疲劳；2、由于缺乏食品而未按规定的饮食进食。而他必须遵守严格的食品饮食制（鸡、黄油、白面粉）。

"我恳请十分严格地按医生的要求发给托洛茨基同志食品，准确地执行中央就此问题作出的决定。"

还在 4 月 23 日政治局就作出了一个决定："特令托洛茨基同志前往别墅进行治疗，按照医生的要求选择地点和治疗的时间。责成捷尔任斯基同志对托洛茨基同志执行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

参加会诊的有当时最有名的医生普列特涅夫、格季耶和米诺尔，会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托洛茨基患有慢性结肠炎。可能厚肠壁形态有异常。需要拍 X 光照片以便确诊。

"昏厥是肠部的血管痉挛引起的反射反应，也可能是独立发生的，也就是由于心理原因（过度疲劳）而产生的血管痉挛。必须在夏天的后半期去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一叶先图基）治疗。"

然而托洛茨基之所以败于斯大林，不是由于他的薄弱的心理妨碍了他，而是因为他事实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维护他自己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

托洛茨基具有大量的优点：闪闪发光的智慧、无比充沛的精力、充满激情的讲演才能、英勇无畏、果断和能够承担责任。但这只是他的画像的一部分，托洛茨基也是一个十分自信、不容反驳、说话带刺、缺乏耐心和好行使权势的人。他显示出，他是超过周围所有人的，他不能指望党的机关会热爱他，因为党的机关是仇视个

性鲜明的人的。

而斯大林则不同于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一些人，他从未侨居过国外，对于党内群众来说，他显得像是他们自己的人。地方上的党组织书记们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头头，这些书记们不仅能对群众的情绪起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直接领导挑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

斯大林是搞政治斗争和党的机关斗争的天才。1926 年 12 月末，斯大林写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里指出："我们的反对派都是些笨蛋。鬼让他们去杀谁，他们就会去杀谁。"斯大林是对的。在机关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托洛茨基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对手。

1924 年夏天在列宁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第 13 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用暴风雨般的掌声向托洛茨基表示欢迎和致敬，虽然整个一年来他一直被作为反对派的领袖遭到批判，他的照片已经开始在办公室里消失。

1924 年底，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长篇特写，这篇特写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党的领导人的声望是一个打击，因为他们在十月事件中的作用在这篇特写中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急于要把托洛茨基从政治局中撵出去。但是小心谨慎和不慌不忙的斯大林认为首先必须把托洛茨基从军队中挤出去。

1925 年 1 月 26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当时在军队里人们是怎样对待托洛茨基的呢？

14 年之后，1937 年 2 月，在中央全会上，当谈到军队中的军事阴谋时，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说："应该坦率地说，托洛茨基在 1923 年以前依靠自己的代理人的帮助得以在红中取得不小的成就。

"在 1923－1924 年间，托洛茨基分子，正如你们大家记得的，几乎掌握了整个莫斯科卫戍区，对这一点是应该记住的。几乎是整

个军事科学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学校、炮兵学校，还有莫斯科卫戍区其他部队的大多数当时都支持托洛茨基……”

当1926年夏天安葬捷尔任斯基的时候，托洛茨基还站在主席台上。他的脸部表情十分悲哀。告别辞是总书记讲的。

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后，表示愿意做工业工作。他被任命为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当时没有部门的人民委员，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管全部工业。托洛茨基领导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总租让委员会和科技局。

他也领导了第聂伯水电站建设委员会，为水电站早日投产做了很多工作。斯大林反对这样做，于1926年4月批评托洛茨基为第聂伯水电站花费了太多的钱。当把托洛茨基的所有工作都撤掉的时候，斯大林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就认为第聂伯水电站的建设是最重要的任务。

1926年10月托洛茨基不再是政治局的委员了。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全部党的机器已用全部力量压向他的身上。在这一斗争中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安东诺夫－叶夫谢延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他写到了“对托洛茨基，对这位广大群众眼中的领袖、革命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所进行的卑鄙的攻击”。

但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鹰爪们来说是啃不动的。1927年6月他们把托洛茨基召到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上，指责他破坏党的纪律。那些日子正在休假的斯大林看了会议的速记记录后写信给莫洛托夫说：“给人的印象是，对中央检查委员会来说，这是一团混乱。”托洛茨基在会上提出诘问和谴责，检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无法反驳他的论据。但是托洛茨基的命运不是在公开的辩论中决定的，而是在书记处的办公室里决定的。

托洛茨基在反对派的集会和会议上发言时遭到阻挠和破坏。在中央全会上，人们甚至试图把他从讲坛上拉下来，党内的同志们向他扔书本和水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反对派仍然在举行集会和会议。参加这些集会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

大学生，他们渴望过生气勃勃的政治生活，他们因托洛茨基对党内官僚主义进行的批评而对他表示敬仰。

但是人们从旁可以看出，反对派势必失败。一位在十月革命之前和之后曾在俄国住过多年的美国教授塞缪尔·哈珀写道："反对派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反对派的活动家们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对他们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在俄国甚至在共产党员的队伍里也可看到反犹主义。在反对派人士中有优秀的演说家、老的革命近卫军，但是更年轻的和更具'俄罗斯气质'的共产党人已对革命英雄和他们的演讲艺术感到厌烦了。"

斯大林急于摆脱那些经常讲"当我同列宁交谈的时候"或"如果列宁在的话，他不会这样做"的老人。但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知道对托洛茨基该怎么办。要提出把他逮捕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国家还不会接受把列宁的亲密战友说成是敌人的做法。

1927 年 6 月初，斯大林头脑中曾有过一个想法：是否把还是中央委员的托洛茨基派到日本去当大使，让他离莫斯科远一些？他甚至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提出过这个建议。但他知道，托洛茨基是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的。

1927 年秋天，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放映了一部为纪念革命十周年而制作的记录片。在银幕上经常出现托洛茨基的镜头——在十月的日子里，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在前线都有托洛茨基的镜头，全场在黑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托洛茨基的英勇的光辉尚未消失。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领导人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布尔什维克一列宁派（反对派）提交第 15 次党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党的危机和克服危机的道路）。政治局禁止散发这个文件，但反对派决定秘密印刷这个文件。有一个人建议为反对派提供帮助，此人积极地为印刷这个文件而工作。但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员侦察到了这家印刷厂，把所有人都逮捕了。那个志愿帮助反对派的人原来是一名"前弗兰格尔军官"。于是大家就指责反对派勾结反革命组织，

准备在国内搞武装政变。根据这一指控，托洛茨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来查清，那个“弗兰格尔军官”是国家保安总局的秘密工作人员。

到1927年，反对派遭到了粉碎。所有有名的反对派分子（总数差不多有150人）都在国家保安总局的代表的监督下被驱逐出莫斯科，而流放到边远的城市中去。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说必须把反对派从党内清扫出去。托洛茨基对这些话作出了尖刻的回答：

“一讲到清扫，你心情就好。你们要的是宪兵的铜牌和扫把，这就是你们的全部纲领。”

1927年11月7日，反对派举行了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未来的苏联火箭－宇航技术的创始人之一鲍里斯·叶夫谢耶维奇·切尔托克当时是个中学生，他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在莫霍瓦亚最后搞的那次公开活动的见证人。他回忆道：“在加里宁的接待室所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楼上挂了托洛茨基的像。季诺维也夫从四楼的阳台上发表演讲。突然阳台上出现了军人，他们开始用长杆揭去托洛茨基的像。人们在下面发狂地呼叫。无法弄清楚，在这里究竟哪一派的人更多些，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还是反对他们的人。从莫斯科大学的大门里有一队托派大学生唱着《国际歌》走出来。在大街上人们开始对骂吵架，在对骂中很难弄清楚谁是支持谁的。”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行动人员和专门挑选出来的一批党的工作人员和工人参加了驱散反对派的活动，他们被告知，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夺取国家政权。这一行动的参加者之一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参加了检阅。但在检阅前参加了驱散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动。他们在夜里占领了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把所有叛变信仰的人都召集到那里。他们想组织自己的纵队去红场，喊着反革命口号，想把检阅搞乱，并掀起反对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叛乱。但是我们在叶洛霍夫斯基大教堂附近遇见了他们。发生了冲突。大家把托洛茨基分子驱散了。”

鲍里斯·切尔诺克写道，次日在他的班上昨天的事件成了讨论

的主要题材："在课间休息时间我们喊着'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冲进旁边的7班（乙）。他们准备防卫。在黑板上写着'向富农开火，向耐普曼开火，向官僚主义者开火！'的标语。在经过一阵轻微的冲突之后，我们谈好要以较文明的方式进行辩论。"

但是斯大林周围的人中，大家谈好要采取的正好是相反的方式。十天以后，托洛茨基的一个老同志、前中央委员、失去了工作和严重患病的阿道夫·越飞在自己家里开枪自杀。他临死前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越飞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不仅谈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几十年的友谊："我始终认为，你缺少列宁那种坚持不懈、毫不退让、即使一个人也要坚持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以待在将来得到大多数人承认这条道路的正确性的精神。

你从1905年开始在政治上一直是正确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说，我亲耳听列宁说过，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你。人在临死之前是不说谎话的，我现在再一次重复这一点……但是你常常迁就于你对之估计过高的那些协议与妥协而放弃自己的正确之处。这是错误的……

你是正确的，但是要使你的正确性取得胜利的保证，恰恰就在于决不退让，在于坚持勇往直前，在于完全不做任何妥协，伊里奇的胜利的秘密就在这里。

我早就多次想给你说这一点，但是只是在现在，在与你诀别的时候，才下决心给你说。"

在越飞的葬礼上安排了乐队和仪仗队，但是葬礼被安排在工作时间举行，以便使参加葬礼的人尽可能少些。在新处女墓地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托洛茨基讲了话。这是他被流放之前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

1927年11月他被开除出党。第二年被流放去阿拉木图。但是他的存在仍然使斯大林感到不安。斯大林仇视这个人，但还是害怕这个人。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个特别会议草拟了由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流放托洛茨基出国的决议（但是只是在3

年以后，到 1932 年才取消托洛茨基的苏联国籍）。

用火车把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属送到了敖德萨。他的档案和图书已预先装上了“伊里奇”号轮船。1929 年 2 月 10 日把托洛茨基带上了轮船。船长收到了一封密封的信，命令他出海以后才能打开这封信。

墨西哥夜之梦

被驱逐出国后，托洛茨基曾几次试图去英国。关于这一点，人们是在不久前当英国人把外交部的文件解密后才知道的。著名的作家萧伯纳和赫伯特·韦尔斯支持托洛茨基的要求，但是英国政府不想因接纳斯大林的死敌而激怒苏联。

托洛茨基只能在远离当时的主要政治斗争的墨西哥找到一个栖息地。他的支持者都逐渐被消灭了。在基洛夫于 1934 年被暗杀后，在全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中都建立了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分队。斯大林称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根据外国间谍机关的任务行动的赤裸裸的和毫无原则的破坏者、暗害者、间谍、杀人犯匪帮”。（自译，未查到《斯大林全集》中译本上的译文）以后在莫斯科的审判中将要说，托洛茨基与希特勒一起，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帮助下准备分裂苏联，并恢复资产阶级政权。

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们企图挽救自己，他们写了忏悔信，希望斯大林能相信他们的忠诚。前红军政治部主任安东诺夫－叶夫谢延科 1936 年在《消息报》上写道：“我深深地感到惭愧，因为在 1923－1927 年间我支持了托洛茨基，尽管我曾听到了明确的警告声……只是在 1927 年 10 月我才在事实上与反对派决裂……那时我写信给卡冈诺维奇说，在对待反对派分子的问题上‘我准备完成党交给的任何任务’。一直到把他们作为凶恶的反革命分子枪决。”

托洛茨基在侨居国外时写了很多东西，但并不总是准确的。不

过他的有些历史预测还是实现了。他在1931年预言说，法西斯分子可能在德国取得政权。他在1933年还预言说，希特勒正在准备发动战争。托洛茨基在他的札记中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一个欧洲的合众国，在欧洲国家之间海关障碍将消失，将会有统一的立法。

1939年春天，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已准备好与希特勒建立联盟关系。到秋天，这个令全世界困惑不解的联盟就建立起来了。1939年9月2日，托洛茨基警告说，两年之后希特勒将进攻苏联。两年还没有过，这一悲剧性的预言就应验了……

1940年春天，托洛茨基在自己的遗嘱中写道："我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自然也作为一个不可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不论我将在什么情况下逝世，我将带着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坚定信念死去。"

他已经病得很重，他为此写道："如果血管的硬化变得严重起来，如果我将面临长期瘫痪的威胁……我保留由自己决定何时辞世的权利。"

但是斯大林给他解除了由他自己作出这个困难决定的必要性。全世界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已不是那么多了，他的思想的吸引力已经减弱了。但是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仍像过去一样是危险的。斯大林热切地希望把被驱逐出俄罗斯后居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杀掉。他最强烈地憎恨的就是托洛茨基。

1940年5月末，对托洛茨基进行了第一次谋杀。20来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解除了看守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离墨西哥市不远）的家的警卫的武装，向屋里投了爆炸物，并开机枪扫射。

托洛茨基幸免于难，但是从那天开始他就生活在即将遭难的气氛之中。每天早晨他都向妻子说：

"瞧，他们这一夜没有把我们杀死，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没有任何堡垒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不能夺取的。1940年贝利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帕维尔·苏多普

拉托夫。直接领导这一行动的是未来的将军艾廷根。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叫拉梦·默尔卡德尔的西班牙人来做这个任务的执行者。他是烹饪学校的毕业生，在巴塞罗那的“利茨”饭店工作，受到苏联间谍的招募。他的母亲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在第一次谋杀事件后过了5天，未来的杀人犯渗入到了托洛茨基家中。他自称是比利时外交官的儿子，名叫雅克·穆尔纳尔，而他使用的是一个名叫弗伦克·杰克逊的人的伪造的加拿大护照。

8月20日默尔卡德尔来到托洛茨基家中，虽然天很热，却穿着风衣，戴着礼帽，他请求托洛茨基看一下他的一篇文章。当托洛茨基拿着他的文章阅读的时候，默尔卡德尔拿出一个冰镐（他身上还有榔头和手枪），闭了眼睛，用全部力量猛烈地向托洛茨基的头部打去。他想一下子就把托洛茨基击毙并逃跑。但是托洛茨基与他争斗起来。默尔卡德尔在慌忙中甚至不会使用手枪了。警卫们听到了声音，跑进屋内，把凶手抓住了。

第二天托洛茨基在医院里去世。约有3万人前来与托洛茨基告别。托洛茨基的家属也差不多全被杀害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一个原则——敌人的家属也要为敌人负责。

托洛茨基的儿子中的一个（他的两个儿子都用母亲的姓，他们不想无功而享受父亲的荣耀）是工程师谢尔盖·谢多夫，他不搞政治，而是搞学术研究的。他拒绝同父亲一起出走而留在了苏联。他在莫斯科的高等技术学校教书，他连政治题材的谈话都不参加，他天真地以为当局不可能对他会有什么意见。

自然，这不可能帮他什么忙。起初谢尔盖·谢多夫于1936年被流放去沃尔库塔。后来又被逮捕并遭枪决。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婿也被枪决了。他的一个女儿1927年在莫斯科死于肺痨，第二个女儿于1933年死在柏林。第三个女儿从1937年起一直居住在西伯利亚，但她活下来了。只是在1962年，当她满87岁时，克格勃才停止跟踪她。

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战斗性格。他随双亲去了

国外，成了父亲的忠实助手。他居住在巴黎，试图把志同道合者团结起来，但没有想到，他是被苏联间谍的情报员包围着。1938年初他接受了盲肠割除手术。手术进行得很成功，但4天后他的情况恶化了。不得不做第二次手术。2月16日列夫·谢多夫死于巴黎的一家医院。很少有人怀疑，他的死亡是苏联间谍搞的。

* * * * * *

列夫·托洛茨基是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他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写道，他的命运慷慨地摒弃了荣誉和喜悦、不幸和悲哀。托洛茨基看到了他最大胆的梦想是如何实现的，如何在顷刻之间他的思想得到了实现，所以他是一个胜利者。他也看到了他的一切希望的破灭和他自己的沉沦。

列夫·托洛茨基在他生命的晚年对列宁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同列宁进行过那么多的争论。历史学家们说，列宁对托洛茨基怀有某些戒心，因为他不喜欢理想主义者，他更器重实践家，认为实践家易于在险峻的历史道路上作出转折。

托洛茨基与列宁（也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是狂热地崇尚权力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不管怎么说，在第一批胜利者中，他是惟一一个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信念的人。

在斯大林下令把他杀害之前不久，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昨夜我做梦与列宁谈了话。他担心地询问了我的病情：'你有神经疲劳症，你应该休息。你应该找医生好好医治。'我向列宁说了我于1926年去柏林治疗的情况，并想补充说：这是在你去世以后，但我止住未说，而指出：这是在你患病之后。"

多么奇怪……这个人们喜欢称之为革命的魔鬼的列夫·托洛茨基，在他生命的晚年，常觉得他受到过列宁的保护和关爱。

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仍像过去那样存在着托洛茨基运动。而在托洛茨基的祖国，一些人把他视为列宁、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的敌人，另一些人则相反把他看作狂热的反俄分子，企图为

世界革命而毁灭俄国。但是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与整个欧洲同时进行才有可能。许多历史学家由此认为，托洛茨基对俄国不感兴趣，而斯大林考虑的只是俄国。还认为托洛茨基藐视俄国文化，而斯大林尊重俄国文化。但是斯大林有计划地消灭了俄国的知识分子，而托洛茨基只不过是写了几篇批评作家和诗人的文学批评文章。

直到今天，列夫·托洛茨基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革命的魔鬼、俄国的历史敌人，或者简直就是世界犹太主义的恶魔和首领，是国家的毁灭者。

《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的主编写道："20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对抗的噩梦，我把这场噩梦称之为托洛茨基与洛希尔的战斗……他们像宗教神话中的奇形怪状的巨人歌革和玛各[①]那样耸立在俄罗斯命运的两边……他们为什么在冷笑呢？那是因为俄罗斯人民为了把他们逗乐而在互相殴打，把对方推向墙壁，在集中营里监禁折磨人，用棍子殴打人，用喷水机喷射人。是的，那不是为了取乐，不，那是为了'得利'。"

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可以读到说托洛茨基是希特勒的盟友的话。这本杂志对一些不好深究的读者讲得更加简单明了："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是从与洛希尔家族的远亲谢多瓦娅结婚开始的……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的谋刺案的线索伸向托洛茨基。是靠洛希尔家族的钱把有名的革命家用密封车厢运进了俄国；是靠这些钱一个小小的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变成了俄国的强大和有影响的政党，是为了托洛茨基而谋刺列宁，安排了著名的'领袖遗言'，以便把斯大林从政治地平线上搞掉，并在俄罗斯把全部权力都转交给托洛茨基……"

一些并不掩盖自己的反犹主义的作家们几十年来在他们的作品

---

① 歌革和玛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话中所说的两个野蛮民族，一旦这两个民族袭来，"最后审判"的日子就快来了。——译注

中说，托洛茨基的残暴可用他的犹太出身来说明：他既不可怜俄罗斯，也不可怜俄罗斯人。

但是托洛茨基的一些同时代人又是如何看他的呢？还在1918年1月，对布尔什维克持批评态度的知名作家亚历山大·安菲捷阿特罗夫在《彼得格勒之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托洛茨基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的文章。安菲捷阿特罗夫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同那种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与俄罗斯格格不入的‘外来人’的一般看法进行论战。

安菲捷阿特罗夫写道："托洛茨基，相反，不具有犹太人的传统特征——小心谨慎、有文化和善于适应环境。可悲之处正好在于，托洛茨基把大俄罗斯主义者的特征掌握得太好了，而且他掌握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特征：自夸自大、好斗架、粗鲁、轻浮、凶狠、善于忍受侮辱。"

事实上民族主义对托洛茨基来说，犹如对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一样，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些人并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波兰人、格鲁吉亚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越民族的人，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是世界性的任务。他们在给自己寻找朋友和敌人时，完全不拿种族原则来做指导。斯大林的小儿子曾秘密地对他的姐妹说："我们的父亲以前是格鲁吉亚人……"，这并非偶然。斯大林后来的反犹主义、他把许多民族强行迁走——那是另一种类型的现象。

仇视托洛茨基的一些人说，谢天谢地，托洛茨基没有掌权，要不然将比斯大林更坏……但是难道还有可能更坏吗？

第二章

契切林：一位不适应现实生活的人

1934 年春天，机警的肃反工作人员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揭穿了同性恋者们的一个阴谋。外交人员对性生活方式的倾向本身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可是卢比扬卡也承担着关注国家机关人员的道德纯洁的责任。那些具有非传统道德倾向的人被他们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潜在敌人。也许，这正是由于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最早认为在同性恋者中间招募间谍是较为方便的。因为第一，那些被迫过双重生活的人善于保守秘密。第二，在同性恋群体中较容易找到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人。而任何秘密在床头上都是可以被打听出来的。

在英国，30 年代初有过一个同性恋者左派分子协会，称作同性恋国际。苏联情报机关就曾利用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提供的服务；该英国人后来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成功的间谍，他的名字叫盖伊·伯杰斯，是名人基姆·菲尔比的朋友和战友。交给伯杰斯的第一个任务是招募英国国防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与那个情报目标建立了亲密关系，也就容易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苏联情报机关的老特工们有时抱怨，人们总不是用最热情洋溢的话来描绘他们招募到的间谍人员。唉，但是特工机关的真实史书甚至对他们的英雄也是不用最吸引人的话语来描述的。非常态的性生活方式和家庭问题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由于受不到世人的重视和承认而对人世的抱怨，职务升迁的困难，秘密指挥身边人员的愿望——就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世界一大批青年人落入了间谍招募人员手中……

但是，如果苏联情报机关可以这样巧妙地招募同性恋者从事间谍活动，那么其他国家情报机关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这种不高明的思想指导着肃反工作人员的行动。于是就把同性恋者的小圈子看成是间谍的巢穴。第一个被逮捕的就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司司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弗洛林斯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向总书记斯大林报告说："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消除莫斯科同性恋策源地时发现，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司司长德米特里·弗洛林斯基是一个同性恋者。

"我们把弗洛林斯基召来，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并说出了自己到目前为止与年轻同性恋者的联系，其中多数是第一次被弗洛林斯基拉入同性恋圈子的。

"与此同时，弗洛林斯基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他在此声明中说自己在 1918 年是领取报酬的德国特务，是被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秘书招募的……

"我们认为，必须解除弗洛林斯基在外交人员委员部的工作，并追究其责任。"

弗洛林斯基是基辅大学校长季莫费·弗洛林斯基的儿子，其父于 1919 年被布尔什维克枪毙。弗洛林斯基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在革命前，他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并进入外交部工作。曾在驻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大使馆和驻里约热内卢（巴西）大使馆工作。1920 年弗洛林斯基被安排在苏联人民外交委员部工作。他同时领导礼宾司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司的工作。所有的人都知道，弗洛林斯基是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的人，后者从 1918 年至 1930 年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斯大林的反应是："1. 建议采纳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意见。

2. 责成卡冈诺维奇同志审查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体工作人员并把审查结果报告中央。"

对苏联外交官性行为方式的审查，变成了对外交人民委员部人员的一场大的清洗。国家安全机关编造了一个指控外交官充当间谍的大案。从各方面情况看，他们打算把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本人置于阴谋的中心地位，因为他们把他也看作同性恋者。

性格古怪、孤僻自守、不爱交往的契切林总是躲避女人，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惟一的朋友就是被安娜·阿赫马托娃[①]称作自己老师的诗人和音乐家、高雅艺术至上者米哈伊尔·库兹明。库兹明是俄罗斯诗歌最兴盛时代的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不隐瞒自己的同性恋爱好，并认为自己是同性恋歌唱家。契切林和库兹明之间整个一生都充满了温柔的友谊。他们同年生，同年去世。

但是，揭露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性恋者的阴谋的这段历史仍然放过了契切林本人。在这之前，他已经退休了4年，经常患病，任何活动都不参加，任何人都不会见。正是这一点救了他一命。镇压绕开了契切林。他得以病死在床上。

精神上的崩溃和对神秘主义的迷恋

最滑稽可笑的是，几乎一直沿用到苏联解体前的苏联外交基本原则是由本身没有任何苏维埃成分的契切林制订的。

世袭贵族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领导苏联外交工作12年。他是继托洛茨基之后的第二任外交人民委员和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位职业外交家。他是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位不能适应苏维埃生活的悲剧性人物。契切林（党内的化名是阿·奥尔纳茨基）按正式的登记材料于1872年11月20日（实际上他是11月12日降生——在填写出生登记表时误写为其他日期）生于坦波夫省基

① 安娜·阿赫马托娃（1889～1966），苏联俄罗斯女诗人。作品有诗集《光明的飞逝》（1909～1965）。——译注

尔萨诺夫县卡拉乌尔村的自家领地。那里至今还有一个契切林博物馆。他是惟一一位名符其实的、无愧于这样的称号的俄国外交部长。

契切林家族是渊源悠久的世袭贵族。该家族起源于阿法纳西·契切尔尼，此人是于1472年，作为拜占庭帝国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的侍从人员，从意大利来到俄国的。索菲娅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阿法纳西·契切尔尼的儿子便改姓为契切林。他的重孙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在1552年攻打喀山时牺牲。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的孙子伊凡·伊凡诺维奇书记[①]1613年在归顺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帝国的证书上签了字，此后曾任乌法市和喀山市的军政长官。

契切林家族中还有一些其他著名人物。基里尔·拉夫连季耶维奇在1698年担任姆岑斯克市军政长官，之后又任沙皇宫廷官员和盐务署顾问。丹尼斯·伊凡诺维奇将军在1863年被任命为西伯利亚省省长。两年之后，阿留申群岛亦归其管辖（该群岛1867年与阿拉斯加一起被卖给美国)。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在1764年被任命为警察局长。叶卡捷琳娜二世授予他上将军衔并任命他为参政员。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是骑兵上将，曾参加过与拿破仑的战争。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就出生在这个家族。

他的叔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契切林是著名的法学家和哲学家，是莫斯科大学国家法教授，在1882～1883年担任莫斯科市行政长官。他是一位光明正大的人，在俄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但从本质上看，他是受社会排斥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退休后回到了卡拉乌尔村的家族领地。

他的著作用词非常美，不仅吸引了俄国社会中善于思考的阶层，而且在国外具有广泛的读者。契切林教授以思想解放和主张自由而闻名。他这样批判斯拉夫派：“他们一点也没有唤起俄国社会

① 14～17世纪俄国中央集权国家机关的负责官员。——译注

的自我意识，却给那些反对盲目崇扬俄国的愚昧和无视欧洲教育的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泼冷水。”

他写道，只有为了他人自由才可以限制个人自由。只要一个人没有妨碍他人自由，就不应当强制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在社会主义中只看到了阴暗的一面。

他的侄子，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未来的委员，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喜欢他的这些思想。可是这位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却完全同意他叔父的其他思想。如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一切事物都是靠实力决定的，而且这种规则不可能改进。契切林教授还认为，在极端需要的情况下，最高权力当局为了社会的利益可以违犯法律。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侄子和苏维埃俄国政府的同事把这种例外的情况变成了常规。

未来的人民委员的父亲瓦西里·契切林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曾任俄国驻意大利皮埃蒙特公使馆秘书。1859 年与男爵小姐乔治娜·叶戈罗芙娜·迈恩多夫结婚。婚礼是在热那亚海港俄国军舰上举行的。多年之后，他们的儿子这颗外交家明星就是在这个港口城市升起来的。

老契切林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很早既讨厌外交工作，又讨厌世俗生活。对生活丧失信心导致他信仰福音教派——基督教派中的新教，类似于洗礼教派。在俄国，把这类教徒称为雷德斯托克教派（它是根据 1874 年来圣彼得堡市布道的英国勋爵雷德斯托克的名字命名的），后称为帕什科夫教派。退役上校 B. A. 帕什科夫崇拜雷德斯托克勋爵的思想并创立了“鼓励精神道德读物协会”。帕什科夫教派不主张实行精神上的等级制度，不赞同圣礼仪，挂圣像，总之，反对一切宗教仪式。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命令，帕什科夫被驱逐出俄国。他生活在英国，死于 1902 年，但是在他死后，该教派的信徒数量继续上升，而且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年代里，增加到 12000 人。他们称自己为“新福音教派”。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契切林没有正式同东正教断绝关系，

但是一直受到雷德斯托克勋爵思想的强有力影响。当遭到他的妻子乔治娜·叶戈罗芙娜的患有精神病的堂兄弟鲁道尔夫·迈恩多夫男爵严重的侮辱时，老契切林的外交生涯结束了。此后应当进行决斗，但是按照宗教的教义，瓦西里·契切林拒绝拿起武器。根据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他不得不提出辞职。他放弃了工作并回到自己在坦波夫省卡拉乌尔村的世袭领地。在这里开始对没有进行决斗和被迫辞职感到十分痛苦。他感到，周围的人都把他看作懦夫，因为他拒绝决斗。为了证明自己勇敢，他同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起自愿参加了巴尔干战争。他不顾自己生命危险，从战场上抢救伤员。这一行程给他留下致命的后果——他患上了肺结核，而且病情很快就恶化了。由于疾病，他已不能工作，便回到了家乡，4 年后去世。

父亲的疾病和去世，给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童年的心灵，留下了凄惨的印象。用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自己的话说，他是在一个与现实脱离的狂热氛围中成长的孤独的儿童。他经常站在窗前以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沿街行走的中学生们。他渴望交际。但是，契切林家族封闭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他与同龄人的交往。全家一起祈祷、唱圣歌、朗诵圣经，这成了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与同龄人隔绝的他，很早就喜欢阅读严肃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历史作品。当时谁能想到，这对他后来是如此有用。

父亲去世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叔父成了格奥尔吉·契切林的监护人。未来的人民委员这样评价叔父家庭的知识氛围："叔父和婶母在智慧和开拓能力方面都是不平凡的人，所以这里有最高级的知识氛围，在这里居住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母亲教会了格奥尔吉尊重艺术，并教育他要满腔热情地对待不幸的人。他把农民生活理想化。家庭的贫困培养他懂得了什么是委屈。他觉得自己是受凌辱和委屈的人。在他身上出现了悔恨自己和妄自菲薄的思想倾向。天生的腼腆和性格孤僻对他也产生了影响。他是在对未来生活没有信心的思绪中成长的。在中学里他感到非常痛苦——他不善于处理同学关系。他一生性格古怪，习惯与外界隔绝。除米哈伊

尔·库兹明外，他实际上没有朋友。他们俩是1886年在契切林一家迁到彼得堡之后和格奥尔吉开始在第八男子中学念书时认识的。他与库兹明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俩人的性格极其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精神世界非常相似，对音乐和诗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米哈伊尔·库兹明在日记中写道："在五年级时契切林来到我们班，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契切林一家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很高兴，因为在一个大的贵族家庭里玩得很开心……对音乐的爱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经常一块儿去听'别利亚耶夫音乐会'（为了介绍俄罗斯的一些作曲家而在彼得堡举办的'俄罗斯交响乐音乐会'），一块儿研究莫扎特，参观剧院的艺术长廊。我开始作曲，而且我们还在家人面前演奏我们自己作的曲子……"

未来的人民委员被理查德·瓦格纳[①]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他的四联剧中的《女武神》[②]深深打动，他认为这部音乐剧是值得赞颂的，是一部歌颂暴动者的悲剧。契切林本人也创作了描述宗教问题的音乐作品。他的音乐爱好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爱上了莫扎特，而且直到去世前仍醉心于莫扎特的作品。库兹明与契切林一样，也醉心于莫扎特的音乐作品。而且他能极精彩地演奏莫扎特的作品。在俄国音乐学史上，契切林是在莫扎特去世多年后出版的惟一一部关于莫扎特的巨型专著的作者。"我心中只有革命和莫扎特"——契切林在给他的也在从事音乐作品创作的哥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另一封信中，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再次谈到了这个想法："对我而言，莫扎特是我整个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

① 理·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歌剧革新家。其音乐具有极大的感人力量、表现力和形象性。写有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特》、《众神的黄昏》（1854～1874）等。——译注

② 《女武神》描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帮助英雄们战斗等。——译注

和同志，我一生都伴随着他……”

契切林在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受过极好的教育。他学历史是从师于《俄国历史教程》的作者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院士本人。契切林是在精神完全崩溃的状态下念完大学的，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自己就曾忧伤地这样说过。疾病使他的这种心理状态变得更加严重——他向来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经常感冒，常去德国治疗。当时德国医学在俄国受到很高的评价。

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受到了仇恨生活的心理的折磨，迷恋于神秘主义。当他发现他不像其他少年时，契切林的主要问题开始产生了。库兹明同样也受着那种心理状态的折磨，他向契切林倾诉说：“我的整个灵魂就像被马蹄踏坏的菜园一样。”

夏天，两个少年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契切林的庄园里休息。两个人都臆想自己爱上了姑娘，但是性格又吸引他们去爱男子。在这些话题上契切林没有发表意见。有一次库兹明放纵了自己的感情，他的倾诉使人明白，他在爱着未来的外交人民委员。米哈伊尔·库兹明处在严重的自相矛盾的境遇之中，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是在没有人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要求中度过的。生活对他来说是苦难、绝望，他想出家为僧。

契切林在国外生活了两年，同样经受了失望和痛苦。他令人感动地关心着米哈伊尔·库兹明，企图劝说他参加宗教活动，当朋友感到不好时，就毫不迟疑地帮助他。首先向他提供资金帮助。

库兹明不久回到了俄国，契切林仍留在德国居住。他在给曾任俄国参政院第二部七等文官的尼古拉哥哥的未婚妻和后来的妻子的信中说：“尊敬的娜塔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我请求您，因为您从一开始就对库兹明非常好，并善于尊重他的与众不同的性格。请求您现在照顾他。他的大约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活已遭毁灭。他从童年起就同他母亲两人生活在一起，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毫无疑问，他完全孤立无援和不知所措。不能让他这样孤独无援……他是一位‘吃现成饭的宫廷乐师’，他生来就如此，也应当

如此。我认为我能每月供给他100卢布……主要是现在——在毁灭性剧变的第一时间就支持他。再次请求您照顾他！深深尊敬您的尤·契切林。”

请求被满足了，但是库兹明经常缺钱，而契切林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德国给他寄支票。他为自己的这个没有实际生活经验的朋友感到担心：“你现在是在亲戚家里。如果你开始在异国他乡旅行的话，天晓得你会落入何种骗子手中！像你这样没有数学脑袋的人，他们将欺骗和敲诈勒索你……”

自己知心朋友的回信真的令契切林悲叹不已，他每周都给他写信：“亲爱的米沙，你来信的语调悲伤——这十分令人担心。我完全不知道有无特殊原因，还是没什么缘故。如果没什么缘故，那么很快就会过去的。即使有特殊原因，也一定会过去的。光明可变为黑暗，而黑暗同样会变成光明。要是现在能见面该多好啊……”

库兹明温柔地称他为“亲爱的尤沙”，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感到寂寞，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经常发生分歧。不久库兹明就不再迷恋于民族主义者、“俄罗斯人民同盟”[①] 的思想家们，尽管他在给契切林写信时仍然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契切林对极右思想家同样感兴趣。他少年时的朋友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尼科利斯基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人物——法学家、诗人、演说家、第一位出版亚历山大·勃洛克[②]著作的编撰者。同时，从观点上看尼科利斯基是一位坚定的黑帮保皇党分子（1919年肃反工作人员将其镇压）。契切

---

① 俄罗斯人民同盟，系俄国的黑帮组织，1905年10月成立于彼得堡。其任务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迫害非俄罗斯民族。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取缔。——译注

② 亚·勃洛克（1880～1921）俄罗斯诗人。著有《美女诗草》（1904）、诗集《城市》（1904～1908）、《恐怖世界》（1908～1916）、《报应》（1907～1913）、《十二个》（1918）等。——译注

林在尼科利斯基的文章中发现，“对生活、对自己和对一切存在事物的蔑视是不依存于任何条件的现象。”但是，这种迷恋尼采哲学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民族主义者也没有引起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的同情。

1905年末契切林在给库兹明的信中写道：“现在最令人感兴趣的最现实的就是，概括起来讲什么叫作‘黑帮’。这可以说是极端反动的歧视异族的组织、贩卖婢女市场（从彼得堡婢女市场的名称而来）般野蛮的民族主义。毫无疑问，这种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这不是古代的民间文化，不是古代教堂里的合唱，不是旺代①。这是民间滑稽草台戏，是瑟京②浅显通俗的小册子，是便宜小报上杀气腾腾的小品文，是带血腥味的幻想和下流小说的语言……这是散发着廉价的国家专卖白酒气味的小饭馆，这里出售便宜白酒，还有管风琴演奏或开着留声机，并有刊登凶杀小说的报纸可读。约翰·喀琅施塔得茨基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佐西玛和列斯科夫小说中的人物马拉费，就像粗俗的现代东正教和粗野的民族主义对待传统的古老民间文化和古代的笃信宗教一样”。

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各自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库兹明不再违抗不可逃避的事情并放纵了自己的感情。他不再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并获得喜欢他的人的理解。世纪之初，在首都有相当多的思想自由解放的人，他们认为，不应当指责人们的非传统的性行为方式。

契切林全家对待库兹明的性癖好非常温和。只有一次娜塔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征求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的意见：能否把库兹明带到农村去，他是否不再奸淫农村的男孩子？

---

① 法国西部省份。在法国大革命和执政内阁时期是王党叛乱中心。——译注

② 瑟京（1851～1934）俄国启蒙派出版家。1876年起在莫斯科从事出版事业，出版课本、通俗科学读物、民间历书等。——译注

经过 15 年痛苦的心理失调后，库兹明恢复了宁静和自信。库兹明在第一次革命之后不久所写的小说《美景如画的小屋》和《翅膀》在俄国社会被看作是为同性恋的辩护词。《亚历山大之歌》至今仍被诗歌爱好者所称赞。库兹明写诗、轻歌剧和作曲，亲自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的声望之高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个子不高、纤细和柔弱的男子，他的脸不知像法乌努斯[1]，还是像年轻的萨提里[2]——现代人们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最有先见之明的人们怀疑他脸上带着假面具，以逃避尘世。但是，人们怎么也不明白，他究竟在什么地方摘下假面具，并露出他那有一双描着眼圈的眼睛的真实面孔。

革命毁灭了库兹明。他说是内心的恐惧而不是表面的可怕，他被搜查、逮捕和在他周围广泛发生的枪杀事件吓得他胆战心惊。他突然变老了并失去了自己昔日的美貌。但是，人们没有触动他。只要契切林仍是人民委员，就一直继续出版库兹明的作品……

契切林本人失去了公开表达自己感情的权利。他与外界隔绝，只是埋头工作和听听音乐。他非常孤独，几乎不与任何人交往。他周围的人们看到，他总是避开妇女，于是就猜测到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同性恋不被看作犯罪。

回国后，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进入外交部档案馆，在那里工作了 6 年，但是他对这种工作不感兴趣，尽管他有机会很详细地研究 19 世纪的俄国外交史。正如后来契切林所写的那样，他感到为解放受苦的人类而开展实际工作的号召在召唤他。从事某种人们需要的实际工作的愿望，改变了他的命运。

---

① 罗马神话中的森林和田野之神，牧群和牧人的保护神。——译注

② 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森林诸神之一，色情狂。——译注

靠母亲的钱干革命

1904年春天，他再次去了国外——这一次是为了研究革命文学。在德国他认识和结交了著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对契切林来说，他是革命者的典范。契切林得出结论，他喜欢革命工作。

1905年契切林在柏林分部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参加了孟什维克派，认为他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最密切。

他在德国使用别人的护照。警察扣住了他——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不言而喻，法院判决把他从德国驱逐出境，但是，他仍居住在当地，没有人来打扰他——因为当时是自由时代。后来，他还是去了巴黎，在那里的政治侨民中间发挥了显著作用。他是靠继承母亲遗产的钱在这里生活的。他把大部分遗产缴了党费。

他的叔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立下遗嘱把祖传的庄园交给他："亲爱的尤里，你是家中惟一出生在卡拉乌尔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决定，庄园应由你继承，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拒绝继承庄园，认为他应当忘却自己的贵族家史。

他在国外——在法国、奥匈帝国、瑞士、比利时、荷兰、英国，总共度过了14年。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契切林正好在英国。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在伦敦领导一个委员会，组织那些逃避沙皇警察迫害而流亡在国外的政治侨民返回俄国。像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他反对战争，并要求签订和约。在战争局势下，这类公开言论被认为是刑事犯罪。1917年8月，因为宣传"失败观点"，英国人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布里克斯顿监狱。但是，托洛茨基以最不寻常的方式把他救了出来。

十月革命后，恐惧的外国人纷纷逃离俄国。然而停止向英国人

签发出境签证。托洛茨基宣布，任何英国人包括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在内均不得离开俄国。当愤怒的英国人要求说明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回国时，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们讥讽地回答道：

“给你们发签证，我们需要与契切林商量。没有契切林，就不能发签证。”

1918年1月3日，英国人释放了契切林。几天之后他回到了俄国。

人们都认为，列宁把契切林安排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是为了让他纠正托洛茨基惹的祸。而实际上最需要他的是托洛茨基本人。契切林马上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而且几天后就在人民委员部机关接替了要去瑞士担任大使的伊万·扎尔金德的全部工作。

为了内部使用

契切林成为托洛茨基难得的人才。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位欧洲通，欧洲主要国家的语言他都会说，而且到了中年还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他有在外交部工作的经验，为托洛茨基承担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全部工作。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卡特称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是不知疲倦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人员、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者。

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契切林可有表决权。1918年3月13日，当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呈后，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被批准担任“临时副人民委员”，而5月30日便被任命为全权的人民委员。这一任命在党的老同志中引起了不满，因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在党内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契切林在党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意见。

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苏维埃外交政策的管理原则：领导外交工作的应当是不具备政治声望的职业外交家、专家。他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了说明：

"日常工作可以由契切林主持，而政治领导则应当由列宁自己承担。"

即使如此，党内的上层分子也没有摆脱对契切林所持的某种轻视和高傲的态度。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常有非常清醒的判断，但是人们并非总能听取他的意见。不太内行的，但有更高权威的人常占了上风。

例如，契切林企图干预把有争议的领土——有大量亚美尼亚族居民的卡拉巴赫和纳希切万——划归阿塞拜疆的做法。契切林认为，应当考虑亚美尼亚的意见。他似乎感觉到，今后定会因为卡拉巴赫爆发真正的战争。但是，外高加索边疆区书记、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认为，这些领土应当交给阿塞拜疆，因为这个共和国比亚美尼亚重要。奥尔忠尼启则说服列宁，"不应当在它们之间举棋不定，应当明确地支持其中的一方，在当前情况下，当然是支持阿塞拜疆和土耳其"。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1920 年 8 月 10 日签订的塞夫勒和约[①]决定了它的命运。土耳其应当承认亚美尼亚独立，而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则请仲裁法官——美国总统予以裁定。

但是塞夫勒条约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条约。反对该条约的不仅有土耳其，而且还有把土耳其看作是友好近邻的苏维埃俄国。1921 年 3 月 16 日签订的苏土条约把相当一部分亚美尼亚领土留给了土

---

①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帝国主义条约之一。协约国和加入协约国的其他国家为一方，苏丹土耳其为另一方于 1920 年 8 月 10 日在法国塞夫勒市签订。条约规定了对奥斯曼帝国（包括土耳其）领土的分割方案。该条约 1923 年在洛桑和会上被废除。——译注

耳其。

列宁本人就把外交仅仅看作是对实际政策的一种掩饰，他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任何口号，甚至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口号，只要它们有助于“分化敌人”，都是有用的。列宁教导自己的人民委员说，不应讲出国家的实际计划，谈论将来要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不要使用“可怕的语言”。国内战争后，针对俄英商务协议的签订，在一次中央例行全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列宁亲自起草的秘密决议，其中就谈到：“通知所有东方各国，告诉它们我们将蒙骗英国，但是仅仅由大使口头通知，不用任何文件。”

列宁的这个遗训——撒谎就是苏维埃外交，将贯穿于各个年代中，但是，中央后来没有再作过如此坦诚的决议。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创造了记录——他领导外交部 12 年，而在那个时期其他人民委员通常在一年中要调动几次工作。苏联于 1922 年建立后，在 1923 年 7 月成立了一些全联盟人民委员部，于是契切林就成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在 1918 年 3 月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后，把位于斯皮里多诺夫斯克的塔拉索夫住宅大院（后来那里成了波兰大使馆所在地）和位于小尼基塔的别墅（现在这里是高尔基博物馆）移交给外交人民委员部使用。契切林及其 6 个红军警卫战士被安置在位于涅格林街的“欧洲”宾馆第二层的几个套房内。

1918 年 4 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已全部转移到“大都会”饭店。1921 年末又搬到位于库兹涅茨克桥大街与卢比扬卡交界处的原“俄罗斯”保险协会大楼——现在这个地方叫沃罗夫斯基广场。在 1952 年以前，外交官们一直在这里办公，此后把斯摩棱斯克广场新建的一幢高楼移交给外交部使用，直到现在外交部还坐落在这里。

当时莫斯科的外交工作不多。承认苏维埃俄国的只有“四国同盟”[①]——需要媾和的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但是，名副其实的大使馆在莫斯科只有一个——德国大使馆。在柏林设有苏维埃国家的全权代表处，而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只有半官方的代表处。

中立国家驻苏维埃俄国的代表们向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提交抗议照会，反对“红色恐怖”。契切林的答复照会刊登在《消息报》上。其中指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都笼罩着反对工人阶级的‘白色恐怖’”，因此，“任何伪善的抗议和要求都不能阻止对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俄国工人和最贫困农民的人的惩办”。

1918 年 2 月 26 日外交使团由彼得格勒迁到比较安全和饥荒程度较轻的沃罗格达。夏天布尔什维克企图劝说大使们回到首都。契切林向沃罗格达发去了邀请电，保证外国人在莫斯科会有充分的安全。外交使团团长美国大使弗兰西斯给契切林回电说：“谢谢您的电报。我们感谢您始终不渝地关心我们的个人安全。我们决定遵从您的劝告离开沃罗格达。”但是外交官们没有去莫斯科，而是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由在那里登陆的协约国部队保护。

1918 年 8 月 2 日阿尔汉格尔斯克被同盟国登陆的部队占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在那里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北方省最高行政管理局。其领导人是尼·瓦·柴科夫斯基[②]。1918 年 10 月出现了北方省临时政府。但是翌年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解散了临时政府，并任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四国结成的联盟，反对四国协约及其盟国。——译注

② 尼·瓦·柴科夫斯基（1850/51 ～1926）革命民粹派分子。1874～1906 年侨居国外。1904～1919 年加人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内战时期为反革命政府的首脑和成员。——译注

命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①]将军为边疆省总督。

契切林声明说，根据战争时期的条件，外交官不能居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因此“我们把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居住只能看作是撤离俄罗斯的一个步骤”。事情正是这样发生了。到1918年末在俄国领土上只剩下英国和法国外交使团。然而他们在1919年9月也与同盟国撤退的军队一块离开了阿尔汉格尔斯克。

同志之间相互敌视

与苏维埃俄国保持实际外交关系的只有德国，而且时间也不长。俄国驻柏林全权代表阿道夫·越飞[②]同契切林之间没有建立起联系——既没有工作联系，又没有私人关系。越飞在柏林主持俄国与同盟国签订和约的谈判，他看到“俄德亲近的思想的确受到人民欢迎”。斯特莱斯曼[③]常到他这儿来，斯特莱斯曼同样认为，同德国结盟可使俄国收回除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之外丧失的全部领土。越飞抱怨，一切事情都由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莫斯科同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直接联系，而俄国驻柏林大使馆却被置于重大政策之外，它甚至没有料到已达成协议。

---

① 叶·卡·米勒（1867～1937年?）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将。1919～1920年任北方省总督和军队总司令。1920年2月流亡国外。1930年起为反苏维埃组织“俄国军人联合会”主席。——译注

② 越飞（1883～1927），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17年起）。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参加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为布列斯特和谈俄罗斯代表团首席代表，后为驻柏林全权代表。1922～1924年驻中国全权代表。1924～1925年为驻奥地利全权代表。1917～1919年候补中央委员。1925年参加新反对派。——译注

③ 古·斯特莱斯曼（1878～1929），德意志人民党（1918年成立）的创始人之一和领袖。1923年8～11月曾任德国总理兼外长。——译注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是驻柏林总领事，这位表情阴沉、寡言少语而异常彬彬有礼的人，就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未来局长。1918 年 5 月缅任斯基从柏林直接向列宁汇报说："尊敬的同志！莫斯科的人显得焦虑不安，总是使越飞同志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越飞同志经常能够在谈判中取得对方非常重要的让步。可是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说已完全放弃我们的立场。更令人伤心的是，越飞同志即使在德国的压力下作出让步时，也从不白白送礼，总是力争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条约中多得到一些好处，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能顺利地做到这一点。

当然，德国人知道我们军事上的软弱，但是他们在被占领的省份、波兰和乌克兰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且他们现在还不打算同俄国公开决裂。但是，如果莫斯科急于让步，那么他们当然不会不要自动送上门的东西。

这种情况是完全不正常的。越飞是一位非常谨慎和熟知情况的人。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不得不让步，那请放心——他会及时让步，但是为此定会得到回报。除越飞的个人素质能力外，还有一个条件对谈判具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这里能更清楚地了解德国人提出各种要求的认真程度……"

越飞抱怨，很难与红军的领导人搞好关系，其结果是，由于我们违反停火条件，德国人经常提出索赔要求。他抱怨说："一切不幸在于军人不愿意与外交官协调行动，相反——却要外交官服从他们，可是外交官又非常软弱，不能进行有力的抵制。"

军人与外交官之间的矛盾将永远存在，而且军人几乎总是能够占上风。

越飞认为，人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制定政策，派遣著名活动家到德国绕开大使企图同德国政治家进行某些单独会谈，这样做是徒劳的。

当在叶卡捷琳堡枪决沙皇一家的时候，仅告知越飞关于处决前沙皇的消息，而并没有谈到枪决皇后及其子女。德国人要求越飞提

供详细情况，可是他本人从莫斯科什么消息都没能得到。最后，当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化名为多曼斯基）前往瑞士途经柏林时，他告诉了越飞真实情况。他还解释说，列宁禁止他通报这个消息：

“就让越飞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柏林那里就会更容易撒谎。”

1918 年 11 月 4 日德国政府宣布断绝与俄国的关系，并把苏维埃全权代表处从柏林驱逐出去。11 月 6 日越飞及他的同事离开了柏林。驱逐的表面理由是，在偶然破碎的苏维埃外交官行李中发现有煽动性传单。实际上，这是由于在德国已经开始了十一月革命。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宣布，承认一个叫作“侨居莫斯科的德国工人和士兵革命苏维埃”为侨居俄国的德国公民利益的临时代表。参加这个革命苏维埃的德国人，占据了德国大使馆的一栋空楼，并在楼上升起红旗，以示拥护自己祖国的革命。11 月 1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一切外交活动都停止了。契切林及其人数不多的助手们实际上在人民委员部已经无事可做。

1918 年 12 月瑞典断绝了与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关系。在瑞典的苏俄全权代表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被警告说，他应当离开瑞典。丹麦也采取了这种行动。恼怒和气愤的沃罗夫斯基建议列宁采取回应措施，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全部公民驱逐出俄国。

契切林反对这种建议，他解释说，这些国家在俄国已经没有高级外交官了，留下来的是一些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对我们保持与西方国家的某种联系是十分有用的。

圈在铁丝网里面的外交官

在莫斯科，人们为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外国人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不论他们打算从事外交调停工作，还是打算参加恢复瘫痪

的俄国经济。1920 年 9 月 17 日美国工程师和商人华·万德利普来到莫斯科。契切林把这个消息通报了列宁——美国人建议签订关于开采石油和煤炭以及在滨海边疆区和堪察加半岛捕鱼的租让合同条约。列宁立即答复契切林："我完全赞成谈判。请加速进行谈判。"

为了说服同志们，也许还有他本人，列宁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述关于美国人的建议时非常自豪地说，"外部的政治封锁很快就要被打破"。

1920 年 5 月 18 日同情苏维埃俄国的英国工会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的尼古拉耶夫火车站。为了欢迎英国工会工作者，在卡拉乔夫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莫斯科卫戍部队举行了阅兵式。这样的荣誉通常只给予外国元首，但是他们不来莫斯科。

在代表团到来之前，契切林曾经写信给列宁："深受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应当盛情接待的工会代表团很快就要令人意外地到达我国边界。那里将有最重要的头面人物出现。对他们的来访必须进行政治上的准备……"

在那几个月里与其说契切林从事的是纯粹的外交工作，不如说是宣传工作。苏维埃领导人希望动员欧洲工人反对本国政府，并以此迫使协约国停止帮助白军。

1920 年 8 月 21 日契切林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在英国工人中掀起的运动已经进入了死胡同。他们要求英国不要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劳合－乔治声明说，英国将不再战斗并期待我们从华沙撤退，这样他就可更容易地兑现这一点。为了使英国工人运动具有活力，它应当提出新的口号。是否提醒他们提出进攻性口号，要求英国政府直接帮助苏维埃俄国反对波兰和彼·弗兰格尔[①]？工人

① 彼·弗兰格尔（1878～1928）俄国国内战争中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男爵，中将。1918～1919 年在邓尼金的志愿军和俄罗斯南方军队中任职。1920 年担任所谓的俄军总司令。1920 年侨居国外。1924～1928 年是反俄的"全俄军人协会"的组织者和主席。——译注

们可以为此目的成立志愿军。”

政治局同意契切林的建议，并委托他给当时在伦敦的列夫·加米涅夫发电报，告诉他应当努力说服英国工人改变口号。

当国内战争已接近结束，与邻国签订和平协定的时刻已来到的时候，就需要有实际的外交艺术。此时契切林立即向列宁报告说：“如果不发给外交人员全份的红军定量食品，外交人民委员部就不可能吸引优秀的工作人员到部里工作”。当时人们做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吃饭——那时有了钱也没有可买东西的地方，没有可买的东西。

1920 年春天，俄国、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在明斯克开始关于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谈判。但是革命外交同惯例和传统有很大不同。8 月 19 日，苏维埃俄国代表团的代表们对契切林抱怨莫斯科说：“我们刚刚收到托洛茨基同志签发的政治局的谈判工作细则，如果贯彻其中的指令，那就意味着谈判破裂。”

契切林向列宁汇报说：“我完全赞成绝对不允许对波兰代表团使用表面上有损尊严的、易引起事端的过火行为，像设置铁丝网，如这样做，在波兰人民看来，这将意味着，我们是要用令人最讨厌的形式使谈判立即破裂……

我认为，由于居民具有反对波兰人的愤怒情绪，为了他们的安全，可以用体面的保镖把他们围住，让他们沿着规定的几条街道走，不许任何人靠近他们，也不给他们进入任何大楼的机会。”

契切林也向托洛茨基作了汇报，希望能说服他。但是托洛茨基第二天就回答说：“我认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反对中央政治局对待波兰代表团方式的决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我的电报中是这样一字不差地指出的：‘可否把它安置在城外，用铁丝网圈起一块地，禁止他们走出栅栏？’”

把代表团安置在地主庄园内，再把它周围几公顷的面积用铁丝网围上，这样做有什么伤害自尊心的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他们把相当大一块地方用铁丝网围了起来，栅拦上写着：“任何俄

国人未经允许进入此地，将被就地处决……”

列夫·达维多维奇不会忘记，德国人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是如何对待俄国代表团的。在他的便条上列宁批示道：“我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

为刺激波兰外交官的神经而要弄的小鬼把戏成了对战争失利和必须接受最不利的媾和条件的一种心理补偿。实际上对波兰战争的失败，给苏联战前的整个政策都打下了严重的烙印。1920 年列宁曾说：“波兰是整个凡尔赛和约的支柱。当代帝国主义世界是靠凡尔赛和约支撑着的……波兰在这个凡尔赛和约中是如此强大的一个因素，如果挖掉了这个因素，我们就能撕毁整个凡尔赛和约……”

列宁企图向党的工作人员们解释，他为什么想打这场败于波兰的战争，实际上也就是在自我辨护，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不自主地夸大了波兰的作用。但是，把波兰人在欧洲政治中的作用加以夸大的思想留传了下来，而对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人来说，直到 1939 年，直到最后瓜分波兰之前，波兰仍然是主要的敌人。

密码电报和密码译电员

随着对世界革命希望的破灭，对外交政策的需要、对外交机构发挥更加显著作用的需要和对全力完善外交机构的需要，变得显而易见。如果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竭力把更多的基干军官选拔到军队中去，那么人们则按阶级的属性来组建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央作出如下决定：“责成组织局在一周时间内再调 2～3 名经过非常严格训练的和曾从事秘密工作的党的工作者来充实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

契切林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或表示反对，尽管不懂外语和没有一点国际知识和文化程度不高的党的工作人员常常使他非常气愤。

外交机关的完善原本是一件复杂的和不能一蹴即就的工作。对

苏维埃的领导人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1920 年 8 月 21 日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指出："深受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总是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我们的密电码，最机密的事情我全不用电报传送，而且我曾几次警告其他同志，不要电传这类绝密文件。加米涅夫同志说密电码不容易破译，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外交部老译码员的儿子萨巴宁了解到，所有的外国密电码都被俄国的译码员成功地破译了。在沙皇制度存在的后期就已经没有不能被破译的外国电报，而且这还不是由于叛徒出卖，而是俄国译码员的高明技术。

同时，外国政府使用的密电码比我们使用的密电码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有规律地变换密钥，那么目前处在白匪营垒中的流亡国外的沙皇官员和军人就会知道这种密码组成型式。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绝密的报告除了派遣专门人员送达外，不应当采用其他任何方法……"

列宁一向自信，能够给下级同志就任何问题甚至最奇特的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他当天就对人民委员的呼吁作出了答复：

"我建议：

1. 立即更换密码组成型式；

2. 每天，比如根据电报日期和根据一年中的某一天（第 1 天……第 365 天等）变换密码；

3. 每天变化密码组成型式或细节（例如，表示字母用 5 个数字；第一种密码组成型式的第一个数字是虚假的；而另一种密码组成型式的最后一个数字则是虚假的等等。）

要是能每周变换密码和一些细节，则就不会被破译。"

一个月过后，列宁又回头来考虑密电码的问题。这个问题经常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他总是担心信函往来的保密问题。

"契切林同志！

对更加严格地监控（既从外部又从内部）密电码的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

请务必告诉我，何时将采取所有这些措施。

还有一项措施必须采取：必须同每一位重要的大使（克拉辛、李维诺夫、沙因曼、越飞等）规定特别严格的密码，只是为了亲自解读，即在这边将由非常可靠的同志、共产党员（也许最好是隶属中央的党员同志）译成密码，而在那边应当由大使（或“特工人员”）亲自译成和译解密码，他们没有权利把这项工作交给秘书或译电员。

必须这样做（特别重要的情况报告，每月报1～2次，每次2～3行字，不要多）。”

9月25日契切林答复道：“关于更好地组织共和国的密码工作问题，通常由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委员会来处理。至于我们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工作，从星期一起戈卢比同志将开始在我们这儿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将密码译成专门公文，以便用这种完全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分发给一般人员阅读。他将把最秘密的和纯属个人的情报同一般的政治情报区别开来，而且只分发一般的政治情报，属第一类的最秘密和纯属个人的情报将仅通知最有限的人员。

越飞已有专门与中央委员会联系的密码。惟一特别严格的密码是文语的。由于这种密码型式异常复杂，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些文语密码，因为这套密码极其庞杂。需要太多时间。为了个别绝密文件，可以这样做。最初我们全体通讯员都有文语密码，但由于这种密码型式异常复杂，就逐渐不使用了。顺便告诉通讯员们，可以恢复使用这种密码型式。

在中央委员会安排密码翻译工作是不适宜的，因为在发送和传递时，密电可能落到局外人手之中，把有关最重要事件的密码翻译工作交给最可靠的密码译员去做将更为可靠。”

与驻外代表机构的一切秘密通信，逐渐都被集中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大使）把所有电报，甚至给政治局委员的电报，都先发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外交部），由这里的值班室决定电报应该交给谁阅读。一般的情报都被送到地区司，比较重要的情报

立即报送人民委员（部长）。最重要的信件送交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技术方面的工作（密码翻译、随之而来的密码电报收发机、密电译员的培养工作）则由国家安全机关负责。

1921 年 5 月 4 日政治局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未经戈尔布诺夫同志（外交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批准，禁止交外交信使带送秘密文献。"

此外，政治局委员们还意识到不应当因让外交官从事秘密活动而败坏他们的声誉，并作出决定："绝对禁止驻外苏维埃代表机构的大使和负责人员，以及信使和其他一切职员从事一切不合法的工作和活动"。5 月 23 日政治局作出专门决定，禁止驻波兰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在当地居民中进行鼓动工作。

但是，在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关系方面，马上就产生了非常复杂的问题。从 1917 年 10 月起，新俄国的领导人一直推动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进行武装起义和革命工作，向他们提供资金和武器。但是国内战争后，当苏维埃俄国考虑到自己的国家利益时，支持各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将只会损害俄国的利益。企图理顺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关系时，都会遇到相应国家政府提出停止向当地共产党提供武器和不再号召它进行武装起义的要求。

契切林第一个感觉到，必须缓和共产国际强烈的革命愿望，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承认苏维埃俄国。1921 年夏天，契切林给列宁写信，请他注意拉脱维亚共产党人的行为，因为他们公开许诺要在里加举行起义，进行恐怖活动和向拉脱维亚非法运送武器。用契切林的话说，"这正在损害我们同拉脱维亚的关系以及我们的国际地位。"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进行的。

政治局讨论了契切林的来信并作出决定，"提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产党人注意，他们必须使自己的政策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特点相适应……中央委员会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人在国际政策以及国内政策方面表现出最慎重的态度，注意俄共中央关于俄罗斯联邦在当前不

可能向他们提供军事帮助的指示。”

世界革命的利益与俄国国家的利益发生了矛盾。1918 年 2 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也许是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措辞：在国际政策方面“国家被迫去做党不会去做的事情”。

但是，难道国家当前的迫切利益应当否定世界革命的伟大目标吗？这就是当时许多人提出的问题。

1922 年 10 月阿道夫·越飞在遥远的中国进行谈判之后给列宁写信指出：“两者取其一：要么是我们的国际政策仍然归结为开展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要么不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就不了解和不懂得我国目前的国际政策，因而我也就不能贯彻它。”

正是这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真理报》总编辑尼古拉·布哈林在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说：“每个无产阶级国家都有权进行红色干涉，而扩大红军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革命。”

困惑莫解的问题被提到列宁那里，因为是他在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后，亲自号召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弗拉基米尔·列宁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强大到能打倒整个资本主义，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抓住它的后脖领子。”

作为一个老社会民主党人，契切林不是世界革命的反对者，但是对他来说，部门的利益看来更重要。比如说，人民委员毫不反对向与合法政府进行战斗的土耳其起义者提供武器和资金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担心来自土耳其政府的不满。但是契切林不得不经常安抚那些周期性地产生想用拳头威胁西方的愿望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之所以主张这样做，是由于他们有一种始终摆脱不了的信念，即他们被敌人团团包围着，只有靠强力才能达成某种协议。

1921 年 7 月列宁突然建议把一位最著名的将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示威性地派往靠近西方边界的明斯克市，而同时又公布了如不是列宁的，那就是托洛茨基的答记者问，其中有“你过来

——就揍你”的严厉警告。契切林立即回应列宁说，任何人都不应当进行威胁，他说：“我们敌人的宣传主调之一就是——苏维埃政府出于绝望的挣扎，为了拯救自己，似乎将进攻自己的邻国。我们的敌人一会儿散布我们进行总动员的谣言，一会儿散布托洛茨基进行秘密备战的神话。词语严厉的答记者问和示威性的巡视，一点也不会增加对我们力量的自信，反而为我们敌人的挑衅活动提供极为丰富的宣传资料……”

在国内战争期间及其以后的年代里，契切林经常要求政治局谨慎从事，避免危险的冒险行动。他认为，只有在有成功的把握并有成功的力量时，才应当动用武力、实现领土占领。如果没有这种力量，而去铤而走险，那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动。

契切林式的温和政策取到了第一批成果。国内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政府牢牢地控制着俄国全部领土。布尔什维克的敌人逃跑了和变成了侨民。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十分同情他们，但是再也不能无视一个现实——俄国是个太大的国家，不可能不同它保持一定关系。1921 年 3 月，英国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俄国。继英国之后，另外几个欧洲国家也承认了苏维埃俄国。然而这只是飞来的第一批春燕。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仍然不愿同共产主义政府打交道，所以苏维埃外交官们在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寻找朋友。

1922 年 2 月，契切林请求政治局拨出价值两万卢布的黄金用于第二次西藏考察。参加第一次考察的人员曾往拉萨运去了一套无线电台设备，作为礼物赠送给了达赖喇嘛。但是，当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找不到懂藏语和能够留在拉萨工作的人。现在找到了这样的专门人才，教他们学习电报业务，以便同达赖喇嘛建立直接联系。“这些联系首先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同拉萨的友好关系对整个佛教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契切林写道，“但是这些联系还具有经济意义，因为它们将向我们提供首先与西藏建立商品交换的机会……没有同拉萨的友好关系，我们将不能在亚洲和欧洲信佛教民族之间履行我们的贸易中介作用……”

契切林同时还与阿富汗、土耳其、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外交关系。

“破坏热亚那会议对我们有利”

1922 年春天，契切林成功的时刻到来了，当时为决定战后欧洲的未来，世界各国的政治精英们云集到意大利。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导致产生了许多新的国家——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几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国家）获得了独立……新独立的国家经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困难，渴望得到帮助。

1922 年 1 月 6 日，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加入协约国的有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根据英国外交大臣劳合－乔治的建议，通过了在热亚那召开旨在复兴中欧和东欧的代表会议的决定。邀请战败国德国和无外交关系的俄国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建议政府首脑率领代表团。

第二天，1 月 7 日，苏俄驻英国全权代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发密电给契切林：“由于存在萨温科夫[①]分子、弗兰格尔[②]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我认为列宁出访意大利是不可行的。比较可以接受的是出访伦敦。在这里既能可靠地安排列宁的到达，比如由克拉辛陪同，又能很好地安排居住。如果列宁不来，是否可建议托洛茨基来？当然也不去意大利。”

莫斯科接受了出席会议的邀请。不应当放弃苏维埃外交走上世

① 俄国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领导过许多恐怖活动。组织反苏维埃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暴动。——译注

② 俄国国内战争期间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中将，1918～1919 年在邓尼金的志愿军和俄罗斯南方军队中任职等。——译注

界舞台的第一次机会。但是让列宁到国外去，人们有些担心，因为人们认为，反革命侨民，正是那个鲍里斯·萨温科夫及其社会革命党的武装分子不会放过迫害革命领袖的机会。国内的第二号人物列夫·托洛茨基遭到的危险一点也不小。

1月12日列宁口述了给中央委员会负责起草政治局会议文件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书记的信稿，其中指出："关于列宁、托洛茨基同志去意大利（根据克拉辛同志的电报）事宜。我认为，克拉辛指出的理由包括其他理由在内，不仅取消了我而且也取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去任何国家的可能性。"

1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以列宁为团长的参加热亚那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但这纯粹是走形式。中央委员会很快就建议列宁把团长的全权移交给自己的副团长契切林。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列宁服从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十分严肃地接受了自己的任务，认为这次代表会议是应当利用的一次机会。最重要的是在西方获得借款，以便能够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人民委员认为，为此作出某种政治让步是值得的。

西方外交官说，苏维埃法律不平等：原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甚至被剥夺了选举权，这是不允许的。契切林建议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允许"非劳动分子"在各级苏维埃中有自己的代表。天真的契切林甚至在革命五年后还是什么都不懂……

狂怒的列宁在他来信的空白处写道："精神失常！"而且建议中央书记莫洛托夫"立即将他送到疗养院去。契切林的信件表明，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如果不把他立即和强行送往疗养院，我们都将成为傻瓜。"

弗拉基米尔·列宁与自己的继承人不同，他没有想出在与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使用精神诊断措施，他根本不想失去自己总体上喜欢的这位人民委员。因此，契切林一直继续工作，但他的想法被推翻了。列宁对恢复经济的兴趣较少，使他更感兴趣的是他所设想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革命不仅国有化了俄国的财产所有者的财产，而且也国有化了外国的财产所有者的财产。这对许多深信国家无权没收个人财产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契切林建议满足在俄国的被没收财产的外国人的要求。那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比较小。列宁曾支持这种意见，但是到第二天列宁又改变了想法。

与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不同，列宁对热亚那会议的成功完全不感兴趣。他内心希望这次会议失败。1922 年 2 月 10 日列宁给契切林写了一封信，此信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从未发表过，其中写道："绝密。如果能把热亚那会议破坏掉……当然不是我们去破坏，对我们是有益的。请与李维诺夫和越飞全面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并写信告诉我。当然在秘密文件中也不能写这个问题。现在就把此信退给我，我要把它烧掉。我们最好在热亚那会议开不成的情况下获得借款，但热亚那会议又不是我们破坏的。要更巧妙地考虑一下我们的策略，以便使热亚那会议开不成，但又不是我们破坏的。例如韩德森及其一伙人将会帮忙，如果我们巧妙地暗示一下……"（阿瑟·韩德森在那期间是英国工党领袖。后来成为外交大臣并促使伦敦和莫斯科亲近。）

人民委员契切林坚决不同意列宁的意见并在当天回信说："我不是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但是所有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都说，我们极其迫切地需要西方帮助、借款、租让合同、经济协议。我应当相信他们。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需要的不是吵架吐吐沫，而是谈判……

如果您认为，我们同英国吵翻，我们不通过热亚那会议，照样会得到借款，您毫无疑问是错误的。给我们借款的不是政府和它们的决定，而是资本家、实业界。现在他们把我们看作在俄国当前条件下最可接受的政府。但是，如果我们在热亚那会议上打碎玻璃，扰乱会场，他们就会马上避开我们。"

人民委员到底没能劝说列宁改变想法。

俄国代表团收到了拒绝西方大国一切要求的指示。但是，列宁在为外交官们送行时说，与此同时不应当以有关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目的毫不掩饰的言论来恫吓西方大国。不要谈论任何关于"不可避免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词汇应当是绝对爱好和平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完全相信自己的人民委员。因此列宁担心自己有无可能及时掌握会议上发生的情况，以便及时纠正契切林的做法。1922年1月16日列宁心情忧虑地给托洛茨基写道：

"在谈判期间，莫斯科与热亚那的电报联系特别重要。应当迅速提出这个问题并予以解决。

（1）在3月8日之前我们在莫斯科是否有无与热亚那联系的电信站？好像是答应了，需要检查。

（2）我们代表团在热亚那有无收报机？

（3）从热亚那如何与我们通话？我们的军舰能否携带一个能与莫斯科联系的电信站驶到热亚那附近？

如果不能或花费很大，那么就应当马上发一个专门的照会，详细地商定供我们使用的通讯线路（如果很贵，那么专用通讯线路就先通到离我们最近的德国电信局，然后再与德国人商定从他们那里通往热亚那，因为我们将在热亚那保护德国人的利益，这样做可行吗？）。

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并尽快提交政治局讨论。"

"他们正在瓦解，而我们将会巩固起来"

热亚那会议从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举行。共有29个国家参加。庞大的苏维埃代表团乘火车抵达热亚那，他们共有63人，占用了两节车厢。

正如预料的那样，欧洲要求俄国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欠下的债务，以及归还外国所有者被国有化的财产。总之，这是恢复经

贸关系和提供新贷款的起码条件。欧洲没有要求立即偿还所有债务，但是它说：希望你们承认，你们最终还是从我门这儿借了钱。要求补偿外国人被没收的在俄国的财产，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政府怎么可能向抢劫其公民财产的国家提供新的贷款呢？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是一位机敏和有才能的人，他建议承认欧洲国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即使承认部分要求也好，建议承认沙皇俄国的债务。他在莫斯科很受尊敬，因为当年他在供给布尔什维克党资金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正是他劝说百万富翁萨瓦·莫罗佐夫和家具工厂主尼古拉·施米特向布尔什维克交了在当时看来是数量很大的资金。争取这些资金的斗争花了很长时间，也不是符合道德的，使用了假结婚的手段，但是最后成功了。

克拉辛还为布尔什维克战斗队做了非法采购武器的工作。沙皇警察逮捕了他。他在塔甘斯克监狱坐牢，在这里他学会了德语，读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全部原著。流放之后，他脱离了革命工作，毕业于哈尔科夫工学院，在巴库从事电站建设工作 4 年，之后索性去了德国，在那里担任工程师，干得很出色。德国人对他评价很高。

克拉辛是懂得什么是现代经济和贸易的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之一。所以列宁吸收克拉辛参加国务工作——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有一段时间领导红军物资供应非常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后来担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驻法国和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

他参加了与德国人进行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

1919 年 9 月克拉辛和李维诺夫共同主持了与爱沙尼亚的前期谈判。克拉辛组建了谈判代表团，稍后代表团在阿道夫·越飞的领导下与爱沙尼亚签订了尤里耶夫和约。

由于克拉辛的努力，英国在大国中第一个于 1921 年 3 月实际上承认了苏维埃政权。

克拉辛了解西方大国的情绪，于是建议列宁承认沙皇政府的债务——尽管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偿还这些债务。克拉辛对自己的同志

解释说，欧洲大国作为回报，首先会承认苏维埃俄国，其次会提供它极其必要的贷款。交易显然对俄国有利。

列宁断然不同意这种立场。他给契切林写信指出："在热亚那会议闭幕时，不要承担丝毫财政义务，甚至一点也不要含糊承认债务，而且不要担心普遍断绝关系。克拉辛同志的特殊意见表明，他的路线绝对不正确并不可容许。"

在同英国劳合－乔治大臣谈判时，契切林实际上还是打破了在莫斯科给他下达的指令框架。人民委员提出了补偿在俄国的外国财产所有者损失的某些可能性。他甚至准备进行更大的妥协，但是不允许他这样做。契切林收到了政治局委员们签署的密码电报，任何让步的可能性都被完全否决了。

俄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了明明知道西方不可能接受的计划：西方大国应当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政权，放弃要求归还军事债务（协约国为反对共同敌人德国向俄国提供的资金）和给俄国提供大量贷款。至于外国公民的原有财产，他们可以根据租赁和租让的原则使用这些财产。西方大国拒绝了这些条件。迅速改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获得恢复经济贷款的可能性未能实现。机会被错过了。苏维埃报刊愤怒地报道说，该死的帝国主义分子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明知不可接受的条件，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社会主义成果，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扼杀工农国家。

不言而喻，契切林执行了政治局的指示，但他认为指示是错误的。在热亚那会议后，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给列宁写信指出："为了宣传目的，我们大家包括我都说，在热亚那会议上有人要求我们归还私有财产。我们自己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为了根本不偿还这些财产，只要印刷 15 年以后支付的债券就足够了。这样就可以达到同西方国家政府达成协议的目的。贷款不是来自国库，而是来自私人钱包；在同西方国家政府达成协议后，在建立了信任关系后，就会有足够多的钱包开始被打开。

印制不能支付的债券，却又可以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这有什

么不合算的呢？至今我也不明白您的真正想法……对我们的基本想法的不理解，正在影响我的一切工作。”

当天列宁就给天真的人民委员回信说：“我的总体想法是：他们正在瓦解，我们将会巩固起来。如果做得到，就应当尽力做到什么也不给。不束缚自己的手脚。”

收到短信后，契切林在晚上 11 点钟再次坐下来给列宁写信。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个时期还允许同党和国家的首脑争论。“如果‘他们’正在瓦解，那么就有了反对您的论据，因为 15 年后我们是如此强大，而‘他们’是如此瓦解，因此任何人都不会考虑强迫我们偿还债务。债券的作用就是把争吵推迟 15 年，到那时力量对比将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过我就不想说‘他们’正在瓦解……危机正在下降。”

首先发表慷慨激昂的声明，然后就忘记它们，苏维埃对外政策中的这种习惯正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因此人们开始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冠冕堂皇的苏维埃宣言。阿道夫·越飞在东京给列宁的信中就谈到这种情况：“我国外交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性质给我们造成很多危害，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在日本谈判期间，全世界的报刊都提醒说，在热亚那我们先是发表了声明，然后就把它们抛到了脑后，因此警告说不需要把我的声明作为最终声明认真对待，尽管这些声明很坚决。”

然而，苏维埃俄国还是向和平迈出了一步。1922 年 4 月 10 日在热亚那会议上发言时，契切林谈到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契切林的话应当这样理解，即苏维埃俄国不搞革命输出并打算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国际关系史经典著作的作者亨利·基辛格认为，这一讲话标志着俄国恢复了传统的外交方针。尽管讲话中充满革命辞藻，但苏维埃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苏联开始在世界革命的愿望和现实政策的需要之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折中立场。

可是，期望唆使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并以此为自

己赢得点什么，已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理想目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训斥契切林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估计不足："外交人民委员部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考虑所有这些矛盾，以这些矛盾为依据，在它们的对抗中随机应变。契切林对此估计不足简直令人震惊……"

不过，这些话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对契切林敢于批评的回击。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契切林放肆地批评分析了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提纲。契切林的题名为《反对斯大林的提纲》的长篇文章连续三天刊登在《真理报》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认为自己是无与伦比的民族问题专家，他在代表大会上非常蔑视地回击了契切林："我认真地阅读了契切林的文章。我认为，这些文章中除了玩弄辞藻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优势，对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则估计不足。而当时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就是以这些文章为依据的……当然写文章容易，但是如果要给它们加上'反对斯大林的提纲'的标题，则需要提出某个严肃的论据。"

"向德国人学习！"

契切林是参加高级外交活动的理想人物。他什么都不亚于自己的西方同行。在热亚那会议期间，他流利地用各种语言讲话和非常乐意与新闻记者们交谈，因此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使所有的人大为惊讶。这是苏维埃外交的黄金时期，当时苏维埃外交渴望公开性，而不是惧怕公开性。契切林的个人外交功绩是与热亚那会议联系在一起的。在列宁的核准下，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在靠近热亚那的小城拉帕洛与德国签订了轰动一时的关于相互承认和恢复外交关系的条约。在拉帕洛两国同意重新建立关系和以最彻底的方式解决了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它们完全放弃了相互提出饿要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成为愿意与苏维埃俄国合作的惟一国家。如果白匪军在国内战争中获胜的话，俄国就会站到战胜国的地位上去。苏维埃俄国没有向德国提出任何要求，并且不参与收取巨额战争赔款，这项赔款使本来就脆弱的德国经济陷于崩溃。

魏玛德国和苏维埃俄国是被欧洲遗弃的国家。俄国和德国尽管站在战线的不同方面，但实际上都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正是这一点使它们亲近起来。签订拉帕洛条约对它们来说是必然的。缺乏远见的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不应当把两个最大的欧洲大陆国家逼到角落里去。

在20年代，对自己力量的缺乏信心，决定着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担心新的战争会导致制度被推翻（沙皇制度就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垮台的），这促使国家领导人谋求与邻国关系正常化。契切林以维持力量均衡这一老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力求不让某一方力量增强。契切林是这样表达的："支持最弱的"。与德国亲近的关系就是由此而来。斯大林也十分担心可能出现反对苏联的同盟。

于是就产生了随机应变制定的政策。曾在英国、法国担任过全权代表的赫里斯季安·拉科夫斯基在中央全会上发言时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不是由预先拟定的既考虑当前又照顾未来的纲领所决定的。它受日复一日不断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是根据经验而制定的。外交人民委员、全权代表都没有现成的计划。"

当签订苏德协议时，西方大国起初还不相信。莫斯科和柏林的亲近，改变了旧世界的政治版图。拉帕洛条约对德国帮助很大：民主大国不敢再发脾气了。它们前不久对德国的态度还非常强硬，后来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并迎合德国人的要求。迥非寻常的是，莫斯科继续帮助德国共产党人，还指望世界革命将在德国继续开展下去。与此同时，莫斯科又同德国政府和曾经镇压共产党人的德国国防军密切合作。

当时苏德关系迅速发展。1926年4月24日苏联大使尼古拉·

克列斯廷斯基和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柏林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如果发生一些国家侵犯他国的情况，两国同意保持中立并达成协议不参加反对他国的联盟。德国和俄国拒绝参加集体安全体系。这个条约就是契切林起草的。

列宁本人也有亲德国的情结，但多半是非政治性的。1922 年 2 月 20 日他给自己在政府中的副手列夫·加米涅夫写信时指出："依我看，不仅应当宣传：懒散透顶的俄国共产党，请'向德国人学习!'，而且应当拜德国人为师。否则——只是空话。"

契切林亲自处理与德国的关系，认为这个国家不仅是俄国最亲密的伙伴，而且是最重要的欧洲国家。他经常访问柏林，而且当党的领袖们和其他部门干预国际事务，破坏他的辛勤努力时，就感到很难过。1927 年契切林从德国给中央书记斯大林和政府首脑李可夫写信时指出："一系列破坏这些关系的荒唐事件对俄德关系造成了损失。为了苏联的生存，正值应当首先巩固在柏林的地位的时候，一些同志除了指责和攻击德国从而破坏我们的整个工作外，任何好事都不考虑。我现在就去莫斯科请求解除我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

前驻德国全权代表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为接替自己职务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欣丘克送行赠言时说："或许我们没有彻底地深入思考关于我们对待德国人企图以武力手段改变凡尔赛和约划定的边界问题，但是在德国方面主动谈起比方说反对波兰的联合武装斗争的各种场合中，我们一贯持慎重态度。当德国人谈论共同敌人时，我们没有反对，我们的军人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一来，我们没有打消德国人在他们与波兰人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得到我方某种支持的期望，但是我方从来未发表过任何肯定的声明……"

与德国结盟的基础是，双方都不喜欢英国和法国的西方自由民主和对波兰的普遍仇视，1939 年秋天就表现出这种情况，当时斯大林很乐意与希特勒亲近。20 年代末政治局在其决定中写道："军事威胁主要来自波兰。"

德国武器在俄罗斯制造

拉帕洛条约使俄国有可能与德国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克拉辛，他认为，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条款迫使德国军队寻找发展军事技术的迂回道路，如果俄国能帮助德国国防军和允许在自己领土上制造新式军事技术，他们将报答俄国。

列宁逝世后，列昂尼德·克拉辛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为了使他高兴，给他保留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职务。尽管人们不理解，怎么能够从巴黎领导整个部门。克拉辛长年有病，并于1926年在国外病逝。

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①]将军是德国一方的军事合作倡导者。1921年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俄国的小组。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中，有该小组的代表。

1922年与“容克”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在俄国菲利的工厂中生产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的协议。在德国公司的帮助下，在俄国制造出了飞机、坦克发动机、轻武器、炮弹、军用毒剂，在当时，军人们对这些武器抱有特别大的期望。在萨马拉郊区建立了生产化学武器的工厂。这个地方叫伊瓦辛科沃，后来更名为特罗茨克，而在1929年又改称恰帕耶夫斯克。

1929年夏，在喀山附近的卡尔戈波尔兵营为苏联和德国坦克兵开办了秘密坦克培训班。德国人运来了12辆坦克并组织教学。热衷于坦克装甲兵工作的德国将军海因茨·古德里安曾视察过培训班的工作，他对苏联经营不善的状况感到惊讶，并公开谈到了关于

---

① 塞克特（1866～1936），德国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集团军参谋长。1920～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陆军部部长。1934～1935年任蒋介石军事顾问。——译注

这方面的情况。

美国教授塞缪尔·哈珀于 1930 年来到莫斯科，他注意到德国大使馆中的许多商务随员具有明显的军人仪表。在莫斯科大街上，他经常碰到一些由于不穿习惯的制服而觉得不自在的德国人。在城外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教学机场，并看到一些穿着红军指挥员制服的德国人。教授觉得还是赶快离开这里为好……

与人员编制极其有限的英国大使馆和法国大使馆不同，德国大使馆人员编制多而且工作人员素质高。德国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出生于俄德通婚家庭。他们是到俄国工作并在这儿结婚的德国工商业家的子弟。

与德国人合作对红军十分有利。1929 年夏天政治局确定的军事政治学说的依据是，所有西方邻国都可能是苏联的敌人。因此在军队的数量上应当与他们对等，而在空军、坦克兵和炮兵方面应当占有优势。

但是，国家安全机关对与德国的经济合作极其警惕。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认为，外国投资者和在俄国工作的专家是特务。

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德国伙伴特别警惕，这使契切林大为恼火。1922 年夏天他与自己的副手列夫·卡拉汉交换意见时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蠢事比其他任何方面都多。温什利赫特（国家政治保安局副局长——作者注）的愚蠢干涉，使我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方面之一遭到致命的威胁。"

捷尔任斯基则是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切的。他曾给自己的副手亨里希·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处处长米哈伊尔·特里利塞尔下达过这样的指示："我产生了一种印象，总之，德国政府和帝制分子及纳粹分子集团正在苏联从事推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工作，他们向往的是未来的君主政体的俄国……'容克'公司的租让合同实际上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适用的东西，这是偶然的吗？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这样讲确切吗？'容克'公司及其机构在政治上代表什么？"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处处长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向捷尔任斯基报告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人几乎人人都是间谍，并建议取消所有这些租让合同。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契切林只能表示气愤和抱怨。把外国的财产所有者简直就驱赶走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完全变成了苏维埃国家的财产。用同样的机床，按照同样的图纸生产出来的同样产品，被完全看作是国货。

在1920年代末，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苏德军事合作。德国国防军军官在俄国领土上掌握新技术：在利佩茨克郊区建立了飞行学校，在喀山郊区建立了坦克学校。在一些打靶场上德国人学习使用化学武器。

1925年夏天，第一次邀请德国观察员观察红军演习。这种做法坚持了下来。在1925年和1932年，未来的元帅、苏德接近的大力拥护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观察了德军的演习。政治局批准的与德国军官们的接触，后来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把肃反工作人员这帮坏蛋拉去枪毙”

位于库兹涅茨桥大街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坐落在国家安全机关旁边。外交官们称肃反工作人员为“邻居”。这种称呼已根深蒂固。直到现在，在外交部的部机关和任何一个俄国大使馆都把情报人员称为邻居。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邻里关系。契切林经常同这个机关发生冲突。当有怨气时，他就往上写充满愤怒的信件。1923年10月23日他给列宁写信说：“十分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要特别行动处和一般肃反工作人员在黑海沿岸地区继续进行目前的活动，与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肯定是不可能的。与美国、德国和波斯已经因此发生了一系列冲突……8月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探在阿尔马维尔逮捕了土耳其大使馆的外交信使费里东

先生，并拆开了他的外交公文包上的印封，而且以最不可容忍的方式对待他。在此之前，土耳其大使馆工作人员伊泽特－伊兹梅特在那里遭到了更加恶劣的待遇。为此我专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写信，多次同达夫强同志谈了这一情况，但是至今未得到任何答复。看来，当地的肃反机关根本不在乎中央的意见，甚至不给予答复。全俄肃反委员会也不向我通报有关这一事件的进展情况。

我们与德国之间已经发生过一次重大争端，起因是新罗西斯克特别行动处在海上强行搜查了一艘德国客轮，而且不顾德国人的抗议，抓走了几名乘客。政府被迫向德国道歉，而当地肃反工作人员对此却完全熟视无睹……

我总是收到土耳其人对图阿普谢特别行动处和一般肃反工作人员肆无忌惮横行霸道行为的控告，抱怨他们搜查军舰、射击土耳其船只，并以最不能容忍的态度对待土耳其公职人员，特别是土耳其驻图阿普谢领事……

土耳其大使多次以最紧急的方式向我指出，被我们的肃反工作人员骗光的土耳其商人每当回到小亚细亚时，他们就在那里传播有关苏维埃俄国的最不友好的传闻……

只要大国的外交代表在黑海地区进入肃反工作人员的活动范围内，肃反工作人员就让我们挨个地同所有这些国家吵架。没有受过政策培训却权力无限的肃反委员会的侦探们不顾及任何规则……”

列宁与他的继承人不同，对国家安全机关不是特别尊重的，他也不怕肃反工作人员。第二天，列宁就回信说：“契切林同志！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的错误在于软弱。需要的不是‘谈一谈’和不仅是‘写信’，而应当向政治局提议（并且要及时这样做，而不能耽误）：

1. 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商议，派遣最坚定的人员；

2. 逮捕可恶的肃反工作人员和把犯罪人员送往莫斯科并枪毙他们。

请您在星期四把此建议提交政治局……

应当善于更迅速和更准确地推动这些工作。戈尔布诺夫应当主持这项工作；他应当对此负责，如果戈尔布诺夫能够把肃反工作人员这帮坏蛋拉去枪毙，我们将永远支持您。”

10月27日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是由托洛茨基拟定的：

“（1）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提供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下达的指导文件，尤其是下达到港口和边境城市的有关外国人的指导文件。责成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志了解这些指导文件的内容。

（2）通过有权威的委员会（或有权威的人）处理此问题。该委员会应当到各地追究那些不执行这些指导文件和违反1918年的肃反工作方法的地方肃反机关的责任……”

但是实际上，不论列宁的干预，还是政治局的决定，对契切林均没有一点帮助。每前进一步都会发生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机关之间的对立。为解决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之间的争论，政治局不止一次成立过专门委员会。莫洛托夫曾领导过一个这种委员会，奥尔忠尼启则领导过另一个这样的委员会。最终中央机关站在了肃反工作人员的一边。

1923年末，中央秘密考核检查委员会对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了大清洗，清洗了全部“不可靠的”外交人员。为对外交官及其家庭进行“内部监视”，该委员会建议中央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列入驻外机构的编制之内。这种做法直到今天还在实行着。

契切林的主管部门企图协调好与外国人的关系和博得他们对苏维埃俄国的好感。肃反工作人员则认为，来俄国的所有外国人尤其是外交官都是特务，对他们没什么好客气的。外国人非常清楚，他们一直处在政治警察的毫不松懈的监视之下。美国教授塞缪尔·哈珀对在苏维埃俄国的生活留有非常有趣的回忆，他写道，清楚了解地方局势的外国人都非常小心谨慎，他们在公开场所甚至在电话交谈中都不提起国家政治保安局。他们给肃反工作人员起了个名字叫“秘密兄弟会”和“不能谈论的人”。可是那些短期逗留的人，却喜

欢故意大声谈论有关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情况，以便表明他们了解苏联的一切。

由于契切林不倦地向中央投诉，政治局也要求进行解释，于是捷尔任斯基指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处处长特里利塞尔制定一个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细则。他说：“我们与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长期的敌视关系，无助于提高苏维埃政权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却使我们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我们的工作和资料因此没有被充分加以利用——这对国家是有害的。我要求调整我们的相互关系，我指的正是必须加强我们的影响和更多地利用对外处和反间谍处工作的成果……

李维诺夫同志指出了以下几点：

1. 不预先通知外交人民委员部就逮捕外国人；

2. 搜查和逮捕外国人证据不足；

3. 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函询不给予答复或给予不确切的答复，结果不仅有损于外交人民委员部，而且有损于整个苏联。这是最严厉的控诉。其整个矛头反对我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因此痛骂我们一顿。结果我们在组织所有的人反对自己，并向外国人提供掀起宣传运动的借口，宣传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苏联统治一切……

4. 非法拒绝外国人的出境签证；

5. 不应当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审判外国人；

6. 更加准确地确定‘经济间谍’概念的定义；

7. 对对外处的资料问题要做调整——通过全权代表发出……”

来自卢比扬卡广场的邻居

当肃反工作人员逮捕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时，捷尔任斯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情况通报契切林。契切林十分绝望地给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写信说：“要么应当把俄国用中国的长城

圈起来，要么应当承认，俄国国际上的需要是根本的需要，损害这些需要的行为就是对整个俄国的打击。如果这种观点不能制止您的某些侦探的行为，请不要允许他们这么做。我们了解他们的水平……”

在捷尔任斯基亲自干预后，通常出现了某种平静：国家安全机关的举止谨慎了一些和不再那么张扬。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

根本改变局面是不可能的：肃反工作人员和外交官是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第一个叛逃到西方的苏联侦探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争夺影响的斗争一直很激烈……这两个机构就同一个问题提供的情报和得出的结论几乎总是不一致……在任命驻外工作人员时，斗争尤其尖锐，而且在国外这种斗争在全权代表与驻外间谍头子之间仍在继续。”

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曾是苏联驻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间谍头子。他在1930年就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情况很少有什么变化。所有的克格勃分子无疑都怀疑任何来到苏联的外国人，而到国外工作的苏联外交官都被看作是潜在的叛徒——因为他们同敌人有过来往……如果认为某外交官“不适宜”出国，特工机关就能毁掉这位外交官的官运。但是，在阿加别科夫任职的年代里，外交官也可以这样来回击特工们。

“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赫特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为我安排工作，”阿加别科夫回忆说，“尽管有温施利希特的亲笔信，外交人民委员部仍不录用我。”

对任何一个出国人员的任命都是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会议上决定的，这种会议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由对外处处长和他的一位助理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他是中央国外支部局局长，有工作人员派出机构的代表。决定权属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代表……

出国人员候选人的表格都要事先填写好并送交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处，由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研究。那里在档案和人事卡片中立有有关此人的材料。如果他的名字出现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情报人员打的报告中——即使没有具体的指控，也没有怀疑其行为的证据——就会不同意他出国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推荐另外的候选人。

在任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时，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同样方式进行回击。但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竭力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果不能加以拒绝，那么至少也要推迟作出决定，如借口没有空额或拟派出的人不符合对出国人员提出的要求。

当阿加别科夫成为驻阿富汗特工头目时，大使曾要求把所有发往莫斯科的情报电报都给他看。后来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大使们屈服了，他们知道，同驻外特工头目是争吵不得的。“全权代表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代表之间在国外的斗争，往往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斗争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代表充分的独立性所产生的双重权力。驻外特工头目在形式上隶属于大使，在实际上，由于他肩负着特殊任务和完全不受监督地与莫斯科联系，他的威信较高和同事们对他的惧怕大于对外交代表本人的惧怕。”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 1930 年这样写道。

外交代表觉得总是处于监督之下，并时刻都会受到驻外特工头目的伤害。后来，特工头目门警惕地监视着大使并把他们的一切失误报告莫斯科，这迫使大使们从内心仇视和害怕自己的特工助理们。格奥尔吉·别谢多夫斯基在 1929 年放弃了自己在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职务并向法国人请求政治避难，契切林此前曾对他说过：

“我也受人窃听。对我这儿的办公室进行了维修，毫无疑问，他们利用这次维修机会安装了窃听器。缅任斯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隐瞒这种情况。又一次他对我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有责任了解在苏联发生的一切情况。而且我们已经达到了使我们机关完全胜任这一任务的水平’。”

在晚年进行总结时，契切林把共产国际和国家安全机关称作是自己主要的内部敌人。他把共产国际的活动简直称为流氓蛮干行为。稍后，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解释了与共产国际分歧的实质："对我来说，俄罗斯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使我感兴趣的是，苏联对世界革命的作用……正是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来看，如果只是为了使台尔曼同志不顺利的鼓动工作能够开展得稍微好一点，而使苏联的国际地位遭到破坏和经受危险，我认为这是十分谬误的……"（恩斯特·台尔曼从 1920 年代中期起领导德国共产党。他对德国共产党员许诺说，当他们掀起革命时，红军将马上来帮助他们。）

苏联领导人一会儿号召在这个国家举行武装起义，一会儿号召在另一个国家举行武装起义，他们的讲话使契切林非常气愤，因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试图同这些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他认为，不能允许利用外交代表处和领事处的外交官、工作人员同外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但是，只是到了 1928 年才提出了关于使外国共产党员离开所有苏联驻外代表处的问题，以便停止把这些代表处再看作世界革命的司令部。

契切林把国家安全机关称为第二个敌人。契切林写道，"在捷尔任斯基时期还比较好。但是后来，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领导人使人无法容忍，他们不诚实、耍滑头、总是企图撒谎、欺骗我们、说话不算数、隐瞒真相……不同我们协商就逮捕外国人，结果酿成大量国际事件，有时在多年以后发现外国人被非法枪毙（是禁止不经审判处死外国人的），可是事先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国家政治保安局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对待外交人民委员部……实行经常不断地逮捕外国使馆的所有私人朋友的可怕做法……更为糟糕的是，经常以逮捕相威胁，强迫和唆使大使馆的服务员、看门人、司机等充当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情报员……

我们的几位卓越和宝贵的外国文学崇拜者，就是由于国家政治保安局企图通过恫吓迫使其熟人或其夫人的亲属向国家政治保安局

报告他们的情况，而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国家政治保安局用最荒唐和最野蛮的方式对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大使馆进行内部监督，对我、全权代表、使馆工作人员搞间谍活动……”

可是在1920年代初，外交人民委员部还可以独立地做许多事情。1922年，世界有名的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被驱逐出境。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向他宣读了决定，并命令他去拿境外护照。在发生此事的两年前，外交人民委员部制订了一个境外护照条例，这个条例实际上一直使用到1991年。发放护照是收钱的。“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有全俄肃反委员会（后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特别行动处的允许。

为了尽快拿到护照，皮季里姆·索罗金去找了卡拉汉。卡拉汉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在契切林缺席时担任代理人民委员。索罗金和卡拉汉是大学时期的朋友。索罗金在美国出版的回忆录中描写了这次会面的情况：“门打开了，卡拉汉在三个肃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您好，皮季里姆·亚历山大罗维奇，’他说，‘高兴见到您。请进。’

依我看，办公室的家具陈设很好，甚至富丽堂皇，过去身材瘦小而匀称的卡拉汉，看上去养得又肥又胖。

‘阁下，’我以嘲讽的语调开始说，‘您当然知道我已经被驱逐。您的部下拒绝在三天之内给我发护照，我对此不满意。劳驾您能否命令他们在明日早晨把我的护照制作好？’

‘非常乐意，’卡拉汉回答并通过电话下达了命令，‘明天一切准备就绪，护照免费发给您。’”

索罗金表示感谢，尽管他从来就没打算为自己被驱逐而付费。但护照还是给制作好了，虽然不是在第二天早晨，而是在一天以后。在他的护照上用三种文字写着：“被驱逐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不佩带任何装饰物

在契切林时期开始实行外交职务条例和外交官官衔条例。契切林向所有驻外代表机关下发了像大使夫人应如何穿戴之类的工作细则：建议穿俭朴的黑色长袖衣服和不许袒胸露背。并且不佩带任何装饰物！大使夫人们服从了规定。然而，要大使本人遵守纪律就复杂多了。全权代表越飞在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中写道："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决议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法律上都不能强迫外交代表遵守，因为外交代表在其活动中不是代表一个主管部门，而是代表整个俄国。"越飞写道，他只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夫·卡拉汉向斯大林请求帮助：

"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请求中央委员会批准原则规定驻外代表服从中央的下列三项程序意见：

1. 外交代表直接服从外交人民委员部，一切问题同外交人民委员部联系，其指示外交代表必须无条件遵守；

2. 外交代表有权控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但在中央对问题作出决定之前，无权阻止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

3. 外交代表直接通过和仅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受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的指示。"

1924年，苏联全权代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尤列涅夫（克罗托夫斯基）自作主张，邀请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参加苏联驻罗马大使馆的招待会。由于他这样做未经莫斯科批准，于是被召回国。

不过，外交代表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经常表示不满，并各自向有关方面控告。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927年11月3日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他从东京曾给自己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写过信。全权代表抱怨招待会和与官员们毫

无意义的会见太多："当我需要时，我就回想起列宁谈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理由时对我说的话，如果革命需要，我们准备到最肮脏的棚屋中去。说实话，在这里不得不进出宫廷，但是由于不习惯，这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应当说，由于缺少来自外交人民委员部有关我国当前对日政策的任何情报，我正陷于十分绝望的境地。日本外务省对莫斯科发生的一切事情非常了解，而我们这儿一点通报也得不到……我们确实什么都不了解，尽管我们应当装出了解某种情况的样子，并用一些笼统的说法敷衍过去……

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把在莫斯科谈判的有关结果告诉我们是多余的。当然这无助于提高我们这儿大使馆的威望，而且不仅是大使的威望，还有情报工作做得如此不好的政府的威望……

除了有关日本事务的情报外，我们还需要有关我们苏联最重大事件的一般情报和至少有关外交事件的情报。比如，据报纸报道，库尔斯基被任命为驻罗马全权代表。人们问我们，这个消息是否确切。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完全像傻子一样。在这里人们经常向我们提出大量有关反对派最主要情况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什么……"

特罗扬诺夫斯基发现，驻日本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状况非常困难："这里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成家，有小孩子，他们的生活状况的确非常困难。有一个事实使我感到震惊，他们中间有些人来东京已二三年了，但不懂英语。原来是他们没有机会学习英语，因为他们没有钱学习……

有些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机会教育自己的子女，比如，武官普特纳债务缠身，他不让子女学习，也不知道他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十分俭朴的人……

请注意，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像流放中的生活条件，因为我们不懂日文并在这里过着一种十分特殊的生活。有家庭的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尤其困难。额外收入在这里也不可能找到……"

许多大使在不久前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经常不客气地向党

的领导人呼吁，契切林也因此常常碰到不愉快的事情。当讨论外交政策问题时，外交官的声望往往是由他与党的领导人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来决定的。

局外人甚至就不应该知道在中央委员会里通过的这个或那个决定。政治局就此问题甚至作出过一个专门决定提请契切林注意："向契切林同志说明，在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全会内部发生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个别中央委员投票表决和发表声明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告诉任何人，甚至包括部务委员会成员。"

与老鼠和蛾子作斗争

许多外交官都深信，契切林是个不怎么样的组织者。一切事情他都要亲自去忙碌并教训其他人："为了查明是否正在做什么事情，应当亲自询问、检查执行情况。应当不时地检查一下，比如发生火灾时，能否有效地组织救火，或者是否尽力防治老鼠和蛾子毁坏文件。"

他实际上不相信任何人，送到人民委员部的一切文件，甚至一些根本不值得他花费时间的文件，他都打算看。这些说法传到了契切林那里。他非常生气，认为这些流言蜚语都是李维诺夫散布出来的。他说，一切过错就在于对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无休止的清洗。"清洗"，契切林写道，"就是排挤好的工作人员并以毫无用处的人替换他们。"

不过，他的干预从来都不是多余的。有一次他发现，在给伊朗大使莫沙维尔－奥利－梅马列库的信封上写着："莫沙维罗利同志"……契切林气愤得难以控制自己。他晓得，收到这一信件后，这位老达官贵人就会干脆回德黑兰去了。

契切林是一位孜孜不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者，但给同志们的印象是一个奇怪的人。他的禁欲主义把他

们吓住了。他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单身汉、离群索居的人，他把办公室变成了独身居住的房间，过着面包加水的贫苦生活。契切林惟一的消遣，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就是养了一只猫。他抱怨说，他的秘书们不管这只猫："我从来不把我的这只猫放出我的房间并且告诉所有的人，如果它跑出去，应当把它赶回来；可是我不在时，它就悄悄地沿办公室跑来跑去，抓挠家具，而秘书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坐着，走来走去，猫就在他们眼前毁坏家具，但是谁都想不到应当把它赶回去。真是消极无为透顶！"

人民委员仇视市侩作风和个人名利思想。可是，最近几年他成了讲究饮食并酷爱白兰地酒和从高加索给他寄来的干红葡萄酒。契切林睡在自己办公室的旁边，他认为，人民委员应当永远留在战斗岗位上，如果需要阅读夜间收到的电报或给外交代表发密电，要求人们随时唤醒他。人民委员部的值班秘书们和密电收发部门昼夜不停地工作。他经常深夜口授给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给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外交代表门的指示，起草外交照会和文章。快到早晨的时候，所有这些文件都打印好了，并摆在人民委员的桌子上，以便他能够签字和寄发给有关单位。他睡觉很少，凌晨才躺下。他可能在深夜或凌晨邀请外国大使到他这儿来。

在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国际事务的所有文章的清样他都要看，并亲自校对。他甚至修改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内的塔斯社的报道。他担心新闻记者的错误报道可能引起俄国同整个世界争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对报刊的监督。如果报纸办得不成体统，任何外交政策都不会得到贯彻。在 1928 年以前，《消息报》和《真理报》上所有与外交政策有关的报道清样都要寄给我看，或在电话中读给我听，我要么删掉，要么修改。现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与报刊的联系完全松散了。在当前报刊不成体统的条件下，政策得不到贯彻。"

人民委员自己保存着大使们的全部重要密电，他不再委托任何人保管。契切林认为，只有在由莫斯科卫戍区特别警卫连守卫的人

民委员办公室内，可以保存条约的秘密附件。

在他的办公室摆着一架钢琴。当疲倦时，就坐到钢琴前弹一会儿。他时常在外交官招待会上演奏。喜欢演奏莫扎特的作品，有时即兴演奏。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不是常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同他搞好关系。1921 年 5 月 3 日契切林写信给托洛茨基，后者曾委托契切林准备一些关于世界局势的材料。契切林写道："我们全权代表的报告大部分阐述当前的问题，偶尔包括一些政治局势和我们对驻在国态度的概括评述。我将尽力给您寄去可能对你最有帮助的材料。困难的食品供应状况对我的健康影响很大，而我的业务熟练的助理非常少，因此，我不能保证能做到为完成您的任务所要求的一切。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格奥尔吉·契切林。"

人民委员不放过向有影响的人物诉说本部门的混乱的机会。契切林不满意人民委员部办公厅变成了"国中之国"。"卡拉汉和我，"契切林给托洛茨基写道，"已被从部里撵出来啦——从前是'无秩序'，而现在是'有秩序'，也就是说，每个小事情上传和下达都要经过 5～6 级大小官员们的审批，文牍主义成风，而马上就要到达的外国使团睡觉的床铺还没落实，由于饥饿，所有的记者都逃到国外去了，可我不能往国外逃亡，因此，我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并将为这种'秩序'而光荣地逐渐死去。"

作为严格的和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托洛茨基没有听从契切林对办公厅的抱怨，他认为，一个部门的首长必须善于整顿本部门的秩序。但是，他对人民委员正在挨饿感到相当惊讶，于是就在寄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信上附加了几句话："列宁同志收。难道不能让契切林吃饱吗？或者这是反对'秩序'的绝食行动？"

当时确实是极端困难的时期，但是新政权仍然关心使领导干部不挨饿、不挨冻和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克里姆林宫的特供制度，该制度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取消。还出现了至今仍存在的克里姆林宫医疗系统。起初，在克里姆林宫安装了两个牙

科沙发椅。而在 1918 年斑疹伤寒病开始流行时，卫生人民委员尼古拉·谢马什科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签发了《克里姆林宫卫生监督组织计划》，以便关照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健康。的确，只是在列宁去世后，确切说一周后，1924 年 1 月 31 日，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高级领导人健康状况》的报告。此后便开始建立高级领导人特殊医疗分支系统。

但是在此之前，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已经为人民委员们和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们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他们在这里可以进行医疗。世界革命或者甚至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不再如此强烈地引起新的政治精英们的兴趣，他们为了职务的晋升和优惠特权的获得是何等忙碌。而契切林属于对自己的生活安排不太关心的一类人。

关于外交人民委员挨饿的消息使列宁大为伤心。宝贵的干部不应当挨饿。1921 年 5 月 5 日他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和部务委员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戈尔布诺夫写信说："戈尔布诺夫同志！这封信我是秘密寄给您个人的。阅完请退回。并请就下面两点写点意见：1. 能否配给契切林更好的食品？他从国外获得'配额'吗？这种配额你们是如何规定的，能否作为例外向契切林充分供应这种配额的食品以加强营养？2. 看来契切林在为办公厅的事焦虑不安。希望您关注他的疾病而且不要在意契切林的过于严厉或吹毛求疵的攻击。"

当天晚上戈尔布诺夫给列宁回信说："十分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拜读后应退还的文件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关于契切林同志的这种悲惨的食品供给情况。他本人、他的服务人员（鲍曼一家）甚至一次都没有向我和我的助理们暗示过这种情况。今天给他送去了所有的普通食品，而从明天开始将按时供应牛奶、鸡蛋、巧克力、罐装水果和其他食品。已命令一个同志专门关注食品问题，而我则负责检查和防止将来供应短缺。当然我的过错是，从前没想

到要关心这件事，但是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在自己个人生活方面是如此的与所有其他人相隔绝，以至于人们简直都不会去想他怎么样生活。对他的病态的暴躁脾气，我已经习惯并知道，最近很多情况常常是由于对他身边的人过于信任引起的，我已让这些人从无秩序的、往往是报告的手工业式的工作转变为有组织的工作。当然他们特别不满意的是，我把他们由外交官和外国人的供应配额略微往下降了一些。”

人民委员离职养病

为契切林任命了两个副手——在那些年代里不允许有更多的副手。人民委员部的整个部务委员会由4～5人组成。老布尔什维克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为第一副人民委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汉为第二副人民委员。契切林同卡拉汉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成了李维诺夫的敌人。关于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机制，契切林和李维诺夫有不同的想法。李维诺夫认为契切林不适合担任人民委员，并经常自作主张。

当李维诺夫自己还不是人民委员的时候，他反对契切林在人民委员部推行一长制的尝试。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的立场是，“每个部务委员主持自己领域的工作，把有关本领域的问题提交部务委员会并执行后者的决定，向部务委员会其他委员发送通报情况的信件和电报。”

契切林抱怨说，主持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李维诺夫总的来说不到人民委员那儿去，一切问题自己决定：“在与西方国家关系方面，我微不足道，只是一个普通的部务委员，而当我竭力企图发挥影响时，这样又造成长期关系紧张。李维诺夫同志必须参加政治局有关西方国家事务的会议巩固了他的地位；为了削弱李维诺夫同志的特殊地位，我就带领卡拉汉同志参加政治局有关东方国家事务的会议。”

斯大林的原助理鲍里斯·巴扎诺夫在侨居期间写道，契切林和李维诺夫相互仇视。契切林抱怨说，李维诺夫是个蛮横无理和不学无术的人，不应让他参加外交工作。李维诺夫则回敬说，契切林是个同性恋者和不正常的人，他只在夜间工作和破坏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李维诺夫的儿子米哈伊尔曾对我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对待契切林就像对待一个远离现实的人：

“契切林为了给我父亲提个问题可以在深夜给他打电话。父亲认为，契切林是个不适应现实生活的人和不适合做具体工作。”

在政治局会议上开会时首先讨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人民委员契切林和他的第一副手李维诺夫。按巴扎诺夫的说法，人民委员说话胆怯和低三下四，注意听取政治局委员的每个意见。他的副手则感到更加自信。

契切林从早年起就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但是，只有当他回莫斯科后，从 1918 年起才为他履行了入党手续。这决定了他在党的精英内部的地位，这些精英们为革命前很早就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而感到骄傲。入党的年份比工龄、教育程度和专业能力重要得多。契切林直到 1925 年才当选为中央委员。“我本人在政治上是如此无能为力，”契切林写道，“以至于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支持任何意见的发言往往被看作是相反的解决方法（‘非革命’）的理由。我不明白：如果不信任我，为什么不让我改任其他工作？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就像一个被不小心的孩子弄坏的任人摆布的布娃娃……”

契切林开始经常闹病。他常去国外医治。1926 年 11 月他离开俄罗斯，直到 1927 年 6 月底回国。李维诺夫代理他的职务。回国后契切林又开始工作，但仍然感觉很不好，尤其是与李维诺夫的关系使他很不痛快。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开始提出，要么把他调离人民委员部，要么再次让他去治病。

1928 年 1 月 16 日契切林给政治局委员兼陆海军人民委员克利

缅特·伏罗希洛夫写信，因为他曾设法与伏罗希洛夫保持不错的关系。他写道："尊敬的同志，我与您分手的时刻正在来临，因为我与李维诺夫的关系已经达到怒不可遏的地步，当时政治局重视他，而我只好请求在省里当个小官，只要能离开李维诺夫就好。我与卡拉汉之间工作配合得很好（他是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敌对阵营中的惟一支柱），我们的一切都是一致的，他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而李维诺夫猖狂反对卡拉汉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我。我不能再忍耐下去。如果您喜欢这类人，请支持他，但是请您放我走，西伯利亚，索洛韦茨基群岛，哪里都可以，只要能离开李维诺夫就行。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对您个人十分赞赏的格奥尔吉·契切林。"

契切林建议任命党内有威望的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只有当领导同志中的核心人物领导外交政策时，局势才会变得正常和健康。"

但是政治局没有匆忙解除契切林的职务。1928 年 8 月 11 日政治局决定让契切林休假 3 个月到国外治病，并根据医生的请求，禁止在治病期间工作。离开莫斯科时，契切林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开诚布公的信，并把信的副本寄发给全体政治局委员。他委屈地提到，他如何遭到严厉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很好地维护苏联利益"，而是"更多地保护别国政府的利益"，表现了"软弱性"。

斯大林向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表示，他"应当继续担任人民委员，即使每天工作两个小时也好"。契切林看到这几行字心里很愉快，但是他自我感觉很不好，并已经明白将不能重返工作岗位。可是他仍继续为莫斯科的同志们提供建议。

1929 年 3 月 1 日，契切林给斯大林寄去了一封关于新总统赫伯特·胡佛就职后美国局势的长信。正是此人曾在 1919 年 2 月成立了美国救济署，该署的工作是帮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害的人们。契切林写道："尊敬的同志！胡佛正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他周围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他将决定一切。我记得，他对美国救济

署尤其敏感。这是他苦心经营的产物。当我们这儿很少称赞它时，他就已经感到受辱。依我看，鉴于他已经当政，必须以他苦心经营的产物美国救济署为借口稍微多说几句热情的话。因为美国救济署的确做了许多事情……如果不说的话，胡佛会抱怨的。

寒冷的天气对我的多发性神经炎危害很大，疼痛加剧和周身不适的健康状况更加严重。近期我将到威斯巴登去，春天到来之时在那里沐浴应该对医治多发性神经炎很有好处，这是我的主要期待。致以同志的敬礼，契切林。”

1929年3月10日斯大林给契切林回信说：“亲爱的契切林同志！您关于胡佛和美国救济署的看法完全正确。您所指出的那个问题，我们在李维诺夫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会议上作的众所周知的陈述中已加以利用。在陈述中已直接提到：‘我们没有忘记，在我们困难的饥饿年代，美国人民当时通过以美国未来总统胡佛先生领导的美国救济署给予我们的慷慨援助。’我想，这暂且够了。我担心，过多地重复和愚蠢地强调这个方面，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想何时回来工作？您能否早些回来？当然要在不对健康造成特别损害的情况下。热情的问候！约·斯大林。”

斯大林经常给契切林写信，询问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经常写很长的回信。他从“格林涅瓦尔德”疗养院给斯大林寄去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批评了苏联的一些对外政策行动。他对和平的看法很有意思：“在我们莫斯科的发言中说，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危险加剧了，因而进攻我们的危险也加剧了。真是胡言乱语，怎么能讲出这种话来!!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才夺取了政权并且巩固了下来，在德国与协约国、法国与意大利、意大利与南斯拉夫、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的任何尖锐化，都意味着我国地位的巩固，威胁我们的各种危险的降低。”

关于德国的局势，契切林写道：“很遗憾，给您提供的情报不正确。您简直不了解，由于无知，我们经常谈论的那个革命运动是多么弱小……”

关于自己的状况契切林没有任何乐观的消息可以报告："在离开莫斯科前我给莫洛托夫同志写信说，不值得开始花费外汇，该同意我退休了。加里宁同志当时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劝说我治疗。我回答说，我将带着悲观主义进行治疗。我现在也是这样做的。政治局是否失去了耐心？恰好由于暂时症状，当前我根本不能承受任何长途旅行，不过这些暂时症状很快就会消失，但愿能够回到苏联履行退休手续，领取微薄的退休金和获准在苏联的任何南方城市，例如梯弗利斯生活，直到不久的将来去世为止……

我现在什么工作都干不了，甚至写这封信我已经中断了 20 次。骨头架子……虚弱不堪的身体……浑身都疼痛，大多时候是双腿觉得刺痛，两腿上片片血斑，傍晚和夜里全身感到异常难受，双腿软弱无力，就像大地在脚下晃晃悠悠，6 月份患流行性感冒后出现的这些和其他的多发性神经炎现象曾经开始好转，但是由于严寒天气的影响，又恶化了。

但是这只是一部分疾病，还有折磨人的幻觉症，或确切地说，似睡非睡状态下的半幻觉症。我的严重的神经症状早在 1928 年初戈尔金给我治疗糖尿病时就开始出现了，戈尔金太轻视神经方面的症状。在回到莫斯科后，这一切都恶化了——当时在我的半幻觉中，李维诺夫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整个被笼罩在恐惧之中，但后来这一切又严重恶化，更加复杂化，与多发性神经炎交织在一起，这些病症之后又出现了其他病症，结果长期以来没有真正睡过觉……

身体极端软弱无力。我每天大约有 1～5 小时感觉稍许好一点儿，并在这个时候出去走走，其他时间我独自一人软弱无力地呆在屋里。如果阅读或谈话，马上便失去思路，谈话离题。当阅读时，我必须经常返回到前面去，因为前面的思想内容全忘掉了。甚至连最短的文章也不能写。

……如果要进行治疗的话，花费就不可能比我花费得更少了；在比较便宜的疗养院里我已经几次因为吃臭鱼而患病。结肠发炎令

人痛苦，它要求很精细的病号饭……

‘朴素引人尊重’，这是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斯巴达式教育的名言（20世纪在欧洲推行斯巴达精神，即极其刻苦耐劳的精神）。如果中央监察委员会命令用拳头捏着鼻子擤鼻涕，如果我将在施特莱斯曼的客厅里用拳头捏着鼻子擤鼻涕，我将不会唤起他的尊重，可是将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地位——在整个这几年中，即使没有用拳头捏着鼻子擤鼻涕的粗鲁行为，我也会完全相信，我们的朴素和贫困引起的不是‘尊重’，而是让人讥笑，并对我国在贸易和政治上的信用造成损害，因为我们是同资产阶级进行贸易和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贷款，而不是从共产党那里……

我正在幸运地向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通知函中产生的与世隔绝的理想境界靠近，在17世纪，莫斯科的大使们曾……非常成功地做到了与世隔绝，可是他们不需要从罪恶的西方国家那里争取贷款。”

契切林痛苦地经受了党的机关经常开展的精简和清洗运动，这些运动使他失去了宝贵的工作人员。还令他愤怒的是，动员有经验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相反却招收青年党员和共青团员到人民委员部工作。比如说，使他非常气愤的是实行统一的报务员管理局，把各个部门的报务员都集中到那里，全体部务委员和人民委员自己都应当到那儿去口述电报内容。

这一切都来源于斯大林，由于契切林仍然抱有多少能改进工作的希望，于是就给斯大林写信抱怨说：“1927年的人员精简对我个人之所以是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样使过于繁重的负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其他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对我说，这是我的过错——我没有足够尽力保护外交人民委员部。当有人破坏委员部时，应当吵架。我已陷入无限的绝望之中。我没有保护好外交人民委员部，我的病况却发展了，这也是由于与李维诺夫的关系而造成的。

整个这种内部局势——无数的恐惧、令人不快的事情、冲突、愤怒（仅仅由于同伏罗希洛夫之间一次不愉快的事情，我好长时间

处于令人恐怖的状态之中）使我更加衰老不堪……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头上。我们的上层领导人闭目塞听，不考虑原因和实际情况，比如，于是就决定取消我们驻亚洲机构中的全部翻译：如果这样做，我们在亚洲的机关就会丧失说话能力。

总之，我将去威斯巴登治病。这是我主要的期望。但是，如果外交人员委员部遭到破坏，那么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好现在让我退休和让我在梯弗利斯随便某个地方安静地慢慢死去，然后在墓碑上写道：'精简和清洗的牺牲者，契切林'……"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是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因此给斯大林写信，天真地认为能向他解释某些事情并使其得以纠正。契切林的个人痛苦很少能引起斯大林的关心，可是他继续通信，仍然期待使不可或缺的专家回来工作。

1929 年 6 月 20 日契切林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遵守了所有的医嘱，但只有一项例外：看戏、听音乐会以及与人们约会。我没有遵守这项医嘱是因为虚弱至极：不能。我听音乐会的尝试使我如此疲倦，以至于全力支撑着，以便不晕倒过去。在与某人约会后总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因此，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过着隐士的生活……

我的身体实际上在 1927 年就垮掉了。多发性神经炎、严重的神经过敏状态加之完全丧失胃口，从 1927 年夏天开始就一直折磨着我。由于人员精简，又增加了一个工作过于繁重的情况，面对机关遭到的新破坏，我一回忆起这些精简，心脏就突突地跳，感到恐惧，总之是永世的忐忑不安和总有不愉快的事情在等待着。

我已经骨瘦如柴，到 1928 年夏天身体就完全垮掉了，而现在全身骨骼不间断的疼痛逐渐地、不停地、慢慢地和确实无误地加重着，走几步路对我来说就是痛苦，大脑的活动能力已经枯萎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看报纸都不能集中注意力……"

契切林向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建议："如果您，斯大林能化装一下，带着一个真正而没有偏见的翻译到国外住一段时间，那就太好了。您就会看到真实的东西。您就会知道关于最后

战斗到来的叫喊声的代价。《真理报》煽动叛乱的胡说八道就会在您面前原形毕露……”

但是，如果不计算 1943 年到德黑兰和 1945 年到被征服的柏林短期出国，斯大林到底还是没有在国外逗留一段时间。斯大林没有看到、不知道、不理解急速变化的世界，他只能依赖间谍、大使们的报告和自己的想象……

只要人民委员不叛逃就行

契切林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后已经清楚，不可能把他治愈了。现在，在莫斯科对他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他已不再是有用的人了，因而为他的花费马上就开始少得微不足道了。此外，在政治局内产生了另外一个不祥的念头：根据契切林目前的情绪，万一他突然决定留在国外怎么办？万一说出他知道的一切怎么办？……

尤其是世界各国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外交部长不回国。奇怪的流言传开了。斯大林命令让他及时回国。1929 年 9 月 9 日政治局作出决定：“1. 认为必须使契切林同志返回苏联。2. 与医生们协商后，派遣莱温医生到契切林同志那里去，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并从医学角度阐明他返回苏联的时间……”

委托莫洛托夫和李可夫给契切林写信，请他回国。与他的来往信件抄送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以便他们了解情况。当时人民委员在德国已经居住了一年多。先是政治局委托莱温医生“给契切林写信，希望他在 11 月底回苏联”。回来的答复说，现在不可能：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经受不住长途旅行。

12 月 3 日政治局作出了新的决定：“鉴于契切林同志及其医生们报告说，只有经过四周的旅行准备后，健康状况方可允许他启程回莫斯科，必须尽可能加快使契切林同志到达莫斯科。应当从医生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既对契切林同志的旅行进行准备，又要组织

好旅行本身。委托叶努基泽和卡拉汉同志采取措施，安置好契切林同志在苏联的居住和治疗。”

1929年9月21日，莫洛托夫给契切林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信：“尊敬的同志！如果您根据健康状况能够——即使不是迅速，而是在不久的将来——回到苏联，这就太好啦。您的名字毕竟与苏联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属于它。难道我们不能如此认真和严肃地对待工作，以便组织好舒适的旅行和为您在我国生活和治疗安排最优越的条件？当然能够和无论如何应当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得更快些……

我们正在十分准确地按照应有的程序开展工作，以保障您的治疗、休息和日常用品不亚于，相反要好于您在国外。一旦医疗条件允许，您极其必须和一定要在苏联国内居住。没有必要向您解释，因为您理解得不比我差……”

可是现在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一点也不愿意回国。当然，作为一个不健康的人，他不想长途旅行。况且他非常了解德国的舒适和马上就要他退休的俄国生活条件之间的差别。根据外国报纸的报道，他想象到了国内的情况。于是他给莫斯科写信指出：“一些英国政治家说，‘要是没有苏联，应当想象出一个苏联来，因为苏联使工人疏远革命’。假定说这是奇谈怪论，可是要知道所有的报刊都在公开高声谈论关于我国的粮食和其他困难，我自己也从工人那里听到：‘在俄国只有土豆，没有肉、黄油、鸡蛋等等。’”

如果退休成为现实，这个想法开始引起契切林的恐惧：他将是一个孤独的任何人都不需要的年老多病的人。为了影响政治局的决定，契切林向莫洛托夫提起了1925年发生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身上的怪事。当时，政治局简直是强迫他动胃溃疡手术。伏龙芝死在了手术台上，于是说他是由于政治斗争被故意害死的传闻在莫斯科广为流传。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被看作不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而是季诺维耶夫的支持者。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中篇小说《不会隐没

的月亮的故事》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撰写的，由于该小说使当局难堪，于是很快就被禁止了。

9月27日，契切林给莫洛托夫回信说："我的旅程无论谁都不可能安排得舒适，因为火车的颠簸和轮船的摇晃是消除不掉的。必要时不得不去死，也可以去冒几乎瘫痪的危险，颠簸和摇晃这种对我来说难以忍受的折磨也许是必须的，但是适当吗？公众将会骂街，回忆起不会隐没的月亮等等——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而且在苏联没有威斯巴登那样的浴疗，有风景秀丽的疗养地，可另一回事是——德国军医把那些在此疗养的缺腿伤员再次派往前线，可然后又怎么样呢？……

又及，如果上级命令剖腹自杀，我将剖腹自杀，可我宁愿要比铁路颠簸和轮船嗒嗒声的折磨轻一些的折磨方法。嘶……"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给自己的副手卡拉汉写信说："返回苏联就是要干掉我，或立刻正式干掉，或为转移视线把我安置到南方某个地方实际上干掉。"

此后，契切林还答复政府首脑阿列克谢·李可夫说："为什么您称我是'大政治家'？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在米尔巴赫①时期，然后在我国和平外交攻势和恢复外交关系时期，此后在热亚那和洛桑工作时，我曾作过有益的工作，但是近几年来我是个假象。我已经没用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任命新人民委员和为什么不公布关于我的健康状况。当埃及国王赛义德巴夏②在1860年代去世时，亲信们给他的尸体穿上礼服，化妆修饰了他的面部，给他戴上墨镜并用四轮轿式马车拉着他的尸体，目的就是让人们以为他还活着。您干吗需要一个穿礼服的死尸呢……"

可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坚持自己的意见。1929年10月20《消

---

① 米尔巴赫（1871～1918），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起在莫斯科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译注

② 赛义德巴夏（1822～1863），1854年起为埃及的统治者。——译注

息报》刊登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报道：糖尿病、咽喉炎、流行性感冒、肺炎、多发性神经炎。就这样为他的退休进行舆论准备。

1930 年 1 月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回到了莫斯科，可是，不言而喻，并没有开始工作。7 月 2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解除了他的人民委员职务。他成了联盟级个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

契切林希望卡拉汉接替自己的职务，但是没能如愿。斯大林对卡拉汉不好，1926 年给莫洛托夫写信说："请不要让卡拉汉在中国问题上为所欲为——他会把整个事情搞坏，真的。他已经衰老无用了……可是放肆和厚颜无耻，自以为是和妄自尊大——这些毛病太多了。"列夫·卡拉汉和契切林相互十分了解，正如契切林形容的那样，"绝对的协调一致"，契切林去世一年后，列夫·卡拉汉就被枪毙了……

没有发出的遗书

当契切林得知卡拉汉的候选人资格没有通过后，他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局委员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身上，希望任命他接替自己的人民委员职务。契切林认为，古比雪夫是一位文化水平高和相当不错的工作人员。契切林给他写了一封内容丰富的类似政治遗嘱的长信，其中两次陈述了自己的不幸和委屈："从 1929 年开始为所有的蛊惑宣传和违章蛮干行为打开了闸门。现在不需要工作，需要的是'在实践中开展反右倾斗争'，也就是说，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告密出卖。国家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在我们这儿特别明显，因为这里的工作不能停顿……国际事务不能推迟。在我们'社会组织'中的蛊惑宣传已经令人完全难以忍受。已经实行了耍嘴皮的人对干实事的人的专政。"

契切林在信中谈到了笼罩整个机关的丧失理智的情况：清洗、精减、党的工作、社会工作、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告密出卖。他

写道："人手少得可怜，外事工作又不能停顿，然而没完没了地抽调人员，时而临时出差，时而去做党的动员工作，时而去加强工厂的工作，时而被任命到各种委员会工作……"

令退休的人民委员气愤的是，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某种专门的高等学校，以快速培养善于吵架和蛊惑煽动的人，他们将把有经验的效劳多年的优秀工作人员撵走……把那些不合格的尤其是一点也不讲究举止文明（用手指头抠鼻孔，往地板上、昂贵的地毯上吐痰和吐唾沫）的人硬塞到我们这儿来，这种做法不仅对发展极其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联系造成严重困难，而且也很难保持现有的联系。"

没有任命古比雪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他被任命为负责国家计划工作的政府副首脑，而把李维诺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这封信一直没有被发出去。他又度过了 6 年，自己过去的事什么也不想，可也没有人再提起他。疾病使他失去了真正的生活。他甚至与亲属也没有保持联系。

早已被人们忘却的契切林于 1936 年 7 月 7 日在一间摆着一架钢琴和许多书籍的没有暖气的公寓内默默地去世了。报纸刊登了他的画像、悼词和医疗委员会的诊断结论。在位于库兹涅茨桥大街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会议厅，举行了与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遗体告别仪式。7 月 9 日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

* * * * * *

当然，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对待契切林并没有像对待托洛茨基那样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但是尽量不再提起他。多年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非常嫉妒别人在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他不喜欢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没有部长的批准，有关外交史的著作是不得出版的。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谈到如何纪念苏维埃外交工作 70 年时，葛罗米柯还不满地说：

"契切林？他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呢？他是与列宁一起工作过。可一切都是列宁做的……"

第二部分

斯大林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三章

李维诺夫：枕头下的左轮手枪

“李维诺夫被撞死的那次车祸不是偶然的，是斯大林蓄谋制造的。”这话是原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有一天在自己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僻静角落里说出来的。

听到这话的只有一个人。这还是在苏联时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这种令人震惊的消息是不可能的，但是斯大林的老战友突然决定揭穿只有他知道的一些重要秘密中的一个。或许他早已认识的有魅力的对话人博得了他的好感，愿意讲一点他知道的秘密？

与米高扬交谈的是著名记者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科夫。他曾在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工作过，是斯大林的翻译。

别列日科夫对米高扬的话大为震惊：官方的说法是，前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因心肌梗塞死于1951年末。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个。”惊讶的别列日科夫说。

“我很了解这个地方，距离李维诺夫的别墅不远，”米高扬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那里是个急转弯，当李维诺夫的汽车转弯时，前面有一辆卡车横着停在马路上……斯大林是干这种事情的能手。他把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召来，亲自单独地给他们下达任务，就这样斯大林希望摆脱的人牺牲了。”

“斯大林具有惩罚李维诺夫的理由，”米高扬继续讲自己的故

事，“当李维诺夫实际上被解除职务后，来莫斯科的美国上层人士经常到别墅拜访他，他们不放过按照惯例探望前部长和前驻美大使的每个机会。”

美国人抱怨说，苏联政府坚持不妥协立场，由于斯大林固执，很难与他打交道。李维诺夫对他们说，不应当绝望，莫斯科的不妥协立场是有限的，并建议：如果美国人表现出足够的强硬态度，那么苏联领导人就会让步。李维诺夫在自己别墅里的这次谈话，像其他多次谈话一样，被窃听并录了下来。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人们报告了斯大林，他向其他政治局委员播放了录音。

“我也听了录音，”米高扬回忆说，“李维诺夫的行为使我们非常气愤。从实质上说，这是背叛。起初，斯大林打算审判和枪毙李维诺夫。但是，考虑到诉讼会挑起国际事端，于是便决定暂时搁置这一案件。但并没有忘记它。他根本不会忘掉这些事情。忽然命令执行自己的判决，但要不动声色秘密地执行。李维诺夫就这样在车祸中死亡了……”

瓦连京·别列日科夫记下了米高扬的这些话，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己的回忆录《我是如何成为斯大林翻译的》一书中公开了这些话。别列日科夫认为，没有理由怀疑米高扬这些话的真实性。这次交谈发生在 1972 年。当时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已满 77 周岁。他仍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精神饱满并且行动自如，正在写回忆录而且记忆力很好。

帕帕沙去银行

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第三任外交人民委员马克斯·瓦拉赫，在革命前地下工作的年代里有许多党内的化名：帕帕沙、格拉夫、库兹涅佐夫、拉特舍夫、费利克斯、加里松、卡济米尔……

但是，他以假名李维诺夫载入史册，李维诺夫也就成了他的第

二个姓，他这个姓全世界都知道。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从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共9年。感情不大外露的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前任契切林和托洛茨基不同，能更好地适应新生活。他十分了解，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但同时，李维诺夫又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真理直言不讳。这些不多见的品质，既注定了他的升迁，又注定了他的垮台。

马克斯·瓦拉赫是银行小职员的儿子，1876年生于比亚韦斯托克市，毕业于实科学校[①]并到沙皇军队中服过兵役。在少年时期他就被社会民主思想所吸引，22岁入党，1901年就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起被捕。他将被流放，但是1902年夏，他同另外11个被监禁的人得以逃出基辅监狱——卢基扬诺夫斯克监狱。警察局在全帝国散发了描述其特征的通辑令："红棕色头发的男子，身高2俄尺6俄寸，身体健壮，不留胡须，浅蓝灰色的眼睛，近视，戴眼镜，圆脸，皮肤黝黑，宽前额，高鼻梁，嗓音洪亮。"

没有逮住李维诺夫。当时的国界控制不严。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他辗转到达了瑞士，他在这里立即作出了决定其今后一生的正确选择——加入了列宁的阵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让他管理财务，负责账目。李维诺夫成了党的出纳员，而且对资金管理得非常严格。他取得了列宁的信任，并很快被委任从事更令人喜欢但又不是特别危险的工作——向俄罗斯运送非法书刊，后来还运送武器。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以惊人的勇敢和沉着冷静而著称。他几次秘密回到俄国。沙皇政府的警察局事先已从其境外的代理机关得知他要回俄国，对他进行了跟踪监视，但是他两次都巧妙地摆脱了监视。

---

① 在旧俄，实科学校与"古典教育"相对，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译注

1906年李维诺夫在巴黎开办了一家冒牌办事处，并冒充厄瓜多尔军官，开始定购武器——在德国定购子弹，在意大利定购步枪，在丹麦定购机枪。保加利亚人鲍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帮他采购武器，此人后来在他领导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

搞到武器看来并非是太复杂的事情，但是，如何把武器送到因无事可做而心情焦急的高加索战斗小组那里呢？李维诺夫企图通过保加利亚人来做这件事，他告诉他们说：

"武器是供亚美尼亚人使用的，他们正在准备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土耳其人的起义。"

保加利亚人仇恨土耳其人，同意帮忙。李维诺夫租了一条轮船，装上了武器，但是这条船在黑海搁浅了，货物落入了罗马尼亚当局手中。著名的卡莫，即西蒙·阿尔沙科维奇·捷尔-彼得罗相[①]就在船上，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挽救这些武器。

捷尔-彼得罗相俄语讲得不好，把"谁"这个词第三格的发音"克穆"发作"卡莫"。斯大林特别喜欢他，于是就叫他卡莫。绰号被叫惯了，就成了他的名字。捷尔-彼得罗相非常需要武器，因为他负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通过武力方式为社会民主党人搞资金。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这是抢劫，而是"没收"。布尔什维克的战斗队员成功地进行了几次没收，并获得了大批资金。

卡莫1907年6月在梯弗里斯组织了一次最有名的抢劫活动。6月13日国家银行梯弗里斯分理处收到了通过邮局从圣彼得堡寄来的面值500卢布的大量纸币，共计37.5万卢布。卡莫化装成军官，带领由50人组成的武装小组，分散部署在埃里万斯基广场上。大约在上午11点钟，两辆四轮轻便马车驶入广场：乘坐第一辆马车

---

① 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1905～1907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组织地下印刷所、运输武器和革命书籍等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创造性。1917～1920年为高加索和俄国南部游击队和地下党的组织者。——译注

的是运送货币的国家银行出纳员库尔久莫夫，乘坐第二辆马车的是四名武装士兵。由 50 名哥萨克士兵组成的护送队护送他们。

卡莫的人员按照他的命令拿起了武器。几颗炸弹向哥萨克士兵飞了过去。出纳员库尔久莫夫由于爆炸而被甩出车外。受惊的马匹狂奔起来，但是卡莫在马蹄下又扔了一颗炸弹，四轮敞篷马车翻了个底朝天。卡莫拿起钱箱，人就消失不见了。在相互射击中，3 人被打死，约 50 人受伤。战斗队员获得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是数额很大的资金，但是，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看来并不那么简单。银行转运的钱都是面值 500 卢布的纸币；当局把被抢走的这些纸币的号码马上通知了俄国和外国的银行。偷来的钱需要到银行去兑换。

布尔什维克判断，外国银行家看来不像接到警察局通知的国内银行家那样警惕性高；况且在当时卢布可以自由兑换成外汇。他们把钱运到巴黎，委托李维诺夫兑换成外汇。兑换应当在 1908 年 1 月 8 日在几个城市同时进行。李维诺夫本人与自己的女助手凡妮·亚姆波利斯卡娅一块去了银行。

但是，沙皇警察局事先了解到了这些行动计划，并请欧洲同行给予帮助。人们逮捕了李维诺夫，没收了他的钱，但是不能指责他参与抢劫活动。况且还有非常有影响力的法国社会党人支持他们的俄国志同道合者。人们释放了他并让他在巴黎多少干点活，让他能攒够到伦敦的火车票钱。李维诺夫辗转到了英国，在这里生活了 10 年。在伦敦他仍然主管党的财务。

人们认为，在高加索地区进行的抢劫财产的活动是由斯大林亲自领导的。李维诺夫能够活下来，正是由于领袖到死一直对战斗队的战友们怀有善意。这样的传言一直流传着。不管怎么说，在 1918 年 4 月《火星报》的编辑之一和孟什维克的首领尔·马尔托夫（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曾因他在《前进报》上指责斯大林参与抢劫财产的活动而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令马尔托夫气愤的是，他的案件竟由革命法庭来处理。这一做法再一次说明，马尔托夫已失去了自我辩护的机会，法律和道德已遭受严重的破坏。

"如果政治活动家感到自己遭到诽谤，他可以请求仲裁法庭处理，"马尔托夫说，"革命法庭条例中指出，侮辱人民或破坏社会生活的人应由革命法庭予以审判。人民一点也没有因斯大林的名字被提到而受到侮辱。"

马尔托夫请求传见证人，这些人应当证明斯大林在巴库参加了抢劫"尼古拉一世"号轮船和图谋杀害工人扎里科夫的行动。在这些证人中，他提到了以诺伊·饶尔丹尼亚为首的一批著名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饶尔丹尼亚在当时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主席。

"马尔托夫的指控，是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所惯用的政治斗争方式的表现。"斯大林说。

马尔托夫对斯大林的话回答说：

"我拒绝说我犯有诽谤罪的控告。不论你们选择何种审判方式，马尔托夫的名字将与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共产国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坐在大厅里的听众对马尔托夫报以热烈的掌声。革命法庭庭长命令把听众清理出大厅，并宣布休庭。他把审判会议向后推迟了一周，以便尽可能把证人召来。马尔托夫始终没有得到对自己提出的控告的具体答复，也没有等到传见自己提到的那些证人。相反，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他却遭到了嘲弄。《消息报》写道，"当马尔托夫在法庭上绝望地为自己辩护，闪烁其词，而提不出任何文件和证据的时候，大家看到马尔托夫公民在心中是非常沉重和痛心的。在审判那天，我始终有一个思想在脑子里萦回：公民马尔托夫的天才应该好好用在别的地方。"

"这些天才应当在我们所经历的对于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极好地加以使用，而不是用来对正在为反对各国掠夺者而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流血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谩骂……

需要具有天才般的能力，才能在什么时候能证明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是'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布尔什维克，是剽悍的抢劫者……

这就像这个不怀好意的和不够诚实的政治战士和思想敌人，公民马尔托夫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确，今天的马尔托夫已经不像过去的马尔托夫战士、马尔托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分子[①]。要知道，尔·马尔托夫曾经是为数不多的社会党人之一，他们以正义及微笑给人类带来光明，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工人国际所缅怀……

人们很难想象，从前的那个尔·马尔托夫，由于派别仇视，竟会如此厚颜无耻地不仅诽谤政治敌手个人，以便中伤、'扼杀'他，而且还诽谤整个党。笔者作为一名年轻和普通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劳动者，只有愤怒地反击公民马尔托夫对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人和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权为之骄傲的约·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这些肮脏的指控。笔者不得不痛心地对现在的马尔托夫说一句话：'与敌手斗争仍然应讲诚实。'"

被捕和回国

李维诺夫完全适应了英国的生活方式，而且直到去世都是一个亲英分子，后来这也被认为是他的罪过。1916 年他与英国女作家艾维·洛伊结婚。在英国，李维诺夫夫妇生了两个孩子——儿子米哈伊尔和女儿塔季扬娜。李维诺夫对自己的妻子说：

"你要考虑到，如果在俄国爆发革命，我马上就离开。"

后来，艾维跟着他去了俄国，在那儿人们叫她艾维·瓦尔特罗芙娜。

李维诺夫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伦敦小组的书记和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二月革命后，李维诺夫负责向俄国转运政治侨民。在

---

①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5 年）上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国际联盟。—译注

战时条件下，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1918 年 1 月 3 日，一些伦敦晚报报道说，侨民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被任命为苏维埃俄国驻英国全权代表。

首先，李维诺夫给莫斯科送去了密电码，该密电码是他与原沙皇驻伦敦军事采购团的工作人员共同编制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同李维诺夫通信时使用的就是这种密电码。1918 年 3 月第一位外交信使辗转芬兰、瑞典和挪威，最后到达目的地，来到他这儿。给他提供了沙皇货币 20 万卢布，当时的英国银行尚未认清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因此它们还接收沙皇货币。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租下了馆址，并雇用了工作人员。在大门上挂上了“俄国人民大使馆”的牌子。英国官方当局不正式承认它。以临时代办康斯坦丁·纳博科夫为首的原俄国大使馆在伦敦仍在发挥作用。但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前，在伦敦人们对待李维诺夫是相当有礼貌的。记者们没完没了地采访他，总之，他成了伦敦的著名人物。

莫斯科同德国人签订和约后，英国人就开始把苏维埃俄国的代表当作敌人对待。9 月 1 日肃反工作人员在莫斯科逮捕了英国外交官布鲁斯·洛克哈特。一年前托洛茨基为了从英国监狱救出契切林，曾下令逮捕了英国大使。这次英国人学习托洛茨基的做法，也以同样方式进行还击。9 月 6 日英国警察局搜查了李维诺夫的住所，逮捕了他本人。十天后又被迫释放了他，以便让他与莫斯科联系，并向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转达伦敦要以李维诺夫交换洛克哈特的建议。这个建议被莫斯科采纳。与李维诺夫一起离开伦敦的，还有几十名急于回俄国的侨民。

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受过教育和有见识的特别是懂外语的布尔什维克，都像黄金一样受到重视。李维诺夫的第一件工作是派他到瑞典出差。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已经在那里。由于他很早就生活在斯德哥尔摩，所以就任命他为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全权代表。李维诺夫和沃罗夫斯基应当与各协约国建立联系，并建议它们停止反

对苏维埃俄国的敌对行动。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来得及去做。瑞典决定断绝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苏维埃政权的所有代表不得不于1919 年 1 月 30 日乘坐打上铅封的车厢离开了瑞典。

由于老布尔什维克们还记得李维诺夫善于管理财务，于是就任命他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中央租让委员会（其职能是根据租让原则建立与外国商人的关系，即把企业和天然矿产租赁给外国商人）副主席。

但是，委任他的外交任务开始逐渐取代所有其他任务。1919年秋天，李维诺夫前往哥本哈根主持与英国人进行交换战俘的谈判。这些接触又转变成探讨建立贸易关系的可能性的谈判。之后，李维诺夫被任命为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最后，被召回莫斯科，取代列夫·卡拉汉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后者被派往华沙担任全权代表。

1922 年夏天，他率领苏维埃代表团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国际代表会议，从此李维诺夫开始有了名气。27 个国家的代表汇集海牙，讨论俄国的债务和向俄国提供贷款的条件问题。苏维埃俄国非常希望得到贷款，但又坚决拒绝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欠下的债务。代表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那个时期在莫斯科很受到尊重的正是这样的外交工作。《真理报》刊登了杰米扬·别德内的一篇题名《协约国狐狸与苏维埃仙鹤》的寓言：

李维诺夫，尊敬、光荣属于他，
机灵的小伙子不是懦夫、胆小鬼；
围猎者的喧闹声紧紧地包围着他，
而他却端坐着，丝毫不予理会……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两位副外交人民委员中的一位，他直接领导两个西方国家司（罗马尼亚司和捷克斯洛伐克司）。但是，他的精力、组织能力、在党的领导层中的广泛联系，很快使他占据了外交主管部门中的第一把交椅。他行动非常独立自主，经常与人民委员争论。如果契切林离开莫斯科，他就代理契切林的职务，当契

切林生病和到国外就医时，他实际上就主持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在人民委员部内，李维诺夫被视为井然有序和一丝不苟地认真工作的榜样。他非常热爱劳动而且性格十分坚强。他的同事后来回忆说，李维诺夫每天10点多钟到人民委员部上班，下午4点多钟下班。他经常把文件带到自己的住所阅读。当时他就住在位于斯皮里多诺夫卡街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住宅大院。他一切都干得不错，所有的工作都按时完成，本人从不迟到，也不允许别人迟到。他准时在约定的时间接见工作人员。李维诺夫一贯举止自信，不能容忍谄媚和阿谀奉承。

1930年7月22日在报纸上刊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任命李维诺夫担任人民委员的决议。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为外国人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宣布了自己被任命为人民委员的消息。据目击者说，外国外交官听到这一消息后，紧张的心情马上放松了下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会把列宁格勒市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挑选为契切林的继任者。在莫斯科工作过的外国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最强硬的“斯大林式的小伙子”。

关于契切林之后谁将主持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争论，已有好长时间了。斯大林作出了有利于李维诺夫的选择，他还是根据列宁和托洛茨基当年任命契切林时的那些理由：日常的外交事务不应当由政治家承担，而应当由职业外交家去做。尽管李维诺夫党龄很长，而且过去有不少功绩，但是他在党内没有地位。托洛茨基写道：“在十月革命前，李维诺夫在党的机关内已经长期不起任何作用。”在党的第16次代表大会上（1930年7月）他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许多人对他不信任——他娶了一个英国女资本家，她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她怎么想就怎么说。1927年艾维·李维诺娃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指出，她一点也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并请求人们不要相信荒谬的流言。该信落到了斯大林手中。斯大林读完了信，把马克西姆

·马克西莫维奇叫来，对他说：

“请告诉你的英国女人，我们不会伤害她。”

的确——没有伤害她。

在被任命担任人民委员的前夕，李维诺夫发生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起因是他的那位在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工作的堂兄弟萨韦利·李维诺夫伪造了期票。萨韦利跑到巴黎躲藏了起来，苏联代表企图说服法国当局引渡逃犯。萨韦利·李维诺夫的案子是由法国法院审理的，他们宣告他无罪。西方报刊报导了这件事情，结果这件事就被不如人意地扩散开来了，政治局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件丑闻，正如同说李维诺夫追随“右派分子”——尼古拉·布哈林和政府首脑阿列克谢·李可夫的谈论一样，并没有给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造成危害。与此同时，斯大林 1929 年从他正在休养的地方索契，给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请对中国和英国表现得更加强硬。请全面审查看来不赞同我们政策的李维诺夫。”

但是，斯大林同时又信任李维诺夫。1931 年 5 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一个电报，这类电报在苏联外交史上是找不到多少的。这封电报就是发给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李维诺夫的。电报指出：“政治局认为，您在日内瓦的发言，在内容上是正确的，在形式上和语调上是无可挑剔的。我们不反对您以您认为适当的形式参加您提到的所有日内瓦委员会和分委员会。”

人民委员及其副手

然而，政治局不仅批准了关于人民委员本人，而且批准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由五人组成的部务委员会的任命，中央组织局还批准了各司长的任命。部务委员会由人民委员本人、第一副人民委员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原中央书记，由于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被调离党的工作）、第二副人民委员列夫·卡拉汉（和蔼可亲的漂亮男子．

娶了一位有名的芭蕾舞女演员为妻）和李维诺夫的老相识鲍里斯·斯托莫尼亚科夫组成。

契切林认为卡拉汉是“非常机敏的、卓越的、天才的政治家”，而不太喜欢斯托莫尼亚科夫，认为斯托莫尼亚科夫是“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者、缺乏灵活性、没有政治敏感性、爱吵架、令人厌恶的、破坏关系的人”。相反，李维诺夫高度评价斯托莫尼亚科夫，而对卡拉汉却不能容忍。人们想把斯托莫尼亚科夫派遣到柏林接替克列斯廷斯基的职务，但是斯托莫尼亚科夫拒绝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副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第五位委员的人选，暂时空缺。

李维诺夫担任人民委员后，继续领导第三司——处理他感到亲近的盎格鲁撒克逊和罗曼语系国家的关系。克列斯廷斯基则领导第二司，处理与中欧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关系。

人民委员可能是模仿斯大林的作风，显得枯燥无味、作风生硬。但是可以同他争论。外交人民委员部中的辩论之风只是在莫洛托夫来后才停息了下来。

克列斯廷斯基和蔼可亲而且作风朴实。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一直工作到 1937 年春天，后来他突然被调到司法人民委员部，而且几乎马上就被逮捕了。在 1938 年 3 月审判“托洛茨基右派反苏集团”案件的法庭上，他被打成主要案犯之一，并被枪决。

1933 年 5 月，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被任命为负责与远东国家（日本、中国、蒙古）关系的副人民委员，此人在国内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成为财政人民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也被看作是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的人，曾在 1929 年被派往英国担任全权代表。

1932 年秋天，索科利尼科夫请求回国。回国后任命他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后来成为副人民委员，但是时间不长。他没有搞好与李维诺夫的关系，1934 年

外交人民委员部压缩副人民委员人数，于是索科利尼科夫被调任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1936 年他被逮捕，被判处 10 年监禁。他在狱中被打死。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卡拉汉仍然担任主管与中东国家（阿富汗、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各国）关系的副人民委员。卡拉汉是前任人民委员契切林的密友，他暗中与李维诺夫竞争。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不太喜欢自己的副手，所以在他任职期间，当他出差时就不再让卡拉汉代理该部门领导人的职务。1934 年 5 月列夫·米哈伊洛维奇由第二副人民委员职务调往土耳其担任大使。

卡拉汉在安卡拉感到很无聊，于是请求担任一个有更多事情可干的工作。1936 年 12 月 31 日他写信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他对伏罗希洛夫称“你”，抱怨自己目前很受压抑，他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没有前途，最好能离开该部去干其他工作。他写道：“我总想回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在那儿我可能会好些。那里有大量外事工作，我可以成为叶若夫不错的助手。”

令人惊讶的是，当时人们对正在发生的情况却知道得如此之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倒确实对卡拉汉很感兴趣。但是另有目的。把他召回莫斯科，只是为了逮捕和枪毙他……

1934 年，在所有人民委员部中，其中也包括外交人民委员部，统统撤消了部务委员会。在契切林时期，人们在会议上可进行真正的争论，部务委员、还有那个李维诺夫都敢于反对人民委员的意见，向中央写信，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斯大林认为，部务委员会是多余的行政机构。政治局作出决定：“为了彻底贯彻人民委员部管理的一长制原则，认为撤消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并由人民委员和不多于两名副人民委员来领导人民委员部，是适宜的。”

在四名副人民委员中，李维诺夫仅仅保留了两名——克列斯廷斯基（第一副人民委员）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第二副人民委员）。这就巩固了他在人民委员部内的权力。而且在 1934 年年初，李维诺夫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斯托莫尼亚科夫领导第一西方司（负责与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主要司，因为与波兰的关系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来说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人民委员最信任鲍里斯·斯托莫尼亚科夫。当在人民委员部开始大规模镇压时，李维诺夫企图挽救斯托莫尼亚科夫，因为他在被捕时企图开枪自杀并被送进了监狱医院。李维诺夫请求斯大林接见。他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但仍坚定地说：

“我为斯托莫尼亚科夫担保。”

斯大林回答说：

“李维诺夫同志，您只能为自己担保。”

斯托莫尼亚科夫被镇压了。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所有领导人当中，只有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本人活了下来……

全权代表处，即外交代表处或大使馆的人员编制不多——全权代表本人、参赞、一秘、武官、总领事。其他是技术人员——领事处秘书若干人、总务主任、密电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警卫。

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曾任驻阿富汗、爱沙尼亚、丹麦、保加利亚等国家的全权代表，他的妻子穆扎·瓦西里耶芙娜·卡尼韦兹曾留下了关于当年大使馆生活的回忆录。当她与丈夫回莫斯科休假，发自内心地说他们过烦了远离祖国的生活时，一位同事低声耳语回答说：

“穆扎奇卡，请别急于从国外回来。这里是地狱般的生活。”

驻外全权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在那时就已尽量在人们面前说驻在国和整个国外生活如何不好。他们知道，在听众中一定会有警惕地监视全权代表处全体工作人员思想道德状况的国家安全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人。如果苏联外交官喜欢上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并且不善于掩饰自己，那么就会很快把他弄回国内。

许多人都希望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因为在国内挨饿而且物资匮乏。一些外交官根本就不打算回国。从 1928 年秋至 1929 年秋，

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有72名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拒绝返回苏联。挑选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变得更加严格——如果发现谁有亲戚在国外，“非无产阶级出身”或者背离党的路线，根本就不放他到国外去工作。

在1920年代，外交使团由受过教育、在国外居住过和懂外语的老布尔什维克组成。在1930年代，开始往国外派遣，用当时的话说，“被提拔的领导干部”，即被动员参加外交工作的党员，他们一点也没受过培训而且一点外语知识都不懂。只允许外交官同外国人交往。其他人员——即外交代表处的技术和行政机关人员，只应当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在不大的集体中引起的冲突，比住在拥挤的合用套房里的居民的冲突还要严重。人们相互吵架，彼此向全权代表或直接向莫斯科写告密信。所有出国的人都得缴出党证，但在全权代表处经常召开党支部大会，大家可以尖锐地批评全权代表，也可向中央机关反映自己的意见。

不过，全权代表本人也可以对人民委员表示不同意见，对他的指示提出争议。在大规模镇压开始前，外交工作，其实也像整个国内生活一样，还没有定型。在中央机关中的私人关系和联系往往能解决许多问题。在20年代（非常普遍）以及30年代初，一些全权代表——曾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直接向与他们有私人关系的政治局委员汇报情况，要不然就直接向斯大林本人汇报。李维诺夫在党内的地位比契切林高，但是他不属于最高领导层，所以那些不久以前还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全权代表不认为自己是他的部下。不过李维诺夫以及他的继任者一直要求所有向上级的报告都要经过人民委员部。

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阿罗谢夫向斯大林抱怨说：“主管部门不希望全权代表有机会直接与政治局或政治局委员联系。主管部门希望所有的职位都由它的官员担任。”阿罗谢夫抓住机会强调指出，李维诺夫与右派关系密切，而副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完全是个托洛茨基分子。李维诺夫束手无策，因

为阿罗谢夫曾经与莫洛托夫一块儿学习，与伏罗希洛夫一同流放过。

斯大林不反对全权代表直接向他汇报情况。他亲自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那些苏联驻最大国家的全权代表。这样可以使他得到更多的消息，其中包括人民委员部内部相互关系的情况，不过总书记不允许外交官有任何独创精神。斯大林的主要手腕是，让人们自觉地自我约束：每个人应当做委托给他的事情，准确地一字不差地执行领导的指示。1933 年驻瑞典大使亚历山大·科隆泰在斯大林会见后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们的工作中，不需要主动精神。需要'执行任务'。"

李维诺夫成为人民委员后，他更新了大使的人员结构，用首批职业外交官替下了过去的政治家。外交干部的挑选工作是由中央组织分配部的国外干部局负责的。还有一个对从国外工作后回国的同志的审查委员会，负责直接管理外交官员。该委员会是党的监察机关——中央监督委员会的直属机构。

1937 年 8 月 11 日，一颗正在升起的党的明星、中央委员会党领导机关部部长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根据您的委托，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挑选了 50 名工作人员。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都经过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查。挑选的这些同志，我都单独地进行了接见，此后李维诺夫与他们见了面。"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

在政治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负责外交政策问题，而且总书记力争亲自过问所有重大问题，并经常与人民委员部发生意见分歧。在给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信中，他经常出言不逊："卡拉汉举止傻里傻气而且无礼貌……卡拉汉和李维诺夫犯了不可宽恕的错误

……外交人民委员部暮气沉沉，盲目无知，目光短浅，应当抽打它。可是你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成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中游手好闲人的尾巴。”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拒绝会见外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只是在 1933 年开始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几个外国大使。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接见的第一位欧洲国家部长是英国人安东尼·艾登，他当时是掌玺大臣。斯大林断然拒绝到国外去。

外交官的任何重要声明、文件的正文和与其他国家的通信、对参加国际谈判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都应当预先得到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局的同意，这在 20 年代末已经成为惯例。

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政治局每月召开 4 次或 3 次会议。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当领导人中只剩下那些看斯大林眼色行事的人时，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变得极不定期。斯大林把少数战友召集到他身边，就决定一切问题。

当政治局会议定期召开时，开会那天是紧张的一天。上午 11 点钟开始，有时晚上 7 点钟结束，不过中间休息一会儿，吃午饭。所有应邀列席会议的人都聚集在秘书室——隔壁不大的一间房间里。按顺序召唤他们。在 1929 年秋天以前，李可夫主持政治局工作，后来是莫洛托夫主持政治局工作。斯大林坐在会议主持人对面的桌子一端，倾听发言人的讲话。有时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在政治局委员之间发生争论，则马上停止对该问题的讨论，把问题退回去进行补充修改。未准备好的问题是不予审议的。不太重要的决定，则通过向政治局委员征询意见的办法办理——或者向他们散发印有“同意”或者“反对”字样的意见调查表，或者干脆打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了讨论不同的外交政策问题而成立的政治局各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交人民委员或者其副手在这种委员会中只不过是普通的成员。但是，1920～1930 年代在中央机关中还没有国际部。该部是在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在中央委员会成立的，当时由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

·季米特洛夫领导。

1933年5月，李维诺夫在同一位外国外交官谈话时说："我们共产党没有外交政策部，因此我们人民委员部执行的对外政策，既是国家的又是执政党的对外政策。"但是，不止一次打算在党的机关中成立负责对外政策的部门。1932年4月，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国际问题情报局——国际情报局。由前中央委员和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领导。他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人物之一，是一个思维敏锐而又刻薄的人，既有教养而又愤世嫉邪、看不上周围人的人。

拉狄克生于利沃夫，能熟练地运用主要欧洲国家的语言，他在波兰、德国生活过，在那里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在华沙，他同罗莎·卢森堡和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在德国，同克拉拉·蔡特金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共同进行地下活动；在瑞士，同列宁一起工作。十月革命后，他打算在德国发动武装起义，但没有成功。大量的冒险主义行为和不喜欢从事日常工作影响了他的升迁。此外，由于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所以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认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显而易见的继承人，可是他打错了算盘。1927年，拉狄克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党籍。两年过后，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好像为他平了反。在那些年里，斯大林很欣赏拉狄克的知识渊博，并且愿意利用他的杰出才能。拉狄克被任命为《消息报》编委会委员，再次把他派往国外。在中央机关内，责成他从事形势分析工作，向党的领导人通报世界形势。拉狄克的新角色在世界上都出了名，人们邀请他去国外，尽力设法同他进行秘密谈判，因为外国认为，他就是那个制订外交战略的人。而他又喜欢故意做出神秘的样子。

拉狄克的助手们与军事情报机关密切合作，定期编写《国际情报局报告》、《国际情报局通讯》和《国际情报局外国报刊简报》，并把它们分发给少数党的领导人阅读。不言而喻，在外交人民委员

部，人们像对待竞争者和对手那样仇视拉狄克。不过，他起重要作用的时间不长。1934 年 5 月，政治局的新决议把拉狄克情报局的任务简化为向中央机关简单报告国际消息。悲惨的命运等待着拉狄克本人。1936 年，他再次被开除党籍并遭逮捕，1937 年，因“平行的反苏托派中心”案件受审判。他出于拯救自己的希望，与侦查人员相配合，在法庭上自愿坦白和忏悔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罪过。他相信，斯大林不会杀害他，审判后将允许他恢复正常生活。法庭对拉狄克作出了最轻的判决——10 年监禁。他死于狱中……

没有请客的钱

20 年代末是苏联外交工作极其不顺利的时期。苏联未能同西方邻国签订一系列互不侵犯条约。英国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法国驱逐了苏联全权代表。在中国，苏联政策遭到了失败。

基本上，由于莫斯科的强硬态度，苏联外交工作处于非常困难局面。像准备签订消除两国间分歧这样一些最简单的国家间协定的工作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成立仲裁法庭、进行调解的想法刚一产生，就受到批驳。鲍里斯·斯托莫尼亚科夫向中央报告说：“我们（即苏联）所关注的、由于错误运用条约或违反条约而产生的争议问题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可是，对方关注许多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机关提供了许多根据，使人可对违反条约或者侵犯公民权利提出意见。”

也产生过成立双边的协商委员会的想法，但这个想法也没得以实现。1929 年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采取的态度和在我们与它发生的冲突的性质下，协商委员会将只能在偶尔情况下得出满意的结果……这些委员会的不成功将被广泛用来发表敌视我们的言论。”

在莫斯科签订政治或外贸条约的同时，总要伴随着指示外交人

民委员部采取反对白匪组织和侨民报纸的措施，也就是说，与居住在欧洲国家侨民的斗争有时竟然比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还要重要……来到俄国的外国公民变成了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行动的牺牲品；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了。不过与苏联公民不同，他们可以提出控告。有些国际争端是由李维诺夫解决的。1930 年 2 月 3 日，李维诺夫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在目前受到有关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新法律影响的富农中，有许多外国国民（德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等）。其中的某些行动违反现行的国际条约规定的关系。比如，根据苏德条约的规定，在苏联的德国国民的财产可以根据司法程序或以赔偿方式收归国有……"

人民委员请求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决定转瞬间通过了。外交看来比意识形态更重要。2 月 5 日，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所有特派员发去了严厉的指示："与苏联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富农、外国国民的财产不应当没收，直到作出特别命令之前，他们本人及其家庭不得被强迫迁出。"

但是，李维诺夫不得不再次呈文斯大林。他指出，许多外国人的财产已经被剥夺，应当考虑给予某种赔偿。对外国富农一般该怎么办呢，呈文中说："不经审判就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地方，也会引起外交抗议。另一种办法是可以建议他们到国外去，当然，如果他们本人愿意离开，我们也无权强制他们留在这儿；但是，把新的反苏宣传员释放到国外去，在政治上未必是适宜的……"

饥饿作为集体化的标志，也给苏联外交官的行动造成困难。甚至邀请外国客人来俄国都成了大问题。副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向驻布拉格全权代表亚历山大·阿罗谢夫解释不可能接待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原因时说："在当前，为使代表团得到良好的印象，需要花费很多力量来为它服务。而现在全部力量都投入到组织收割上去了。"

李维诺夫赋有改变局势的使命。他建议通过作出某些让步，比如承认沙皇俄国的债务，尝试与英国搞好关系。但是该计划没有博

得斯大林的欢心，他不喜欢作出让步。此外，他认为，英国是我国的主要敌人。从前很少关注美国，现在产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兴趣。1933 年春天是重新评价和重新研究对外政策方针的时期。还在不久以前，李维诺夫还曾向政治局证明说，“德国是苏联得救的最后指望”，在外交政策上应当面向柏林。但是，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马上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

1933 年 12 月，中央通过了李维诺夫的计划——加入联合国的前身组织国际联盟，继续与国际联盟各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创立关于避免德国侵略的地区互助公约。打算吸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各波罗的海国家、芬兰、法国、比利时参加这一协定。但是斯大林不急于与德国新上台的统治者争吵，他盘算了一下：是否有可能与之突然搞好关系呢？他甚至发表了迎合希特勒的言论。他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 年 1 月）上发言时说：“我们决不会因为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而喜不自胜。但是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法西斯主义，这至少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妨碍苏联和这个国家建立最好的关系……如果苏联的利益要求我们和某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亲近，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① 这实际上是同时向柏林的政治家呼吁。

但是希特勒没有响应这一友好表示。他仍然像过去那样恶毒地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改变了想法——建立欧洲国家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为了避免被孤立和防守薄弱，从 1934 年起莫斯科一直在探索与邻国、与法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建立军事政治同盟。“防疫线”的思想开始有了另外的涵义。在 1920 年代，西方曾企图把苏维埃俄国隔离起来。现在苏联打算利用同样那些东欧国家把来自纳粹德国的危险隔离起来。已经很明显，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良好关系也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不能让亲希特勒的力量在这

---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267－268 页。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些国家得到加强。决定把同这些国家签订的互不侵犯公约再延长10年，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军人建立关系，邀请他们来莫斯科访问。

在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思考斯拉夫民族的历史渊源，认为可以利用昔日的亲情来为目前的政策服务。1934年春天，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向苏联驻布拉格全权代表转达了国家总统托马什·马萨里克的话："俄国人不了解，可能会有哪些走狗来帮助他们反对以中欧小国为代表的欧洲……"

但是，与邻国尤其是与波兰的关系始终没能搞好。苏联政策中对待欧洲小国的傲慢态度妨碍了关系的建立，应当承认，这种傲慢态度也被当前的俄国外交继承了下来。波兰政治家过度的感情用事也起了阻碍作用。总之，这是东欧和中欧国家之间相互仇视和害怕的时期。并且经常向邻国提出要求，往往是领土要求。

边界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确定的。这些国家希望正义占优势并使从前加入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各个民族获得独立。但是没能成功地划分理想的边界线。因此许多新国家的出现产生了大量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还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在许多这样的国家中，建立了独裁的民族主义制度，有的属于法西斯制度。

在莫斯科人们担心，波兰人准备与苏联打一场新的战争，并希望利用乌克兰出现的骚动，因为大规模集体化在乌克兰激起了愤怒浪潮和真正的农民起义。在73个村苏维埃中，起义的农民简直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农民不满的规模在莫斯科引起极度恐慌。决定把所有的波兰人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潜在敌人从边境地区驱逐出去。1930年3月11日，政治局作出决议，其中指出："根据现有的情报，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境内的富农分子猖狂进攻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将要把波兰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从边境地区驱逐出去，波兰政府可能进行干涉。

为了防止这一切发生，中央认为需要向乌克兰共产党（布）中

央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以及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相应部门下达如下指示：

——在边境军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加强作战部队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机动作战分队；

——认真准备并在最短时间内采取逮捕和驱逐波兰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行动；

——防止在边境地区出现任何大规模的进攻。"

在莫斯科，严肃认真地分析了从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进犯苏联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加强边防部队和军区的力量，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亚戈达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划拨了经费。1932年8月11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写信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情况坏极了……如果现在不着手扭转乌克兰的形势，我们就会失去乌克兰。请注意，毕苏斯基[①]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而且他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力量比雷坚斯（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作者注）或者科肖尔（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作者注）所想象的强大许多倍。同时还请注意，在乌克兰共产党（50万党员，嘿嘿!）内有不少（是，不少）腐败分子，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彼得留拉分子，他们最终都是毕苏斯基的代理人。只要事态恶化，这些人就会毫不迟疑地在党内（和党外）开辟反党阵线……"

为了恢复与波兰的接触，李维诺夫采取了及时的措施。停止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策划的对基辅天主教神甫的司法诉讼。在莫斯科决定把审判推迟到世界政治形势对苏联"更加有利的时刻"。

---

① 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8年11月任新生的波兰的首任总统（1918－1922）。20世纪波兰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1919－1920年领导了对苏俄军队进攻波兰的抵抗。——译注

我们中间谁是欧洲人?

李维诺夫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建立了在契切林时期不曾有的良好关系。未来的人民委员早在1902年在卢基扬诺夫斯克监狱中就认识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的领导人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李维诺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还是一块越狱的，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

从30年代初开始，共产国际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它已不再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障碍。可是李维诺夫却没有能够协调好同国家安全机关的关系。1932年8月20日代理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弗谢沃洛德·阿波洛诺维奇·巴利茨基发去了备忘录，其中列举了波兰外交官对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抱怨。克列斯廷斯基不客气地指出："波兰人对监视和警卫波兰外交使团所使用的粗暴手段提出抱怨，是有一定根据的。"克列斯廷斯基请求国家安全机关注意克服"可能引起波兰外交使团和波兰政府抗议和抱怨的因素"。

波兰人抱怨对所有来波兰外交使团驻地的人进行"毫不放松的监视"，"直到对所有来访者进行拍照"。所有与波兰外交官有某种接触的苏联公民"被逮捕或至少被召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建议他们成为秘密合作者"。

1932年3月5日一个叫И. M. 施捷恩的人在莫斯科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冯·特瓦尔多夫斯基开枪射击。1932年3月8日在《消息报》上出现了塔斯社的报道，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暗杀的目的是挑起苏联和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3月11日《消息报》刊登了塔斯社的报道，其中说，恐怖分子执行了"某些波兰公民的任务"。进行了法庭审讯，在法庭上人们把一个叫B. 柳巴尔斯基的人称为真正的组织者，此人是作为外交信使持波兰外交护照

来莫斯科的。波兰人对于这种推测十分气愤。苏联外交官也不怀疑整个故事都是编造的。他们不喜欢这个故事，尽管在他们中间没有多少波兰政策的拥护者。

莫斯科定期与波兰交换囚犯，目的是为了把执行共产国际任务的共产党人从波兰监狱中解救出来。波兰人不愿意把那些号召武装起义和把乌克兰人的土地从波兰分离出来的人交出来。例如，他们拒绝释放著名的地下工作者布罗尼斯拉夫·塔拉什克维奇。有一次把他引渡给了莫斯科，然而他又出现在波兰领土上。克列斯廷斯基给中央书记拉扎里·卡冈诺维奇写信指出：“对我们来说，塔拉什克维奇体现的价值不仅是整个波兰共产党的著名工作者，而且特别是西白俄罗斯工农群众的赋有重大使命的领袖。在与波兰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在苏联领土上居住具有重大意义。塔拉什克维奇在这时不仅在白俄罗斯阵线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会给我们带来巨大好处，而且在我们占领西白俄罗斯的情况下，大概会在革命政权机关中发挥重大作用。”

把波兰共产党人交换过来的做法还是成功了。他们来到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的战争发生了——1939 年 9 月红军从东面对防御德国军队的波兰军队进行了打击。但是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人了，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们作为“反革命民族主义组织”的参加者消灭了……

美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人员瑟缪尔·哈帕教授讲述了在 1930 年代初与德国大使馆信使、退役上校乘坐莫斯科～柏林这次列车的故事。当他们在通过波兰海关检查时，哈帕教授对上校说：

“瞧，我们已到了欧洲了。”

德国人含糊不清地嘟哝说：

“暂时还没有。”

波兰海关人员把教授的笔记当成了苏联的宣传材料，企图把它们没收，波兰海关人员的行为好像证实了上校的话。12 小时后，当德国边防军人让教授通过没有铁丝网的边界时，上校高兴地说：

“现在，正如您看到的那样，我们真的在欧洲了。”

莫斯科与波兰亲近的企图引起了德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德国坚决反对莫斯科和华沙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进行选择时，波兰人选择了后者。结果在1934年1月签署了波兰德国互不侵犯宣言。该宣言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波兰人并没有意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会遭遇到什么，自己得到了满足，却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其实，在苏联领导层中，不知为什么人们特别不喜欢波兰人。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波兰已成为同盟国，李维诺夫在一次不供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

“把3 000万波兰人和1.8亿俄罗斯人的利益同等看待是不合理的。在俄罗斯人的利益与波兰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波兰人应当让步。”

李维诺夫对斯诺说，他或许“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自己政府的意见，“但在对待波兰方面，我们绝对正确。实际上我们对波兰过于宽容。”

美国人不会喝酒

德国的强大成了苏联改善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关系的理由，可是这些国家怎么也不愿意承认苏维埃政权。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是1920年由国务卿科尔比制订的。他说，美国政府不打算承认苏维埃政府，因为它不能完全代表俄国各民族的意志。解散立宪会议和布尔什维克一直禁止类似全民选举的任何事物，就证明了这一点。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拒绝承认俄国所欠其他国家的债务，证明了他们不负责任的态度。最后还有一个情况，这些领导人滥用外交代表处的特权，利用外交代表处作为扩大革命宣传的渠道……

十多年过去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成了美国总统。从

他的竞选演说中已可得出结论，他打算承认苏联。但是国务院不急于同莫斯科进行谈判。美国人有自己担心的事情。他们害怕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并且打算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帝国。美国外交官们担心，同苏维埃俄国亲近“将会使在远东挣断锁链的疯狗更加凶狠”——当时人们是这样谈论日本的。

的确，在华盛顿有不少人支持承认苏联，他们指望发展贸易，天真地认为，苏联将用成千万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美国经济迫切需要销售其商品，以便刺激自己的生产和阻止失业的增长。一些美国实业界人士喜欢计划经济思想，他们还对苏联开始的大规模的改造赞叹不已。

但是，在大洋彼岸人们对苏联的经济机制了解很少。当时仍受斯大林宠爱的卡尔·拉狄克，刻薄地把苏联经济体制的声望与西欧餐厅里的俄式大菜的声望相比较。拉狄克写道，在欧洲的俄式大菜没有真正的莫斯科大菜的浓烈调味浇汁。当然这种调味浇汁太辣，不适合资产阶级的胃口，因为它是由三种成分——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执政的共产党组成的，没有这些成分就谈不上真正的俄式大菜。

1933 年 10 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了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信，建议派遣苏联代表赴华盛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这封总统信是大使威廉·布利特起草的，国务院并不知道。这意味着，罗斯福将亲自主持谈判，而不是由国务院主持谈判。对美国外交官来说，总统的倡议是一个出人意外之举。

在加里宁的回信中指出，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将立即动身去华盛顿。对苏联领导人来说，罗斯福的建议同样是个出人意外之举，不过是愉快的意外，尽管美国从整体上仍被看作是敌人。“北美利坚合众国努力的目标是”斯大林 1931 年 8 月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写道，“搞空我们的外汇金库和破坏我们的外汇状况，现在北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金融领域的主要力量和主要敌人。”

1933年11月7日李维诺夫乘坐“贝伦加里亚”号远洋轮来到纽约。轮船航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罗斯福接见了他。人们曾经提醒总统说，他将同非常聪明和举止言谈非常直率的人李维诺夫打交道。罗斯福喜欢这样的交谈者。

秘密谈判进行了几天。美国人希望从苏联政府得到保证，它将不再借助共产国际支持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为目标的组织。此外，美国人指望迫使苏联政府同意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关注保证使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全体馆员有机会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宗教教育。第三个大问题是关于债务和将来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根本拒绝偿还前政府的债务和赔偿美国人被国有化的财产，莫斯科没有得到贷款。美国人曾经专门成立了进出口银行，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运作，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只向归还战争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

每一方都有向对方提出要求的清单，但与此同时，也都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尽管罗斯福或者李维诺夫相互都怀疑对方是在企图蒙骗谈判伙伴。

1933年11月16日，最终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最后一个大国承认了苏维埃俄国。这是人民委员的成功时刻。李维诺夫回国后，斯大林赠给他一套别墅。

与美国的关系立刻受到高度重视。任命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为驻这个国家的首任全权代表。在启程前，斯大林三次接见了他——没有一位外交官曾受到如此关注。在1934年苏联大使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招待会组织得极为出色，华盛顿的著名人士成群结队地来到大使馆，因为这一切非同寻常，而且还因为有香槟酒招待。的确有香槟酒，并且还有伏特加酒招待。1917年起生效的冷酷无情的法律刚刚被取消，然而如饥似渴的美国人怎么也不能满足自己的渴望。在争抢鱼子酱和香槟酒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醉酒的人，并且都是美国人。所有的俄国人事先都受到警告，如果出现任何无节制的行为，将把他们遣送回国。

全权代表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从此再也不在大型招待会

上用伏特加酒款待美国人了。他得出对美国人不利的结论：

“他们不会喝酒。”

威廉·布利特是首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此人喜欢给人讲述他如何早在1918年就同列宁谈过话。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很多，但是美国外交官不很了解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不注意深入了解细节……

在美国承认苏联政府后，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莫斯科的外交生活变得更加活跃了。经常举办招待会。每逢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总要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最盛大的招待会。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出席。客人们跳舞、喝酒和吃饭，直到第二天早晨。不过外国人很快就信服了，同主人比赛喝酒和吃东西是件危险的事情。到早晨，许多客人都已神志不大清醒并好不容易地才回到家。

60周岁获列宁勋章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世界政治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经常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而且他的发言很引人注意，因为他讲话直率和理智。不过，他说话直率和刻薄激怒了受严格礼宾规则束缚的西方外交官们。

1936年7月17日，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在瑞士的蒙特勒市迎来了自己的60周岁生日，当时在该市正在召开关于黑海海峡管理办法的国际会议。在那里签订的公约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在生日那天，人民委员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祝贺电：“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您，布尔什维克党的资深活动家、苏联外交的领导人、为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孜孜不倦的战士，表示祝贺……”

李维诺夫回复了感谢电：“如果说在我的外交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它们首先应当归功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所

取得的全部成就的指挥者的坚强和英明领导——归功于领袖斯大林。这种领导也是今后取得更大成就的保证。”

授予他列宁勋章，以示奖励。在报纸上出现了著名外交家——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鲍里斯·斯托莫尼亚科夫、伊万·马伊斯基、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鲍里斯·施泰因的祝贺文章。《真理报》在题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儿子》的文章中写道：“李维诺夫同志的名字作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时代的一位最著名的代表的名字、作为苏联外交政策及其为保障所有民族间和平而斗争的化身将被载入史册。”

李维诺夫懂得，希特勒对俄国意味着怎样的危险。在 1935 年末，他给斯大林写信指出：“希特勒采取的反对我国的方针没有改变，而且，不应当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什么重大改变。希特勒的癫狂症有三点表现：仇视苏联、欧洲问题和吞并（合并奥地利的行动）……不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会得出什么结论，我建议把支付德国的货物订单限制在 1 亿马克，最多不超过 2 亿马克。

希特勒分子的反苏浪潮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规模惊人。尽管如此，苏联报刊对待德国仍然采取某种托尔斯泰主义的立场——不抵抗邪恶的立场。我们的这种立场进一步鼓励和加剧德国的反苏浪潮。我认为，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我建议向我们的报刊下达开展经常性的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分子运动的指示。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迫使德国停止或者减少反苏言行。”

李维诺夫积极尝试利用报刊为外交政策目标服务。有一次，他专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建议：“在外交政策宣传方面，资产阶级政府对我们有一种优势，不管在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有无正式外交关系，它们能够通过私营报刊对这些国家说出最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时甚至在最友好的同盟国关系方面，它们也利用这种方法。苏联的报刊是政府或者党的机关报，在对待与我们国家有某种友好关系的国家方面，迫不得已采取更大的克制态度，因而失去了针对它们说出不可避免的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的可能性。不错，

《莫斯科新闻》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它每周只出版一次，因此不总能对事件作出及时反应。

建议《消息报》和《真理报》开辟《读者来信》专栏，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这种不平等。这种做法在英国非常流行，甚至在像《泰晤士报》、《晨邮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这些大报中，《读者来信》专栏都占有十分显著的版面……如果您同意我的建议，请向有关人士下达必要的指示。李维诺夫。”

根据这封信，政治局作出了决议：“建议《真理报》和《消息报》开辟《读者来信》专栏。”为了要弄外交手腕，斯大林后来也进行这种制造假自由报刊的尝试。于是在战争年代出现了《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1945 年更名为《新时代》）。该杂志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批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对此十分气愤。斯大林无与伦比地厚着脸皮回答说，《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是苏联社会团体的机关报，因此政府无权向它发号施令……

欧洲被不可阻挡地推向战争，但是只有少数人预见到即将临头的灾难。伊利亚·爱伦堡 1930 年代初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到过柏林、捷克、瑞士。整个欧洲阴沉昏暗和令人不解。它的一切姿态让人们想起庸俗自杀者的姿态。”

从 1933 年起，李维诺夫主持与法国人就防止德国侵略方面的合作问题进行的谈判。遗憾的是，1934 年 10 月法国外长、法俄合作的拥护者路易·巴都在马赛与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起被暗杀。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乌斯塔什分子刺杀了自己的国王、统一南斯拉夫的支持者。巴都牺牲了，因为他正好坐在亚历山大国王的身旁。

在第二年，苏法互助条约最终还是签订了。

1935 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托马什·马萨里克派遣自己的外交部长爱德华·别涅什赴莫斯科与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条约没有得以执行。斯大林建议捷克人让红军到自己领土上去，以便红军在战争时能够与德国军队战斗。但是，捷克人担

心，如果红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那它就不会撤走了——将会由解放军变成占领军。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他们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

与契切林和托洛茨基不同，李维诺夫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非常实际的人。他努力做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客观情况不允许。他联合欧洲国家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欧洲人就像不相信希特勒那样，不相信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的审判、关于镇压的消息、有关集体化和饥饿的传闻，使人们根本不再相信斯大林和整个苏维埃俄国。更糟糕的是，让两个独裁者——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互对抗的刻薄主张很受西方政治家的欣赏。

莫斯科也希望使自己的敌人相互冲突。1935 年 3 月，加里宁在同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机关工作人员谈话时毫不掩饰地说：

“如果帝国主义战争能够只局限在比如日本与美国之间，或者英国与法国之间，那么我们不反对这种战争。”

给阿道夫发去的信号

外交人民委员部也没能逃过大规模镇压的时代。外交官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得以生还的人回忆说：

“本来与同事约好见面谈某个问题，可是第二天人民委员部里已经没有他了——被逮捕了。”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总共有 2500 名工作人员受到惩罚，把 50 名全权代表、几乎各司的全部领导人投入了监狱。正常的工作停止了。领导各司的是临时代理司长。在全权代表处和领事处基本上已没有高级外交官了。一些苏联外交机构干脆就关闭了。在驻沙特阿拉伯全权代表被捕后，1938 年关闭了那里的大使馆，只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时期才得以重新开馆。

在苏联工作人员遭到被捕后，驻莫斯科的外国大使馆也陆续关闭了。外交人民委员部里堆满了各大使馆对逮捕外国人的投诉，但它对此完全无能为力。1938 年 11 月 26 日，在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的第二天，拉夫连季·贝利亚签署了一道命令，其中特别谈道："对拜访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苏联公民实行拘留，并搞清被拘留人员的身份。拘留不得超过 48 小时，在此期间如果发现有败坏名声的材料，则必须准确按照刑事诉讼法典的相关条款办理对被拘留人的逮捕手续，或者，如果没有逮捕的必要根据，则应释放他们。"

很难开展外交活动，因为如果谈出自己的真实意见，会就有生命危险。在镇压期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开始避免与外国人会见，甚至尽量少参加使馆招待会。李维诺夫不得不强迫他们去参加招待会。但是，人民委员既不能保护自己的部下，也不能保护自己本人。他在高级职位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在斯大林决定与希特勒结成战略同盟后，李维诺夫时代就结束了。不应认为李维诺夫对抗斯大林的命令，说他是斯大林的反对派，推行独立的政策。关于外交政策，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具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人民委员执行的都是斯大林决定的事情，而且每个问题都要报告中央批准。他的自主性可归结为外交风格和方法，归结为习惯与外国人交往和某种程度的思想自由。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是个亲英派——长期生活在英国，还娶了个英国女人。他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是俄国的主要伙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把赌注押在德国身上。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作为犹太人，除了仇恨和蔑视之外不会对希特勒统治抱有任何好感。不过，如果斯大林责成他搞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李维诺夫不仅不敢拒绝，而且会说服自己必须这样做。但是，调换外交人民委员对斯大林来说是更为有利的——因为很难想出给希特勒一个比这更明确的表示准备立即改善关系的信号了。

人民委员部里的新人

苏联驻英国的全权代表和苏联科学院的未来院士伊万·马伊斯基后来回忆起，他如何在 1939 年 4 月的最后几天偶然地出席了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斯大林在会上对待李维诺夫很不友好，政府首脑莫洛托夫干脆指责人民委员的各项错误——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5 月 4 日，自早晨起肃反工作人员就包围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大楼。新任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来了，与他同来的有中央书记、领导干部管理局局长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和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他们告诉李维诺夫说，他已不再是人民委员。把各司领导人和高级外交官逐个地叫到人民委员办公室，解释说，在那里正在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莫洛托夫坐在桌后的主要位子上，他的右边是弗拉基米尔· 格奥尔吉耶维奇· 杰卡诺佐夫，此人由国家安全总局第三局（反间谍局）局长职务被任命为副人民委员，左边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稍远一点坐着李维诺夫。

莫洛托夫在记录什么。杰卡诺佐夫默默地听着。马林科夫同样一句话不说。贝利亚仔细听着并发表了意见。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了解那天出现在该委员会面前的都是哪些人，因为在旁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里已搜集了有关他们的材料，而且大部分人将很快被逮捕。

在与机关干部见面的这个程序结束之后，李维诺夫立刻到别墅去了。已撤换了他的警卫，切断了他的政府专线电话。在人民委员部召开了大会。莫洛托夫解释了撤换其前任的原因：

“李维诺夫同志没能保障在人民委员部贯彻党的路线、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把前外交人民委员部确定为非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部是不正确的，但是，在选择和培养干部问题方面，外交人民委员部

并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因为李维诺夫同志使用了一批对党和苏联国家持敌对态度的异己分子，而对调入人民委员部的新人则表现出了非党的态度。”

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安排斯大林同志的最好的战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是最好的例子和证明。”

李维诺夫被撤职后，人民委员部对“不适用的、可疑的和敌对分子”进行了清洗。杰卡诺佐夫占据了鲍里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的办公室。有些外交官直接在他的办公室里遭到逮捕。杰卡诺佐夫很乐意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志。

成为莫洛托夫助理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对我讲述说：

“当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时，在那里实际上只留下了二三个曾经与李维诺夫工作过的人。全体干部都换掉了。”

整个一代外交官全被撤换了，代替他们的是被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其中有些人成了优秀的外交官。然而，大多数仍然是能力有限的胆小怕事的官员，就是这些人长期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号施令。

除中央委员会外，国家安全机关也把自己的人派往外交人民委员部。1939 年 5 月 17 日，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给中央写信，“请求批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格勒州管理局副局长、国家安全少校瓦西里·萨维奇·科尔任科同志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办公室主任”。

世界对李维诺夫被解职反应不一。在自己当政时期与苏维埃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赫里欧在国会发言时痛心地指出：

“欧洲集体安全的最后一位伟大朋友离职了。”

5 月 11 日在《消息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国际形势”的编辑部文章。这是向德国人发出的信号——苏联打算对德国推行

新的政策。

那被解职的前人民委员将做什么呢?

通常解职后，接着就是逮捕。李维诺夫等待人们来逮捕他，但是没有要逮捕的迹象。他只有为家庭担心了。他的儿子记得他曾经何等绝望地说：

“一定会逮捕你们。”

儿子的未婚妻弗洛拉·李维诺娃对我讲述说：

“我与米沙已经同居了——那里没有任何婚姻登记处。就这样，当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这么说后，第二天我们就赶紧进行结婚登记。因为我知道，关于被捕人的消息只通知最密切的亲属。”

人们从被捕者的身上榨取关于李维诺夫的口供。直接在贝利亚办公室用棍子殴打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前司长叶夫根尼·格涅金，要他承认与“间谍头子”有犯罪联系。

但是斯大林不允许触动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这是很难解释的一件怪事。人们认为，斯大林不想这么做，是为了缓和各国对苏联的消极态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李维诺夫，他有很高的威望。这未必是客观的解释。比他有更高威望的政治家都失踪了。看来，斯大林对李维诺夫还是有些私人感情。

李维诺夫离职几天之后，外国记者在剧院看到了他，后来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看到了他。他仍是代表，但任何工作都不让他去做。当把他从党中央委员会开除时，伏罗希洛夫说：

“在你们人民委员部窝藏了太多的人民敌人。”

李维诺夫忍不住说：

“你们那里也不少!”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气愤地问斯大林：

“怎么，你们认为我是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从嘴里抽出烟斗回答说：

“我们不认为。”

李维诺夫住在斯大林赠送给他的别墅里。谁也不给他打电话，

除了最好的朋友外，谁也不到他这儿来。也许，有时候他也会有满腔绝望的情绪，不过前人民委员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他的妻子为"国际图书"文学书籍出版公司做翻译工作，并亲自送交译文。有时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陪同她一同前往。出版公司经理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维约夫对李维诺夫为什么这么早退休很感兴趣。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叹了一口气后回答说，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老干部——因为他们太直率，不善于奉承和唱赞美歌。

"你看，"李维诺夫说，"在总书记周围都是什么人：只是溜须拍马的人。所以进行大换班，以便彻底抛弃关于列宁主义的老传统。"

索洛维约夫在现今发表的日记中写道，他打断了前人民委员的话说：

"不该由我来评论党的领导，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事。"

第二天，李维诺夫亲自同索洛维约夫谈了起来。前人民委员的心情很沉重，很压抑。索洛维约夫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李维诺夫很痛苦，想排除心中的郁闷。李维诺夫开始"责备"斯大林智慧有限，过于自负和自信，贪图功名和固执己见，有个人名利思想，并追求不受限制的权力。

"列宁把人放在首位，"李维诺夫说，"因此他任何时候都不把哪个人完全刷掉，除了绝对不可救药的敌人以外。而对斯大林来说，谁只要不同意他的观点，就已有足够的理由把此人消灭掉，大规模镇压就是由此而造成的。斯大林把一些目光短浅、才智有限、唯命是从的糊涂人调到自己身边。现在他依靠的都是什么人？脑筋迟钝者莫洛托夫，个人名利主义者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贝利亚以及梅赫利斯，目光短浅的马林科夫，傻瓜赫鲁晓夫……"

索洛维约夫被李维诺夫的这种大胆评论所震惊，于是在日记中写道："难道他是正确的吗？即使部分正确也好。"

李维诺夫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害怕。他是一位意志坚定和勇

敢的人。在革命前，他毕竟不是像许多党的同志那样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而是往俄罗斯非法运送武器。

偶然保住了一条命

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李维诺夫又有用了。开始邀请他去克里姆林宫会见外国外交官，责成他发表广播讲话，为英国和美国报刊写文章。1941 年 9 月末，吸收他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参加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苏联代表团由莫洛托夫率领，团员有军人和几位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仍然没有职务，仅仅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列入了代表团名单。但是，他的出现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均具有重要意义。莫斯科会议进行了几天。在会议上，达成了关于向苏联提供一切必要的战争物资的协议。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重新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干部被派往古比雪夫，因为整个外交使团正往那里疏散。11 月 9 日，出乎意外地把他召回莫斯科，任命他为副人民委员兼驻美国大使。他在华盛顿接替了一位前不久还是自己部下的人——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乌曼斯基，此人多年担任塔斯社驻欧洲记者，后来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司。乌曼斯基有时担任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的翻译，由于博得领袖的欢喜，他还收到了一张写有“赠乌曼斯基。斯大林”签字的领袖照片。

1936 年乌曼斯基被派往美国。1941 年他回到莫斯科，但很快又赴墨西哥担任大使。1945 年 1 月他乘坐的飞往哥斯达黎加的飞机失事。乌曼斯基夫妇牺牲。而此前一年半，他的女儿已死——爱上她的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的儿子开枪打死了她，并自杀身亡……

启程赴华盛顿之前，斯大林接见了李维诺夫，他在谈话中说，主要是迫使美国帮助苏联和参加反对德国的战争。强大的美国及其

雄厚的经济潜力是斯大林的指望。在希特勒进攻后，英国立刻发表了声援俄国的声明，但是英国人能给的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他们自己在作战，并且也需要帮助。

“当我们的事情变得灾难般地糟糕和斯大林抓住任何一根稻草拼命挣扎时，他把李维诺夫派往华盛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说，“李维诺夫享有罗斯福和其他美国活动家对他的好感，并且可以说，在那最困难的时刻，他拯救了我们，因为他使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联，并得到了10亿美元的借款。”

11月11日李维诺夫返回古比雪夫收拾东西。在与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谈话后，他奔上了长途旅程。李维诺夫乘坐飞机经德黑兰、巴格达、加尔各答、曼谷、新加坡、菲律宾，绕行飞往美国。罗斯福很高兴与李维诺夫会见，他很重视苏联外交官，经常邀请他到自己那儿做客，并且长时间进行单独交谈。苏联大使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找美国总统。因此苏联很快就开始收到在那些年代十分需要的武器、粮食和军用物资。李维诺夫同时成功地赢得了普通美国人的好感，并使美国政治家相信必须帮助苏联。

但是，在莫斯科对待李维诺夫的态度仍然很不好。莫洛托夫不能容忍他。新任人民委员关于自己的前任是这样说的（引自费里克斯·丘耶夫的《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①]一书，丘耶夫用心地记录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所有滔滔不绝的谈话）：

“让李维诺夫担任驻美国大使，只是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他。此人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整个战争期间达成的协议都没让他参加。李维诺夫完全是我们的敌人。尽管聪明、漂亮，然而不能信任他。他应当受到无产阶级最严厉的惩罚。任何程度的……李维诺夫只是偶然保住了一条命。”

---

① 中文版书名为《莫洛托夫访谈录》，军科院外军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译注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非常遗憾地对作家、又一位莫洛托夫的崇拜者伊万·斯塔德纽克说：

“你要知道，很偶然，尽管在那个时期本应当把他枪毙，可人们还是饶恕了他……”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是死在自己卧榻上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对此感到遗憾。

莫洛托夫讲述说，李维诺夫与美国记者的谈话被录了下来，李维诺夫毫无顾忌地说：同我们苏联政府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的立场就是不能就某个重要问题与你们达成协议。

“我们是中央集权外交，”被大使的一意孤行激怒的莫洛托夫说，“大使们没有任何自主权力。而且他们也不能有，因为形势复杂，大使们不可以表现出任何首创精神。大使们只是已经作出的指示的执行者……”

莫洛托夫认为，只有他一人从事外交。其他人只应当执行他的指示，不得偏离工作细则一步。在李维诺夫时期，如果意见不一致，大使、全权代表还能够与人民委员争论，向中央请示，报告斯大林。在莫洛托夫时期，这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大使们都是一些连想都不想与人民委员争论的人，他们认为，首长的指示就是正确的。

1943 年 7 月，李维诺夫自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写信说，苏联应当与罗斯福建立密切关系，他打算与苏联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人们故意不理会这个建议。

1943 年初，李维诺夫气愤地对一位熟悉的美国记者说：

“我再也不能作唯命是从的小奴仆了。我使馆的任何工作人员都可以完成委托给我的工作。我不得不只服从命令。这简直无法容忍。我要回国。”

李维诺夫几乎毫不掩饰地表示不同意莫洛托夫的路线，外国外交官也了解这种情况。

1943 年 5 月 7 日，在回莫斯科前不久，李维诺夫拜访了美国

副国务卿萨姆奈·华莱士。他说苏联体制不灵活，并承认他本人已不能与斯大林交谈。用他的话说，由于同外部世界隔绝，斯大林对西方已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概念，而且他对社会舆论在西方的作用估计不足。

他还与非常熟悉和相信其举止言谈谦恭温雅的美国记者谈了这种看法。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只是提醒他们说，美国大使馆从莫斯科发往华盛顿的报告，苏联官员都知道，并请他们不要把与他谈话的记录寄到大使馆。谈话记录送给了罗斯福总统，他认真阅读了这些记录。

李维诺夫讲述说，人民委员会部由三个人领导——莫洛托夫、他的副手维辛斯基和杰卡诺佐夫，“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既不了解美国，又不了解英国”。三人一伙的狭窄眼界使他感到愤怒。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是驻纳粹德国的前任大使，“与里宾特洛甫[①]肩并肩地坐了一年——这就是他知道的关于外国的全部情况”。

李维诺夫不反对建立大苏联帝国和把东欧变为附属国，但是他认为，苏联需要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支持。可是斯大林总是怎么也不能决定什么对他更重要：吞并东欧，还是享受与西方合作的成果。

莫洛托夫及其助手们感兴趣的是凸出与西方的分歧。政治方面的任何失败都可以归结为西方国家不肯让步。当斯大林已经从美国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时，就已不再需要李维诺夫了，于是莫洛托夫达到了把李维诺夫撤回莫斯科的目的。

不过，还有另一种解释。被再次推迟开辟第二战场激怒的斯大林，所以他决定故意引人注目地降低代表处的级别：从美国召回李维诺夫，从英国召回马伊斯基，而且用年轻的外交官接替他们——葛罗米柯去了华盛顿，费奥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去了伦敦。

---

① 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1938～1945年任德国外交部长。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译注

同一辆轿车中的三位部长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是个顽强、埋头苦干、为莫洛托夫特别宠爱的人。他作为参赞在李维诺夫那儿工作。未来的部长与前任部长的接触并没有结果。葛罗米柯和李维诺夫关系搞不好。

葛罗米柯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进行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谈话时，他在场。这是1942年6月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莫洛托夫来谈判，李维诺夫和葛罗米柯陪同他。现任、前任和未来的三位苏联外交部长同时坐上了一辆车，谈话就是在这辆轿车中进行的。莫洛托夫又说起英国和法国唆使希特勒进攻苏联。这听起来好像是自我辩护。李维诺夫克制不住自己，于是反驳了莫洛托夫的意见。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说得过分坦诚。“我为李维诺夫袒护英国和法国立场的顽强精神所震惊，”葛罗米柯写道，“尽管李维诺夫因为其错误立场，尤其在评价英国和法国方面的错误立场，而被解除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仍然故意在莫洛托夫面前，当然因此也是在斯大林面前宣扬自己的观点。这人听起来很奇怪……我相信，回到莫斯科后，莫洛托夫一定会向斯大林报告关于这次小轿车里的辩论情况。同时我也相信，就因为这一件事，李维诺夫作为大使在美国工作的前景就会暗淡下来。情况果真如此。”

明知会受到惩罚，还要当面向首长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来李维诺夫是这个职位上最后一个有足够男子汉勇气的人了。葛罗米柯当时非常惊讶，并且在暮年写回忆录时仍然惊讶不已。他么，当然，从来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他的观点同他那位文化程度不高的首长的想法也是不一致的，但是葛罗米柯从来不同首长争吵，正因为如此，他在部长的交椅上坐了几乎30年。由于葛罗米柯不喜欢李维

诺夫，直到80年代末人们几乎从不提起这位人民委员，甚至禁止出版关于他的书籍。纪念李维诺夫的建议（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简直使葛罗米柯大为震惊，他说：

“总之，怎么能提出这种建议？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你们怎么啦，不知道这个情况？由于什么原因？因为与党的路线不一致!”

1943年4月初，李维诺夫被召回莫斯科——没有说明理由。罗斯福总统与他告别时，直接问道：

“您不回来了吗?”

李维诺夫有几个月名义上仍是大使，但是他已明白，已经不会去华盛顿了。夏末，任命葛罗米柯为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保住了副人民委员的职位，但是没有固定范围的职责。一会儿责成他主持高级外交学校的考试，一会儿责成他解决部内的总务问题。

1944年斯大林要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分析战后世界形势。组成了几个专门委员会。李维诺夫领导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大家实质上提出了一致的建议：在苏联周围建立安全缓冲带，使德国变得无害，不允许在欧洲建立军事集团，与东欧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在预测战后的事态进程时，李维诺夫当时作出了严重的错误判断。他认为，英美关系将成为主要矛盾，苏联应当与英国一道反对美国的霸权行为。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继续相当坦诚地与外国记者谈话。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理查德·霍特莱特说，苏联政治又回到了“以扩张领土为原则的旧的安全构想——您的领土越大，您的安全程度就越高。如果西方向苏联的要求让步，导致的结果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西方将会遇到一系列新的要求”。在与著名美国记者亚历山大·沃特的谈话中，他断然指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相信，良好的愿望可以成为新政策的牢固基础，“所以他们也就拿走了没有摆放好的一切东西”。

1946年2月，李维诺夫再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

是帝王的恩赐——因为按职务他不应该有代表头衔，但是斯大林依然厚待他。而莫洛托夫极其厌恶李维诺夫。李特诺夫不容许莫洛托夫忘掉与希特勒勾结这件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则想把这件事从记忆中清除掉。

1946年7月17日，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满70岁。第二天副部长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要他顺便来一下。杰卡诺佐夫是贝利亚的忠实战友，后来与贝利亚一起被枪毙。负责干部工作的杰卡诺佐夫说：

"责成我通知您，您已被解除工作和退休。"

李维诺夫领的是联盟级的个人养老金。这为他保留了某些对在苏联生活十分重要的生活特权。李维诺夫的朋友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写道，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曾写信给斯大林，请求随便给他一点什么工作做做。

过了一段时间，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把李维诺夫叫来说：

"您给斯大林写过信。我们想让您领导艺术委员会的工作。"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气愤地说：

"在这方面我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也不认为可以对艺术指手画脚……"

日丹诺夫生气地说：

"您指的是什么工作？"

"纯事务性工作。"

什么工作都没有给他。他开始编写同义词词典，每天上午去列宁图书馆，但仍然因无事可做而感到无聊。伊利亚·爱伦堡写道，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里，几乎每天都同驻阿富汗、挪威、土耳其、德国、法国的前大使雅科夫·萨哈罗维奇·苏里茨一起吃午饭。他们通过心情压抑的交谈抒发内心的郁闷。苏里茨在为李维诺夫送葬的那天死去了，他比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总共多活了几天……

与一个凶狠的老太婆的恋爱

撤消了李维诺夫在外交部的党员登记，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房屋管理所党组织。李维诺夫去那里参加党员大会，只是坐着听别人发言。据前大使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与其他高级官员家庭中的气氛相比，李维诺夫家中笼罩着的完全是另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是由他的妻子创造的，人们给他妻子起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叫艾维·瓦尔特罗芙娜。她从事文艺作品的翻译工作。

1932 年夏天，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到位于斯皮里多诺夫卡街 30 号的住所找艾维·李维诺娃。该住所是“非常优雅的公寓，窗户朝院子开，外交人民委员的住所还附有一个在国外是一般大夫、律师和其他人住的小厢房。李维诺娃的房间内摆着精致书籍、一幅马科夫斯基的画、某位外国人制作的革命题材的艺术招贴画，——最使我惊讶的是：蒙着天鹅绒布帘的整个格子柜，里面全是她的皮鞋，大约有 20 双或 25 双。我到她这里来以‘科学院’出版社的名义请她把我的儿童图书译成英文。”

李维诺夫不隐瞒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怀疑态度，而实际上是冷嘲热讽的态度，他明确谴责反间谍和镇压运动。记得听他谈话时，他继续对苏联领导持批评态度。他蔑视莫洛托夫，称他为“石头屁股”。认为葛罗米柯是没有骨气的职业外交官。李维诺夫镇静、自信，而且不像有声望的苏联领导人那样玩多米诺骨牌，而是打在英国就学会的桥牌。喜欢听音乐，博览群书。他性格快活和开朗。他喜欢处在人们注意的中心。他乐意穿外交官通常穿的礼服。尽管人很胖，但喜欢跳舞。

“李维诺夫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伊利亚·爱伦堡写道，“他坐着，听别人说话，有时微微一笑——时而轻微讽刺地一笑，时而善良地一笑，偶尔插上一句话，不过一点也不像令人难堪的寡言少语

者，他喜欢畅笑。有心情忧郁的乐观主义者，而李维诺夫则是个快乐的人，但他是一个经常带有忧郁思想的快乐者，晚年情况尤其如此……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有一副十分友善的外表：长得胖胖的、心地善良，顾家的人。而且他的空闲时间充满了无可非议的娱乐活动——在国外时当碰上两三个小时的空闲，就去影院，看看情节剧影片、'恐怖片'。他吃东西很讲究，看他吃东西的样子很开心……他热爱生活……"

李维诺夫在暮年是否对国内发生的事情很失望？他认定在家中不谈政治话题。然而有一次，他从英国带回的妻子还是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要知道，像通常那样，你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并同她一起生活。可是时间渐渐过去了，而她变成了一个凶狠的老太婆。不过，这也没有办法……"

李维诺夫的女儿塔季扬娜·马克西莫芙娜这样写她的父亲："用他的话说，他们（列宁主义者）把革命当作高尚的冒险，准备牺牲和失败。有一点他们最终都没有预料到，这就是革命的成功，革命的这种命中注定不祥的成功。在父亲在世时，人们常常讲关于瓦西里耶夫弟兄们的故事，瓦西里耶夫弟兄们似乎说，要是他们能预见到'夏伯阳'的这种成就，他们会努力把它做得更好。父亲说：'我们就是这样的'。"

李维诺夫晚年，凶狠的反犹太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看来，他很幸运，他已经退休了。另一位副外交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成了关于欧洲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的主要被告人。这一案件是在李维诺夫死后半年开始的。如果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再多活一段时间，人们也会收拾他的。

令人惊讶的是，李维诺夫临终前仍保持着对斯大林的尊重。用爱伦堡的话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关于斯大林的评价是有分寸的，他高度评价斯大林的聪明才智，并且只有一次在谈论关于外交政策时，叹了一口气说：

“不了解西方……假如我们的敌人将他几次军，他定会以妙计胜过他们……”

李维诺夫甚至在死前的信中还对斯大林表白，向他证明自己不是敌人。

1951年12月，李维诺夫第三次发作心肌梗塞。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不过医学也无能为力。12月31日，一年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他死了。立即出现了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查看了他的所有文件和信件，挑出并带走了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1952年1月3日，在《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不长的讣闻。第二天，把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安葬在新圣母公墓。

那么米高扬关于李维诺夫被故意制造的车祸杀死的故事又如何解释呢?

李维诺夫的儿子米哈伊尔·马克西莫维奇告诉我说，他也听说过父亲死亡的这种说法，但是他说，这是谣言。

“最后几个月父亲一动不动地躺着——心肌梗塞后护士寸步不离地在他身旁。他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妈妈，我、我的妻子——我们都在场……”

这就是说，米高扬编造了暗杀的故事?

从各方面判断，人们的确打算消灭李维诺夫——用消灭国家犹太人剧院艺术领导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演员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的办法。人们选定不逮捕和审判他，而是在1948年1月他去明斯克时，野蛮地杀害了他。然后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十分笨拙地制造了一个被汽车轧死的现场。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说：“在斯大林死后查阅一系列文件和审问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时，就已经搞清楚，应在从莫斯科去别墅的路上把李维诺夫杀死。在通往他的别墅的路上，有这样的拐弯处，就是在这个地方打算实施暗杀。我很了解这个地方，因为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个别墅里。为杀害李维诺夫，斯大林有双重动机。斯大林认为他是敌人，

就像把自己所有的受害者都称作间谍那样，称他是美国间谍，祖国的变节者，人民的叛徒和敌人。李维诺夫的犹太族出身也起了作用。”

作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看来也读过这些文件，并在暮年多少有点混淆……

为什么允许李维诺夫死在自己的床上？他早已退休了，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而主要的是——斯大林至死都对他抱有某种好感，因此国家安全部起草的野蛮计划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但是，李维诺夫不可能知道这种情况。从他被解职那时起，从1939年5月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每夜都把左轮手枪藏在自己身边。他已下定决心，宁可开枪自杀，也不让自己被逮捕。

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斯大林——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误、关于朝鲜战争。第二封信写给亲属。在后一封信中他对自己的孙女写道：“让那些出卖灵魂的历史学家随意忽视我，把我的名字从全部著作和百科全书中删除吧。但是，人民记起我的时候一定会到来。”

李维诺夫既不像其前任托洛茨基是个反对派成员，也不像参加1968年8月25日反对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驰名抗议示威的孙子帕维尔是个持不同政见者。1968年8月21日，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8月25日苏联人民委员的孙子帕维尔·李维诺夫和其他6人来到红场，骑在宣谕台的女儿墙上，展开了写着“不准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侵占者可耻!”的标语。示威一共持续了几分钟，因为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跑来了，逮捕了所有示威者。10月举行了审判。帕维尔·李维诺夫被判5年流放。

我与他的父母米哈伊尔·马克西莫维奇和弗洛拉·帕夫洛芙娜交谈过。米哈伊尔·李维诺夫的职业是航空工程师。弗洛拉·李维诺娃是物理学家，近20年来在心脏病医疗中心工作。我问道，他们的儿子后来是否对参加毁灭他生活的示威感到痛心？

“不，”他的父母回答说，“从来都不。”

“那你们未曾试图阻止他吗?”

“在我们家里不采取相互施压的办法。我们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我们非常为儿子担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可以对他施加影响。”

在这个家庭里，这家人什么都不怕，也不向人提出什么请求。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帕维尔·李维诺夫成长为一个不惧怕克格勃的人。

“为什么帕维尔·李维诺夫离开了国家?”

“原本是把他推出去的。他不想离开。流放结束后，他回来了，打算教书。长期不给他登记户口。而且克格勃不喜欢他与萨哈罗夫院士会见。就在他去会见萨哈罗夫时，人们拘留了他，并说他有两种选择——去东方或去西方。他说，他已到过东方，可谁也没有邀请他去西方。于是很快就安排邀请他去以色列，并把他赶出国家。他去了美国，现在在那里的中学里教数学和物理。”

“那为什么你们不离开呢?”

“我们非常喜欢美国。特别是第一次去。可是我们不想离开。”

在布拉格，人们没有忘记李维诺夫一家。既没有忘记企图保卫国家免遭法西斯侵犯的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也没有忘记谦恭温雅的教师帕维尔·李维诺夫，他当然不能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遭外国军队的入侵，但他为拯救自己国家的荣誉作出了一切。

第四章

莫洛托夫："并非人人皆豪杰"

莫洛托夫曾有过只要愿意就可以领导国家的时刻。米高扬记得，在1941年6月末的一天，政治局委员们聚集在莫洛托夫那里。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都来了。大家都很沮丧——德国人正在入侵，红军阻挡不住他们。贝利亚建议成立国防委员会并将党中央、政府和最高苏维埃的全部权力交给这个机构。大家都同意并决定让斯大林来领导国防委员会。有人提议立即去邻近的位于沃伦斯科耶的别墅找他。但是莫洛托夫突然说起最近两天斯大林意志消沉——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主动性，总之，情绪低落。

突然沃兹涅先斯基说："维亚切斯拉夫，你来打头，我们跟着你。"

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如果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没有能力领导国家，那么，国家就应该由莫洛托夫来领导，因为在全体人民的心目中，他是国内的第二号人物。

于是大家去找斯大林。他坐在餐厅的安乐椅上。看到政治局的委员们之后，他好像整个身子都陷进了椅子里，问道：

"你们来干什么？"

"他的神态警觉，有点怪。连他提出的问题也同样是奇怪的，"——米高扬写道。"要知道事实上他应该自己召集我们。我毫无疑问地感到：他认定我们是来逮捕他的。"

莫洛托夫说，必须使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并为此成立国防委

员会。

"谁来领导?"——斯大林挤出了一句话问道。

"斯大林,"——大家齐声说道。

"好,"——斯大林就说了这么一个字。

这件事使当时去斯大林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刻骨铭心。

1953年6月，被捕的贝利亚在他被关押的地方给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写了一个便条。他给莫洛托夫写道："您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开始时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在邻近的斯大林别墅里同他谈过话后，您在部长会议自己的办公室里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挽救时局，应当立即组织一个中心来领导我国的国防，当时我全力支持了您并建议立刻召集马林科夫来开会，而过了不多时间，在莫斯科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来了。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大家去了斯大林那里并说服他必须立即成立享有一切权力的国防委员会。"

可能就是在那一天，莫洛托夫错过了自己的机会。25年后他要尝试当国内的头号人物，但为时已晚。

"人家是在给你抹黑"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1890年2月生于维亚特卡省诺林斯克县库卡尔卡村。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的前任，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的父亲也是在这个村出生的。李可夫和莫洛托夫不仅来自同一个地方，而且他们俩还都是结巴。

未来的政治局委员的父亲是个掌柜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富商之家。他们共生了十个孩子，三个夭折于襁褓中，剩下六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后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从没有关心过亲属们。他们曾想使这位大人物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书记处的人总是回答说：他忙。

除莫洛托夫外，他的家里还出了一位著名人物——苏联人民演

员鲍里斯·奇尔科夫，他就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侄儿。是的，还有一位神秘人物，在被德国人俘虏时也声称自己为莫洛托夫的侄儿。德国人相信了他，把他遣送到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所在的同一个集中营里。战后那人落到了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手中并被处决。历史学家们认为，他是冒名顶替的。

“小时候，父亲像对一个不可救药的浑人一样抽打我，”——莫洛托夫对非常欣赏自己的诗人费利克斯·丘耶夫讲述道，诗人记下了伟大领袖的战友的每一句话。“还把我关进储藏室，用鞭子打我。一切似乎都是应该的。”

但他让儿子受到了教育——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进了实科中学[①]，学习用功，而且他毕生办事都是严肃和认真的。他还学过拉小提琴，并同伏罗希洛夫一样曾在教堂的唱诗班唱过诗。在苏联时期，在丰盛的宴席之后，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坐下弹钢琴，伏罗希洛夫便开始唱：

“修改你的祈祷……”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也会随着唱起来。

莫洛托夫在少年时期参加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小组，在那里他们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他甚至被吸收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化学小组”，这个小组为了党的战斗队伍试图去做炸药。莫洛托夫在年轻学生中间做工作，促使他们去反对行政领导。1909 年 3 月他被捕，但他非常幸运：他所在的喀山监狱的风气是那么自由，以至在牢房里他能够继续学业。秋天里，他被流放到沃洛戈达省，为期两年。

在那里，莫洛托夫在一家餐厅里拉小提琴，他得到的报酬是每天 1 卢布和免费的饭菜。商人们把乐师们叫到单间，选点抒情歌曲。商人们招待乐师们喝加酒的咖啡以示感谢。

---

① 俄国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不教授古代语言的学校。——译注

莫洛托夫的音乐爱好成了政治局同志们的嬉笑话柄。“我不能评估他的小提琴拉得有多好，但我听他拉过，”——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有时在这方面对他略加取笑，有时简直是挖苦他。当莫洛托夫在革命前被流放时，醉醺醺的商人们在餐厅里强拉他去演奏。他为他们拉琴，而他们付他钱。莫洛托夫说：

‘这是报酬’。

而斯大林在生气的时候会呛莫洛托夫一句，说：

‘你在醉醺醺的商人面前拉琴，人家是在给你抹黑’。

我承认，我那时也更多站在斯大林一边，因为我认为这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个政治流放者，是一种侮辱。他拉着琴，讨取醉醺醺的商人们的欢心！要知道当时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找求生机会的……”

在沃洛格达，莫洛托夫通过了实科中学全部课程的考试，当结束流放时，他转到了首都并进入工学院经济分院。他很少去听课，但参加考试，只是为了不被赶走和抓去当兵。他竭尽全力试图逃避兵役。

布尔什维克吸收他参加了《真理报》的工作。在这里他首次使用阿基姆·普罗斯托塔的笔名发表作品。他第一次用莫洛托夫这个笔名，是1919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工人们如何学习建设自己的经济》这本小册子上署名的时候。

1913年警察直接到《真理报》编辑部来抓莫洛托夫，他跳出窗外躲了起来。转而他来到莫斯科，但在这里他还是被捕了，并再次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州。不过，他从流放地逃跑，并回到了彼得格勒。

在地下小组里莫洛托夫同后来成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的亚历山大·阿罗谢夫走到了一起，把他看作朋友，但当后者被捕并被枪决时，他没有站出来说话。

“他在1937年失踪了，”——莫洛托夫对菲利克斯·丘耶夫讲述道。“一个最为忠实的人。看来，他不善交际。他是不可能被卷

入反苏事件的。但是由于……”

“您不知道这个情况还是怎么回事?”

“怎么不知道,我知道!”

“那不能把他解救出来吗?”

“解救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要拿证据。是要我去审讯吗?不可能。”

“是谁拿到了证据呢?”

“鬼知道是谁!”

十月革命后,莫洛托夫开始官运亨通。开始他任彼得堡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9年任下诺夫戈罗德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后任顿巴斯省委书记。1920年他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1年他来到莫斯科参加第十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俄共(布)中央三书记之一。

同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娶波林娜·谢苗诺芙娜·热姆丘日娜为妻,并同她互敬互爱、和谐生活,一直到她去世。她同莫洛托夫一样,也是一名热情的共产党员,比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来,她对斯大林甚至要爱得更多一些。妻子和女儿斯韦特兰娜,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温柔相待的仅有的两个人。

结婚一年以后,1922年,莫洛托夫把年轻的妻子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治疗,后来他自己去探望过她,并顺路看了看意大利——他想瞧瞧正在诞生的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很快就学会了利用政权的所有优越条件。

斯大林的副手

列宁喜欢莫洛托夫的麻利、勤奋和做办公室工作的能力。据说

他在小圈子里称莫洛托夫为“石头屁股”和“布尔什维克中最顽固的人”。这类人不属于伊里奇的宠儿，可他认为莫洛托夫是有用的。

对于斯大林来说，正好相反，莫洛托夫成了他最愿意见到的助手。同别人不一样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马上把赌注下在斯大林的身上，并赢得了性命和官运。

第一代苏联领导人没有把莫洛托夫当成竞争者。他各方面的才能并不出众，不在集会上演讲，引不起公众的注意，也不善用响亮的话语振奋公众。第一，他不会；第二，他压根说不好话，他结巴。

他的助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告诉我，有一次，他问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是个不错的姓，为什么他要使用笔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他很难把它读出来，而莫洛托夫——说起来就容易了。

斯大林喜欢挖苦一下结巴的同志，一次，他对诗人谢尔盖·米哈尔科夫说：“别再结巴了！我就对莫洛托夫说过，要他不再结巴，他就果真停止结巴了。”

莫洛托夫装出感到非常可笑的样子。不高的身材，胖胖的，不爱笑，戴着夹鼻眼镜，正如现在人们说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不是魅力超群的领导人。但在他身上可找到其他的好品质。他百分之百地选择站在斯大林的一边，并帮他清除机关里的敌手和对手。

斯大林的前任秘书鲍里斯·巴扎诺夫关于莫洛托夫是这样写的：他貌不惊人，却是个有超级工作能力的官僚，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多年来他一直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党的主要组织者。他勤劳、平静、克制，从不拒绝任何任务。巴扎诺夫描述了政治局的一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上，托洛茨基咒骂“无情的党内办事人员用石头般的屁股扼杀了劳动群众自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莫洛托夫一面扶正夹鼻眼镜，一面结结巴巴地说：

“并非人人皆豪杰，托洛茨基同志”。

1925年大家想选莫洛托夫为乌克兰中央总书记。他拒绝了。替代他的是已在乌克兰工作的拉扎尔·莫伊谢维奇·卡冈诺维奇。在那些年里，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彼此暗中竞争成为党内和国内的第二号人物。在莫洛托夫转到政府之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接下了他所有的党的工作。但是，看来还是莫洛托夫更聪明、更有涵养、更有用处。他使得斯大林选择了他，而且斯大林没有选错。

“莫洛托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在党内的副手，”——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写道。“他管理着所有党的事务，包括斯大林不在场时的政治局活动……这一时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和信任。可以说，莫洛托夫是斯大林主要的、特别信任的战友。”

莫洛托夫1926年在党的第15次代表会议发言时说：“我党的政策现在是，并将一直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最终胜利的政策……”也就是在1926年，斯大林让他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并把他拉得很近。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里谈到关于发表他们在党的第15次代表会议上讲话的问题，此信被保存了下来。莫洛托夫守规矩地问斯大林，他有没有意见。斯大林回答说：“我只是现在才明白了我没有让任何人看我的报告所带来的全部窘困。你执意要修改，这是不是表明我没有把自己的讲话稿发给朋友们看是做错了呢？而现在你又坚持要检查讲话稿，是想用自己的谦逊态度来置我于死地。不，我最好不发表意见。最好是按你认为需要的样子去排印。”

在休假的时候，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最多。对他总是开玩笑地时而称呼他的姓，时而称呼他的名——时而叫他莫洛托维奇，时而叫他莫洛托什维利，时而说“向莫洛托施泰因致敬！”。

早在列宁在世时，列昂尼德·克拉辛就曾给他写信反对政治局干涉外贸问题：“那种热衷于折腾、‘改组’各种机构的做法算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是通过顽强地、逐渐地积累经验，采用谨慎的、经过周密考虑的措施去完善那些目前自然还不完美的机关，而

是每年三次搞得底朝天，而且还要感到奇怪，为什么事情没有办好。”

但是斯大林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暗中支持者，他认为机关需要定期抖动，好让官员们不能相安无事。党的领导们几乎每年都被调换地方。只有莫洛托夫一人差不多有十年死死地坐在负责组织事务的中央书记的位子上。

在十月革命20周年庆典活动的那一天，同卡冈诺维奇的竞争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胜利而告终，那天，莫洛托夫受委托作了报告。这一事件甚至写进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许多作者写道：莫洛托夫是惟一不仅能同斯大林平等谈话，而且甚至敢于反驳他的人。在现实中莫洛托夫不仅不敢反驳斯大林，而且相反，他一生都在奉承领袖，都在表明自己对他是有用的。在所有方面，无论是在经济政策、外交还是在迫害方面，他都是斯大林意志的内行和可靠的执行者。

莫洛托夫是一个强硬的政治家，但他的握手是没有力气的，就像一个没有性格的人一样。有一件很有趣的细节。

20年代末，政治局委员们是能同斯大林争论的，有时也可以不接受他的建议。而且对他提出反对意见的往往是完全忠实于他的人，如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对于他们来说，斯大林还不是领袖，而是平起平坐的人们中的第一人。他不得不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这个非常受尊敬的和有影响的人成了斯大林的主要隐患。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写道，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到李可夫，这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俄罗斯人，在许多人看来他是领导俄罗斯的更合适的人选。在几年时间中一直在准备对李可夫的攻击。他被指责为右倾，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出了若干起虚假的阴谋事件，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承认”同李可夫有密切联系。最后，斯大林感到他能搞掉李可夫的时刻已经来临。

1930年9月他从南方给莫洛托夫寄来一封长信：“你必须取代

李可夫。这有必要。不然，苏维埃和党的领导人之间将要脱节……这一切暂时只有我们俩知道。到秋天我们再详谈。而现在你要在好朋友的小圈子内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若有反对意见，就通知我。”

然而，政治局委员们劝斯大林本人来担任这些职务。伏罗希洛夫代表大家给他写信说：

“最好的出路是把领导统一起来。如果你能坐到人民委员会，并且像您能做到的那样，真正把整个建设的领导权抓起来，那是最好不过的……当然，可以（在组织上）让一切保留原样不同照旧，也就是说，把总部和总指挥部仍设在在老广场，但这种制度太沉重，不够灵活……我主张公开地、有组织地由您把总的领导的‘整个担子’都挑起来。反正这个领导权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这种状况下，领导起来会极其困难，而且在工作中难以得到充分的效果……”

然而斯大林无论如何都不想这样做。为什么？第一，作为党的领导人，他对经济困难不负直接责任。第二，转到政府去就意味着实际上失去对党的机关的控制。在政府里他会陷入最繁重的工作中，而党的机关就会由其他人去领导。这就会削弱他对国家和战友们的控制。所以，他坚决予以拒绝并坚持任命莫洛托夫。

一切就像照着乐谱似地演奏出来了。

在 1930 年 12 月 19 日的中央全会上，李可夫实际上没有陈述的机会。刚刚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的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说，李可夫领导政府期间，“这种状况对整个苏维埃机关起了腐蚀作用”。最后，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肖尔提议解除李可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莫洛托夫来取代他。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被解除了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职务。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

李可夫被任命为邮政人民委员，1937 年 2 月被捕，1938 年 3

月被枪决。他的妻子尼娜·谢苗诺芙娜当时是卫生人民委员部保护儿童健康管理局局长，在丈夫死后过了半年，她也被枪决了。

“难道军队里就没有破坏者?”

在大迫害的年代里，莫洛托夫是同斯大林一道在枪决名单上签名的。他们本人没有枪决过任何人，他们是坐在写字台旁的刽子手。有时，莫洛托夫自己主动在某个人的姓名后面加三个字母："BMH"，即“极刑”的简写。

1930 年 1 月莫洛托夫领导了没收富农财产筹备委员会，他曾提议:“在最近两个月（2—3 月）里，要确保落实把富农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和关进集中营的措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大体上要把握的数字是关进集中营 6 万人和流放 15 万户。对于最凶恶的反革命分子，要不惜采用极刑……”

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引发有莫洛托夫的参与。在 1937 年 2—3 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谈到了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问题，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军队政治部主任扬·加马尔尼克称，军队的局势并不令人担忧，因为在把托洛茨基赶出红军之后，已清除了 4.7 万人。

但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军队领导人的看法。他在全会上说：

“军事部门至关重要，我们将不是在现在检查它的工作，而是在晚些时候，而且要非常严密地检查……如果我们的所有部门都有破坏者，我们能够想象只是军队里没有破坏者吗？这是荒谬的，这是掉以轻心……”

不久便开始了对军队的大清洗。他是个凶残冷漠的人，从不会为别人的痛苦而动心。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国际红十字会立即建议莫洛托夫组织交换战俘名单，以便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处境告知亲属，给他们写信。斯大林允许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出现了一张通

告，说在莫斯科将开设一个有关战俘情况的至于资讯局。在安卡拉和斯德哥尔摩开始了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谈判。但后来政治局的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被俘虏的人都是胆小鬼和叛徒，没有必要去关心他们。莫洛托夫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关于交换重伤战俘和给战俘们寄食品包裹的建议。红军士兵成了在纳粹集中营俘虏中惟独得不到任何保护、医疗援助和食品包裹的人。

此后，莫洛托夫完全禁止了苏联外交官们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会晤。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对俘虏们的命运丝毫不感兴趣。找他帮忙毫无用处。他命令他的助手们不要把被镇压者的信件列入新的文件清单。他不认为需要对什么人进行赦免。因为他并不认为搞大规模的迫害是错误的，而认为这是国家所需要的政策。

莫洛托夫的孙子，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尼科诺夫，在解释其祖父的所作所为时对我说：

“他们等待着发生战争并希望消灭可能的内部敌人。”

莫洛托夫本人多次反复说过：

“我对采取非常激烈的行动从未遗憾过，也永远不会感到遗憾。1937 年所做的一切是必要的，因为主要的是要掌握住政权。我们在战争时期没有第五纵队就是得益于 1937 年。”

在莫斯科的审判过程中有些人给自己加了某种难以想象的罪名，莫洛托夫对此似乎曾感到吃惊。后来他找到了解释，这是费利克斯·丘耶夫用心记录下来的：

“我想，这是在公开的审判过程中继续反党的一种做法，给自己加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是为了使其他的指控也变得难以置信……他们把这些事情故意地说成是自己做的，为的是表明，似乎所有这些指控都是同样荒谬的。”

有人问他：为什么迫害行动扩大到了妇女和儿童身上？

“什么叫为什么？”——这位前政府首脑回答说：“他们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离起来的。当然，他们可能曾经是各种怨言的传布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自己也堕落了。”

往锅里啐了一口

1939 年 5 月 4 日莫洛托夫开始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先是外交人民委员，而在出现了部的设置的时候，就是外交部长：从 1939 到 1949 年，连任了十年，而后，在间断了一个时期后，又从 1953 到 1956 年连任了三年。

他是不是已经有条件担任国家首席外交官的角色呢？

莫洛托夫是一个阴沉、不灵活、缺乏想象力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谨慎、拘泥细节和要求严格的人。对于斯大林来说，莫洛托夫是难得的人才。对斯大林的外交来说，他是个理想的人物。要知道，学会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根本就不是他的任务。

在读过莫洛托夫的一个报告稿后，斯大林给他写了封短信，指出报告的国际部分写得不错："写得好。对'大国'的调子不卑不亢，充满自信，往神气活现的'大国'的锅里恰到好处地简单啐了一口，总之，非常好。让它们去'尝尝'吧……"

这就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对外政策。1939 年 7 月 23 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大会通过了决议："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外交人民委员部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安排斯大林同志的最好的战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是最好的例子和证明。"

事实上，从 30 年代中期起，斯大林就开始疏远莫洛托夫了，从这之后让他扮演的角色已经不是战友，而是同大家一样，是领袖手下的人。斯大林继续同莫洛托夫讨论最为重要的问题，但总是极力让他安分守己，不再保持以往的朋友关系。1937 年政治局一下子解除了莫洛托夫几个助理的职务，而他却没有能把他们保下来。后来，斯大林发现了莫洛托夫的弱点——他的妻子……

任命莫洛托夫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是他开始失宠的标志，尽管他

还继续当了两年的政府首脑。

曾经担任他的助理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对我说："在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之后，他还继续在人民委员会工作，也就是说，他不仅要管和美国的关系，而且还要管女短衫的生产。他有两个秘书班子，它们各做各的事情。公文在沃罗夫斯基广场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来回传递。我们勉勉强强才能把送给他的大堆文件处理掉。"

在那个年代，苏维埃的外交部门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士。在开战前夕，外交人民委员部曾两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第一次是在1936—1937年间的大清洗年代里，第二次是在李维诺夫被革职之后。

莫洛托夫曾回忆道，当李维诺夫被撤职和他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时候，斯大林曾对他说：

"把犹太人从外交人民委员部赶走。"

莫洛托夫自己是娶犹太人为妻的，不仅不敢反对，而且毫不犹疑地就着手执行起命令来了。在接受任命后不久，为了解自己的新部下，他普查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内不仅进行了种族方面的清洗。莫洛托夫还排除了有自由主义和自以为是的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莫洛托夫招来的是那些随时准备服从他所推行的强硬纪律的党的工作者和技术知识分子。他们既不懂外语，也不懂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但莫洛托夫很少为此感到不安。他最看重的是这些工作人员能做到令行禁止。

昨天的党的工作者要在外交和领事人员培训学院学习，这个学院不久后改编成了外交学院。

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说："在多数情况下大使们是信息的传递者，他们只能在这样的范围内行动。我看到，当我作为外交部长活动时，特别是在斯大林之后，很多人为我表现得如此独立而惊讶，而我的独立只限于我所得到的指令的范围之内……"

人们问他：他认为谁是苏联最强的外交官？

莫洛托夫反问道："最强的外交官？我们是中央掌握的外交。大使们没有任何独立性。也不能有，因为局势复杂，大使们不可能表现出什么主动性。这对于大使们，这些有教养的人来说是不舒服的，但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们的外交官、大使们的作用是有意要受到限制的，因为我们没有有经验的外交官，但我们有忠诚的和谨慎的外交官，他们是有文化的，读过很多书的。"

莫洛托夫是在得到突然决定之后开始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新闻司领导人叶夫根尼·格涅金不久后就被捕了，但他还是做到了向人民委员解释，说对外国记者发自莫斯科的电报进行检查不但没有意义，而且还有损国家的利益。记者们避开检查而通过外交官的帮助照样能够发出消息。因此，他们只要仔细研究什么是检查勾掉的，他们就能够容易地知道什么正是当局想要隐瞒的，从而坚信自己的消息是正确的。莫洛托夫的确取消了对外国记者的电报的检查。不过，几个月之后，由于欧洲战争爆发，这种检查又重新正式开始实行。彻底取消它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了，在 1961 年。

斯大林让莫洛托夫当外交人民委员并不是要他在机关内进行清洗。这应该在办事的过程中顺手来做的。主要的是要使国家的对外政策有一个 180 度的转变。

"整个世界是我的囊中之物！"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觉得，只处理国内事务的日子已经够了。走向世界舞台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到了。狡猾、自信的希特勒一直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古老的欧洲对他的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和厚颜无耻已经俯首听命。坐在莫斯科的这些人的咄咄逼人、狡猾和厚颜无耻也毫不逊色。

世界开始谈论莫洛托夫，是在 1939 年 8 月他同纳粹德国签订条约之后。同德国人签的条约奠定了莫洛托夫在外交史上的地位

早在1938年他就开始同纳粹德国接近。但是双方瞻前顾后，不知道怎样去同意识形态的敌人进行对话。1938年10月，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达成一致，两国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不发表直接攻击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言论。同年12月19日签署了两国贸易协定。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党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说，西方大国是“要激起苏联对德国的愤怒，毒化气氛，挑拨我们同德国发生无缘无故的冲突”[①]。这是明确的信号，说明斯大林是在建议进行谈判。但这个信号没有被柏林发觉。那时莫洛托夫命令自己的下级通过外交途径把这个想法传递给德国人。4月中旬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求见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并对他说：

“意识形态的分歧未必会影响到同意大利的关系，也不应该成为同德国关系的绊脚石。从苏联的观点出发，并不存在能够阻碍正常的相互关系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做起，双方关系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希特勒仅注意到了作为犹太人和集体安全体系的拥护者——人民委员李维诺夫5月的离职。在李维诺夫被清除的当天，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纪佩尔斯基希给柏林发密码电报：“看来，这个决定和克里姆林宫内部对李维诺夫所进行的谈判出现分歧有关。分歧的原因大概在于斯大林的疑心重重，他对自己周围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满了不信任和仇恨……莫洛托夫（非犹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里格被认为是最通晓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他得到指示立即去柏林并亲自去见不久前还是驻英国大使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自命不凡的和善于辞令的里宾特洛甫向希里格解释说，元首本人想见他。他们乘坐部长的专列去元首在伯格霍夫的官邸。希特勒问了希里格两个问题：为什么李维诺

---

① 见《斯大林文选》（上），第217页。

夫被解除职务和斯大林是否准备在某种条件下同德国建立相互谅解的关系？

希里格感到震惊的是，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里宾特洛甫，甚至都没有料到斯大林的三月讲话会如此坚决地表示同德国建立新关系的愿望。希里格曾反复出声读了两遍斯大林的这段讲话。

十天后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得到指示，恢复有关新贸易协定的谈判。但是，无论是柏林还是莫斯科，怎么都不能下决心去进行谈政治上接近的公开对话。于是开始使用复杂的外交手段。6月初的几天里，德国大使舒伦堡给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写信说："我觉得，柏林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是莫洛托夫先生在与我交谈时拒绝了德俄关系的调整。我不能明白，是什么促使柏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事实就是，莫洛托夫先生几乎是在呼吁我们进行政治对话。"

7月底，在德国外交部研究对外经济问题的卡尔·施努尔邀请苏联临时代办阿斯塔霍夫吃午饭并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能给你们的是什么？是参加欧洲战争和对德国采取敌对态度。而我们能给你们的是什么呢？是中立，而如果莫斯科想要的话，可以是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施努尔补充说："我们两国之间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和远东的整个地区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除此以外，德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共同的方面——这就是对抗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站在西方民主的一边是反常的。"

阿斯塔霍夫提请注意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认为苏联是敌对国家。但这是为什么？

施努尔做了冗长的解释，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

"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德国共产主义斗争的结果，后者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但是斗争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在德国已被根除。苏联的政策也变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已成为过去。表现在对一些伟大的俄国人物及其功勋的颂扬中的布尔什维主义同俄罗斯民族

历史的融合，改变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性。特别是从斯大林无限期地推迟了世界革命的那个时候起。”

8月中旬，已经在准备进攻波兰的希特勒明白了，他需要同苏联密切合作或者至少需要苏联的善意的中立。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得到了加强接近的指示。

1939年8月15日清晨，舒伦堡大使收到了国内部长的指示，要他立即拜见莫洛托夫并通知他说里宾特洛甫准备“到莫斯科进行短期访问，代表元首向斯大林先生陈述元首的看法”。

大使向莫斯科转达了部长的话：

“过去，当两国人民是朋友时，对双方人民始终都有好处，而当他们互为敌人时，对双方就都有坏处。”

莫洛托夫对舒伦堡大使说，为了继续贸易谈判，必须具备“政治基础”。他向舒伦堡解释说，只有在有了专门的议定书附带说明苏联关心的所有重要问题的情况下，才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

总的来说，莫洛托夫是友善地听取了德国同行的话，但是，他更感兴趣的不是漂亮的表述，而是具体能得到什么。里宾特洛甫准备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就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和共同解决东欧领土问题。

斯大林想让希特勒明白，要让苏联中立，他必须支付莫斯科开出的那个代价。

8月19日舒伦堡通知莫洛托夫说，里宾特洛甫被委任全权在莫斯科签署确定两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利益并决定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命运的专门议定书。舒伦堡用了整整一个小时试图从莫洛托夫那里打听里宾特洛甫何时能够来访，但毫无结果。对他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尽快促成访问，而莫洛托夫一直迟迟不予答复。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寸步不离电传机，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深夜莫洛托夫答复说，如果贸易协定能在第二天，即8月20日周日这一天签字的话，那么，再过一周，即8月26日或27日，里宾特洛甫就可以过来。

希特勒一直熬到了早晨，等候舒伦堡的详细报告。他不能把同斯大林澄清关系这件事再拖上一个礼拜了。他需要立即同莫斯科达成一致，因为若不这样，他就不敢冒险去进攻波兰。如果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联合起来的话，希特勒未必会下决心动手。而将军们已经提醒他，时间正在过去：应该在8月的最后几天开始战争，9月的雨季有可能会打破军事行动计划。

斯大林是在最后一分钟同意与希特勒谈判的，那时，对希特勒来说，时间已经耗尽，元首不得不同意接受斯大林的条件。

8月20日白天，希特勒给斯大林亲自写信说："第一，我真诚地欢迎德苏贸易协定的签订，它是改变德苏关系过程中的第一步。

第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政策可保持长期稳定。这样，德国就可回到过去几百年来对双方国家都有利的政治路线上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决心要从这种根本的变化中做出结论。

第三，我接受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先生所提议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是，我认为必须通过最迅速的途径搞清楚与它有关的问题。

第四，我坚信，如果德国负责的国务活动家将能在莫斯科亲自参加有关这方面的谈判，苏联政府所希望的补充议定书实质上可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明确。否则，德国政府不能想象，怎样才能使这个补充议定书在短期内予以明确并拟订出来。

第五，德国与波兰关系的紧张变得不能忍受。波兰对待大国的行为会导致危机很快爆发。今后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利用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这些图谋。

第六，我认为，在两国愿意开始一种新的相互关系的情况下，最适宜的是不丢失时间。所以，我再次建议您在8月22日，星期二，但不迟于8月23日，星期三，接见我的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有无所不包的无限权力，去草拟和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由于国际局势的关系，外交部长不可能在莫斯科有超过

一天或至多两天的逗留。

若能得到您的迅速答复，我将会感到高兴。”

里宾特洛甫自己给舒伦堡大使另外发出了一份电报：“请尽一切努力促使访问成行。”

有希特勒关于愿意签订共同议定书的保证就已经足够了。星期一斯大林答复希特勒说：“我感谢您的来信并希望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标志着我们两国政治关系的良好转折……苏联政府委托我通知您，它同意将里宾特洛甫先生对莫斯科的访问改在 8 月 23 日。”

当舒伦堡大使通知柏林说，克里姆林宫准备在莫斯科迎接纳粹的外交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时，希特勒无比兴奋。他展开双手，仰天大笑：

“啊，现在整个世界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像处在党内老朋友中间

8 月 22 日希特勒签署了一个简短的文件：“我授予帝国外交部长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全权代表德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权代表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谈判，如有可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其他协议，作为这次谈判的结果，让该条约和协议在它们签署之后立即生效。”

8 月 23 日里宾特洛甫乘希特勒的专机飞抵莫斯科。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后来告诉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说，德国飞机在途中遭到射击。在机身上发现了高射炮弹片打出的孔。后来，委员会调查了这件事情，等待着德国人的抗议，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害怕有碍条约的签订。

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被送到德国大使馆。舒伦堡大使已经知道，晚上六点钟他们将在克里姆林宫里受到接见。但是，苏联方面将由谁来进行谈判，德国人未被告知。

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除主人外他们还看到了斯大林本人。舒伦堡大使很惊讶：斯大林第一次亲自同外国外交官员进行有关签订条约的谈判。外国外交官们通常是根本见不到斯大林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总是回答说，总书记是党的活动家，不管外交政策方面的事情。

斯大林原想建议莫洛托夫先发表意见，可后者拒绝了这份荣誉：

“不，应该你来说，你将做得比我好。”

当斯大林陈述了苏联的立场后，莫洛托夫对德国人说：

“我不是说过，他会做得比我好得多吗？……”

德国人提出了一个辞藻过于华丽的条约方案：“多少世纪的经验证明，在德国和俄罗斯人民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好感……”斯大林坚决地划掉了所有这些多余的华丽辞藻。里宾特洛甫对任何修改都表示同意——他极其需要条约。

斯大林说：

“虽然我们多年来互相谩骂，但这不应妨碍我们达成一致意见。”

他们三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一天之内决定了一切。这是十分罕见的快速和坦率的谈判。他们是在摆布欧洲国家的命运，而丝毫不感到有任何道义上的问题。很快地就波兰问题达成了一致。斯大林对德国人说，不值得保留甚至只有不大领土的独立的波兰：应该完全占领它。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想让波兰消失。他恨波兰人。斯大林对里宾特洛甫说：

“独立的波兰终归是欧洲长期不安的策源地……出自这些考虑，我坚信，最好使从种族概念上说属于波兰的领土掌握在一个种族的人，即德国人的手中。德国就可以在那里按自己的愿望行事了……德国将做出很好的有利可图的事情。”

里宾特洛甫建议根据 1914 年的边界瓜分波兰，但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华沙就会落到德国人的手里。斯

大林没有反对。他亲自用粗大的有色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这条线第四次把波兰在两个相邻的大国之间瓜分了。

作为交换，里宾特洛甫提议把芬兰和爱沙尼亚划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立陶宛可以给德国，而拉脱维亚则可由他们瓜分。斯大林要求得到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的大部分领土。

晚上8点刚过，里宾特洛甫就给柏林发电报说："请立即报告元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第一次为时3小时的会晤刚刚结束。讨论是按照我们的精神进行的，进展顺利，从中发现最终解决的最后障碍是俄罗斯人要求我们承认利巴瓦（利耶帕亚）港和文达瓦（文次皮尔斯）港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元首若确定同意，我将感激不尽。"

柏林很快作出了答复："好，同意"。那时希特勒准备接受一切条件——因为斯大林排除了他可能要在两线作战的恐惧。

将近半夜时分，双方达成一致的全部内容被写进了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补充议定书里。

补充议定书的第一条规定："一旦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各个州发生领土一政治变革，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同时是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边界。"

苏联方面签署条约和秘密议定书的是莫洛托夫，因此，这个可悲的著名文件被称为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

德国同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把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归到苏联的计划。这是莫斯科允许希特勒消灭波兰的代价。

希特勒也不反对斯大林收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的比萨拉比亚："关于东南欧，苏联方面强调了苏联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德国方面则声明它对这些区域毫无政治兴趣。"

这个议定书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外交的主要秘密。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知道有这个议定书，但一直否定其存在，因为他们了解这是一个多么可耻的文件。莫洛托夫把对德条约的秘密议定书长期存放在自己个人的档案里。他离开外交部的时候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政

治局的档案库。但是，他直到临死之前还一直对所有的人证明不存在任何议定书。

费利克斯·丘耶夫多次问莫洛托夫：

“1939 年同里宾特洛甫谈判时签订的是什么秘密议定书?”

“不记得。”

德国人在战后马上公布了所有的秘密议定书，但是在苏联的报刊上，它们被称为伪造的文件。在我国，许多人至今还不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在他们看来同希特勒勾结是极其不可信的。前驻联邦德国大使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回忆说，事实上，早在 1968 年，当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和平而斗争》的文件集时，有人就曾建议部长发表 1939 年与德国签订的条约的秘密附录。

葛罗米科回答说：

“这个问题不属我的职权范围，应该在政治局里商量一下。”

一周后他说，这项提议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葛罗米科在自己人圈子里自然不会说这些议定书是“伪造的”。

秘密议定书违反了俄罗斯和波兰、俄罗斯和法国之间的条约，但是，这并未使斯大林感到不安。什么叫条约? 全是一纸空文。在世界政治中只有实力才有意义。

在与里宾特洛甫谈话时，斯大林是殷勤和和蔼幽默的。当他们结束工作后，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直接摆上了晚宴。斯大林站了起来，发表了让德国人感到突然的祝酒词，说他一直景仰阿道夫·希特勒：

“我知道德国人民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元首，因此，我想为他的健康干杯。”

后来斯大林为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致祝酒词，称他为德国秩序的保障。纳粹领导人后来在读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报告时感到震惊：希姆莱消灭了德国共产党人，即消灭了那些相信斯大林的人，而斯大林却在为杀害他们的刽子手的健康干杯。

纳粹思想家之一、1941 年领导帝国东方被占领土事务部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在日记里写道："布尔什维克简直就在计划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了。"

莫洛托夫没有放过为斯大林祝酒的机会，称他在 3 月 10 日的讲话得到了德国的正确理解并为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8 月 14 日《真理报》写道："苏联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曾被德国和苏联敌人引入死胡同，从今以后应该获得它的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

里宾特洛甫后来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几个小时内就达成这样的协议，这是他连想都不曾想到的。回到柏林后，里宾特洛甫叙述说，俄罗斯人非常可爱，他感觉在莫斯科就像处在党内老朋友中间一样。

陪同他的是元首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后者给斯大林拍了许多照片并按照希特勒的个人要求给斯大林的耳垂拍过特写镜头。希特勒相信，根据耳垂可以确定，该人是否有犹太人的血统（"如果耳垂紧贴着颅骨，那就是犹太人；如果不是，那就是阿利安人。"）。希特勒仔细地研究了照片后得出结论说，斯大林不是犹太人。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过同斯大林签署的条约，他说：

"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得到了巨大的战略好处。"

时任海军人民委员的海军上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其留下的笔记里写道："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里接见里宾特洛甫之后，当只有自己人在场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好像我们成功地哄骗了德国人'。看来是，他自己是想哄骗别人，而不是被别人哄骗。"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当同希特勒签署条约的时候，"斯大林简直就是翘着鼻子趾高气扬地走着"，同时重复说：

"啊，我哄骗了希特勒。我哄骗了希特勒！"

用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

8 月 31 日，莫洛托夫就同德国签订条约问题在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上做了报告：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关于德国与苏联之间有可能建立另一种关系，也就是非敌对性的睦邻关系的问题。现在看来，德国总的来说正确理解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声明并由此得出了实际结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表明，斯大林同志的历史性预见得到了出色的证实。”

最高苏维埃赞同了苏联政府的政策并批准了苏德条约。希特勒后来在帝国国会声称：“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说的每一句话”。

次日，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进攻了波兰。从此以后苏联报刊报道的只是德国指挥部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因为法国和英国为了履行向波兰承担的义务，向德国宣战了。斯大林认为，这次战火不会烧到他的身上。9 月 7 日，他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说：

“现在是两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着瓜分世界和统治世界的战争！我们不反对他们互相厮杀以及彼此削弱力量。”

斯大林称波兰为法西斯国家：

“在目前条件下，消灭这个国家意味着减少一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如果由于摧毁波兰，我们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传播到新的领土和居民，那有什么不好呢?”

9 月 9 日莫洛托夫命令给德国大使发电报：“我收到了您有关德国军队进入华沙的通报。请向德意志帝国政府转达我的祝贺和致意。”

但是，华沙战役拖延下来了。波兰人拼命地捍卫自己的首都。

波兰军队的这种顽强精神使莫斯科感到气愤。希特勒催促斯大林参加对波兰的战争。他并不需要红军在军事上的支持，他自己就能对付波兰人。但对他来说，苏联参加反对波兰的战争的政治意义是重要的。里宾特洛甫写信给莫洛托夫说，他们指望红军能尽快发起进攻，"它能使我们不必把波兰军队一直赶到俄国边境，去消灭它的残余，"。

莫洛托夫给里宾特洛甫回信说："我们认为，时候还未到。可能我们错了，但我们感觉过分匆忙会给我们带来损失，并促使我们的敌人联合起来。"

斯大林不急于参战，因为波兰人在继续战斗。进攻波兰预想在9月12日夜间进行，后来又将进攻日期改在了17日。

为了与波兰打仗，在边界上集中了大约一百万红军的官兵、坦克和空军。建立了两个方面军——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红军部队受领的任务是摧毁波兰的武装力量、占领重要的战略据点和不让波兰官兵逃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境内。

9月10日莫洛托夫邀请了舒伦堡大使并说：

"苏联政府对德国突然而至的、快速的军事胜利感到出其不意。红军原以为它有几个礼拜的准备时间，而现在缩短到了几天。"

莫洛托夫坦率地警告大使说，莫斯科准备发表声明说，波兰正在瓦解，苏联被迫去帮助正面临德国"威胁"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

"这给了苏联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可以不被视为侵略者。但是昨天勃劳希契上将声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可如果德国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的话，苏联就不能参战了。"

里宾特洛甫要求舒伦堡转告，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的话"显然是个误会。关于同波兰停战的问题并未提出过"。

9月14日莫洛托夫请来了舒伦堡并说，红军已经实际上做好了准备，但是考虑到苏联作战行动的政治理由（捍卫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莫斯科不能在波兰沦陷之前开始行动。因此，莫洛托

夫要求尽量更准确地通知他，预计什么时候能完全占领华沙。

里宾特洛甫从柏林通知说，华沙将在几天内被占领。他请求转告莫洛托夫："我们的理解是，苏联政府已经放弃根据来自德国的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居民的威胁而采取行动的想法。指出这样的动机是不可能的。"

舒伦堡带来了里宾特洛甫致莫洛托夫的信函。人民委员同意，"苏联政府拟议中的借口是带有伤害德国人感情的调门，但请求关注对苏联政府来说复杂的局势，不要让这样的区区小事成为我们道路上的障碍"。

莫洛托夫对大使说："遗憾的是，苏联政府没有其他的借口，因为至今苏联并不对在波兰的少数民族感到担心，但无论如何也应该在外国人的眼中为自己的干涉找到借口。"

柏林寄来了关于苏联部队进攻波兰的联合公报的草案。舒伦堡把它交给了斯大林。后者读完了俄文译文并要求大使作出一些修改。他没有征求坐在一旁的莫洛托夫的意见，在数分钟内修改了行文，把它交给了大使。舒伦堡说，应该向其政府报告这份新文本。

斯大林点了一下头并说：

"不要忘记就连古罗马人也是穿着披甲，而不是光着身子参加战役的。巧妙地写就的政治公报在今天就起着这种披甲的作用，它使我们不致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

两份文本都被摆在了希特勒的桌上。他选择了斯大林修改过的方案并说：

"当然是这份！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它强了许多！"

9月17日深夜两点钟德国大使舒伦堡、武官科斯特林格将军和参赞希利格被邀请来见斯大林。斯大林说，早晨六点钟红军将越过苏波边界。科斯特林格将军说，在这数小时内德国指挥部来不及警告所有的进攻部队，所以可能会有冲突。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回答科斯特林格将军说，德国人以其组织才能会对此应付自如的。

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波将金给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一份苏联政府的照会："波德战争暴露了波兰国家内部的站不住脚。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已经不复存在。波兰政府已经瓦解并毫无存活的迹象。这表明波兰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实际上已不再存在。"

大使愤怒地拒绝接受照会并说：华沙还没有倒下，波兰政府也还继续存在。

就在那一天，莫洛托夫在电台发表讲话说，苏联部队带着解放的使命进入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是曾经沾满波兰鲜血的领土。

莫洛托夫在电台说："由于招募红军预备役士兵，出于对将要实行凭卡制度的担心，在我国公民中出现了囤积更多的食品和其他商品的现象。政府认为需要指出的是，它没有打算实行凭卡购买食品和工业品的制度。我怕过多地购买食品和商品只会使那些这样做和囤积不需要的存货的人受到伤害，使这些东西面临损坏的危险……"

9月20日《真理报》刊登了塔斯社记者发自柏林的报道："德国老百姓一致欢迎苏联政府决定捍卫苏联人民至亲的、被逃亡的波兰政府抛弃的波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居民。在这些日子里，柏林呈现出一片特别活跃的情景。大街上的橱窗和专门的护栏旁挂着波兰的地图，那里整天聚集着人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红军的顺利行动。在地图上用红色的苏联小旗标出了红军部队的推进。"

波兰军队总司令爱德华·斯密格莱一利兹元帅命令不向红军抵抗。波兰人在继续与德国人作战，但苏联的参战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波兰被占领、瓜分并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中，波兰的瓜分被称做是"苏联和德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靠基础"。

个别未得到总司令命令的波兰部队把红军看作侵略者并投入了战斗。格罗德诺市抵抗了两天。当城市被占领时，300名波兰人未

经审讯就被立即执行枪决。

在波兰的作战行动继续了 12 天。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在其命令中指出，波兰的国家“如同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已经支离破碎。红军占领了有着 1200 万人口的领土。大约有 25 万名波兰官兵被苏军俘虏。其中许多人后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和其他地方枪杀了。

红军指挥部和法西斯德国的军队约定，“为了在推进过程中消灭波兰匪帮，苏联和德国双方的军队将联合行动”。

在一些地区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和红军一起消灭了波兰抵抗力量的策源地。这也就是后来斯大林所说的“用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

设在明斯克的苏联军事广播电台被利用来为德国轰炸波兰城市的轰炸机作导航。为表示感谢，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送给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一架飞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盖世太保在扎科帕内成立了“反对波兰鼓动宣传”联合中心。同样，根据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达成的谅解，一大批盖世太保人员来到了利沃夫。他们来此做撤退德国居民的工作。一大批德国共产党员被交到了盖世太保的手里，这些人本来想，他们在苏联能找到躲避纳粹的藏身之地。

9 月 20 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他在乌克兰的部下下达命令：“释放 9 月 18 日在奥列夫斯克边境部队辖区的奥斯特罗沃克边防哨所地段扣押的、落为波兰战俘的德国军官，为他们以及陪同人员去德国大使馆提供可能和工具，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交还德国部队。以后若出现类似的情况，照此指示办理。”

契卡行动小组已经开始在红军占领的领土上进行大规模逮捕。只有德国人可以不担心被捕。贝利亚就此给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出了严密指示：“在我们部队占领的领土上，特别是在沃伦，有德国居民点（侨民区）。在他们中间不进行逮捕，当场抓获的罪犯除外。”

早在战争爆发前的一周，希特勒在对自己的将军们讲话时说：

“自 1938 年秋季起，我开始决定要与斯大林走在一起。实质

上，全世界只有三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我和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是最弱的。斯大林和我是惟一的能看到未来的国务活动家。这样，再过几周，我就将在共同的德俄边界把手伸给斯大林并同他一起实现对世界的瓜分。”

而暂时互相拉手的只是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和红军。在格罗德诺同德国将军们一起接受联合阅兵式的，有那时的军级指挥员、未来的元帅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在布列斯特，为庆祝“苏德兄弟的战斗友谊”，9 月 22 日也举行了联合阅兵式。

现在发现了 1939 年 9 月 21 日德国第 20 师司令部起草的命令：“第一，为庆祝苏联部队接收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1939 年 9 月 22 日下午约 15—16 点在第 19 军司令部大楼前将举行阅兵式，接受第 19 军军长古德里安和苏联部队指挥官的检阅……”

进行检阅的是坦克部队首长——德国将军海因兹·古德里安和苏联旅级指挥员谢苗·莫伊谢耶维奇·克里沃舍因。

古德里安战后在《一个士兵的笔记》中写道：“克里沃舍因会讲法语，所以我容易同他沟通。所有问题得到了令双方满意的解决……我们在布列斯特逗留是以举行阅兵式和交换旗帜的仪式告终的。”

两年以后，在 1941 年 7 月，古德里安和克里沃舍因在攻占普罗波伊斯克市的战役中相遇，后来斯大林命令将该市改名为斯拉夫戈罗德。谢苗·克里沃舍因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第一骑兵师作战，1937 年到过西班牙，后来在远东指挥过坦克旅，曾参加哈桑湖战役和芬兰战争。在柏林战役中，作为机械化军的指挥，克里沃舍因表现突出，为此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波兰崩溃之后，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满意地说：

“波兰的执政人士没少以自己国家‘牢固’和自己军队‘强大’而自傲。原来却只要先是德国军队，后是红军对波兰的短短一击，就足以使这个靠压迫非波兰的民族生存的、凡尔赛和约的畸形儿化

为乌有了。”

半个世纪以后，“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们把莫洛托夫的这句话作为传单贴在了华沙的大街上。有莫洛托夫签名的秘密议定书、红军 1939 年 9 月对抵御德国人的波兰军队的背后一击以及 1940 年在卡廷枪杀波兰战俘的事件，直到今天还在决定着波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1940 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写着：“波兰——地理概念。属于德国的国家利益范围。”

谢谢约沙·里宾特洛甫

在那些月份里，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来说，没有比苏联政府首脑和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再好的朋友和保护人了。他那关于“眼光短浅的反法西斯分子”的气愤的话语，使习惯地认为法西斯分子是苏维埃政权最坏敌人的苏联人感到震惊。而莫洛托夫却在最高苏维埃的讲台上对没有能及时转变看法的同胞们申斥说：

“在我国有一些眼光短浅的人，他们沉醉于简单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忘却了我们的敌人的挑拨离间作用。”

他指的是现在已被认为是侵略者的英国和法国。

莫洛托夫继续说：“这些人要求苏联一定要站在英国一边介入反对德国的战争。这些冒进的战争贩子难道不是神经失常了吗？（大厅内发出笑声）如果这些先生们有克制不住的战争欲望的话，就让他们在苏联不介入的情况下自己去作战好了。（笑声。鼓掌声。）我们倒要看看，这是些什么样的斗士。”（笑声。鼓掌声。）

苏联和德国就已经开始的世界大战发表了共同声明。斯大林口授了这样的声明：“英国和法国要对战争的继续负责，而且在战争继续的情况下，德国和苏联将保持接触并就争取和平所必须采取的

措施彼此进行协商。”

同希特勒的条约引起了苏联人民的慌乱，尽管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缓解的感觉：将不再有战争了。报刊上对德国的攻击消失了，不再谈论德国一贯对俄罗斯施加的恶劣影响了。相反，出现了关于德国精神对俄罗斯文化起良好作用的报道。

舒伦堡大使向柏林报告说：“苏联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来改变民众对德国的态度。报界好像被更换过了似的，不仅停止了所有对德国的攻击，而且现在所提供的国际政治事件绝大部分是以德国的报道为基础的，而反德书籍在书店已停止出售。”

作家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抱怨说：

“我已经开始写一本反对德国人的小说，而且已经写了很多，可现在我的小说完蛋了：要我赞扬希特勒主义——不，不是希特勒主义，而是德国的英勇和德国文明的伟大……”

著名的作曲家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被勒令将写于1939年的歌剧《谢苗·科特科》中叙述德国占领的情节去掉。莫洛托夫的副手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专门去听了歌剧——他想确认里面再也没有什么使德国新朋友感到委屈的东西了。

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助理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那时还是莫斯科大学学生，他成了这样一件事情的见证人。共青团的一位团委书记突然伸手作纳粹欢迎状并高声喊道：

“希特勒万岁！”

大家都大笑起来。但是马上感觉到，在共青团领导人的这场恶作剧中包含着内在的抗议。他被解除了共青团的职务，差一点被开除出大学，罪名是“嘲弄党的政策”。是的，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但由于他“不理解党的政策”而给了他处分。

莫斯科的乐队学会了纳粹国歌，把它同《国际歌》一起演奏。19世纪的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曾认为同俄罗斯作战是极其危险的，他的书被译成了俄语。在大剧院上演了希特勒喜爱的作曲

家理夏德·瓦格纳的作品。孩子们配合当前形势唱起了俄罗斯歌谣："感谢约沙·里宾特洛甫，他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户"。

1939年9月底，里宾特洛甫第二次来到莫斯科。里宾特洛甫回忆说："我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友好的、几乎是亲切的接待。"

在里宾特洛甫来访的前夕，斯大林对舒伦堡说，他提议做一项新的交易——苏联放弃整个卢布林省和华沙省中属于苏联的那一部分，但是要求德国把它想得到的立陶宛交给苏联。

舒伦堡向柏林报告说："斯大林补充说，如果我们同意的话，苏联将根据8月23日的议定书立即着手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问题，并期望在这方面能得到德国政府的完全支持。斯大林着重提到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没有提及芬兰。"

希特勒轻松地把波兰的大部分占为己有，这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受到了鼓舞。他们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了里宾特洛甫。部长马上去询问希特勒的最后看法。在等待柏林的答复时，德国代表团被带往大剧院观看《天鹅湖》。

那时，莫洛托夫接见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并用威胁性的口吻说：

"如果爱沙尼亚不同意与莫斯科结成军事联盟的话，那我们不用爱沙尼亚同意，将通过其他的方法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在波兰被瓜分之后，这些话用不着解释了。这位部长当然没有怀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已经给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下令："立即开始把兵力集中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边界……列宁格勒军区的任务是给爱沙尼亚军队以沉重打击……各集团军的行动应该是果断的，因此它们不应该在敌人的筑垒阵地卷入正面战斗，而应该正面留下屏护队，从两侧迂回并绕到后方……"

莫洛托夫说，将在爱沙尼亚驻扎为数3.5万人的苏联军队。爱沙尼亚外长胆怯地反对说，这比整个爱沙尼亚军队的人数还要

多。这时斯大林走进了房间，他对莫洛托夫说：

“行了，行了，你对我们的朋友们太严厉了。我们限制在 2.5 万人。”

在德国代表团在大剧院看完芭蕾舞之前，就签订了苏联同爱沙尼亚的互助条约。

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往莫斯科给里宾特洛甫打来电话，答复对俄国人的要求表示同意：他不反对斯大林把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拿过去，尽管他曾想宣布立陶宛为德国的保护国。

元首补充说：

“我想要同他们建立牢固的和紧密的关系。”

当里宾特洛甫把自己同柏林的谈话转告斯大林时，斯大林点着头说：

“希特勒懂得自己的好处。”

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又签署了一个秘密议定书，指出“立陶宛的国家领土纳入苏联的利益范围，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卢布林省和部分华沙省将纳入德国的利益范围。”

希特勒那时给自己留了立陶宛的一小部分领土，但不久也放弃了它。1941 年 1 月 10 日，莫洛托夫和德国大使舒伦堡又签署了一个秘密议定书：德国政府放弃了根据 1939 年 9 月 28 日的秘密补充议定书归其所有的那部分立陶宛领土。为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意付给德国 750 万金美元。其中 1/8，德国应该得到的是有色金属，其余部分在相互贸易结算中加以计算。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命运已被决定。莫洛托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到我们这里来，我对他说：‘只要不签署并入我们的协议，您就别想回去’”。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的米哈伊尔·斯米尔秋科夫在答杂志记者问时说：“关于将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并入苏联版图的谈判结束后，斯大林从莫洛托夫那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从他的脸上看

到的是半嘲讽和半幸灾乐祸的表情……我记得在签署需要的文件之前他们是怎样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周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和莫洛托夫的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差不多就把他们捧在手上私的。而等所有的手续就绪之后，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领导人的态度就一下子都改变了。甚至不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后来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似乎像穷亲戚一般，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领导人接待室的椅子扶手上，等待着被召见。"

同拉脱维亚的条约是 10 月 5 日签署的，同立陶宛的条约是 10 月 10 日签署的。苏联获得了向所有共和国派出自己部队并在它们境内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权利。

谈判之后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里格在战后对这次招待会进行了描述。拉夫连季·贝利亚不停地给希里格加胡椒浸的酒。希里格试图保持清醒的头脑。

"喂，如果您不想喝的话，谁也不能强迫您，"——斯大林宽容地对希里格说。

"甚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希里格开玩笑地说。

"在这张桌边，甚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也不比任何别人更了不起，"——斯大林严肃地回答说。

9 月 28 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第二个"友好和边界"条约，同时签署的还有几个秘密文件。其中包括：关于德国公民和德国出身的其他人士有权移居德国的委托议定书以及德国和苏联一致同"波兰的鼓动宣传"作斗争的秘密补充议定书。

为批准苏德条约重新召开了最高苏维埃例会。10 月 31 日，莫洛托夫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为希特勒思想辩护的讲话：

"英国的、还有法国的战争支持者们，对德国宣布了类似古老的宗教战争的思想战……这样的战争是说不出什么道理的。希特勒主义的思想就和任何其他的思想体系一样，可以承认或者否定，这是政治观点的问题。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懂得，一种思想是不能用暴力来消灭的，也不能用战争来使其终止。所以，进行这种战争，

把它作为一场在为‘民主’而战的虚伪旗帜的掩盖下的‘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在帝国国会上发表演说时，讲述了关于波兰的毁灭：“德国与苏联签订的友好和利益范围条约给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和平，而且还有顺利和牢固的合作的可能。”

帝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939年10月10日在日记里写道，刚刚出现在《消息报》上的文章“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有人猜测，这是斯大林自己写的。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出现对我们来说非常及时，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迄今为止，俄国人履行了自己的所有诺言。”

文章写得如此之好，看来戈培尔同希特勒讨论过它，正如已经查明的那样，希特勒也是一个推崇1939年的《消息报》的人。

1939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接受法国哈瓦斯通讯社采访时称法国为“主张战争的”国家，而德国为“捍卫和平事业的”国家。

1940年4月，莫洛托夫祝贺德国人成功地入侵挪威和丹麦。5月，他祝贺德国人入侵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为履行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的条件，舒伦堡大使在德国军队开始在西方进攻前的三天就对此向莫洛托夫作了通报。

人民委员回答说：

“德国应该防备英法进攻，对此苏联政府表示完全理解。”

苏联驻巴黎全权代表处在其例行会议上通过了给斯大林的贺电，谴责了发动反德战争的英法帝国主义。可是发生了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全权代表处的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没有把电文给译电员，而是直接给了巴黎的电报局。第二天，法国报纸刊登了电文。苏联大使雅科夫·扎哈罗维奇·苏里茨被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他离开之后，大使的职务由使馆参赞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伊万诺夫代理。1941年，他在莫斯科被捕并“由于反德情绪”被判处五年监禁……

当德国军队进入巴黎时，苏联全权代表处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他们挥手表示欢迎。苏联外交官们立即开始了同德国占领当局的友好关系并激动地谈论着盟友德国人。

在斯大林同希特勒结盟之后，所有的共产党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关于停止反法西斯宣传的命令。法国共产党被命令同德国占领政权合作。但是德国人自己使法国共产党人未做出这种可耻的事情来，他们在进入巴黎后拒绝同共产党人打交道……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坚定地同我们在一起"。戈培尔兴奋地指出，莫洛托夫的每一次讲话都是莫斯科对德国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中断了同被占领的欧洲国家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并承认了德国人在被占领国家建立的所有傀儡政府。这实际上是对希特勒所有战果的赞同。

坚硬的干果

苏联成了德国的盟国。作为回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只是对芬兰没有搞成，芬兰成了坚硬的干果，它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斯大林要求芬兰签署类似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签署的那种条约，并预定要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

从 1939 年 10 月 12 日到 11 月 9 日，同芬兰的谈判进行了几乎整整一个月。斯大林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芬兰代表团则由后来的国家总统尤霍·巴锡基维率领。芬兰人一直采取拒绝的态度。于是斯大林要求把芬兰湾的部分岛屿、卡累利阿地峡的一部分和雷巴奇半岛交给苏联，并要求租赁汉科半岛的一部分。作为回答，苏联准备交出东卡累利阿的领土。芬兰再次表示拒绝。斯大林决定，如果愚蠢的芬兰人抵制的话，那就不得不用暴力拿走这些领土，而且还可能把整个芬兰纳入苏联的版图。

当会谈还在进行时，1939 年 10 月 26 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下令开始组建由苏联的芬兰人和卡累利阿人构成的特别步兵军。任命在西班牙作战过的阿克塞尔·安季拉为该军军长。该军应该成为起来反对芬兰政府的人民军队的基础。被列入安季拉军的俄罗斯军官们都取了芬兰的姓名。

1939 年 11 月 30 日，战争开始了：苏联空军轰炸了赫尔辛基，红军越过了边界。战争进行了 105 天并于 1940 年 3 月结束。

莫斯科称战争的理由是芬兰人扫射了在马伊尼拉村的苏联边防哨所。但是，在那天之后的 60 年里，没有找到任何事实能证明确实是芬兰人先开的枪。除此以外，有证据证明，这场挑衅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安排的，是为了得到早就期待的入侵理由。

11 月 30 日，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称，红军采取的行动是被迫对芬兰的敌对政策所作的回答，而战斗行动的目的是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立即出现了关于建立以芬兰共产党奠基人之一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的通告。库西宁自 1921 年起就一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里工作。

从未存在过的芬兰民主共和国的政府似乎就坐落在苏联军队占领的芬兰的边境小城泰里约基。12 月 1 日，它号召芬兰人民像迎接解放者一样地欢迎红军。第二天，莫洛托夫同奥托·威廉莫维奇签署了互助友好条约，后者就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一样，不仅领导着人民政府，而且同时还担任着外交部长的职务。

由于全世界对进攻芬兰感到愤慨，莫洛托夫立即致函国际联盟，声明“苏联并没有同芬兰处于战争状态，也没有威胁芬兰人民。苏联同芬兰民主共和国保持着和平关系，12 月 2 日同该国政府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所有问题在这个文件中得到了解决”。莫洛托夫的恬不知耻是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

希特勒公开支持了苏联，称斯大林只是想获得通向不冻海的出口。军事历史学家米哈伊尔·谢米里亚加教授这样写道，希特勒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在这场战争中十分积极地帮助了莫斯科。德国船

只为苏联在波罗的海的潜水艇供应了食品和燃料。为了使西方不能援助芬兰，德国人帮助封锁了波的尼亚湾。希特勒不许意大利飞机通过德国领土给芬兰人运送货物，并威胁瑞典说，如果它支持芬兰的话，它将会倒霉。

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 1939 年 12 月 21 日为庆祝领袖 60 寿辰而举行的酒宴是怎样拖长到早晨 8 点钟的。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斯大林对客人们说：

“苏联开始变得有些拥挤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切尔诺维策给我们才好。”

一个月后，1940 年 1 月 21 日，在庆祝列宁诞辰的友好晚宴上，斯大林祝酒说：

“我们在芬兰暂时杀了 6 万人。现在应该杀死其余人，那时这件事可以算是干成了。剩下的只是孩子和老人们。”

苏联军队得到了摧毁芬兰军队、把芬兰人民从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和逼近与瑞典和挪威的边界的命令，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说的就是要完全占领这个国家，而完全不是要把边界线推得离列宁格勒远一些。但是芬兰军队的拼命抵抗粉碎了斯大林的全部计划。没有能够征服小小的芬兰。原来红军并没有作好打一场现代战争的准备。红军损失了 13.1 万人。芬兰军队损失了 2.9 万人。只得停止战争并开始谈判。但是，芬兰人也不得不交出斯大林要他们交出的一切东西。同芬兰人的谈判是在莫斯科进行的。1940 年 3 月 12 日签署了和约。斯大林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领土，除此以外，还租借到了整个汉科半岛，在那里将设立一个苏联海军基地。

莫洛托夫为未能解决“芬兰问题”感到非常懊丧。可是把芬兰合并过来的期望并没有消失。1940 年 4 月在卡累利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说到，过不了多久，“芬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将以新的令人震撼的力量站立起来，并将把这个出卖灵魂的傀儡集团完全扔进垃圾箱。在需要的时刻，我们将在芬兰人民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向他们伸出兄弟般的援助的手”。

已经是在二次大战之后了，负责对芬兰关系的政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 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带着极大的遗憾对南斯拉夫领导成员密洛凡·吉拉斯说：

“我们没有占领芬兰是犯了一个错误。现在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

斯大林补充说：

“是的，这是个错误，我们是过于顾及美国人了，而他们是连一个手指头也不会动的。”

莫洛托夫遗憾地指出：

“对，芬兰——这是个坚果”。

可能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真的担心美国会作出尖锐反应，但更加可能的是，他们记得了，芬兰军队对他们作出了何等激烈的抵抗，所以他们不想再次冒险……

1939—1945 年间，当苏联和芬兰第二次作战时，小小的北部国家损失了 8.7 万人——这占其人口的 2.3%（每个牺牲者都被送至家乡安葬）。芬兰失去了其领土的 1/10，这些领土被并入了苏联。将近 50 万卡累利阿的居民不要苏联公民权，抛弃了家园，迁往芬兰去了。

通信“恋爱”

斯大林认为，德国将会长久地陷入同法国和英国的战争。对于他来说，法国军队的迅速崩溃是令人不快的意外。1940 年 5 月 17 日莫洛托夫请德国大使舒伦堡接受“对德国军队在法国的胜利的最热烈祝贺”。同时，莫洛托夫还坦率地告诉大使说，已经向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派去了特使，他们的使命是在那里组织新的、莫斯科更能接受的政府。斯大林一点也不想落在希特勒的后面。

又过了几天，莫洛托夫对大使说，已经决定向属于罗马尼亚的

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出兵。希特勒为了履行承担的义务，建议罗马尼亚国王不要进行抵抗。北布科维纳在各个不同时期曾分别隶属土耳其和奥匈帝国，但它的居民基本上是乌克兰人。比萨拉比亚隶属土耳其 300 年，自 1812 年起归属俄罗斯帝国。1918 年罗马尼亚将比萨拉比亚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莫斯科长时间不能决定，对比萨拉比亚该怎样办。李维诺夫认为，需要放弃对比萨拉比亚的权力，因为搞好同罗马尼亚的关系更为重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同希特勒谈判的同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北布科维纳被并入了乌克兰。而在比萨拉比亚的领土上于 1940 年 8 月 2 日成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其中的三个县也被交给了乌克兰。

在莫斯科同德国外交官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指出，他也准备同日本开战。他满意地确认，在哈勒欣河的战役中日本人的损失不少于 2 万人。

斯大林说："这是亚洲人惟一听得懂的语言。况且，我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莫洛托夫晚些时候说，他和斯大林马上猜到了希特勒的阴谋诡计。但人们好像并不太相信他们这种洞察力。1941 年夏德国军队进逼莫斯科是进得太快了，苏联人在战场上、在俘虏营里和在被占领地区牺牲的太多了，1945 年 5 月取得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向德国靠近呢？官方的说法是，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有助于避免希特勒在 1939 年就发动进攻，有助于尽可能推迟战争和更好地对战争做好准备。但是，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希特勒并没有想在 1939 年就进攻苏联，而且因为他在背后有敌对的法国，所以他也不可能这样做。更糟糕的是，虽然把战争推迟了两年，但斯大林并没有能使军队对可怕的战争做好准备。所以，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希特勒给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是英国和法国不能给的东西。他向他们提出了瓜分世界的建

议。作为开始，他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的一部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给了他们。而且莫斯科简直就是在一天之内就得到了这一切，没有斗争，没有让步，也没有同西方的谈判！在希特勒的帮助之下，斯大林成了世界政治的关键人物。他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举足轻重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在学习扮演主宰世界命运的角色，并很快尝到了甜头。他们合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他们还企图霸占芬兰，但芬兰人捍卫住了自己的国家。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想的是，这一切仅仅是开始。

1941 年 6 月，政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丹诺夫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说："我们变得更强大了，我们可以提出更积极的任务了。同波兰和芬兰的战争不是防御性的战争。我们已经迈上进攻性政策的道路。"

除此以外，还有两人相互接近的个人原因。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经历。莫洛托夫成了恋人的书信传递员。至今仍有着关于希特勒同斯大林在西部边界幽会的传闻。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幽会。他俩始终未曾谋面。他们之间只有书信上的感情交流。而且他们总是醉心地从莫洛托夫那里打听对方的情况。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在一个电影中看到了斯大林，便马上对他有好感。其实那时就开始了德俄联盟。"

希特勒认为斯大林是他的同龄人中最为出色的人。元首在 1940 年 12 月同莫洛托交谈时说："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历史人物。当然我本人也想载入史册。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两位政治活动家聚到一起，是件很自然的事情。我请您，莫洛托夫先生，把我的问候和我关于在不远的将来举行这样的会见的提议转告斯大林先生。"

在这之前希特勒已签署了准备进攻俄国的指令，但是，他仍保留了对斯大林的某种尊重。到了战争期间，他说：

"在战胜俄国之后，最好是让斯大林来管理国家，当然要在德

国的领导之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强，能对付俄国人……”

斯大林并没有那么多的情感，可他对元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能力评价很高。他常向自己驻柏林的大使打听希特勒的情况，醋意十足地把元首同自己作比较。总书记喜欢的正是元首的那些对德国来说是致命的品质。可能他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伙伴，同他在一起他们就能支配整个世界。在这方面，在西欧让战争长期打下去是完全合乎斯大林的胃口的，因为这场战争会把英国，也会把德国拖垮，这就会给他提供在欧洲大陆行动的自由。

在同里宾特洛甫第二次会晤时，斯大林安慰这位纳粹部长说：

“苏联政府不想同像英国、美国和法国这样贪婪的国家建立任何联系。英国首相是个蠢物，而法国总理更蠢……”

这时斯大林突然说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话：

“如果德国出乎意料地陷入困境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相信，苏联人民会来援助德国，不会允许让德国受到窒息。苏联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国。”

里宾特洛甫是这样理解斯大林这句话的含义的：如果德国同西方大国的战争打得不顺的话，他准备支持德国。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德国不需要军事援助，但是指望能提供军用材料。柏林简直就不相信，像里宾特洛甫说的那样，斯大林真的说过这样一句话。舒伦堡授权去见莫洛托夫，请他提供一个斯大林原话的准确记录。德国人得到了摘录后才相信，里宾特洛甫对苏联领袖的理解是正确的：斯大林是直截了当地向德国建议给它提供帮助，如果它在同西方大国的战争中开始失利的话。当然，斯大林不希望德国强盛，但也不愿它毁灭，因为看来他依然认为英国是主要敌人。

德国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石油、原料和食品。在科拉半岛上建立了德国潜水艇的供应基地。而苏联也并没有吃亏。制订了一个与德国友好相处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帮助建立了苏联的军事工业。大批苏联专家去了德国，德国人什么都给他们看，什么都给他们介绍。

后来成为党的高层工作者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描述了一次出差去德国的情况。战前叶夫列莫夫是沃罗涅日第18飞机制造厂的一级设备检查员。通过全苏机床进口联合公司的渠道，他被派往德国出差去采购设备。那时苏联专家常常被分成不大的团组派出。他们在旅途中经过了维尔纽斯、考纳斯、柯尼斯堡。1940年6月4日叶夫列莫夫小组抵达柏林，那时德国人正在庆祝他们在西线的胜利："胜利的战士们举着旗子和带着乐队在马路上经过，站在马路两旁的城乡居民给他们抛鲜花，用狂热的欢呼声欢迎他们。一些人跑到行进中的士兵面前，拥抱和亲吻他们……"

在德国实行了凭证制度。给苏联专家们按照外交官的标准发给供应面包、肉、黄油和砂糖等的票证。"而且为了方便起见，这些票证分成5、10、25、50和100克一张的、上带小孔，容易撕开。例如，如果你决定在旅馆、餐厅或铁路小吃部用餐的话，那么，在菜单上，除标出每个菜肴价格外，还标有为得到第一、第二道菜、咖啡、茶需交招待员多少和哪些票证。在餐厅里，如没有票证只有钱的话，就只能买到啤酒和其他烈性饮料。

在苏联的商务代表处有个'孔租姆'商店，在那里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和部分食品（罐头、茶叶和炼乳）。我们还可凭外交护照在当局为此专设的商店或裁缝铺里购买或定购衣服、鞋和内衣……"

苏联专家们被安置在公寓旅馆里。他们所见到的许多东西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企业中的井然有序、工人们的技术、德国人的节约。"每个星期可以洗一次澡。为此每套住房里都安装了燃气热水器，在一个孔里塞进硬币之后，很快便会流出热水。德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和节俭的。譬如，在房子的入口处，当用钥匙打开大门时，灯就亮了，而当你进入室内时，灯立即就灭了。"

叶夫列莫夫及其同事们在最大的德国机床制造厂接收了专门为苏联生产的最新型的机床。德国人向红军出售了人民委员捷沃相订

购的那时最现代化的“柳特佐夫”号巡洋舰、30架最现代的飞机、各种最新型的炮和坦克（还有配套的装甲）。总之，希特勒慷慨地与我国分享军事工艺。我们的航空代表团甚至不相信，给他们展示的果真是最新式的机器。德国人允许他们购买几样武器，数年后这些武器将在苏联的天空中横行，它们是：“梅塞施米特—109”型和“110”型、“容克—88”型和“52”型、“道尼尔—215”型和甚至还有未曾用来装备军队的“亨克尔—100”型试验样机。对德国飞机的参观表明，苏联空军远远落后于“德国空军”。

为什么希特勒知道将要进攻苏联，还要同斯大林分享武器呢？因为他坚信，苏联已经什么都来不及利用了。

克里姆林宫里的晚会

1939年12月，在斯大林生日前夕，希特勒发去了祝贺信：

“在您60寿辰之际，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贺。与此同时，我寄去我的最美好的祝愿。祝您本人身体健康、也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未来幸福。”

里宾特洛甫单独向斯大林表示了祝贺：“缅怀在克里姆林宫里度过的那开辟了两国伟大人民间关系的转折点、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长期友谊奠定了基础的历史时刻，在您的60寿辰来到之际，请您接受我的最热烈的祝贺。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领袖答复部长说：“部长先生，感谢您的祝贺。德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可以成为长久的和牢固的。约·斯大林”。

这次通信的整个内容都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伊利亚·爱伦堡写道，这些话激起了他的愤慨。“这不正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吗！难道能把红军的鲜血与希特勒分子的鲜血相比吗？而且怎能忘记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

国本国所造成的鲜血流成的河……”

12月21日晚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厅里举行了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友好晚宴。聚集了约70—80人，许多人是带着夫人来的。斯大林最后一个到场，同所有人握手问好。庆典开始了。

莫洛托夫当宴席主持。他热情洋溢地致祝酒词说：

“我们中许多人长年来与列宁同志在一起工作，而现在与斯大林同志在一起工作。我没有见过比列宁更伟大的思想巨人，更伟大的领袖。但是应该说，斯大林同志具有比列宁更出色的品质。列宁长年以来与本国人民和本国隔离，过着流亡的生活，而斯大林一直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的。这当然使斯大林同志能更好地了解人民和更接近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同志可以有资格称为人民的领袖。”

晚宴拖了很长时间。人们从叶卡捷琳娜厅转到了乔治厅——在那里举行了音乐会。然后，酒宴继续进行。莫洛托夫很有兴致——喝着酒，跳着舞。到清晨8点才散席。

正当外交人民委员为自己的领袖所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的时候，一场争论正在柏林进行——对俄国该怎么办？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柏林签署了为期十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的协议。也许将俄国接收进轴心国并把它变成长期盟友？或者用突然袭击解除俄国的武装和永远摆脱来自东方的威胁？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一年后，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分歧逐渐明显起来。无论斯大林，还是希特勒都在急切地扩大自己的帝国，它们的利益在欧洲东部开始发生冲突。

1940年10月13日，里宾特洛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地论证了德国政府的每一个步骤，并邀请莫洛托夫去柏林。10月17日，斯大林收到了信件。就这封信讨论了三天。10月21日，莫洛托夫把斯大林的答复转告了德国大使舒伦堡：“尊敬的里宾特洛甫先生！我收到了您的来信。衷心地感谢您的信任以及您信中所阐述的对最近事件的有益分析。我同意您关于我们完全可以在划分

长期的相互利益的牢固基础上进一步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观点。莫洛托夫先生接受您的邀请……”

11月12日，莫洛托夫带着解决争议问题的希望乘火车来到柏林。陪同他的是新任黑色冶金人民委员伊万·捷沃相、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后来留在柏林任大使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以及包括16名警卫人员、医生和随从在内的其他60人。

莫洛托夫在柏林呆了两天。里宾特洛甫对莫洛托夫说，英国已经溃败，应该考虑不列颠帝国的命运问题，以便划分俄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俄国将来是否也转向南方，以便得到对俄国来说是如此重要的通向公海的天然出口?”

莫洛托夫感兴趣地问他所指的是什么海。

“对俄国来说，经过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去公海不将是最有利的出口吗?”——里宾特洛甫建议说。

然后，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他尽力博得莫洛托夫对自己的好感。

希特勒也说，正在准备对英国进行最后的打击，需要考虑瓜分不列颠帝国遗产的问题。莫洛托夫开始时想弄清楚，为什么德国军队转到了芬兰和罗马尼亚。他并非是指德国准备进攻苏联。他不满意的是希特勒觊觎那些已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然而希特勒试图把莫洛托夫的目光引到瓜分不列颠帝国的前景上来，描述了苏联转向印度和波斯湾的好处。

莫洛托夫没有反驳希特勒的意图。他只是想讨价还价，争取再多得到点什么。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和斯大林首先想得到的是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自由出口，得到在保加利亚、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基地，以便控制黑海海峡。如果德国同意这一点的话，那么，莫斯科不反对参加三方条约。

莫洛托夫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似的，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

写道："希特勒的最大兴趣在于在现有的势力范围内与苏联签约和加强友谊。"第二天，他给斯大林发了另一封信："他们很好地接待了我，看来，他们是想要巩固同苏联的关系。"

戈培尔不同于里宾特洛甫，完全不喜欢苏联的党员同志们。元首邀请戈培尔出席为莫洛托夫安排的早餐会。宣传部长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聪明和狡猾的人。脸是蜡黄的。从他的嘴里很难掏出什么来。他听人讲话挺认真的，仅此而已……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一种前哨，一切都取决于后者……莫洛托夫的随员们智能低下。没有一个人是干大事业的。他们好像是要尽力证明我们关于布尔什维克群众实质的理论概念似的。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彼此间的惧怕和自卑的神态。甚至同他们进行简单的谈话也几乎完全不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警觉地注意着！这是可怕的！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

德国人提出了四国协议的草案，其中照例要有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在其中的一个议定书里向苏联允诺了修改船只通过黑海各海峡的条件。另一个议定书的内容是关于瓜分世界的，而且苏联可以放手地在印度洋方向获取领土。

莫洛托夫 11 月 14 日向斯大林报告说："会谈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但是至少是弄清楚了希特勒目前的情绪，对此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在《真理报》上公布了一个官方的通报："今年 11 月 12—13 日，在柏林逗留期间，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同内阁总理阿·希特勒先生和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进行了交谈。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交换了看法，并就苏联和德国感兴趣的极其重要的所有问题取得了相互谅解。莫洛托夫同志还与空军元帅戈林先生和希特勒先生在国家社会党的副手赫斯先生进行了交谈……"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向鲁道夫·赫斯询问了党务方面的情况，详尽地了解了元首的副手所从事的事务。莫洛托夫对负责

发展军事工业四年计划的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发牢骚说，德国没有履行向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计划。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仍然认为他们同德国是战略伙伴关系，而希特勒则已决定要征服苏联。在莫洛托夫离开之后，他就签署了关于准备进攻俄罗斯的秘密指令。而苏联全权代表处通知莫斯科说，“吸引苏联转向德国一边是旨在尽快胜利结束同英国的战争的德国对外政策计划的基础”。

11 月 25 日，莫洛托夫请来了舒伦堡，他说，苏联准备接受四国条约草案，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德国军队应该离开芬兰，根据苏德 1939 年协议，芬兰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在芬兰的经济利益（供应木材和镍）将得到保障；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应该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而保加利亚将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

“在波斯湾的总方向上，从巴统和巴库起的南部地区将属于苏联的利益范围（这个已熟悉的提法意味着要把这一地区划归苏联）；

“日本放弃其在北萨哈林开采煤和石油的租让权。”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建议将所有这一切写进五个秘密议定书里。舒伦堡答应立即把苏联的提议向自己的政府报告。但在柏林已经无人对同苏联玩地缘政治游戏感兴趣了。1941 年 1 月 9 日，在德国军队领导作战的司令部的秘密会议上，希特勒说：

“斯大林是欧洲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个聪明人。他将不会公开反对德国，但是应该考虑到，在德国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他将会越来越多地给我们制造困难。他想参加占有经过战争蹂躏的欧洲遗产。他也在渴望着有所成就……”

凑巧的是，次日，并未怀疑希特勒居心叵测计划的苏联代表签署了补充协议：莫斯科同意增加向德国供应小麦、原油、金属废料、生铁、铂和棉花。苏联代表答应给德国 500 万吨粮食。到了 3 月份，苏联的供应量明显地增加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试图使希特

勒变得温和些。火车载着苏联的石油和小麦开往德国，直至最后一分钟。

“这不是我们该得的！”

1941年4月13日，星期日，斯大林作出了从未有过的姿态。他来到火车站，好像是来为日本外长松岗送行，而实际上他是想让整个外交使团看到，他同德国大使舒伦堡拥抱，并请他多多关心，使德国和苏联今后还是朋友。

然后，斯大林向代理武官职务的德国上校克莱勃斯转过身去，握着他的手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将是朋友。”

整个世界都在议论斯大林的故意作出的这个姿态。但这没有给德国人留下任何印象。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掌握实力是多么好啊！斯大林显然不想了解德国的坦克……我整天就沉浸在狂热的幸福感中。漫长的冬天的夜晚中的周日是多么好啊！”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懂得，两个大国的利益早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而且有人一定要退让。但这可能发生在三四年以后。他们认为，现在希特勒没有能力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德国能够同法国和英国打仗，因为它得到了苏联的原料、苏联的石油和苏联的小麦。

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对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说，同德国人的条约还将长时期有效。不是因为谁对它过分地相信，而是因为在西方的战争还拖着，德国和英国将长时间地被斗争困扰着，而我们就有可能从事自己的和平劳动并准备应付战争。

在原则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议论是对的。只是希特勒并没有想进行一场长久的战争！他想发动闪电式的袭击，在几个月内摧毁苏联并解决所有的问题。斯大林想，希特勒同他自己一样，是那么冷漠和深谋远虑，他不会为了征服俄罗斯而拿他取得的所有成果去

冒险。但是，希特勒的本性是不一样的：他相信，意志可以克服任何障碍。

希特勒认为，斯大林害怕战争，这是因为他把自己军队的整个指挥人员都摧毁了。在一次谈话中，希特勒轻蔑地指出，被派到德国出差的苏联将军在德国军队中只能指挥一个炮兵连。

斯大林真的害怕同德国人打仗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在战前变得好像更沉闷了。他更多地陷入沉思，他开始喝更多的酒，还把别人灌醉。真正的灌醉！我们彼此匆匆地议论，该怎样快一点结束这顿午餐或晚餐……在他那里午餐有时要进行到拂晓……伏特加和白兰地喝得很少。谁想喝，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喝个够。然而，斯大林本人午餐开始时喝一杯白兰地或者伏特加，以后就喝葡萄酒。但如果光是葡萄酒一连喝五六个小时的话，尽管是用小酒杯，那也是鬼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贝利亚说：

"应该快一点喝醉。当我们都喝醉时，我们就可早一点分手了。不然他是不会让走的。

"我知道这种气氛的出现是由某种似乎是压抑的心情造成的。斯大林看到了一种不可抵挡的巨流正在日益临近，无法逃避，而且他对能够征服这个巨流的信念已被摧毁……看来他的脑袋里想的尽是战争不可避免的问题，他无法抑制住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恐惧。于是他开始喝酒并把别人灌醉……"

1941 年 5 月 15 日，德国外交部负责商务的工作人员卡尔·施努尔起草了一份报告，他在其中指出："我们可以向莫斯科提出经济上的要求，甚至超出 1941 年 1 月 10 日条约的框架，提出比条约所规定的更多的、能保障德国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的要求。"与此同时，施努尔确认，德国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特别是在提供武器方面。帝国航空部没有提供所允诺的飞机。许多德国公司拒绝向俄罗斯派出为履行合同所需要的人员，因为大家都在谈论着即将来临的战争。

在这些日子里，舒伦堡给柏林发电报说："我和我的大使馆里的高级工作人员们一直在为对付德俄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的传闻而斗争，因为很清楚，这些传闻为德苏关系的继续和平发展制造了障碍。请你们注意的是，试图在莫斯科这里驳斥这些传闻将毫无成效，因为这些消息不断从德国传到这里来，每一个来到莫斯科的人不仅带来了这种传闻，而且甚至可以引用事实来证明。"

只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这显而易见的一切视而不见。情报机关通报了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地区集结的情况，说到了预定进攻苏联的日期，这都是明显的事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深信希特勒在虚张声势，只是试图迫使他们在领土上和经济上作出让步。他们准备好了塔斯社的声明，其中指出，关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似乎正在准备战争的传闻是敌对势力要的手腕。德国对苏联没有野心，两国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指望希特勒的回应，希望他也能确定他对苏联没有野心，这样就可以消除紧张气氛。但是柏林保持沉默，好像根本就没有塔斯社的声明。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塔斯社以最尖锐的方式驳斥了俄国在西部边界集结军队的传闻。这样看来，斯大林的惧怕是明显的。"

而在莫斯科，已到 1941 年 6 月，还在讨论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交换信件、安排他们的会见以及派莫洛托夫再次去柏林的主张。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通过自己的渠道再次得到关于德国人准备进攻的警告时，他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一个并不了解情况的人进行干扰感到有点生气，他说：

"是的，局势复杂，但是您根本不知道：这是在进行一场大游戏。"

这次谈话是在 6 月 21 日进行的——季米特洛夫记了日记。在战争开始前的几个小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在希望能要赢希特

勒！

6 月 21 日深夜，莫洛托夫邀请了德国大使并对德国飞行员不断侵犯国境表示抗议：

“要是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我们早已宣布最后通牒了。但是我们相信德国指挥部将结束这种飞行。”

莫洛托夫问舒伦堡：

“给人的印象是，好像德国政府对什么东西不满意。究竟是对什么不满意呢？难道不能谈谈清楚吗？苏联政府对关于德国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的传闻感到惊讶。而且我们还有情报说，德国大使馆人员的夫人和孩子们已经离开莫斯科。这与什么事情有关呢？”

舒伦堡大使试图解释他们的离开是与即将来临的炎热夏天有关，并答应将谈话的情况向柏林报告，他也立即这样做了。他还有什么可答复莫洛托夫的呢？舒伦堡早在 1941 年 4 月就给希特勒发过一封个人信件，试图用外交的方式提醒进攻苏联的危险。希特勒实际上回避了谈话：回到莫斯科之后，舒伦堡绝望地对自己的参赞希利格说：

“战争是木已成舟了。”

5 月舒伦堡和希利格邀请了那时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并试图提醒他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谈话没有成功。杰卡诺佐夫没有弄懂德国外交官们是冒着恐惧和风险进行这次谈话的，认为他们的话是试图煽动苏联政府去作出某种危险的步骤。

舒伦堡大使是个出色的职业外交官和非常有魅力的人。他在莫斯科生活了 7 年。1944 年希特勒下令处死他，是因为他参加了一批德国军官企图刺杀元首和结束战争的“七月二十日阴谋事件”……

6 月 21 日夜，舒伦堡收到了部长亲自从柏林发来的电报。其中说：

“1，收到本电报后，一切带有密码的材料应该销毁。电台应该拆毁。

2，请立即通知莫洛托夫先生，您有紧急事情要通知他，因此您想立即见他。

然后，请对莫洛托夫先生作以下声明：

‘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此时会收到帝国外交部长的备忘录，其中详细罗列的事实简要归纳如下……’”

在下面的几页中，苏联被指责进行反对德意志帝国的破坏活动，在德国边境集结军队以及同英国进行反德军事合作的会谈。文件是快手起草的，可是，在里宾特洛甫的部门里，谁也没有关心给它赋予最起码的可靠性：如果俄国已经注定要失败，还干吗要努力这样做呢？

清晨5点钟，舒伦堡来到克里姆林宫。他不得不等待着莫洛托夫的接见。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在斯大林那里。德国空军已经轰炸了苏联的城市，而地面部队已越过了边界。但是斯大林不想相信这是战争。

海军人民委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清晨3点20分向中央书记格奥尔吉·马林科夫报告了德国空军袭击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的情况。马林科夫疑心重重地听取了库兹涅佐夫的报告，并马上下令给他连接黑海舰队司令部，以便核实人民委员所讲的话。

当舒伦堡大使请求接见的时候，斯大林看来还闪过一丝希望：可能是希特勒要在边界上喧嚷一阵以便使自己的要求增加分量。莫洛托夫显得很累。舒伦堡看上去也好不了多少。莫洛托夫的副手谢苗·帕夫洛维奇·科济列夫后来说，德国大使的双手和嘴唇都在发抖。他对自己将要宣布的事感到备受煎熬。

舒伦堡开始宣读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它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苏联政府破坏了同德国缔结的条约和蓄意在德国为其生存斗争的时候从后方进攻德国。所以，元首命令德国武装力量使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对抗这种威胁。”

莫洛托夫问道：

“这是宣战？”

舒伦堡默默地朝天举起双手。里宾特洛甫曾命令大使“不要就这项照会进行任何讨论”。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气愤地说：

“德国侵犯了一个同它签订了友好条约的国家。这是史无前例的！苏联部队抵达边境地区只是为了进行夏季大演习。如果德国政府对此不满意的话，将此事通知苏联政府就足够了，是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的。德国没有这样做，却发动了战争……”

莫洛托夫最后是这样说的：

“这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莫洛托夫和大使相互握了手就分开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回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领袖那时相信舒伦堡会向莫洛托夫转交一份希特勒的政治、经济和领土要求的单子，并将有可能达成某种谅解。当莫洛托夫说德国已经宣战的时候，斯大林在安乐椅上瘫倒了。他没有力气向人民宣布，代替他在电台宣布战争开始的是莫洛托夫。他的声音显得干巴巴和单调乏味。

伊利亚·爱伦堡回忆道：“我们坐在收音机旁，等待着斯大林的讲话。代替他讲话的是莫洛托夫，他显得很不安。说背信弃义地发动进攻的话使我感到惊奇。当一个幼稚的姑娘抱怨说，她的情人欺骗了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可以期待什么呢？……”

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领袖呆若木鸡。根据目击者的话来判断，他无论如何都不能集中精力把握住国家的领导权。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我见到斯大林的时候，他给我留下了令人难受的印象：他神情恍惚地坐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看到领袖在精神上是完全垮掉了。他坐在卧榻式沙发上。我走近他，向他问好。他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看来是那样的冷漠和乏力。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在听任自然了，并且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我要说，他带着某种可怜的和祈求的眼神……我习惯于看到他表现的自信、他的脸部和眼睛显露的坚强

的表情。而在这里仿佛是一个行尸走肉的斯大林。只留下了斯大林的外表，而他的躯体里已完全是别样的内容了。”

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里主事的就是政府第一副总理、最老的政治局委员和完全是国内第二把手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了。那时沃兹涅先斯基开了腔：

“维亚切斯拉夫，你来打头，我们跟着你。”

但是，莫洛托夫没有足够的勇气，或者相反，他谨慎到了不敢追求头号人物地位的地步。斯大林看到谁也不想把他推翻，军队在退却，但在奋勇自卫，不久便恢复了常态……

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讲述道，已经到了战争结束时，在莫斯科经常举行招待活动的期候，斯大林在正式晚宴之后总要邀请大家到一个不大的电影厅看电影。使在场的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好几次要求放映电影《如果明天有战争》。一次被邀来看电影的人民委员和将军们彼此问道：

“今天要看什么片子？”

黑色冶金人民委员伊万·捷沃相调皮地笑了一下回答：

“最新片：《如果明天有战争》。”

这部在战前年代众所周知的电影，描写的是战胜德国的一次战争，战时德国无产阶级给红军提供了帮助。战争完全不是像银幕上表演的那样进行的，但是斯大林根本不在意这一点。当电影开始放映的时候，斯大林通常总是对在场的人重复说，战争开始时我们不顺利，因为希特勒是突然进攻的……可是，在银幕上发生的一切是他喜欢的。他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看这部电影。苏联军队在宽大的银幕上立即转入了反攻并在赶走敌人，在别人的领土上用少量的鲜血和强有力的打击消灭着敌人。

第一次失宠?

一位部长如果政策失败了，那就会让他下台。但斯大林不能为1941年的悲剧责备莫洛托夫，要不他就得承认，他自己犯了可怕的错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装出样子，好像一切都是正确的，然后若无其事地转向了不久前还在对之进行嘲笑挖苦的西方。

不过，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态度真的有了变化，但不是因为国际事务。只有在最高领导层才能看出这一点。在全国人民看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仍然是斯大林最亲近的人。

1940年3月9日莫洛托夫50寿辰的时候，所有的报纸登满了有关他的文章，活下来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叙述着莫洛托夫无数的革命功勋。彼尔姆市改名为莫洛托夫市。国家的地图上出现了三个莫洛托夫斯克、两个莫洛托夫巴德，还有莫洛托夫岬、莫洛托夫峰，以及无数开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街、工厂和集体农庄。但在现实中莫洛托夫在党和国家上层的地位改变了。早在战前斯大林就曾不失时机地向莫洛托夫表示，他不是战友，而是下属。斯大林示威般地申斥他，驳斥他的观点，而听取莫洛托夫副手们的意见。

1939年3月，莫洛托夫作为政府首脑在第18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家国民经济发展新的五年计划的报告。所有这类报告都是要事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确认的。

但是，第二天，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的决定：

“1）莫洛托夫在其报告中没有谈到讨论的结果和对提纲的主要修改和补充意见的分析，这是不正确的。

2）建议莫洛托夫同志改正这种状况。”

这是从未见过的找茬，党的上层不会没有注意到。

1941年5月斯大林解除了莫洛托夫政府首脑的职务，自己成

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为什么这样做？在这方面有着许多推测。多数作者一致认为，在战争前夕，斯大林想集中控制对国家的领导权。但实际上这是早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斯大林是一个独自决定一切的人。如果他爱倾听别人意见的话，其他人是能够给他提建议的。政府首脑同任何其他一个官员一样也是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示的……

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另一方面。斯大林让莫洛托夫担任政府首脑以便给自己帮忙是在1930年，那时在政治局还存在着持不同政见的残余势力，斯大林需要在关键的岗位上有可靠的工作人员。十年过去了，斯大林已经稳固地进入了神的行列。过去列宁担任过的政府首脑的职务，在形式上被认为是同总书记同级的职务。斯大林干吗还要在旁边留着一个同级的人物呢？

除此以外，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碰到过的局势也起了作用。自1939年秋天起，斯大林积极地着手推行对外政策。当然，世界上谁也没有对他的实际作用产生过误解，但是从礼宾的角度看，他什么人都算不上。而他已经考虑到可能要去国外。1941年春天，他和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地说：为什么斯大林不去一下柏林？当然，他如在国外，就只能作为政府首脑出现。

1941年5月4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加强苏维埃中央和地方机构工作》的决定，其中特别谈到：

“1，任命И. В. 斯大林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2，任命В. М. 莫洛托夫同志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对外政策领导人，并继续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3，鉴于政治局坚持斯大林同志继续担任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他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从事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解除其监察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职责……”

于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第一副手，而国防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博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

基成了他在政府中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被彻底地推到了次要的位置。

根据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说，早在战争期间斯大林实际上就解除了莫洛托夫的关键职务，但总是让他在自己身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常坐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出席所有的谈话。米高扬写道："从表面上看来，这为他树立了一种特殊的威望，但事实上斯大林是把他与工作隔离开来，看来，他对莫洛托夫并不完全信任：担心这个国内第二号人物的俄罗斯人会把他手中的权夺走。"

但是，莫洛托夫的表现就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8月底他为评估列宁格勒的局势来到列宁格勒，并得出了强硬的结论：伏罗希洛夫没有能力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在1941年10月最困难的日子里，当德国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时，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刚刚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莫洛托夫事先得到了关于德国坦克已突破战线的情报，而朱可夫还没有掌握前线的情况。莫洛托夫提高了嗓门说：

"您要么阻止住德国人的这次进攻，要么将被枪决！"

朱可夫试图对局势作出解释：

"别吓唬我，我不怕您的威胁。我开始指挥方面军还不到两昼夜，我还没有完全进入情况，还未彻底搞清楚，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话使莫洛托夫更加愤怒。

"这是怎么回事，两昼夜还不能搞清楚。"

朱可夫后来说，他当时的答复非常尖锐：

"如果您能比我更快地搞清楚情况的话，那您来指挥方面军吧。"

莫洛托夫扔掉了烟斗。朱可夫看来知道，他只应害怕一个人——斯大林。

莫洛托夫还带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研究了伊万·科涅夫所指挥的草原方面军的局势，责备他犯了各种滔天大罪，但是斯大林依旧

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他需要这些不仅拯救了国家、而且拯救了他本人的将军们。

同志们感觉到莫洛托夫的地位在削弱，还老想同他捣蛋。米高扬回忆说，1942 年，在斯大林那里谈到了生产坦克的问题，当时坦克十分缺乏。

贝利亚说：

“莫洛托夫管坦克。”

“什么？他管得怎么样？”——斯大林问。

“他同工厂没有联系，不领导具体业务，不深入生产方面的事务，而当马雷舍夫等其他人提出问题时，莫洛托夫就召集开大会。他们什么问题一讨论就是几个小时，可是作出的决定没有多大用处，实际上他夺去了那些应该处理业务问题的人的时间。”

于是斯大林把坦克生产的领导工作转交给了贝利亚。

一个像人的机器人

1941 年 5 月已开始实行外交等级制度，全权代表们开始被称为大使。6 月 22 日，苏联驻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大陆的所有大使馆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伊万·迈斯基任大使的驻伦敦使馆以及后来匆忙把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派去的驻华盛顿使馆成了外交活动的主要中心。在战争爆发前仅几个月，迈斯基在写给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详尽信函里抱怨说，实质上缺乏名副其实的工作：“我们在英国这里几乎像生活在被围困的要塞里。同苏联的一切正常联系都被切断了。半年收不到外交邮件……莫斯科的报纸我们要在报纸发出后两个月才收到，而且还不能经常收到，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电报机……

“我们苏联人的侨民区大约有 150 人，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暂时没有受害者。大部分家庭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离开伦敦

150—160 公里处的农村地区，那些留在伦敦的人集中呆在早在去年冬天由全权代表处盖的两个掩蔽所里：分别在大使馆和苏联学校附近……

“白天，我们努力正常工作——一般地说这还能做到。晚上，我们去大使馆的地下室，如果袭击不太猛烈的话，我们在那里继续工作。如果袭击太猛，我们就跑到掩蔽所，在那里除了一个大的公共用房外，还有四个小的地下工作室。我们在掩蔽所里睡觉——不脱或者不完全脱掉衣服。黎明时分，当警报拉响“平安无事!”的信号时，我们便各自回家，脱掉衣服在自己的床上继续睡完剩下的觉……”

同英国的关系已被冻结，迈斯基晚上无事，便写了关于自己革命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录《暴风雨来临之前》。

6 月 22 日整个苏联的外交有了 180 度的大转弯。昨天的朋友、盟友和伙伴变成了敌人。应该把昨天的对手变成盟友。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第一个作出了友好的姿态。6 月 22 日他发表了广播声明：

“我们将向俄国人民和俄国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英国人能够喘口气了。希特勒进攻俄国表明，德国军队登陆英伦诸岛的行动已被取消或至少被推迟了。

美国还没有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但罗斯福总统也声称，它将帮助成为侵略牺牲品的苏维埃俄国。

6 月 27 日，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紧急回到莫斯科。同他一起来的有军事和经济代表团。前不久是克里姆林宫主要敌人和嘲讽对象的英国人变成了它的主要盟友。斯大林接见了克里普斯，双方谈到了向红军提供它所需的军事技术和装备问题。6 月 30 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人民委员会编写了所需物品的单子。结果单子上罗列了一大堆：飞机、坦克、高射炮、反坦克枪、铝、锡、铅、钢、磷、呢

绒、小麦、砂糖……而且这一切要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得到，在这段时间里，转移到东部的工业企业还来不及开工。

莫洛托夫的新任务是建立反希特勒联盟。他应该同那些他不信任的和他认为是本国敌人的人达成协议。而且西方的政治家们一点也不相信莫洛托夫。但是，必须团结一致反对希特勒，这比什么都重要。

1941 年 7 月 12 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同英国的协议，其中谈到在同希特勒的战争中的相互帮助，也有不单独媾和的义务。代表苏联方面签字的有斯大林、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和海军人民委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

但是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实际上什么也帮不上苏联。所有的资源都在美国人手里。在战争的年代里，苏联外交政策中的美国方面第一次被提到了首位。

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增加了人员——不仅有外交官，而且还有情报人员。在美国原来就已经有军事和战略情报机关的情报点在工作，现在又出现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一（情报）局单独的情报点。莫洛托夫在驻华盛顿使馆中设了一个技术信息部——它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在战争期间，大量情报官员打着苏联采购委员会和《美国贸易股份公司》（在这些公司的苏联员工有 5000 人）的旗号开展工作。美国反间谍机关的工作对象只是敌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以，苏联的情报人员能够相对自由地开展工作。除了政治情报外，他们还大量收集生产新武器所必须的图纸和工艺。有时他们能够上手。但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命令联邦调查局不要碰苏联的情报人员，或者至少不要把事情闹大。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纽约情报组长 Г. Б. 奥瓦基米扬被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当场抓获，但他被允许悄悄地离开。空军副武官 П. Ф. 别列津上校和 К. 奥夫钦尼科夫少校 1941 年 6 月 10 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他们被允许留下

来。以使馆三秘为掩护的情报机关工作人员 B. M. 扎鲁宾 1944 年被联邦调查局备案，但他得以不事声张地离开。

一位曾经是苏联情报员的人告诉我，在战争期间以及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美国陆军部，如果办公室的主人不在的话，他们就打开他的书桌和满不在乎地拿任何文件来看。苏联官员作为盟友和朋友到处受到欢迎。

1941 年 11 月 7 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关于将苏联也包括到实行租借法案的国家中去的命令。这一法案允许出租或者借贷武器、军事技术、战略原料和食品。按那个时期的物价计算，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的供货大约相当于 100 亿美元。

英国和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争先恐后地来到莫斯科。建立了反希特勒统一战线，需要谈定的事情很多。

战争年代成了对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严肃磨炼。这是需要进行艰难、痛苦谈判的年代。英国人和美国人当然不希望希特勒战胜苏联，但是也不急于提供帮助。它们运去了武器、技术、粮食，但不想过早地让自己的士兵去冲锋陷阵。莫洛托夫为了有步骤地从盟国求得经济援助和武器供应以及要求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使出了浑身解数。1942 年 5 月，他飞抵英国，握了丘吉尔的手。尽管英国人感兴趣的似乎是见见曾经握过希特勒手的人，但莫洛托夫在建立反希特勒联盟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在他在同他所不信任的和他认为是自己国家的敌人的人谈判。这是一种各有盘算的结合。

莫洛托夫的外国语不怎么样，但他注意地听着译员，有时同译员争论，说他译错了。译员们耐心地解释说他们的翻译是正确的。他过去的助理弗拉基米尔·叶罗费耶夫是这样描述莫洛托夫的会谈风格的：

“他讲那些他认为需要讲的话。如果对方有人反对他，列举一些理由，试图说服他，他就把一切从头开始重复一遍。就这样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了莫洛托夫：

“一个有杰出才能和冷漠无情的人。我从未遇到过比他更符合现代机器人概念的人了。尽管是这种情况，他看来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经过精细雕琢的外交官。进行需要慎重处置和审时度势的、艰难的会谈时，他表现出有十足的耐心、城府很深，能够保持场面上的那种彬彬有礼。从未暴露过任何漏洞。从未出现过没有必要的半点直言……

他的微笑带着西伯利亚的冷漠，他那经过周密斟酌和通常是聪明的话语，他客气的风度使他成为苏联政策理想的表达者……同他就争论问题互换信件总是无益的，总是以谎言和侮辱告终。”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说：“莫洛托夫是一个出色的官僚。从他孜孜不倦地追寻自己的目标说，可以称他为老练的外交官。斯大林制订政策，莫洛托夫将它付诸实施。他像拖拉机一样地耕地。我从未见过莫洛托夫采取什么巧妙的策略。正是他的固执使他达到了效果。”

莫洛托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他不是应该在谈判桌上使对手着迷以及赢得朋友和盟友的外交官。这些事情是由斯大林这样一个天生的演员来做的。他和斯大林的谈判纲领是预先编订好的。斯大林让他先出场，莫洛托夫以自己的固执搞得对手火冒三丈。那人完全失望，认为一切都完了，而这只不过是战斗侦察。经过这样的先期加工之后，高贵的外国客人便被带去见斯大林。

要进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所在的楼道大门，必须有专门的通行证。但是对谁也不检查，也不搜查。然后是一排穿廊式的房间，这里是秘书处，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房间以及总有几个人坐着的卫士的房间就在这里。卫士长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将军在门边的安乐椅上打着盹。

在斯大林同外国人会谈的时候，莫洛托夫沉默着，有时斯大林会转向他，叫他“维亚切斯拉夫”，建议他谈谈自己的观点。莫洛托夫总是说，斯大林会谈得更好。外国人实际上是在抱怨莫洛托夫。而和善的斯大林好像在对他们作出让步。

那时的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回忆起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是如何同情地问他：

“您觉得莫洛托夫难以相处吗?”

他还建议如果在会谈中出现难处的话，可直接去找他。艾登还回忆说，斯大林真的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不难想象，斯大林只是利用了事先设想好的备用方案。但是，斯大林的善解人意给天真的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同莫洛托夫是无法谈成的，而同斯大林则可以。他的女儿回忆说，在接见重要的外国客人时，领袖变得极其亲热，殷勤好客，这一点绝对会使所有的人神往……

只有不多的外宾懂得他们在与谁打交道。未来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战争期间为解决共同对付德国的问题来到了莫斯科。将军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什么人。斯大林给他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习惯于充满阴谋的生活，隐瞒自己脸上真正的表情和自己内心的感情起伏，不为幻想、慈悲、真诚所动，习惯于在每个人身上看到障碍或危险. 他充满了诡秘、不信任和固执。不管斯大林是沉默还是说话，他总是低垂着眼睛，他不停地用铅笔描着什么象形字……”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与这样一些天真的人们打交道，对他们真是不骗白不骗。来自西方的客人自己也乐于上当。1944 年 5 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一个极力崇拜苏联的人，来到了马加丹。他的访问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边疆区局局长谢苗·戈格利泽是贴近贝利亚的人中的一个，他也到了马加丹。远北建设总局主任后来往莫斯科发密电向贝利亚报告，说副总统非常满意此行：“在他的陪同和我们的同志们在场的情况下，他在同我和戈格利泽同志谈话时这样说：

‘我们在美国听说过远北建设总局并知道这是家大托拉斯。在这里我们到了远北建设总局之后，我们确信了这一点，我们应该说，像这样从事这么多的、各种各样性质的工作的强大托拉斯，美国还没有……’

我认为华莱士及其陪同们感兴趣的下一个问题是参观犯人营，但是因为他们不仅没有看到犯人营，而且甚至还没有看到个别的犯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感到很失望……”

“在告别时华莱士对我说：

‘我希望战后远北建设总局将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这将进一步巩固美国和苏联的友谊……’

在参观艺术展览的时候，华莱士喜欢两幅画，他表示希望能购买它们。在与戈格利泽同志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把它们送给他。华莱士非常感谢地接受了这两幅画……”

远北建设总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在建设工地上干活的是犯人们，但没有给美国人看犯人，于是他们就觉得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犯人，关于在苏联的迫害行动的说法是过分夸大的。

在饥饿的战争年代，政府和人民委员部对外宾的接待给人留下了的印象是慷慨和讲究。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1943 年 11 月 7 日，莫洛托夫在斯皮里多诺夫卡的别墅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参加者有政府官员、穿着刚刚开始实行的外交官礼服的苏联外交官员、胸前挂满了勋章的将军、作家、演员和记者们。美国记者赞叹地对爱伦堡说：

“八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在莫斯科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联盟！”

在正式的午宴和招待会上，人们相互以最友好的方式祝酒。1944 年 10 月，在莫斯科接待了丘吉尔和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英国大使克尔在招待会上开玩笑地说：

“我研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行为并发现，当斯大林对什么东西不满意时，他常常抽烟斗。但最近斯大林不再抽烟斗了，他抽起了烟卷。所以我应该能找到新的特点来确定斯大林的状况，而且我找到了。当斯大林对什么东西不满意时，他用手把鼻子往上撑，把它弄皱。而当莫洛托夫先生不满意时，他经常把夹鼻眼镜取下又戴上。我有一次对莫洛托夫先生说到了这一点，他现在开始对自己的

夹鼻眼镜更谨慎了。而我就变得更难观察莫洛托夫的状况了。”

但是，克里姆林宫里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仍然同过去一样。政治局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从前线给斯大林写信说：“我怀着极大的兴致读完了您的答记者问。这是对盟友们的一次应有的教训，轻轻地打了他们一个嘴巴。我们在这里流着血，而他们却在说着大话，用好话来敷衍了事，而且什么也不做。不能用过分客气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语言来掩盖他们的空谈，而应该让我们的和他们的人民知道真相。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您都是这样做的——扼要、简明、坦率和完美。”

1944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密洛凡·吉拉斯来到莫斯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他并与他像与自己人一样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谈话。斯大林感兴趣的是关于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的复杂关系问题。他问莫洛托夫：

“我们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向英国人进言，让他们承认铁托这个惟一在实际上进行反对德国人斗争的人吗?”

莫洛托夫微微一笑——微笑中带着嘲讽和沾沾自喜：

“不，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完全了解已在南斯拉夫形成的各种关系。”

斯大林转而对吉拉斯说：

“也许您以为我们忘记英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丘吉尔是什么人吗？英国人最高兴干的事是危害盟友。而丘吉尔，他是这样的一人，你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天哪，从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罗斯福可不是这样的人——只有为了更多的东西他才会把手伸进去的。而丘吉尔——只为了一个戈比也会这样干的。”

吃晚饭的时候，谈话还在继续进行。吉拉斯很快就感觉到了，斯大林在吃喝时就会活跃起来，情绪就会变好。斯大林问，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娶了谁。当吉拉斯说他娶了希腊公主时，斯大林开玩笑说：

“那维亚切斯拉夫，如果我或者你娶某个外国公主的话，这样做可能会有什么好处吧？”

莫洛托夫笑了起来，但十分克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莫洛托夫不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吉拉斯后来回忆说。“如果同斯大林谈话，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攀谈起来就轻松和直爽，莫洛托夫甚至在私人谈话中都是滴水不漏的。

“无法追踪到莫洛托夫在想什么，也无法追踪到这个想法产生的过程。他经常是矜持的和含糊的……莫洛托夫总是毫无情感流露，总是一样的表情……斯大林的冷漠和算计并不亚于莫洛托夫。然而斯大林是个有激情的人，有着许多不同的面部表情，而且每一种表情都是那么令人信服，似乎他从来就不装腔作势，而总是在真诚地体验着自己充当的每一个角色。”

“您还是个拍马屁的人！”

斯大林在战争年代又重新珍视莫洛托夫罕见的工作能力和可靠性了。1942 年 8 月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负责苏联人民委员部全部工作的苏联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主席”。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了 1946 年他再次失宠被黜。1943 年莫洛托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而后还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历史部的荣誉院士。

莫洛托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占了整个一层楼：带有长桌的会议室、本人办公室以及带有浴缸和床的休息室。在休息室的小桌上放着一瓶花、一碟核桃仁和一盆水果，这些水果是每周数次用飞机从南边的共和国运来的。他不喜欢喝酒。他不会放松自己，而当你的身后老是跟着卫士的时候，要在生活上放纵一下也有些难。莫洛托夫喜欢散步，经常在沿着克里姆林宫院子散步时讨论一些问题。睡前半小时他读些书。半夜里他步行去斯大林那里汇报，并带着疲倦和恼怒回家。据他的助手瓦连京·别列日科夫说，如果斯大林不赞

同他的建议的话，莫洛托夫会表现得非常神经质。那时他就会阴沉着脸，此时最好不要撞见他。莫洛托夫很少是在确知斯大林本人已经去休息之前离开办公室的。所以，他的工作日要到清晨3—4点钟才结束。

土黄的脸色是某种疾病的标志，但莫洛托夫的身体状态很好，而且健康得让人吃惊。他只要头一碰枕头，便能闪电般地入睡，这种能力拯救了他。有时，他对自己的助手们或者警卫队长说：

“我去躺一会儿。15分钟后叫醒我。”

应该严格地在规定的时间里叫醒他。他做很多工作，而且干得十分满意，浏览一大堆官僚主义机构制造的文件。首先，莫洛托夫要批阅急需答复的文件。然后是来自斯大林的函件（它们转来的时候是没有拆封的）、侦察情报、大使们发来的已经解译的密电。

他的助手们在其他文件中或者划出最主要的段落，以便他能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或者把同一话题的文件夹在一个文件夹里，并别上文件的目录——它们来自何人及其简要内容。他阅读报告单，但如果他对哪个文件感兴趣的话，他可从文件夹里取出它来。对于每个需要答复的文件，助手们附上了解决的方案。通常莫洛托夫接受他们的建议并在解决方案上签字。

他是个非常井然有序的人。他的一切都是按照钟点精确计算好的，而且文件也是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放在桌上的。根据莫洛托夫的助手们所说的，他能很快地抓一切，关心细节并记住它们——他有极好的记忆力。莫洛托夫也能听取与他自己看法不一致的意见。

莫洛托夫亲自写他的讲话稿。先写出讲话的提纲，然后用清晰和明确的语言口述。他把讲话稿发给助手们，要求他们提出意见。而且他听取意见时总是对所提的意见感到不满意，但也会考虑其中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会发出第二稿、第三稿。到了第四次征求意见时，大家一般就没有什么意见了。那时他就愤怒地说：

“你们怎么搞的，不读我给你们的文件？”

他完全是一个极端爱挑剔的人。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

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贾丕才回忆说，莫洛托夫在每一次会议上是怎样训斥负责日本、朝鲜关系的外交官的。一次，那位外交官忍不了，乞求地问道：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您每次只训斥我？难道我是所有人中间最笨的一个吗?”

莫洛托夫嘟哝着说：

“因为您是惟一一个多少还明白一些事理的人。”

他说起话来不慌不忙，很有分量。他会口吃，特别是当他激动或者生气的时候。他是个粗暴的和尖刻的人，但不会出言不逊。最多会说：

“您不是工作人员，而是一条鲱鱼（意为窝囊废——译注）。”

他绝对禁止他的所有工作人员提到他们是在莫洛托夫身边工作的。认为这是在利用其职权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不喜欢拍马屁的人。当他训斥什么人的时候，他的声色就会改变，会发出不悦耳的金属声。

“那您同意我所说的吗？我说的对吗?”

“您总是说得对的，”——由于没有经验害怕得直打哆嗦的外交官说。

“啊，您还是个拍马屁的人!”

他看重其下属在会谈中熟识细节和坚忍不拔的品质，所以很赏识未来的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他要求非常简单扼要的汇报。不喜欢幽默。同他在一起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弗拉基米尔·叶罗费耶夫说：“他与人格格不入。只称呼大家的姓。他让那些有病的人回家时常说：成年人不应该让自己感冒。他不认为人应有什么爱好。一天深夜，我们一边等着他从斯大林那里回来，一边下着象棋。他回来看到我们在下棋，就嘟囔着说，他只是在监狱里才做这些事。”

据米哈伊尔·贾丕才说，莫洛托夫有时也会流露出一些人情味来。在斯大林死后，他对贾丕才说：

“您可知道，贾丕才同志，在1948年，有一次，我不得不救您免遭很大的不愉快？贝利亚给了我一张年轻外交官的名单，其中也有您，他提议逮捕这些人，因为他们策划了反对我的恐怖行动。贝利亚是根据外交部的某个叫谢苗诺夫的职员的供词说的。我说这是一派胡言，勾掉了全部名单。”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幸运。他对自己的助手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科夫、一个非常有天赋、前程远大的人，却不想保护。关于这一点，莫洛托夫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把他撵走去做记者的工作，因为契卡人员报告说，他的父母曾同德国人一起呆在后方。在基辅地区的什么地方。也许这是道听途说，但来了报告、通知，我无法去检查。我立刻把他派到《新时代》杂志社去了——你在我们这里没什么可干的。我甚至没有告诉他原因，因为鬼知道他是什么人！契卡人员报告的是机密，你又能做什么呢！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住在基辅的别列日科夫父母陷入了敌占区。当红军临近这座城市时，他们躲了起来，因为老别列日科夫战前被监禁过，后来又放出来了。他不想冒险去等着再次遇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科夫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他们是50年代在国外去世的。

但那时，在1944年，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对此一无所知。他只认为自己有义务报告说，在基辅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

莫洛托夫说：

“您马上向我报告，您做得对。这种事情不能拖。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基辅的呢？”

“这我不知道。也许是德国人把他们赶走的？”

“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我想，他们会被找到的。您继续工作吧。”

但是，1945年1月2日，莫洛托夫紧急召见了别列日科夫并说，从贝利亚的书面报告中得知，他的父母自己跟着德国人去了西

方。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在莫洛托夫那里工作已不可能。别列日科夫从保险柜里取出了所有自己的文件，把它们交给了莫洛托夫的另一位助手。当他走出斯帕斯克大门时，值班军官说：

“有命令要收回您的通行证。”

很多年别列日科夫一直被认为是失宠的人，在他的身上有着某种阴影……

战后的世界格局

当红军胜利地进入欧洲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得以迫使西方接受自己的条件。1944 年 1 月，在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给各加盟共和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授权并为此将外交人民委员部从全苏机构改为联邦一共和国的人民委员部》的法令。1944 年 2 月，修改了苏联宪法，各加盟共和国获得了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同它们签订协议和甚至互设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权力。

这个突然的决定本身具有某种历史基础。革命后，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得到了从事外交活动的权力。直至 1923 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都还有其独立的外交代表机构。

后来，在苏联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权代表处留下了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参赞们，他们是相当独立的，服从自己的首都。联盟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抱怨他们，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对外事务被承认是莫斯科的特权。

1944 年对宪法的修改绝不意味着回到先前的自由放任。在各加盟共和国里出现了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但它们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正在讨论关于建立联合国的问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想出了这些主意，是试图让苏联所有的共和国都能进入未来的联合国，

以便加强自己在那里的阵地。

1944 年 8 月 28 日，在与美国和英国外交官们会谈时，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称，“列入第一批联合国成员国名单的应该有全体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非常惊讶。罗斯福总统对此答复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美国的 48 个州全部吸收进联合国。但是，华盛顿竭力遮盖这些分歧。美国人担心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传播开来，德国人会觉得盟国之间发生了纷争，而这会使战争拖延。

1944 年 9 月 1 日。罗斯福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函，指出苏联的建议使联合国的成立受到了威胁。斯大林答复罗斯福说，对于苏联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就其居民数量和政治意义来说超过了某些国家”。

美国人起先把苏联的这一建议当作是一种“耍脾气的姿态或不成功的玩笑”。实际上，在这里可以看出一种蛮横无理的外交风格：为什么不试试，如果突然能行呢？最后还是达到了部分目的。

1945 年 2 月，丘吉尔和罗斯福来到雅尔塔，讨论了战后的世界格局问题。莫洛托夫提出了妥协性方案。莫斯科撤回关于吸收全部 16 个共和国的要求，但请求吸收三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或者至少吸收两个。在克里米亚会议的秘密记录里，美国和英国同意支持接受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入未来的世界组织。

世界上不知道这个秘密协议。罗斯福和丘吉尔还须说服自己的下属们和国内的舆论。与此同时，1945 年春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命令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团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美国人没有料到这一点，并试图制造障碍。他们说，只有在联合国本身建立之后，这两个共和国才能被这个组织吸收。但是，葛罗米柯尊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不参加会议，会议的工作简直就停了下来。威胁和最后通牒起了作用——1945 年 4 月 27 日决定允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首批成员国。

警察四人组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共同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是盟友和战友。他们互相交换贺词和友好信件，就共同的战略和未来欧洲的新格局进行会见和谈判。他们被称为三巨头。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他们甚至是志同道合者。

而实际上只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才把他们联合在了一起。他们互相之间疑心重重。

在所有这三个巨头中间，温斯顿·丘吉尔是最守旧的政治家，他还抱着业已消失的不列颠帝国的理想不放。尽管他有他独有的傲视其他人的习气，但他还能深深地被一些崇高的感情所打动。丘吉尔很容易对与他合作的人产生感情上的依恋，有时甚至对斯大林也有这种感情。

丘吉尔对俄罗斯和对斯大林的态度似乎不太稳定。他忽而劝罗斯福制定统一的反对俄罗斯的战略，忽而去莫斯科就战后瓜分东欧势力范围问题进行谈判。当斯大林支持他的想法时，丘吉尔欢欣鼓舞地回到伦敦并于1944年10月在下议院宣布：

“我们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紧密、合意和诚挚。”

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是一个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人。至今美国的研究人员还没有最终搞清他。小小的诡计和崇高的原则在他身上能以最难以置信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不管他的举止是多么有礼貌，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爱好。他一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从未被别人抓到过话柄。在俄罗斯，对罗斯福的态度要明显地比对丘吉尔的好，后者的名字是同十月革命后协约国的干涉连在一起的。罗斯福的讲话被广泛地登载在苏联的报刊上，而且受到人们以最友好的方式作出的评论。

那斯大林呢？……英国人和美国人还需要摆脱把他看成是希特勒的盟友和志同道合者的习惯，对于他们来说，斯大林在战前两年间就是这样的人。当希特勒进攻俄罗斯时，只有丘吉尔立即在6月22日的那天晚上声明主张同俄罗斯结盟。其他的英国政治家们——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既不相信俄罗斯的诚意，也不相信俄罗斯的能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同希特勒的战争中得到了一个盟友。

美国人准备帮助英国人，但无论如何不会帮助共产党俄国。况且起初美国人还不相信俄罗斯能够抵抗住德国军队。在整个战争年代中，美国人对俄国一直抱有这种双重态度。

斯大林怀疑盟国准备与希特勒单独媾和。直至战争结束之前，他一直害怕德国人还是会同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在西线投降，并把所有兵力投向东线来对付红军。斯大林不能忘记，希特勒在党内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在战争前夕到了英国。党内二号人物想同英国缔结和约。而英国人从赫斯那里得到了莫洛托夫1940年11月写给德国大使舒伦堡的信，其中谈的是不惜损害不列颠帝国的利益来瓜分世界。这个文件给英国人留下了沉重的印象。

这些伙伴们称自己是“联合国宣言的签字国”。英国和美国称自己为民主国家，苏联更喜欢“反希特勒联盟国家”这个称呼。

斯大林感兴趣的只是：击溃希特勒。除此之外，他希望世界承认新的苏联边界，也就是说，要把由于瓜分波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而合在一起的领土算在内。丘吉尔、罗斯福在德黑兰同意了这一点：波兰应该靠取得德国的领土来得到补偿。

在战争末期，在三大盟国的光辉外表的背后，猜疑越来越重了。一方面，罗斯福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说：“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地相信，我们大家所祈祷的新的一天的朝霞已经来临……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对我们能够与俄罗斯人一起和平生活、搞好关系产生过丝毫疑问。”另一方面，东方

害怕西方的巨大胜利，而西方则害怕东方取得太大的胜利。苏联的制度和西方民主在原则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戴高乐将军作为刚刚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国家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和未来的法国总统，1944 年 12 月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被斯大林着实吓了一跳。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正式会谈之后，斯大林开始为每一位在座的人祝酒。他对空军司令员说：

“你领导着我们的空军。如果你对飞机使用不当的话，你自己知道，等待着你的将是什么”。

斯大林转而对红军后勤部长说：

“后勤部长的责任是给前线供应物资和人员。好好地去做这些事，不然的话，你将按我国的做法被吊死。”

结束祝酒的时候，斯大林对他说到的那个人叫喊道：

“过来！”

元帅或将军急忙跑着走近斯大林去同他碰杯。法国客人等晚宴一结束便马上离开了那里。斯大林在为戴高乐送行时阴沉地看了一下莫洛托夫的助手、翻译鲍里斯·波采罗布，突然对他说：

“你知道得太多了。我想把你送到集中营去。”

戴高乐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与自己的伙伴们走了出来。在门口回头张望时，看到斯大林孤独地坐在桌旁。他重新在吃着什么。”

关于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聚在雅尔塔瓜分了世界，或至少瓜分了欧洲的议论，这些全都是神话而已。如果不举行雅尔塔会议的话，欧洲还是会在战后被分成东、西欧，即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欧洲的。

实际上 1945 年 2 月初在雅尔塔究竟发生了什么？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确定了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日期。他们议论了战后的德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通过了德国的各占领区的划分，讨论了战争赔偿问题。他们就恢复法国大国作用问题达成了一致。还议论了关于成立联合国的问题。讨论了波兰的前途、它的政府组成和未来的边界。大家对波兰的态度是最傲慢的。当讨论要给波兰多少

德国土地的问题时，丘吉尔说：

“给波兰鹅喂那么多德国饲料，让它消化不良，这就太可怜了。”

厚颜无耻和鄙视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不仅仅成了斯大林的特权。

1944 年 11 月丘吉尔到刚刚被解放的巴黎去见戴高乐。英国首相说：“俄国是一个饿了好长时间的大牲口。今天不可能不让它吃个够。但是问题在于要它不把整群牲口都吃光。我正在尽力使斯大林的要求适可而止。顺便说，斯大林即便是胃口很大，并没有失去理智。此外，吃过之后就要消化。到了该消化食物的时刻，俄国人的艰难时刻也就来临了。那时，上帝的仆人尼古拉也许会让那些被食人者腌制起来的不幸孩子们起死回生。”

那又怎么样？是丘吉尔本人提议斯大林瓜分东欧的。这件事早在雅尔塔之前，在 1944 年 10 月就发生了，那时，丘吉尔来到了莫斯科。丘吉尔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交给斯大林一张纸，在上面用百分比表明了苏联和西方在欧洲各国的势力范围。

丘吉尔认为，在希腊，英国有权得到 90％的势力范围。给苏联剩下的是 10％。在罗马尼亚则相反，苏联的势力范围应该占绝大部分。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英国和苏联应该势力均等。在保加利亚，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应该占优势——75％对 25％。

一些人认为，英国首相迈出的这一步是试图在中东欧为西方保留一些阵地的英明之举。其他人则认为，这是用地球仪决定全球人民命运的可耻习惯。

斯大林那时同意了和丘吉尔一起瓜分势力范围。果然，第二天，莫洛托夫就试图与自己的英国同行安东尼·艾登讨价还价，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修改百分比。他们讨价还价地搞了一整天，但数字仍然虚无缥缈。

美国人对这个交易极其不赞同，所以没有达成协议。对欧洲的瓜分是通过苏军的向前推进产生的。

在雅尔塔，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确定了以正在进攻的苏联军队为一方、以盟国军队为另一方的双方应该停止行动的界线。战后，这条划定的界线就变成了欧洲的分界线。但是，摧毁纳粹分子的双方军队应该停止前进的这条界线，将成为民主停止存在的界线，这一点西方当时是否能够预见到呢？

在雅尔塔，还通过一个关于欧洲国家民主改造的条件的宣言。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同意按照苏联的模式来改造被红军解放的国家。但也许他们应该更有远见些，并懂得将要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

斯大林对自己党内的同志们说：

“这场战争不同于过去。谁占领了领土，把军队开进去了，他就在那里培育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不是这种情况。”

当戴高乐将军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他从与斯大林的谈话中懂得，“苏联满怀信心地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决断来对待它的军队占领的任何国家和领土”。

从雅尔塔会议回来后，三巨头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自己是胜利者。美国人得到了苏联同意加入对日战争和成立联合国的保证。英国人得到了恢复法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和扩大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形成的波兰政府的版图的保证。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西方伙伴是意志薄弱的伪君子，对他们可以施加压力，并可以用空洞的保证来换取自己要达到的目的。雅尔塔会议的参加者并不明白，他们是在多大程度上互相欺骗和自我欺骗的。

雅尔塔会议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半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开始说，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是不成功的。罗斯福总统认为，战后应该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避免胜利者之间的角逐。他打算在战胜希特勒之后立即从欧洲撤出美国军队。

1944 年罗斯福给丘吉尔写信说：“我求您不要请求我把军队留在法国。我就是不能这样做！我应该让他们回家。我拒绝对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实行庇护：您应该教育和惩罚自己的孩子们……

我不希望美国挑起改造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的重担。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距这些地方有三千多海里远。”

罗斯福在同莫洛托夫谈话时说，战后将留下四个警察——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它们将监视剩余的国家。罗斯福鄙视法国。将只允许这四个国家拥有武器。罗斯福根本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他，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派，看来寄希望于在东欧进行自由选举。丘吉尔更明白苏联的情况，但他知道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他已经懂得了苏联外交的原则：已经是我们的东西应该继续是我们的，其余的可以通过谈判来得到。

罗斯福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位维持战后和平事业中的伙伴。如果他确信斯大林不是他所想象的那种人的话，罗斯福就会成为斯大林的对手。但是，4 月 12 日罗斯福就逝世了，离战争结束只差一个月。哈里·杜鲁门成为新总统，他无论对斯大林，还是对俄国，都不怀有好感。

白宫中的新人

罗斯福的逝世使斯大林感到担忧。一位熟识的和在某些方面同他的思想接近的总统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取代了，对他的情况只了解一点，那就是他在 1941 年曾经说过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分子互相残杀。

在同莫洛托夫第一次谈话时，杜鲁门就请求将他对俄国人政策的不满转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说，谁都还未曾这样同他谈过话。杜鲁门回答说：

“请履行你已签署的协议，那么就不会有人这样同你谈话了。”

莫斯科确认美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了，虽然改变的只是政策的风格。斯大林把归还俄国在 1904—1905 年俄日战争中失去的全部权利、恢复在旅顺口的军事基地以及把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管理权

交给苏联作为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

1945年夏天，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国人不想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苏联的军事基地。斯大林对中国人说，他需要这一切只是为了在将来遏制日本：

“日本将不会毁灭，即使是它将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话。凡尔赛之后，大家认为，德国站不起来了。过了15—20年，它得到了恢复。日本也将会是这种情况，即使迫使它屈服的话。”

他解释苏联需要千岛群岛和海上的军事基地的原因时说：

“我们是封闭的。我们的舰队没有通向太平洋的出口。需要让日本从各方面都不堪一击：从北部、西部、南部和东部。我们还需要大连和旅顺口，为期30年，以防日本恢复力量。我们可以从那里打击它。”

罗斯福接受了斯大林的全部条件，并开始劝说中国迎合莫斯科的要求。但是到1945年夏天的时候，对苏联参战已经不那么关心了，而且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这种关注实际上已经消失。斯大林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催促军人们，他担心日本在苏联参战前就投降。

8月16日，当日本人停止抵抗时，斯大林给杜鲁门致函说，理智的做法是让苏联军队接受日军在北海道岛屿的北部的投降。但是，看来杜鲁门预料到这块领土将会永远被苏联控制，于是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

8月22日，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被迫取消了早已准备好的将苏军派往北海道的作战行动。

美国总统根本就拒绝像在德国发生的那样，把日本划分为占领区的方案。尽管根据最初的计划，曾设想要把日本的北部划归苏联军队控制。甚至要把东京分成四个区——美国区、英国区、中国区和苏联区。于是，斯大林瓜分日本和在其领土上建立某个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想法落空了。

别墅小聚

斯拉夫人米洛万·吉拉斯被带到斯大林的别墅里，这是一种特殊信任的标志。吉拉斯懂得斯大林设晚宴的意思：“这样的晚宴通常要延长到六个小时甚至更多小时——从晚上九点钟至早晨四五点钟。他们不慌不忙地一边吃喝，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从开玩笑、讲笑话一直转到最严肃的政治甚至哲学话题。这样的非正式晚宴反映了苏联大部分政策的真正面貌，它们就是斯大林的单调和忧郁生活中最通常的和最合适的消遣方式和惟一的奢侈享受。”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有许多东西使吉拉斯感到困惑。迫使大家大量地喝酒，还有苏联领导人的毫无教养。吉拉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不无厌恶地写道，他与莫洛托夫是这样一起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同时去厕所的。还未走到厕所的时候，莫洛托夫就开始解裤子，他用这样的话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我们把这个称为载重前先减负！”

吉拉斯来自农村，参加过游击队运动，这种不讲究的习气让他感到很不自在。

在晚宴的某个时刻，斯大林站了起来，拉了拉裤子，好像要去参加战斗或是去挥拳打架，几乎兴高采烈地喊道：

“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将能恢复元气，然后再从头来！”

吉拉斯写道，在他的话里有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要知道可怕的战争还在继续……

1945年春天，莫洛托夫通知自己在人民委员部的下属说，应该解除契切林在1925年12月签署的、同土耳其的友好和中立条约。3月19日条约被声明废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重新提出了要求获取尚在战前他们试图在希特勒的帮助下得到的东西。他们要求

土耳其把苏联根据1921年的友好和联盟条约放弃的土地交给苏联，并允许苏联武装力量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可以为黑海舰队打开通向地中海的自由出口。

1947年1月，斯大林在他那里召集了关于军事造船业的会议。他说：

“最好是在黑海拥有两艘带有12英寸口径大炮的重型巡洋舰。那时土耳其人就会比现在吓得更发抖了。”

莫洛托夫告诉费利克斯·丘耶夫说，“斯大林开始有点骄傲起来，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只得提出米留科夫[①]的要求——达达尼尔海峡！”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

“施加点压力！以共同拥有的方式。”

莫洛托夫试图反对说：

“他们不会给。”

“你去试试！”

有人给斯大林的别墅送来了苏联地图。斯大林用图钉把它钉在了墙上并说：

“我们看看，我们获得了什么……在我们的北部，一切都顺利、正常。芬兰非常对不起我们，于是我们就把边界从列宁格勒移开了。波罗的海沿岸——这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土地！——现在重新是我们的了，白俄罗斯人目前在我们这里一起居住，乌克兰人也在一起，还有摩尔达维亚人也在一起。西部的情况正常。”

他转而谈到了东部边界，说：

“我们这里有什么？……千岛群岛现在是我们的，萨哈林完全是我们的，看呀，多好啊！旅顺口和大连是我们的，还有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正常……就是在这里我不喜欢我们的边界，”——斯大林说着并指着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

① 米留科夫，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译注

斯大林逝世后，1953 年 5 月 30 日，苏联政府专门发表声明取消了所有的要求。然而两国关系被破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土耳其于 1952 年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在它的领土上出现了带有核弹头的美国导弹。同土耳其的关系只是到了 70 年代才得到了改善。

与伊朗的关系也变得尖锐了起来，战争期间曾在它的领土上部署了苏联部队。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求给苏联在伊朗北部开采石油的租赁权。1946 年春天，签署了关于建立苏伊石油合资公司的协议。但是，伊朗众议院没有批准这个协议。除此以外，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帮助下，在南阿塞拜疆煽起了“民主运动”，希望能把这个省从伊朗那里夺过来并将它划入苏联的阿塞拜疆。

杜鲁门对苏联的行为、对它不愿从伊朗撤军感到不满。总统给自己的国务卿写信说：“如果俄国不碰上铁拳和强硬的语言的话，就会爆发新的战争。我对过分地照顾俄国人已感到不耐烦了。”

美国的强硬路线迫使斯大林把部队从伊朗撤了出来。只是在 10 年之后，当 1956 年夏天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同伊朗的关系才得以恢复。

阿列克谢·列昂尼德维奇·沃罗宁大使回忆起，那时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是怎样发表了不寻常的祝酒词的。

赫鲁晓夫说：“我们不需要伊朗的石油，我们自己的石油就足够了。谁需要石油，就让他去伊朗购买吧。至于伊朗阿塞拜疆命运的问题，这里不允许有任何干涉。这是伊朗的土地，它应该属于这个国家，是它的组成部分。”

国王在致答词时说，赫鲁晓夫拔出了伊朗体内的最后一根刺，现在，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开始了……

使斯大林感兴趣的还有非洲。当讨论到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的命运时，莫洛托夫在同美国人的会面时要求把对其中的一个——的黎波里塔尼亚，即现今的利比亚的托管权交给苏联。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说：‘施加点压力！’我被授权提出了把这个地区划归我们的问题。让在那里居住的人留下来，但要使他们在我们的控

制之下。”

美国人不同意，于是斯大林没有得到在非洲的殖民地。那时莫洛托夫开玩笑说：“如果您不想让给我们一块意属殖民地的话，我们能拿到比属刚果也就满足了。”

刚果有着已探明的铀储量。第一个原子弹已经爆炸，所以，铀已变得比金子还珍贵。

口袋中的原子弹

核武器变成了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美国人提议放弃对核武器的垄断和把对原子能的生产和利用的整个控制权转交给联合国。斯大林不接受这个想法，他认为最好是创造自己的武器。在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一个月之后，在 1945 年 9 月的伦敦外长会晤上，美国与苏联这两个不久前的盟国的关系明显恶化了。

当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向莫洛托夫说出自己的要求时，人民委员感兴趣地问道：

“难道贝尔纳斯口袋里没有原子弹吗?”

“您不了解南方人，”——贝尔纳斯回答说，“我们在我们的口袋里装着大炮。如果您不停止你的狡辩，如果你不让我们干正事的话，那我就准备把原子弹从口袋里取出来，那时您就会挨原子弹了”。

莫洛托夫和他的译员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想把一切都变成笑话。

莫洛托夫在正式的午宴上再次回到了炸弹的话题上：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贝尔纳斯先生所说的话，因为美国人是惟一掌握原子弹的国家。”

而事实上他完全不想关注美国的立场。那时人们也把莫洛托夫说成是“不先生”，他不接受盟国的一切提议。伦敦的报纸写道，

“莫洛托夫把战时在我们国家中积累起来的对俄国的善意的巨大信任感都不聪明地挥霍掉了”。在战争年代里，苏联在千百万西方人眼中几乎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西欧人都很难习惯于想象，现在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不是德国，而是苏联。

1945 年 12 月 3 日，英国驻苏联大使阿奇博尔德·克尔写信给自己的部长说，对德国的胜利使得俄国拥有了安全感，但是“后来出现了原子弹。一个原子弹的打击就破坏了似乎已经确立起来的力量均衡。当俄国感到似乎一切都可得到时，西方阻止了它。三百个师实际上失去了任何价值”。

在联合国大会例行会议上莫洛托夫发表了讲话，这次讲话在那时看来是很吓人的：

“不要忘记，为对付一方的原子弹，另一方也可以找到原子弹，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到那时，某些自鸣得意但没有远见的人今天所有的一切计谋都将最终破灭，这一点将会变得最明显不过。”

根据莫洛托夫本人的话，斯大林后来对他说：

“啊，你是强者。”

1945 年 12 月，国务卿贝尔纳斯抵达莫斯科。莫洛托夫在午宴时想起了美国人的笑话并试图发挥一下：

“几杯酒之后我们可能要研究一下我的秘密，并检查一下我的口袋里有没有原子弹，以便把它从那里取出来。”

大家都站起来干杯，突然，对祝酒词极其不满的斯大林插话说：

“为了科学和为了美国科学家们，为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干杯。这是个严肃的话题，不好开玩笑。我们现在应该为了把这项伟大的发明用于和平目的而一起工作”。

受屈辱的莫洛托夫甚至在脸上没有任何变化。斯大林驳斥了他的玩笑和承认了原子弹的严肃性。按照美国人的观点，斯大林在贬低莫洛托夫的时候明显得到了满足。

政治与福音书

斯大林想把东欧变成可靠的缓冲国，以便使俄国能够免受进攻。红军进驻的所有领土应该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做到了这一点。

在雅尔塔会议上，西方领导人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特殊利益。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1943 年 12 月 12 日）、南斯拉夫（1945 年 4 月 11 日）、波兰（1945 年 4 月 21 日）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1948 年，与战线另一方的参战国又准备好了一批友好互助条约，这是与罗马尼亚（2 月 4 日）、匈牙利（2 月 18 日）、保加利亚（3 月 18 日）、芬兰（4 月 6 日）的条约。

东欧完全处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了。但这完全破坏了苏联和西方的关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错误地估计了 1941 年的希特勒，也错误地估计了 1945 年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为美国的强大而感到骄傲，并相信美国的使命是成为全人类的自由和进步的明灯。

斯大林不能明白，美国人如果在东欧没有自己的战略利益，为什么这样关心那里的局势。他不认为道德和法律是政治范畴。

当杜鲁门引用福音书的时候，美国人懂得他所指的是什么。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在政治中引用道德标准要么是毫无意义的，要么就是要滑头。当美国复员自己的军队，美国外交官的抗议在斯大林看来就失去了任何说服力。斯大林连想也没有想到，美国人对在波兰或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自由选举的关心是真诚的。在他看来，对于抽象原则的忠诚是如此荒谬，以至他简直无法相信美国人，并在他们的行为和言论中寻找另一种含义。

1946 年 2 月初，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译电员伊戈尔・古津科逃到了西方。他告诉加拿大警察，苏联谍报机关为了制造自己的核

武器是怎样偷窃原子弹秘密的。这使美国人更加相信，苏联打算借助于原子战争来完全占领欧洲。

1946 年 3 月 5 日，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富尔顿市在杜鲁门在场的情况下发表了讲话。他谈到了斯大林用铁幕把东欧与欧洲大陆的其余部分割开。丘吉尔提议团结一致来对抗苏联的扩张。

为了掩盖自身的弱点——国家被完全破坏——斯大林极力地硬充好汉。他鄙视地说：

“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脆弱的人的，但是它们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他表演得如此令人信服，结果西方相信了他。莫洛托夫用其富有进攻性的和强硬的言论将美国变成了最凶恶的敌人。西方拒绝承认苏联的西部边界，即不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领土和东普鲁士的一部分（现今的加里宁格勒州）与苏联的合并。欧洲的分裂开始了。

莫洛托夫把同西方的关系看作是一场斗争，认为在这场斗争中软弱是不能饶恕的，让步是绝不可能的。由此而来的是放弃灵活性和妥协。而且，他准备去进行任何一种厚颜无耻的交易，如果他和斯大林感到这种交易是有利的话。

波兰流亡政府向莫洛托夫打听：“1939 年被你们俘虏去的军官们到哪里去了?”那时，波兰人重新成了盟友。部分波兰人同红军在一起战斗，其余的前战俘被允许离开了苏联，他们已与英国人在一起作战。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答复说，失踪的波兰军官朝着中国方向的什么地方逃跑了……他竟能这样粗野地回答，是因为他深信任何波兰移民再也不可能回到华沙掌权。新的波兰政府只能是亲苏联的。

莫洛托夫的外交丧失了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自由。这甚至压根就不是外交了。莫洛托夫同留声机一样，重复着同一种公式。要与他在一起争论去寻找互谅和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协是不可能的。他在会谈中是离奇地顽固，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直至疲惫不堪，战斗到最后

一颗子弹。他是在尝试了所有办法，甚至包括中断谈判的威胁之后，才会作出让步。由于莫洛托夫所固有的墨守成规以及他那怪癖的和少有的固执性格，同他打交道是艰难的。他向来是个干巴巴的、尖酸刻薄的和令人腻烦的人。

外国外交官们说，同莫洛托夫是不可能谈成任何积极的结果的。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莫洛托夫罕见的固执性格。在国内有一个人是能够作出决定的。如果这个人给莫洛托夫下命令的话，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不能脱离开这个决定一步。他能否生存下来要取决于能否巧妙地完成斯大林的指示。

对于斯大林来说，莫洛托夫是个难得的人才。他非常完美地适合斯大林的外交。他努力地回避着新措辞和新鲜的思想。他不喜欢任何新的东西。这甚至使葛罗米柯都感到吃惊，虽然他本人也是这样的人。但是莫洛托夫对新词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他的教条主义使他的助手们也感到惊奇。安纳托利·多勃雷宁对我说："他是否相信过共产主义的胜利，这很难说。但是他是通过为共产主义而战去看待一切的。他在访美期间说，美国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在那里，共产主义将要比在其他国家来得早……美国人的情绪急剧转变了。他们不再信任俄国了。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未懂得过西方民主。他们更容易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打交道。"

1946 年杜鲁门政府出台了美国对外政策纲领：美国要承担起保障苏联会对其构成威胁的所有民主国家的安全的全球使命。美国人开始从这样一点出发，即他们认为苏联是与西方民主国家敌对的国家，不领会西方的安抚政策，并十分固执。对此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和可伤心的，要明白这就是客观现实。所以，只有坚决地遏制和顶住苏联对全世界所施加的压力，才能对抗莫斯科。只有等斯大林的政策得到改变之后才可提议转向谈判和合作。

1947 年 2 月，英国政府为了节约，停止了对土耳其和希腊的援助。杜鲁门为了不使这些国家让斯大林吃掉，决定对它们提供援助。美国人等待着苏联军队进攻土耳其。而在希腊，游击队员一共

产党员们已经起来反对政府，他们得到了来自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援助。

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 1947 年 2 月在和国会议员会面时提出了新的政策："在世界上只剩下了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自罗马和迦太基对抗的时期以来，世界上就没有过这样的力量两极分化。对于美国来说，采取措施加强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或者共产主义阴谋威胁的国家，就等于捍卫美国自己和捍卫自由。"

杜鲁门在 3 月 12 日致国会的信函中宣布了对抗苏维埃专政的政策是自己的学说。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被看作是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全球激战的一部分。

为了与莫洛托夫讨论局势，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抵达莫斯科。莫洛托夫讥讽地笑着说：

"总统试图吓唬我们，试图一下子就把我们变成听话的乖孩子。而我们不去理会他。我们坚决推行自己的原则性路线。"

发现部长逝世

1948 年 2 月的日子不仅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整个欧洲的命运。在从德国军队的手中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与其他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从前的领导人回到了那里，他们是：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和共和国奠基人托马什·马萨里克的儿子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

贝奈斯和马萨里克设法既同西方大国也和苏联处好关系。在布拉格组成了由共产党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的联合政府。似乎在克里姆林宫的旁边可以存在多党制民主。但这维持了没有多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定参加美国人为恢复欧洲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但是，斯大林对马萨里克说，如果捷克人珍惜与苏联的友谊的话，他们应该拒绝马歇尔计划。他们听从了。现在斯大林再也不需

要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了。除此之外，共产党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支持。莫斯科决定要改变局面。于是不久便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非共产党员的部长们要求讨论外交部和特别是国家安全局的活动，后者是由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和顾问们控制的。共产党员们不想向任何人报告任何有关国家安全机关活动的情况。于是，2 月 20 日，非共产党员部长们提出辞职。他们认为，哥特瓦尔德会像民主国家通常采取的办法那样，将不得不举行新的选举。好幼稚的人啊！

共产党员们把自己的拥护者们带到街上，并开始建立工人警察队。哥特瓦尔德决定组织清一色共产党人的政府。贝奈斯总统作了抵抗。哥特瓦尔德威胁说要加强工人警察并邀请苏联的坦克。2 月 27 日，贝奈斯投降，国家的整个权力转到了共产党人的手里。这是国家政变。

3 月 10 日，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被发现死在其住宅的窗下。官方的说法是自杀、内心崩溃和无力应付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和在西方谁也不怀疑：部长是被抛到窗外的。他是被苏联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杀死的，他们在布拉格作威作福，并牢牢地控制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们。

小马萨里克全心全意地渴望同莫斯科紧密合作。但是他妨碍了掌握国内政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们。由于他的国际威望和响亮的名字，简单地让他辞职是困难的。马萨里克部长的死解决了这个问题。

苏联战胜了捷克斯洛伐克，但赢来的却是它注定要输的“冷战”，尽管这场战争带来了一切牺牲。

1948 年布拉格的政变在西方产生了恐惧心理，担心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会不会也出现。两个月后，1948 年 4 月，欧洲国家通过布鲁塞尔条约这个防御联盟联合在了一起，这个联盟的宗旨是抵抗各种推翻民主政府的图谋。不久以后便出现了北大西洋条约组

织。

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之后，杜鲁门把“B－29”轰炸机派到了欧洲。它们还不能装载核武器。但这是一个信号。杜鲁门那时对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说，如果一旦有必要的话，他将下令使用核武器。从这一时刻起，开始在靠近苏联领土的地方建立基地。

几年之后，在一次中央全会上，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在回忆这个时期时说：

“在斯大林逝世前的最后年代里，对于我们来说，国际局势非常严重。我们在与西方大国和美国的关系中是站在了战争的边缘上。”

1949 年 3 月 4 日，莫洛托夫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正如通告中所说的那样，这是由于必须集中力量领导苏联部长会议。而在事实上，这是走向预先策划好的逮捕和审讯的第一步。

第五章

维辛斯基：总检察长

令几代苏联人惧怕的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是惟一一位差不多被所有了解他的人咒骂的外交部长，而他本人也许从来不承认生活中的一切甚至生命本身都归因于自己几乎独一无二的大公无私的善举。

年轻的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党内化名尤里——于1908年在巴库坐牢时，与其同一牢房里有一位样子十分忧郁的布尔什维克。证件上他的名字叫盖奥兹·尼扎拉泽。同一牢房的人给他起名叫科巴。真正的姓则是朱加什维利。他给党的报刊写文章用的是笔名斯大林。服刑期间，他用一段时间学习当时在革命者中流行的人造国际语言世界语（这并不妨碍他后来把使用世界语者作为外国间谍加以消灭）。

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和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频频争论，但政治上的分歧没有影响完全的同志关系。年轻的妻子经常从家里送来转交维辛斯基的好吃的和丰盛的东西，维辛斯基就给科巴一些东西吃，增加点营养。科巴高高兴兴地吃着，吃得津津有味，说真的，连谢谢的话都不说。这个同一牢房的人谢谢的话都不说一句没有得罪孟什维克维辛斯基——他本人意识到科巴有着多么复杂的性格。

1908年11月4日，维辛斯基服满4个月刑期后获得了自由。17天后斯大林也离开了监狱。他的刑期比较长。他被流放去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期限为3年。过了10年他们又相遇时，

维辛斯基既没有吐露半句话也没有作出暗示来提醒斯大林，他似乎欠着维辛斯基的人情。这就救了他，使他得以免遭不幸。

如何分鲱鱼？

安德烈·维辛斯基 1883 年 11 月 28 日（旧历）生于敖德萨。小男孩 5 岁时，全家搬到了巴库。其父亚努阿里·维辛斯基是药剂师，自己开了一家药店。

维辛斯基是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各方面都有天赋的年轻人。他在中学时学习很出色，华尔兹舞跳得很漂亮，在中学的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同她生活了一辈子。中学毕业后，他到基辅大学法律系学习。他的一本传记是由作家和法学家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撰写的，写得很精彩。

维辛斯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随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他被大学开除。他返回巴库并参加了 1905 年的革命，甚至成了工人战斗队的成员，惩罚与警察合作的人。

维辛斯基参与了对两名警察挑衅分子的暗杀行动。他两次被捕，但对他的审判所依据的是一条罪责很轻的条款——“公开发表反政府演说”。后来当他自己成了检察官，他就未再重犯沙皇的法院审判的错误，他从未仅仅因为侦查没有取得罪证，而让被告不判处坐牢、进劳改营或者处决。

服满刑期后，维辛斯基就若无其事地回到大学继续学习。他做律师的时间不长。不过他曾当过全国著名的法学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马良托维奇律师的助理。

二月革命后，维辛斯基的政治热情和演说家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了。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他成了莫斯科亚基曼斯基区第一警察管段的警官。后来这个区里成立了管理局，维辛斯基即被选为亚基曼斯基区管理局第一地段的主任。他也是市杜马成员，经常在群众集

会上发表讲话。

就在那个时候，帕维尔·马良托维奇同意出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兼俄罗斯最高检察官。他在这两个岗位上总共才呆了1个月——到十月革命为止，但是却发布了一道使他后来付出了自己生命代价的命令。

1917年10月，亚基曼斯基区管理局主任维辛斯基，像所有其他地方政权的领导人一样，收到了一个由马良托维奇签署的命令："彼得格勒侦查局决定必须逮捕因7月3日和5日彼得格勒武装暴动案被指控的乌里扬诺夫一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据此，责成你如在你的辖区内出现此人必须立即执行本决定。并把随后情况及时报告。"

维辛斯基下令在本地区内张贴了这则通告，他没有想到后来在一生中为这一行动而责骂自己。

应当说，马良托维奇本人没有参与对列宁的迫害。他仅仅按照司法程序的陈规签署了一个命令：列宁不知去向，对他进行过搜查。马良托维奇签署的这个命令丝毫也没有损害列宁心目中对他的看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位著名的法学家是尊重的。不仅抓契卡工作，还管工业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请马良托维奇到自己身边在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中工作。

但在1937年开始了另一个时期。有人还是想起了马良托维奇。他作为前临时政府的部长遭到逮捕。这一职务本身就构成了犯罪要素，更不用说那个有名的逮捕列宁的命令了。被捕者请求其前助手维辛斯基给予帮助，但维辛斯基没有作出回应。马良托维奇于1940年被枪决。

十月革命后，维辛斯基的政治前程似乎已结束。维辛斯基当时加入孟什维克是大大地失策了。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而孟什维克迅则即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忘却了政治，躲了起来，改行做起了供应工作。由于老熟人的关系，他得到了一份普普通通的、但在饥

饿时期却是非常重要的差事——领导莫斯科铁路枢纽的物资科。有人在那里把农民运到城里出售的粮食加以没收。后来他当上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分配局局长。

1919年11月，维辛斯基在第一次全俄分配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发言，他说：

“如今在分配方面没有必要遵循全人类的公正原则……我们正在从平均分配原则过渡到阶级分配原则。”

在结束讲话时，维辛斯基引用了一句，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格言式的妙语”：

“我们把鲱鱼身段供给工人，而把鲱鱼尾巴留给资产阶级。”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本人虽然没有挨过饥饿，但是一直在恐惧中胆战心惊。

维辛斯基仍然是孟什维克党党员，布尔什维克没有吸收他。但是当年同一牢房的一位难友过问了这件事，布尔什维克最终于1920年2月吸收了他。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在对斯大林的关系上找到了恰当的说话语气，他对斯大林总是带着恭敬和钦佩的表情只用“您”这个词，丝毫也不提以前同他的友好和平等的关系。这正是斯大林所喜欢的。对那些毫无保留地领悟和承认他的伟大和崇高的人，他是颇为赏识的。

维辛斯基胆子大了起来，他请求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任用他去做司法方面的工作。起先他被选为首都辩护人（律师）委员会主席，但为人辩护，使人免遭不公正对待，这不是他要走的人生之路。不久，他就成了俄罗斯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委员会检察官。

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位水平高的、知识渊博的、很有口才的检察官。他还从事教学工作，很乐于去讲课。其后他被任命为国民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

1925年，学术委员会选举维辛斯基为莫斯科大学校长。当时教授中谁知道他们是在与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啊？3年之后他被

正式任命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和职业教育总局局长。

拉姆津教授案

1928年，开始进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高加索特派员叶夫根尼·叶夫多基莫夫“揭露”一个工程师的“破坏组织”的诉讼程序，维辛斯基的名声在这一诉讼案中轰动了全国。契卡人员肯定地说，这些罪犯奉巴黎的指示在沙赫特市（罗斯托夫州）进行了破坏活动。

斯大林任命维辛斯基为特别审判庭审判长。俄罗斯联邦检察官、老布尔什维克、红军第一任总司令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被指派为公诉人。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不喜欢法官在苏联司法制度中所起的无足轻重的作用（判决是事先就定好的）。他本人愿意成为起诉人、揭发者，成为大家都要屏气凝神地倾听他的讲话的人，在诉讼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打断检察官克雷连科讲话的机会。

维辛斯基轻率地摈弃了他的老师在大学里教他的一切，他在帕维尔·马良托维奇的律师事务所里所看到的一切。他毫不犹豫地无视一切法律原则。“沙赫特案”审理后他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特别写道：“苏联的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最重要的机构，应当以国家和经济的合宜性的考虑为出发点，而且始终以此为出发点。”

1930年，他再次主持了对“工业党案”的特别审判庭。这是第一个因被告对自己的罪行完全供认不讳而震惊世界的诉讼案。在“沙赫特案”审判中，被告还试图进行辩护，证明自己有理。1930年11月11日，莫斯科各报就反革命组织“工程师团体联合会”（工业党）一案公布了内容详尽的起诉书。被告中最有名的是著名的热力工程专家、列宁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参与者列昂季·康

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教授。

看了由俄罗斯检察官尼古拉·克雷连科签署的起诉书后，苏联人得知契卡人员终于查出了一个组织国内所有破坏活动的中心。工业党联合了“分布在各工业部门中的所有单个的破坏组织，不仅按照前俄国和外国资本家的国际组织的旨意、而且还按照法国统治阶层和总参谋部策划武装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直接指令进行活动。”

破坏分子的活动是由俄国工商金融联盟从国外领导的，它设在巴黎，是“革命前工业巨头的一个联合组织，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为收回他们原先的企业而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政治斗争。”工商金融联盟的领导人杰尼索夫和特列季亚科夫被列入了将在推翻苏维埃政权后组建的政府工商部部长候选人名单中。

主要被告拉姆津教授说：“特列季亚科夫说，如果利用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军队和弗兰格尔的军队——约有10万人，武装干涉就将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按照很多前企业主的意见，只要南方和北方得到海军的支援，即使军队不多也可指望取得胜利……”

但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编造的。工业党诉讼程序开始之前，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已经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两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非常清楚地知道，被克雷连科说成是破坏活动主要中心的工商金融联盟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它也从来没有搞过破坏活动。

在工业党案审判过程中，苏联情报机关一名工作人员曾在巴黎会见了特列季亚科夫，后者十分惊讶地对他说：

“我应该提请你们注意，你们正在犯错误。工商金融联盟没有进行你们硬加在它身上的那种活动。请相信，要把这样的大笔金额寄给工业党成员，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先生们，请问从哪里来这些钱啊？要知道，不仅是我，甚至像杰尼索夫这样的人，现在生活都很苦，都不能挣钱糊口。我要告诉你们，我与‘工业党案’毫不相干，我在诉讼开始之前甚至没有听说过工业党。”

“您与这些人中谁也没有见过面?”

“没有,”特列季亚科夫回答说,“我在你们的报纸上读到,那些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经常给我写信,但这完全是他们臆想的结果。总而言之,你们对法国策划的干涉感到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白利安总理是和平的拥护者。究竟谁会对你们动武?南斯拉夫?不。意大利?它在欧洲的这一地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德国?在目前形势下也根本不可能。捷克斯洛伐克?不。又有谁呢?有谁呢?……”

人们在国外非常惊讶地注意到,“工业党案”的所有被告人,尽管在诉讼过程中没有提出一个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却都承认他们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

被告们按照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编制的脚本行动,描绘了“危害分子”大规模破坏国家经济的情景,为斯大林制造了够他用几十年的冠冕堂皇的托词。

在大学生时代,我遇见过一些记得工业党诉讼案的长辈,他们都意味深长地摇头说,像拉姆津教授这样一些危害分子使国家遭受了多大损失。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极力讨好契卡人员的教授被赦免了,又回去做他心爱的工作,甚至于1943年因他取得的学术成果而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领袖的信任

维辛斯基因善于主持案件诉讼而受到的奖励不久就来了。1931年5月,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俄罗斯联邦检察长的职位,并几乎立即当上了俄罗斯司法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是克雷连科。两年后维辛斯基又当上了苏联副检察长。

维辛斯基是个天生的法学家,很有学识,各方面都很有天赋,有惊人的记忆力,有演说家的口才。他在专业人士和广大群众中都很有名气。他的办公室在普希金广场检察院大楼5层。阿尔卡季·

瓦克斯贝格写道：30 年代初，任何人都可以去见维辛斯基。他倾听来访者的诉说，指示要把情况了解清楚。但他不管政治案件。

韦尔纳茨基院士[①]曾试图挽救他的朋友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沙霍夫斯科伊公爵。这位朋友是地方自治运动活动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临时政府国家救济部长。革命后他在国家计委工作。他被捕的时候已是 70 开外的人了。韦尔钠茨基给维辛斯基写信说："他所遭遇的事情完全是源自于我们国内所形成的那种局势，这种事情，我们中任何人，包括您和我，都同样有可能很容易地碰上……"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内心深处无疑是赞同韦尔钠茨基的。他和大家一样，夜间常常由于急促刺耳的门铃声而哆嗦，但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不愿意去干预国家安全事务。沙霍夫斯科伊被枪毙了，但他的亲属得到通知说，他被判处不得与人通信的 10 年徒刑。韦尔钠茨基向贝利亚提出请求，请他给予从宽处理。这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通知韦尔钠茨基说，沙霍夫斯科伊实际上已"在遥远的集中营里因心内膜麻痹"而死亡。

而维辛斯基则步步高升。他越来越博得斯大林的喜爱。

1933 年 8 月，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理了全苏农业机器制造联合公司、乌克兰共和国农业机器制造总局、全苏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和"公社社员"工厂的前工作人员案，他们被指控不成套地发走联合收割机。苏联副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以公诉人的身份提出起诉。他在讲话中还说：

"不管是什么机关，不管领导这些机关的是什么人，我们应该揭露那些确实是黑暗的地方，这些黑暗之处说明在某些十分重要的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度中存在着很多不良现象。我说的首先是以农业供应局为代表的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我说的是以全苏农业机器制

---

① B·韦尔纳茨基（1863—1945）苏联科学家，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放射地质学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译注

造联合公司为代表的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

有权威的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雅科夫·雅科夫列夫愤怒了。斯大林不在莫斯科，他们仍要求在政治局谴责维辛斯基的言论。8月24日，政治局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谴责了维辛斯基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为对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进行不正确的指控提供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由卡冈诺维奇起草，莫洛托夫审定。

获悉这件事后，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应，为维辛斯基辩护。8月29日，他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信说："从卡冈诺维奇的来信中得知，你们认定维辛斯基发言中的有一个地方是不正确的，那就是他指出了人民委员们在供应和接收不成套的产品方面负有责任。我认为这样的决议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供应和接收不成套的产品是极严重地违反了中央的决议，对这件事情人民委员们也不能不负有责任。可悲的是，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未能经受住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官僚主义的责怪。"

9月1日，谴责维辛斯基的政治局决议被撤销。但是斯大林怎么也不能放下心来。他再次给卡冈诺维奇写信说："非常不好和危险的是，您（和莫洛托夫）没有能够制止住谢尔戈在有关不成套的联合收割机问题上的官僚主义的冲动，你们把维辛斯基做了他的官僚主义冲动的牺牲品。如果您这样来教育干部，您那里党内就不会再有一个诚实的党员了。真不像话。"

他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也讲了这件事："谢尔戈对维辛斯基的胡闹我认为是流氓行为。你怎么能对他让步？"

问题不在于对斯大林说维辛斯基比奥尔忠尼启则更亲近。斯大林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在他不在的时候商妥什么事情，团结一致，保护他们中的一个人免受批评。他需要政治局委员们都感到自己是有懈可击的。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惩办和宽恕什么人。政治局委员们自己是无权赦免自己的。

反对司法人民委员的检察长

不管事情看起来是多么奇怪，但维辛斯基在30年代初曾经是加强法律权威的主要拥护者，并从事过司法机关的改革。

维辛斯基的同事们依然坚持，政治上的合宜性比法律规范更重要。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论证说，法官应当依靠革命嗅觉。但是他们没有察觉到，时代已经变了，国家、法庭、法律消亡的思想已被当作“左倾冒进思想”而受到批驳了。

知识渊博得多、脑子敏锐得多的维辛斯基已经看到，斯大林需要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权机关的具有良好组织的司法检察系统。为了实行专政，斯大林也需要依靠法律的力量。关于这一点，研究苏联司法制度的美国研究工作者彼得·所罗门写道：“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谈论法制的巩固和法律的胜利。在现实中，法律必须成为政权的工具，成为领袖手中可靠有效的工具。维辛斯基向斯大林表示检察机关愿意效劳，而领袖也就开始依靠检察机关。”

在20年代，在维辛斯基之前，检察机关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部门。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要求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积极地抓刑事案件——检查侦察员的工作，出席法院开庭和对审判员提出指控。检察机关被赋予了新的职责——对预审和法院审判是否符合法律进行监督。就是说，检察机关被置于法院之上。

维辛斯基使检察机关摆脱了各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的监督。斯大林允许检察机关监督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他感到重要的是，当宪法已在形式上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的时候，需要造成国家完全法制化的表象，而实际上是要达到政权所需要的那种目的。维辛斯基所关心的是要使国内的镇具有合法的表象。内务人民委员部表面上未经检察官批准无权逮捕人。但是检察官们不能拒绝契卡人员的任何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通常什么证据都没有。维

辛斯基找到了一个办法，命令检察官们：

“把法院审理中没有足够证据的案件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会议去研究审理。”

很多人欣赏维辛斯基发表的要求大家严格遵守法律的言论。实际上，维辛斯基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思想：镇压必须用法律来掩饰。斯大林和维辛斯基都明白，任何写入法律的人权都不会妨碍政府去做它认为需要做的事情。

1935 年夏，他当上了苏联检察长，第二年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奖励一座别墅

斯大林责成新任检察长主持了臭名昭著的对“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审判案。

为自己受到信任而感到骄傲起来的维辛斯基，对一些前政治局委员、列宁的朋友、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元老，对他多年来一直对之极其尊敬的一些人，都提出了指控。这些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一切都取决于被告的供词。当然，他们都被制服了，因为他们只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活下来。但是，如果他们能在法庭上，有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否认自己的罪过，审判就会破产。

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写道，维辛斯基是用自己的脑袋来担保审判的成功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是，维辛斯基却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做到了：使全世界的人（少数除外）都相信被告确实有罪。来到莫斯科的法律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们都相信，诉讼程序是完全合法的，苏维埃国家有权惩处自己的敌人。辩护人说，只有在被告否认自己有罪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提出异议。但这些被告都心甘情愿地承认有罪，使检查官们无事可做。维辛斯基首先设法取得被告的供认，他这样做是对的。他书写或重写起诉书，并根据起诉书要

求侦查员从被捕者那里拿到需要的口供。他常亲自进行审问，他非常清楚，被告没有任何罪过。但这根本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只有一个人敢于破坏规定了的场景。前副外交人民委员、前中央书记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在法庭上突然宣称他不承认自己有罪：

"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不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参加者。我不知道有这个集团。我也没有犯任何一项归咎于我本人的罪行。尤其是我不承认自己在与德国情报机关联系方面有罪。"

侦查员们和维辛斯基对克列斯京斯基做了一夜的工作，以致第二天他服服贴贴地一切都承认了。曾主持列福尔托沃监狱卫生所工作的医生于1956年作证如下："克列斯京斯基接受审讯后被送来我卫生所时已不省人事。他遭到了毒打，他的整个背上伤痕累累，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维辛斯基的起诉书是这样结束的：

"决不能饶恕阴险狡猾的敌人。全体人民一看到有关这一令人憎恶的暴行的公告就十分震惊。全体人民都感到不安和愤怒。我作为国家公诉方的代表要把自己的国家公诉人的义愤填膺的呼声汇入千百万人的怒吼声中！……我要求枪毙这些疯狗——全部枪毙一个不留！"

维辛斯基请求把前中央书记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别墅交给他用，而谢列布里亚科夫正是根据他签署的逮捕证被逮捕的。而且，在逮捕之前，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常到谢列布里亚科夫家去做客，并对别墅大加赞扬。犯人的财产应当没收归国家，但国家决定，看在维辛斯基的面上可以破例。检察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了装修，尔后维辛斯基就迁到了被他害死的人的别墅里居住。

1939年是维辛斯基走运的一年。1月份他当选为"法学理论"专业方面的科学院院士。他担任了法学研究所所长并主持了《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在3月份举行的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安德烈

·亚努阿里耶维奇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1日，最高苏维埃免去了他的检察长职务，任命他为主管文教事务的政府副首脑。

在政府中，维辛斯基的职责并不复杂——大部分是一些当代表和做检查的工作。例如，1940年8月（在发生有关影片《生命法则》的丑闻之后），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组成了“新电影审看和上映”委员会，成员中有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政治局委员兼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和维辛斯基。

他有了空闲时间，做了很多科研工作——撰写了他一生中的一本主要著作《苏维埃法律中的诉讼证据理论》。1947年因这本书他被授予一等斯大林奖金。他论证说，最重要的是取得被告人的供认。正如他写的，这是“证据之王”。维辛斯基为他的部下提供了解决难题的办法——他们不可能弄到没有发生的罪行的证据，但是学会了进行逼供。维辛斯基的著作为契卡人员的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

1940年，维辛斯基又接到一项任命——出任副外交人民委员，从而成了莫洛托夫的双料副手，即既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又在人民委员会成为莫洛托夫的副手。

人们通常认为，由于公开的诉讼程序已经结束，就没有必要让维辛斯基再呆在检察长的岗位上了，所以就决定安排他去做外交工作。问题不仅仅在这里。斯大林正在登上世界舞台，他要把一些能人集中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他重视维辛斯基的才干：要跟整个世界较劲。

斯大林的外交也需要法学家。不是关心严格遵守法律的法学家，而是能使任何令人怀疑的交易都具有合法形式的诡计多端的奸诈的法学家。维辛斯基以其组织才能和清晰有条理的头脑是非常有用的。他有本事做到莫洛托夫和其他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时就能口授任何文件，不论是照会、条约草案、讲稿、命令。要知道，外交文件是要求对措辞经过精心推敲和仔细斟酌的。

顺便说一句，莫洛托夫与维辛斯基相互是仇视的。这对斯大林是合适的。莫洛托夫这个国内二号人物，不敢对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只好容忍他极不喜欢的副手。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一有合适的时机就会申斥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他反复说：

“您就光会发表讲话！”

但维辛斯基常常反击他。据目击者称，人民委员与其副手之间的争论常常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场面。

除维辛斯基外，派到外交人民委员部担任副人民委员的，还有一位巴库人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和一位老革命家、前工会国际书记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罗佐夫斯基。·洛佐夫斯基，后者曾任工会国际书记。

杰卡诺佐夫是贝利亚的战友，是从内务人民委员部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1940 年底，他陪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并留在那里任全权代表，同时仍保留副人民委员的职位。战争开始后，苏联外交代表团全体成员取道土耳其返回了祖国，杰卡诺佐夫接着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就职。由于感觉到贝利亚的支持，他处事很自信，大胆地解决任何问题，给大使们发指示。

维辛斯基不可能喜欢杰卡诺佐夫插手他的管辖范围，但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从未表露过自己的不满。他怕杰卡诺佐夫，如同怕来自契卡部门的所有人一样。对女色的爱好毁掉了杰卡诺佐夫的仕途生涯。大家说，他盯上的女性之一弄出了丑闻。他被清除出了人民委员部，调到了苏联国外财产管理总局（领导该局的是贝利亚的另一位战友、前国家安全部长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总局还负责运送，包括为最高领导运送战利品的工作，这些缴获的汽车、绘画、古玩和家具一车皮一车皮地从战败的德国拉来。

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让杰卡诺佐夫当了格鲁吉亚的国家安全部长。1953 年 12 月，他同梅尔库洛夫和贝利亚的其他最亲密战友

一起被枪毙了。

所罗门·罗佐夫斯基后来领导了苏联情报局。1949 年他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被捕，3 年后在斯大林在世时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枪杀行动中被处决。

在拉脱维亚的使命

维辛斯基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任务与拉脱维亚加入苏联有关。1939 年，所有 3 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怀着对被占领的恐惧被迫与斯大林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得到了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领土上各部署两万名军人的权利，而在立陶宛还得到了建立海军基地和使用当地机场的权利。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们对红军的到来持不友好的态度，于是红军的指挥官们极力不让自己的战士与当地居民交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民的高生活水平使红军战士们不胜惊讶。有些战士甚至企图开小差，以便留在那里。

苏联驻拉脱维亚武官向莫斯科报告说，红军战士们给人留下了不大好的印象：“战士和指挥员在衣着整洁、神态端庄、坐立姿势等仪表方面都远不如拉脱维亚军人。我们的指挥人员出现在公共场所时或者就在城市里，照例在军大衣下都别着左轮手枪，肩挎军用挂包，因此腰间鼓鼓囊囊，显得滑稽可笑，他们常穿着旧军大衣进进出出，而且脸也不刮，胡子拉碴。红军战士们穿着旧的沾满油污的制服，穿着不合身的军大衣，也是满脸胡子。所有这一切与拉脱维亚人形成了不良的鲜明对比。”

1940 年夏，斯大林决定要结束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游戏。6 月中旬，莫斯科要求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各自组建对苏联友好的新政府，并保证让苏联增援部队自由进入他们的领土。拉脱维亚领导人曾请求德国人允许其政府和军队转移到德国境内，但遭

到拒绝。希特勒当时仍信守向斯大林承诺的义务。三国政府不得不接受莫斯科的最后通牒。

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家们明白，抵抗苏联是没有好处的。红军不经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同意就可占领它们。在发给苏联边防军的指示中说："在红军部队全部越过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边界之前，驻扎在国境线上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与红军各小分队必须协同以突然的和勇敢的袭击方式夺取并拔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边防哨所……"

1940 年 6 月 17 日，红军占领了整个拉脱维亚。同一天，维辛斯基作为"苏联政府实施拉（脱维亚）苏（联）互助条约的特别全权代表"来到里加。

他的同事杰卡诺佐夫带着同样的任务前往立陶宛，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则去塔林。政治局候补委员日丹诺夫职位较高，维辛斯基曾去塔林找他，向他报告自己的工作。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挑选微生物学家奥古斯特・基兴施泰因教授担当拉脱维亚政府新首脑的角色。奥古斯特・基兴施泰因竟没有想到，他的逃往苏维埃俄国的兄弟鲁道夫，一名军事间谍和红星勋章获得者，两年前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波兰人基兴施泰因企图推荐就在不久前在莫斯科还享有显赫地位的拉脱维亚人罗伯特・艾希来代替自己。基兴施泰因不知道，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农业人民委员艾希也已被处决。

6 月 18 日，维辛斯基来到拉脱维亚总统卡尔・乌尔马尼斯那里，向他提交了一份在莫斯科拟就的新政府成员名单。总统只好同意斯大林的条件。但这个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它只是在过渡时期是需要的，为的是避免拉脱维亚人和拉脱维亚军队的抵抗。

同样的新政府（按照从莫斯科带来的名单）先后于 6 月 17 日在立陶宛、6 月 21 日在爱沙尼亚组成。

6 月 21 日，由共产党人组织的示威游行队伍在苏联驻里加大使馆前经过，表示支持与莫斯科结盟。这些人相信，只有苏联及其

军队才能使拉脱维亚免遭希特勒的奴役。维辛斯基站在阳台上，以了不起的样子向游行示威者们致敬。很多拉脱维亚人希望拉脱维亚成为苏联的军事盟友，但保持独立。然而，7 月 21 日，拉脱维亚新议会不经讨论就通过表决同意并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了好些行动小组来到了这个共和国。实际上就立即开始了大规模镇压。一下子抓了 1. 8 万人——对于一个不大的共和国来说这是很大的数目。没有被枪毙的人都送到了西伯利亚集中营。拉脱维亚军队的军官们解甲归田，一部分人被监禁起来，一部分人被处决，罪名是给德国或英国当间谍——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区分局的侦察员们说了算。

被押送转移的不仅有前警官和政府官员，还有一身正气的知识界人士。战前的最后一次押送转移发生在 1941 年 6 月 14 日——即在德国进犯之前的一周。对拉脱维亚而言，如同对其他波罗的海共和国一样，这几次押送转移成为永远确定他们对苏联的态度的悲剧。

给歌唱家韦尔京斯基出主意

维辛斯基参与撰写了 1941 年 6 月 22 日中午莫洛托夫发表的讲话稿，有可能还是他一个人撰写的。

1941 年 10 月 16 日，满载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军用列车驶离了莫斯科。次年年底之前，维辛斯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都到达了古比雪夫，所有大使馆都疏散到了那里。两天后，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他守在斯大林身边处理更重大的问题。维辛斯基在人民委员部主持了所有事务工作。

在古比雪夫，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成了一位重要人物。11 月 6 日，他在古比雪夫歌剧院大楼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了报告。第二天，他在观礼台上站在检阅队伍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旁边。晚

上，维辛斯基是为外交使团举行的招待会的主人。

在外交舞台上他如日中天。他总是穿着一套考究的银灰色的外交制服出现在公众中。他看上去很精神，像一位真正的将军。

维辛斯基大概是斯大林的最有学问的助手了。他懂多种欧洲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起来文质彬彬，令这些外国人为之倾倒。他通晓波兰语，法语运用自如，德语和英语掌握得相当好。他很有魅力，机智敏锐，受到某些外国外交官的喜欢，但主要是受到那些对苏联生活一无所知的人的喜欢。

斯大林特别有幸结识了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此人甚至相信莫斯科的审判的真实性，对被告的有罪深信不疑，并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了相关的报告。戴维斯写了一本书名为《在莫斯科的使命》的书，根据该书拍了一部斯大林非常喜欢的亲苏电影。战后，1945年，戴维斯获得了列宁勋章，他是所有西方外交官中惟一一个获得这项荣誉的外交官。

了解维辛斯基的检察长经历的、比较严肃认真的外交官对他印象并不好。英国外交大臣晚些时候曾坦言：

“当我注视着维辛斯基眼睛的时候，我就觉得从这个恶魔的大嘴里随时都有可能流出他的成千上万个受害者的鲜血。”

莫洛托夫的双手沾满了更多的鲜血，但人们对他还能表示尊敬。而对维辛斯基则只能令人蔑视。他阿谀奉承，对人十分殷勤。但他力求对任何问题都不作定论，千方百计地避免做出决定。这是众所周知的。外国外交官不喜欢找他，而喜欢找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官员谈事情。

在古比雪夫，维辛斯基接待了逃亡的波兰政府首脑、波兰军队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这位将军试图说服苏联当局允许呆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士兵和军官们打击共同的敌人。这是一些于 1939 年秋瓜分波兰后被苏联俘虏的和躲过了发生在卡廷的枪杀的波兰人。1941 年 12 月初，在萨拉托夫附近举行了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部队的阅兵式，这支部队是由被俘的波兰人组建的。当

苏军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时，安德斯是一支骑兵部队的指挥员，他被俘时身负重伤。

伊利亚·爱伦堡后来回忆说："西科尔斯基来了，他由维辛斯基陪同。我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为什么选中了维辛斯基？我倒回忆起了在审判过程中作为检察官的他……他跟西科尔斯基互相碰杯，并甜蜜地微笑。波兰人中有许多人愁眉苦脸，为他们的遭遇满怀怨恨；有些人不能克制自己——他们承认憎恨我们……西科尔斯基和维辛斯基互相以'盟友'相称，但在客气话的背后可感到内心的不友好。"

波兰人本来可以同苏军一起对希特勒作战，但他们想离开。最终斯大林还是让他们走了……

不过，算起来维辛斯基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帮助在苏维埃时代第一次出版了《圣经》，帮助亚历山大·韦尔京斯基回到了祖国，甚至给这位歌唱家出过主意如何去引起斯大林对他的注意。

1944年，维辛斯基不再担任政府副首脑，但没有失去斯大林的信任。他60岁时获得了列宁勋章。他是在阿尔及尔庆祝自己的生日的，因为他正在那里参加意大利问题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中代表苏联的是维辛斯基。1945年2月在反希特勒的盟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他就坐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旁边。

随后，斯大林给了他一项特殊任务——到罗马尼亚去授予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枚罕见的胜利勋章，并如同在拉脱维亚一样去组建一个新政府。年轻的国王米哈伊表示坚决拒绝。维辛斯基看了一下手表说：

"您有125分钟签署命令的时间。如果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保证罗马尼亚人民的自由生存。"

国王投降了，莫斯科认为合适的彼得鲁·格罗查博士领导了政府。

1945年5月9日，4个战胜国军队的代表在德国投降书上签了字。代表苏联的是朱可夫元帅。挨着他在桌旁就座的，是作为斯大

林私人代表的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他留在德国任朱可夫的政治顾问。他还领导了参加纽伦堡审判的政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确定了一个不应该在纽伦堡法庭上讨论的问题的清单。他密切关注不让在法庭上提到1939年的秘密条约和在卡廷对波兰人的处决。盟国为了保持战胜国的一致，同意不讨论这些问题。当被告中有人或被告的律师有人提到卡廷或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秘密协议是，他们就被命令保持沉默。

战后时期，特别是联合国开始运转后，维辛斯基的演说家的天赋充分展露了出来。他能轻轻松松、从容不迫地一连讲几个小时，显现了担当检察长期间所受到的锻炼。从职业角度来看，他的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能不慌不忙、镇静沉着地引用历史上少有的例子，插入拉丁语、谚语和格言。但他的举止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他根本不想说明自己的立场，只求找到妥协和达成协议的可能。

英国外交官肖克劳斯对维辛斯基的作风曾做过这样的评论：

“当苏联代表团伸出和平橄榄枝的时候，它的做法总带有很大的进攻性，似乎存心要打消人家接受橄榄枝的愿望。”

所以外国人对维辛斯基是不信任的，不想跟他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大家只把他看作是一个演说家。

“干杯，同志们”

1949年3月，斯大林把莫洛托夫免职后让维辛斯基当了外交部长。“冷战”方兴未艾。很可能，领袖的出发点是严肃认真的谈判时期已经结束。在谈判桌上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只剩下相互吵骂。维辛斯基担当这个角色很理想。

看来维辛斯基是职业法学家中第一个表明办案是根本不需要证据的人。光骂人就够了：“败类，臭尸，粪土，一堆废物，可恶的哈巴狗，该死的小爬虫，恶棍。”后来他在联合国讲坛上恰好也是

这样骂人的："老奸巨猾的骗子，讨厌的畜生，无赖，强盗，厚颜无耻之徒，可鄙的冒险家。"

这是检察长和外交家维辛斯基的特殊风格。他的风格全国效法，用这种语言讲话的有学者、作家和国家领导人。他看不出被告人与聚集在联合国的各国外长之间有特别的差异，他们都是应该被击倒的敌人。

维辛斯基无论在检察机关还是在外事部门工作时都知道，他有一位喜欢这种骂人话的坚定的崇拜者。为了他，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就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当听到维辛斯基把政治局委员或外国外交官踩在脚下的时候，斯大林就感到满足。

莫洛托夫当外交部长时把部里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只把琐碎的日常事务留给副手们处理。维辛斯基明显感到委屈，因为不让他施展才能，迫使他墨守成规。莫洛托夫被免职后，他就摆脱了困难局面，出气了：他什么文件也不送给他不久前的这个上司，尽管此人形式上还是代表政治局主管外交部的。

维辛斯基不仅当了部长，还成了头号间谍——领导了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该委员会把全苏的情报机关即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统一了起来。

其实，维辛斯基本人就是"冷战"的工具。

外国外交官们都明白，同他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妥协也是做不到的。维辛斯基也不想让对手相信接受苏联建议的必要性。他只管骂人，蛮横无理。这样的外交给国家带来的只是损害。

当维辛斯基是外交部长的时候，苏联在 1952 年旧金山和会上拒绝签署对日和约，从而把至今还没有顺利解决的领土问题带进了死胡同。

1950 年 2 月 14 日，维辛斯基与中国政府首脑周恩来当着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面共同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附有一个秘密协定，按照这个协定，中国保证不允许外国在东北和新疆进行活动。但斯大林未能如愿地强逼中国让苏联一旦需要时有权把军队通

过中国的新疆、西北和东北各省调往远东。作为回答，毛泽东要求让中国能够通过苏联的领土把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疆。讨论到此结束。

毛泽东在大都会饭店举行了招待会，斯大林出席并举杯致词：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应当感谢历史，因为它给了我们这样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勇敢无畏的共产党人毛泽东。为他的健康和成就！干杯，同志们！"

朝鲜战争：错误的悲剧

1950 年夏天，苏联人从早晨起就在商店门前排长队，采购货架和柜台上放着的一切东西。滨海边疆区的商店里火柴、盐、肥皂、煤油等日用必需品都消失了。抢购之风不仅在远东地区的居民中有。甚至莫斯科附近的商店里也尽是排队的人，因为人们深信，马上就要与美国开战了。

在远东，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说美国人很快就要侵入俄罗斯领土。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传说美国军队已经在萨哈林和千岛群岛登陆。人们等待着苏联因为朝鲜而与美国开战。

战争在朝鲜半岛上开始了，并持续了 3 年 1 个月另 2 天，这是因为战争的参与者根本没有能力互相摸透对方的意图。这是一个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的政治错误的悲剧。

金日成创造了绝对纪录——他一个人掌管国家近半个世纪。从苏联军队于 1945 年 8 月把他送到平壤开始，到他于 1994 年逝世为止。

在抗日战争中，金日成和一些朝鲜人加入了抵抗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游击队。但到 1941 年年底，日军打败了中国东北的游击运动。金日成和余下的朝鲜游击队员一起跑到了苏联。苏联当局接纳了游击队员，以备将来与日本打仗之需。

后来整个战争时期金日成是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红军第 88 步兵旅中度过的。

金日成在苏联结了婚。苏联军官们给他的妻子取名薇拉。1942 年 2 月，金日成有了一个儿子，为他取了俄文名字，叫尤拉。他就是北朝鲜现在的伟大领袖金正日。金日成的第二个儿子也取了俄文名字，叫亚历山大，小名为舒拉。这位不幸的小男孩出生 3 年后淹死了。

日本投降后，1945 年 8 月，年轻的金日成身着苏式野战服、脚穿长筒靴、佩带大尉肩章，他被送到了平壤。同他一起达到的还有他的大约 40 名游击队员——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苏式制服。

苏联统帅部需要在朝鲜建立新的政权，但我们的军官们不了解任何一个地下工作者。于是决定推举金日成——他至少是忠诚可靠的人。苏联军官们为他从苏籍朝鲜人中请了一些教师到他那里去工作，这些人很快就移居到了平壤。斯大林亲自决定了金日成的最终命运。金日成被带到莫斯科亮相。与苏联领袖的会晤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和领导作风。他爱上了斯大林。他想成为斯大林。

战后，朝鲜半岛像德国一样被分割。这里也出现了互不承认的两个国家。1950 年 1 月金日成说：我们应当统一国家。他举了毛泽东的成功为例子。毛泽东推翻了中国的政府，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历史学家们使人确信，1950 年的战争计划是由苏联将军们用俄文制定的。刚刚提升为将军的朝鲜游击队员们是根本胜任不了这项参谋部的工作的。

1950 年 6 月 25 日，金日成的 7 个师在 150 辆“T—34”坦克的支援下向南方进攻。金日成预计两个月内击溃敌人。但 4 天后北方人就拿下了汉城。南朝鲜军队没有作好战争准备。金日成得意洋洋，但不明白他已输掉了这场战争，因为美国人参加了战争。

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说，战争前夕金日成来到莫斯科。在与斯大林交谈中，他说他想用刺刀试探一下南朝鲜。他说服了斯大林：南方人民将奋起反抗反人民的制度，他们就只等着援助。斯大

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赞成了金日成的计划并肯定地说美国不会干预。

金日成、毛泽东、斯大林都错了。美国人参与了战争。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出言不逊地说：

“我们无论如何要制止这些狗崽子。”

两个朝鲜虽然互不承认，但都是独立自主的、得到国际上承认的国家。这样，北朝鲜实施的是对别国的侵略行动。杜鲁门命令美国武装力量去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

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一位城府很深的人雅科夫·马立克抵制安理会会议，以示抗议联合国席位仍归台湾占有而没有交给人民中国。

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讨论朝鲜半岛形势的安理会会议，因而没有能够对谴责北朝鲜和号召援助南朝鲜的决议行使否决权。美军获得了打着联合国的旗帜登陆朝鲜的权利。杜鲁门总统责成看来是最有才能的美国军事长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军队。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身于军人世家，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从来什么都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甚至在枪林弹雨下也从来不戴钢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在太平洋上度过的，起初在日军的优势兵力面前退却，后来把日本人击溃。日本人投降后，麦克阿瑟对自己的军官们说：

“是的，先生们，归途是漫长的。”

他用手指着一具日本士兵的尸体说：

“我就是喜欢他们成为这个样子。”

军事部门向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在朝鲜的行动方案：把美军部署到正在退却的南朝鲜军的后方，以阻止后退。麦克阿瑟作出了另一个决定：他在北朝鲜军的后方登陆。他迅速切断了北朝鲜人的补给线，给了他们以背后一击，金日成的军队陷于惊惶失措，简直就是崩溃了。

美国人打开了通向平壤的道路，北朝鲜人仓促后撤，未经战斗就放弃了平壤。美国人取得军事胜利后，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杜鲁门总统本来就已命令麦克阿瑟将军及时停止前进，但将军论证说，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必须彻底歼灭敌人。

美国人接近中国边境时，就轮到毛泽东感到惊慌了。他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不仅想占领整个朝鲜半岛，还想侵入中国，以便推翻共产党。毛泽东认为不能坐等美国人进入中国领土，就命令他的军队采取行动。

10 月 18 日夜里，苏联外交官们看到，没有尽头的中国军人队伍通过界河鸭绿江大桥，这些军人肩挑武器装备和粮食。毛泽东把 5 个步兵军和 3 个炮兵师派到朝鲜。指挥中国军队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他坚信一定能把美国人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的全线进攻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的突如其来，他们仓皇地向南撤退。如果当时毛泽东提议订立停战协定，大为惊愕的美国人大概不会放过这个提议，毛泽东就可作为使美国遭受失败的战略家载入历史。

为自己的成就所鼓舞的毛泽东决定把美国佬扔到海里去并把朝鲜统一起来。但是，美国人已经苏醒过来，而他们在技术装备和火器威力方面优于中国志愿军是显而易见的。开始了阵地消耗战。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扩大战争规模，打击中国，甚至可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杜鲁门总统担心打击中国会迫使苏联参战，他不想给斯大林提供借口。杜鲁门甚至把太倔强的麦克阿瑟将军从司令官的岗位上撤了下来。

杜鲁门只思考一个问题：可千万别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甚至害怕把太多的兵力派到朝鲜去，认为斯大林是把这作为圈套，其意图是在欧洲进行主要打击。

赫鲁晓夫倒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不派一两个坦克军到朝鲜去决定战争结局。斯大林对朝鲜不大感兴趣。他在心里甚至不在乎金日成的失败，不在乎美军进到苏联边境。他曾说过：

“那又怎么样，现在让美国在远东做我们的邻居好了。他们将到达那里，但我们现在不会跟他们打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在这个时候，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总参谋长什捷缅科请求政府补充征召技术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入伍。应征入伍者对于掌握新的技术装备——“图—4”、“伊尔—28”、“米格—15”等飞机及水陆两用坦克——是必不可少的。

1952 年秋，为了起降能携带核武器的图波列夫和米亚西谢夫重型远程轰炸机，决定增建机场。机场建在东欧国家和中国的领土上。使用这些机场不仅能打击西欧，还能打击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美国基地。

朝鲜半岛战争是苏联飞行员的极好训练场。他们经历了战斗磨炼，已习惯于射击美国人。22 名歼击机飞行员在那里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损失了 335 架飞机，牺牲了大约 200 名飞行员。确切的数字没有披露。

匈牙利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回忆说，1951 年 1 月 8 日，在斯大林与各兄弟共产党总书记和国防部长的一次会晤中，领袖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在 1953 年之前拥有强大的军队。

斯大林打算与毛泽东合伙跟美国人打仗，毛泽东在朝鲜的几个师也学会了与美国人厮杀。是有人已作好战斗准备。世界并不知道新的战争即将来临。但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了，他的计划和想法也同他一起逝去。朝鲜战争也立即结束了。7 月，在小地方板门店，在中立地带开始了谈判。7 月 27 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如果不考虑金日成着手进行的战争彻底破坏了朝鲜的话，事实上南方和北方依然各自存在着。美国帮助南朝鲜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北朝鲜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则始终未能摆脱破坏和贫穷的状况。

铁幕

当政治家们和史学家们重温1945年春天的幸福和激动人心的事件时，还将长期地想去弄清楚，究竟为什么昨天的盟友会如此快地变成了敌人？为什么1945年4月26日在易北河会师的苏美军人过了几个月就会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

几十年来他们各自把对方视为敌人，认真备战。关于联合抗击纳粹主义的记忆很快就消失了，而“冷战”的痕迹如果不是永远的话也将长期地留存下来。世人所看不见的最早的“冷战”的炮火恰恰就是在1945年夏天发生的。英国的军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制定了针对俄罗斯的作战计划。英国军人认为，他们应当作好击退苏军进攻的准备。英国人预计，打败希特勒之后，红军很可能占领挪威，入侵希腊和土耳其，还将夺取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丘吉尔认为，他势必要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保卫不列颠群岛，因为被战争削弱的法国和欧洲的一些小国无法抵抗红军，所以俄国人很快就将到达拉芒什海峡。

莫斯科也同样疑心重重地注视着盟国的行动。斯大林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可能与德国人勾结起来，一起掉转身来反对他。1945年6月29日，朱可夫元帅下令全面地重新部署驻扎在德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作好对未请自来的敌人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

有些人认为，“冷战”之所以会加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和苏联互相都不正确地评估了对方的意图。双方都认为对方正在实施经过精心制定的瓜分世界的阴险计划。发表的一些言论和声明被当成了已经制定好的行动计划。从而就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苏联只是希望它周围有一个友好国家的地带而不是战前的那种防疫走廊，并把中欧变成可靠的缓冲区，以防遭到新的进攻。

但西方看到了，斯大林在红军到过的各国都建立了亲共政府，

东欧没有出现自由选举的氛围。杜鲁门总统声称，美国承担着保障所有可能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的安全的全球使命。美军就留在了西欧。

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成了维辛斯基的旗鼓相当的对手。他们二人都是法学家。但与维辛斯基不同，这位美国人是一个性格刚强和不放弃原则的人。1950 年，他的助手阿尔杰·希斯被指控把美国政府文件偷送给苏联。艾奇逊被召请到参议院接受质讯，议员们要求他悔过。但他断然拒绝谴责已被判决有罪的希斯。中国军队入朝参战后，议会两院通过决议：《艾奇逊已失去国家的信任，应从他的职位上撤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奇逊主张与苏联搞好关系。他建议同苏联分享原子能秘密，认为不然的话莫斯科就将失去对美国和英国的信任。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对他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企图迫使土耳其把博斯普鲁斯海峡交给苏联控制。艾奇逊和杜鲁门总统进行了一次原则性谈话，他使总统确信美国应当强硬地对抗斯大林。于是艾奇逊成了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对的。

迪恩·艾奇逊是这样评论其对手维辛斯基的：

“天生的恶棍，不过是个有趣的恶棍。”

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宣布了美国抵制苏联专制独裁的全球政策。土耳其和希腊首先获得了美国的援助，在这两个国家中正进行着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基地得到支持的游击战争。西方害怕在其他国家中共产党也试图用武力夺取政权。

1946 年 3 月 5 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他的著名的演说。他讲到了铁幕，说这块铁幕把欧洲分成了有自由的国家和没有自由的国家。丘吉尔关于铁幕的提法是准确的。欧洲是分裂了。这条分界线穿过德国，把它分为东德和西德；也穿过德国首都柏林，柏林也被分成了东西柏林。

空中走廊

柏林的苏联占领区和西方占领区之间的界线成了“冷战”的战线和前沿。但是，“冷战”是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转变为热战的。柏林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1945 年，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不让柏林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而受盟国共管。柏林相应地被分成 4 个区。实际结果并不是这样。在苏联占领区，也像在整个东德一样，进行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组建工作。而西柏林则想成为西德的一部分。

当西方大国决定它们不应反对建立西德国家时，彻底分裂的时刻就来到了。1948 年 3 月 20 日，四方共管德国的最高机构——管制委员会停止活动。以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苏联代表退出了会议厅，再也没有回来。德国的分裂已成现实。

被苏军四面包围的西柏林是十分脆弱的。1948 年 3 月 31 日，斯大林对西方国家军队的调动设置了种种限制。从此以后，西方国家在柏林的驻军只能通过空中得到供应，后来这一封锁扩大到了整个西柏林。

6 月，西德开始进行币制改革。当时苏军完全中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交通运输。西方国家被通知说：道路需要维修，交通关闭。同时西柏林断了电。城市没有了电灯、热源和食品。

斯大林深信，西柏林经受不住封锁，将可把它并入东德。西方不会下决心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只会限于发表外交照会。按照当时担任第一副外长的安德烈·葛罗米柯的话来说，斯大林已下了决心，只有在美国人突然下决心真要开战的情况下，苏联才会退却。

斯大林的预料是正确的。英国和美国慌了。它们并不愿意为了西柏林而打仗。但是，西柏林在封锁面前没有发抖，没有屈服。市政当局一再说：

“西柏林仍将是自由的西柏林，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的西柏林！”

3 月 18 日，西柏林市长恩斯特·路德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上说：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变后，下一个该轮到的是芬兰。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这是因为芬兰人民已作好了捍卫自己自由的准备。柏林如果在这危机的日子里顶得住，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柏林的居民们！在这最严重的考验时刻，我们号召你们：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即使我们的生活将是贫困的，但是自由的。”

市政当局表现了出乎意外的顽强精神。美国驻柏林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也是一个顽强的人。这位将军说，如果柏林人自己有经得住一切考验的准备，盟军定将帮助西柏林。市长答复他说：“将军先生，柏林人将把自己的自由捍卫到底。”

克莱将军找到了办法。他提议建立空中走廊，用军用飞机向该市运送一切必需品。斯大林不能禁止盟国飞机的飞行。美国人认为空中走廊需要使用一两周时间，但实际上使用了将近 1 年。空运了 200 万吨货物。出动了 27 万架次飞机，因航空事故牺牲了若干机组人员。在柏林，在议会大楼旁竖立了一座美国阵亡飞行员纪念碑。每 48 秒钟就有 1 架装载和平货物的轰炸机在柏林降落。柏林人得到了少量的，甚至是很少的配给食品。但是，没有一个人饿死，没有一个人投降。

斯大林通常之所以占上风，是因为他善于使欧洲国家相信他准备斗争到底。然而软弱的欧洲无意这样做。但这一次斯大林对柏林人和美国人估计不足。他徒劳地把他们看作懦弱无能者，认为他们没有决心、缺乏勇气和不能忍受困苦。一年后斯大林取消了封锁。柏林人感到无限欢乐。他们维护了自己的独立。

欧洲合众国

斯大林的政策使西方国家紧密地团结了起来。美国把军费增加了1倍。西欧感到它需要联合。

温斯顿·丘吉尔于1946年9月19日在苏黎世大学发表了与富尔顿演说同样重要的演说。富尔顿演说之后过了半年，这位英国人讲了欧洲的团结：

“在欧洲的广阔土地上，许多精疲力竭、饥饿不堪、忧心忡忡和失魂落魄的人们审视着他们的城市和住房的废墟，凝望着阴暗的天边，害怕在那里发现某种新的危险的征兆、新的暴虐或新的恐怖的征兆。如果在大西洋彼岸的那个伟大共和国最终不能意识到，欧洲的覆灭或被奴役也将确定它自身的命运并把它推向深渊，如果它不向欧洲伸出援助之手和不能给欧洲保证它的领导，具有一切惨状的黑暗时代就会重新来临。这种时代还可能回来！

但是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如果能普遍地、切实地加以运用，就能奇迹般地改变现状，并在几年内使欧洲或者至少使欧洲的大部分变成像今天的瑞士那样自由的、幸福的地区。这个办法就是重建各民族大家庭（或者至少联合尽可能多的大家庭成员），并在秩序的基础上重组这个大家庭，这样它的成员才能生活在自由、安全与和平的环境里。我们应当建立某种形式的欧洲合众国。

我们的时间也许是有限的。我们现在有个喘息时间。斗争停止了，但危险没有过去。如果我们想建立欧洲合众国，那么我们现在就应当去做这件事……”

在欧洲各国首都，人们反复地阅读了丘吉尔的演说。由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充满着强烈的纷争，各国人民恐怕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联合。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产生疑问：一个统一的欧洲的存在有可能吗？

几百年间欧洲在世界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战争与和平全由欧洲列强来决定。经济的进步有赖于欧洲的资本和欧洲的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欧洲的一场大灾难。在战争的绞肉器里欧洲大陆上牺牲了许多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是如此巨大和如此突然，加之这些苦难是人们在几百年中一直愉快地感受到不断取得进步之后来到的，以致欧洲对自己的信心发生动摇了，欧洲经济实力的基础开始崩溃了。欧洲的前景变窄了，它本身无能为力的感觉更加明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事件的重心由欧洲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欧洲各国的政府忽然意识到，它们的安全和繁荣取决于某些遥远的地方做出的决定。出现了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欧洲一个强国也没有了。欧洲人已从戏剧的主角变成了演次要角色的演员。

1948 年 3 月，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及集体防御的布鲁塞尔条约。后来又有 5 个欧洲国家——丹麦、冰岛、意大利、挪威和葡萄牙——加入了第一批 5 个国家的条约。

以维辛斯基为首的苏联外交官们不太了解欧洲发生了哪些过程。莫斯科还在指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法国和意大利被认为是薄弱环节，因为战后那里有强大的共产党。维辛斯基经常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外交在力图挑起西欧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维辛斯基和他的助手们没有看到从成立欧洲煤钢联营开始的欧洲联合过程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长们声称，这个联营的目的是恢复西德的军事工业潜力，是“为了在欧洲策划新的战争和使西德经济适应英美军事集团的计划。”

后来由煤钢联营产生了欧洲联盟。同时还出现了欧洲防务集团。1949 年 4 月，10 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关于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的华盛顿条约。北约章程的第 5、第 6 条说，侵犯

一个公约成员国将被视为对所有公约成员国的侵犯。北约成立后过了1个月，莫斯科取消了对柏林的封锁。北约司令部最初设在巴黎。

美国作为首要军事大国承担了军事指挥的责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第一任司令。英国受托处理政治问题。北约第一任秘书长是伊斯梅勋爵。这就表明，美国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政治问题有什么意义。伊斯梅勋爵大半辈子在印度供职，一直到当上驻印度的英军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丘吉尔的参谋长。

在北约之后出现了华沙条约组织——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但是，西方集团比东方集团显得安稳、富有和牢固。东方集团垮了，而西方集团依然存在。

“您只会生孩子”

维辛斯基部长的工作日上午11点开始，第二天早晨4～5点钟结束。会议都在夜里举行，这时人们的脑子已不太管用。维辛斯基本人倒特别有工作能力。况且他也非常害怕不呆在工作地点，因为怕斯大林突然会来电话。

已形成这样的习惯：如果领袖打来电话，大家都应当立即离开部长办公室。有几次正当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在开会时他打来了电话。维辛斯基总是站起来说：

“您好，斯大林同志。”

部务委员们马上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迅速向门口走去，让部长一个人留下来。但门较狭窄，大家不能一起都一下子就走出去。这时，维辛斯基就用他的检察官的声调对最后一个走出去的人说：

“我发现我与斯大林同志说话时，你们总想呆在办公室里。”

这话说了之后，门口就出现拥堵现象，结果是同事们往外走的时间延长了一倍。

在那个年代，苏联外交部门的专业人才很少。外交人民委员部于战前两次遭到清洗。第一次是在 1936～1937 年的大清洗时期，第二次是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之后的 1939 年。莫洛托夫吸收了一些被提拔起来的年轻人担任外交官，他们的家庭出身是可靠的，但在职业技能方面没有受过培训。新干部得意地把自己称作是“莫洛托夫召唤来的人”。他们不久前还是工程师、医生、教师和复员军人，他们是被党中央派去做外交工作的。战后苏联的驻外使馆数目增加了一倍，所以立即决定动员一批党务和苏维埃机关工作者去做使馆工作人员。这是一些习惯于遵守严格纪律的人。但是外交部的智力才能就消失了。

外交部也没有躲过反世界主义和其他令人厌恶的政治运动。那里也举行过公意审判。大家书写过告密材料，指控某些人“脱离党的路线”。这些事都以把被揭发者开除免职而告终。

维辛斯基掌管外交部时，严格的制度变成了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制度。外交部明显地退化了。新部长对下属态度粗暴，蛮横无礼，用最粗野低级的话侮辱他们。与维辛斯基一起工作过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大使称他是没有人性的人。有人在部委委员会会议上遭到他的申斥后曾因心脏病发作而被抬出去。

后来成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贾丕才回忆说：“维辛斯基经常因工作人员有了一点什么疏漏就极其严厉地加以处分。例如，一个文件起草者如没有看出文件打印中的一个错字，他就可以解除他的工作。在外交部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雅古阿尔·雅古阿尔罗维奇（俄文美洲豹一词的音读为雅古阿尔，给维辛斯基起这个名字和父名，是把他比做美洲豹——译者）。美洲豹没有找过我麻烦，对我还有礼貌，甚至在莫斯科郊外举行招待会时还让我坐他的汽车顺路把我送到莫斯科……”

维辛斯基不喜欢自己的第一副手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

米柯，使他失去了第一副部长的职位，派他到英国去当了大使。这无异于降职和流放。要是维辛斯基担任部长职务时间长一点，他肯定会把葛罗米柯的外交职务撤掉。其实葛罗米柯本人已作好了下台的准备。他派了部里的工人在伏努科沃为自己修建了一栋别墅，这点过错在高官中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但是维辛斯基知道此事后，通过党的系统给了葛罗米柯以警告处分。雅科夫·马立克取代葛罗米柯当了第一副部长。

与维辛斯基一起工作过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说：

“在部务委员会开会时，他常常对我说：把某某叫来。我立即转告秘书，他们就打电话把某某请来了。当某某来到部务委员会会议室时，维辛斯基已经忘了为什么叫他来，于是低声问我：您记不记得我有什么事要找他？我可不知道……然后维辛斯基一挥手说声：那好吧，接着他就记起了这个人真有的错误，或者是他臆想出来的缺点，开始把他申斥一通。维辛斯基满意了——没有平白无故地把他找来！”

“这就是他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以前莫洛托夫有时虽曾说过他，可是现在谁又敢对这位部长提意见呢？诚然，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曾给我说过一件事：有一次，外交部经济司司长弗拉基米尔·格拉先科（后来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的父亲）巧妙地顶撞了一下部长。”

“维辛斯基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他对下属的一次例行的申斥：您什么也不会好好干，您只会生孩子！”

“格拉先科的确有许多子女，他就马上回敬说：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您这样发脾气，是会伤您的元气的。’

维辛斯基窘迫得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

可是在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的命运中，维辛斯基却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多勃雷宁进入外交界是偶然的。他

被派到高级外交学校，后来被抽调到外交部教育司。工作是令人乏味的——草拟各种工作细则、条例等。有一次晚上很晚他被叫到维辛斯基那里。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喜欢像斯大林那样经常在夜里开会。他宣布：

“我们要任命您为教育司司长。”

多勃雷宁立即说：“我不同意，我不喜欢这项工作。”

维辛斯基容忍不了反对意见，把多勃雷宁赶了出去。几年后人们打算把多勃雷宁派到瑞士去工作的时候，他又出现在维辛斯基的办公室里。维辛斯基立刻记起了这个倔强的人，就发指示说：

“就让我们把他派到美国去吧，我们与美国人的关系很不好。”

就这样，部长为一个人的顺利升迁奠定了基础，此人在美国 6 届总统的任期内当了驻美大使。

维辛斯基认为接见有个人问题的人是自己的责任，有时还对他们做点好事。例如，他曾使他未来的传记的作者、当时还是大学法律系学生的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免遭逮捕。在外交部，他的部下经常请求维辛斯基给予帮助。他指示要人把情况了解清楚，有时甚至他的名字就管用，凭他的名字人们就得到帮助。德国问题专家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叶若夫教授在维辛斯基任部长期间开始到外交部工作，他说：

“人们有点怕维辛斯基，因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他可以贬低、侮辱部里任何一名工作人员。但有些人也尊敬他，因为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具有令人羡慕的渊博知识，并经常与斯大林交谈，斯大林常常同意他的意见。他参与 30 年代的审判案件对我们来说算不上是坏事，我们认为维辛斯基是一个善于揭露敌人的人。”

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弗谢沃洛德·叶若夫被分配到捷克斯洛伐克处工作。有一次，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函请外交部对准备购买的一部捷克斯洛伐克影片发表意见。所有年长的外交官都很忙，因此看这部影片和写结论的任务就委托给了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叶若

夫。

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说，这是一部很一般的侦探故事片，但我按照有人教我的办法拿定了主意，说该影片对苏联观众不合适，写了否定的意见。

可是麻烦之处在于影片原来已经买下来了，而征询外交部的意见不过是放马后炮，以为外交部总会作出肯定的答复的。开始忙乱起来了。艺术委员会的领导人请求伏罗希洛夫帮忙，后者接替维辛斯基担任了主管文教的政府副首脑。伏罗希洛夫给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打了电话，请他过问一下这件事。部长答应亲自看一看这部影片。夜里在外交部电影放映厅组织了审看。当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来时，维辛斯基站起来冲着司长疑惑地问：

"这片子有什么有害的地方？"

他开始申斥司长。后来他用锐利的眼光向叶若夫一瞪。

"你是只想看足球，不干正事。"

他说完就走了，吩咐写一份新的审看意见。

弗谢沃洛德·叶若夫回忆说："为此推迟了一年才授予我外交官的头衔。可是我的同事们后来说，我的运气还算是好的。当时司长就被调走去做别的工作了。"

在外交部告诫年轻的外交官们的一条基本规矩是：别露锋芒！对外交官来说主要执行命令，不要提什么主张。还有就是令人震撼的保密气氛。有一次，叶若夫拿到一份从巴黎通过外交信使带来的文件：《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日记摘抄——与瑞典大使谈话记录》。全部记录只有一行："今天在街上散步时我遇见了瑞典大使。我们打了招呼，后来就分手了。"

叶若夫惊奇地问年长的同事：

"这他干吗写这种报告？"

"以防万一。"

"为什么还盖'密件'章？"

"理应如此。一小片纸分文不值，但如果它被风吹到街上去了，

最好你自己跳下去拣，要不会让你坐牢。”

外交官们时时被提醒：跟亲戚、跟朋友、跟谁都不要谈论工作。

弗谢沃洛德·叶若夫对我说：“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我们是在参与重大的国家事务，相反，我们是在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一辆苏联坦克在演习时撞毁了一堵波兰农民的围墙，为此而要向他支付赔偿的问题也由斯大林签字决定。

由外交官改做契卡工作并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回忆说，外交部的工作在斯大林时代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大家要到夜里两三点钟下班，领导要呆到清晨。但白天大家可休息两小时——吃午饭和睡一会儿。只有高级首长才能批准一个人早一点下班——就也得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回到了外交部，他吩咐制定了正常的工作日制度，他的助手们负责监督，不让任何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呆在办公室里。开始变得安定一些了。莫洛托夫不像维辛斯基那样喜欢打搅别人。”

没有朋友可言！

1951年10月，以短篇侦探小说闻名遐迩的列夫·罗曼诺维奇·舍伊宁被捕。律师们更多地知道他是苏联检察机关侦察处处长。舍伊宁是作为“犹太民族主义者”被捕的，但侦察员们还从他那里挤出了一份揭发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坦白材料。舍伊宁给国家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写了一份声明：“当人民的敌人着手对我进行调教，竭力想把我作为他们希望抓到的维辛斯基最亲近的人关押起来的时候，侦察员就是按有倾向性地挑选各种各样的、往往是荒谬的材料（大部分这类材料曾在叶若夫时期胡编乱造过）的路线行事的。”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的崇高地位丝毫也没有使国家安全部的侦察员们感到疑虑为难。

要知道，在斯大林生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维辛斯基已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这是他升迁的顶峰了。诚然，领袖并没有邀请维辛斯基到他的别墅中去，还没有把他完全看作是自己人。但对他的无可争议的才能是器重的。在与许多文化水平低下和拙口笨舌的党务工作者相比之下，维辛斯基显得像一盏思想的明灯。

维辛斯基这位天生的演说家在科学院讲话时，能够毫不打顿地说出一套对斯大林的颂扬之词，要大家“歌颂伟大的领袖、导师、缔造者、鼓舞者、不朽的宪法的制定者、革命的舵手和列宁遗训的伟大捍卫者。”不是任何人都能脱口说出这些话的。但是，斯大林的情绪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生变化，因而国家安全部的侦察员们就想预先收集好维辛斯基的材料，以便需要时不至于两手空空，毫无准备。

为什么维辛斯基活了下来？谁也没有能力洞察斯大林的逻辑，但应当明白，在下一次历史转折中维辛斯基也是有可能落到车轮底下去的。这一点他是知道的，是记住的，他一秒钟也没有忘记过，他在自由中过的任何一天对他来说都可能最后的一天。人们都羡慕他，可在睡梦中可怕的梦魇老跟随着他。斯大林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些人老是处在恐惧之中，他们因此渐渐变成了奴才。

与莫洛托夫喜欢清心寡欲的生活不同，维辛斯基是一位老爷派头的人和奢侈逸乐的人——喜欢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不大喝酒，每天晚上喜欢在郊外的别墅中散步，但他特别喜欢女人。在外交部他身边有一位花枝招展、能说会道的女士，这位女士最后开始定夺所有的干部问题。外交官们在她面前都低三下四。

同时，他始终是一个孤家寡人，亲近的人只有妻子和女儿。没有任何朋友。那时一切都是相对的——今天还是朋友，明天成了敌人。这里没有朋友可言！

保险柜里的勃朗宁手枪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继承者们重新组成了已经没有维辛斯基参加的中央主席团。外交部长再次由莫洛托夫担任。3月7日，“因政府改组”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被解除职务。他领导外交部整整4年。但人们不想让维辛斯基感到委屈。他被任命为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为了强调他的地位之高，还让他当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在纽约度过了70岁生日，又获得了1枚列宁勋章——这是他得到的第6枚列宁勋章。但他已不仅失去了影响，也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心。

在联合国与他一起工作的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回忆说：

“这已是另一个人了——像一条挨了打的狗。”

他只剩下一个他所喜欢议论的话题——联合国讲坛。他仍然大骂所有的人。联合国给各国外交官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机会，使他们可以不为人察觉地、关起门来、通过长时间地协商和交谈达成一致，取得妥协。但在那个时代人们也不指望取得妥协。联合国曾是一个争吵、冲突和骂人的讲坛。本来就不要达成协议，而是要谩骂。这方面是没有人可与维辛斯基相比的。他可以不讲礼节地用手指指着人说：

“就是他，战争贩子！”

在联合国人们并不抱怨维辛斯基。谁也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有身份的君子。他是一件独特的著名文物，正像现在人们所说的是一个第一流的表演家。他在联合国常常进行各种演出，这时各国外交官们就跑来看他……

正如美国大使凯南所说，维辛斯基常常发出“多疑和封闭的俄罗斯对它想象的敌对的外部世界的嚎叫。”

他的确是一位很强的演说家，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西方外交官

中这种“口才卓越的人”是找不到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有一次他向广大听众翻译维辛斯基的讲话。他说，人们批评我国是不公正的，把我们称作极权主义者是没有根据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开始翻译这句话，但怎么也说不出极权主义者这个词。机智的维辛斯基弯向麦克风说：

“你们看，我们甚至不能说出这个词来！”

他的机智是不寻常的。在一次讲话中他把什么事弄混了，开始陈述西方的观点。他的惊恐不已的助手们给他写了张纸条：“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您是在陈述西方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话。后来他突然谈到：

“这是和平敌人和战争贩子的立场，而我们的立场是与之相反的。”

接着他开始阐述与他刚才热烈论证的观点恰好相反的观点。

维辛斯基在纽约只生活了一年。甚至有传言说他开枪自杀了。在他的保险柜里确实找到了一把勃朗宁手枪。但维辛斯基没有使用手枪。他可以说是在列昂尼德·扎米亚京的双臂上死去的。此事发生在1954年11月22日。

扎米亚京给我说：

“头一天，星期六，维辛斯基在与波兰外长斯坦尼斯瓦夫·克日谢夫斯基进行长时间的、不愉快的会谈后回来了。

星期日早晨是扎米亚京值班。他来到后就问有什么新情况。维辛斯基的警卫人员说，夜里他心脏病发作，医生只好给他打了一针。在他们讲述这些情况时，突然从上面、从3层楼上传来女人的喊叫声——这是女速记员瓦莲京娜·卡拉谢娃在喊叫。

维辛斯基需要发表一篇讲话。他睡醒后把女速记员叫来，开始口授，接着他又觉得难受。女速记员走到楼梯上，开始呼救。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身体不舒服，他快不行了！”

扎米亚京和警卫员们坐电梯上去，看见他坐在圈椅上，头向后仰着，衬衣领子已被撕开。大家把他移到沙发上，一名警卫员急忙

去找医生。他的私人医生跑来给他打了针。代表团的一名女医生也来了。她看了一下他的眼睛说：

"不用打针了，他已经死了。"

过了一些时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亨利·洛奇打来电话问：

"凯博特·洛兹来电问：

——扎米亚京先生，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回答说：

"没有发生什么事，一切正常。"

他惊讶地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将立即提供。"

几分钟后，苏联常设代表团的大门口出现了一辆急救车。

美国人到底能从哪里得知所发生的事情？扎米亚京还没有来得及给驻华盛顿的大使打电话，也没有来得及给常设代表团维辛斯基的副手打电话。后来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检查他办公室时，在写字台的一条腿上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他的私下交谈、秘密会谈、口述等都被美国人一一录了下来。维辛斯基那样尽心地为自己的家庭所作的采购使美国人大为吃惊，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了他为自己家里人准备好了的一切。幸亏他没有活到这一可悲的事情被揭露的时候。

在联合国里，人们在这类场合都发表一些哀悼的话。有一位外交官可能是真心诚意地感到遗憾，他说再也听不到这位口若悬河的人的声音了。

在莫斯科，据说在为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举行安葬仪式时，一个人也没有掉眼泪。看样子他显然得罪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所有的人……

不过，绝非所有人想起这位前部长时只记着他的坏的一面的。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 11 月 23 日在日记中写道：

---

① K·楚科夫斯基（1882—1969），苏联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作品有用诗歌和散文写的儿童读物、文艺评论和翻译作品。——译注

“安·亚·维辛斯基去世了。昔日我与马尔夏克[①]曾去他家，为舒拉·柳巴尔斯卡娅和塔马拉·加别[②]奔走求情。他答应了我们的苦苦央求，甚至做得比我们所请求的更周到，因此马尔夏克拥抱了他，并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们两人都哭了起来……”

维辛斯基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列宁陵墓左侧的克里姆林宫墙内。他是惟一一位获此荣誉的外交部长。但是在他去世后，在苏联时代他如同托洛茨基和谢皮洛夫一样迅速就从苏联外交史上被抹掉了。他既没有受到过谴责，也没有受到过镇压，但是人们根本就羞于去提到他。

* * *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1930年代臭名远扬的莫斯科审判案中作为检察长、法官和公诉人被写进了历史。但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只当了4年，他担任外交部长也是这么多年。而他在外交部总共工作了14年——多于在检察机关工作的时间。不过他依然作为检察长被载入历史。这是对的。即使是在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也始终是检察长——只不过是全球范围内的检察长。

在维辛斯基之前和之后，成为外交部长的都是些偶然被推上外交奥林波斯圣山的人。在其他的历史情况下，他们是坐不到如此引人注目的位置上的。安德烈·维辛斯基可能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占有符合其天资和天才的崇高的地位。也许在其他时代不会表现出他性格中存在的内心的卑鄙、胆怯和毫无原则性。

---

① C·马尔夏克（1887—1964），苏联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著有诗歌、童话和儿童剧等。曾多次获列宁奖和苏联国家奖。——译注

② T·加别（1903—1960），苏联俄罗斯作家。著有童话剧和论儿童文学的文章。——译注

第六章

莫洛托夫：他甚至连妻子都救不了

战后的1945年秋天，斯大林是近年来首次到南方度假，并在那里呆了相当长时间。他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回忆说："他变老了。他要安静。有时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人们看到领袖想像过去一样在南方休息，就开始在这个遭到破坏的和饥饿的国家里在各处为他盖别墅——在苏呼米、在新圣山、在瓦尔代，还在利察湖畔修了一个别墅综合体。

莫洛托夫留下处理各种事务。在这里，与盟国的招待会、友好会见没完没了。甚至像莫洛托夫有的那种强壮的心脏都无法承受。他失去了往常的谨慎，变得松弛起来。在克里姆林宫一年一度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的招待会上，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给外国记者们暗示说，政府可能将对新闻检查稍加放宽，外国记者们将能更自由地从莫斯科发消息。美国记者还补充说，现在莫洛托夫可能重新成为政府首脑，因为斯大林老了，还有病，并很快将离开自己的岗位。

克里姆林宫里的枪声

当向领袖呈送从外国报刊文章上翻译过来的译文时，他愤怒不已。斯大林无情地惩罚一切对他身体状况的议论，时不时地安排对战友们进行检查。

在 1945 年胜利阅兵式日那天举行的一个规模不大的招待会上，斯大林突然说，“再过几年他将应该不再管事了”。大家同声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次，斯大林在他的别墅里又一次谈起自己退休的事：

“现在让维亚切斯拉夫来干吧。他年轻一些。”

这是公开的挑唆，当然莫洛托夫是够聪明和有经验的，他马上起来否定这样的前景。但是，斯大林读了外国报刊的评论后想到，莫洛托夫也许真的是惦记着他的这把交椅。他要求严厉地惩罚一下莫洛托夫并把他赶出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们试图设法拯救莫洛托夫。他们给斯大林写信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后悔、请他原谅并哭了。斯大林厌恶地说：

“他怎么啦，是女学生呀，还哭?”

但那时斯大林好像是原谅了莫洛托夫。而到 1949 年，他突然又抓了这件事，给政治局委员们散发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来往信件，而且不作任何解释。政治局里是些新人。他们很有兴趣地得知，莫洛托夫，苏维埃国家的支柱之一，原来犯了这样严重的政治错误。正是在这个时刻，国家安全部在斯大林的同意下逮捕了莫洛托夫的妻子。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卡尔波夫斯卡娅）比莫洛托夫年轻 7 岁。她出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从 14 岁起就在卷烟厂当烟丝填装工。1917 年 5 月她得了肺病。她不能再工作，要进行作治疗，住在姐姐那里。革命后她加入了红军。1918 年她被吸收入党，1919 年被接纳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负责妇女工作的指导员。她与莫洛托夫是在彼得堡的一次会议上认识的。

1921 年她跟随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转到了莫斯科，并开始担任罗戈什科—西蒙诺夫斯克区委的指导员。同年，她与莫洛托夫结了婚。婚后热姆丘任娜开始学习。1925 年她在莫斯科毕业于波克罗夫斯基工人速成学校，1927 年读完了共产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进修班。

1927年夏天，热姆丘任娜成为了“新霞”化妆品厂的党支部书记。她当了一年的扎莫斯克沃列茨克区委的指导员。1930年9月她被任命为“新霞”化妆品厂厂长。

在那些年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两家相处和睦。在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生命的最后时刻，波林娜·热姆丘任娜一直在她的身边。这发生在1932年11月的节日里。11月8日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还在大剧院里看演出。娜杰日达似乎觉得丈夫过分关注其中的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在苏联领导层里，欣赏芭蕾舞女演员被认为是时髦的事情。后来他们去伏罗希洛夫家吃晚饭，那天他邀请了很多客人。

斯大林的心情非常好。后来人们说，他似乎对一位元帅夫人特别关注。这件事不是没有引起周围人，首先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注意。斯大林发现她不满后，将橘子皮扔到她的盘子里，并用有些粗暴的态度朝她说：

“喂，你！”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勃然大怒：

“我不是你的‘喂，你’！”

后来她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跟着她出来。阿利卢耶娃和热姆丘任娜两人在秋天的克里姆林宫里散步了很久。在斯大林时期，这里是不对参观者开放的。除了警卫以外，那里没有任何人。

热姆丘任娜后来说，娜杰日达抱怨自己的丈夫。她猜忌斯大林，并认为她这样想是有根据的。波林娜·谢苗诺夫娜对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说：

“你父亲很粗暴，她同他在一起很艰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要知道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不少年，有了孩子、房子和家庭，大家都这么爱娜佳……谁又能想到呢！当然，这不是理想的婚姻，可难道有纯粹理想的婚姻吗？”

但是晚些时候阿利卢耶娃好像平静了下来并回家去了——总书

记的家在克里姆林宫那座叫游戏宫的楼里。

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睡在不同的房间里。她睡在自己的屋子里。他睡在办公室或者睡在餐厅旁边那间有电话的不大的房间里。那个晚上宴会后他也就睡在那里。这就是说，在那个不幸的时刻，在她绝望、苦闷、充满醋意的时刻，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完全是一个人独处的。如果斯大林回家后想到对她解释一下或者是一般地去看一看他的妻子情况怎样，她可能会活下来的。但是，他从伏罗希洛夫那里回来时心情很好，应该认为，他不想让对妻子作那种不愉快解释来扰乱自己的好心情。

清晨，女管家来叫醒娜杰日达，发现她已经死去。她是用她兄弟帕维尔给她的女式手枪自杀的，斯大林后来处决了他，而且几乎是把他妻子的所有亲属也都处决了……

后来才清楚，娜杰日达的存在对斯大林有着良好的影响。在她活着的时候，在斯大林的家里不搞这些难熬的、最后往往搞得非常不成体统的酒宴。醉醺醺的政治局委员们把熟透了的西红柿扔到天花板上，像疯子一样地大笑。

斯大林在妻子死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渐渐变得整天愁容满面。斯大林害怕独处，开始更多地喝酒，一连三四个小时坐在饭桌旁，直到烈酒让他变得迷糊为止。而且他总是让与他共同进餐的人一起同饮。

在最后的几年里，斯大林常把自己从里面锁在房间里。在他的别墅里经常可看到各种各样新的门锁和门闩。周围有那么多警卫，可他还是害怕……甚至每日乘车在莫斯科行走，每次他都要命令按不同的线路行驶。他几乎都要亲自对驾驶员说该怎么走。

他决不第一个去碰桌上的饭菜，总是等着客人中有人先去尝试。有一次，他走出卫生间，在战友们在场的情况下，他冲向站在门边的警卫说：为什么胆敢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战友们不明白：难道斯大林想要警卫陪他一起上厕所？

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会等待着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斯大林

几乎灭掉了自己的全部亲属。他监禁了莫洛托夫和加里宁的妻子。他自己的妻子也完全有可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但也许她的影响会使得斯大林有所收敛。如果没有克里姆林宫里的那次 11 月的枪声，他老年时或许会不至于那样忧郁，不至于对国家造成那么大的危害。

告密代替举杯

按照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回忆，在 30 年代初斯大林很能倾听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的意见。她给领袖灌输的思想是必须发展化妆品制造业，因为妇女们需要的不仅是肥皂，而且还有香水和化妆品。

热姆丘任娜起初领导了一个肥皂—化妆品工业托拉斯，而到了 1936 年夏天，她成了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肥皂和化妆品工业管理总局局长。一年之后，她已经是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了。米高扬写道："她是工人出身，很能干和充满活力，思路敏捷，具有组织才能并完全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除了优点之外，我对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她的领导下，这个领域的工作开展得如此顺利，于是我能给她提出苏联的香水在质量上要不比巴黎香水逊色的任务。那时，从总体上来说，她是完成了这项任务的：香水生产开始具有现代的水平，我们最好的香水得到了承认。"

1939 年 1 月，斯大林任命她为渔业人民委员，下令选举她为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她被授予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和荣誉奖章。但是在那一年，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态度急剧改变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突然得到了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去的任命，而他的妻子碰到了更加严重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她立了案，指控她与"人民的敌人和间谍"

有牵连。尽管根据这种指控首先应该审讯的是斯大林本人——是他任命了那些人担任高级职务，后来又是他自己宣布这些人是敌人的……

1939年8月10日，政治局通过了一个被放入“特别档案”的绝密决议。里面说，莫洛托夫的妻子（这里故意不提他的姓名）“对自己所联系的人表现出了不慎重和糊涂，结果是在热姆丘任娜同志的周围出现了不少敌对的间谍分子，这样就不由自主地方便了他们的间谍工作”。

政治局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涉及热姆丘任娜的所有材料进行细致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聪明人立即编造了有关她参与了“有害的间谍性工作”的证据并把它们提交给了中央委员会。

但是斯大林暂时赦免了她——破坏莫洛托夫的威信对他来说就足够了。10月24日，政治局重新研究了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的行为。对她提出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指控被认为是“诋毁性的”，但说她“不慎重和糊涂”的指责则被写进了决议。

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说：

“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好工作人员和好同志。使人感到愉快的是，她从不让人感到她不单单是个党员，而且还是莫洛托夫的妻子……斯大林对她十分尊重……热姆丘任娜的胸前挂满了勋章，但所有勋章都是合情合理地得到的，并没有引起任何闲话。突然斯大林的愤怒降到了热姆丘任娜的身上，我即使现在对此也找不到任何解释……对她具体的指控是什基里亚托夫（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提出来的……热姆丘任娜为自己作了辩护。尽管当时我相信斯大林是对的，并站在斯大林的一边，但我从内心深处赞赏她。可是她勇敢地捍卫了自己作为党员的尊严并表现出了非常坚强的性格……”

她被解除了渔业人民委员的职务，职务降得很低，转到了共和国一级的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任纺织工业管理总局局长。1941年2月，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会议上，热姆丘任娜失去了党中央

候补委员的头衔。

莫洛托夫不敢为她说一句话，但是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这是惟一的、在当时算是勇敢的举动（某些其他的党的领导人曾要求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用自己的手去消灭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亲属）后来也算是他的罪过了。

战后好像斯大林原谅了她过去的罪过。1946年10月热姆丘任娜被提升——她领导了苏联轻工业部纺织一毛皮工业管理总局。但是斯大林没有放弃同莫洛托夫算帐的念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指责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说，她对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影响不好”。也许这是间接地说她在娜杰日达自杀一案中有罪过……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叙述了一段完全是神话般的插曲。1948年他同莫洛托夫一起来到斯大林那里，当时斯大林正在南方疗养。与他们一起共进午餐的还有斯大林的助手、享有无限权力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对中央书记们称呼“你”。突然，波斯克列贝舍夫站了起来并说：

“斯大林同志，当您在南方这里休养的时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莫斯科策划了反对您的阴谋。”

脾气暴躁的米高扬抓住了椅子并一面说着，一面扑向了波斯克列贝舍夫：

“你这个恶棍！”

斯大林阻止了米高扬并说：

“你为什么这么大叫，你可是在我这里作客。”

米高扬开始激烈地说：

“无法听这种话，没有这种事，压根儿不可能有！”

斯大林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

“既然这样，就别管他了。”

莫洛托夫坐着，面色白得像一张白纸。但是一直沉默着，没有说一句话。

波斯克列贝舍夫并非是自己主动想这样说的，这是清楚的。这是心理上的测试。斯大林经常搞这种挑唆，并注意观察被指责的那一方是如何反应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犯了错误，那么，他就一定会露馅的。主要的是要给他一个措手不及。

“你必须同妻子离婚”

所有战后几年都是在无休止的阴谋中度过的。政治局委员们常常根据斯大林不断变化的心情变换着职位，斯大林一直在摆弄纸牌给自己的干部算卦。领袖累了，显然是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1946年5月取代马林科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并领导党的部干审查局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回忆了斯大林是怎样给他打电话的：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领导人要求我接见他们。他们是想汇报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允许他们来莫斯科，他们也来了。但是我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授权您来接见他们，好好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并于上午前提出建议来。他们说，他们有些情况非常不好。”

是什么“不好”，斯大林没有明确说，虽然他非常了解摩尔达维亚的局势：共和国发生了饥荒。他根本不想处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尽管这是涉及到整个共和国命运的问题。这一点在中央机构里人们是能清楚地感觉到的。如果斯大林亲自给什么人安排任务的话，领袖的委托是一定要立即完成的。所有其他的思想和指示都可高高挂起。党和国家的办事机构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搞阴谋，在注视上层力量配置的变化。

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在1952年当上了中央书记。他后来说：

“斯大林召见了我们这些年轻的书记，但只向我们训了话。那时我们什么具体事也没有做。”

年龄和身体状况不允许斯大林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但是他还能撤职和任命干部。任何一个最接近他的人都不能弄清楚他的心境。他甚至撤掉了像他的私人卫队队长弗拉西克将军和当了他的助手几乎 30 年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的那样一些忠实于他的仆人。最高层的领导成员们像罐头里的蜘蛛一样力图互相诋毁，以便保住自己或者爬到更高的空缺职位上去。历史学博士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茹可夫对苏联领导层中的权力之争作了很好的描述。

莫洛托夫的地位渐渐地被削弱了。在 1946 年 3 月的中央全会上，成立了由各政府副主席组成的部长会议常设局。任常设局主席的不是莫洛托夫，而是那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贝利亚。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实际上成了国内的第二号人物，因为他总的负责对原子能项目和最为重要的几个部的领导。马林科夫也遭了难，因为整个中央办事机构不起作用了，那里按部门设置的各个部都被解散了。只留下了两个管理局——干部局和宣传局，还有负责组织指导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部。5 月 4 日马林科夫根本就被从中央书记处除了名——斯大林认为他对他所负责的航空工业工作的缺点负有责任。但他的失宠只持续了三个月——一直到 8 月 2 日，斯大林又把他变成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副手。

1947 年初，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得以部分地恢复自己失去的地位。斯大林亲自领导了部长会议常设局，莫洛托夫成了他的第一副手，这就是说实际上是由他主持常设局的会议。

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情报机关从国家安全部里抽了出来。通过政府决定成立了部长会议信息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它包括了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以及党中央情报和信息机构。有意思的是，领导信息委员会的不是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而是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但是领袖相对宽容的那个短暂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1948 年 3 月，莫洛托夫被免去了主持部长会议常设局会议的权力，称此举是为了使他能够“主要从事外交政策事务”。

10月，热姆丘任娜失去工作并被转为轻工业部后备人员。国家安全部又对她立了一个新的案子。后来热姆丘任娜被开除出党，而此举意味着很快就将被捕，此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

“你必须同妻子离婚。”

莫洛托夫一辈子热烈地爱着波林娜·谢苗诺夫娜。他去什么地方时，总是随身带着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回到家里便把同斯大林的谈话告诉了妻子。波林娜·谢苗诺夫娜坚决地说：

“既然党需要这样做，那我们就离婚。”

她的性格也是够倔的。她收拾了东西便去了亲戚那里——这似乎是与莫洛托夫离了婚。1949年1月26日，她被逮捕。向中央委员们散发了有关她的案子的材料。那里有许多卑鄙的详细描述，这是侦查人员编造出来的，明显地想要让莫洛托夫出丑。国家安全部的材料强调说，热姆丘任娜对丈夫不忠，甚至还提到了臆造出来的她的情人们的名字。

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于1955年在医院里遇到了莫洛托夫，曾愤怒地问他：

“为什么您，一个政治局委员，允许逮捕您的妻子?”

莫洛托夫的脸上纹丝不动。

“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应该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这里与纪律没有任何关系。对他来说，妻子被捕是一场极大的悲剧，但是莫洛托夫不敢反对斯大林，否则他马上就会随着她而去。

3月4日，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似乎是为了让他出丑，起先派他去领导部长会议冶金地质局，而后是领导交通邮电局。

莫洛托夫的理解是对的，不是他因为妻子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而是她因为他去蹲了监狱。

“有人到我这里来找突破口，然后审讯她，说什么她也是某个

阴谋事件的参加者，要贬低她，是为了败坏我的名声。她被一次次地传讯，说什么我并不是真正拥护全党的路线的。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在卢比扬卡受讯。每天莫洛托夫都要带着警卫坐着黑色高级小轿车路过国家安全部所在的大楼。但他不能为自己的妻子做任何事情。他甚至不敢去打听她的情况。诚然，她还没有遭拷打——因为他的命运还没有最终决定。对她的指控是根据可悲的著名的第 58 条款作出的，所有的政治犯都是根据这一条被枪决或监禁的。第 58 条有很多款。把若干指控编织在一起便可作出任何判决——从流放到枪决。侦察员们为她编织的还不是最危险的一套：

第 58 条第 1 款第 1 项——非军人所犯的叛变祖国未遂罪；

第 58 条第 10 款——反苏宣传和鼓动；

第 58 条第 11 款——旨在策划或实施反革命罪行的有组织活动。

1949 年 12 月 29 日，国家安全部召开的特别会议宣判她流放五年。她被送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塔奈州。

拉夫连季·贝利亚有时在莫洛托夫的耳边悄悄地说：

“波林娜活着。”

国家安全机构注视着莫洛托夫的一举一动。1949 年想出了装修莫洛托夫的书记处房间的主意。如报告中所说，在整理时发现，有一幅“斯大林的像画得很怪”。说它怪是因为斯大林未被画得像一个活生生的纪念像。这一发现被报告给了贝利亚。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米哈伊尔·波马兹涅夫后来于 1953 年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写信说，贝利亚十分高兴并让搞清楚，这幅肖像是出于谁的手。莫洛托夫秘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承认，当他在苏联驻巴黎使馆工作时，一位想要回国的侨民画家将这幅肖像交给了他。贝利亚非常失望，因为未能把这幅有疑问的画像算到莫洛托夫本人身上。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继续在克里姆林宫里居住。他的轿车不用停便能直接开进博罗维茨大门。如果女儿斯韦特兰娜坐车

来他这里，汽车就得在博罗维茨大门口停下。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的军官们要检查证件并向值班人员报告。政治局委员们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有克里姆林宫宿舍管理员发给的专门通行证。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套房所在的三层楼房已经不在了。在这个地方建造了大会堂。过去有一条共产主义街从那里通过。那里有车库、医疗站、洗衣店、理发店和其他保障政治局委员们生活的服务场所。在楼门口有警卫站岗，在每一层也都设有警卫。

米高扬带着一大家子占了有八间房的住房。莫洛托夫住在米高扬的楼上。在热姆丘任娜被捕之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剩下了一个人。斯韦特兰娜住在市内，在那里她感到比在克里姆林宫里更自由一些。父亲和女儿实际上彼此并不来往。很难招呼朋友们来家里。处处都是国家的、带有铁皮编号的家具。整个是一种死气沉沉和寂寞的感觉。在房间里还有壁炉，每天早晨那里烧着柴火。

1950 年 4 月，斯大林重组了部长会议常设局的机构。现在他让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作自己的第一副手，几年前他曾是斯大林在军事部门的副手。最后在 1951 年 2 月又发生了一次部长会议常设局的改组，这次改组证明出现了新的力量配置："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志轮流主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主席团常设局的会议，还授权他们研究和解决日常的问题。

"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命令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签字后公布。"

莫洛托夫已经不是这个新的常设局里的人了。日常的权力集中在三个人——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的手中。不过，就连他们也知道，他们的高位是非常不可靠的。

有一次，在斯大林那里吃过午饭后，正受赏识的布尔加宁向赫鲁晓夫抱怨说：

"你去他那里作客，在那里请你喝，请你吃，但之后你就不知

道你将去哪里：是自己回家去，还是别人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去蹲监狱。”

赫鲁晓夫写道，他是在醉醺醺的情况下说这些话的。但要知道清醒的人在想些什么，那就……

“您姓什么？”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忆说，逐年变得愈加明显的是，斯大林的体力在变弱：“有一次，我们坐在桌边，他在向一个认识了几十年，也可能认识了更长时间的人打招呼时，突然停了下来，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姓名来。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生气，他不想让别人发现这种生理上的衰退……我记得，有一次，他招呼布尔加宁时怎么都不能想起他的姓名来。朝他看呀看，说：

‘您姓什么？’

‘布尔加宁。’

‘对，布尔加宁！’

只是在那个时候他才说了想对布尔加宁说的话。

这样的情况经常重复，这使得他发狂。”

斯大林不参加中央主席团常设局的正式会议。当他从别墅来到克里姆林宫时，就邀请大家去电影厅。他们看一两部电影，顺便讨论点什么事。赫鲁晓夫写道：“看过电影之后，斯大林照常宣布说应该去吃点东西。在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也一样，在斯大林那里总是把这叫做午饭。大家坐上轿车，一起到他离得最近的别墅。在那里继续‘开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深夜的午餐会变成沉重的酗酒。斯大林简直是强迫大家把自己灌醉。也许他喜欢看到自己的战友们醉醺醺的可怜相。也可能他相信，喝醉了的人一定会道出自己隐秘的思想。

米洛万·吉拉斯是当时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之一，他惊奇地描写

了在斯大林别墅里的一次晚餐，他是在1944年同领袖的第一次会见后过了三年又去那里的。他注意到领袖的体力明显不支："斯大林提议每个人说出现在有零下多少度，然后作为惩罚，错多少度，就要喝多少杯伏特加酒……我顿时感受到了聚集在自己年事已高的领袖周围的苏联领导层生活的孤独、空虚和茫然……斯大林以前就喜欢讲究吃，可是他现在表现得这么贪婪，好像是害怕他再也吃不到美食似的……"

斯大林没有永久的朋友。他只有永久的利益——保住完全的和个人专有的权力。而朋友和战友们都在不断地变换。他更想让他们一直处于恐惧状态，其中包括采用逮捕他们的妻子、兄弟和孩子们的办法。

苏联形式上的总统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及其妻子的命运比莫洛托夫夫妇还要惨。

1938年10月25日，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加里宁娜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二处逮捕，她被指控参加反苏活动以及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有联系。在贝利亚提交斯大林的材料上说："经过侦查确定，从1929年开始，加里宁娜在组织上就与右派分子的反苏破坏恐怖组织的人在一起，并对他们的反苏活动起了促进作用。她与一系列联共（布）的敌对分子有密切联系，他们是：前苏联法律研究所所长A. O. 米舍利、前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副经理M. Г. 格尔奇科夫、前民航总局工作人员奥斯特罗乌莫娃、前联共（布）中央工作人员H. Ф. 奥斯特洛夫司卡雅和该组织的其他人员，这些人后来因参与右翼托洛茨基分子活动被判刑。加里宁娜向他们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以便进行反革命聚会，在那里他们讨论了该组织旨在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和领导的反苏活动问题。"

"加里宁娜在同B. П. 奥斯特罗乌莫娃紧密交往期间，向她通报了带有秘密性质问题的消息，被奥斯特罗乌莫用于间谍活动。自1936年起，加里宁娜作为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一直与右派

分子保持着联系，他们是：前最高法院工作人员贝尔曼和前苏联法律研究所工作人员帕舒卡尼斯（均已被判刑）。”

“除此之外，经过侦查确定，截至1924年，加里宁娜隐瞒了有关她的兄弟洛尔贝尔格·弗拉基米尔（已被判刑）是沙皇暗探局内线的事实。”

“Е. И. 加里宁娜承认自己在提出的指控中有罪。”

“1939年4月2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7—58—6、17—58—8和58—11条判了她为期15年的劳改营监禁，并剥夺权利5年。”

在1945年5月9日的胜利日那天，指望得到领袖的特赦，她致函斯大林说：“我，加里宁娜，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于1938年根据第58条被捕并被判在劳改营监禁，为期15年。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更严重的是，您曾及时地给我指出过，而我却没有给予重视。对自己的处境和周围的人的这种不自觉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过错，为此我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我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并深切地感到后悔。我犯这些过错不是因为我有有意识的敌对思想，而是由于我不了解局势以及对我周围的人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我完全丧失劳动力已经多年。我惟一的希望是期待您的宽恕：请您原谅我所犯的错误，并使我有可能在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度过余生。”

关于这封信，人们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弗谢沃罗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做了报告。由于事情涉及留任政治局委员的加里宁的妻子，梅尔库洛夫把信转给了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在信上写道：“致戈尔金同志。要予以特赦并立即释放，准许获特赦者来莫斯科。”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戈尔金那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

6月11日，主席团讨论了“关于加里宁娜，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的特赦请求”，决定：“给予加里宁娜，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特赦，提前从刑地释放并解除对其权利的剥夺和判刑。”

斯大林对她的突然赦免，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加里宁已经病入膏肓。把他的妻子关在劳改营里再也没有意义了。莫洛托夫还留任政治局委员，他在民间依然被看作是领袖最亲近的人。游行的人群举着他的画像。许多城市和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是斯大林在政府里的副手。每天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并整天坐在自己的大办公室里，读着报纸和塔斯社的新闻消息，回家吃午饭，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事情。斯大林不给他打电话，也不请他去。

斯大林几乎从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而是为解决这些或那些问题成立五人、六人、三人小组。结果是，譬如说，如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没有进入这些三人和五人小组，那就意味着，不给他发任何材料，既不请他去开会，也不征求他的意见。

莫洛托夫的一位助手对我说：

“在那些年代，看着他都令人觉得可怜……”

在特别车厢里被招募的间谍

斯大林在政治上的算计由于他的老年多疑症而变得更多了。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莫洛托夫是美国间谍。他是在访美期间被招募的。否则为什么美国人要给他一个特别的车厢？他们是在车厢里同他进行秘密谈判并把他给招募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一次斯大林在苏呼米休假时，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莫洛托夫是美国的间谍，同美国合作……于是莫洛托夫就开始求别人帮助。我和米高扬也都在那里，大家都说这好像不大可能。

斯大林说：‘你们大家都记得，莫洛托夫在参加一次联合国大会时曾报告说，他从纽约乘火车去了华盛顿。既然是乘火车，那就是说，他在那里有一节自己的专用车厢。他怎么会拥有它的呢？这

就说明他是美国间谍’。

我们回答说，那里的国务活动家没有任何私人的铁路车厢。斯大林则是按照他在苏联实行的办法和规矩来思考问题的，在这里他不仅有沙龙车厢，而且还有一个专列……

对大家对他的说法所表现出来的不信任，他尖锐地作出了反应，马上就口述要给那时驻纽约的维辛斯基发一封电报：要求维辛斯基查一下，莫洛托夫在美国是否有自己的车厢？这封电报马上用密码发走了。维辛斯基迅速地答复说，根据经过验证的查询，目前没有发现莫洛托夫在纽约有私人车厢。

斯大林对这个答复并不满意。他其实不需要答复。主要的是他的不信任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他在为自己这种不信任寻找依据，想要得到确认，从而可以向其他人表明，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他喜欢对我们重复说：

‘你们是瞎子，是些小猫，要是没有我，帝国主义分子会把你们掐死的’。

这就是他所想要的，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他希望把莫洛托夫说成是个不诚实的人而得到满足感。”

看到莫洛托夫离灭亡已近在咫尺，政治局的“同志们”就急着要把他溺死。1949 年制造了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逮捕并消灭了一批来自列宁格勒的著名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他们中有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和政府副总理沃兹涅先斯基，中央组织局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

莫洛托夫只有在出差的时候到过列宁格勒，但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试图把他也扯到这个致命的案子中来。1949 年 10 月，他们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政治局致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秘密信件的草案——“关于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季奥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

这个文件说：“政治局认为还要指出的是，在涉嫌从事敌对活

动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是接近莫洛托夫的人。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多年来受到莫洛托夫同志的特别支持和巨大的信任，莫洛托夫同志是袒护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季奥诺夫的……作为一个同这些人接近的人，莫洛托夫同志不能不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考虑到上述这一切，政治局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下列建议：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向联共（布）中央解释有关本信件中所说的事情，并委托政治局讨论这些解释'"。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回忆说，当 1913 年沙皇警察来逮捕他时，他跳出窗外逃跑了。现在他无处可逃。他等待着被捕。他明白，他不会被送去劳改营。他会被作为反对苏联政权的间谍阴谋的头子被告上一个大的诉讼案并被枪决。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策划了新的一轮迫害运动。所有的一切就像是在 1937 年那样按照经过考验的套路进行的。只是这一次确定了犹太人是主要的牺牲对象。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计划，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是犹太人，设想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中把她作为被告之一。但是热姆丘任娜仅仅是共和国一个部的管理总局的领导人，一个小人物。而国家安全部策划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阴谋，它应该使全国受到震惊。出现了另一个主意：为什么不把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变成反苏阴谋的领导人呢？

为他编造的罪名是，他是通过妻子与犹太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联系的，他差一点儿就支持了把因为战争而变得居无定处的犹太人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迁往克里米亚的想法，而那里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被迁走了。至今不清楚是谁想出了这个“克里米亚主意”的。米霍埃尔斯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著名活动家并不认为迁往把克里米亚鞑靼人赶走了的克里米亚是可行的。但是，在这个委员会里，中央委员会机关任命的几名编内办事人员却积极地推动了这个主意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莫洛托夫也拉进来讨论这

个主意。这已经足够了。后来才清楚，这几个人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员。在斯大林的想象中，犹太人想要占领克里米亚，是为了做白卫军弗兰格尔将军在1920年没有做成的事情：召唤美国人去那里，把这个半岛从苏联夺走。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当时没有把莫洛托夫拿掉呢？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回忆说："莫洛托夫是一个最接近斯大林的人。莫洛托夫一直是作为一个常在的伟人存在的，他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在我们这一代中间，始终是最受尊重和让大家最先想到的人。"

对于整个东欧来说，莫洛托夫是党内的二号人物，在那些被斯大林强迫拉入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他如被清除和逮捕，会引起疑惑。要消灭莫洛托夫就必须好好做准备……

历史学家们试图搞明白：为什么斯大林需要做这一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对犹太人久远仇恨的表现？是妄想狂？是脑子有毛病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起了致命的作用。但主要问题在于另一方面。他在准备对付新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的概念已丧失了令人恐惧的意义。要知道这是双方在心理上已经进入热战的时候。所以斯大林需要使人们作好战争准备，明确外部敌人，并把外部敌人同内部敌人连在一起。

对苏联犹太人的迫害，对一个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国家来说，是来得如此突然。实施这种迫害，杀害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总监所罗门·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及逮捕"医生杀手"，所有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是，斯大林决定要宣布犹太人是美国间谍。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早在1940年3月的日记中就曾写道："斯大林会不会也要逐渐消灭犹太人呢？也许，只是为了把全世界都搞糊涂，他会称他们为托洛茨基分子。谁知道呀？……"

在军队政工人员的会议上曾直接宣布过，下一次战争将是同美

国的战争。而在美国定调子的是犹太人，那也就是说，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是未来的叛徒。他们现在已经在为美国人当间谍或者从事破坏工作了。为一场大的战争做准备，应该从消灭内部敌人开始。这能把人民团结起来。

伊利亚·爱伦堡在总结自己一生时写道："我后来一直在绞脑筋，想弄明白，为什么斯大林要向犹太人发难。Я. З. 苏里茨有一次对我说，早在1935年，当他还是我国驻德国大使时，他曾向斯大林报告纳粹分子的政策，也谈到了德国反犹太人运动的猖獗。

斯大林突然问他：

'你说说，德国的犹太人真的有反国家情绪吗？……'

我感觉，斯大林完全相信出身相同的人都是相互勾结在一起的；要知道他在镇压'人民的敌人'的同时，也不怜悯他们的亲属。还谈什么家庭呀；当按照他的命令把整个民族都从他们的家园赶走时，把所有的人都抓走了，也包括党的领导人、政府成员和苏联英雄在内。反犹太主义是有自己的传统的，但我从未听说过反印古什主义或者仇视卡尔梅克人的行动算是什么。

听说斯大林总是笃信一种思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设想，他要整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由同一种出身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中又有数百万人生活在美国。这自然是猜想，我不可能想出什么来——我不知道，而且也不理解"。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公众场合讲话用词是非常小心的，从不会有反犹太人的提法——他不想被人看成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努力强调这一点。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回忆说，1952年春天，在讨论提请颁发斯大林奖金的文学作品时，斯大林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通独白，似乎对有人要在文学笔名下标明作者的真实姓名的做法感到愤怒，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一个人给自己选择了笔名，这是他的权利。但是，看来有人乐于强调，说这个人有两个姓，乐于强调这

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散布反犹太主义？谁需要这个东西？”

斯大林之所以这样说，是知道他的话当天就会在全莫斯科传开。他只是在非常小的圈子里，在自己人中间，才会坦率地说话。

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领袖所说的所有的话。根据他的日记记载，在1952年12月1日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斯大林曾说过：

“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分子，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内线。犹太民族主义分子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感谢美国人。在医生中间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分子。”

就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恼怒地谈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状态不佳”：“懒惰和腐化深深地触及了国家安全部”，契卡工作人员们的“警惕性迟钝了”。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几个月中，他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要比对党中央或政府中的工作更为操心。

1953年初，通过了增加劳改营和监狱床位的决定。交通部得到了准备转移大批犯人的命令。对根据策划谋杀政治局委员的莫须有罪名被捕的“医生案件”的侦查开始狂热起来。要求国家安全部的侦察员们尽快提出关于医生同某个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材料。

第二个诉讼案也正在策划之中——针对的是克里姆林宫卫队的一位军官，似乎他同美国人有联系。

一切是为了对美国提出严厉的指控。不仅是干涉了苏联的内政，而且还策划了反对斯大林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恐怖主义行动。斯大林原来的卫队长、被撤职和被逮捕的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被指控与被称为美国间谍的人有联系。在国家安全部的审讯中，弗拉西克被要求承认：他向这些人公开了保卫斯大林的一套机制。

莫洛托夫也应该受到这个案子的审讯。斯大林压根就想摆脱这些还活着的老战友们。他认为他的下属们是些软弱的人，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甘拜下风，他们身上缺乏真正的坚强性。他想他将离开

人世，他怕老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怂恿年轻人去作出让步和放松警惕。

1951年1月，斯大林召集了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书记和国防部长到他那里开会。他说，到1953年年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将完全结束其准备工作，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应该拥有相应的军队。总参谋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念了一个单子，上面写着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军队。但是，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们不相信将会发生战争，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如果把所有资金都用在军队上，生活水平将会下降。

甚至像匈牙利领导人马加斯·拉科西这样忠诚于斯大林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国家无法承受的军事开支。保加利亚的同行忧郁地微笑着对他说，匈牙利还算是幸运的：

“你们没有海洋。你知道一艘巡洋舰要多少钱吗?”

当拉科西计算出维持军队、军事工业、建筑工事、战略物质储备和成立国内卫队共需要多少钱时，他明白了，这简直要超出国家的预算能力。他试图向斯大林抱怨。后者叹了口气说：

“如果您知道我们花了多大的代价抓国防就好了！……但如果您现在去省军队的钱，那么，一旦战争爆发，敌人就会轻而易举地炸毁你们的工厂或者占领国家的大部分领土。除此之外，您若不拨出共同计划所规定的发展军队用的资金的话，那苏联就得拿出这笔钱来。您觉得这样做对吗?”

在斯大林生前出版的最后几期《共产党人》杂志，是他所提拔的、后来成为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德米特里·切斯诺科夫编辑的，那里谈到了与帝国主义者不能共处的问题。

没有速记记录的中央全会

在政治局的历史上，总会有一个时刻，在一定的阶段最后结束后，所有见证人就都消失了。对于莫洛托夫来说，这个时期也来临了。他知道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党的机关已经被警告过，说莫洛托夫是个可疑分子，也可能是危险人物。斯大林在第 19 次代表大会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这一点。

第 19 次代表大会是在 1952 年 10 月 5 日召开的，那是个星期日。莫洛托夫发表了开幕词。他连想都不会想到，在大会结束时等待他的是什么。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作了总结报告。他同时兼任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被看作是斯大林的副手。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马克西姆·扎哈罗维奇·萨布罗夫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的报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有关党章修改建议的说明。

第 19 次代表大会让人难忘的是，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而政治局改名为主席团。大会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里举行了招待会。伏罗希洛夫向外国客人们表示欢迎。所有祝酒词都是由他讲的。斯大林的心情非常好。

10 月 16 日，在代表大会后照例举行了中央新班子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要选出领导机构——主席团和书记处。这次全会没有速记记录。那天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的事情，只有从全会参加者的叙述中才能得知。他们对具体的细节讲法有不同，但所谈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对于当时任库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来说，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全会。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鲜明的，他记住了许多情节。我现在就来引用他的叙述。

“全会开始时没有任何要发生突然事件的预示。在主席团就座

的是上一届政治局委员们。马林科夫一开始就请领袖讲话。斯大林穿着灰色的弗伦奇式薄呢军上衣，一边沿着主席台的桌子慢慢走动，一边说：

‘这不，我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它开得很好，许多人可能感觉，我们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致。一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各项决定。问为什么我们要大大扩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我们老头子们都会死掉的，可是需要考虑，我们这一伟大事业要由谁来继承。为此就需要更年轻的和忠诚的人、政治活动家们。培养一个国务活动家需要10年，不，需要整整15年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扩充了中央委员会的班子……’”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把著名的党和国务活动家从重要的、部长的岗位上撤下来？我们解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其他人的职务，让新的工作人员取代他们。为什么？有什么根据？部长的工作是男子汉的工作。它要求花大力气、要求实际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一些有功勋的同志们从他们的岗位上撤下来，并任命新人、比较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来担任他们的职务的原因。他们是充满了活力的年轻人。”

“至于最著名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们，他们仍然还是著名的活动家。我们让他们转而承担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工作。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这里有多少副手……”

“如果我们谈到关于我们队伍中的团结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某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的不正确行为。我指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莫洛托夫是一个忠于我们事业的人。只要召唤，他就会毫不犹豫和毫不动摇地为党献出生命。但是不能回避他的那些不体面的行为。”

“我们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在外交招待会上喝着‘沙尔特廖斯甜酒’，答应英国大使在我国出版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杂志。有什么理由？难道不明白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在苏联人中间散发资产阶级的出版物除了害处是什么都不会带来的吗。”

“这是莫洛托夫的第一个政治错误。莫洛托夫提出的把克里米亚交给犹太人的建议有什么价值呢？这是莫洛托夫的严重错误。我们有个犹太自治州。难道这还不够吗？让这个自治州去发展吧。而莫洛托夫同志不应该是犹太人对我们苏维埃克里米亚提出的非法要求的辩护士。莫洛托夫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我们坚决地驳回了他所臆想出来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这样深切地尊敬自己的夫人，以至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就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通过政治局的决议，热姆丘任娜同志却很快就知道了。结果是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接着政治局和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任娜以及她的朋友们。而她的周围是一群不能信任的朋友。很清楚，政治局委员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现在来谈谈米高扬同志。你们看到了吗，他反对对农民提高农业税。我们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是谁？难道他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与农民有着牢固的联盟。我们让土地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他们也应该对国家承担该有的义务，所以，不能同意米高扬同志的立场……’”

“当斯大林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厅里一片寂静。他讲了几乎有一个半小时，而整个全会也只进行了两个小时多一点点。

“米高扬来到讲台上并开始引用经济上的计算为自己辩护。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并用食指指着他威胁说：

‘看您，自己糊里糊涂的，还想让我们在这个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变得糊涂起来’。

米高扬不再说话并离开了讲台。

莫洛托夫也一边为自己辩护说，他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斯大林同志忠实的学生，一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斯大林打断了莫洛托夫说：

‘胡说八道！我没有任何学生。我们大家都是伟大的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说，应该解决组织问题，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他从弗伦奇式军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并说：

‘可以选举这样的同志来担任中央主席团成员，例如……’

他念了一大串名单，并指出这里面包括了除前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外的所有上届政治局委员。斯大林解释说：

‘关于尊敬的安德烈耶夫是十分清楚的：他完全变聋了，什么都听不见，不能开展工作。让他去治病吧！’

然后，使在场的各位感到突然的是，斯大林提议选举一个类似现有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常设局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成员包括：斯大林本人及他在政府里的副手们——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和中央书记赫鲁晓夫。

斯大林没有将莫洛托夫列入中央主席团常委会。而且，未列入的还有米高扬。至于伏罗希洛夫，看来元帅被列入常委会是偶然的。斯大林是在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列出的名单，他的手习惯地写出了这个曾是他最接近的人的熟悉的姓名。可是在全会结束后，当斯大林看到在常委会的名单里有伏罗希洛夫的姓名时，他吃惊地问：

‘这个英国间谍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当主席团常委会被确认时，大厅里响起了喊声：

‘应该选举斯大林同志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体站了起来并鼓起掌来。斯大林挥了挥手，招呼大家安静下来并说：

‘不，请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大家惊奇地沉默起来。

马林科夫急忙来到讲台上说：

‘同志们，我们大家应该一致请求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继续当总书记。’

又响起了欢呼声和喊声：

‘请留任！请收回自己的请求！’

斯大林走到了讲台上说：

‘在中央全会上不需要掌声。需要的是不带感情色彩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我请求解除我的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我已经老了。文件也不看了。你们给自己另选一个吧！’

铁木辛哥元帅站起来说：

‘斯大林同志，人民对此将不能理解。我们大家一致选举您为我们的领导人。不可能有另一种决定。’

整个大厅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斯大林久久地站着，看着大厅，然后挥了挥手并坐了下来。”

中央委员们很清楚，莫洛托夫的官运已到了尽头。斯大林让大家明白，这个有疑问的人不能在领袖死后占据他的位置。

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出席了这次全会，他写道：“斯大林打破了人们关于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最坚定的、最不屈不挠的继承人的概念。他阴险地和有目的地进行打击，要把自己可能的继承人击溃……他不希望莫洛托夫在他之后，在他一旦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成为国内和党内的第一号人物。而他的讲话就彻底消除了这种可能性。”

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住这样的生活的。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却做到了。无论是莫洛托夫，还是所有他在党的领导层的同志们，都陶醉于权力———现有的毒品中最强烈的一种毒品。是的，他们害怕斯大林，在领袖面前献媚拍马，只要领袖要，他们就能跳戈帕克舞[①]，可是国内所有其他的人都害怕他们。

最可怕的还在后面。1953 年 1 月 21 日，曾经被流放过的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重新被捕。这一次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们指控她犯了更严重的罪行，以至已经可以将她永远送到劳改营

---

① 粗犷活泼的乌克兰民间舞。——译注

管理总局去了。他们准备根据第 58 条第 1 款第 1 项（背叛祖国，而不是像以前判的准备背叛）、第 58 条第 10 款（反苏宣传和鼓动）和第 58 条第 11 款（旨在策划或完成反革命罪行的组织活动）来审判她。这就是说，斯大林还是决定除掉莫洛托夫。

但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和波林娜·谢苗诺夫娜有幸的是，一个半月之后斯大林死了。领袖之死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尽管谁也没有像这对夫妇那样对斯大林如此忠诚和如此盲从。

在领袖的葬礼上，在陵墓讲台上发言的所有人中间，似乎惟独莫洛托夫是在同他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对之热爱的人告别。总还是有什么东西已经把他们俩永远连在一起……

贝利亚亲自办理了有关莫洛托夫妻子的命运的案子——他想让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感激他，因为正是他解救了她。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立即被送到了莫斯科。晚上，黑色政府高级轿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克里姆林宫里莫洛托夫的家——主席团成员们是来祝贺莫洛托夫的妻子归来的。1953 年 3 月 23 日内务部侦查处决定：终止针对热姆丘任娜的案子。一天之后，内务部召开的特别会议决定给她完全恢复名誉。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当时已经 56 岁。她再没有回去工作，而到了 4 月，给她发了个人特别养老金。

三驾马车的领导

当斯大林还活着，医生们甚至还发出他的身体状况有某些好转的通报的时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就已经分割了权力。他们知道，即使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能苏醒过来的话，他也已不能再领导国家了。3 月 5 日晚上，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他们举行了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的联席会议。早在规定的开会时间之前，就已有数百个人来到了。所

有的人彼此之间都不交谈，大家默默地坐着。斯大林选出的中央主席团常委会的成员们来了，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已同他们在一起出来了。他们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细心的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我的感觉是，老政治局委员们走出来的时候有着一种深深埋在心底的、不外露的、但从他们身上可以察觉得到的轻松感……有这样一种的感觉，就在那里，在主席团那里，人们已从某种压抑和束缚着他们的东西中得到了解放。他们就像被拿掉了尿布的婴儿似的，难道不是吗……"

马林科夫首先开了腔。他说，斯大林同志继续在同死亡作斗争，但他的身体状况是如此严重，即使他能战胜已经逼近的死亡，也不能长时间地工作了。而国际局势不允许国家没有领导人。因此，必须进行某些任命。

贝利亚登上了主席台，提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又一次走上主席台，这次是提议确认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数减少了一半。责成赫鲁晓夫集中精力在中央书记处工作。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成了党内和国内的首要人物。起初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的十分善意的传说。据说，有一次当他出席一个什么会议的时候，人们对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他说：

"这里不是大剧院，而我也不是科兹洛夫斯基[①]。"

但是马林科夫缺乏毅力、威严和力量来掌握权力。用谢皮洛夫的话来说，"马林科夫是属于那种要依靠什么人和听从更强的人的人"。

---

① 伊·谢·科兹洛夫斯基，俄罗斯著名男高音抒情歌唱家，1926—1954年在大剧院工作，演过很多著名歌剧（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一剧的连斯基等）中的角色。

他的妻子瓦列里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戈卢布佐娃倒是意志和毅力坚强有余，她在战争时期成为莫斯科动力学院院长，铁腕般地领导了该学院的工作。妻子有很多东西可与丈夫共享，而在毅力方面却做不到。

马林科夫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党的机关里工作了，他被斯大林看上，1934 年就当上了党中央的党的领导干部的部长。那时他才 30 岁出头。斯大林是通过马林科夫的手来实现对党中央书记的清洗和调动的。马林科夫获得了直接去见领袖的权利。战前他领导了中央干部管理局，该局有 45 个处，也就是说，整个党的机关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同事们宽容地称他为“话务员”。赫鲁晓夫回忆说，“他总是坐在电话旁：往哪儿了解什么，怎样打通关系，他就会这个。办理组织行政事务、干部调配——这是马林科夫的工作。还有给地方传达指示、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商谈。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有活力的、和气的人。可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党组织。”

斯大林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中特别赏识马林科夫。1952 年春天，斯大林第一次授权他去主持讨论斯大林奖金的会议，尽管过去一直是他亲自主持的。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回忆说，马林科夫觉得很不自在，只是说出了需要讨论的作品的名称。一切都是斯大林决定的。

马林科夫可以给自己选择任何一个岗位。他愿意当政府首脑，因为斯大林在其最后的几年里把权力集中到了部长会议机关里。除此之外，按照传统，从列宁时代起就一直是由政府首脑来主持政治局（主席团）会议的。马林科夫轻率地把已削弱了的党的机关留给赫鲁晓夫，忘记了在 30 年前列宁的战友们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也不明白，在能干的中央书记手里，党的机关将能成为强大的工具。他们被斯大林所迷惑，而马林科夫小看了赫鲁晓夫。

莫洛托夫重新成了外交部长和政府第一副主席。他曾希望得到更多。他强调说，在党务领导方面他是惟一与列宁共过事的人。但

是没有让他当第一把手。为什么？

早在斯大林逝世以前就形成了两个集团：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为一方，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为另一方。莫洛托夫置身一旁。在领袖去世之后，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三人领导小组开始执掌一切权力。莫洛托夫还是没有能参加到这伙人中间去。他同党的领导成员的关系不好——他在长时间的任职生涯中已经得罪过所有的人。他不善交友。要是将他安排在政府首脑的位置上，就意味着违背斯大林的意志。从事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没有让莫洛托夫得到实际的权力。

安德烈·季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起1953年他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见到莫洛托夫的情形。使萨哈罗夫感到惊奇的是莫洛托夫的面容，它一点都不像画像上的，干瘪黄色的脸，带着某种固有的警觉的表情，好像每一刻都有致命的圈套在威胁着他似的。

而莫洛托夫在斯大林逝世后还是有了变化。他不再害怕，他略微松弛了起来，努力使自己的举止变得温和和礼貌一些。他对指责他冷淡和拘泥细节往往是很生气的：

“这只是某些人把我想象成丧失了人的品质的机器人。”

有时，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甚至开始说俏皮话，但看得出来，他这样做更多地是为了公务上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心的驱使。

他的助理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

“斯大林逝世一个月之后，他把我叫去并提议当他的助理。他说，我们需要改善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我看到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换了一种样子同外国人交谈，变得更加随便一些。甚至还说一些笑话。可我现在不想重复这些笑话。”

在部机关里人们得出的结论是，莫洛托夫的变化不大。他依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人。他的一切都是按着时间表来进行的。午饭后他躺下睡一小觉。如果他睡得比往常长一些时间，卫队长就会来叫

醒他。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回忆说，他在头脑里把那硕大的办公桌划分了成八个部分，助理们得严格按照确定好的程序摆放文件：那儿放特急通知，那儿放大使来电，等等。他来到办公室：如果他有15分钟，就阅读最紧急的文件；如果有一个小时，就看看重要性略次一些的文件。

他不喜欢冗长的报告。他自己说起话来简短和明确。他几乎反对幽默。

他从前的一位助理说："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冷酷无情的人。同他在一起工作是极其困难的……"

主席团成员们的生活改变了。赫鲁晓夫让大家从克里姆林宫里搬到了沃罗比约夫公路，在那里为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们修建了12幢一模一样的两层小楼。

让我们好好商谈

苏联新领导人与斯大林不同，不想与任何人打仗，总是想改变点什么，无论是在国内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明显地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分散经济管理、实行较为自由的政策。他们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把重点放在了日用消费品生产上，为此后来当轮到马林科夫倒霉时他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1953年4月1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很长的降价商品单——占了整整一版。

朝鲜战争正在进行，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允许他使用核武器。苏联同日本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同以色列中断了关系。同南斯拉夫彼此充满了仇恨。由于斯大林提出的领土要求，苏联同土耳其的关系也严重恶化了。

1953年3月16日，斯大林逝世两周之后，新的政府首脑格奥

尔吉·马林科夫呼吁西方进行谈判："当前，没有任何复杂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不能在有关国家彼此谅解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的。这涉及我们同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关系。"

马林科夫走得更远。一年以后，1954年3月12日，在最高苏维埃选举前夕发表的传统讲话中，他说，新的世界大战"在运用现代战争手段的情况下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也就是说，他放弃了苏联领导人先前的关于战争不可避免以及战争将会有助于消灭世界帝国主义的观念。马林科夫的话成了向西方国家发出的羞怯的信号：我们想进行商谈。

温斯顿·丘吉尔那时说过，不要错过机会。可是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是悲观的。西方总的说不想进行谈判，因为不相信莫斯科的诚意。

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制定了他的对苏政策：

"不应该采取任何能减少俄国人困难的行动。他们应该看到，他们没有能力取得世界霸权地位。很可能，到那时他们就会表现出进行明智的谈判的意愿。"

然而，马林科夫的话成了赫鲁晓夫所期望的摆脱竞争对手的把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原来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生气勃勃和充满活力的他，轻松地超越了他的笨拙的战友们。首先，他摆脱了他所极其害怕的贝利亚。摆脱马林科夫则更是容易得多。

1953年3月，赫鲁晓夫当选为一位普通的中央书记——四位书记中的一位。在他高明地把贝利亚逮捕之后，他想要升职了。在两个月后的九月全会期间，会间休息时在主席团成员们通常聚集的休息室里，马林科夫突然说：

"我提议在本次全会上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回忆说，他当时大吃一惊。一般来说，这样严肃的问题是要事前商议的。后来他问马林科夫，为什么他对谁什么也没有说。马林科夫解释说，在全会就要召开之前，布尔加宁来找他并提出了选举赫鲁晓夫的建议：

“要不，我自己来提这个建议。”

确实，是布尔加宁第一个对马林科夫的提议表示支持：

“让我们决定吧！”

谁也不敢反对。

而过了一年半之后，赫鲁晓夫已经变得如此稳固，以至能向马林科夫发起进攻，指责政府首脑放弃了苏联政策的基本原则。马林科夫不得不亲自来否定自己的话。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声明说，进攻苏联的结局是“侵略者将被用同样的武器得到压制，这样的冒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

但是这已经不能拯救他了。在 1955 年 1 月的中央全会上，在讨论第一个问题“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之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反对马林科夫的长篇讲话，并提议解除他政府首脑的职务。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关于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文明就会毁灭的言论“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和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赫鲁晓夫肯定地说，这种声明“会使各国人民感到他们摧毁侵略者计划的努力是无望的”。

赫鲁晓夫巧妙地利用了莫洛托夫来打击马林科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不失时机地说，马林科夫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经济管理人员。而在涉及外交政策的问题上，莫洛托夫在这方面简直就是铁面无情：

“共产党员应该谈的不是关于‘世界文明的毁灭’，也不是关于‘人类的毁灭’，而是要准备和动员一切力量来消灭资产阶级……难道我们能这样去吓唬人民，说一旦战争爆发，所有人就都会死去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关心明天？最好是现在就为所有人准备好棺材……你们看，在政治问题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将导致什么样的荒谬行为和什么样有害的东西呀。”

全会决议中指出，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些没有多少经济根据的许诺，更像是指望获得廉价声誉

的一个议会宣言，不像是苏联政府首脑的负责任的发言。马林科夫同志在这个讲话里把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马林科夫同志1954年3月12日在选民会议上的讲话中同样发表了理论上错误和政治上有害的论点，如肯定说，假如帝国主义者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就有‘世界文明遭毁灭’的可能性。”

马林科夫被撤去了政府首脑的职务，转而任副主席，还给了一个电站部部长的职位，但主要的是留任了中央主席团成员。他的贬职使得党的机关十分满意：在马林科夫领导期间，政府部门过于自信，不太巴结中央委员会。

在毯子下工作的译电员

对赫鲁晓夫来说，要紧的是摆脱掉马林科夫，而莫洛托夫讲的是真心话。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与他的许多战友不同的是，他不搞伪装。他真的是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一切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前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那时还刚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自己的部长：“莫洛托夫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坚信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并为使它早日到来而努力。他不能接受和平共处的政策。他认为，共产党员进行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莫洛托夫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接受和平共处的思想。他发火并激动地说：

“如果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能够和平共处的话，那么，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是要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战斗的，这就是说，这个口号是欺骗和自我欺骗。”

1955年在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十周年庆祝活动。莫洛托夫到了那里。他的译员病了，多勃雷宁被调到部长身边工作。莫洛托夫乘火车从纽约到旧金山是为了看看美国。他喜欢他所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作出了出乎意料的结论：

“看来，美国是离共产主义最近的。”

他们抵达了芝加哥。在月台上站满了想看看莫洛托夫的人群。那里有许多来自欧洲的有敌对情绪的移民。他们开始表达自己的感情。莫洛托夫问，这是什么意思。大使急忙回答说，他们这是在欢迎他。多勃雷宁没有吭声，为的是不使大使难堪。莫洛托夫说，美国人的欢迎方式还是挺怪异的……

莫洛托夫定时往莫斯科发电报。可是怎么把它们译成密码呢？没有密码机，译电员带着密码本工作。但他们害怕，美国人会把什么装置安在天花板上，从那里就能看到一切。所以，译电员是趴在床上工作的，又四名外交官拿着一条大毯子挡在他的上方，这样，从天花板那边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苏联代表团觉得一直有人在窥视着它。

莫洛托夫是乘轮船回到莫斯科的。每天早晨重复着同一幕情景。莫洛托夫是个极其不讲究吃的人。早餐时只要有粥就满意了。每天早晨莫洛托夫的私人厨师去船上厨房熬粥，他后面跟着此刻要守卫粥的部长卫队队长亚历山德罗夫上校，以及担任翻译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船上厨房里的厨师想要自己提供服务：

“我们将为莫洛托夫先生熬任何种类的粥，只是请告诉我要哪一种。”

苏联厨师坚决地回答说：

“不，我有自己的粥。”

他熬着什么东西，然后倒进了手提饭盒，以便使粥不致变冷，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庄严地拿着这盒粥送到莫洛托夫那里去。

他的行为中最主要的就是坚忍不拔和不愿改变自己的立场。某

些人可能会喜欢这些品质。但在政治中它们给国家带来的只是损失。因为它们遇到的是同样的偏执和顽强。在华盛顿，出现了莫洛托夫的当之无愧的对手——同他一样顽固不化的对手。

在会见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时，莫洛托夫开始说，美国执行的是敌对的政策，用一圈基地包围着苏联。

杜勒斯回答说：

“而我们还要建更多的基地！是您自己在说，你们的目标是要摧毁我们，但我向您保证，我们不会坐以待毙！”

杜勒斯的思维带有清教徒式教养的烙印。在成为律师之前，他当了多年的传教士。在他看来，成功的政策只能建立在坚实的伦理原则上。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对西方基督文明的威胁。

莫洛托夫与杜勒斯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双方都准备战斗到底。

赫鲁晓夫说过：“我们认为杜勒斯是一个没有健康理性的、沉醉于仇恨而不能自拔的人……要同杜勒斯达成协议或就什么问题达成谅解是不可能的。”美国人对莫洛托夫也持同样的看法。

赫鲁晓夫想推行一种比较灵活的政策，但是，莫洛托夫的影响还非常显著。在他的坚持下，1955 年 5 月，苏联废除了对我国非常有利的、同英国和法国在战争年代签订的友好条约。这是对英国和法国批准关于西欧联盟协议的强烈回答，西欧联盟是从来没有起过显著的作用的组织。

莫洛托夫反对苏联军队从奥地利撤军。他认为，苏联军队应该留在 1945 年他们所在的地方。从 1949 年起开始进行谈判，但只是到了 1955 年，赫鲁晓夫才同意与奥地利签订和约，因为他知道再拖下去已不可能。

赫鲁晓夫放弃了在中国和在芬兰拥有海军基地的权利。莫洛托夫非常不喜欢这样做。苏联的军事基地就位于赫尔辛基的旁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驻芬兰的大使报告说，当来自赫尔辛基的火车经过我们的军事基地时，车厢里的窗子都被遮上了窗帘，警告

说，谁也不能走出车厢，不能张望，灯也被关了。这自然引起了芬兰人的强烈愤慨和不满。如果我们想同芬兰友好并巩固这种友谊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我们的军事基地用自己的大炮威胁着赫尔辛基，我们每天都在刺痛芬兰人的自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呢？……”

赫鲁晓夫问朱可夫：

“听着，格奥尔吉，你说，我们在芬兰的基地有什么价值吗？”

朱可夫抬起了双眉，严肃地看了一下第一书记，说：

“你知道，说真的，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基地能有什么用呢？”

“而如果没有这个基地的话，会出现来自芬兰人对我们的威胁吗？”

“没有任何威胁。”

朱可夫和赫鲁晓夫是对的。芬兰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对俄罗斯最友好的欧洲国家。

在莫斯科首次开始认真地谈论削减军备以及同西方就军备问题达成谅解的可能性问题。现在已是赫鲁晓夫自己准备放弃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了。使赫鲁晓夫感到惊奇的是，当1954年在日内瓦进行谈判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简直就是在念国务卿杜勒斯交给他的发言稿。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想表现一下他有能力执行外交政策，用不着别人的提醒，能够自立。可是，要做到这样他就得摆脱掉莫洛托夫，而后者是不允许任何人碰外交政策的，他甚至可以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争论起来，而没有一个外交部长是敢于这样做的。

1954年，主席团成员们一起在克里米亚疗养。卡冈诺维奇问赫鲁晓夫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赫鲁晓夫坦率地回答说：

“不坏，可就是莫洛托夫不承认我，所以，我同他的关系挺紧张的。”

莫洛托夫逐渐成了赫鲁晓夫的负担。看来，有一次，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是对的。1954年，当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转

交给乌克兰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签署相应的决议时，莫洛托夫悄悄地对站在旁边的《真理报》主编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说：

“他到底在干什么?!”

谁握过希特勒的手?

1955年9月，以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为首的西德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就有关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互换使馆的问题进行商谈。阿登纳在莫斯科被指责有复仇主义。但是，阿登纳眼盯着莫洛托夫说，至少他与某些人不同，他没有握过希特勒的手。

当同南斯拉夫恢复关系的谈判开始时，就明显需要摆脱掉莫洛托夫了。战争结束后过了两年，斯大林就搞坏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起初他自然是支持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首的游击运动的，尽管他内心里对这位南斯拉夫领袖怀着某种疑问。

米洛万·吉拉斯觉察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同铁托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别的、没全说出来的东西，好像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互之间的委屈，可是由于各自的某种原因，谁也没有把它们说出来。”

与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同的是，铁托是在没有苏联军队援助的条件下获得政权的。就是这一点使他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在南斯拉夫的领土上没有苏联军队和苏联安插的人。再者，也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不同的是，铁托没有在国外侨居过，没有寻求过苏联的救助，没有在莫斯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控制下生活过，没有奴隶般地听命于苏联官员并为每一次敲门声而战栗；他勇敢地与自己的游击队员们一起对德国人作战，因此，他不怕斯大林，并与苏联领导人打交道是平起平坐的。在那个时候，其他东欧国家每一件小事都需要请求莫斯科或者莫斯科安插的人的允许，而

铁托是自己在领导他的国家。

到1947年秋天，莫斯科就表现出了对南斯拉夫领导人显示的独立性的不满。斯大林需要或者迫使南斯拉夫人服从，或者宣布他们为敌人。可是第一条他做不到。斯大林就想出了一些新的地缘政治图式。他想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为一个国家。其目的是清楚的——这些深受内部矛盾折磨的联邦就会经常求助于苏联。这就能保证莫斯科对东欧的长久控制。

无须花很长时间去寻找冲突的借口。斯大林希望合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但当铁托未经莫斯科允许便开始行动时，他生气了。而且还有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报告说，南斯拉夫当局拒绝提供有关本国经济的情报。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于1948年3月18日致电铁托，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行为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

斯大林从南斯拉夫召回了专家和军事顾问。铁托拒绝了所有对他的指责，说它们都是臆造的。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在致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一封信上签了字，信中对南斯拉夫提出了一整套罪名：修正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和反苏主义。接着这封信又发出了另一封信。南斯拉夫人拒绝向任何一个苏联代表提供最秘密的情报的做法，被认为是"污辱苏联军事专家和破坏其信誉的不体面的政策"。南斯拉夫人被指责说，他们信奉的是"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

同时，斯大林要求所有的共产党谴责南斯拉夫人的行为，它们就这样做了。这进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而且支持与苏联保持紧密关系的人在南斯拉夫受到了残酷的惩罚。斯大林则利用同南斯拉夫机会主义的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更强硬的控制，在这些国家中对被怀疑是南斯拉夫盟友的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审讯。

在斯大林逝世后，人们开始明白，应该恢复关系。莫洛托夫在

1953 年 7 月的中央全会上说：

“既然我们未能用迎头痛击的办法解决某个任务，那就应该转而采用其他方法。”

于是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一种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国家一样的关系——互换大使、官方互通电报、进行事务性的会见。7 月 31 日，苏联大使向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递交了国书。

莫洛托夫顽固地拒绝称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依旧认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和他的人都是“叛徒、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堕入社会民主党人阵营的蜕化变质分子”。莫洛托夫称南斯拉夫为法西斯国家并要求不往那里派代表团，尽管当年他曾心安理得地去过真正的法西斯国家。

1955 年 5 月，赫鲁晓夫还是去了贝尔格莱德。外交部长没有随行。但由《真理报》主编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陪同，这个人后来很快就取代莫洛托夫当了外交部部长。在贝尔格莱德双方谈妥了国家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问题和“实现党的系统的相互谅解”。

在 1955 年 7 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作出了关于谈判结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策动主席团的同志们去反对莫洛托夫，他们齐声狠狠地批评了他。他们联合起来诋毁了莫洛托夫的声誉，并粉碎了他追求成为党内第一把手的希望。

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说：

“莫洛托夫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囫囵吞枣地读书的人。”

政府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说：

“莫洛托夫只沉浸在往事中，完全为这场苏南争吵的积怨所左右。”

苏联共产党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说：

“莫洛托夫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平等的政策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从而得出了错误的和对

我国政治有害的结论。”

全会决议说：“中央全会谴责莫洛托夫同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错误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不符合苏联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也不符合列宁主义政策的原则。

莫洛托夫同志的立场导致了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关系的固定化，并将南斯拉夫进一步推向帝国主义阵营。

虽然中央主席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耐心地向莫洛托夫同志说明他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错误，莫洛托夫同志继续顽固地坚持这一立场。

中央全会认为，莫洛托夫同志继续坚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路线，认为应该同南斯拉夫只在国家关系方面实现关系正常化，如同与资产阶级国家一样，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表的讲话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在 7 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就莫洛托夫妻子的行为问题给他提了意见。赫鲁晓夫说，她干预政治事务，这是不能允许的。这到底是指什么？原来波林娜・谢苗诺夫娜仅仅是接见过美国大使波伦的夫人。

就在那一年，莫洛托夫因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而受处分，他在那里写到，苏联只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赫鲁晓夫没有放过这个过失。批评是公开的，而且对莫洛托夫的威信是危险的。他不得不在《共产党人》上做自我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后悔说：“我认为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次年，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抵达莫斯科的前一天，莫洛托夫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因为不能想象他将如何去握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的手。1948 年写给铁托的那封粗暴和侮辱性的信就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

当莫洛托夫不再当部长时，甚至他那特别宠爱的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也说：

"现在工作起来将轻松一些了。"

曾担任过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瓦连京·法林写道:"大家所指的,不仅是已经成了隐晦的讽喻的莫洛托夫的顽固不化和教条主义,而且还有他端坐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的习惯。据说,部里其他一些人一下子就治好了同外交部前任领导人的说话毛病类似的口吃。"

至于对南斯拉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是白白地这样表示对抗。同南斯拉夫的友谊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在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会谈之后,苏共在给各地方党的机关发的情况通报里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布尔加宁同志今年6月5日在莫斯科早餐上的讲话中称铁托同志为列宁主义者的评价是为时过早的。"

赫鲁晓夫没有放过使战友出丑的机会。他已经摆脱了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现在他要做的是破坏他一点也不尊重的政府首脑布尔加宁的地位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认识到,他所需要的不是战友,而是下属。

在布尔加宁被任命之后不久,主席团成员们观看了轻工业产品展。布尔加宁谈到关于人造丝的什么问题,赫鲁晓夫当众对布尔加宁攻击说:

"你们看,部长会议主席对经济一窍不通,只会胡说八道。"

被解除了外交部职务的莫洛托夫要求给他点工作做,在11月他当上了国家监察部部长。这个职务先是由斯大林的忠实助手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而后由贝利亚的战友并与贝利亚一起被枪决的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担任的。

1957年4月6日,赫鲁晓夫由于"在制定和实施关于开发荒地和闲置土地方面的杰出功绩"被授予第二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关于颁奖的问题在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讨论。马林科夫和卡岗诺维奇未敢投反对票。马林科夫甚至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并说:

"瞧,尼基塔,现在我带着轻松的心情回家去,衷心地为你干

上一杯白兰地。”

莫洛托夫是反对颁奖的，并说出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对这样的得罪是不会忘记的。

5月，在会见莫斯科作家们的时候，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地用不赞同的口气发表了对莫洛托夫的评论：

“在这里就座的你们中的一些人谈到了我们主席团成员间的某些不一致和分歧。我应该在这里直接和公开地说，我们大家，主席团成员们，阿纳斯塔斯、拉扎尔、维亚切斯拉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以及其他同志们，在推行列宁主义路线方面是一致的。是的，我们主席团内部在工作的过程中是有争论的，更经常的是同莫洛托夫的争论。莫洛托夫有时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这是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主席团不团结。”

赫鲁晓夫的话在整个莫斯科传开了。但是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依然是中央主席团的成员。

赫鲁晓夫连自己都没有发觉，在党的最高一级机关里是怎样聚集起了一批怪罪于他的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是被他撤职的，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是一有合适机会便要被他责骂的对象。除了主要的目标——搞掉赫鲁晓夫外，他们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年之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就像1953年反对贝利亚一样。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却没有发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如何迅速壮大起来，迅速适应了国家领导人的角色。他们原以为他们能轻松地推翻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认定了自己将占有他的位置，布尔加宁预定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而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将是政府领导人。

政府第一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和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政府副主席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认为，赫鲁晓夫自己抓的权力太多了，不尊重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压制首创精神和独立性，因此应该撤掉他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且根本就不需要第一书记的职位，党的领导

应该是集体的。

卡冈诺维奇认为，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赫鲁晓夫以往的谦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如俗话说的，他变得“目中无人”。他开始自己决定一切。未经中央主席团的事先讨论就发表讲话。他粗暴地打断其他人的话。

1957年6月18日，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所有这些意见。

我们干吗都要去列宁格勒？

一切都是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开始的，那里讨论着关于收获庄稼和粮食收购的问题。赫鲁晓夫提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去列宁格勒参加该市250周年庆典活动。伏罗希洛夫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为什么全体人员都应该去？难道主席团成员们没有其他事情了吗？”

卡冈诺维奇接着他的话说，他有许多有关收获庄稼的工作要做，他说：

“我们深切地尊敬列宁格勒，但如果只有主席团的几位成员前往的话，列宁格勒人是不会生气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一种他所习惯的方式责难主席团成员们。米高扬试图使他镇静下来。

但是，主席团成员们立刻说，不能这样工作了，让我们大家来讨论赫鲁晓夫的行为，让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这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才明白：策划了一个反对他的阴谋。

马林科夫发言说：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支持过赫鲁晓夫。我和布尔加宁同志都提出了关于选举赫鲁晓夫为第一书记的建议。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们错了。他暴露出没有能力领导中央。他犯了一个又一个错

误，他骄傲了。对主席团成员们的态度变得让人不能忍受，特别是在第20次代表大会之后。他用党的机关代替国家机关，直接越过部长会议来指挥。我们应该通过关于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

卡冈诺维奇支持马林科夫说：

“赫鲁晓夫一贯损害中央主席团的威信，背着我们批评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的这种行为有害于团结，而为了团结，中央主席团至今一直忍受着赫鲁晓夫的任性。”

莫洛托夫也高兴地报复赫鲁晓夫说：

“不管赫鲁晓夫怎样花力气对我进行挑衅，我没有上钩把关系搞得越来越紧张。可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赫鲁晓夫不仅使个人关系，而且还使整个主席团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莫洛托夫说，凭空捏造他似乎反对开垦荒地是徒劳无益的。这是不真实的。他反对的是过度开垦，提议逐步推进，这是为了很好地开垦新土地和获得高收成。指责他似乎反对和平政策的说法也是枉然的。他反对南斯拉夫的讲话涉及到的不是对外政策问题，而是涉及需要批判的南斯拉夫的反苏言论。

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以及两位政府第一副主席——米哈伊尔·格奥尔吉耶维奇·别尔乌辛和马克西姆·扎哈罗维奇·萨布罗夫先后支持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在与党内各种倾向进行的斗争中获得了某些经验的卡冈诺维奇提醒说，赫鲁晓夫曾经犯过错误，他支持过托洛茨基分子。

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

“还应该搞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的事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清楚，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臆造出来的。但是他的党内同志们怎么也不想重新审查这些事情。

卡岗诺维奇在会上冒出一句话：

“不管人家的奶牛怎么叫，你的奶牛最好别吭声。”

赫鲁晓夫发怒说：

“你老是暗指什么，我讨厌!”

卡冈诺维奇说：“那时我没有在主席团揭开这个暗示，而现在我来把它揭开。赫鲁晓夫在1923—1924年间曾是个托洛茨基分子。1925年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过失表示了忏悔。”

被指控托洛茨基主义是极其危险的，于是赫鲁晓夫要求米高扬给他帮助。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向中央委员们作解释说：

“1923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党内民主的口号，他是向青年提出这一口号的。他在学生青年中获得了许多票，存在着他有可能把党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危险。在进行这场争论期间，赫鲁晓夫在最初举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有利于托洛茨基的立场的讲话。可后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之后，他在同一个组织内又积极地反对了托洛茨基。不要忘记，托洛茨基那时是政治局委员，他是主张党内民主的。要知道那时的心理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实……

“每一次当赫鲁晓夫在人的情感驱使下，主张党内民主或维护被枪决的无辜时，他总被看作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修正主义者……”

伏罗希洛夫比别人更多地受到赫鲁晓夫的压制，他提出了一个组织建议：

“我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同志们，不能再与他一起工作了。我们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让我们作出决定吧。”

两年前，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的做法是比较轻的——撤了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撤了他的职，但又让他当上了电站部部长。这次本打算不是打发赫鲁晓夫去拿养老金，而是任命他为农业部部长：让他再工作一段时间，担任较小的职务。

表决结果对赫鲁晓夫不利。主席团以七票对四票的结果通过了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然而发生了一件突然的事情：赫鲁晓夫破坏党的纪律，他不服从党的最高机构的决议。会议举行

后的那天夜里，他同自己的支持者待在一起，整夜没有睡。他们一同制定了反攻计划。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准确地猜到了：中央委员中的州委第一书记们在反对老近卫军的斗争中是会支持他的，他们会原谅第一书记去做这样违反纪律的事。胜利者能得到一切。

在挽救他的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朱可夫动用了运输航空兵的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送到了莫斯科，而谢罗夫则帮助他们认清了方向。

中央委员们聚集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他们声明支持第一书记，是前来要求主席团成员们报告：发生了什么事？

卡冈诺维奇声明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派别活动，是巧妙的但是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活动。

马克西姆·萨布罗夫气愤地说：

"我原以为您，赫鲁晓夫同志，是一个最诚实的人。现在我看到我错了——您是个不诚实的人，您允许自己利用派别活动的方式、背着中央主席团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组织会议。"

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看到，党的机构已不再服从领导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不得不同意举行中央全会，在那里赫鲁晓夫的人明显占多数。其余人看到谁占上风，就马上倒向了胜利者。于是角色换了：莫洛托夫和其他人成了阴谋家。

洗桑拿浴轶事

赫鲁晓夫巧妙地从反对第一书记的主席团七名成员中挑出了三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并指出他们是反党集团。他给了其余人承认自己错误和靠边站的机会。赫鲁晓夫饶恕了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诚然，对布尔加宁，后来还是把他除掉

了，而对伏罗希洛夫，则让他留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象征性的职务。

那个在党内斗争中遭到失败的集团成了苏联历史上的反党集团。赫鲁晓夫赢了，于是他的敌人成了反党集团。七年以后，在1964年，赫鲁晓夫遭到了失败，那些几乎像马林科夫等人一样谈论他的人成了胜利者并掌握了政权……

中央全会变成了审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法庭。赫鲁晓夫本人将莫洛托夫摆在了首位——他认为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是这个集团的思想领袖。莫洛托夫就是在全会上，面对着大厅里敌对的人群，也没有沮丧，而是继续进行对抗，骂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总是要捎带地谈论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说这个是昏聩的老头，这个是懒汉，那个是向上爬的人。一个主席团成员是不能像支配小卒一样地支配我们的。”

莫洛托夫作为不久前的外交部长，感到特别气愤的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芬兰的时候被邀去洗桑拿浴，赫鲁晓夫接受了邀请。莫洛托夫说：

“布尔加宁拒绝了邀请，他做得对，而赫鲁晓夫在半夜三点钟去芬兰总统那里洗澡，并在那里一直呆到了清晨六点钟。我认为，自己的行为应该庄重些。”

赫鲁晓夫乐意地向全场人解释了这次洗澡的经历：

“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其他同志们说，他们喜欢洗蒸气浴。我呢，正像你们所知道的，我是在南方的草原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的。那里没有澡堂。我从来不到澡堂里去洗澡，有一次除外，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他对坐在大厅里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作者注），在战争期间我和您在顿河呆过并洗过蒸气浴。我们来到了芬兰。那里大家都在夸澡堂好。芬兰总统吉科宁说：我当了总统后，盖了个新澡堂。布尔加宁没有去，而我虽然不习惯去澡堂，还是决定去了——我认为拒绝是不礼貌的。在澡堂干什么？洗蒸气

浴。我们也洗了蒸气浴，说说笑话，笑笑。我应该说，吉科宁是芬兰人中间最接近苏联的人之一。这就应该珍惜。你们想象一下：总统邀请客人去澡堂，而客人嗤之以鼻地走掉了。这样会伤他们的心并使他们感到受了侮辱。”

于是赫鲁晓夫转身对莫洛托夫说：

“你怎么不感到羞耻呢？你看你跟谁都合不来。要是大家都随你的意的话，你会使国家陷入绝境，你会同所有的人吵架，会引起冲突。看看你从旧金山发来的电报吧，你在写些什么？你说，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莫洛托夫坚持自己的观点说：

“我不同意。在芬兰的举止是可以更庄重一点的。”

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已经忍不住了，他说：

“那您认为到希特勒那里去是庄重的吗？”

在全会上大家向莫洛托夫提起了所有事情。提起了斯大林称他为“糊涂虫”，提起了他参与过杀害人的行动。几十年来中央委员们在这些人面前都是要卑躬屈膝的，而现在却在美滋滋地辱骂他们。大多数人按照老一套对莫洛托夫提出了反党活动的指控。但有的时候，就像鲁坚科检察长那样，也会冒出一些真诚的谈吐来。

朱可夫元帅看来是第一次说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怎样确定枪决名单的。例如说，1938 年 11 月 12 日这一天他们就批准枪决 3 167 人。

朱可夫说：“我们相信这些人，抬着他们的画像，而他们的手在滴着血……他们挽起袖子，手里拿斧子砍头……就像赶牲口一样，按照名单把人们赶往屠宰场：多少公牛，多少母牛，多少羊……要是人民知道真相的话，那迎接他们的就不是掌声，而是石块了。”

这些可怕的话语并未给莫洛托夫留下丝毫印象。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冷静，完全否认自己有罪。

朱可夫没有后退，他说：

“你说，为什么所有的指控仅以那些被捕者的个人口供为依据？而这些供词是在严刑拷打之后获得的。关于拷打被捕者并从他们那里强行获取供词的决定是依据什么通过的呢？谁签署了这份关于审讯和拷打的文件？”

莫洛托夫非常镇静地回答说：

“采用体罚措施是政治局的共同决定。大家都签了名。”

马林科夫和其他人说，这是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做的。大厅里的人向他们喊道：

“把责任推到死去的人身上是没有用的。”

赫鲁晓夫提醒说：

“你是斯大林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你应该负主要责任。”

朱可夫做了好几次发言。他的手上有文件：

“我想提供些情况。我们曾有 12.6 万军官被俘。他们被释放了。莫洛托夫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违背了现行法律，取消了这些军官的军衔，并将他们按行政程序送到了集中营，为期六年。我这里有这个文件，这是莫洛托夫在 1945 年 10 月 22 日签署的。”

这是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在德国军队、德国“弗拉索夫分子”和警察特种部队服过役的人员的军衔》的秘密决议。它是 1945 年 8 月 18 日根据国防委员会《关于将被德国释放的红军俘虏和被遣送回国的适龄青年送去工业部门工作》的决定通过的。

军官们被取消了军衔并被解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又被该部押送至内务人民委员部诺里尔斯克和乌赫金斯克联合企业、伯朝拉煤田和卡玛河上游地区，为期六年。

中央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尼基福罗维奇·马林在中央的档案里找到了需要的文件。斯大林在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后把马林要来当自己的助理。马林几乎是斯大林个人班子里留下来的惟一的人。

马林也要求发言：

“请允许我提供些情况。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需要有勇气对此负责。在中央的档案里，在处决名单中还有一份，莫洛托夫亲笔在上面写了：‘杀，杀’。”

大厅里的人大声喊道：

“可耻!”

甚至连莫洛托夫的宠儿、被他提拔起来的、多亏他才有其梦幻般官运的新任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也说，莫洛托夫的发言是一个可悲的场景，莫洛托夫想往赫鲁晓夫的头上泼脏水，却是自己被泼了一身脏水离去的……

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对讨论莫洛托夫的行为作出结论说：

“如果说莫洛托夫能不时到我们的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来，那他就会相信自己是不对的。因此，同志们，我认为，莫洛托夫不能留在中央主席团里，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能再留在我们党的队伍里。”

大厅内响起了掌声和喊声：

“对!”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以为，党会自动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可他们错了。

要知道，1957 年他们好像是谈了一些符合理智的事情：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正在形成，需要党内的民主和集体领导制，“在肉奶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简直就是愚蠢的……但是，就像他们以前不听其他人试图批评党的机关和领袖的话一样，现在谁也不听他们说的话了。

州委第一书记们并不想搞任何自由主义，可是他们更害怕回到斯大林时期，在那个时期，谁也不能保证不会被逮捕。莫洛托夫等人在他们的眼中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生活。因此，6 月全会支持了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并不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情，但他为年轻的一代开辟了上升的道路，让坐在各个办公室里的原来的

主人把位子空了出来。

莫洛托夫到底还是没有搞清楚党的干部的性质。他一辈子从事党的工作，却始终没有搞明白他自己建立的党的制度的实质。他永远是第二号人物，也不可能成为头号人物。

顽固不化的莫洛托夫是这些人中间惟一一个什么错误都没有承认的人。但这已毫无意义。1957 年 6 月 29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个冗长的《关于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关于莫洛托夫是单独写的："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在外交政策方面表现出因循守旧，并阻碍了推行已经成熟的、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新措施。

长期以来，莫洛托夫同志作为外交部长，在外交部方面，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而且不止一次地反对中央主席团为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所实行的那些措施。1955 年 7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一致谴责莫洛托夫同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不正确立场，指出它是'不符合苏联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以及不符合列宁主义政策的原则'的。

莫洛托夫同志阻碍了同奥地利的国家条约的签订以及同地处欧洲中心的这个国家的关系的改善……他也反对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他反对党所制定的关于在目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的原则性论断……他否认，为了达成相互谅解和改善国际关系，在苏联领导人与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之间建立个人联系是适宜的。"

还有一段是当时决定不予发表的，这是关于莫洛托夫等人参与大规模迫害活动的一段话："他们指望通过夺取在党和国家内的关键岗位的做法来掩盖其过去罪恶行为的痕迹……"

除了给各州委散发的中央决议以外，还有一封中央的信，是在各地党的会议上宣读的。那里也谈到了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成员莫洛托夫同志表现出教条主义和因循守旧，不仅不理解开垦荒地的必要性，而且还对抗对我国经济如此至关重要的开垦 3500 万顷荒

地的工作，不能认为这些是偶然的。”

下命令让他去东方

赫鲁晓夫的所有敌人都被撵出了政治舞台。马林科夫被派到阿尔泰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任水电站站长，卡冈诺维奇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阿斯别斯特市任“苏联石棉公司”主管。他们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方机关的监视之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管理局的原局长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贝利亚倒台之后被捕。他也被作为贝利亚分子判了刑。他写道，在审判之后，1958 年秋天，他被带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万·谢罗夫的办公室。后者说：

“您将被送往弗拉吉基尔的监狱。如果您在那里想起有关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什么值得怀疑的行为或犯罪的命令，就通知我。”

这就意味着，事情只限于解除职务。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未敢一下子就置自己的对手于死地。根据党的地方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知道，国内并不非常赞同中央六月全会的决定。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对国内著名人物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他们到底有什么罪过？人们想了解证实“反党集团”成员们罪行的事实，而在报纸上登的全是空话。

在古比雪夫，人们简直就使一个谴责“反党集团”的群众大会开不下去了。这是后来担任政治局委员，而那时任一个航空工厂党委书记的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的。

问题在于，在此两年前，莫洛托夫到过古比雪夫。沃罗特尼科夫写道：“他在工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拿掉了全部障碍物，把他作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位战友，轰轰烈烈地欢迎了他。大家为他的质朴和平易近人而感到非常高兴：在自动车间他握着女工人被机油弄脏的手，饶有兴致地听着钳工沃洛佳·贝尔曼讲解我们车间

做的安装工作，对组装车间的技师的住房问题感兴趣，询问了关于工资和城里供应情况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和新的。”

当1957年赫鲁晓夫指责莫洛托夫，说他变成了党内游手好闲的人，不了解人民的生活，在古比雪夫市集会上市委书记也重复了这个说法时，群众发起牢骚来：

“这不是真的！莫洛托夫来过我们工厂。我们不相信赫鲁晓夫！”

莫洛托夫被派去蒙古当大使。其他国家回避接受危险的斯大林战友的荣幸，而蒙古领导人尤睦佳·泽登巴尔是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拒绝莫斯科的。更何况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曾经为确立他为蒙古国家元首出过力。

莫洛托夫后来向费利克斯·丘耶夫[①]叙述说：

“我记得乔巴山。一个文化程度不高但对苏联忠诚的人。他去世后，应该任命一个人。推荐了达姆巴……可他是个狡猾的蒙古人，小心翼翼的，不会说俄语。仅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不适合当领导人，当领导人是要读《真理报》、《共产党人》的。而泽登巴尔毕业于伊尔库茨克金融学院并在那里娶了俄罗斯姑娘。”

上面提到过的米哈伊尔·贾丕才在那些年领导外交部远东司，他说：“莫洛托夫好像成了我的被保护人。那时我确信这个已经不年轻的人（他当时为68岁）是多么严于律己和守纪律。有时他打高频通信电话谈问题，还要求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我回答说，问题是清楚的，就这么办吧。他却坚持一定要得到苏斯洛夫的指示。”

三年后莫洛托夫从乌兰巴托转到了维也纳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追求功名的外交官们都力争离开亚洲前往舒适的欧洲。但是

---

① 费利克斯·丘耶夫系《莫洛托夫访谈录》一书的作者。此书1991年莫斯科出版；中文版由军科院外军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译注

在乌兰巴托还有某些工作可做，而在维也纳莫洛托夫简直是无所事事。但他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维也纳最后一次见了面。1961 年 6 月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美国新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奥地利首都举行了会见。所有苏联外交官都来欢迎赫鲁晓夫，其中包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莫洛托夫。他是与波林娜·谢苗诺芙娜一起到车站的。

赫鲁晓夫开心地笑着，迎着说：

“啊，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您好，见到您非常高兴。”

但是赫鲁晓夫立即命令其助手们拿掉莫洛托夫。他被召回了莫斯科，而到了 1962 年 2 月，部长会议事务管理局的基层组织开除了莫洛托夫的党籍。莫洛托夫抗议过。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区委和莫斯科市委先后审理了他的案子。

市委第一书记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契夫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您应该交还您的党证。”

莫洛托夫没有服从被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每个月往中央交党费。就像对以往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有人对他进行监视，谈话被窃听。1962 年赫鲁晓夫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与卡冈诺维奇谈话，后者继续在说，让他退休是不公正的。卡冈诺维奇带着个小包裹来到了卢比扬卡，以为他会被囚禁了。

在中央的最后一次会见

莫洛托夫铁一般的身体使他经受住了一切不幸。他从不抱怨什么，从不感到难过，也从不由于错误而责备自己，因此，比别人更容易适应退休生活。

他的孙子、著名的政治学家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对我说：

“他完全没有复杂的心理变态，也不像知识分子那样痴心于自我分析。他是个不知妥协的人。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他对什么事后悔过吗？对自己参与镇压活动后悔过吗？”

“不。他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革命者是最保守的人。”

莫洛托夫只对妻子的被捕曾感到过遗憾。

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回忆说：“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对，爷爷在她面前感到有罪。”

莫洛托夫及其一家在克里姆林宫里生活了多年。革命前，在这些有着低低的天花板和老式家具的并不美观的房间里住着的是仆人。斯大林逝世后，中央主席团成员们住进了位于列宁山的单独小楼。

莫洛托夫退休后搬到了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那幢众所周知的领导人居住的住宅楼。给他发的是最普通的养老金——120 卢布。在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开始淡化时，莫洛托夫的物质待遇得到了改善。养老金增加到了 250 卢布，过了一段时间后又给他补贴了 50 卢布。

后来莫洛托夫还得到了可去所谓营养食堂的餐券，这是为领导人供应食品的内部分配站，就在那条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

波林娜·谢苗诺芙娜·热姆丘日娜向部长会议事务管理局提出，要求得到茹科夫卡政府村的别墅：

“如果你们不尊重他，那么，不要忘记我曾经也是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

后来，别墅的房费开始由国家支付。为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做饭的那个妇女正式成为列入别墅管理处编制的厨师。发给了免费的餐具。

莫洛托夫就是在暮年时也还是在谈话中吹捧斯大林。为什么？他是斯大林时期的二号人物。如果斯大林是伟人，那么他也差不多是伟人了。除赫鲁晓夫外的所有原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保持着一

种盲从的钦佩。甚至被他清除掉的、危在旦夕的他们，还会非常感动地回忆起他们曾同伟人在一起工作过。要知道这是他把他们捧上了政权的顶峰。

除了诗人费利克斯·丘耶夫外，常到莫洛托夫在茹科夫卡的别墅里作客的还有作家伊万·斯塔德纽克，他听了莫洛托夫的讲述，写出了多卷小说《战争》。同丘耶夫一样，斯塔德纽克为能与伟人交往而感到震惊，记下了他的每一句话。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实质上向他口述了自己为自己解脱了责任的历史——在讲到自己与希特勒勾结和 1941 年的灾难时他推卸了自己的责任。

莫洛托夫喜欢听他的崇拜者们说：他与斯大林一起接受的是一个用木犁耕地的国家，而留下的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从来就没有想过，是他们没有能使国家避免可怕的战争，是他们没有能拯救千百万人，没有能让军队做好对德作战的准备。然而，为了准备同美国的战争，他们却把国家彻底搞垮了。是的，斯大林同莫洛托夫一起最终留下的是一个拥有大量火箭和坦克的国家，但这是一个贫穷和饥饿的、被敌人团团包围的国家。

伊万·斯塔德纽克回忆说：

“每一次，当我们坐在饭桌旁的时候，莫洛托夫总能找到合适的时机来为‘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干杯。大家都站了起来，热姆丘任娜也站了起来，同大家一起碰杯，再说些吹捧斯大林的话。”

斯塔德纽克问莫洛托夫，他是否真的批准了判处 300 个死刑犯的名单。

“是真的！”——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就是现在也会签这个名单的，因为我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在档案里保存着莫洛托夫批准过的名单共有 372 份。这是那些在 1937 年 2 月至 1938 年 9 月这短短的时期内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了死刑的人的名单——他们总共有 5000 人左右。

莫洛托夫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突然搜集了他保存在家里的斯大林信件，并把它们交给了党中央档案馆。不是给中央，在那里它们可能会消失得毫无踪影，会被搁在文件柜里睡大觉；而是交给了档案馆，那里的人对它们作了登记。莫洛托夫在斯大林去世后还来得及清理一下档案——他当时还是中央主席团成员，还能这样做。可是他留下了斯大林的信件，尽管他是应该把它们交掉的，而且其中的一些信件压根不是写给他的，而是写给托姆斯基或者布哈林的。在斯大林时期留下这些信件是危险的事情，斯大林不喜欢他所签过字的文件落在别人的手里。

所选的信件对于斯大林来说很少有可以引以为荣的内容。他随时都是在写：枪决多少人，还要枪决，而且好像都是在处理工作之间写的……没有零钱了吗？那就枪毙几个收款员，马上就会来钱。没有肉？那就枪毙几个管供应肉的人。应该是一个完全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才不会急于将这些信件交出来让人们知道。看来莫洛托夫是想使自己与斯大林拉开一点距离，虽然他从未谈到过这一点。

他是很自命不凡的。当别人问他是否在写回忆录时，他回答说：

“为什么我应该写回忆录？斯大林和列宁都没有写过。”

他感到自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伟人之列的，并只把自己同列宁和斯大林作比较。其他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波林娜·谢苗诺芙娜·热姆丘日娜死于1970年春天。这是对他的沉重打击。葬礼是在“红十月”俱乐部里进行的。原苏联政府首脑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到场了。乐队奏起了苏联国歌。

莫洛托夫为妻子致悼词说：

“她成为我的妻子是我的最大荣幸。她漂亮、聪明，而最主要的——她是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她生活得不顺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她受难于困难时期，可是她明白一切，她不仅没有责骂斯大林，而且当别人骂他时连听都不想听，因为谁

往斯大林身上抹黑，谁就将作为我党和我国人民的敌对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最终抛弃。”

莫洛托夫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当与苏联文学经典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同坐在一张桌子边的时候，他突然问：

“您是怎么写反对爱国的短篇小说《叶夫根尼娅·伊万诺夫娜》的？”

“为什么是反爱国的？”——列昂诺夫的的脸上浮起了红晕，“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

“要是在过去，我们早就为此严惩您了。”——莫洛托夫的脸也涨得通红。

当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在1984年成为总书记时，他决定，应该恢复莫洛托夫的党籍。他得到了葛罗米柯的支持。为莫洛托夫派来了两辆车。在第二辆车中坐着医生——中央担心：他会不会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出什么事情？党的官员们根本没有想到，莫洛托夫会活过契尔年科本人，比起后者来说，他已经是父辈的人了。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被送到了老广场，那里他有20多年未曾去过了。契尔年科亲自通知莫洛托夫说，他重新是党的完全合法的成员了，并将在近日内发给他新的党证。为了庆祝这件事，莫洛托夫允许自己喝了香槟酒。

“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生存了这么多年后，生活依然是这么差？”——费利克斯·丘耶夫问他道。

莫洛托夫回答说：“只要存在帝国主义，人民改善生活就会非常困难。需要强大的国防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许多东西要建立起来。我们不能保证免遭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很多人在这样想：只要和平，只要和平！只要没有战争就好。这就是赫鲁晓夫式的没有远见的观点。它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考虑对新的战争做好准备……”

几乎是在生命的尽头来到之前，他的情况一直完全正常。但在去世前不久，他读完了《真理报》后，突然要求说：

“5 点钟请谢瓦尔德纳泽到我这里来。”

看来他又觉得自己是政府首脑了，是一个对国家的外交政策负责的人了。家里人希望他会忘记自己的请求。但是，到 5 点钟的时候，他穿上了西服，戴上了领带。人们不得不告诉他说，外交部长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非常忙，不能来……

莫洛托夫患了肺炎。他被送进了苏联卫生部下属的第四总局中心医院。但医生们已经无能为力了。1986 年 11 月 8 日他与世长逝。

当《真理报》和《莫斯科晚报》发出关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这位 97 岁的个人特别养老金领取者去世的简短通告时，许多人惊讶地得知，他活了这么长时间。



第三部分

赫鲁晓夫和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
对外政策



第七章

谢皮洛夫：一个没有附和任何人的人[①]

如今几乎被忘却了的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是一位只当了8个半月——1956年6月1日至1957年2月14日——的外交部长。但他是苏联时代最值得注意的政治家之一。他有过光辉灿烂的、尽管是短暂的飞黄腾达。1957年他敢于批评赫鲁晓夫。他被开除出党，被剥夺了工作，甚至被赶出了住宅。他是蒙受了"也附和他们的谢皮洛夫"这一荒唐可笑的提法而载入史册的，虽然他没有附和过谁，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因此就受苦落难。

完全能够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的并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而是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可是命运偏偏没有按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勃列日涅夫与谢皮洛夫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他们几乎是同龄人。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都是佩带着将军肩章从战场上回来的，这就有利于把他们与在后方度过整个战争时期的国家其他领导人区别开来。年轻的、健壮的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在大腹便便的、个子矮小的、身体有某些缺陷的许多政治局委员中显得很突出。

使人产生好感的外貌有助于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的飞黄腾达。斯大林——尤其在晚年——喜欢漂亮的、体态匀称的和年轻的

---

① 1957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中谴责谢皮洛夫为附和这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个标题针对的是这个决议的上述提法。——译注

将军。斯大林，尔后是尼基塔·赫鲁晓夫，都提拔过和亲近过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1957 年，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已经都是中央书记和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了。再有一个小台阶，再有一步，他们就是上天的人了。他们两人并不是干燥无味的人，并不是苦行主义者，而是热爱生活的人，受到妇女们的青睐。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止于此，他们走的路子则是全然不同的。

勃列日涅夫爱玩多米诺骨牌戏，喜欢酒席上的美食和豪饮，他这些爱好在他的党的书记的同伙中是突出的。谢皮洛夫教授——按专业说是经济学家——通晓音乐、戏剧和文学。只要一有机会，谢皮洛夫就会放下工作，去大剧院观看首场演出。与谢皮洛夫很要好的前作曲家协会领导人吉洪·赫连尼科夫回忆说，他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他器重和尊敬艺术人才，他本人的歌喉也非常好……

谢皮洛夫是一个有魅力的和漂亮的人。他使人一看就对他产生好感。谢皮洛夫还是一名演说家——在后革命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中也可说是凤毛麟角。

但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水平更高的政治家。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他正确无误地站到了胜利者的一方。而谢皮洛夫是按照他自己认为是公正的和诚实的方式行事的，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依然是天真幼稚的人，尽管他不止一次地遭到过现实生活的打击。

等待逮捕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诞生在阿什哈巴德。他的父亲在当地的铁路机务段当车工，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后来形成了好听的男中音。他的父亲是教徒，因此德米特里就在教会合唱团里唱过歌。全家搬到塔什干后，他曾在市国民教育局下的学生剧团里演过戏。

这位未来的中央书记早晨在一家做烟卷空纸筒的烟草作坊挣点钱，白天在学校上学，晚上跑到戏院去看音乐剧。他对戏剧如此情有独钟，甚至到一个剧团做过助理化妆师。他很崇拜柴可夫斯基和拉赫曼尼诺夫。谢皮洛夫会唱 10 部歌剧，熟记一百来首抒情歌曲。这些歌曲他愉快地一直唱到生命结束。

1922 年，德米特里・谢皮洛夫来到莫斯科学习，4 年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那里开的刑事诉讼课是由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讲授的。维辛斯基还主办过一个讲习班，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

谢皮洛夫一边学习，一边靠在铁路上卸木材或在制革厂分拣兽毛来挣点钱。他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工作，当了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法院的检察官。两年后他转到斯摩棱斯克，担任西部州检察长的高级助理。

1929 年，他回到莫斯科，被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管理技术研究所聘为高级研究员。他开始撰写关于农业的文章，1931 年进入红色教授农学院。与此同时，他开始担任《苏联百科全书》农业卷的学术编辑和《农业战线》杂志的责任秘书，同时还在莫斯科季米利亚泽夫农学院的农学系讲授政治经济学。

他乐于承担这么多重负，所有工作都能完成，而且愿意执教。他非常喜欢讲课，学生们也注意听他的课。

1933 年，谢皮洛夫被派去当西西伯利亚边疆区丘雷姆区国营畜牧场政治处处长。但是，这样的干部总是受到重用的，不会把他们长期放在边远地区工作。两年后他就被召回首都，并立即被调到党中央机关出任党中央农业部科学处副处长。不久，科学处转归党中央科学部。同时他开始在他本人前不久从那里毕业的红色教授农学院任教。

但他在党中央工作时间不长。科学部部长、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卡尔・亚诺维奇・鲍曼被关进了监狱（他后来死于狱中）。这个部被解散。谢皮洛夫被任命为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术

秘书和室主任。另一位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也是政治经济学专家）已在这个研究所工作。葛罗米柯不久被调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谢皮洛夫仍旧从事科研工作。将近20年中他们的命运是不同的。

谢皮洛夫的妻姐和她的丈夫两人（他们都在国家计委工作）都被捕了，后来他妻子的父母也被捕了。他的岳父加拉利德·伊万诺维奇·克鲁明是《消息报》主编，岳母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温克索娃是莫斯科州沃斯克列先斯克区党委书记。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本人也被带到卢比扬卡，受到了盘问，那里的人威胁要把他关起来，但还是把他释放了。他碰上了好运气。

谢皮洛夫成了经济科学博士和教授，当了《经济问题》杂志的秘书，还担任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学术编辑。与此同时，他还在党中央高级党校和莫斯科苏联合作社贸易学院任教。

战争改变了他生活中的一切。1941年，他到首都基辅区委组建的民兵师当了一名列兵。在叶利尼亚血战中，仓促组建的民兵几乎全军覆没。谢皮洛夫好不容易才冲出了包围。此后，他被抽调到基干部队，授予军官头衔。委任为师政治部教导员。在前线，勇敢的、忠诚的谢皮洛夫总是临危不惧。讲到谢皮洛夫时，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说："这是来自教授的士兵，来自士兵的将军。"

在军队里召开的一次难得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大会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一致表示，谢皮洛夫应该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次大会后他就成了师政治部主任。其前任则同意大家的意见，改任谢皮洛夫的副手，而总政治部批准了这一干部变动。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谢皮洛夫已是第24集团军（稍后改名为第4近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该集团军被编入沃罗涅日方面军，在那里谢皮洛夫认识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1944年年底，谢皮洛夫成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同集团军一起打到了维也纳。1945年3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那时

他只是高兴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将军肩章的分量，而到生命终结时这一崇高的军衔成了他的救命符。其实，谁能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呢……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很关心维也纳歌剧院的修复工作。他发令修复了霍夫堡宫，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军官之家。他邀请伊万·科兹洛夫斯基到维也纳，这位著名的抒情男高音向苏联军官们作了演唱。

谢皮洛夫被授予以下当之无愧的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和两枚战斗红旗勋章。

“拉手风琴的人”和其他领袖

战后，谢皮洛夫被召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但很快，就在1946年同一年的8月，他被调到《真理报》，领导那里的宣传部的工作。他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领域里，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中，进行着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无休无止的暗中争斗，所以很难保持一个人的完整无损。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处在了搞意识形态的权势分子的圈子中。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些人“没有原则和信念可言，他们可颂扬奉命颂扬的任何人，同样可痛斥奉命痛斥的任何人。”

1946年，党中央机关被彻底改组。许多部门干脆被撤消了，剩下的部门归入两大部——干部部和宣传鼓动部。干部部由刚刚当选的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委员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领导。斯大林是把他从列宁格勒调来的。库兹涅佐夫在该城市的防守中表现突出，所以得到很快升迁。宣传鼓动部部长由长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的格奥尔吉·费奥多罗

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担任。早在战争期间，亚历山德罗夫在发给政治局委员们的一份工作文件中写到了从文化界清除犹太人的必要性，他在文件中报告说："在艺术活动中占多数的是非俄罗斯人（主要是犹太人）。"1943年秋，著名女演员法因娜·拉涅夫斯卡娅未被准许在影片《伊万雷帝》中担任角色，因为"拉涅夫斯卡娅的闪米特[①]人脸型十分明显，尤其是在近镜头上。"

党中央主管宣传部的是政治局委员、不久以前的列宁格勒头头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人们认为，日丹诺夫把列宁格勒的干部陆续调到莫斯科，特别是批庇护了库兹涅佐夫。事实上他们之间已形成很不一般的关系。日丹诺夫嗜好烈性酒。战争之初，他患过可委婉地说是神经性的毛病。他不能工作，无法在人们前露面。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列宁格勒方面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涅佐夫不得不让日丹诺夫单独住在他的寓所，并承担起了领导被困城市的责任。

战后，斯大林把库兹涅佐夫调到了莫斯科，因为他需要年轻和活动能力强的人。对此日丹诺夫是不高兴的。在党中央机关，他不久以前的部下竟成了自己的对手。他们之间开始了扩大个人影响的斗争。起初，优势在较为有经验的、党内头衔较高的日丹诺夫一边，因为日丹诺夫是轰动一时的意识形态决议的起草人，这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战后国内的精神气氛。

最著名的决议出现在1946年——那就是《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8月14日），和关于影片《伟大生活》的决议（9月4日）。结果，安娜·阿赫马托娃和米哈伊尔·佐先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而影片《伟大生活》下集因"思想政治有问题，不真实地、歪曲地塑造苏联人的形象"而被禁映。这些决议使知识分子所抱有的从前的镇压手段战后将不再出现，而较为自由和

① 闪米特人，指近代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叙利亚人。——译注

开明的时代将会到来的希望化为乌有。

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德罗夫还草拟了一个党中央《关于培训和再培训党和苏维埃的干部》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全体机关工作人员都接受系统的党的教育。这就把宣传部置于干部部之上。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社会科学学院，调整了高级党校和军事政治学院的工作。

很少接触报刊业务的谢皮洛夫立即开始既在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又在军事政治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

日丹诺夫还受托主持组织局的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意味着他在党的等级系统中成了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但是，这种高升不能不引起同事们的妒忌。赫鲁晓夫写道："他手风琴拉得不错，钢琴弹得也好。这我很喜欢。卡冈诺维奇对他却是瞧不起的，说'拉手风琴的人'如此这般。卡冈诺维奇常挖苦地说：

'在这里不需要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只要能说会道，善于讲讲笑话，唱唱民间小调，就能在这个世上过日子了。'

说实在的，当我在近处，在工作场合，仔细观察日丹诺夫时，我也开始同意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了。确实是这样，当我们在斯大林那里时（这个时候斯大林已开始喝酒并给别人灌酒，日丹诺夫对此有很大嗜好），常常是由日丹诺夫弹着钢琴，唱着歌，斯大林则随着他唱。这些小曲只能在斯大林那里唱，因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唱不得的。这些小曲只有装卸工人在小酒馆里能唱，而再也没有谁能唱……"

在斯大林举行的晚宴上，斯大林总是让日丹诺夫坐在自己的旁边，并指定他为筵席主持人。斯大林确实每一次都告诉他，什么时候和为谁干杯，而且有时还逐字逐句地口授祝酒词。

流血流汗挤向上层的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不喜欢日丹诺夫，因为他们觉得此人在党内被提拔得太快了。人们妒忌他——那是当然的事！

赫鲁晓夫写道："日丹诺夫有点带狡诈的阴险。他能敏锐地发

现你的失策，说话带点讽刺。另一方面，纯粹从表面上看，在历次全体会议上他都手拿铅笔坐着，记录着。人们可能这样想：日丹诺夫在全体会议上多么仔细地听取一切，记录着一切，什么也不放过。而他记下了某人不妥当的说法后就跑到斯大林那里去重复这些说法……”

针对日丹诺夫的算计是从攻击他的主要下属、宣传部长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夫开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米洛万·吉拉斯回忆起亚历山德罗夫时说：“他主要的突出特点就是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个性。他身材不高、体格结实，秃顶，而他脸色的苍白、身体的发胖表明他经常不走出办公室。除了一般性的意见和殷勤的微笑外，他什么话也不说……”

1947 年 4 月 22 日，政治局作出了第二次讨论亚历山德罗夫的书《西欧哲学史》的决定。好像亚历山德罗夫的这本书的出现成了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值得国家最高当局来关注！是斯大林亲自设下这个小计谋，他想要批判亚历山德罗夫的意识形态错误，另外还搞抄袭。

当时担任党中央书记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回忆说，在斯大林办公室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后，大家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领袖说：

“帕托利切夫，您留一下。”

大家都已离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站在门口，等待领袖讲话。而领袖在翻阅桌子上的什么东西。时间在流逝。帕托利切夫想：莫非他忘了？斯大林终于离开写字台，走了几步，问道：

“您说，亚历山德罗夫自己写东西吗？”

帕托利切夫果断地回答：

“亚历山德罗夫自己是写东西的。”

斯大林仔细地看了看帕托利切夫，沉默了一会儿说：

“好吧，您可以走了。”

总的来说，亚历山德罗夫（1946 年让他当选为院士）的创作

手法在莫斯科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说，他如何把一位有才干的年轻学者叫到自己身边，向他大概讲了以下的话：

“国家安全部门打来电话查问您的情况……您的事情不妙。对您来说惟一的挽救办法是赶快写这么一本书。”

此人在惊慌中写了，亚历山德罗夫一次又一次地吓唬他，最终取到了这本书的手稿。亚历山德罗夫大胆地在原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把它交给了出版社……

受托主持讨论的不是日丹诺夫，而是他的对手库兹涅佐夫，虽然库兹涅佐夫管辖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干部问题。

亚历山德罗夫的书是编的，它是靠剪刀和糨糊搞出来的。但对这本书进行尖锐批评当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这是上头的意见。在这次浪潮中，亚历山德罗夫和他的副手、后来的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谢耶夫被解除了宣传部领导的职务。亚历山德罗夫被派到科学院哲学所主持工作，斯大林去世后当了文化部长。但 1955 年春，完全偶然地在莫斯科郊外的瓦连京诺夫卡发现了一处“淫窝”，国家的主要思想家和党内哲学家格奥尔吉·费奥多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在那里正在与放荡的女人们寻欢作乐，与他在一起的还有文化部门的几名官员。

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想想看，这算什么新鲜事！我在乌兹基疗养院见过这个亚历山德罗夫。每天晚上他都喝得醉醺醺的，偷偷走进 NN 号房间，（据一位女服务员说）到天亮才从那里出来。但是这还不是问题之所在。问题是他平庸无能、不学无术、卑鄙下流、低级趣味、吹毛求疵。只要仔细观察他 5 分钟，就可发现，这是一位追名逐利、向上爬的人，他与文化毫不相干。竟让他当了文化部长！……

在莫斯科市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的笑话。据说，3 月 8 日有人给他打电话祝贺妇女节。

‘你为什么祝贺我？’

‘因为您是我们的头号卖身投靠者。’”

这时候亚历山德罗夫已被彻底赶出了莫斯科，被派到了明斯克工作，53岁时他就死在那里……

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担任了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日丹诺夫的地位已被大大削弱。1947年9月，上级把谢皮洛夫从《真理报》调到费多谢耶夫的位子上担任第一副部长。日丹诺夫把他请来对他说，宣传鼓动部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而国内形势是复杂的：

“成百万人到过国外。他们看到了一些驱使他们去思考的东西。他们希望拥有好的住宅（他们在西方看到了好的住宅是什么样的），吃得好，穿得好。人们议论说：什么政治，去它的吧！我们只想好好生活，多挣点钱，自由地呼吸，好好地休息。但人们不懂得，只有通过正确的政治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不问政治、不讲思想性的情绪是很危险的。这些情绪如加上对西方的奉承迎合，就更加危险。但政治局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不使宣传鼓动部变得纯洁和得到加强，我们就不可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发起顺利的进攻。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要吸收您参与这件事情……”

谢皮洛夫处境的复杂性在于他位居日丹诺夫之下，而后者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所以谢皮洛夫本人也处在一个危险地带。斯大林对日丹诺夫已失去兴趣，认为他是一个累赘，想抛弃他。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何以还是会失宠于斯大林呢？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曾自问自地答道：“‘上层’有这样的印象（这种印象有多少根据，我现在难以判断），他像是个懒汉，缺乏工作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觉察到了这一点。党中央每次开会，他都可以晚到两三个小时，还可能根本不来。一句话，他不是像卡冈诺维奇那样的人。卡冈诺维奇总是自己找事干，他总是没有空。而那一位则悠闲自得：事情交他办他就办，不交他办他就不办……”

也许，问题还有另一方面。斯大林经常更换干部，提拔新人。而对日丹诺夫来说，也已到了他离职的时间了。而对日丹诺夫恰恰又提不出太多对他个人的意见。他在政治游戏中显得是个多余的

人。

赫鲁晓夫回忆说："大家都在斯大林那里吃午饭，午饭吃到这样一种程度，日丹诺夫竟然不能行走了。他想要像过去那样在斯大林那里留下过夜，但事与愿违。斯大林对他说：

'您有自己的住宅。'

简直就把他撵走了……"

日丹诺夫有心脏病，但他喝酒喝得很厉害。甚至喜欢把人灌醉的斯大林有时也厉声斥责日丹诺夫几句，这时后者就乖乖地给自己倒点果子露来代替葡萄酒。米洛万·吉拉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别墅里一直观察日丹诺夫的情况并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典型的厚颜无耻的知识分子。

吃饭时日丹诺夫是惟一一位喝橙汁的人。他向南斯拉夫客人解释说是因为有心脏病。吉拉斯这位还十分年轻的人天真地问：

"这种病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日丹诺夫讥讽地回答说：

"我随时都可能死，但我也可能活得很长久。"

斯大林败坏了莫洛托夫的名誉，不断指责他的妻子先后参与各种反党和反国家的行动。对日丹诺夫则是打击了他的儿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此人是在党中央机关中在谢皮洛夫身边工作的。

请立即来"小角落"

在国家安全部内部，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已酝酿成熟，就此案件将枪毙许多知名的列宁格勒出身的党的工作者。不清楚的是，将如何处理长期领导列宁格勒的安德烈·日丹诺夫。不能把所有的列宁格勒人都关起来，而让他一个人仍然自由自在，这是不行的。

但斯大林不想触动日丹诺夫。因为他的名字是与重大意识形态

措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把他监禁了，那就势必要把轰动一时的关于文学、音乐、电影等的决议都扔到字纸篓里去。日丹诺夫一死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在谢皮洛夫的回忆录中描述过斯大林严厉抨击日丹诺夫的一次会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身体很不好，十分困难地前来开会，在会上简直就晕了过去。脸就像死人一样刷白。政治局决定送日丹诺夫去休假。

谢皮洛夫对日丹诺夫说：

“您应当立即住院!”

日丹诺夫回答说：

“不，政治局决定我应当去瓦尔代。斯大林同志说，那里的空气对心脏病患者很有益。”

斯大林还对陪同前往的医生说：

“你们要经常带他去散步。不然的话他还会发胖……”

在对心脏病患者不利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散步很快导致日丹诺夫心肌梗塞……

就在那个时候，党中央科学部建议在全苏讲师讲习班上讨论生物学领域的状况问题。谢皮洛夫表示同意，自然他事先已向宣传鼓动部部长苏斯洛夫作了报告。由科学处处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在会上作了报告。

小日丹诺夫（当时还不到30岁），这位化学家、未来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罗斯托夫大学校长，在他的报告中批评了“人民院士”、天才的故弄玄虚者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小日丹诺夫的报告并不是他的独创。在党中央的意识形态部门中大家早就对李森科表示不满。一些知名的生物学学者对李森科都有意见，他们论证说李森科的活动对农业有害。他所许诺的小麦神奇品种中始终没有出现。但是他却成功地阻碍另外一些生物学家推广自己通过长期育种工作培育养出来的品种。

1948年春，老日丹诺夫在中央组织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强

农学院领导的问题，把这种官方语言译成通常的字眼，这就意味着决定要撤掉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院长的职。但日丹诺夫的这个意图与另一位有权势的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马林科夫在短暂失宠后又威风了起来。斯大林责成他主管中央农业部，并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农业委员会主席。尽管谁都不敢说，格奥尔吉·马林科夫这个一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城里人能通晓农业。

马林科夫除了重新依靠李森科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许诺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办法来改变农业部门的状况。为此他就应使“人民院士”免受攻击。马林科夫指示谢皮洛夫立即把小日丹诺夫的讲话速记记录呈送给斯大林，并把他对这个批评性报告的看法向斯大林作了报告。领袖就有了他所希望得到的打击老日丹诺夫的一个借口。这时日丹诺夫马上就意识到了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就批评谢皮洛夫：

“您怎么不同我商量就允许作这样的报告？尤里是一个爱冲动的人。而您呢，您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工作者，怎么估计不到这样的报告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尤里·日丹诺夫讲话后过了两天，谢皮洛夫的锥圆形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是从斯大林秘书处打来的：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请立即来‘小角落’。”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被称为“小角落”。

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已经聚集了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领袖首先讲话：

“需要讨论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宣传鼓动部未经中央批准就组织全苏讲习班，会上痛骂了李森科院士。而我们的整个农业是靠他维持的。根据什么理由？谁准许的？”

斯大林转身面向中央书记、领导宣传鼓动部的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老练的宫廷大臣毫不犹豫地立马否认了自己讲过的话：

“我没有准许，斯大林同志。”

“我是问谁准许的？”领袖重复说。

谢皮洛夫当然可以说是苏斯洛夫准许的，但他不想这样做。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站起来大声说：

“我准许的。斯大林同志，您可以严厉地处分我，但我请求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斯大林略带关切地看了看这位大胆的人，并重复说：

“您说什么？您不知道我们的整个农业是靠李森科维持的？”

斯大林给了谢皮洛夫一个放弃错误看法的机会。这是一个救生圈。但谢皮洛夫表明，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看法！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后来回忆说，他好像突然发作起来。他激情地说：

“斯大林同志，这是极大的误解。人们向您提供了不正确的消息。李森科一个品种也没有培育出来，他没有任何科学构想。有经验的育种家们培育成了一些小麦品种，数以千万计的公顷正在播种这些品种，而他们身上却被打上了魏斯曼学说信奉者和摩尔根主义者的烙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久前才被委派到宣传鼓动部工作，我已做好受任何处分的准备，但我请求您弄清这个问题……”

斯大林已经弄清楚了。他使人有不祥之感地说：

“不能把事情这样放着不管。应当对有罪的人进行处分，以儆效尤。不应处分尤里·日丹诺夫，他还年轻，没有经验。应当处分‘父辈们’——日丹诺夫和谢皮洛夫。应当支持李森科，并削去我国不高明的摩尔根主义者的桂冠。”

斯大林授予了李森科清除他的论敌的全权。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触动谢皮洛夫。

过了几天，7 月 10 日，根据政治局决定，再次改组了党中央机关的结构。撤消了局，设立了部。宣传鼓动局改为宣传鼓动部。部长由谢皮洛夫担任。

同一天，即7月10日，老日丹诺夫去休假两个月，从这次休假中他再也没有回来。马林科夫这位中央第二书记开始主管意识形态问题。

7月15日，即老日丹诺夫去休假后过了5天，政治局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打击："由于日丹诺夫同志就生物科学问题作了错误的、没有反映联共（布）中央立场的报告，因而接受苏联农业部、苏联国营农场部和列宁农学院关于在农业科学院7月会议上讨论特·杰·李森科院士的题为《关于苏联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的建议，并准备在报刊上公布这个报告。"

一封悔过信

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举行了那次难忘的会议。李森科在会上作了《关于生物科学状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与学术讨论没有任何共同点。

在会议上人们如此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不想跟摩尔根主义者讨论，我们将继续揭露他们这些本质上有害的、思想上异己的伪科学倾向的代表人物。"

各报在报道会议结果时都称"击溃了"生物学中的"反科学潮流"。实际上是毁掉本国的科学，这不仅导致了农村的苦难处境，而且还决定了俄罗斯在许多科学和工艺方面的落后。

尤里·日丹诺夫不得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悔过信。这封信刊登在8月7日即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最后一天的《真理报》上。本次会议是李森科的重大胜利。

尤里·日丹诺夫写道："从我到科学部工作的第一天起，形式主义遗传学人士就开始到我这里来抱怨说，他们获得的、优质的有用植物新品种（荞麦、橡胶草、老鹳草、大麻、柑橘）还没有在生产中加以推广，就遇到特·杰·李森科院士拥护者们的反对……

“我的错误在于，我决定去保护这些是‘阴险狡猾的敌人的礼物’的实际成果，而没有对门捷列夫—摩尔根遗传学的根本方法论错误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我现在认识到，这是对待实践的事务主义态度，是在舍本逐末……”

斯大林迫使小日丹诺夫公开悔过，不是偶然的。这是败坏老日丹诺夫的名声。

斯大林把莫洛托夫的妻子先是解除工作，尔后开除出党，最后监禁起来。尤里·日丹诺夫的前途可以想象也是暗淡的。但是，8月30日，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去世了，从而使斯大林摆脱了许多问题，他对小日丹诺夫的态度也马上变好了。

1949年10月，当正在策划“列宁格勒案件”时，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企图在事后把已故的日丹诺夫也加到这个案件中去。他们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以政治局的名义致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关于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季奥诺夫等人反党集团》的密信草稿。这是对列宁格勒人的一份死刑判决书。

信中也谈到了日丹诺夫：“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指出安·亚·日丹诺夫对列宁格勒上层人物进行的敌对活动所负有的政治责任……现在很难解释安·亚·日丹诺夫怎么能不看清他坚持提拔的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索洛维耶夫等人的敌人面目……”

但斯大林对死了的日丹诺夫已毫无兴趣。他倒把小日丹诺夫还是留在中央机关的那个岗位上工作。由于机构的普遍改组，科学部改成了处，尤里·日丹诺夫依然在谢皮洛夫的领导下做事。日丹诺夫的一家继续住在克里姆林宫。次年，即1949年春，斯韦特兰娜·斯大林娜得到父亲的恩准后嫁给了尤里·日丹诺夫。来到这个家庭后，使她极为震惊的是大量装满“好东西”的柜子，和这个家庭中装腔作势的、虚伪的“党性”和十足的小市民习气的结合。

1952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他与斯韦特兰娜的婚姻很快就破裂了。不过，断送他大有希望的党内仕途的不是离婚，而是次年 3 月他的岳父的去世。

世界主义与原子弹

农业科学院会议是在反对世界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总的斗争范围内举行的。斯大林把这一斗争当作自己在战后时期的意识形态旗帜。当谢皮洛夫成为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他本人也就成了这部机器中的主要螺丝钉了。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支持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的决议，关闭了被宣布为反动摩尔根主义策源地的实验室。医学科学院也接受了这个决议。高等教育部长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卡夫塔诺夫签署了几道开除全国各大学中不同意李森科观点的一些大学者和大教授的命令。这些人都曾是生物学界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卡夫塔诺夫没有到此为止。他要求各大学“在两个月期限内重新审查一遍生物系各教研室所有人员，把他们中对米丘林生物学持敌视态度的人清除出去，用米丘林派生物学家来加强它们的干部。”

后来，在农学院、医学院、畜牧学院和畜牧兽医学院也都进行了这样的清洗。李森科反对者撰写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被禁止出版。

全国开展了反对“向西方卑躬屈膝”的斗争。所有来自西方国家的东西，甚至是非常科学的东西，都被称为是反动的。学者们无可奈何地把引用外国作者的话统统删掉。用这种蒙昧无知的方式来确立了本国科学的优先地位。

米洛万·吉拉斯惊奇地注视着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不久前他还认为苏联是仿效的榜样。“俄国人的优越性以其畸形的和滑稽可笑的面貌显示出来。我们处处看到了迄今为止还无人知道的苏联现实的方方面面：落后，蒙昧无知，沙文主义，大国主义，当然伴之试

图英勇地、超人般地把这一切都加以克服，和服从于正常的生活潮流的努力。”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回忆起斯大林怎样把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召集到身边。接着，斯大林开始谈“毫无根据地崇拜外国文化”的情况。

“这个传统来自彼得。彼得有很好的思想。但不久就钻进来了过多的德国人，这是崇拜德国人的时期。起先是德国人，尔后是法国人，崇拜外国人——臭洋鬼子，”斯大林诙谐地说，“军人也曾这样崇拜过，现在不大崇拜了……”

西蒙诺夫认为，“斯大林对所有归入‘向外国卑躬屈膝’这个概念的一切东西都持非常严厉和病态的态度。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后，在这个满目疮痍、忍饥挨饿的战胜国中，这是他的心头之痛。”

1948年，在布琼尼红旗军事通讯学院讨论了未来的第一个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创始人、科学院通讯院士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基苏尼科的著作。他的书被推荐获斯大林奖金。但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发言称，基苏尼科的这本书只在序言中讲到本国科学的优先地位，而在书的正文中到处都是外国姓氏：马克斯韦尔，亥姆霍兹，赫兹……

科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撤消了对该书获奖的推荐。这对苏联科学来说是最糟糕的时期。控制论被当作资产阶级科学受到禁止。科学院化学分部仿效李森科的方式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这使化学受到了重大损害。下一个该轮到物理学了。

甚至苏联原子弹的制造也险些告吹，其原因也就是使德国没有搞出核武器的那个原因。如同在纳粹德国一样，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反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论。相对论的拥护者被指责为缺乏爱国主义。

还是那位高等教育部长卡夫塔诺夫把所有情况向部长会议副主席伏罗希洛夫作了报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敌的学派正在通过物理学传播到高等院校。教科书中反映俄罗斯和苏联学者在发展物

理学方面的作用非常不充分。书籍中充斥着外国学者的名字……”

物理学家们分成了几类，有些人懂得现代物理学，所以能从事原子弹项目的工作；有些人因专业上不合适而没有被抽调去从事原子弹项目的工作。一些学位高的人否定量子论和相对论，认为它们与苏联科学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强调：“对苏联物理学来说，对向西方卑躬屈膝作斗争和进行民族自豪感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平庸的物理学家集中在莫斯科大学，他们向意识形态首长发牢骚。使他们感到特别生气的是核武器制造者中有大量的犹太人的名字。这使他们怀有希望，以为他们虔诚的愤怒声会被上层听到。

全苏关于物理科学问题的会议定于 1949 年 3 月召开。会议的组织者们打算重复一下李森科的成就，与自己的论敌算算账。但受托负责制造原子武器的政府副首脑贝利亚询问了原子设计的科学领导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真的是唯心主义理论吗？

库尔恰托夫简洁明了地向贝利亚解释说，如果这些理论被禁止，那就只好放弃原子弹。贝利亚清楚，如果原子弹制造不出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急着去见斯大林。上述会议立即被取消。对斯大林来说，原子弹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物理学得救了。即使犹太人物理学家们也没有去触动，他们被认为是“对国家是有益的”，尽管战后与世界主义作斗争的意识形态是浓烈地与反犹主义混杂在一起的。

斯大林的反犹主义是生理性的，或者确切地说是动物生理性的。被斯大林提拔起来党内高级权势分子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心地凶狠的一帮人，他们仇恨所有与他们不同的人。所以他们也把俄罗斯人列入“没有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集团和“医生危害分子”集团中。这不仅是为了保持体统，而且是为了悄悄地跟他们算账。在纳粹时期，这种举动被称为与“白犹分子”作斗争，即同不是血缘上而是在思想上接近犹太人的人作斗争。在反“世界主义者”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铁杆的职业揭发者队伍，这些人通常都是些无能

之辈，他们希望靠踩着自己的同事往上爬。犹太人纷纷被赶出了国家安全部门和国家机关，被革除了军队领导职务。

本书已经谈到的作家伊万·斯塔德纽克当年供职于陆军政治部报刊处。他在其回忆录《一名斯大林主义者的自白》一书中写道，政治部的同志们如何怀疑起他本人不是雅利安人后裔。这是斯塔德纽克从他兄弟的一封引起惊慌的信件中得知的。他兄弟在信中写道："你在莫斯科那里干了什么坏事？……是杀了什么人？杀死了？你坐牢了吗？……人家老是纠缠我，使我不得安宁！……"原来是一位上校从莫斯科来到斯塔德纽克的故乡，同当地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首长一起传见斯塔德纽克的亲属和邻居，询问斯塔德纽克是什么民族，他的父母是谁。

伊万·福季耶维奇·斯塔德纽克立即跑到陆军政治部主任 C. Ф. 加拉杰夫中将那里，把那封信扔在他的桌子上说：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这是法西斯主义！"

加拉杰夫不会念乌克兰文，但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少将，他说：

"我懂乌克兰语，让我来译成俄语吧。"

少将开始念起来，而他的脸变得刷白。

斯塔德纽克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

"当我在前线鼓舞我的战士们冲锋的时候，谁也没有问我是什么民族！"

加拉杰夫情绪低落地坐着，眼神颓丧。斯塔德纽克看了看这位不认识的将军。忽然他明白了：同他不一样，这位将军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他念的那封信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将军悄悄地问政治部主任：

"那就是说，我也会因这个理由而要被逐出军队？"

响起了电话铃声。加拉杰夫拿起听筒：

"喂……是，将军在我这儿……不！我坚决反对让他转入预备役！"

政治部主任对斯塔德纽克说：

“您办理一下10天额外假期的手续，回家乡时要穿上军官制服，佩带勋章。让人家看到您什么事也没有。”

“但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呢？”

“您就说：误会，愚蠢。真实情况别说，因为这会给军队丢脸……”

加拉杰夫富有同情心地看了一下将军说：

“请您别见怪……某种令人不解的和不能接受的东西闯入了您的生活。我们要鼓起勇气，振作精神……您回到自己的部队去，效力吧……”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观察力敏锐的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注意到，即使通常的人的情感流露也是有危险的。人们竭力不作反应，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显露自己的脸，都戴上了假面具。

楚科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作家协会领导人的脸是毫无表情的，呆滞的。吉洪诺夫的脸最没有表情。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听你讲话，但脸上不会流露出任何表情。索博列夫、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脸。这也许是当领导的习惯。不过我发现，在当今这个解放的时代，俄罗斯人一般都不如在以前的时代那样愿意显露出面部表情了。比如我的脸在如今的任何公众场合下就显得都过于多变，时刻在变。这就使我与众不同，使我成为一个不稳重的人……”

对谢皮洛夫在意识形态舞台上的活动要进行评价并不那么简单容易。一方面，在与世界主义作斗争的最黑暗的时期，他领导了中央宣传局。同时又兼任党报《文化与生活》的主编。该报整过所有正派一点的人。在他主持工作时，在1949年，开展了一场反对“一个具有反爱国主义思想的戏剧评论家集团”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运动的一部分，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该运动应当成为又一次大规模恐怖的根据。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作家，音乐家，还是戏剧界人士，大家都回忆说，谢皮洛夫曾是中央最正派的一个

人。

谢皮洛夫向斯大林报告了斯大林奖金评奖委员会关于在文学艺术方面颁发奖金的建议。他还说明了该委员会提出建议的理由，同时对提交讨论的作品做了评价。斯大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他认为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本人也读了很多作品。他对其他艺术形式兴趣要小得多。

在1949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授予奖金的问题时，斯大林突然问：

“音乐方面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好的作品？”

接着他看了看谢皮洛夫。谢皮洛夫建议给为轻歌剧《特列姆比塔牧笛》作曲的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米柳京发奖。

斯大林问：

“谁看过这部轻歌剧？”

大家默不作声。

“让我们信任谢皮洛夫吧。”

米柳京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不管怎么说，就他本人的心愿而言，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不会对任何人做坏事。他的过错和不幸在于他赤胆忠心、襟怀坦白地服务于领袖和制度。

在一次会议上，斯大林问谢皮洛夫：

“听我说，谢皮洛夫同志，为什么我们没有苏联的歌剧？人家有各种各样的意大利歌剧、德国歌剧，有优秀的俄国歌剧，怎么没有苏联歌剧？”

谢皮洛夫报告说：

“斯大林同志，这不完全准确。我们有优秀的歌剧。例如，有

捷尔任斯基的《静静的顿河》，有赫连尼科夫[①]的《冲向暴风雨》。”

斯大林没有听他的话，说：

“应当抓这件事。要搞清楚为什么没有，要为有这样的歌剧创造条件。”

谢皮洛夫酷爱经典音乐作品，持正统的观点，甚至在较晚的年代还说：

“我们这里从西方不断传来有害的、臭恶的东西——首先是在爵士乐方面。需要采取措施，防止爵士音乐和前卫风尚的不健康影响。我们应当着手对俄罗斯经典作品追本溯源。在此基础上使音乐文化得到发展。”

谢皮洛夫起草了一份相当心平气和的文件，但它是被认为是“学院式的文件”。随后，该文件经别人之手作了修改，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力量。结果是出台了中央的令人震动的决定《关于瓦诺·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

亚历山大·博尔夏科夫斯基[②]回忆说，恰恰是谢皮洛夫试图阻止实质上就是反犹太主义的反爱国主义评论家的运动。博尔夏科夫斯基非常严厉地指责了那个时候的当事人，甚至包括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因为正是他以作家协会副总书记的身份发表了一篇有名的反对世界主义者的定调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博尔夏科夫斯基也丝毫不怀疑谢皮洛夫的正派：“这是一个富有朝气的、聪明机灵的、坚定果断的人；他不仅思维能力健全，而且知识渊博，能评价文学和艺术的真实状况……

---

① 赫连尼科夫（1913－ ），苏联作曲家。苏联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1948年起）。他的创作在苏联歌剧、交响曲和声乐浪漫曲以及戏剧及电影配曲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译注

② 博尔夏科夫斯基（1913－ ）苏联俄罗斯作家、评论家。著有历史长篇小说《俄国国旗》（1953）《银河》（1968）和《铁匠在安娜家》（1974－1975）、剧本《女装裁缝》（1980）等。——译注

他是一位不照讲稿讲话的优秀演说家，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人，在讲台上一站就楚楚动人，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力求搞清楚真实情况的人。在那种只要方便和简单地执行指示的时候，他在中央的出现，在中央身居宣传鼓动部领导者的高位，使我觉得意外和奇怪。”

与莫须有的世界主义作战的斗士们轻而易举地克服了谢皮洛夫的阻力。这场运动是斯大林亲自指挥的，给他当助手的是马林科夫。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当然还在文化素养上与其他党的官员不同，他不是反犹主义者。但在那个年代，他也起了有害的作用，参与了所有这些对正派人来说是可耻的事情。那个时代谢皮洛夫真诚地相信斯大林的英明。机关工作人员尤其赞颂斯大林。斯大林以他的彬彬有礼的举止、善于适时地对大家表示的关怀和虚伪的深思熟虑的神态收买了他们的心。

1949 年 1 月 28 日，《真理报》上刊载了题为《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集团》的长篇文章。年轻的读者大概很难明白，为什么一篇似乎专门谈论一个狭隘的小团体问题的文章会导致极其严重的摧残社会的后果。可是要知道，这就是搜查内部敌人的一个信号。

是谢皮洛夫亲自起草了这份《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集团》的可悲的著名决议的草稿的。这个决议铺下了斯大林已策划好的新的血腥镇压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之所以未搞成，只是因为斯大林去世了……

与赫鲁晓夫散步

马林科夫不喜欢谢皮洛夫，想办法要把他从机关中赶出去。有过一个文件，说在主要党刊《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和宣传鼓动部隐藏着“人民的敌人”、(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捕的）前政治局委

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追随者。谢皮洛夫也被列在这批人中。

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去找马林科夫的情况：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我完全认为，我可能不适合在宣传鼓动部工作。就放我走吧。我不在乎自己的职位。要是重新当个科学工作者，我就感到幸运。但干吗指责我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马林科夫以温厚的语气回答他说：

“我们早就想找您了，但总是没有如愿，而现在您不能马上离开。”

1949年7月，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决议。决议中就谈到了谢皮洛夫：“必须指出，作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谢皮洛夫同志在监督《布尔什维克》杂志方面是不称职的。

必须向谢皮洛夫同志指出，他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即容许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把尼·沃兹涅先斯基的一本书当作教育区党委书记和宣传干部的教科书加以推荐。必须撤消这些错误的指示。”

秋天，谢皮洛夫被解除了宣传鼓动部长的职务。他几个月无事可做。一般来说，这样解除职务后就是逮捕。深夜通常是抓走犯人的时候，他此时外出散步。他绕着大学的旧楼慢慢行走，凌晨才回家。他本能地想：有人来抓他，而他不在家。但是没有人触动他。他似乎强烈地使斯大林感到了惊讶。斯大林记住了这个敢于反对他的意见的真诚的自由思考的人。或许，正因如此才没有触动谢皮洛夫。

1950年1月30日，中央打电话给他：

“明天12点钟前请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

他的命运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被决定的。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说：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关于谢皮洛夫同志的问题。他在我们这里

至今还闲着。他这个人知识渊博，有经验。让我们正式委任他为中央巡视员，今后怎么安排以后再说。怎么样，谢皮洛夫同志?”

被任命为中央巡视员的，通常都是地方上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人员，他们将提拔为州委第一书记或民族共和国中央书记。让他们当巡视员，目的是使他们能够在高就之前熟悉中央机关的工作。

正如后来谢皮洛夫自己了解到的，斯大林记起来他。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问：

“我们的谢皮洛夫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担任什么工作?”

马林科夫谨慎地回答说：

“我们大家想听听您的意见，斯大林同志，怎样安排谢皮洛夫。”

领袖确实没有忘记他。

“我们批评了谢皮洛夫。但他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不能不爱惜这样的干部。”

谢皮洛夫的真诚的表现给渐渐衰老的和对自己的一些战友感到失望的斯大林留下了印象。而主要是斯大林需要一位能简单明了地写东西的经济学家。在他去世之前一年，即1952年，他责成谢皮洛夫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谢皮洛夫后来说，那天（是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与妻子正在轻歌剧剧院看演出，有人在剧场找到他说：

“谢皮洛夫同志，请您赶快去打一个电话。”

他拨了斯大林秘书处的电话号码。领袖讲话时心情很好：

“听说你在看戏？看什么有趣的东西?”

“是的，看一个轻松的音乐喜剧。”谢皮洛夫小心地回答说。

斯大林显得异常和善地说：

“如果你能抽出身来的话，能否来一下?”

谢皮洛夫愉快地坐下来做他所喜爱的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而且，斯大林很关心他的工作进展情况，一章接着一章地仔细阅读，提出意见，亲自修改文稿。教科书编写工作的环境很理想，那是莫

斯科河岸边山丘上的一栋两层楼的单独住宅，从前是高尔基所有的。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被安置在作家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住过的一个房间里（马克西姆是在很早的时候并且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去世的）……

在谢皮洛夫的葬礼上，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工作过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阿巴尔金院士说：

"对于老一代的经济学家来说，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的名字与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学术上的一件大事，有助于提高千百万公民的经济学知识水平。"

应当说，阿巴尔金夸大了教科书的学术意义，尽管1953年10月谢皮洛夫当选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而他是在当上了《真理报》总编后才写完这本教科书的。

斯大林吩咐让谢皮洛夫当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19次党代表大会上让他成了中央委员。1952年10月，在一次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上，斯大林谈了中央宣传部和《真理报》编辑部工作差劲的情况，建议解除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伊利切夫总编的职务并在中央主席团下建立一个管意识形态问题的常设委员会。谢皮洛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斯大林使这个职务具有这样的意义，让把老广场5层楼上的一间办公室给谢皮洛夫，那间房间被认为是总书记的办公室。但斯大林早就不用那间办公室，因为他已搬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11月，苏斯洛夫打电话给谢皮洛夫：

"打算委派您担任《真理报》总编辑。伊利切夫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叙述了自己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让我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感到非常荣幸。您说过，党认为编写这本教科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离开编写组可能会耽误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但斯大林说，谢皮洛夫可以既编写教科书，又当《真理报》编辑。

“难道当《真理报》编辑就意味着昼夜都要呆在编辑部？这完全没有必要。编辑应当确保政治路线的正确，定调子。其他事情应当由编辑部的秘书处去做。”

1953 年 3 月 5 日晚上很晚，谢皮洛夫在《真理报》的办公室里聚集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法捷耶夫和考涅楚克。当他们在随便交谈时，有人用专线电话机给谢皮洛夫打电话。这是在晚上 10 点钟左右。

谢皮洛夫拿起话筒，听着对方说话，接着他转告大家：

“电话里说，斯大林同志去世了。”

新的时期已经到来，应当适应它们。但谢皮洛夫显然热心过度了。《真理报》编辑部的能人们这样剪辑了一幅摄于 1950 年 2 月签订苏中条约时的照片，照片上新的政府首脑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站在一起。谢皮洛夫决定做一点让马林科夫高兴的事，因为后者已被认为是国家的新主人。但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根本不希望马林科夫真的成为第一把手。

1953 年 3 月 12 日，中央主席团向《真理报》总编辑提出了严厉警告，原因是“在今年 3 月 10 日的《真理报》上随意发表了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追悼大会上的讲话的大样，并未经中央批准在第 3 版上发表了任意剪辑的照片。”

谢皮洛夫的照片风波得到了平息。警告在 12 月被撤销。赫鲁晓夫非常欣赏谢皮洛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真理报》总编辑的评价是：聪明机灵，工作勤奋，知识渊博和不搞阴谋。这样的人正是赫鲁晓夫所需要的。他正在聚集自己的班子，寻找有才能的人，所以吸收谢皮洛夫参加了他的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1954 年 4 月 17 日，赫鲁晓夫大肆张扬地庆祝了自己的 60 岁生日。几天后他遇见了谢皮洛夫，问：

“我过命名日您参加了吗？”

“没有参加。”

“为什么?”

“谁也没有邀请我。”

“哟，这就是说我的小伙子们失误了。”

赫鲁晓夫于1955年7月在中央全会上使谢皮洛夫成了中央书记，大大地巩固了他的地位。

赫鲁晓夫经常携妻去谢皮洛夫的别墅，共进午餐，但更多的是接他及其家人到自己家里度过整个星期天。赫鲁晓夫和谢皮洛夫两人一起散步，直言不讳地既谈论斯大林的罪行，也谈论国家该怎么办。他褒奖谢皮洛夫，信任谢皮洛夫。每当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请赫鲁晓夫作指示时，后者总是回答说：

“自己决定吧。”

谢皮洛夫在实现国家的非斯大林化中成了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谢皮洛夫亲眼看到了国家安全部门档案中的秘密材料后，开始同样真诚地谴责斯大林，如同以前真诚地赞颂他那样。正是谢皮洛夫帮助赫鲁晓夫准备了他在20大上做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著名报告。

20大后，莫洛托夫打电话给《真理报》总编谢皮洛夫。他不作自我介绍就严厉地说：

“别再谩骂斯大林了。”

谢皮洛夫凭声音知道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在讲话，回答说他不是谩骂斯大林，而是执行20大决议。莫洛托夫已不再掩饰愤怒的情绪了：

“我再次请您别再谩骂斯大林。”

但谢皮洛夫却毫不动摇地坚持己见：

“莫洛托夫同志，我只能重复我所说过的：我是在执行20大决议。您不满意吗？那就请把问题提交中央主席团。”

从中央委员会到外交部

20大后的1956年2月，谢皮洛夫在社会科学学院的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斯大林。但大会感到不满意的是他回避了其他保持了自己职位的党的领导成员的责任问题。该院的一些教师们直言不讳地谈了这一点。未来的院士、被斯大林枪决的一个十月革命积极参加者的儿子博尼法基·米哈伊洛维奇·克德罗夫讲得特别尖锐。

克德罗夫要求追究斯大林战友们的责任，因为他们与斯大林一起杀害了那么多的无辜。听众对这些发言反映强烈。谢皮洛夫好不容易遏制了院内沸腾的激情。

1956年6月4日，计划召开中央全会并讨论《第20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问题。要继续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责成谢皮洛夫作报告。随后应由国防部长朱可夫发言——他保存了一篇他没有作的报告文本，该文本对斯大林及其罪行进行了十分激烈尖锐的抨击。但在全会前3天，中央主席团把讨论改到秋天举行。8月又出现了全会问题。这次报告人确定为赫鲁晓夫，全会改到12月举行。但12月没有讨论意识形态问题。

党的干部抵制进一步的反斯大林行动，因为很多党的书记双手沾有鲜血。

西德外长冯·勃伦塔诺当时尖刻地说："赫鲁晓夫先生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上谴责已故斯大林这一事实，许多人认为是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几十年间一直是某个叫斯大林的先生的最亲密战友和同谋者的人们，现在一方面显示出他们令人作呕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一方面又正在与他们在斯大林生前和与他一起做的事情划清界限。"

谢皮洛夫尊敬赫鲁晓夫，因为他下命令释放了劳改营里的人

们：

“把他妈的大门统统打开，释放所有的无辜者。”

但是，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不是始终一贯的。当谢皮洛夫建议更改斯大林奖金的名称时，赫鲁晓夫表示不同意，反问道：

“为什么？再说哩，要是我得了斯大林奖金，我会为这个称号感到骄傲。”

20大后，谢皮洛夫不再主编《真理报》，而转到中央去了。除了他之外，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还有苏斯洛夫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佩洛夫，后者以前在《真理报》是谢皮洛夫的副手。他们对谢皮洛夫并不感到高兴。比方说，波斯佩洛夫在1954年第一次把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清除出《新世界》杂志时起了关键作用。

党中央机关里的同志们简直就不理解谢皮洛夫。他在中央这样主持过一个有关文学问题的会议，他说：

“我将不是作为中央书记，不是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而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发言。”

机关的同事们面面相觑：这怎么理解？我们毕竟是领导者而不是读者……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对搞艺术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不是用领导的语言而是用正常的语言与他们交谈。他并不怀疑党有资格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但不应当压制任何人。因此，赫鲁晓夫对待艺术的态度使谢皮洛夫讨厌。赫鲁晓夫做出的有些事，令有学识的人感到粗野荒唐。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认为，不能粗鲁地与知识分子交谈。档案中保存着他对创作知识分子的讲话稿。在他之前领导人讲话时用的都是批评责骂的语言，他明确地强调说：请注意，这不是中央的指示。

为什么1956年7月谢皮洛夫突然当了外交部长？这是赫鲁晓夫在长时间的夺权斗争中玩的手腕之一。外长的职位赫鲁晓夫向来不认为是重要的，他要亲自制定对外政策。他只是迫切地要把莫洛

托夫从外长的岗位上拉下来，他就把他可完全信任的人派到了外交部。况且谢皮洛夫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打开了苏联与阿拉伯东方的亲近关系。在他之前，阿拉伯政权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反动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这离实际情况并不太远。在埃及，国王被推翻后军人掌握了政权，他们甚至解散了当时的那个国会。谢皮洛夫在埃及领导人中首先发现了对抗西方的理想盟友。这是对意识形态定向标作出的决定性的转换：阿拉伯新政权残酷地消灭共产党人、互相残杀并残杀本国居民，但现在莫斯科对此闭眼不去看了。

1955 年夏，埃及人庆祝国王被推翻和革命 3 周年。苏联代表第一次应邀来到开罗。来的是谢皮洛夫，但不是以《真理报》主编的身份，而是以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7 月 22 日，埃及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谢皮洛夫坐在讲台前，有人给他翻译总统的讲话。时任苏联驻开罗使馆的见习翻译瓦连京·亚历山德罗夫回忆说，他听得非常仔细。谢皮洛夫十分欣赏纳赛尔号召维护国家独立的讲话。他几次鼓掌。

听完讲话后，谢皮洛夫要求安排他与纳赛尔会见。大使未曾有过这样的接触。苏联驻开罗大使馆根本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赶走了法鲁克国王的年轻军官们。这件事由武官处的人去办了。据说，纳赛尔是用这样的话来见谢皮洛夫的：

“我的兄弟，我早等着这次会见了！”

谢皮洛夫与纳赛尔的会见奠定了苏联近东政策的基础——依靠阿拉伯国家反对西方。为了感谢喊出反帝口号和对不断相互更换的苏联领袖们表达爱戴的言论，莫斯科向阿拉伯世界供应武器，提供贷款，派遣众多顾问和专家。

在苏联与阿拉伯友好的最初几年，表达永恒友谊和无限忠诚的华丽词句，对莫斯科的领袖们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清楚了，这是一些非常自私的朋友，他们只是在还没有与美国搞好关系的时候才紧紧地靠近苏联的。

谢皮洛夫确定的近东政策原则在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到外交部工作之前始终未变。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起原子能专家学者有一次如何被邀请出席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情况。等了很久不让他们进入会议厅，因为前一个问题怎么也讨论不完。最后给他们解释说：

"对刚访问埃及回来的谢皮洛夫所作的情况通报的讨论快结束了。问题非常重要。正要讨论坚决改变我国近东政策的原则。从今以后我们将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目的是破坏阿拉伯人与欧洲和美国已有的关系，造成'石油危机'——这一切将使欧洲依赖我们。"

1956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偕王后访问莫斯科。对过去的事情已划上了句号。但赫鲁晓夫和谢皮洛夫向伊朗人提出了新的意见：为什么他们加入了巴格达公约？1955年在巴格达签订了关于成立中央条约组织的公约。该组织的成员有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这是一个寿命不长的军事政治同盟。

国王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很不客气地回答说："我提醒好客的主人们，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不断地企图经过伊朗向南推进。1907年他们进入了伊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又试图占领我国。1946年成立了傀儡政府，目的是侵占伊朗最富饶的一个省——阿塞拜疆"。赫鲁晓夫和谢皮洛夫回答说，他们不承担在他们领导国家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的责任。

谢皮洛夫是个办事利索行动果断的人，与他的前任莫洛托夫不同，他认为外交部长应当尽可能多地到世界各地走走，经常会晤外国外交官。他人比较年轻，直爽开朗，善于倾听交谈者的话，如果交谈者说得合情合理，他就同意。外国外交官们马上意识到，苏联外交政策由新人在抓。

联邦德国外长勃伦塔诺说："苏联成功地实现了舆论战线的重大突破。经常不断的外出访问和接受回访给苏联带来了宣传上和心

理上的成功，对此不能低估……”

西方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注意到，俄罗斯人已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跟他们很容易交谈。他们说起话来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充满自信，胸有成竹。

谢皮洛夫感觉到赫鲁晓夫对他的全力支持，表现出完全独立的办事精神。苏联外交官们有了一位不同于他们所有前任部长的部长。当谢皮洛夫飞往开罗会见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时，有人问他哪位助手陪他前往。他惊讶地说：

“干吗让人家放下手中的事情？翻译在使馆找得到，公文包我能自己拿。”

谢皮洛夫是惟一一位从来不对任何人大声嚷嚷的外交部长。他不找自己部下的茬，信任他们，不横加挑剔地签署给他送去的文件。

当了部长后，谢皮洛夫发出指示，要求部里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他们甚至进行了考试。年纪不轻的外交官们啃起了教科书，找来了已被遗忘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当过部长助手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看到他桌子上放着大量文件觉得可怕，但能很好地对付自己的工作。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找谢皮洛夫要求调动工作，因为那时他已在部长秘书处工作好几年了。谢皮洛夫请求他说：

——我的所有助手都是从《真理报》来的，不懂外交。请再留半年——教教我的同事们学会做外交部的工作。

多勃雷宁认为，跟谢皮洛夫一起工作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十分好学好问的人，经常把专家找来，请他们讲解什么东西意味着什么。他是个聪明人，什么事情都理解得很快，但似乎并不力求弄得很清楚。谢皮洛夫可能不打算一直停留在这个位置上。但他也没有料到他当部长的道路竟会是如此短暂。

德米特里·谢皮洛夫认为，苏联应当与亚洲国家交朋友。莫斯

科以前是不注意这些国家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只把美国和西欧看作是值得注意的对手。此外，在谢皮洛夫任职期间，1956年10月签署了关于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共同声明。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惟一一份使俄罗斯与日本沟通起来的文件。

北方领土

在1956年10月的日子里，一个日本代表团飞抵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11年了，只有苏联还没有与日本签订和约。当时这好像是一件很容易排除的荒唐事情。谁又能料到，和平条约就这样仍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目的?

当时抵达莫斯科的日本代表团由年纪已经不轻的鸠山一郎首相率领。他走起路来明显地不那么利落，气色不大好。日本首相在莫斯科病了，因此与谢皮洛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谈判就由农林大臣河野一郎进行。他很想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其中包括要改善他监护的日本渔民的生活。就是他要求首相到莫斯科访问的。如果不是河野大臣，一切都将告吹。所有事情都岌岌可危。在签署联合声明前的两天里，河野大臣处于悲观失望的境地，心想什么结果都不可能有了。他信任地说：

“鸠山首相不可能再来莫斯科了。如果我们现在不达成协议，那么日苏关系的正常化就要推迟好些年。我很怕发生这种情况，请布尔加宁先生和赫鲁晓夫先生考虑到业已形成的情况。”

河野大臣对苏联的谈判伙伴惊人地直爽。他经常向他们讲述政治家们原则上任何时候也不对外国人讲的那种事情。

河野大臣对他的苏联对手说：我是日本的小赫鲁晓夫。我和我的拥护者们在我们党内有很多敌人，特别是有势力的吉田集团。这是一些赞成与美国友好的人，是一些疯狂反对苏联的人。我们计划全面彻底地改组内阁，我们要把自己的敌人——美国人的帮凶从日

本政府中清除出去。我希望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不要忘记我们的会见和开诚布公的交谈。

但领土问题最终妨碍了协议的达成。战争胜利后，苏联收回了1905年战败后丧失的南部萨哈林和早在1875年俄罗斯帝国割让给日本的千岛群岛。日本遭受失败后放弃了对这些领土的一切权利，但希望得到紧靠北海道的4个小岛：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

双方学者都选择出了证明本国有权拥有这些岛屿的历史和地理论据。他们开始追溯是谁首先登上千岛群岛的。但发现和开垦千岛群岛是从北向南又从南向北推进的。根据全部情况判断，俄罗斯和日本实际上同时在做这件事。人们开始深入地分析研究俄罗斯帝国与日本签署过的条约文本。根据第一个条约，即1855年的下田条约，现在的北方领土归日本所有。根据第二个条约，即1875年的圣彼得堡条约，整个千岛群岛归日本所有。第三个条约，即俄罗斯战败后于1905年缔结的朴次茅斯条约，没有提及千岛群岛的地位问题。

东京希望得到的南部4个岛屿从来不是俄罗斯的。这4个岛屿于1945年成了苏联的岛屿，因为苏军已占领了它们。另外，齿舞的3个环状珊瑚小岛，正如历史学家鲍里斯·斯拉温斯基根据档案材料得以搞清的，只是因为一名海军上校没有弄清楚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命令而加以占领的。无线电联络进行得很糟糕，这位海军上校又过于热心。而1946年2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却发布命令宣告："南部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境内的全部土地及地下资源、森林和工厂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

归还两个岛屿——齿舞和色丹——是最低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日本才同意签署恢复关系的声明。如果莫斯科不同意这个条件，谈判就会中断。这不是胡闹，这是日本国民的情绪。日本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们把苏共看作是他们的老大哥和师长的那个时期，也要求归还这些岛屿。

主管与兄弟党关系的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苏斯洛夫在北京会见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日共中央总书记野坂参三对苏斯洛夫说，这些岛屿当然属于日本。苏斯洛夫富有党性精神地开玩笑答道：当日本成了社会主义的日本后，岛屿问题就自行消失了……

莫斯科不同意交还 4 个岛屿，但答应交还两个。结果于 1956 年 10 月 19 日在莫斯科只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该声明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恢复了外交关系。声明中说："为迎合日本的愿望并考虑到日本国的利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交给日本，但这些岛屿的实际交付将在签订苏日和约之后进行。"

1956 年 10 月这个声明的签署首先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当时世界上人们对待日本的态度还不是很好的。没有苏联的同意，日本就进不了联合国。莫斯科只是在签署声明之后才给予这样的同意。此外，莫斯科于 1956 年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俘虏营度过了 11 年的全部日本战俘。1945 年，60 多万日本官兵被苏方俘获。从保存在以前被称为特别档案中的文件中可得出结论：在被苏方抓获的俘虏中死了 6 万多日本战俘，即每 10 个战俘中有 1 个死亡。

被俘的日本官兵不是战犯，所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协定签署后他们就应当被遣返回家。但是日本人没有得到释放。斯大林可能把俘虏的无偿劳动看作是战争中所受损失的补偿，并想从日本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他们劳动在西伯利亚的矿山和伐木场，建造房屋，修建铁路。他们生病，吃不饱，挨饿，死亡，但实际上没有企图逃跑……

1956 年的声明是正式条约签署之前的一份过渡性的、临时性的文件。当时以为，最终达成协议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幼稚的推测。谢皮洛夫哪里知道他不当部长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莫斯科没有履行其交出岛屿的诺言。声明签署后过了 4 年，1960 年 1 月 27 日，新任外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召

见日本大使，向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由于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条约，丧失了独立，所以向日本交出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已成为不可能。

日本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不能单方面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命令别国跟谁可以签订条约，而跟谁就不能签订。在日本，收回北方领土的运动具有全民族参与的性质。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却说，领土问题干脆就不存在。

战争和起义

在谢皮洛夫的部长任期内，正好遇上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近东爆发战争和匈牙利人民起义遭镇压。

匈牙利人于 1956 年 10 月底举行起义。游行示威者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歌》，要求推倒斯大林主义者政权。匈牙利党的惊惶失措的领导人急忙跑到苏联大使馆向尤里·安德罗波夫求援。此时，纳吉·伊姆雷总理还要求苏军从匈牙利领土上撤走，并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人们指责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挑起了匈牙利事件。但赫鲁晓夫在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交谈中解释了他为什么把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我们不能允许在匈牙利复辟资本主义，因为人们会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而这些谴责斯大林的人却什么都纵容，这种情况军队是忍受不了的。

在自己人之间的谈话中，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他的战友们也不打算说匈牙利事件是西方和西方代理人干的。他们非常明白：是人民起来反对他们，匈牙利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于是他们只能指望苏联军队了。赫鲁晓夫命令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制服匈牙利。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匈牙利人拿起了武器，狠狠地抗击了苏军。但起义遭到了镇压，纳吉被捕。

11 月底，谢皮洛夫到纽约出席了联合国大会。他觉察到，全世界因镇压匈牙利人和逮捕匈牙利政府首脑而愤慨。谢皮洛夫给莫斯科发了一份惊恐的电报："不排除联合国将提出纳吉问题。为了防止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苏，从纳吉那里得到一个关于他自愿出走罗马尼亚或诸如此类的声明是适宜的。"

中央主席团的答复是严厉的。答复显然赫鲁晓夫口授的："你们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幼稚的……如果西方国家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大，苏联代表团应当沉着、坚定，不要神经紧张……我们应当认定，西方国家为了利用联合国来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揭穿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图谋，坚决维护自己的立场，利用所有的可能以揭露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布达佩斯的流血给苏联造成了很大麻烦，但这时使莫斯科感到高兴的是，近东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转移了国际社会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力。

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说，那个秋天，氢弹试验成功之后科学家们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嘉奖。发奖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戈尔金。仪式开始之前，大家谈到了匈牙利人的起义和近东的战争。戈尔金随心所欲地对核物理学家们说：

"我看，我们当然要在匈牙利揍他们一下。也应当在近东好好揍一下，但太远了。真可惜啊！"

1956 年夏，谢皮洛夫飞赴开罗与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举行了会谈。回到莫斯科后，谢皮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纳赛尔想把由法英公司管理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事情果真发生了——埃及军队控制了运河。

这引起了巴黎和伦敦的愤怒，它们决定用武力恢复自己的权利。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向埃及军队发动了进攻。1956 年 11 月 5 日到 6 日的夜间，在苏联坦克开始击溃匈牙利人起义之后过了 24 小时，谢皮洛夫向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提出了停止侵略埃及的要求。

同时散发了苏联政府首脑尼古拉·布尔加宁的一封信："我们充满决心以武力击溃侵略者，恢复近东的和平……如果这场战争不被制止，它就可能带来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在致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信中说：他的行动"使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受到威胁。"

在致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中有同样吓人的措辞："如果大不列颠受到更强大国家的进攻，它将处于怎样的境地？要知道，这些国家比方说可以动用火箭武器。"

这是令人不安的暗示和肆无忌惮的逞强——这是赫鲁晓夫外交的突出特点。为了近东的新盟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似乎已作好准备，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威胁发挥了作用。西方退却了。

赫鲁晓夫觉得很得意。他得出结论，西方是虚弱的，可以成功地把它们吓唬住。这使赫鲁晓夫后来有了 1958 年柏林最后通牒的想法，并试图于 1962 年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当时世界确实处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嫉妒和怨恨

然而，究竟为什么取得了那么明显的外交成就之后，谢皮洛夫的部长前程就迅即结束了呢？

根据谢皮洛夫的孙子德米特里·科瑟列夫的意见，是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产生了嫉妒——一世界上人们都在谈论谢皮洛夫的外交政策，但是要知道外交政策只能是赫鲁晓夫的。

产生不满的第一个由头是谢皮洛夫在 1956 年 8 月下半月于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国际会议上所作的发言。苏联代表团由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率领。他委托两个班子为其起草发言稿——一个班子是外交部里的，另一个班子帮是从《真理报》来的。《真理报》的班子为他起草了一篇精彩的发言稿，但他还是把部里人写的那篇

作为基础。谢皮洛夫回忆起了在伦敦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到苏联大使馆找他的情况。这位以其顽固而著名的美国人说：

"我之所以来找您，是因为在您抵达伦敦后所发表的极其简短的声明中，我看到了一句产生希望的话，即我和您能够想办法找到共同点以便理智地解决苏伊士问题。要是与维辛斯基先生就很难做到的这一点，当然维辛斯基先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我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人听维辛斯基先生的精彩讲话能听到底的……"

谢皮洛夫接到了要他称西方的政策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敲诈"的指示。他未予理睬。回国后，他于9月5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报告了此次出差的情况。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的：

"我们已与美国人建立起了关系，无需争吵了。"

赫鲁晓夫大发雷霆：

"啊，是这样吗？你想自己制定政策吗？

在主席团的决议中写着："苏共中央对苏联代表团在伦敦会议上的行动方针和实际工作表示赞许"。但赫鲁晓夫说，部长没有执行中央的指令，也就是作为党员表现了没有修养，而这个过错具有原则意义。

表面上谢皮洛夫由外交部调到中央是提升了。1957年2月在中央全会上他再次当上了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实际上赫鲁晓夫对谢皮洛夫耿耿于怀，怨恨在心。他们之间开始冷淡。可是谢皮洛夫显然不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性格会发生如此快的变化，还继续与赫鲁晓夫进行争论。

当赫鲁晓夫想根本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要撤消部而建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时候，谢皮洛夫带了一个图式来找他。这个图式标明了高尔基汽车厂与向该厂供应备件和材料的其他企业的复杂联系。谢皮洛夫向第一书记解释说，如果根据新的图式进行，企业就不可能有效地运转。

赫鲁晓夫后来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嘿，你们可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得出了一张蜘蛛网，而谢皮洛夫就像一只苍蝇，飞到这张蛛

网上不能动弹了。我对他说，您的论断不正确。当我们改组工业管理时，就会产生有理智的合作，而所有愚蠢的、不需要的联系就都将失去意义。谢皮洛夫作为经济学家曾经是正确的，但这一点只有在他被逐出中央之后才会变得清楚。”

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恶化了。他们不再带着家人见面。赫鲁晓夫甚至没有邀请谢皮洛夫参加儿子的婚礼，尽管邀请了党的所有其他高级领导人。

伏罗希洛夫碰到谢皮洛夫时问：

“去参加婚礼吗?”

谢皮洛夫回答说：

“不，没有邀请我。”

“是吗?”伏罗希洛夫好像很高兴并骄傲地补充说：“我要去。”

“纨绔子弟和阿飞”

1957 年 10 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决定推翻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们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一系列指控。谢皮洛夫也突然开始批评起赫鲁晓夫来。这不是因为他支持莫洛托夫等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点，而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谢皮洛夫依然是赫鲁晓夫的人，但他真诚地说出了他所确信的事情。他缺乏机关圈子里的人员的小心谨慎的精神，缺乏那种保持沉默、观察风向、尔后勇敢地倒向胜利者一方的本领。

谢皮洛夫认为，应该保持 20 大的思想——任何一位党的领导人都不应当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他反对正在形成的对赫鲁晓夫的崇拜。这一点不光是谢皮洛夫说过，而且国防部长朱可夫也说过。朱可夫认为应当解除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天真的朱可夫就这个问题写了一张条子，并将此条子交给了政府首脑布尔加宁。这之后谢皮洛夫对朱可夫说：

“下一个就是你了。”

谢皮洛夫好像早已料到。人们开始收集朱可夫的材料，过了4个月元帅就被打发辞职了。

赫鲁晓夫压倒了自己的对手，接着在10月份的中央全会上人们组织了对这些人的审判。但是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是有事情可以指控的，如参与镇压，反对20大决议，搞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对谢皮洛夫是没有什么可指控的。谢皮洛夫亲自起草了几个揭露个人崇拜的报告。他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的关系不好。因此，对他的指责完全是一派胡言。

谢皮洛夫则认为整个这件事情是荒唐的。他在全会上力图说明，把中央主席团成员们称为阴谋家是荒唐的。

“我不能想象，部长会议主席会提出夺权的问题。请大家想一想。是夺谁的权？要不我们就该得出结论：我们的主席团里有人是有权的，有人是没有权的。在主席团会议上议论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安排书记处和主席团的工作；如何保证与部长会议的正确的相互关系；为了防止党所谴责的那些现象复发，领导人们应该用什么口气和按什么程序发表讲话……如果议论的是让许多主席团成员感到担忧的事情，那算是什么阴谋？我在主席团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有强的、宝贵的品质，我列举了这些品质。他也有弱的地方。有那样一些品质，在集体领导被削弱的条件下它们能够带来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这种讨论是正常的。这些是在主席团里谈的，而不是在地下谈的……”

会议厅里有人向他喊道，同志们看到卡冈诺维奇的汽车如何追上了他的汽车，他就改乘了卡冈诺维奇的汽车。这就是说，他们是商量好反对赫鲁晓夫的？

谢皮洛夫惊讶地答道：

“我们大家还经常见面、散步哩，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况且我与卡冈诺维奇是别墅区的邻居。”

这个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出来表现，他说：

“17号白天我因为公事给你办公室打了电话。你的助手说，你早就在克里姆林宫了。我问：在谁那里？在卡冈诺维奇同志那里。你在那里待了两个半小时。”

会议厅里发出了问话声：

“您是在卡冈诺维奇那里吗？”

“没有，”谢皮洛夫力图说明，“现在是一个时候的事实移到了另一个时候去了，把事情歪曲了。”

人们立即谴责谢皮洛夫，说是他撰写了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最后决议。中央俄罗斯联邦局农业处处长梅拉尔希科夫告发说：

“早上8点钟谢皮洛夫就把女速记员全部带走了，所以他不能在中央委员会上班。

谢皮洛夫反驳说：

“这是荒谬的想象。我受主席团的委托应在社会科学教研室领导人会议上讲话。”

会议厅里有人大声地说：

“撒谎!”

谢皮洛夫继续说：

“我是应该在会议上讲话……哪个女速记员我也没有叫，她们明明都在中央委员会上班嘛，这在几分钟内就可查清楚的。我在别墅里工作，是用电话向女速记员口述了我在会上要讲的有关理论问题的一小段文字。这段文字还在，因为所有向我们的女速记员口述的东西都是有打印稿的。”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非常强烈地反对谢皮洛夫。这次全会后，谢列平的官位扶摇直上。对他而言，谢皮洛夫是个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者：

“在最近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谢皮洛夫发表了一篇伪装起来的、令人憎恶的讲话。他说，断言苏联农业似乎已高度机械化的说法是不对的。而且他是带着挖苦的口气说这话的。或者拿他在

‘镰刀与锤子’厂的讲话来看。他说，我们在国外的军人举动没有分寸、不能容忍，他们在那里到不该钓鱼的地方去钓鱼。难道这是反映我们光荣军队的特征吗？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声称，我们的中小学应当首先培养学生到高等学校去学习。难道这是我们党的方针？不是。我们的中小学应当首先培养孩子们到生活中去，准备到工厂、集体农庄去工作……”

谢列平指责谢皮洛夫在意识形态上搞异端邪说：

“您是掌管文学艺术问题的。请您说说，为什么当有些作家，例如杜金采夫等人，开始散布各种胡说八道的言论，发表反党作品的时候，您一直到赫鲁晓夫同志进行过问，作出表态之前始终保持沉默？您坐着不动，一言不发。显然，对这类作家您是感到满意的。按照您的旨意，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留里科夫给我打电话，传达了您的指示，要‘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杜金采夫的一本极其有害的反苏书籍。幸亏我没有执行这个指示……”

有一个搞意识形态的官员告发谢皮洛夫说：

“谢皮洛夫反映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的庸俗情绪。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了对党的领导的不满……从此他开始堕落了。谢皮洛夫取悦讨好创作知识分子。如果仔细看一下他在作曲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可看出，他对党在艺术方面的领导作用是说得十分苍白无力的。”

《文学报》主编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科切托夫得到了发言机会，他对谢皮洛夫大发牢骚：

“我想说，作家组织知道，文学战线上有的事情受到阻碍，这些行动来自谢皮洛夫那里。他故意做不地道的事，他在这方面纵容了文学战线。”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古拉·伊里奇·别利亚耶夫在全会上大声喊叫：

“谢皮洛夫，您究竟是个什么人？”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沉着镇静地回答说：

“我的父亲是一名工人。我大学毕业后去了雅库特，后来在西部地区工作。各地纷纷成立政治部的时候，我去西伯利亚到一个政治部工作。卫国战争开始后，我交了申请书，要到前线去。3 天后我自愿去了前线，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7 月，我随一个师沿莫扎伊斯克公路徒步去了前线。我于 1941 年 7 月初出发，1946 年 5 月回到莫斯科。”

大厅里发出喊声：

“指的不是这个！”

谢皮洛夫继续说：

“在讨论思想问题时不能把争论转为对人格的侮辱。你们问我是什么人，我的回答是：我的全部情况都摆在这里了。我个人不仅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还透支了 200 年的所得：给了我那么多头衔、勋章。”

后来的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怒气冲冲地说：

“这是那样一个蹩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一个官老爷、追名逐利之徒；他腐蚀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蒙蔽我们的干部，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要两面派手腕。”

大厅里发出喊声：

“纨绔子弟。”

波利扬斯基表示赞成：

“是的，说得对。他的表现就像纨绔子弟和阿飞。他每次都穿着一身新的、烫得笔挺的套装来开会。而我这样认为，不是别人，而正是谢皮洛夫是可以穿着旧的，甚至皱巴巴的套装来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

赫鲁晓夫忍不住了，大声喊起来：

“你们看，谢皮洛夫一直坐着，而且还在笑。”

对赫鲁晓夫来说，莫洛托夫等人完全是自己的政敌。他把谢皮洛夫的讲话看作是对他个人发泄怨气。他认为谢皮洛夫竟敢批评

他，这是忘恩负义，以怨报德。谢皮洛夫的孙子德米特里·科瑟列夫认为，还有另外某种东西在赫鲁晓夫身上起了作用。

“这里还有一些个人的原因。赫鲁晓夫妒忌爷爷。爷爷年轻、卷发、漂亮。而这里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对有文化和有学问的人的敌视心理。”

赫鲁晓夫津津乐道地算起谢皮洛夫的旧账：

“如果您是那种反个人崇拜的斗士，那你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后，作为《真理报》的编辑，要伪造照片，无中生有地在报上刊登了一幅马林科夫挨着毛泽东的照片?”

谢皮洛夫回答说：

“确实有过这件事，我还因此受了处分。我当时认为主要问题是我们与中国的友谊，两国政府首脑的亲近是这一永恒友谊的象征。我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这样做的，这是我的错误。”

赫鲁晓夫提醒大厅里的在座者：

“为这件事中央主席团给了你警告处分。”

谢皮洛夫反驳说：

“这跟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谢皮洛夫在发言中提到了赫鲁晓夫本人讲过的有关党内的一些同志的话，赫鲁晓夫对此大为生气：

“一个正派的人，怎么可以当着我和他谈论过的某个人的面，重复相互信任地交谈的话呢?谢皮洛夫说了我没有说过的关于伏罗希洛夫的话，这是多么卑鄙和庸俗！他看书，却一点也看不懂，简单的东西也不懂，还想教训别人。”

什么骂人的话都用到了谢皮洛夫身上：好播弄是非的人、政治娼妓、恶毒的挑拨者、伪君子、冒险家、靠钻营飞黄腾达的人、下流的人、几乎就是刑事犯……

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摆出一付傲慢的样子说：

“谢皮洛夫表现出自己是政治上出卖灵魂的人。”

大厅里有人补充说：

“卑鄙下流的东西。”

卡皮托诺夫补充说：

“谢皮洛夫需要经历基层工作的磨炼，需要在工人的环境中接受熏陶，到那个时候才能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谢皮洛夫原来是个十分倔强的人，尽管他更像教授而不像中央书记。在中央全会上只有两个人不表示悔过——固执的莫洛托夫和有原则性的谢皮洛夫。

后来由于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要解除谢皮洛夫的职务，在中央有人想出了这一著名的提法：“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附和他们的谢皮洛夫”，虽然事实上他与这个集团没有任何关系。

对 1957 年事件作过非常详细研究的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教授曾对我说：

“他被称为是‘附和’别人的人，我倒要说：他是‘没有附和任何人的谢皮洛夫’。”

解职，开除，撵走

1957 年 6 月 29 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维·米·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定中说：“中央全会上揭露出来的事实表明，马林科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附和他们的谢皮洛夫同志已走上了派别斗争的道路，违反了党章和列宁制定的第 10 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定撤消德·特·谢皮洛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并将他从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中除名。”

在致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中，谈到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的地方却不多：“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德·特·谢皮洛夫同志

加入了反党集团，他在这个集团的派别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卑劣的角色。他发表了一系列挑拨性的、诽谤性的言论，目的是要离间中央主席团成员之间的关系。”

谢皮洛夫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他从中央全会出来成了一个失业者。对这样一个结局谢皮洛夫是否感到遗憾呢？吉洪·赫连尼科夫告诉我：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后来说，总的说他并不打算这样尖锐地反对赫鲁晓夫。但显然他对此感到痛苦。他是尊敬赫鲁晓夫的。同时他认为可以也有必要批评一位党内的同志。但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结果。”

知识界对他的离去感到伤心。伊利亚·爱伦堡遗憾地指出："他已经开始明白某些事情。”例如，他已准许成立电影工作者协会。谢皮洛夫批准于1957年成立这个协会。

他有尊严地经受住了失宠被黜。他的孙子德米特里·科瑟列夫说：

“爷爷始终清楚，他早晚会被人从政局中抛弃，并且为此作好了准备。”

全会后，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立即被送到了博特金医院的7号楼——他的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他躺在单间病房里，为国家发生的粉碎反党集团这件事感到压抑。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充斥了所有报纸。他难以入睡，他感到悲伤。

人们关注着谢皮洛夫。他劝朋友们哪怕暂时把他忘掉：

“你们何必为我而遭受不愉快呢？”

赫鲁晓夫叫人把谢皮洛夫赶出了莫斯科。有人为他在伏龙芝市找到了工作。1957年11月2日，苏联科学院一名副院长签署了一道命令：“依照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的请求，委派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德·特·谢皮洛夫前去伏龙芝，由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主席团安排作为经济研究所所长加以使用。去伏龙芝市的机票费准予从协调委员会的预算中支付。”

谢皮洛夫被派到吉尔吉斯当经济研究所所长了，但赫鲁晓夫还是感到不放心。命令把谢皮洛夫从所长降为副所长。

据说，在吉尔吉斯他常常去火车站，闷闷不乐地目送着离去的列车。他在莫斯科之外经受煎熬。他病了。1959 年他来到莫斯科。他的一位朋友、著名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维什涅夫斯基为他切除了胆囊。他被定为二类残废。他好不容易为自己买到了一张去热列兹诺沃茨克的疗养证。他在那里的时候，收到了一张要他迁出他在莫斯科的住房的通知书，借口是他在伏龙芝有一套住房，而苏联人是不能有两套住房的。事实上他离开伏龙芝时已把那里的住房交出去了。所以这只不过是找个让他不愉快、把他撵出莫斯科的口实罢了。这是对他坚持己见、不人云亦云的惩罚。

他从基斯洛沃茨克用城市间政府高频通讯专线电话给与赫鲁晓夫关系很密切的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打了个电话，请求帮助。米高扬马上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没有给我打电话说过这件事，但你最好跑一趟莫斯科。"

允许谢皮洛夫使用高频通讯专线电话的一位官员立即受到免职处分。谢皮洛夫到了莫斯科，看到人们正在把他的物品从他的住房中搬出来。这项行动是由民警实施的。他坐在楼梯间里，用绳子捆扎书籍。他同妻子有 8 个月时间借住在熟人家里。

后来，谢皮洛夫的妻子玛丽亚娜·米哈伊洛夫娜守候着见到了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同她谈了谈。尼娜·彼得罗夫娜想起了昔日的友谊，在丈夫面前说了情。赫鲁晓夫发了慈悲。谢皮洛夫在库图佐夫大街得到了一套 2 居室住房。党中央的官员们都以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说起自己不久前的这位上司：

"我们给了他一个小套间，他倒还好意思问，哪里放他的书籍和文稿。我们就向他说明：我们给您的住房不是用来放书籍和文稿的，而是给你住的。"

有了莫斯科的户口后，他写了一封请求安排工作的信，因为光

靠退休金是生活不了的。

他被召到党中央机关去，人们问他：

“您想做什么工作？”

谢皮洛夫回答说：

“我是从科学院上的前线，我是一名科学工作者，想回到科学院去。也许我已挣不到做任何组织工作的权利，但我能当一名科研人员。”

1960 年 9 月，他被调到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当了一名做研究工作的档案员。为他找不到别的工作。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不要对他表现出兴趣，无事不要到他那里去：总之不要与他来往。

第 21 次党代表大会后，1962 年 2 月，他“因积极从事反党派别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苏共。科学院奉命取消了他这个“反对人民利益的”通讯院士的称号——从未有过的事情！。

他做的工作是为各主管部门的档案机关准备出版的文件汇编写评论。但他写的评论都由档案局局长署名，因为谢皮洛夫的工作是匿名的。

他不时地要求得到平反。1970 年，国防部长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接见了他，对他表示了关心。过了一些时候，谢皮洛夫以将军的身份领取了军人退休金并有权享受部队医疗待遇。他作为退伍将军可以在军队医院就医和在莫斯科郊区的“阿尔汗格尔斯克”疗养院疗养。

1973 年，他得到了一套新的住房。1976 年 2 月 18 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党龄。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亲自跟他谈话，说公正胜利了。在监察委员会的谈话，使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感到有了希望。他希望自己从此就能找到一个比较喜欢的工作。但一切途径对他都已切断。为他做的惟一一件事是提升了他的职务，把他转成了高级档案员。

1982 年 11 月，他退休了，时年 77 岁。但他完全不是一个孱

弱的老人。他经常衣着整齐，虽然完全失去了对物质财富的奢望，已一无所有，但也从来没有因此而愁眉苦脸。他的一个特点是喜欢写信——对 20 世纪的人来说这是罕见的品质。

尽管他经历了种种不幸，但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的一些朋友仍然是他的朋友。在音乐家当中他绝对不是因为位高权重而享有无可争议的威望的。

吉洪·赫连尼科夫回忆说：

“肖斯塔科维奇邀请他出席了历次音乐会，即使当谢皮洛夫不在政和无职无权时，也经常征询他的意见。”

有一次，吉洪·赫连尼科夫给他搞到了一张在大剧院举行首场演出的票，旁边是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的座位。她愤怒地说：

“谁胆敢把票卖给了谢皮洛夫？而且竟然是和我挨着的座位？”

搞艺术的人感到他亲切热情、平易近人。甚至伊万·科兹洛夫斯基[①]也曾亲自与他唱过二重唱。

谢皮洛夫曾经写道：“在我有理智的一生中，只要进入神话般的音乐世界，我就感受到难以名状的心旷神怡、无上幸福。即使在保卫莫斯科的大会战中，即使在斯大林格勒的冰冷的掩体里，在夜深人静时，在一场战斗之后，我都要努力调拨无线电波以寻找能启发智慧和陶冶心情的音乐来听。”

谢皮洛夫身材高大，英俊漂亮，招人喜欢。许多女人一生钟情于他。她们爱听他的柔和悦耳的嗓音。

在他晚年，照顾他的是塔马拉·彼得罗夫娜·托尔恰诺娃。她可能是全国惟一一个在 1957 年党的会议上投票不赞成谴责反党集团的人，因为她喜爱和尊敬谢皮洛夫。

“你们知道，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身上有什么东西使我感

---

① 科茨洛夫斯基（1900— ）苏联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苏联声学学派杰出代表。1926—1954 年在苏联大剧院工作。——译注

到震撼?”塔马拉·托尔恰诺娃说，“我从未听到过他像老头子那样唠叨，对什么表示抱怨。”

他最后一次住进了索科尔尼基军医院。显然，当他开始得肺炎的时候，医生们错过了机会，肺炎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期盼写完他的回忆录，曾请求医生：

“再让我活一年吧!”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于1995年8月18日去世，距他90岁生日只差两个月。他并不想念被毁灭了的功名利禄和丧失了的机会。他感到不幸的是，他受到了诽谤，指责他干了他并没有干的事情。“附和”一词使他终身感到委屈。

他在医院里感到自己的病情十分严重后对塔马拉·托尔恰诺娃说：

“我就要死了。在我身后除了“还有附和他们的谢皮洛夫”这句话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可我从来也没有附和过任何人，我有自己的头脑……”

第八章

葛罗米柯:“不先生”的谦虚魅力

想当外交部长的年轻人应该勇敢地以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为榜样。一位来自白俄罗斯的研究生来到莫斯科，被安排从事外交工作，并马上就被派往美国工作。他很快成了大使，副部长，第一副部长，部长。真是个幸运儿！

但这是他生活的一个侧面。还有另一个侧面，所有想当外交部长的人都应预先了解的另一面。

这里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插曲。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政府首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汇报自己的想法。他戴上眼镜，开始读外交部准备的呈文。赫鲁晓夫不耐烦地打断了部长：

“等一等，现在你听我说。如果我说的同你写的相吻合，那就好，如果不一致就把稿子扔进废纸篓里去。

葛罗米柯把自己与全体工作人员一同用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全部稿子都扔进了废纸篓里，并恭顺地听那个根本不把自己的外交部长放在眼里的第一书记说话。葛罗米柯没提出辞职，甚至都没抱屈，认为应当如此，因为他明白：如果你想升迁，就别得罪上司。

有一次，从国外出差返回时，部长产生了怀旧之情，给自己的下属讲述了他从 13 岁起就开始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去伐木的事情。有时他沿河放木排。在光滑的原木上保持平衡的同时，需要排除阻塞。一步没迈准 — 就掉到了河里。而原木就像是设法想要把送木材的工人压在自己下面一样。部长最后说道，这对外交官是极好的

锻炼。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担任了28年外交部长，创造了苏联时期的绝对最高记录。不过，俄罗斯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如果俄罗斯的沙皇喜欢某位外交部长，那么这位部长就可以直到垂暮老年都担任这一职务。在19世纪，至今仍受爱戴的公爵戈尔恰科夫当了26年的外交大臣。而人们不太喜欢的卡尔·涅谢尔罗德[①]伯爵——当了40年。

本可以成为一名飞行员

1909年7月18日，未来的部长在距离戈梅利不远的老葛罗米柯村降生。这个村子里有一百多户人家，几乎所有的住户都姓葛罗米柯。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早他一年半出生的姐姐塔季扬娜，可她夭折了。两个弟弟——阿列克谢和费奥多尔——在前线牺牲了。第三个弟弟，德米特里，也打过仗，但活了下来。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躲过了灾难，他是在遥远的美国度过战争的。

葛罗米柯一直想学习并喜欢学习。他念完七年制中学，然后，在戈梅利念完职业技校，在鲍里索夫念完中等技术学校，最后又考入明斯克的经济学院。1931年他入了党，立刻被选为中等技术学

① 涅谢尔罗德，卡尔·瓦西里耶维奇（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1816—185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奉行亲奥地利、普鲁士政策，他认为镇压西方的革命运动是主要任务，因而积极支持欧洲的反动势力。尼古拉一世上台后，他开始违心地执行新沙皇同英法接近的路线。俄法关系恶化之后极力恢复神圣同盟。涅谢尔罗德将英俄之间的矛盾估计过分，没有认清英法两国推动俄国同土耳其交战的政策，结果使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处于孤立。1856年巴黎和约签订后，涅谢尔罗德被免职。——译注

校的党支部书记。同年，他结了婚，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是他生活中的忠实伴侣，比他小两岁。她生在卡缅卡村，也是白俄罗斯的一个村子。

在学院学习两年后，葛罗米柯被任命为明斯克郊外一所中学的校长：他不得不用晚上时间来完成学业。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国营农场从事畜牧工作。但这段时间不长。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从7个人中要挑选第一批研究生，他们应成为教社会科学的教师。葛罗米柯这个年轻、好思考、办事认真的专业工作者被列入了名单。他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后，要给学经济的大学生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营农业的优越性。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对提议他去念研究生不是很高兴：他不想再靠奖学金生活，他毕竟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但天生的对教育的向往占了上风。这个走读生通过了学院的毕业考试，成功地通过了面试，被录取为研究生。研究生要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决定了葛罗米柯命运的英语。

1934年，研究生们被从明斯克调到了莫斯科的全苏农业经济研究所。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一边学习，一边到莫斯科郊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去讲课，讲述剥夺富农的好处和农业集体化的成就。这一工作不太吸引葛罗米柯。人们都记得他是一个干巴巴的、缺少热情、很保守的人。但在青年时代，他是一个并不缺少浪漫情调的人。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并决定考飞行学校，但他已经晚了，那里只招收不满25周岁的人。而他到莫斯科时正好已满25周岁。

后来，葛罗米柯说，飞行员和外交官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比如，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不惊慌失措。他很好地掌握了这门本领。他的冷静只能令人羡慕。

葛罗米柯在研究生班学了四年，完成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方面的副博士论文，1936年答辩通过后，他被聘到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高级研究员。同时，葛罗米柯还要在莫斯科市政建筑工程学

院教政治经济学。1938 年，他在《经济问题》上发表文章，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90 周年，第二年，杂志发表了他写的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文章。

在大清洗时期，升迁是很快的。1938 年，葛罗米柯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研究所学术秘书的职务。有人曾想派他担任科学院远东分院的学术秘书。但是，葛罗米柯明智地拒绝了，他并没有失算。1939 年初他被召前去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选拔干部的。那时外交人民委员部有很多空职位。原来的工作人员要么被关起来，要么被免职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是那个委员会的成员。葛罗米柯——是党内人，从外省来，可以说，从农村来，——而他又会英语，这使他们看上了他。通晓外语的人是很少见的。葛罗米柯被录用了。葛罗米柯还不想去，他不想走外交之路。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里他被聘用为责任调研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参赞一级。但几天之后就让他去主管美国司。这一重要任命一点也没让他感到不安。美国司不像现在这样是主要的司。欧洲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葛罗米柯是特别走运。大清洗为他扫清了起跑的场地。

“不适合外交工作”

几个月后，他被叫去见斯大林，这是极为罕见的事。就是全权代表（当时称驻外大使为全权代表－译注）中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幸见过总书记。在领袖的办公室里有莫洛托夫。其实，这次相见也是他安排的，——他向斯大林介绍了自己喜欢的新兵。

“葛罗米柯同志，派你去我们的驻美代表处当参赞，”斯大林说，“你的英语如何？”

“我正在攻它，会逐渐掌握的，”未来的部长报告说，“尽管学

习的过程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在缺少必要的口语实践时。”

领袖给他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

“你到美国后，你为什么不抽出些时间到美国的教会、大礼拜堂去听听教会牧师的布道呢？要知道，他们英语说得很标准，发音吐字很清晰。要知道，俄国的革命者在国外都没有白呆，他们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完善外语知识的。”

在 1939 年 10 月，葛罗米柯到了华盛顿。在华盛顿他不仅用心学习英语，而且还研究美国的历史、经济和政治。葛罗米柯没有白白地浪费时间，也没有使自己沉湎于国外的生活。这有助于他成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家，获得更好的晋升。当然了，也应当承认他特别走运。

应当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他去接替当时的全权代表康斯坦丁·乌曼斯基，是因为他们已经对乌曼斯基有些失望了。但是，战争爆发了，与华盛顿的关系突然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李维诺夫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根据 1941 年 5 月 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特命全权大使取代了全权代表）。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即李维诺夫——译注）不喜欢年轻的葛罗米柯。

后来也成了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曾笑着说：

“每位大使都要给自己的下属写鉴定。一些老外交家们断言，李维诺夫定会写下这样的评语：葛罗米柯不适合外交工作。”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对自己的下属估计得太低了。1943 年他本人被召回，葛罗米柯接替了他的位子。任命没有政治威信的年轻的外交官作大使，是斯大林因盟军长时间不开辟第二战场而对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个小小的报复。

后来莫洛托夫多次讲道：

“我任命葛罗米柯——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年轻而又没有经验、但很诚实的外交官。我们知道，这个人不会令人难堪……”

新的驻美大使当时只有 34 岁。这是一位在边远省份成长起来

的人，是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员，也就是说是一位职业的教条主义者和读过许多经典著作的人。这些教条中的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印在了他的心中，有些东西他已能克服。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去美国时毕竟比较年轻，他一直在努力自学。李维诺夫由于自己的性格和阅历和他对生活的看法，在自己的见解和行动中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葛罗米柯属于被称为“1937 的入伍者”的那一批人之列，他知道，对长官圣明的丝毫怀疑都等于死亡。李维诺夫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西方的政治家都非常了解，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本人就是欧洲人。葛罗米柯是在大镇压的年代上的大学，受的是仇视西方的教育。

葛罗米柯从当时的华盛顿发来的信函证明了分析的欠缺、对美国政策的看法过于简单、不能理解美国人的意图和目标。作为小地方的经济学家的葛罗米柯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付另一种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东西他会理解，但是，西方民主的某些原则对他来说永远都是个谜。

在战争结束前夕，国际生活的中心就开始向美国转移，葛罗米柯也就变成了大外交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在 1944 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率领苏联代表团前往敦巴顿橡树园参加联合国的创建工作。1945 年 6 月，在旧金山的国际会议上他代表苏联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这一象征性的行动永远地巩固了他在外交史上的地位。在临终前，葛罗米柯仔细地回顾了联合国的事务，认为联合国它是他自己的产儿。

1946 年 4 月，葛罗米柯被任命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并给了他一个外交部副部长的官衔。与西方大国合作的时代逐渐结束，“冷战”爆发了。历史学家作过统计，在 1940 年底，葛罗米柯使用了 20 多次赋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此人们开始称他为“不先生”。

葛罗米柯迅速而熟练地执行着莫斯科的指示，从不知到疲倦，就连莫洛托夫也对他喜欢不已。在苏联的所有外交官中，他特别看

中的正是葛罗米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在性格上很像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也有他那样的经历，掌握了莫洛托夫式的外交风格——干巴巴、生硬、固执。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缺少的只是莫洛托夫的坚定性，缺少在与外国外交官的争论中，而且也在与自己党内同志的争论中坚持自己观点的决心，而同党内同志争论是比较危险的。部长的支持巩固了葛罗米柯的地位。

保存着 1946 年 3 月 26 日葛罗米柯写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维辛斯基的一封信。维辛斯基以自己特有的老爷作风指责葛罗米柯从使馆发回的情报经常中断。大使的答复是，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无法进行有效联系。他还补充写道：“您没有问清是怎么一回事，就建议我‘尽快地扭转过来’，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扭转得已经相当快了。”

葛罗米柯在大洋彼岸工作了 9 年。在 1948 年莫洛托夫把他叫回国，并很快就又任命他担任了第一副部长之一的职务。莫洛托夫公开袒护葛罗米柯。而维辛斯基同样公开地表示不喜欢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而且比他年轻了 25 岁的对手。过了一年，莫洛托夫被拿开了，而维辛斯基被任命为部长。

失去靠山

这对葛罗米柯来讲是一些最不好的年份。他长时间不在莫斯科，没有积累起对付复杂的官僚倾轧、告密和暗算的经验。而维辛斯基在这方面却如鱼得水。当然，斯大林是知道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没有领袖的批准也就不能对他怎么样。但是，部长在背地里行动。他说葛罗米柯的坏话，想方设法抓他的什么把柄，向政治局的成员抱怨自己的副手政治上不够成熟，指责葛罗米柯，认为没能与中国人成功地签订经济协定全是他的过错。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葛罗米柯按职务被选为中央候补

委员，但在1952年6月却派他出任驻英大使。这显然是降职。葛罗米柯到达伦敦后，国家安全部驻外情报机关的头目通过自己的渠道弄清楚大使不受赏识，便向莫斯科发去了对他的告密信。葛罗米柯不得不写信给斯大林进行解释。这一切有可能成为他外交生涯的终结。

同维辛斯基的斗争，总体来讲这个阴暗的时期，是在葛罗米柯的行为中留下了它们的烙印的。他永远记住了这样一点：对内外交，即同高官的关系，比对外外交更重要。在同年轻的外交官聊天时，他把这称为“官员的第一条戒律”。葛罗米柯认为维辛斯基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家，在回忆这段时间时他说：

“他毁了很多人。”

但马上又同情地补充说：

“但他的生活也毁了。”

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又回到了外交部。他立即把葛罗米柯从伦敦召回。1953年4月他重新担任原来的第一副部长职务。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明白，自己的晋升完全归功于莫洛托夫。但是感激之情丝毫没有妨碍他参与赫鲁晓夫发动的败坏莫洛托夫名誉的运动。在1955年的外交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自己的上司，谈了革新外交政策的必要性。莫洛托夫就坐在主席台，和大家一起为发言者鼓掌，他一点儿都没有怪罪自己提拔上来的这个人，因为在他自己的漫长的一生中他也常常这样做。

当莫洛托夫在1957年中央全会上遭到猛烈抨击的时候，他的红人葛罗米柯也匆忙地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落井下石。在这次著名的全会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甚至还想开开玩笑，虽然他从来是没有这种习惯的。他不遗余力地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进行揭露：

“这些人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在桌子底下爬的半大孩子。的确，我们中的很多人要比反党集团的某些参与者要年轻。但是，你们也

会同意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有人犯了错，那主要是我们父母的错……同志们，连资产阶级都不会这么奢侈，以至于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担任国家领导的任何价值时还占着位子。比如，丘吉尔。他为不列颠殖民帝国干得不错，但是，当他失去了价值之后，他就被打发去画风景了。我认为，这三个人，如果可能的话，连同与这三个人结盟的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也应当被打发去画风景。”

大厅里响起了欢笑声。

葛罗米柯说，正是赫鲁晓夫在领导外交政策，各种创意都来自他，他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所作的“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量工作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谈这一点并不觉得不好意思，尽管我现在是在主持我们外交部门的工作。如果我不想或不愿意谈这一点，那就是错误地理解了外交部的威望。”

最后，葛罗米柯再一次地嘲笑了自己的教父：

“如果莫洛托夫在头脑中想象一下，他从台上走到大厅中央看一看他自己在这个讲台上讲话的样子，那就好了。他就会看到这是一幅多么可悲的画面。我不想谈莫洛托夫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胡说八道，试图往第一书记头上泼脏水。但是莫洛托夫没有发现，也许现在才发现，他泼的脏水倒是把他自己从头到脚都弄脏了。”

在1956年6月莫洛托夫被第二次清除出外交部时，葛罗米柯估计这次他肯定会当上外交部长。但是，赫鲁晓夫把自己喜欢的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派到了斯摩棱斯克广场。对葛罗米柯来说这是一个打击。他的儿子阿纳托利·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对我说，父亲是个异常稳重的人，在那天他却动了感情——拿起了耙子到伏努科沃别墅去打扫院子……

开朗活泼的谢皮洛夫不喜欢有点儿枯燥的第一副部长。在他的秘书处中有人估计马上就会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赶走。听说葛

罗米柯已经在科学院为自己选好了位子。在伦敦当大使时，他就写了《美国的资本输出：作为经济和政治扩张的资本输出史》。他的书是用安德烈耶夫的笔名出版的。1956 年，莫斯科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授予他经济学博士学位。因此，可以说他已经摆好了准备转向学术工作的架势。但事情顺利地过去了。

“我们要埋葬你们”

众所周知，老爷式的宠爱不会长久。后来，把谢皮洛夫调回了中央。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出现了任命谁当部长的争论。供讨论的候选人有两个——葛罗米柯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在斯大林去世后重新审查干部时被免去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位。

并不是对库兹涅佐夫个人有什么意见——只是急需把库兹涅佐夫担任的崇高的苏联工会领导职位空出来。把在斯大林时代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调去接任他的职务。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头头（无权但显赫的职位）则由伏罗希洛夫担任——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新的国家集体领导层需要元帅这样一个真正传奇式的人物来体现团结一致。

在 3 月 5 日晚上，在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分权和分位子的中央全会上，决定任命库兹涅佐夫为外交部副部长并任命他为驻中国大使和中央的代表。但是，派他去北京的想法很快就被否决了，他仍留在外交部。从 1955 年起他也像葛罗米柯一样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库兹涅佐夫是中央主席团成员比较喜欢的人物。作为冶金工程师，他在工业上一直在按部就班地晋升，在战争前夜他是国家计委副主席，后来到了工会。但在赫鲁晓夫的眼中库兹涅佐夫的经验和威信多半成了缺点：赫鲁晓夫需要的是绝对服从他的指示的、内行的、没有政治威信的国际问题专家。

有人讲，好像有人劝阻过赫鲁晓夫让葛罗米柯当部长，对他做了不大好的评价：说他无首创精神、有点儿笨。但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打算自己抓外交，对反对意见没有理睬：

“政策是中央定的。你就是把一个集体农庄主席放到这一位子上，他也会推行这样的路线。”

1957年2月，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被任命为部长。平和而不动声色的库兹涅佐夫在他那里当了20年的第一副部长，直到1977年秋天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被提升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为止。勃列日涅夫任主席，因而库兹涅佐夫承担机关的各项工作。

原苏共中央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成了外交部中的第二位第一副部长。他与葛罗米柯不和，幸运的是，过了一年，1958年8月他就被任命为外贸部部长。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确很愿意搞国际事务。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私人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回忆说，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突然开始去各使馆参加几乎所有的招待会——甚至是外交部长平常都不去的最普通的招待会。还在前不久，外国人还是很难接近苏联的领袖的，突然，外国的外交官获得了直接与所有的克里姆林宫天堂里的人们进行对话的机会。中央主席团——所有的人，个头都不高，除了米高扬外，所有的人都很胖，都穿相同的衣服，他们出现在外交官中间，并不反对喝上一两杯酒。

与国际上的做法不同，赫鲁晓夫在鸡尾酒会上总是要祝酒。在一次这样的招待会上，在就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非常激动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突然以尖刻的句子总结自己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们埋葬你们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来了！”

这句话传遍了全世界。人们把这句话看成是对峙的呼声。苏霍德列夫认为，赫鲁晓夫指的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历史性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对于全世界来讲，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感到可怕，

是这句话由于苏联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而加强了。

赫鲁晓夫强调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私人接触。他常常说：

“最好是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就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如果他们都不能达成协议，那么怎么可能期望级别不太高的人来解决问题呢?”

他认为外交部长简直就是个官僚，看不到外交部长应该独立发挥的作用。葛罗米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比如说，1961 年修建柏林墙的所有准备工作都绕过了他，而分割柏林对欧洲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赫鲁晓夫曾经通过驻柏林的苏联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向民主德国首脑乌布利希发出过呼吁。大使也从柏林给赫鲁晓夫本人写过信，由于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大喜欢部长，对是否给葛罗米柯寄一份复印件问题，他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是寄了，为了不完全搞坏与葛罗米柯的关系。

赫鲁晓夫有庞大的助手班子。葛罗米柯被降到了只发挥专家的作用——当需要什么说法、建议和资料时，把他叫来。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身边的人起到了首要作用。留给葛罗米柯的都是专业人士不太感兴趣、因循守旧的工作。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外交官与其说是在协商，不如说是在相互威吓的时代。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刚刚当上部长，就责成他向决定要加入北约的挪威首相埃纳尔·基哈德森发出呼吁。这不是外交文件，而是真正的威胁：“如果北约战略家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挪威人民势必要为在挪威建立的基地付出昂贵的代价……作为对针对苏联的侵略行动的回答，我们也将采取最有力的措施以对侵略者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包括对设在我们国境附近的基地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莫斯科每周都有外国客人来。赫鲁晓夫本人经常出国，而且时间很长。赫鲁晓夫经常派人到国外去执行一些重大的外交任务，有时派由他自己从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新提拔到莫斯科的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有时派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有时派他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赫鲁晓夫认为，并非神仙才能烧瓦罐，任何人都能胜任外交使命。他没有考虑到，有心计的、有经验的苏联官僚去到西方，是要同一些并不逊色的对手打交道的，他们也是蛊惑宣传的老手，只是他们在行动中更为自由。

普鲁士传统

1958 年 4 月，苏联政府第一副首脑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出访西德。他按莫斯科的指示开始采用进攻姿态与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进行谈判——他提示说，十月革命后德意志帝国占去了俄国很大一部分，并将苏维埃政府置于困境。

阿登纳很轻易地就驳回了他的话：

“请您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了列宁及其追随者夺取了政权，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数目不小的一笔钱——两千万金马克！”

总理还不失时机地提到了德国国防军和红军的秘密的军事接触，提到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对波兰的卑鄙的瓜分。

会谈之后，总理安排了早餐以示对苏联代表团的尊重。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向首相汇报说，在前一天的晚宴上米高扬发表了全面攻击联邦共和国的讲话。

总理对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说：

“听我说，米高扬先生，我听到了您昨天的讲话。您在我这里不应该这样做。换句话说，您让我不得不客气地对您进行答复，我本想避开这一点。”

米高扬回答说，他认为自己即将作的发言是很友好的。

“亲爱的米高扬先生，”——机灵的总理问，“您看，我要作个

什么样的发言呢？”

似乎是为了表示特殊的信任，阿登纳向他读了自己发言稿中的一段。然后也让米高扬拿出他的讲话稿看看，以确信发言是否真的是友好的。犹豫了一会儿，米高扬把手伸进兜里，拽出了原文。阿登纳仔细地听完翻译，要求删去一些尖刻的词句。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没什么话说了，只有同意的份儿。之后，他们下了楼，其他的客人已经聚在楼下的宴会厅里了。阿登纳知道，苏联的客人青年时代毕业于梯弗里斯的宗教学校，甚至还在艾奇米亚金的神学院学过一年，差点儿没成为一名牧师。总理问米高扬，为什么他放弃了这一受人尊敬的职业。米高扬讲，在授教职前不久，他突然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他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在这个内心慌乱的时期，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落入他的手里。对他来讲，该书是神的启示。

阿登纳惊奇地看了看米高扬：

“有一次我也翻阅了一下《资本论》，但我根本没弄懂它。”

“我也是读第二次的时候才懂，”——米高扬承认道。

不知道阿登纳是否相信，同他交谈的人真的已经掌握了这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根据米高扬整个成年时代做的和说的可以断言，马克思的思想对他来讲始终都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也是这个西德总理不无幽默地描写了苏联大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怎样来找他，要转告莫斯科当前的那份不满。大使说，苏联政府对西德将军关于继承德国军队传统的讲话感到不安。阿登纳回答说，他不清楚德国将军有这样的讲话。恰恰相反，他却记得自己到莫斯科的访问和迎接时列队的仪仗队。

“苏联士兵的军容和他们的清晰明快的步伐，依我看，完全符合普鲁士和沙俄的传统，”——总理说，——“这样的传统恰恰在西德国防军中没有推行。”

在这种情况下，大使转到了在联邦共和国出现了很多歪曲苏联现实的别有用心的出版物和电影的话题。斯米尔诺夫以此前不久在

联邦德国放映的三个惊险片为例，——《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医生》、《泰加森林》、《长丝袜》。类似的景象在文学领域也有，大使说："很多乌七八糟的书都出版了。"

"如果苏联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会怎么样？"——大使庄严地宣布，——"要知道，这么做的材料可是绰绰有余。在苏联人民中，在战时和被占领时积累了如此多的仇恨，通过相应的出版物重新唤起它根本就不难。但这将造成什么结果呢？"

总理对会谈出现这样的转折是有准备的。"有时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阿登纳若有所思地说，——"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一个很聪明的人的一封信，他却对在联邦共和国上映太多的可以成为对苏维埃俄国有利的宣传材料的电影感到担心。而昨天我方出版部门的领导埃卡特给我带来了苏联报刊最近攻击联邦共和国的材料，尽管我没有向他要这个。大使先生，我现在就把它交给您。"

为国务卿准备的燕麦粥

赫鲁晓夫希望被接纳加入大国首脑俱乐部。他希望，人们不仅把他作为苏联的首脑来尊敬，而且把他作为世界级的活动家来尊重。为此，首先要和美国建立联系。但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知道，如何着手完成这项任务。似乎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得不可救药了。

1957年5月，赫鲁晓夫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的采访："如果讲国际间的紧张局势，那么，显而易见，问题最终归结于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如果苏联能够同美国达成协议，那么也就不难同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了。"

莫洛托夫对这一论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夸大美国的作用是不对的。但对赫鲁晓夫而言，规模和实力小的强国不配当伙伴。不过，他本人也不很相信会很容易同美国人达成协议。"如果让我

们的部长葛罗米柯同你们的国务卿杜勒斯会晤，那么，他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也不会谈出任何结果，可能，只有孙子们能够等到这些谈判的某些结果。”

1959 年夏，当时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到莫斯科。十余年之后，尼克松重返莫斯科时已经是总统了，那时他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谈判。但这已经是另外的一个尼克松和另外的一个莫斯科。而在 1959 年，这是拳击场上的一场非比寻常的决斗。

尼克松来访的官方目的是为了参加 7 月 24 日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举办美国在苏联的第一届展览会的开幕式。在展览会重点展出的是美国的消费品生产。此外，尼克松将要邀请苏联领导人访问美国。

出访前，尼克松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他同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谈话，研究赫鲁晓夫的个性。他同到过华盛顿的苏联政府中两个赫鲁晓夫的第一副手——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见过面。“在同我进行的长时间的交谈中，他们每个人都传了几个快的旋球，”——尼克松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但是，在同他们会谈之后，同赫鲁晓夫的会晤——这就跟同弱队进行比赛之后又同高水平的球队进行比赛是一样的。他动用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手段：惊人的速度、旋球、弱传和强传、大量的技巧——这一切让您弄不清球的速度。我对各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进行礼节性访问已有几百次了，但以前还从来没有哪个政府的首脑用一段冗长的粗话迎接我，他的翻译在将那些话翻译成英语时，脸都红了。”

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对尼克松说：

“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想操纵世界。但同时他也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不打算管理一些被毁坏的城市和半死不活的人。”

总理回忆起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与他谈判时是怎样发怒的：

“只有我在地狱里看到您之后才会同意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阿登纳的反应很快：

“如果您在地狱里看到我，那只能是因为您是第一个下地狱

的。”

这次对骂之后，谈话变得轻松了一些。

尼克松向原国务卿杜勒斯讨主意，杜勒斯当时已经患了癌症，知道自己很快就不行了。他什么都不能吃，还要忍受如此巨大的疼痛，以至于只有在服用了大剂量的镇痛药之后，才能入睡。在白天，他拒绝服用麻醉剂，担心它们会影响他的智力。他对尼克松讲，当需要开始完全聚精会神的紧张工作时，他就不会感觉到疼痛。在去世前不久，杜勒斯成功地对欧洲进行了大范围的访问。1959 年 2 月，他飞到波恩。康拉德·阿登纳去接他。看到国务卿后，他大吃一惊。在车上，杜勒斯说，他觉得身体很不舒服，还要严格遵守规定的饮食，因此不能应邀参加官方的宴会了。

阿登纳还是劝杜勒斯参加晚宴，厨师会为他准备燕麦粥的，上燕麦粥的时候出席的人谁也不会发现，给国务卿上的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杜勒斯同意了。他显然喜欢这份燕麦粥。接替他任美国国务卿一职的是克里斯蒂安·赫特，他飞到波恩进行谈判，代杜勒斯转达了对总理的问候并转达了杜勒斯的一个请求，要总理告诉他请他吃过的燕麦粥的做法。赫特承认，起初他以为，这好像是一封密码信。

阿登纳给杜勒斯寄去了粥的煮法和几包燕麦，因为在美国不可能找到那样的燕麦。当 1959 年 5 月阿登纳前去参加他的葬礼时，有人告诉他，燕麦粥是杜勒斯临终前吃的最后一道菜。杜勒斯逝世时，在日内瓦正召开各国外长会议。所有的外长都前去参加葬礼。葛罗米柯不想去。赫鲁晓夫认为葛罗米柯不对，并吩咐他前往大洋彼岸：

“甚至应该高兴地参加自己对手的葬礼。”

杜勒斯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尼克松到那里去探望过他。原国务卿常常含一小块冰来减轻嗓部的灼痛。尼克松问他：

“首先我应该尽力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什么?”

杜勒斯从不急于回答，但是这次他思考得比平时还要久些。

“不必劝说赫鲁晓夫相信我们良好的意愿。他知道，我们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安全。但他应该知道，我们也了解他。赫鲁晓夫说他拥护和平共处。他所指的是，反对非共产主义政府的起义，是正义的事业，应该予以支持，而反对共产主义政府的起义，永远都是非正义的事业，应该加以镇压，就像他在匈牙利所做的那样。因此，他所赞成的和平共处——对共产主义国家是和平，而对非共产主义国家是不断的内战和冲突。应该让他明白，二者都办不到。”

与副总统的争吵

两个月后，尼克松飞到了莫斯科。随行的有总统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核潜艇之父、著名的海军上将哈曼·里科弗。迎接他们的是苏联政府第一副首脑科兹洛夫。如果不算外交官和记者，机场显得空空荡荡。

驻苏联的美国大使是卢埃林·汤普逊，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他第一次到莫斯科还是在 1939 年。甚至在 1941 年秋天最危险的那些日子，当把所有的外交官疏散到古比雪夫时，汤普逊仍留在莫斯科。1957 年艾森豪威尔任命他为驻莫斯科大使。

汤普逊领尼克松到了一间不大的客厅，客厅紧挨着二楼的大使卧室，在那儿他讲了莫斯科的情况。反间谍情报人员保证，这个房间里没有窃听装置，在整个使馆中这是惟一的一间！

尼克松很早就躺下睡觉了，但是由于时差较大，他睡不着。早晨五点半，他就起床了，叫醒自己的助手，和同时担任翻译和司机的苏联警卫员一起去了丹尼洛夫市场。当副总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曾在父亲的小铺干活，清早和父亲一起去洛杉矶的市场，以便在小铺开门前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运到。他想对市场进行一下比较。人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这个美国人，表示愿意给他水果和蔬

菜，拒绝收钱。他在市场转了将近一个小时。只有一个细节让副总统吃惊：他看到两套秤——卖主使一套，买主使另一套重新称一下所买东西的分量，以便确信，没有给他少称。“监督秤”的概念，对他来讲是很陌生的。

人们向尼克松要美国展览会的票。他以为，对这些人来说，票很贵，他让助手给他们一百卢布。但所有的人都笑了：无论花多少钱票都是搞不到的。

参观市场不是计划内的事，这惹怒了主人。《真理报》、《消息报》和《劳动报》愤怒地指责尼克松企图“博得苏联人的好感”并“侮辱”苏联人：他打算分钱的时候，摆好了姿势让美国摄影师照相。

克里姆林宫的会见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办公室开始的。然后，把客人带到赫鲁晓夫的办公室。美国人进来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假装在看发上月球的卫星模型。

“我觉得，他处于兴奋状态，”——尼克松回忆说。——“他一直从头到脚打量我，就像裁缝为了打量一个顾主以便为他缝制衣服一样，或者，更像办丧事的内行打量一个未来的死者，好给他选一口棺材。”

赫鲁晓夫对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被苏联征服的那些国家表示表示支持感到极大的不满。赫鲁晓夫用拳头敲着桌子声明，他认为这是严重的挑衅。尼克松试图解释，国会不听命于行政当局。赫鲁晓夫无论怎样也不能控制自己。

“这个决议是放屁！”——他敲着桌子喊道。

他用远远超出了外交词令的下流猥亵的口语表达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他的翻译特罗扬诺夫斯基面红耳赤，他无法毫不犹豫地翻译他的话。

赫鲁晓夫亲自前来参加了展览会的开幕式。他一点都不疲于争吵，并企图抓住话柄挖苦尼克松：

“美国人已不会做生意了。你们已经老了，已不像从前那样做

生意了。你们应该补充新生力量。”

“而你们为了做生意需要有商品，”——尼克松马上应付道。

展览会上展出的展品中有一台新型的电视。有人请他们说点什么。赫鲁晓夫说道，苏联希望在和平中生活，但时刻准备在发生战争时保卫自己。他承诺说，过7年苏联将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

“当我们追上你们并超过你们的时候，我们会对你们挥几下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会停下来说，请追赶我们吧……”

他在展览会上拦住了一个人，并非常兴奋地对尼克松说：

“看，有这样的奴隶吗？有这种高昂精神的人在，我们怎么会输呢？”

尼克松尽力控制住自己，他毕竟只是个副总统、只是一个客人。

“您不应该怕交流思想，归根到底，您还并不是对一切都了解了……”

“如果我还不是对一切都了解，”——赫鲁晓夫打断他，——“那么您对共产主义除了害怕外，丝毫都不了解。”

路过展览会上的一个烤面包小铺时，尼克松说：

“也许，您会有兴趣知道，我父亲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不大的小铺，我们家的所有男孩在上学时，也都同时在这个小铺做工。”

赫鲁晓夫鄙视地挥挥手，扑哧笑着说：

“所有商人——都是小偷！”

尼克松答道：

“小偷到处都有。我今天就看到，人们在国营商店买食品是如何多称一些的。”

他们在厨房设备展厅里停了下来。正是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厨房辩论。首先谈的是各种洗衣机的优点。尼克松决定讲一下，不仅仅富有的美国人能够买得起展览会上展出的房子。

“这是典型的美国房子，”——副总统讲道，——“它值14000美元——这些钱可以分25——30年支付。大多数工人能够给自己

买这样的房子。”

什么也不会使赫鲁晓夫难为情。他眼都没眨一下就不假思索地说：

“我们这里也有能够拿出 14000 美元现金买住房的工人和农民。”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深信不疑地说，资本家建的房子只能用 20 年，而苏联建的房子可以留给儿孙。

“您认为，这个展览会会使俄罗斯人感到震惊吗？美国人要买这样的房子，他要有很多钱，可在我们这里，只要成了一名国家公民就足够了。如果美国人没有钱，他买这种房子的权利就变成了在桥底下过夜的可能。”

尼克松试图反驳他：

“我们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会让苏联人民感到震惊，但它会引起了苏联人民的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样。多样化、选择权、由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公司建房子的事实，——对我们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不想由某个居高位的国家官员来作出决定并说，我们将有同一种类型的房子。”

赫鲁晓夫回答说，拥有同一个样式的洗衣机比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更好。

尼克松指出：

“比我们的洗衣机的质量不是比比我们导弹的威力更好吗？难道您不想要这样的竞赛吗？”

“是的，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竞赛！”——赫鲁晓夫喊起来，——“是你们的将军们叫嚷着要比导弹，而不是厨房用具，是他们用导弹威胁着我们，是他们神气十足地叫嚷着，以为他们能够从地球表面上把我们消灭掉。当然了，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做到这一点。对那些想试试的人，我们会，用我们俄罗斯的俗话说，给他点儿厉害看看。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

尼克松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的意思是，你们很强大，我们也很强大。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可在另一些方面——我们比你们更强。但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争论谁更强大，——完全是无益的事……对我们来讲，争论谁更强大没有意义。如果战争开始了，我们两个国家将会两败俱伤。”

赫鲁晓夫开始打诨：

“我不得不第四次说，我不了解我的朋友尼克松先生。如果所有的美国人都赞同您的意见，那么我们怎么会不赞同呢？我们想要的正是这个。”

但尼克松也不示弱：

“当我们坐下来谈判时，不能要求一切都像一方所希望的那样。一方不可以向另一方下最后通牒。”

赫鲁晓夫不喜欢副总统的话。

“我认为，您这是在威胁我。我们也是一个大国。如果你们威胁我们的话，我们会以威胁对付威胁。”

“我不是威胁您。我们从不搞威胁，”——尼克松答道。

“您这是在间接地威胁我，”——赫鲁晓夫激愤地高声说道，——“你们有点东西，我们也有点东西，而且我们的比你们的要好！这是你们想搞军备竞赛。”

“我们非常了解你们有什么。对我们来说，谁的导弹和炮弹更好没有实质意义。”

争论结束了。副总统把手放到赫鲁晓夫肩上说：

“我担心，我没有扮演好主人的角色。”

赫鲁晓夫转向导游小姐：

“感谢您，小姐，感谢您盛情地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这场厨房辩论的机会。”

他们继续在展览会上走着。尼克松和伏罗希洛夫走在前面，赫鲁晓夫走在后面。尼克松转过身，邀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们一起走。赫鲁晓夫带着冷嘲的微笑说：

“您和主席走吧，我知道自己的位置。”

干杯和乘船游览

晚上，在展览会的正式开幕式上，尼克松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讲话，这个讲话曾刊登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尼克松谈的是一个苏联领导人极为敏感的话题——多少个美国家庭有汽车、电视，多少个美国家庭有自己的私人住宅。

“这些数字有力地证明，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角度来看，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接近无阶级社会普遍富裕的理想。”

这令赫鲁晓夫无法忍受。他跳起来，开始反驳。但尼克松阻止了他：

“是让我发言。现在轮到我说。”

在互相致辞之后，尼克松把赫鲁晓夫领到有加利福尼亚葡萄酒的桌子前。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所有建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不想举杯反对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强调指出：

“让我们为和平干杯。”

有关军事基地的争论开始了，但是有人举杯祝赫鲁晓夫长寿。尼克松很高兴转变话题。

“让我们为此干杯。我可能不赞同您的政策，但我们希望您身体健康。祝您长命百岁！”

他们喝完了，但赫鲁晓夫决定把最后的发言留给自己：

“等我们 99 岁的时候，我们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但在这种针锋相对中，尼克松心情很好，他自己说了一些随意的、相当冒险的话：

“您想说，99 岁的时候您还在掌权，你们的国家会依旧像从前一样不进行自由选举？”

赫鲁晓夫邀请副总统到别墅去（用尼克松的话讲，“这是我过去所见到的豪华庄园中的一个”），还提议乘船沿莫斯科河游览，“以便看看奴隶们是怎样生活的”。

赫鲁晓夫八次停下快艇同在河里游泳的人握手。

“说说，你们是被奴役的人吗，你们是奴隶吗?!”——他向他们喊道。

“不，不是!”——休息的人说。

之后，赫鲁晓夫用手指碰碰尼克松的胸脯扬扬得意地说：

“您看见了，我们的奴隶是怎样生活的!”

在回来的路上，快艇搁浅。尼克松觉得，赫鲁晓夫现在简直要枪毙舵手。为了继续游览，他们换了另一条船，副总统看了一眼舵手，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游览之后，在别墅前白桦树下的小草地上安排了午餐。赫鲁晓夫实际上滴酒未沾，并且绝对清醒。米高扬试图同尼克松的妻子帕特说话，她坐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立即打断了他：

“听着，你，狡猾的亚美尼亚人！尼克松夫人是属于我的，在自己的那一边找人讲话去吧。”他用手指在桌子中间划了一条线说：

“这是铁幕。绝对不许逾越!”

赫鲁晓夫极力推荐鱼：

“这是斯大林喜欢的菜。他说过，这样的鱼可以增强体质。”

米高扬对尼克松讲，斯大林如何半夜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叫去的，并指出：

“自从赫鲁晓夫同志领导我们时起，我们睡得好得多了。”

他微笑着补充道：

“我想，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随后谈到了军事话题。赫鲁晓夫讲，一周前，苏联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 7000 公里，与目标的偏差不到两公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身子弯过桌子，对尼克松说，现在告诉他一个

什么秘密：

“有一个弹道导弹的推动力隔断系统发生了故障，导弹从目标旁飞过——向更远的地方射去，射向阿拉斯加。但幸运的是，它没有落在阿拉斯加，而是轰隆一声落到了大洋里。”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拥有的中、远程导弹的数量，足以用来消灭欧洲所有的敌人并毁掉美国的主要城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毫不怀疑，他的武装力量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能够消灭德国、法国和英国。当然，苏联也会遭受损失，但欧洲国家会变成荒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说。

接着，尼克松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侦察兵开始行动了。既然美国人没有很好地想象苏联的武装力量的情况，那他就开始用专业问题来烦赫鲁晓夫：

“如果你们对导弹的数量和它们的命中率都满意，为什么苏联还继续制造轰炸机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轰炸机的生产几乎停止了，因为导弹更精确。此外，有的时候人由于情绪作用不能把炸弹扔向目标，而导弹是可靠的。

“海员的命运令人同情，”——赫鲁晓夫说，——“除潜水艇以外，舰队完全老化了。巡洋舰和航空母舰——这不过是导弹的靶子，我不再制造大型水面舰只了。

尼克松知道，在能够从水下发射导弹的潜水艇的制造方面，美国超过了苏联。尼克松想知道，苏联在这方面是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赫鲁晓夫说，苏联军人认为，从陆上发射导弹比从海洋发射导弹更有效。

尼克松知道，美国在制造导弹的固体燃料方面走在了苏联前面，因而他想知道，苏联科学家取得了哪些成就。赫鲁晓夫说，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技术专家，对于这个问题他不是内行。

这时，帕特·尼克松参与了谈话。她笑着说：

“原来，也有赫鲁晓夫先生不能讨论的问题。我以为，赫鲁晓

夫先生把一切都抓在手中，他什么都知道。”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米高扬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做所有的事，他的手都不够用了，他需要帮助。”

赫鲁晓夫从新又回到苏联导弹破坏力的话题上，他反复说，苏联在导弹方面超过了美国，而导弹是无法防御的。他带着愉快的微笑开始复述英国人想出来的一个笑话：

“悲观主义者说，要消灭英国有 6 枚原子弹足够了，而乐观主义者肯定地说，要用 9 枚或 10 枚。

尼克松的结论是，赫鲁晓夫完全不像他想表现的那样一个人。认为他是一个会因怒气发作或喝多了就挑起战争的人，这是一个大错误。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他是清醒的、冷静的、沉着的。尼克松对苏联领袖的外交策略有了认识。第一，赫鲁晓夫想要得到无权得到的东西；第二，如果达不到他要求的，他就用战争来进行威胁；第三，如别人拒绝接受他的要求时，他就会指责别人，说他们对和平构成了威胁；第四，在为和平而作出的支付中，他至少要得到他最初毫无理由地想要得到的东西的一半。

同总统的争吵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印象比尼克松要好。1959 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访问美国。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大使回忆说，他非常想去，但同时，他又有点担心。他能够不卑不亢地同西方世界进行谈判吗？如突然不把他看作地位对等的人怎么办？会不会把他引诱去，然后凌辱他，教训他一顿，企图吓倒他，以便迫使他在谈判中作出让步。要知道，人们认为西方总是会搞鬼的。在他周围的人中大家也都很愿意谈论一下这个痛处。一方面，他们带着鄙视的态度谈论西方，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然而，在美国他

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用苏霍德列夫的话说，这个对待美国人不用外交伎俩的憨厚、坦诚的人博得了美国人敬仰。

美国之行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他看到了，可以怎样生活。他对美国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赫鲁晓夫决定，要同美国交好。

第二年，1960年6月，莫斯科等待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回访，美国总统的到来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可能会减轻两国间的敌视。但是，正像世界政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特工机关起了极有害的作用。美国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说服艾森豪威尔继续派“U－2”侦察机在苏联领土上空飞行。

“U－2”是在“冷战”时制造的，目的是为了监视苏联。它的第一次飞行是在1955年8月。“U－2”飞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任何气候状况下都能飞行：它配有所有样式的照相机和无线电探测仪器。但“U－2”的速度——每小时700公里——比较而言不算快，这使飞机比较容易受到攻击。

1960年5月1日，由格里·鲍尔斯驾驶的美国“U－2”侦察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苏联共产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原第一书记雅科夫·彼得罗维奇·里亚博夫对我讲：

“我是亲眼看着这件事发生的，当时我们正准备去参加游行。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但很凉爽。我们站着，忽然之间我看见：就在头顶上出现了两个大的白球。我还觉得挺奇怪：这是什么东西？这样的焰火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采取的行动都是很不理智的。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总统道歉，尽管国家首脑从来不为自己的间谍人员承担责任——这正是为了使正常的国家间的关系能够继续下去。而艾森豪威尔开始为美国进行侦察飞行的权利辩护，这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

5月，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应该于巴黎在四大国首脑的会晤时见面。大家刚一到齐，赫鲁晓夫就宣布，如果美国总统拒绝道

歉，那苏联就收回自己的邀请，艾森豪威尔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客人……

会晤就此结束。

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非常高兴地支持赫鲁晓夫：

“没必要和他们客气。”

葛罗米柯在上了年纪的时候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跟着赫鲁晓夫走，可头脑中有一个想法：‘纯粹是要威风！’赫鲁晓夫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这对于国务活动家是不容许的。”在回忆录中，葛罗米柯谴责赫鲁晓夫退出了巴黎会晤，破坏了艾森豪威尔对苏联的访问。

实际上，那时葛罗米柯想的和做的是有点不同的。苏联驻巴黎大使的助手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斯涅吉廖夫回忆起，当时为苏联代表团运来了大量食物。为了不白白浪费这些东西，大使馆举行了盛大的晚宴。第一杯祝酒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议的：

“在这里，在巴黎，我们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他所特有的本领将这个过于肥胖的资产者逼得万般无奈并叫他道歉，我们是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葛罗米柯也不甘落后，说“我们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非常英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带着明显的狂喜看着第一书记，尽管赫鲁晓夫的不可预测和即兴作风令他害怕。

尼古拉·卢尼科夫曾是驻挪威的大使，他回忆了赫鲁晓夫在奥斯陆的访问。在游览期间，赫鲁晓夫、他的女婿《消息报》的主编阿朱别伊和《真理报》的主编萨秋科夫走在前头。葛罗米柯对卢尼科夫说：

“您快赶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他并肩走，以备出现一些纯粹有关挪威的问题时，您在旁边可给他提醒一下。”

当卢尼科夫走近的时刻，赫鲁晓夫正兴致勃勃地对阿朱别伊和萨秋科夫说：

“听着，如果我们建两个党——工人党和农民党，你们怎么想?”

这时，他回头看了一下，并含有深意地看了卢尼科夫一眼。卢尼科夫明白，他应该走在后面。卢尼科夫趴在耳边对葛罗米柯说了听到的话。葛罗米柯谨慎地说：

“是的，这挺有意思。但您对谁也别提这个。”

皮鞋的故事

1960 年 9 月，赫鲁晓夫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他和代表团一起乘坐“波罗的海”号涡轮机电动船。这艘德国船在战后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海军所有，给它取名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莫洛托夫被赶下党的奥林波斯圣山[①]之后，船就改名叫“波罗的海”号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住在船左侧的“A”级豪华舱里。一大清早他就来到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甚至在起大风时他还散步。船上的播音器播放着他最喜欢的歌曲“小钢锥”，有时他登上桥楼，同船长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马约罗夫交谈几句。晚上，他在音乐厅看电影。11 点整他回自己的房间。

但赫鲁晓夫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工作——向速记员口授自己将在纽约做的发言的草稿。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放过逗笑葛罗米柯的机会。他对自己周围的人说：

“看，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看起来多年轻啊。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可见，他总是坐在自己舒适的船舱里慢慢地喝茶。”

葛罗米柯装出他显得可笑的样子。

---

① 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的地方。——译注

在纽约，涡轮机电动船乘务组发生了最不愉快的事件。让一组机械师进市里看看，锅炉工爱沙尼亚人维克托·亚安尼梅茨乘机叛逃了。他向美国人申请避难。在其他情况下，船长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想大肆声张。

赫鲁晓夫对联合国的工作极为不满，在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常投票反对苏联。他试图罢免当时的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并建议把联合国总部从纽约迁到别的地方。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的所有会议，尽管国家领导人通常不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但是赫鲁晓夫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一对他来讲是全新的事业中去。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群众性集会上同党的总路线的反对者进行坚决斗争的时代。当菲律宾代表发言时，赫鲁晓夫开始了首次争吵，菲律宾代表说，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镇压匈牙利的人民起义。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回忆说，赫鲁晓夫想要跺脚，但地板上铺着地毯。于是他开始用拳头敲桌子。和他并排坐着的葛罗米柯也毫不顾忌地敲打。后来，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解释说，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是想让赫鲁晓夫冷静下来。事实上，他力争别落在领袖的后面——对主人的忠诚比什么都更重要。

第二天，当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的代表发言时，赫鲁晓夫就用一只靴子敲桌子。后来，赫鲁晓夫对这件事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就在这件事之后，他曾公开说过：他用拳头敲桌子，敲得他的表都停了。这让他感到万分激怒。

“瞧，我想，真见鬼，为了这个资本主义的走狗把自己的手表都弄坏了。我觉得很生气，便脱下一只皮鞋，用它来敲。”

他要求发言，一走上讲台，他就开始喊：

“佛朗哥建立的是血腥的专制制度，他正在消灭西班牙优秀的儿女。西班牙人民奋起推翻血腥制度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会议主席爱尔兰人弗雷德里克·波兰德试图阻止他：

“发言者侮辱西班牙国家首脑，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谁也没把这些话翻译给赫鲁晓夫。而他断定，会议主席是在袒护西班牙人，便冲着鲍尔波兰德说：

“啊，原来是这样？连您当主席的也支持这个卑鄙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走狗？我告诉您：爱尔兰人民起来反对自己压迫者的时刻会到来的！爱尔兰人民是会推翻像您这样的帝国主义走狗的！”

平常稳重、沉着的波兰德喊了起来，要取消赫鲁晓夫的发言权。而赫鲁晓夫还在继续说，尽管他的麦克风已经给关了。只在波兰德退出会议大厅，会议中断的时候，他才离开讲台。

葛罗米柯后来说，赫鲁晓夫用一只皮鞋敲桌子，这是丢脸的事。但在当时，他准备完全跟着主人走到底，虽然他的嘴唇已变得苍白——因为联合国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丑闻。

加勒比海危机

1960 年 11 月 4 日，约翰·肯尼迪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1961 年 1 月 20 日，他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国内问题只说了几句话。他主要说的是外交，他认为，只有外交能让他扬名后世。

“所有的民族，”——他当时讲，——“不论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怎样，都应该知道，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一切重担，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和反对一切敌人，以保证自由的胜利！”

在莫斯科，新总统的话被理解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蛊惑煽动。1961 年夏，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一个中立领土——维也纳会晤。他们互相端详。肯尼迪建议发表一个拒绝把战争当作解决冲突的手段的联合声明。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提议，因为这会让他失去参加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也就是失去提供武器和派军队去帮助所有请求提供这种帮助的人的机会。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感到失望的

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有经验的政治家被换掉了，上来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比苏联领导人要年轻二十多岁。

一般认为，在维也纳的会晤中，美国总统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傻孩子，他不难对付，这也就导致了向古巴运送核武器的决定。但是，关于调拨导弹—核武器的决定早在同肯尼迪会晤前就已经定下了，是 1961 年 5 月 18 日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而赫鲁晓夫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还要早。同美国新总统的谈话只能更加坚定赫鲁晓夫的想法。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问肯尼迪：

“总统先生，您多大了?”

肯尼迪回答了。赫鲁晓夫若有所思地说：

“是吗，我的大儿子现在也这么大，或许还要大一些。”

所有的人都把这理解成是让年轻的美国总统自量。但是，按苏霍德列夫的说法，赫鲁晓夫说这些话时满怀忧郁。他只是想起了在战争中牺牲的自己的儿子列昂尼德，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一切都很明显，当时赫鲁晓夫不喜欢肯尼迪。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甚至跟自己周围的人说：

“是的，如果现在美国人有这样一位总统，那我为美国人民感到可怜。”

从维也纳回来之后，葛罗米柯在部里党的积极分子中发表了讲话。他谈到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会晤时说：

“如果说得形象一些，那么这是巨人和侏儒的会晤。”

会晤没有取得成果——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一点。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读完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晤资料后，在日记中写道：“起先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肯尼迪最后的交谈感到非常困惑。但拿来一读，细想一下：不对，不是这样。我们不会真的要走向战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对精神和意志的考验。”

实际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错误判断险些引起了战争。

把核弹运往古巴是赫鲁晓夫个人出的主意。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目的是使古巴免受美国的攻击。这是一种优雅高尚的解释。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但实质上，是另有目的：宽慰一下自己的自尊心，让美国人看看，苏联也能给他们带来不愉快。苏联不得不在美国军事基地的包围中生存。现在也让美国人失去习以为常的安全感，让他们意识到，被别人的导弹瞄准是什么滋味。

赫鲁晓夫坚信，他能够顺利地秘密完成这次行动，然后，当美国人面对事实时，他们会看到，他们无处可藏。他还准备在 11 月份亲自前往古巴，以便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军事合作及双方应尽义务的协议，还要通告一下，从现在起，古巴人可以不再害怕美国人了。赫鲁晓夫显然没搞懂，他在做什么，他想象不出，美国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还是对美国总统肯尼迪估计不足。

领导层中也没有人对赫鲁晓夫的想法表示异议。连葛罗米柯都保持缄默，尽管他应该告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美国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可他没敢。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不同——他对所有的人都只称呼“您”，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怕他。“葛罗米柯非常怕赫鲁晓夫，”——法林回忆说，——“当赫鲁晓夫提高声调的时候，部长就没词儿了。在答话时，政府首脑们听到的都是‘是—是—是’、‘明白’、‘马上执行’这类话。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部长也会满头是汗，放下话筒之后，他还会一动不动地坐一会。眼睛盯着一个地方，整个模样都是难言的苦闷和忧愁。”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既不了解世界局势，也不了解美国人。况且，外交和军事——是第一书记的特权。他们认为，危险会过去的，美国人不会把事情搞得太紧张——没有这个能力。

有关古巴的苏联导弹的消息不仅对美国人是个意外，对苏联人也是个意外。导弹和核弹头的运送是非常机密的行动。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向我讲了运送核弹头去古巴一事，他是从自己情报局的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那里知道的，而且也是在美国人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之

后才知道的。

“当然了，克格勃机关保证将导弹等武器运抵古巴。但是，没有让我们知道有关核武器的事……我把反间谍局的局长叫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军事反间谍机关过了一段时间向我报告说：是的，核武器确实运往古巴了。”

“就是说，赫鲁晓夫甚至连克格勃主席都没让知道?”

“此时，我当克格勃主席才一年，”——谢米恰斯内说，——“还不是中央主席团的成员。只是一个中央候补委员。还在把我当成是一个共青团员。也不是所有的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知道这件事。”

“难道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问一下情报机关美国会做何反应?没有预测一下事件会如何发展?”

“赫鲁晓夫应该让我知道他的计划。可这就意味着，我的部门的一部分人都会知道。我也要向情报机关提问题：美国人会怎么反应?如果我的部门知道了，外交部就会有人知道，消息就有可能泄露，美国人就会事先知道，而这是他想避免的。况且，赫鲁晓夫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光想让美国人惊奇，还想让我们惊奇：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政治家啊，什么都能做出来!”

并且，发运核弹的准备工作是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悲剧事件的背景下进行的，6月新切尔卡斯克的电力机车制造工厂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了真正的工人暴动。它是由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通过的提高肉、奶类食品的价格的决议引发的。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伊萨·普利耶夫将军指挥的北高加索军区的军队驱散了工人。士兵向爱好和平的人们开枪射击。23人被打死。14人受到审判，一半被枪毙，一半被判处长期监禁。普利耶夫将军因他的军队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表现突出而被赫鲁晓夫派去指挥驻古巴的苏联军队。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使用武力决定的人。

从1962年9月开始，用“印第吉尔卡”号柴油机电动船从苏联北莫尔斯克港向古巴的马丽埃尔港运送了36枚“P－12”导弹

的核弹头和 24 枚“P－14”导弹的核弹头。“P－12”和“P－14”——这是设计师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扬格利研究出来的中程弹道导弹。1959 年 3 月，“P－12”被交付使用，“P－14”两年之后被使用。“P－12”的最大射程是两千多公里，“P－14”的最大射程是 4500 公里。额定的核爆破功率超过了两百万吨，但运往古巴的是已经经过试验的核弹头，功率是 100 万吨。不过，没来得及向古巴运去“P－14”导弹。

此外，还向古巴运送了用来安装到 12 枚“月球”战术导弹上的核弹头，其射程约两百公里，供“伊尔—28”轰炸机携带的六枚原子弹和几枚核鱼雷。

这样，在古巴就有了足以进行一场真正核战争的庞大的军火库——共储备了 164 枚核武器。驻古巴的苏军有第 51（罗姆内市的）导弹师，第 11（聂德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市的）高射导弹师和第 10（伏尔加格勒市的）对空防御高射炮兵师，4 个机械化步兵团，空军部队（157 架战斗机，33 架直升飞机）和海军部队（18 艘导弹艇，4 艘潜水艇），海岸导弹团——8 个“火山”发射装置和供给部队。

运送所有的部队，需要 85 艘船，183 个航次。在途中全体人员都待在温度高达摄氏 50 度的底舱里。白天禁止到甲板上来，只有在夜里一小批、一小批地放出来透口气，活动活动。在古巴他们更不容易：炎热，空气湿度大，服兵役非常辛苦。

只有赫鲁晓夫本人可以向普利耶夫将军下达发射核导弹的命令。在美国人入侵古巴领土的情况下，普利耶夫有权使用“月球”战术导弹。

早在 8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就预先通知总统，苏联的导弹可能运往古巴。但没有确凿的情报。肯尼迪直到最后都不相信，苏联能这么做。况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大使多勃雷宁发誓，在古巴没有导弹，也不会有。

10 月 6 日一大早，有人向肯尼迪总统呈报了古巴有苏联的中

程导弹的确切消息——这是空中摄影资料。在白宫马上就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第一个提案是要给苏联的导弹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担任司法部长的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要求慎重。麦克纳马拉说：

"轰炸古巴的苏联导弹发射装置会导致在那里的苏联专家死亡。毫无疑问，这会招致莫斯科的回击。我们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冲突的升级会导致真正的战争。"

麦克纳马拉还解释说，从空中轰炸不能保证摧毁所有的导弹。剩下的导弹还可能发射，它们将在美国城市的上空爆炸……

莫斯科没有料到，肯尼迪总统已经全知道了，在激怒了美国人的同时，他们还在玩原来的游戏。10 月 18 日，葛罗米柯在华盛顿肯定地说，在古巴部署的只是防御性武器，这破坏了美国人对他的信任。这次撒谎使得不让舆论界知道、秘密地协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没有弄明白白宫发生了什么的葛罗米柯，若无其事似地向莫斯科报告说，华盛顿已经不那么紧张了，美国人不可能采取反对古巴的军事行动。

1962 年 10 月 22 日晚 7 点，当肯尼迪总统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并要求撤走它们的时候，无疑是一声晴天霹雳。此前一个小时，肯尼迪致赫鲁晓夫的信已交到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赫鲁晓夫和中央主席团作出的第一反应是带有敌意的愤怒。加快安装导弹进行战斗值班的指令已经下达到了古巴。

10 月 23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由于美国政府的挑衅行为，苏联政府听取了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关于提高武装力量战斗准备的措施的意见，并对国防部长下达了必要的指示，其中包括特殊的指示：

1. 暂停苏联军队中执行战略任务的导弹部队、防空部队和潜水舰队的年龄较大的军人退役。

2. 取消所有人员的休假。

3. 提高全军的战斗准备和警惕性。”

这是证明赫鲁晓夫不打算进行协商，而是打算进行冲突的信号。在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的回信中，拒不接受任何指责。

但是肯尼迪的严厉声明使很多人不安起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彼得·叶非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一个强硬、保守的人，来自国防工业，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来，我们出现了疏漏，也可能，太冒险了。要防止过于自信。”

10月23日，肯尼迪在古巴周围设立了隔离检查区，并预先通知，美国军舰得到了命令，所有运货进古巴的船只都要停下接受检查，为的是防止把进攻性武器运送进岛。

最危险的时刻是10月24日早晨，苏联船只接近隔离检查区的时候。莫斯科给苏联船长下达的最初命令是：冲进去。“我感觉到，”——事后罗伯特·肯尼迪写道，——“我们正站在深渊的边缘上，而且没有退路……肯尼迪总统已经失去了对事态发展的控制能力。”

在最后时刻，赫鲁晓夫意识到了他是在做什么，并下令船只返航。如果船只试着冲向古巴，美国军舰就会开火。那时，赫鲁晓夫和肯尼迪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同一天，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的愤怒来信：“总统先生，您是在向我们挑战。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总统先生，您宣布的不是隔离检查，而是提出了最后通牒并进行威胁，如果我们不服从您的要求，您就动用武力。不，总统先生，我不能同意这一点！……美国对古巴的行动——是一种直接的掠夺，这也可以说是堕落的帝国主义的狂妄行为……”

10月25日，美国进行了原子警报演习。机上载有核武器的“B—52”战略轰炸机轮着班经常在空中盘旋，准备越过北极飞往苏联边境。局势变得非常紧张。

肯尼迪总统担心有的军人神经过于紧张，命令从核武器上拆下引信。总统警告他的军人，使用核武器的命令只能来自白宫。

赫鲁晓夫逐渐领悟到，他惹出了什么样的麻烦。在一次会上，他说：

“列宁的整个事业都被输掉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落入了他自己设置的陷阱。如果美国攻击古巴，该怎么办？对美国进行核回击？也就是开始全球性的核战争？可是国家对此还没有准备好，有可能输掉。

“出现了这样一种神经过敏的情况，无论是中央主席团还是部长会议都转为昼夜工作制，”——谢米恰斯内讲，——“在我们克格勃有三四天时间没熄过灯。驻全世界的间谍机关都只研究这件事。在最后的日子里，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发了很多电报给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报没有译成密码，没时间搞翻译和破译密码的工作。失去几小时和几分钟，最终可能就是一场疯狂的战争。”

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古巴之后，并没有考虑事情发展的各种可能。现在搞成这样，他只有一条出路——退却，把导弹运回来。为了使这个不被看成是彻底的认输，哪怕从美国人那里弄点东西弥补一下也行。

可华盛顿一点都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苦恼。美国政治家们要求肯尼迪对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说，应该给古巴人一昼夜时间进行人口疏散，然后摧毁导弹。将军们也准备对苏联进行打击。肯尼迪兄弟不得不制止他们。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最大的“鸽派”。他在会上说，俄罗斯人已经拥有能够打到美国领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因此，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原则上没有改变什么，只是赫鲁晓夫进行攻击时可以快几分钟。实际上麦克纳马拉是在劝总统什么也别做。但对肯尼迪政府来说，在古巴出现导弹是势不两立的挑衅行为。如果他不能迫使赫鲁晓夫撤走导弹，他的政敌就不会原谅他。他们担心，导弹早晚会落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手里，因为，卡斯特罗会毫无顾忌地把导弹发射到他所痛恨的美国这边。而且赫鲁晓夫也会认为，他什么

都可以做。要知道美国人头脑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赫鲁晓夫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处于独立状态的西柏林并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照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指示采取行动的苏联间谍，尽管不是希望这样，实际上也使人加强了这种推测。

赫鲁晓夫发出了信号：莫斯科不希望发生冲突，它在寻找摆脱这种危险局面的适当方式，情报工作人员应该重复这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也许更令美国人怀疑了。用福明这一假名的苏联驻华盛顿情报机构的头头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由他自己倡议同著名美国记者约翰·斯卡利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会上说，在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的情况下，苏联会对“薄弱地区”进行回击。斯卡利马上予以明确：

“这会是西柏林吗?”

“作为回应措施这完全有可能，”——费克利索夫轻率地说。

这个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头脑中没有出现过这会导致与赫鲁晓夫搞出的危机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的死亡的想法。斯卡利说，美国会保护柏林。费克利索夫毫不掩饰地嘲讽说：

“约翰，你知道，当上千辆苏联坦克投入战斗，而俯冲攻击机超低空飞行，从空中进行攻击的时候，它们将会扫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

费克利索夫说这些，相信他的话会传到白宫。肯尼迪认真地考虑了这些话，并通过斯卡利转达了摆脱危机状况的方式：苏联撤走导弹，美国不入侵古巴并取消封锁。多勃雷宁拒绝在报告这条消息的电报上签字。费克利索夫通过自己的系统发了密电。但赫鲁晓夫对这条消息不感兴趣。他需要肯尼迪方面发出放弃打击古巴的企图的官方保证。要撤走核武器，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10月26日，赫鲁晓夫又转交给肯尼迪一封信，证实了他打算寻求妥协。但是，美国人甚至还没来得及答复他。第二天发生的事把赫鲁晓夫有意和解的口气完全勾销了。10月27日，星期六，已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师已准备好发射24枚导弹打击美国本土。这些

导弹能精确地毁灭华盛顿。现在任何小事都可能引发战争。

同一天早晨，一架美国"U－2"飞机的导航系统坏了，它没有在阿拉斯加而是在楚科奇上空转了40分钟，可这架飞机没有发觉这一点。美方派了一架"F－102"歼击机去解救它，想为迷失方向的驾驶员领航。这样，苏联领空出现的已经是两架非法侵入的飞机了。苏联歼击机起飞对它们进行拦截。当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知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神经都经受不住了。他高声说道：

"这是同苏联的战争！"

比较沉着的肯尼迪总统哼了一声，说出了他的一句名言：

"总会出现会把所有事情都搞砸的狗崽子。"

美国飞机在苏联拦截飞机赶到之前成功地消失了。但局势已经超越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控制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渴望决战。岛上有了苏联核武器之后，他拿定主意要使美国人知道自量。他要求苏联军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并下令击落美国的飞机。古巴高射炮手进行射击，但没有打中。可是，"C－75"、"杰斯纳"防空导弹营用两枚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机。飞行员死亡。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亲自向赫鲁晓夫报告这件事。赫鲁晓夫问：

"谁下的命令？"

"他们自己决定的，"——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是卡斯特罗同志下令击落敌机的。"

大概，在这一刻，赫鲁晓夫才明白，局势变得如此危险，和平在非常迅速地转向战争。他派驻古巴的将军们，在没有莫斯科命令的情况下，卷入了军事行动。

心满意足的卡斯特罗给普利耶夫将军打电话，感谢苏联的导弹射手。他们收拾了飞机的残骸并运往哈瓦那的博物馆。战争可能随后爆发的想法没有让卡斯特罗害怕。但是苏联军官每一分钟都在等待美国的攻击。

赫鲁晓夫下达命令，没有他的批准不准再射击美国飞机。美国人当然不知道他下过这个命令。他们是从相反方面想的：俄罗斯人

已经动用了武器。在华盛顿人们把这一天称做“黑色星期六”。肯尼迪总统派自己的兄弟去苏联大使馆向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说，“如果你们不撤销古巴的基地，那我们替你们来做这件事”。

美国国防部向总统提交了袭击在古巴的苏联导弹阵地的计划。“我们预料，”——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说，——“星期二将开始战争。”

紧张局势日渐加剧。美国人对打击古巴进行着认真的准备，如果莫斯科不改变主意，他们大概就会打击古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根本不可能公开承认所犯的错误，但他明白，要改正它，因为国家的存亡危在旦夕。

赫鲁晓夫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不善于控制情绪，但这是表面现象。曾做过他的国际事务方面助手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认为，赫鲁晓夫总是能够控制自己，如果他失去了自制力，那是他装出来的。不过他在这一件事上表演得太过火了。赫鲁晓夫明白，世界正处在战争的边缘，应该赶紧采取措施，他通过公开的无线电台又转给肯尼迪一封信。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答应把导弹从古巴运走，但也要求从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肯尼迪很轻易地就同意了。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美国就在土耳其部署了导弹。这是使用液体燃料的过时的导弹——是靠不住的、不准确的，而且容易受到攻击。美国有了固体燃料的导弹后，它们就失去了作用。

当肯尼迪就任总统的时候，他自己就说过，应该把导弹从土耳其撤走。但国务院劝他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目的是别激怒那些认为导弹是安全保障的土耳其人。1962 年初，肯尼迪又一次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让他同土耳其人就撤出导弹一事进行谈判。腊斯克没有急于去执行他的指示。这正好给赫鲁晓夫提供了一个签订形式上等价协定的极好机会。

10 月 27 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们从土耳其撤走自己的导弹，我们就从古巴撤走我们的导弹……

苏联郑重承诺，不侵犯土耳其，不干涉其内政；美国对古巴也应该作出这样的承诺。"

肯尼迪大发脾气是由于国务院使他陷入这样一种境地：要知道，赫鲁晓夫的提议完全是理智的。他命令答复莫斯科，说过一段时间他就从土耳其撤走"丘比特"导弹。

10 月 28 日，赫鲁晓夫通知美国人，说他已经命令拆除导弹并把他们运回家。一切都结束了。危机过去了。我国有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曾发生了什么事。

我问谢米恰斯内：

"当时您本人想过，可能会爆发战争吗?"

"想过。我处的地位使我看到：一切都可能发生。请记住——"冷战"有时会达到那样一个沸点，变得非常可怕。"

美国军人对危机的迅速解决感到不满。"在俄罗斯人答应运走导弹的那个星期天的早晨，"——罗伯特·肯尼迪回忆道，——"一个高层军人说，无论如何应该在星期一进行打击……"

当得知导弹要从岛上撤走时，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失望。实质上他和苏联的友谊到此为止。后来，他把莫斯科看成是一头挤奶的牛，为了继续古巴的革命需要利用它……

第二年，1963 年 9 月，出现了粮食供应困难，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粮食完全从商店里消失了。可在尼古拉耶夫港此时正在为古巴装运粮食。城里出现了不满。港口装卸工人断然拒绝工作。怎么办呢? 派了部队进行装货。去古巴的船按时起航——不想得罪卡斯特罗。

危机是以苏联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告终的。从古巴退却是不可避免的、是很丢脸的。整个这段历史对主要当事人——赫鲁晓夫产生了不愉快的后果，加勒比海危机削弱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人独掌大权的状况。党的领导层的同志们看到他张皇失措，看到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后退了。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当时是莫斯科市委第一

书记。他对我讲，十月份的一天，他去弗罗尔·科兹洛夫处，当时弗罗尔·科兹洛夫已经是党内的二把手了。有一个军人给科兹洛夫打电话问：

“美国人驶近我们的船，想要检查。怎么办？”

“让他们查吧！还能怎么办？我们都同意了。”

“但船上是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那又怎么样！让他们看吧。我们的确是在退出。”

科兹洛夫挂上话筒，表示信任地对叶戈雷切夫说：

“嘿，我们的老爷子已经完全垂头丧气了。他非常害怕！”

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地位削弱了，谨小慎微的科兹洛夫无论如何也不会对第一书记如此轻视。

不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装作什么特殊的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不大客气地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说：

“你们想让我像一个年轻的军官一样在舞会上跳得头昏脑涨，然后开枪自杀？”

两年后，1964 年 10 月，有人给他算起了加勒比海危机这笔帐。

赫鲁晓夫给西方惹了一大堆麻烦，但没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他能让危机开始，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危机。浪费了大量资源，却没有取得任何战略补偿，这是他采取的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是怎样的呢？”——著名的导演米哈伊尔·罗姆写道，——“他身上有某种很人道的、甚至是令人喜欢的东西。但作为国家的头头，看来他是太放荡不羁了。大概，他可以把整个俄罗斯搞破产。在什么时候，什么制约对他都起不了作用，根本都起不了了。他如此放任自由，如此丧失了任何一点拘束，这种状态是危险的——对整个人类都是危险的……”

克里姆林宫的三重奏和部长

加勒比海危机之后，更换了驻联合国代表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他不得不长期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驳斥无法反驳的事——古巴有导弹。东方学家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林接替了他。很多外交官认为，葛罗米柯会失去自己的位子。更何况，赫鲁晓夫并不太器重自己的部长，经常蔑视地谈到他：

“可以不用怀疑，葛罗米柯会丝毫不差地完成给他的指示，最大限度地从交谈者口中榨出所需的东西。但别指望葛罗米柯会提出倡议，会有能力作出要由他自己承担责任的决定。他是个典型的官僚。”

赫鲁晓夫挑逗葛罗米柯，取笑他，认为他是一个懦夫。有人证实，在自己人的圈子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好像说过：

“命令葛罗米柯光屁股坐到冰上，他会吓得坐下去。”

传言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的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伊瞄上了外交部长的位子。赫鲁晓夫喜欢将年轻人任命到较高的职位上。阿朱别伊这个有天赋的人，有可能成为部长，但是赫鲁晓夫被早一步打发退休了。

后来，葛罗米柯就不用担心，什么人会侵夺他的交椅。不过，有些好搬弄是非的人曾断言，多勃雷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在华盛顿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大使。如果他按时回莫斯科，那么他就有可能取代坐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大厦七楼的主要办公室里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赫鲁晓夫被免职时，葛罗米柯暗暗为自己庆幸：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即使还没有打定主意要免除他，无论如何也会经常会把他呼来唤去，经常会欺负他。直到临终前，他说起赫鲁晓夫都是抱不以为然的态度：你不知道，他会搞出什么鬼把戏来。但是他对斯大林评价很高。葛罗米柯喜欢回忆，在三大巨头会晤时，他们

是如何谈到未来欧洲的边界的。丘吉尔转向斯大林，流露出讽刺的神情说：

“总理先生，要知道，利沃夫从来也没有进入过俄国的版图！”

斯大林略作思考后回答：

“您是对的，利沃夫从来也没有进入过俄国的版图。但华沙进入过呀！

葛罗米柯还喜欢斯大林能口授任何文件。如果斯大林对文件中有什么地方不喜欢，他就让人拿一支铅笔，一边抽几口烟斗，一边口授新的文本。

现在葛罗米柯面临的是搞好同新的国家领导层的关系，新的国家领导层以三个人为首——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主持政府工作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和先占据了中央第二书记这一关键位子、一年后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中央主席团中的力量对比并不清晰。除了正式的三个领导人之外，中央书记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多人认为他会当党的领导。

葛罗米柯毫不踌躇地把赌注压在了勃列日涅夫身上，他没有失算。但让新领导重视自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准备在勃列日涅夫任期内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二十三大上的发言时，他的助手不得不写了十七篇讲话稿。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考虑好，说什么更正确，更有利。当前谁掌权，葛罗米柯就全身心地投靠谁。外贸部长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曾在外交部工作过，有一次他对著名的苏联外交家法林说：

“你知道吗，瓦连京，政府里有人不喜欢也不尊重你那个葛罗

米柯……把他比作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

但是勃列日涅夫很欣赏葛罗米柯的忠诚。他们很快就用“你”来相互称呼，而且列昂尼德·伊里奇很愿意倾听外交部长的话。

勃列日涅夫有自己的问题。起初他有点儿害怕国际事务，觉得自己不太有把握。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进行过谈判。但是同西方国家的首脑、总统或者总理进行礼仪性见面的，要么是政府首脑柯西金，要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

波德戈尔内完全是个不露城府的人。有一次，他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一起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苏联驻纽约的代表机关安排的一次午宴上，波德戈尔内想起了外交部的原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深表同情地说：

“你们外交官的工作很繁重。我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外交官的。”

马祖罗夫说：

“如果党下命令，你就能。”

波德戈尔内摆了摆手说：

“不，我不能，我没有做这种工作的才能。”

马祖罗夫还不罢休：

“可叶皮谢夫是你的州委书记，他不是去南斯拉夫当了大使。”

波德戈尔内真的表示惊讶地说：

“哎，你说的也是，叶皮谢夫——终究是个文化水平高的人。”

波德戈尔内是一个顽强、自信、无远见的人。他以保护人的姿态对待勃列日涅夫，和他平起平坐，也许，他把自己看成是首要角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他反对专制农奴制，反对官场的腐败，但同时也痛斥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译注

色。他喜欢被人称为总统，在同外国人会谈时，他以苏联代表团头头的身份发言。在正式会见时，他是主人，外国总统向他致祝酒词和贺词。

这惹怒了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的职务是装饰用的，他依靠的是不久前他曾在那里担任过第一书记的乌克兰，依靠有影响的乌克兰领导人，依靠不少来自乌克兰的、在莫斯科占据重要职位的人。

勃列日涅夫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摆脱波德戈尔内。首先，他更换了乌克兰的领导人，把自己人安插到基辅，然后借他们之手除掉了波德戈尔内，就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直接把他从政治局除名。对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起初，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非常想在对外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他很乐意出国，很乐意接待外国客人。在政治问题上他是极其保守的，如果不说他是反动的话。1965 年 2 月，柯西金来到了北越，此行的目的是要告知越南人，他们将会得到大量的军事援助。在从河内返回的途中他同毛泽东会晤，试图想要劝毛泽东降低两国间异常紧张的论战声调，甚至还邀请他前往莫斯科，但没有什么结果。毛的回答是：

“我累了，已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看来，我快死了……”

1966 年 1 月，柯西金在塔什干呆了近两周，他企图把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的立场拉近点。他取得了成功——签署了塔什干宣言。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天夜里，印度总理去世了。

1967 年 6 月，柯西金被派去同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会晤——那是在以色列在近东击溃了阿拉伯军队的六天战争之后。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也落到了他手里——在 1969 年珍宝岛战役之后同中国人进行协商。3 月底，柯西金打电话给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外交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利扎韦京接的电话。有些情绪不佳的柯西金说：

“我受政治局委托，要亲自和毛泽东同志或者周恩来同志商谈几句。我们想要通过高频保密电话同他们取得联系，但北京的电话局里坐着个下流家伙，说话粗鲁，拒绝为我和他们接通。大使馆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吗?”

叶利扎韦京讲，现在不同中国外交部提前约好就要同中国领导人联系恐怕不可能。大使馆向中方请求安排交谈。中国官员傲慢地说：

“无论什么样的电话交谈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苏联方面有什么要对中国领导人说，应该通过外交途径。”

这是无礼的拒绝，叶利扎韦京通过电话用比较克制的说法向柯西金报告了这件事，其出发点是，对高频电话中国人自然是会侦听的。

同中国人谈一谈的第一个合适机会是在越南领袖胡志明葬礼的时候出现的。柯西金和周恩来都飞到了河内。原葛罗米柯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大使瓦列里·齐布科夫回忆说，苏联外交官建议同中国人举行会晤，中国人很长时间都没有答复。柯西金起飞回国了。当他的飞机在塔什干中途降落时，北京通知，周准备与他见面。政治局里大家认为，柯西金往回飞有失体面。但机智的葛罗米柯找到了出路。柯西金还是从塔什干飞往北京，但官方报道中只说，他在返国途中在中国首都中途做了停留。在北京机场进行的会谈降低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

世界各国都认为，正是需要同柯西金打交道——他在莫斯科是长者。大使们要求他接见，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给他写信，他被看成是赫鲁晓夫的政府首脑职位的继承人。

葛罗米柯和柯西金之间关系没有搞好。维克托·苏霍德列夫讲，当柯西金在塔什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导人调停的时候，葛罗米柯自然也在那里。应该去谈判了，葛罗米柯忽然想起他把公文夹忘在房间里了——大概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部长请柯西金等一分钟，跑去取文件夹。但柯西金非常平静地坐上汽

车走了。葛罗米柯出来了，看到没有人等他，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是他不得不同翻译一同乘坐“伏尔加”前往，柯西金带着毫不掩饰的挖苦看了看葛罗米柯，说：

“怎么？把文件夹忘了？所有的秘密都泄露了……”

葛罗米柯不敢应声，他还没成为政治局成员，但他尽一切努力要把政府首脑从对外政策领域推开。柯西金不想交出外交事务，如果讨论对外政策问题的时候没有他，他会非常气愤。

葛罗米柯坚决站在勃列日涅夫一边，竭力把勃列日涅夫拉进国际事务，同时把其他人推开。部长强调说，所有重要的谈判都应该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而不是政府首脑主持。至于礼节，那可以商量。1971 年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驻各国的苏联大使们开始向驻在国解释，寄往莫斯科的所有信函应该寄给勃列日涅夫而不是柯西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当年在中央委员会国际局工作，他描述说，有一次他无意地来到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听到总书记在同柯西金在电话中进行谈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用的是免提扩音电话机，因此，在场的人都听到了整个谈话。

柯西金开始说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到莫斯科进行的访问：

“瞧，尼克松有多厚颜无耻。对越南炸了又炸。真混蛋。喂，列昂，要不，我们推迟他的来访？”

“你是怎么啦！”

“怎么啦！还会要轰炸啊！”

“轰炸归轰炸，可它更多地是炸谁呀。”

“是，好吧。但应该给他写封信，不是吗。”

“对，我这里好像有一封尼克松的信。我还没答复他呢。我就利用它吧。”

勃列日涅夫立刻和葛罗米柯联系：

“你知道吗，柯西金建议推迟尼克松的来访。他说，尼克松将继续轰炸。”

“他是怎么回事？”——葛罗米柯发愣了，甚至没能立刻想出说

什么来回答。

然后自言自语说了一通，意思就是说“这个柯西金一天会有二十个想法”。

“行了，行了，”——勃列日涅夫说，——“让我们在政治局把一切都商谈一下。”

对勃列日涅夫来讲，在外交问题上葛罗米柯的观点比政府首脑的意见更重要。不过，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他身体还是健康的时候，他完全是独立自主地行事的，有时没有自己的外交部长也能应付过去。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埃贡·巴尔写道，当1971年勃列日涅夫邀请勃兰特去克里米亚时，“这件事作得相当漂亮，没有让葛罗米柯参加谈判……部长不可能对此感到高兴。不过，他肯定还不得不承受更大的打击。”

用手枪顶着太阳穴

葛罗米柯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政治局委员要么完全不懂世界事务，要么就囿于某些荒诞不经的神话。在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上，苏联领导人有着复杂的感觉——既尊重又鄙视，既羡慕又轻视。在莫斯科，对美国的总统大选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怎样搞好同新人的关系。

1972年5月，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飞到莫斯科，这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同时对美国人来讲也是大事。两国的关系从一个危机走向又一个危机。

1970年，白宫办公厅的领导人和未来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到位于华盛顿16街上苏联大使馆大楼来见多勃雷宁。他们单独呆在大使办公室，出于安全考虑，大使办公室的窗户始终用护窗板紧紧地遮盖着。黑格用威胁的口气说明了总统交给他的任务的实

质。美国侦察机关发现，在西恩富戈斯，在古巴的南海岸，苏联正在建原子潜艇基地。在岛上出现了带有核武器的苏联潜艇，这就破坏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黑格代表尼克松总统提出最后通牒：应该停止修建。黑格提高了声音说：

“或是你们自己取消西恩富戈斯基地，或是我们帮你们做。”

多勃雷宁的脸平常是极其和蔼的，这时气得发青了。大使用冰冷的语调说，他认为这种外交行动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莫斯科不想搞出新的导弹危机，所以一切都得到妥善解决。

过了一些时候，多勃雷宁说，葛罗米柯责成他通报如下情况：

“我们在古巴没有潜艇基地，我们也不会在那里建海军设施。我们会严格遵守 1962 年协议。”

苏联潜艇继续时不时地前往古巴，但并没有建立所说的那种基地……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礼仪问题都拿到了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担心地说：

“在中国，尼克松及夫人去游览了长城。到我们这里，夫人总是单独活动的。只是去看《天鹅湖》的时候才一起去。这合适吗？不应当把尼克松的随从人员安排进宾馆。在那里住安德罗波夫盯不住他们。应该把他们都安排在列宁山上的单独住所去。这样同外界的接触也将少一些。在机场的欢迎仪式。通常在我们这里是挥舞小旗子高喊‘友谊’。现在这不合适。但也不能完全默不作声。要训练五六个孩子，让他们用英语对总统随便说点儿什么，比方说，祝谈判取得成功……”

波德戈尔内建议让尼克松去欣赏奥西波夫管弦乐团和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演出。

勃列日涅夫摆摆手说：

“这不是我们能引以为荣的东西。”

苏斯洛夫建议带他们去看看钻石展览。

"这不行！我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在伊朗看到过这种展览。比起他们来我们的宝石资源简直就少得可怜。"

波德戈尔内建议不在机场，而是晚些时候在克里姆林宫向尼克松介绍外交团。勃列日涅夫不喜欢这个主意。

"那机场就显得空荡荡的。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瞧周恩来：穿着肥大的裤子就来了，皱着眉头在机场里带引着尼克松。这不合适。我们是讲文化的人……"

同尼克松的谈判也非比寻常。苏联领导人有意谈到了越南战争——他们要使自己国内的人得出印象，要向中央委员会证明，他们是坚持原则立场的。而且把谈话的音调也提得很高。波德戈尔内说：

"你们是杀人犯，在你们的手上沾满了老人、妇女和儿童的血。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但是，在这个话题结束之后，马上改变了口气，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去吃晚饭，大家一起使劲地喝酒。美国总统从桌子后面站起来都有点困难了。

维克托·苏霍德列夫讲，在单独交谈中，列昂尼德·伊里奇对尼克松说，想和他建立私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讲，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代表教会了他这个。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尼克松说他指的是谁，而他对苏霍德列夫说这个人就是莫洛托夫。勃列日涅夫进行谈判没有带葛罗米柯，他自己的身体状态还很好。尼克松邀请勃列日涅夫进行回访。

勃列日涅夫出发去美国前，曾折磨过赫鲁晓夫的那种忐忑不安也折磨着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最担心的也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中人们会平等地对待他吗？

原政治局委员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回忆了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是如何作《国际形势和苏共的对外政策》的报告的。这是去同尼克松谈判之前。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他也得到了支持。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请记住，你在自己最艰难、最重要的工作中有我们我们与你在一起。你有人民的肩膀可依靠，有我们的党和苏军作支撑!”

也像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访美后，对美国的印象极为深刻。勃列日涅夫想创造条件，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况且，美国人善意地接待了他，还送给了他一辆“林肯”汽车。美国政府没有资金买这么贵重的汽车，是要几个商人凑钱买的，以便加强同俄国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美国的举止既自信又随便。因为他没带夫人，他专机上的女乘务员陪他度过了两天。勃列日涅夫甚至还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她，总统毫不在意，只是有礼貌地微笑了一下。

在同尼克松吃晚饭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晚饭时，喝下了一瓶美国总统特意准备的“首都”牌伏特加酒，勃列日涅夫抱怨说，在裁军和同美国建立良好关系问题上他要说服领导层的同事们很难——尤其是对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这不仅可以看作是真诚的表现，表示想说明克里姆林宫情况的意愿，也可以看作是耍花招：我举双手“赞成”，但不是我一个人决定得了的……

在尼克松的到访和对美国的回访之后，勃列日涅夫认为自己是一个把缓和变成了现实的人。他很喜欢西方报刊把他写成和平的缔造者、大政治活动家。他的确对政策做了某些改变，比如减少了对越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

政治局委员们把缓和仅仅理解成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巧妙的一步，而勃列日涅夫在出国并同著名的世界政治家会晤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边搞外交的人——顾问和助手也对他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的真正的第一次西方之旅是 1971 年去法国。他做了认真的准备，否定了外交部给准备的讲话稿，要求挑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话，他说：

“在前线我们就曾梦想，在炮轰停止的那一天可以前往巴黎，登上艾菲尔铁塔，从那里宣告，让各处都能听到：这一切都结束

了，永远地结束了！……应当深刻地写下这一点。还不单单是写和说，而是要做……”

勃列日涅夫还迫使军人同意限制核武器。总书记的国际事务助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描述了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把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领导人召集到他在老广场党中央的办公室里去的。一起讨论同美国的条约草案。军人们断然拒绝了对美国人的让步，尽管他们也采取了某些迎合的行动。争论进行了5个小时，最后勃列日涅夫忍不住了：

“好吧，我们不做任何让步，也不签订协议，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你们能给我这个国家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个明确的保证吗？说我们一定会超过美国，我们之间的力量对比要比现在对我们更有利。

出席者谁也不敢作这样的保证：

“这是怎么回事呢？”——勃列日涅夫紧逼着说道，——“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消耗我们的经济，不断地增加军事开支？”

勃列日涅夫是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主要推动者。准备工作进行了好几年。对苏联而言，主要目的是要承认战后的边界。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言，是捍卫人权和自由。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谈判进行了两年。读了最后决议的草案之后，政治局成员们宣称，不应签署这样的东西——西方会开始指示我们该怎么做和怎么做。

但葛罗米柯知道，勃列日涅夫想去参加这次会议，就昧着良心说，可以不去关注达成协议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自己家里是主人。我们只做我们认为需要做的。”

勃列日涅夫获得了去赫尔辛基的机会，并签署了历史性的文件。葛罗米柯说的和做的只是为了尽力取悦于勃列日涅夫。

去民主德国时，勃列日涅夫要访问汉堡。他的胸前挂了很多“金星”勋章，这令西德人非常惊奇。大使法林劝他，哪怕是暂时摘下勋章：

“列昂尼德·伊里奇，汉堡人是个有独特习俗的民族。他们不重视勋章。您看注意一下这个传统是否更合适?”

勃列日涅夫征求葛罗米柯的意见。部长嘟哝道：

“他们有自己的传统，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列昂尼德，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展示自己理应得到的奖章呢?”

列昂尼德·伊里奇没有忘记这位忠实的战友。葛罗米柯获得了七枚列宁勋章，比维辛斯基多一枚。1969 年，快到六十岁时，勃列日涅夫给了他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快到七十岁的时候，葛罗米柯获得了第二颗“星”。

但是，总书记到国外出访的积极动机很快就消失了。其他政治局委员们即不如赫鲁晓夫那样开放，也不如勃列日涅夫那样易于流露感情，他们这些人，还有党的机关中所有持批评态度的人还是把美国看作敌人。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说，在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在扎维多沃给勃列日涅夫起草总结报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加勒比海危机：

“尼基塔想哄骗美国人。他在中央主席团上叫嚷：‘我们可以用导弹射中华盛顿的苍蝇!’傻瓜弗罗尔·科兹洛夫附和他说：‘我们能用手枪顶住美国人的太阳穴!’结果呢? 耻辱! 差点儿没有面临核战争。然后不得不花多少力量让美国人相信，我们真的是要和平。我真诚地想要和平，无论如何也不会退缩。但是这条路线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

总书记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表示不同意：

“您怎么啦，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国有 2.5 亿人口，他们中可能有人不赞同。值得为这个不安吗?”

勃列日涅夫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你别绕弯子了，安德留沙。因为，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不赞同的人不在 2.5 亿人中，而在克里姆林宫。他们不是来自州委员会的宣传员，而是像我这样的人。只是他们看法不一样!”

然而，也不应过高估计勃列日涅夫明智地地评价在苏联境外所

发生的事情的能力。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回忆了1976年秋天同他的一次单独交谈，当时美国正处于总统竞选的最紧张时期。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杰拉尔德·福特没有把“为和平而奋斗”作为自己竞选运动的旗帜，如果把这作为旗帜就能让“所有正直的美国人”都支持他。多勃雷宁想对他讲讲美国人的情绪，但没有成功。勃列日涅夫仍然是意识形态的教条的俘虏。

勃列日涅夫想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羡慕它的成就，但他相信，早晚社会主义会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胜。

是间谍，还是外交官？

1970年，在联邦德国，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政府掌握了政权。右翼、基督教民主党在战后首次丧失了政权。

新政府由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领导。与总理岗位上自己的前任不同，勃兰特是一位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从纳粹德国跑出来，侨居国外，在挪威度过了战争。勃兰特有神奇的、迷人的微笑。据说，脸是心灵的镜子。这完全适合勃兰特。他一生都在政治中度过的，而且一直都是个品行端正、坦白诚恳的人，厚颜无耻他是不会的。甚至在他身上还保留了某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在20世纪30年代盖世太保追捕过这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想把他送到集中营去。战后德国新纳粹要求枪毙他。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把总理称为民族利益的背叛者。苏联报纸一开始就把勃兰特称做社会主义背叛者。

勃兰特做了他的前任不想做的事情。为了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划上句号，他去了波兰。勃兰特承认存在着第二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使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因此，在1971年，勃兰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在勃兰特访问华沙期间，突然在华沙被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前

跪下，这让各个国家的人们都深感震惊。这不是计划好的姿态。这是内心情感的涌动。他后来写道，“面对着德国历史的深渊，在对数百万被杀害者的记忆的沉重压力下，我做了当人们不能用语言表达时要做的事。”他本人是用不着道歉的。勃兰特代那些应该道歉但不想道歉的人这么做了。

在他周围也有这样的人。在勃兰特组建的第一届政府中，外交部长兼副总理是瓦尔特·谢尔。晚些时候，他被选为西德总统。谢尔和妻子从各个不同的国家领养了几个深肤色的孩子。他想证明，对于一个有正常心理、对世界有正常看法的人来说，人不是按民族或种族原则来划分的。

根据一些迹象可以看出，勃兰特打算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给自己的真正对手——苏联政府首脑柯西金写了一封信。勃兰特用外交方式暗示，他想同莫斯科建立联系。

而随后开始了最有趣的事情。不久前，原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的军官透露了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秘密的一面。主要的讲述人是原克格勃将军维亚切斯拉夫·叶尔万多维奇·克沃尔科夫。他写了一本题名《秘密通道：莫斯科、克格勃和波恩的东方政策》的书。

克沃尔科夫将军在莫斯科的新闻界中是一个知名的人。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管理总局（反间谍机关）工作了很多年，后来去了第五局，领导一个部门，该部门是监视在苏联的外国记者的工作的。他是一个活泼、好接触的人，同很多写东西的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他和尤利安·谢苗诺夫很要好。谢苗诺夫甚至在小说《塔斯社受权宣布》中把他作为主角之一。斯拉温将军——在书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中就是斯拉瓦，就是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一个超级勇敢和智慧的人。

克沃尔科夫住在莫斯科近郊的佩列杰尔基诺镇的作家新村，他在那里买了半套别墅。别墅的另一半属于他的朋友——摄影记者尤里·科罗廖夫，此人在1955年遭到抢劫，刚好在前往佩列杰尔基诺镇的途中被打死。在离克沃尔科夫的别墅不远处还住着他的另一

个朋友——情报局的同事瓦列里·列德涅夫和他的妻子。列德涅夫的妻子在讽刺剧院当演员，在著名的电视剧《十三把小椅子的小酒馆》扮演过角色。

列德涅夫一生都打着新闻工作者的幌子工作。他是报纸《苏联文化》国际部的主编。这份报纸不是主要报纸，国际部也不是报纸内部的主要部门，连他的不知情的同事都奇怪，他怎么经常去德国，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事。列德涅夫和克沃尔科夫去德国是办情报机关的事情。

用克沃尔科夫将军的话讲，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勃兰特执政后立即命令自己的肃反工作人员同波恩建立秘密的联络通道。从德国方面讲，勃兰特最亲密的助手、联邦总理的管理机关中的任副部长的埃贡·巴尔成了他的对手。从莫斯科方面来讲，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和瓦列里·列德涅夫是联络员。从原则上讲，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时，政治家不喜欢通过古板的、慢条斯理的外交官进行礼仪性的交往，他们想加快事情的进度，直接进行联系，那么他们就得求助于情报员。

用克沃尔科夫的话来讲，苏联和西德接近的所有工作都是克格勃完成的。外交部和苏联的主要外交家葛罗米柯只是妨碍情报人员的工作。但是，那些负责同西德搞关系的苏联外交官总是用讽刺口吻谈论原情报人员透露的耸人听闻的情况。外交官们说，同勃兰特建立关系、同联邦德国进行谈判的所有准备工作，毕竟还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完成的，而不是情报人员干的。

葛罗米柯本人曾十五次同勃兰特的外交顾问埃贡·巴尔会晤，同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也见了这么多次面。埃贡·巴尔后来讲到，葛罗米柯认识勃兰特——还是在勃兰特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但当时已经很清楚了，他可能会主持政府工作。会晤是在纽约，在召开联合国大会时进行的。德国通讯社的记者转给了巴尔一张字条，内容如下："苏联使馆的新闻专员通知我，如果勃兰特先生希望同葛罗米柯先生会谈，请给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一步。比较重要的人物希望会见并“试探”新的著名政治家，是应当通过一个次要的人物来转达要求接见的愿望的。关于葛罗米柯，埃贡·巴尔写道：“我对这个好像总是在工作的人产生了同情感，工作把这个人都围起来了。作为他的事业的能手，他当然可以让自己即使是干巴巴地，但也闲谈几句，不过他不喜欢这些‘谈细小事情的谈话’……”

总理本人说，“我认为葛罗米柯是一个比传说中的无比刻薄的‘不先生’更令人喜爱的交谈者。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礼貌的、沉着冷静的人，有着讨人喜欢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稳重。”

勃兰特是在拿他的政治仕途押宝，为的是在俄国人和德国人、在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在德国人和东欧人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尽管挨他很多同胞的咒骂，他还是去了莫斯科，用书面的形式确认，战争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德国人不会觊觎他们 1945 年失去的领土。

1970 年 8 月 12 日，勃兰特和柯西金签署了莫斯科协议。联邦德国和苏联承认战后边界的不可破坏性，并就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战后的欧洲一直生活在面对苏联坦克的恐惧之中。勃兰特签署的莫斯科协议让欧洲人放下心来。莫斯科在确信联邦德国不准备进行军事报复后，也略微放心了。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使得欧洲的生活更加平静、更加理性了。

但是，同德国人的协议在开始时却引起了苏联人的恐惧。勃列日涅夫半开玩笑地给外交部的德国问题专家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打电话：

“你干了什么？州委书记们都打来电话。在斯摩棱斯克、白俄罗斯和西乌拉尔人们在抢购盐、肥皂和火柴：‘同德国人签了协议，也就是说很快就要发生战争了。’”

很多党内官员都反对同西德建立密切的联系，尽管不敢公开说出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文学报》上刊登了一幅照片：勃列日涅夫、勃兰特及其夫人挽着胳臂站着，微笑着。谁需要这个，难道我们是这样的‘朋

友'，在我们的报刊上还要如此广为传播?"

而在西德，一些力量团结起来企图破坏这个协议。1972年春，莫斯科在焦急地等待，勃兰特能否使莫斯科协议获得参议院的批准——社会民主党人的票数不够。

克沃尔科夫将军写道，他在苏联情报机关的驻外机构里收到了装有一大笔德国马克的一只小皮箱，任务是把钱转给埃贡·巴尔以便收买反对派代表。克沃尔科夫写道，他没能成功地把钱给出去，他又把皮箱带回到了驻外情报机关。

但是，一个反对派代表还是投票赞成莫斯科协议。有人断言，他真的被收买了。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波恩的表决结果。它是在苏共中央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中央全会前夕进行的，勃列日涅夫明白，如果德国人否决了协议，那么在全会上就会有人说，如果帝国主义每一步都欺骗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缓和紧张局势呢？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所有努力都会成为泡影……

勃兰特的政治生涯恰恰毁在他提携起来的那些人的手里，这真对命运的可怕嘲弄。当查明他的私人顾问京特·吉奥姆为民主德国的情报机关工作时，他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情报人员喜欢讲自己组织的无所不能和情报机关所干的那些好事情。但奇怪的是，情报机关的功勋只有情报人员自己叙述。正如世界经验所表明的，情报机关只能是外交的辅助手段，仅此而已。可有的时候，如勃兰特事件，情报机关的巨大成功会使国家遭受了损失。

当勃兰特在参议院宣读辞职声明——因吉奥姆间谍事件而导致的辞职时，埃贡·巴尔哭了起来。他哭着，一点儿也没有由于周围的人和摄影记者而感到不好意思。他惋惜的不是他不得不离开政府。他惋惜的是勃兰特——一个生来就注定成为总理的人要离开活跃的政治舞台。

勃兰特离开之后，东德人向他进行了非正式的道歉：不是我们，而是俄国人迫使在您身边安插间谍。莫斯科也找到了进行道歉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这全是东德人干的。这些道歉让

勃兰特很开心。

赫尔穆特·施密特成了新总理，他对东德和苏联都采取较强硬的立场。

缓和的消退

1974年11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同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会晤时，发生了一件复杂的事情。同限制战略性武器相关的所有文件早就达成了协议。但福特突然提出要改变一些内容。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这些有利于美国人的修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因此而拒绝签署如此重要的文件。但勃列日涅夫不想承担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责任，根据党的传统他向政治局征求意见。更何况在同福特会晤前在莫斯科就有过激烈的辩论。

军人们论证说，如果在协议中不把布置在前沿基地上的美国的设施——在苏联周围基地上的导弹和飞机计算在内，就不要签订协议。鉴于这些导弹和飞机距苏联领土很近，它们是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武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签署了类似的协议，那么军人就可以不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了。

勃列日涅夫被激怒了：这个格列奇科竟敢指责总书记不顾祖国的利益？格列奇科后来打电话道歉。勃列日涅夫不满地回答说：

“这样是不行的。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别人是叛徒，却想不声不响地收回这些话。”

勃列日涅夫赢得了事先的争吵。但是现在，当他已经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候，出现了新的困难。在莫斯科职位最高的是波德戈尔内。他两个小时之后给勃列日涅夫回电话说，美国人的提议完全不能接受。波德戈尔内建议把会晤推迟到下一年，在这段时间内可以对华盛顿施加压力。勃列日涅夫挂上话筒去和葛罗米柯商量。总书记犹豫不决。他不想中断同福特的会晤，但又不能与莫斯科的

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对着干。葛罗米柯非常坚定地反对推迟会晤，认为这会损害苏美关系，妨碍就战略性武器进行谈判的进程。

勃列日涅夫又坐下打电话，他同柯西金、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谈了以后，再给波德戈尔内打电话。波德戈尔内仍坚持自己的立场，还把完全不想同美国人谈判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到了电话旁。

这下勃列日涅夫可发火了。他对波德戈尔内说：

“好吧，既然你坚持，那我现在就向福特宣布停止会晤，我回莫斯科。我们召开政治局会议，我和葛罗米柯一起将在发言，让大家评判我们吧。”

波德戈尔内害怕了，他后退了。他马上说，他勃列日涅夫对怎样同美国人打交道在当场看得更清楚，而政治局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决定的。勃列日涅夫又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但这些争论让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谈判时他出现了脑血管痉挛。

在同福特会晤结束后，脑血液循环已经被严重破坏。勃列日涅夫明显地衰弱了。瓦连京·法林写道，他的眼睛开始显得凶狠、多疑，他失去了幽默。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能记住重要的细节，有一次在谈判中他开始临时现编。因此就确定了这样一种做法：由勃列日涅夫宣读准备好的声明，然后由葛罗米柯去同对方进行讨论。

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不能进行重大谈判了。他宣读准备好的文本，对外国对手的答复不太感兴趣。他将谈判转托给葛罗米柯说：

“好了，安德烈，你来谈。”

葛罗米柯也就接着与对方进行对话。

勃列日涅夫由于出现了说话困难而感到很烦恼。谈判之后他对葛罗米柯说：

“安德烈，我认为我今天说得不好……”

葛罗米柯很警惕：

“不，不，列昂尼德。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说得恰到好处

……”

弗拉基米尔·斯图皮申大使回忆了1979年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来莫斯科的情景。他知道勃列日涅夫的嗜好，给他带了两辆吉普车型的小轿车做礼物。在谈判时，勃列日涅夫按书面材料读完了所有的内容并不断地问自己身旁的柯西金和葛罗米柯：

“怎么样，阿列克谢，我读得好吗？”

“好，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怎么样，安德烈，我读得好吗？”

“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

只有一次，勃列日涅夫突然抬起头，出人意料地对法国总统说：

“我们是在钵子里捣水白费劲吧？我们在谈裁军。这尽是些空话，因为你们不想进行任何裁军。”

德斯坦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谈判又回到了原来的、有分寸的轨道上。

勃列日涅夫越来越依靠自己的部长。当驻联邦德国大使法林在同勃列日涅夫交谈中提点什么建议时，他都总是问：

“葛罗米柯是怎么想的？”

法林说：

“部长当然了解。但部长对不符合他自己观点的东西不加考虑。”

对这一点勃列日涅夫通常回答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你去说服葛罗米柯，你去做吧。”

“我不去日本”

1973年4月，葛罗米柯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一起当选）。在选进政治局之前，葛

罗米柯是以最重要的，但又是下属的外交工作人员的身份讲话的。现在，他逐渐成了几乎是对外政策的惟一创作者了。

部长觉得自己几乎成了无可置疑的权威了，十分满意自己的工作。

在对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时，他说：

"瞧瞧，同志们，前不久，我们在采取什么外交步骤之前还不得不在政治局衡量一下，看看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法国会做什么等等。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认为，为了苏联的利益什么是必须做的，我们就去做。它们喊什么也不管用，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它们再也不敢乱动了。我们成了真正的伟大强国……"

在外交事务上，最终的发言权属于葛罗米柯。只有在军人反对的情况下他才让步。他不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他的继任者乌斯季诺夫争论。用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院士的话说，乌斯季诺夫是一个有势力、性格坚毅的人（对所有地位比他低的人甚至放肆无礼），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他。葛罗米柯本人也是一个性格坚毅的人，在他面前大家几乎也都显得十分胆怯。当谈到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时，他用他的方式来帮助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讲完后，国防部长接着说，他还需要多少武器来抗击美国人。军人想要美国有的那么多的武器，还要加上那么多的武器，以准备能同时在几个方面作战。这也就把国家搞垮了。

当时，葛罗米柯希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他对自己的儿子说：

"美国是个总想搞出点什么鬼名堂来得罪我们和我们的盟友的国家。"

葛罗米柯记得，战时苏联和美国是盟友。那是两国关系成功的时刻，当时他还是个青年。

葛罗米柯喜欢美国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自认为是个美国通。而且他认为，西方可能会开始对苏联发动核战争，对此应当加以阻止。他是限制和裁减军备以及和平共处的忠实拥护者。在他任职时

出现了缓和，不过也是在他任职期内缓和凋萎了。

反对军备竞赛的斗争，在开始时纯粹是一种宣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开始带来好处了。要知道，开始时外交官是为军人的需要服务的——他们想要阻止敌人发展对方已经改进了的那些类型的武器。

葛罗米柯对去华盛顿的多勃雷宁说：

“喂，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到我这里来聊聊你今后的工作。”

部长给了大使一个意外的忠告：

“我要对你说的是，我们政治局在苏美关系问题上没有固定的一致观点和意见。很遗憾，我的大多数同事都不了解美国，没有在那儿呆过，不清楚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相应地，由于‘冷战’气氛，他们倾向于对抗的思维，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回击’美国人。因此，对大使来讲，向莫斯科汇报由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引起的‘轰动新闻’比较简单。这是容易做到的，但它严重地妨碍外交部按计划进行的工作。要大胆地、以充分的论据来支持能够改善和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一切。应该逐渐地确立这样一种思想，即在寻求协商的过程中，不仅有对立和斗争，合作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葛罗米柯感兴趣的只有美国、欧洲大国和联合国。对葛罗米柯来讲，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实际上都不存在。他对第三世界国家不感兴趣。他没把它们看成是重要的伙伴。他只去了一次印度，还几乎是被迫的。

“他认为，第三世界，这纯粹是麻烦，”——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讲，——“这是他亲自对我说的。”

之所以有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负责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工作的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外交部。派到那里去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原来的党的书记。葛罗米柯对东方和阿拉伯世界也不感兴趣。因此他把这些地区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该部很多年

来一直由中央书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负责——早在共产国际工作时他就开始了这一工作。然而，部长没有让波诺马廖夫的人插手美国和欧洲的事务。这种竞争因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之间不好的关系而不断加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讲了这样一个片段。波诺马廖夫走进即将举行什么谈判的房间，他看见主席位置的右侧放着葛罗米柯的公文夹。波诺马廖夫把它推开并放上了自己的公文夹，以便自己同主人坐在一起。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在 1975 年 12 月底，在扎维多沃正在起草总书记的例行讲话，葛罗米柯来了。他和勃列日涅夫谈了三个小时。大家都认为部长是来祝寿的——第二天，2 月 19 日，列昂尼德·伊里奇将满 69 岁。但早上，勃列日涅夫在吃早餐时说：

"葛罗米柯请求不去日本。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他应该在 1 月初去日本。我同意了：当然，他不愿意因为要进行出访准备而使他过不好新年，而且这次访问任务艰巨。是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们想要岛屿，我们不给。所以反正都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去或不去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事务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真的极端震怒：

"这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不是一个严肃的国家吗？我们不应该遵守诺言吗？还是我们不在乎？我们都答应四次了，日本人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访问的消息。我们不应该考虑他们的威信吗？还是我们完全想把他们让给中国人？您看到了吗，葛罗米柯是不想错过新年。政治局的决议对他来讲什么也不值！他来请假！您做得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没有料到会受到攻击，无力地为自己辩护：

"他要求，我就同意了……"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是一个干巴巴的人，但忠实于事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您同意就不对。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年去了五次日本。也好像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而我们的葛罗米柯去了比利时、意大利、法国，也许还有什么地方。真要做复杂工作的时候，他却‘不想毁了新年’。应该和日本人谈谈。哪怕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能给他们。但应该进行谈判，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这是一个极有影响的国家，它也想同我们打交道。对此应该珍惜，应该考虑。外交的意义就在于此。”

总书记的其他助手也支持亚历山德罗夫。勃列日涅夫想换个话题。但没换成。他沉下脸来，把餐巾扔下了说：

“你们可给我准备了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

列昂尼德·伊里奇走了，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看了看亚历山德罗夫：

“与葛罗米柯谈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对他说了让他去日本。”

对第三世界缺乏兴趣，是苏联近东政策失败的一个原因。在1967年发生的以以色列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的六天战争之后，政治局决定同犹太国家断绝关系。阿拉伯国家非常欢迎这个决定，而且他们得到了加倍的苏联武器。似乎，苏联在阿拉伯的东方获得了一些永久的朋友。但很快就弄清楚了，苏联不可能在近东起关键作用，因为，没有同以色列建立关系。各国都需要的调解人的角色落到了美国的手里。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支走了苏联的军事顾问，转向了美国，并在美国的帮助下同以色列签订了和约。

在莫斯科有人明白，是我们自己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地位。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写道，1973年叙利亚总统哈非兹·阿萨德在战争爆发前四天通知苏联领导人：他要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他和“萨达特兄弟”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达成了协议。勃列日涅夫对阿萨德总统的答复是，他走的是很冒险的一步，而结果可能是同叙利亚所期待的是不同的。当时阿萨德下令让苏联军事专家撤走，不

让他们起干扰作用。对叙利亚来讲，十月战争又一次以惨败告终。苏联进行了干预，才使叙利亚没有被完全摧毁。十月战争后勃列日涅夫对葛罗米柯说：

“我们应参加谈判，要保证以色列的边界。在适当的时候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部长指出：

“阿拉伯人会生气，会大做文章的。”

勃列日涅夫骂了一句：

“去他妈的吧！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建议他们走理性道路。不行，他们想要打仗。请吧：我们给他们提供最新技术装备——越南都没有这种装备。他们在坦克和航空方面有一倍的优势，炮兵是两倍的优势。而在防空和反坦克手段方面——占绝对优势。怎么样了？又被打垮了。又是他们逃跑。又豪哭着让我们救他们。萨达特在夜里两次把我弄醒去接电话。他要求我派空降兵。我们不会为他们打仗的。更不打算因为他们开始世界大战……”

但是政治局不敢如此彻底地改变近东的政策，尽管阿拉伯兄弟一点儿也瞧不起苏联政治家。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 1974 年他是怎样借助于“穿梭外交”，也就是如何从大马士革飞到耶路撒冷，成功地签署了叙利亚军队和以色列军队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的协议的。在基辛格和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结束了文件签署工作的当天，葛罗米柯飞到了大马士革。“晚上九点，他的飞机已经飞临大马士革上空，”——基辛格不无高兴地回忆说，——“在这时是我和阿萨德工作最紧张的时刻。叙利亚空军参谋长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安排妥善。结果是葛罗米柯的飞机开始在城市上空盘旋。过了四十五分钟，在飞机的燃料快用完了的时候，我发慈悲同意他的飞机着陆，条件是要让他的飞机离我的飞机远点儿。苏联部长的飞机被赶到机场的一个又远又暗的角落，叙利亚的外交部副部长在那里欢迎他，因为叙利亚的所有高层领导人都在和我谈判。”

通常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不完全如此。在伊拉克，共产党人遭到杀害，而莫斯科却保持沉默，目的是不同伊拉克争吵。霍梅尼在伊朗掌权后，消灭了亲苏的伊朗人民党。为了不激怒霍梅尼，莫斯科保持了沉默。

西方外交官多次想同葛罗米柯讨论由波尔布特执政、血流成河的柬埔寨的局势。部长刻板地回答说：

“我们同这个国家有正常的关系，可我们并不掌握任何能够证实你们情报的信息。”

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引发了反苏浪潮。当葛罗米柯去西方时，记者问他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情况。

“审判？什么审判？”——外长把手放到耳边重又问道。

然后回答：

“我不想讨论这些事情。”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是位有良心的人，他经常说，苏联应当尊重人权。葛罗米柯不理会他的话，转而谈大政治问题。有一次在同葛罗米柯交谈时，卡特谈起了在莫斯科被捕的、曾获准去以色列的阿纳托利·夏兰斯基。不仅不放他，而且还作为美国的间谍被关了起来。

葛罗米柯不解地问总统：

“谁是夏兰斯基？”

卡特惊呆了，他换了一个话题。出席会谈的多勃雷宁大使想：部长是多么机敏地避开了令人不愉快的谈话啊。当会谈结束时，他们上了车，葛罗米柯困惑地问多勃雷宁：

“这个夏兰斯基究竟是什么人？”

他真的根本不想了解任何这方面的事，他吩咐助手不要把保卫人权题目的简报放到他的桌子上。

挤干柠檬汁的技巧

毅力、罕见的工作能力、惊人的记忆力、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一切帮助葛罗米柯当上了部长。但是他是在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从莫洛托夫那里他学会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愿意领悟和考虑谈判对手的观点。这妨碍了他的发展。

葛罗米柯是一个善于掩盖自己想法和情绪的演员。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他的感情会战胜理智。也有一些让葛罗米柯发火的人。瓦连京·法林回忆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布朗企图与同行建立非正式关系，早饭时，他以最随便的方式对葛罗米柯说：

“安德鲁什卡!”

葛罗米柯用冷冰冰的语气纠正他：

“如果您想以非正式的、同时又是礼貌的方式同我打交道，那就应当说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

显然，那个人记不住他的名字和父称，这更增强了葛罗米柯对这个英国人的不喜欢，英国大臣理顺关系的全部企图就成了泡影。英国人都感到同葛罗米柯打交道很难。英国外交官回忆说，苏联的部长可以几个小时地进行毫无结果的会谈。

另一位英国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有一次甚至想用这样的话打断葛罗米柯：说他非常了解《真理报》最近几篇社论的内容，浪费宝贵的时间转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但葛罗米柯继续长篇大论地宣传苏联外交政策的爱好和平的精神。道格拉斯—霍姆提议宣布休会。然后，两个部长单独会晤，只有那时交谈才具有更多的事务性质。

葛罗米柯高度重视准备工作——挑选谈判的材料，他认为要想在谈判中应付自如，这必须亲自去做。部长不怕干烦琐的工作，所以他比准备不足、经验不够的外交官占有优势。在外交中他不允许

即兴发挥，尽管即兴发挥是外交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在“冷战”时期即兴发挥是危险的事。

大自然赐予他健康的体魄，使他能够经得起沉重的工作负担，特别是在国外访问期间。在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他一天要同各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进行几次会晤，总是能鼓足了劲准备进行辩论。

葛罗米柯的责任感非常强。有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他晕倒了。部长只是中暑了。纽约很热，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穿得很厚，甚至在夏天还穿长衬裤。当时还没有大功率的空调。警卫把他从会议厅带走了。部长醒过来后，尽管助手反对，他还是要回到会议大厅作完发言。人们对他热烈欢呼。

苏霍德列夫回忆说，葛罗米柯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进行谈判，什么也不会漏掉，什么也不会忘记。葛罗米柯面前摆着装有上级指示的公文夹，但他从来不打开它。他用蓝铅笔作标注。如果谈到有大量的数字和技术细节的复杂的裁军事宜，那他只关注数字，其余的全部都记在脑子里，尽管他的同行，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都很沉着地翻厚厚的公文夹，并宣读最重要的内容。

葛罗米柯认真地研究自己未来的谈判对手，读他的简历，试图领会他的谈判手法，向我们的大使详细地打听这个人。

他具有罕见的记忆力。比如说，他会突然询问一下两个月以前的某件事，而他的助手和副手常常处于难堪的境地，因为他们回忆不起那时发生了什么。当出现问题时，他马上会在外交史中找类似的事件。如果找到了，那么就知道了该如何解决新问题。葛罗米柯说：“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不同的，但如果外交官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他的记性不好，那就糟糕了。不要抱怨自己的记性，而是锻炼它、发展它，这是比较明智的办法。”

葛罗米柯明白，说错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好的外交官和不好及平庸的外交官的差别就是善于准确地表达。所有最重要的文件都经葛罗米柯之手。外交官们常常对他修改的准确性感到惊讶，他能感觉到最细微的差别。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英语很好，但一定要翻译。葛罗米柯的奥秘就是他可以得到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在译员进行翻译时他在考虑怎么答复。

葛罗米柯认真地听译员是怎么翻译他的话的，会纠正译员——甚至是苏霍德列夫本人的错误。翻译得不准确会令他很生气。

他的对手也评价说，他的“是”也像他的“不”一样是如此地可信。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对儿子说：

“记住外交的金科玉律——在进行谈判时，想一下子解决问题，立即向对方摊开所有的牌是绝对不容许的。很多政治家都觉得，只要令人信服地表述出了自己的提议，显示了真诚和合作的愿望，就一切都成了。这是错觉!”

部长教导外交部的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在谈判中获得了成功，不要急于喊成绩，尽管荣誉属于你们。你们要这样做，使条约的缔结成为最高当局的功绩。

在“内政”中，也就是同上司的关系中的随机应变和外交上的不让步在他身上惊人地结合在了一起。格里涅夫斯基大使回忆说，葛罗米柯发展了这一战略。他总结了三条超级大国外交的金科玉律。

第一，要最大限度地提一切要求，不要不好意思提出要求。要要求得到从来不属于您的东西。

第二，要发最后通牒。不要吝惜威胁，但要把谈判作为摆脱所出现的局势的出路。在西方总是有人吃这一套。

第三，开始谈判后，不要作丝毫的让步。他们自己会提出满足你们的部分要求。但是这时候你们不要同意，而要索取更多。他们是会同意的。当你们获得了你们所没有的东西的一半或2/3时，那么你们就可以自认为是个外交官了。

在西方外交官对葛罗米柯没有了解透之前，葛罗米柯的这套法则常起作用。葛罗米柯有一个很强的对手——亨利·基辛格，他开

始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后来成了美国国务卿。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希望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载入史册。他想让人们把他本人看成是外交问题的关键人物。他果断地，有时简直就是侮辱性地不让国务院和罗杰斯国务卿参与外交政策的决策。所有必须慎重对待的谈判，总统都委托给自己的助手，他认为这个说话还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的人（基辛格出生在德国，在孩提时代他就被带到了美国）不可能同他竞争。但与尼克松预期的相反，亨利·基辛格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他善于同苏联领导人建立事务性的关系。葛罗米柯有时称基辛格是“魔鬼”，但对他却很认真，相信他作出的承诺是算数的。

有时谈判在极为奇特的条件下进行。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回忆说，在基辛格来到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建议去打野猪。国务卿还没开枪，勃列日涅夫就打倒了一只和打伤了一只。看守猎场的人跟在后面追。勃列日涅夫、基辛格和苏霍德列夫落在了后面。苏霍德列夫从包中取出了食品：白的长面包、黑面包、香肠、乳酪、黄瓜、西红柿和一瓶“首都”牌伏特加。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说：

“亨利，我们开始吧？不要没事干坐着——拿刀切香肠。”

苏霍德列夫翻译完了，基辛格拿起了刀。他们三个喝了一瓶酒，谈到了最重要的话题——关于同中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要求回答：美国人同中国结盟是否是针对苏联的？

基辛格高度评价葛罗米柯，称他为外交能手。

苏联部长不信走运出现的灵感或是高超的手腕。这与他天生的小心谨慎是相矛盾的。他是个孜孜不倦和不动声色的人。如果他生气了，那也意味着他的突然发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本质之前，葛罗米柯从来不参加谈判。基辛格承认，不对文件进行详细的研究就同他进行谈判，那就等于是自杀。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培养了整整一批谈判代表，他们在这种对外交官来讲最艰难的事情上表现出了高超的职业技能。参加葛罗

米柯主持的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比较年轻的外交官跟在自己的部长后面记下了一些巧妙的步骤和恰当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措辞。他善于用不大的让步换取重大的让步，他利用自己伙伴的急躁心情，把他们折磨得疲惫不堪，最后取得他们的同意。他从容不迫，好像他永远是部长。

葛罗米柯的忍耐是无限的。他努力要把对手折磨得筋疲力尽，他对每一个问题都要讨价还价，只有在确信柠檬已经被挤干了，他才转到下一个问题。他善于积小胜为大胜。

基辛格指出，葛罗米柯开始时总是采取坚如磐石的立场。这是打扑克的主要规则——在不知道对方的牌之前不亮自己的牌。不管葛罗米柯受权讨论什么样的提案，他在初次会晤时总是重复原先的立场和原先的反对意见。在第二阶段，葛罗米柯不依不饶地逐一指出美国人以前提出的所有没有根据的要求。然后他大谈他自己政府的忍耐性和宽宏大量。这是序曲——就这一部分来看他是个技艺高超的人。他依靠的是自己对手的不耐烦，只有当失望的对手准备站起来中断谈判的时候，他才作出让步。

用基辛格的话说，同苏联外交官的谈判变成了对忍耐性的考验。在苏联对手自己不相信、也不能让自己的莫斯科长官们相信另一方已经用尽了自己的灵活性之前，不要期待他们会让步。

葛罗米柯可以几个小时地逼迫会谈者作出最为微小的让步。苏霍德列夫说，他几乎总是能够成功做到由他来说最后的话。不过，基辛格没有向他让步，他也想做到用他的话来结束会晤。所以，他们的会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结束。

在结束会谈时葛罗米柯说：

“好吧，回到莫斯科后，我可以向苏联领导人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汇报说，美国方面认为……”

于是，他就开始复述美国的立场，略微玩弄一下文字游戏，使美国的立场同自己的立场接近一点儿。没有经验的谈判对手不知道该怎么办：葛罗米柯似乎只是在重复他们的话，而实际上已轻微地

移动了他们的立场。在下一次，他继续进一步挤压，推开已经达成的协议。正如英国的一份报纸所写的，他进行谈判的方式很像是钻牙机：它是很有穿透力的，连续不断的、很痛苦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策略开始转过来对付葛罗米柯本人了。外国的外交官们最后也明白了，如果表现出足够的耐力，那么也可以迫使葛罗米柯本人作出让步。如果谈判拖得时间很长，那么葛罗米柯就会急于尽快签订协议。他担心，如果对手在最后的时刻同他开一个恶毒的玩笑，拒绝已经取得的成果，那时他就不得不为谈判的失败而负责。

葛罗米柯非常准确地履行政治局的指示，而政治局的指示实际上是他自己为自己制订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批准部长写好的东西。但是，就连政治局的指示往往也事先规定了让步、妥协的可能性，以便获得对方作为交换的让步。但葛罗米柯总是病态式地不喜欢转而采用备用的方案。尽管他可以在不超出指示范围的情况下做某些让步，而且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多勃雷宁讲了他是怎样向葛罗米柯提建议的：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启用备用方案吧，我觉得基辛格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光感觉是不够的，您能向我保证他会同意吗？”

他没有必要地耽搁了事情，错过了在有利的条件下签订协议的机会，失去了合适的时机。结果华盛顿出现了一位新总统，就不得不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签订协议。

有时，部长故意作出很严厉、不妥协的样子，他是担心政治局的同志指责他对阶级敌人软弱。有时他埋头做事，他向勃列日涅夫保证他会获得比可能获得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当谈判险些儿告吹时，葛罗米柯本人就不得不作出某种重大牺牲。法林写道：“被赶到了角落（常常是自己把自己赶到角落）的他，不认为作出代价巨大的牺牲是不体面的事。”

他不够灵活。讨价还价——这是正确的，但应当知道分寸。拣

了芝麻，是可能丢掉西瓜的。

“第五号问题”

在基辛格之后任国务卿的是赛勒斯·万斯——此前他曾是国防部的首席顾问、国防部副部长、林登·约汉逊总统的班子中协调内外危机处理的全权代表。

杜勃雷宁回忆说：“我不得不就柏林事件同国务卿万斯进行了大约 80 次会见。我们两个人都在重复着同样一些话，像放一张毫不新鲜的唱片一样，因为，所有的论据都用尽了。”

有一次，万斯说：

“我们就这么做吧！你来谈柏林问题，你就说，从我们所熟知的第五号问题开始。我就用第八号答案来回答。此后，我们就可以喝威士忌并各自回家。你回到大使馆，你那里所有的问题和答案都是现成的，你就可以向莫斯科报告会谈的情况，而我也以同样的精神向总统汇报……”

人们认为万斯古板、枯燥无味、谨小慎微和对小事过于认真。但他为人正直、有经验，很快就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他自称是个令人腻烦的人。这种性格在同葛罗米柯的谈判中倒是有好处。万斯的经历要比葛罗米柯艰难得多，因为葛罗米柯一生都在从事同一件事，所有的东西都在脑子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感觉自己要高美国外交官一筹，因为美国外交官每四年要换一次；新的班子不得不重新掌握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本领。

曾当过记者、后来也成了外交官的斯特劳布·塔尔博特写道，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以这样的一种架势来华盛顿与万斯会晤的，似乎他的词汇只是由“不”这个词的派生词组成的。甚至在经过长时间飞行后下榻苏联使馆睡过一夜之后，葛罗米柯总是不高兴，皱着眉头，显得气呼呼的。然后是午宴，这时谈判的参加者就

好像忘记了分歧一样。苏联的部长开始讲述自己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那段时间的事，大家都很喜欢。正如谈判的一位参加者所说的，“这是惟一的一次，我看到了葛罗米柯嘴上因不满意而出现的皱纹展平了。”

午宴之后，国务卿万斯在私人会谈中（只有翻译出席）对葛罗米柯说，如果在定于第二天举行的同卡特总统的会晤时，他已经忍耐了一整天的这种固执场面再重复，那么关于限制核武器的谈判马上就完了。当时葛罗米柯改变了态度。他宣布说，他有权作出一系列的妥协。万斯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谈判得到了挽救。

万斯很快明白了，应当怎样同葛罗米柯打交道，并向总统作了汇报。

“同俄国人可以很坦率地谈，但要在身边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那时他们会坦率地对您说：‘好吧，我们的问题在于……’这样您就会明白他们的难处，可以衡量一下，在你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时能否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在自己的所有同事都在场的情况下，俄国人根本就不能公开讨论这一切。这样讨论对他们是很危险的。”

万斯明白，应当回到秘密外交、秘密的渠道，回到远离新闻记者的会晤。基辛格很快就懂得了这一点，所以他与葛罗米柯的谈判很成功。

在高层会晤前夕，美国人尽量事先让苏联外交官了解他们的立场。苏联外交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美国人不抱怨。这不是礼貌，不过是一种策略手段：如果苏联代表团事先知道了它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它就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可能提早制订自己的让步。

美国的体制为即兴发挥留了很大的空间。美国总统可以比政治局更快地通过决定。美国国务卿完全可以使自己的提议获得总统的同意，而葛罗米柯必须要说服整个政治局。

关于限制和缩减核武器的谈判是极为复杂的事。军方——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反对任何限制，总是谴责自己的外交官，说他们

让对方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签署了文件。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在小圈子里讲了他是如何坚决提出就核问题同美国人谈判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美国人协商的念头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去谈判完全不是为了达成协议。他转向外交官补充说：

“如果谢苗诺夫打算达成什么协议，那就让他自己决定要到哪里去，是卢比扬卡，还是莫斯科军区的禁闭室。”

格列奇科元帅和葛罗米柯部长没有料到，在华盛顿也传出了类似的言论。美国的军人怀着毫不掩饰的仇恨说，亨利·基辛格“简直就受苏维埃支配”，他达成的协议是“对美国不利的闹剧”，“基辛格丧失了理智”，基辛格的主要反对者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当过足球运动员、摔跤运动员和飞行员。他反对同苏联进行任何协商并相当成功地妨碍了基辛格的行动。在 2001 年 1 月，拉姆斯菲尔德重新在小布什的政府中出任美国国防部长……

因为所有这些协议都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数字，因此争论就因数字而起。美国人每次都建议把双方拥有武器的所有资料都放到桌面上，只有那样才能达成协议。但是，苏联代表团的回答是它没有义务帮助美国的情报机关，断然拒绝提供有关自己武器的任何资料。此外，苏联的外交官说他们也不要美国人给他们提供美国武器的资料。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一切都在公开的刊物上公布了。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研究制订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美国人重新提出了交换资料的问题。苏联代表团团长、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生气地说：

“谁需要交换材料？你们国家有技术手段，所以你们什么都知道。美国人真的知道被禁止接近最高国家机密的苏联公民所不知道的很多东西。当美国人点出苏联外交官不应该知道的苏联武器的资料时，苏联的军事代表很不安。军人不能让外交官知道自己的秘密。在美国人那里一切正相反。”

当国务卿万斯 1977 年春天带着关于缩减战略武器的新建议飞

往莫斯科时，代表团的军事成员要求让他们熟悉一下这些建议。万斯让自己的助手把文件拿给军人看，但不是全部文件。备用方案对他们仍是秘密。美国人知道，葛罗米柯有时会凭自己的顽固劲儿迫使他们退向备用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要装作完全没有备用方案。

万斯的助手去美国大使馆，躲进所谓的保险库里——一个防止电子窃听的专门的房间。他用剪刀和糨糊把指示中军人不应当知道的地方剪下。他被关在那里干这项工作。

从苏联方面来讲，谈判当然是由外交官进行的，但一切都已经在总参谋部决定了。只有总书记能对军人产生影响。只有在勃列日涅夫对军人施加压力之后才能同美国人签订所有文件。1979 年他也是逼迫他们同意与美国人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

而且，美国的鹰派也像苏联军方一样对这个条约不满。在吉米·卡特飞往要举行签约仪式的维也纳前夕，一直批评苏联违犯人权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宣布说，卡特要步 1938 年同希特勒签订可耻的慕尼黑协定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后尘。杰克逊提醒说，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政府也同纳粹德国进行了裁军的谈判。结果是，对批评敏感的卡特命令自己的助手不要打伞，尽管维也纳下着瓢泼大雨。

“我宁可淋透也不在手里拿着伞。”——卡特说。

原来是，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后，是在一把大伞下讲了同希特勒签订协定的事的……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已经前往维也纳，而他们要签署的文件还没有准备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团正在日内瓦忙着文件的加工。最后一轮谈判持续到凌晨三点，此后，代表团的领导人维克托·卡尔波夫和拉尔夫·厄尔为庆祝成功喝了香槟酒，各自去睡觉了。

技术人员留下来把文件重印四份，每种语言两份。如果一份中先提到了苏联，那么在另一份中美国就放在前头。就是在单纯的文牍性事务上也遵循完全均衡的原则。

美国代表团较简单：他们有个人电脑，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在电

脑屏幕上改正，可以获得一份无可指摘的文本。苏联的打字员不得不用普通的打字机把约有150页的东西重新打成带红框的专门的条约文本。打字员哪怕出一个错误，这一页都得重打。代表团的领导人在四份文件的每一页上都写上了自己名和父称的第一个字母。文本被郑重地送到了维也纳。

根据记录来看，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会见应当在美国举行，因为美国总统已经去苏联两次了。而在外交上是对等的铁的原则在发挥作用。但是，苏联外交官明确向美国人说明了：政治局认为让勃列日涅夫飞越大洋不合适。美国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表示理解。正如所期待的，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英国电视台通讯员感兴趣的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美国总统的新闻秘书乔吉·帕韦尔和苏共中央对外宣传处（在公开出版物上是——国际情报处）处长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回答了各种问题。扎米亚京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回答说：

"所提的问题与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作出回答。我们的总统在我们国内要完成巨大的国务和党务工作。在这里，在维也纳，你们有机会看到他的工作，当然，这项工作需要有非常好的身体。他的健康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报刊上出现的有关他的健康的报道——都是推测。"

《消息报》的特约通讯员梅勒·斯图鲁阿立即站了起来，按对等规则问美国总统的新闻秘书：

"请您向我们讲讲卡特先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健康状况？"

"没有特别的变化，"——帕韦尔回答说。

在来到维也纳的第一天，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就礼节性地拜访了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他按宪法履行的是纯代表性的职能。谈话持续了几分钟。勃列日涅夫突然深有感触地对卡特说：

"如果我们失败了，上帝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大家对共产党的总书记引用"上帝"感到很惊讶。扎米亚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不要这样来理解总书记：

“列昂尼德·伊里奇想说，如果我们失败了，后辈人不会原谅我们。”

签约的仪式是在霍夫堡宫的多棱厅举行的。签完了各份条约之后，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突然相互接吻，这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几个微妙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单独进行了说明。谈的主要是对条约履行情况的监督。在伊朗的君主制垮台后，美国就丧失了自己在与苏联接壤的地区的一些观察站。这些带有巨大触角的观察站靠近苏联发射导弹的射击场，——秋拉塔姆（咸海附近）和进行反导试验的试验场，——萨雷沙甘（巴尔哈什湖附近）。

位于伊朗的情报站能记录发射的时间和传给地面指挥所的遥测资料。这可以记下导弹的长短和直径以及投掷的重量，也就是说可以确定导弹的类型。现在，美国只剩下土耳其领土上的侦察设备了。这是不够的。美国要求土耳其政府准许“U--2”侦察机顺着苏联边界飞行。土耳其的答复是，在莫斯科不反对的情况下它同意。

卡特与勃列日涅夫谈了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的回答很含糊，但他明白，卡特必须要向参议院证明美国有检查第二阶段缩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执行情况的能力，否则参议员不会批准条约。早在准备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和反导防御条约时，两国就已经达成了协议，不妨碍卫星、预警雷达站和电子监听工具的工作。每一方都知道另一方不会欺骗它。

当出现了分导多弹头的导弹时，就产生了新问题。怎样才能察觉另一方不想秘密地把单弹头换成多弹头呢？得出的共识是，应当禁止在部署单弹头导弹的发射井上面建棚式建筑，以便不往那里放其他弹头和秘密地避开侦察卫星给导弹装上多弹头。

但是，一切并不这么简单。美国人不安的是，当时，在乌克兰的杰拉日尼亚和五一城两个城市地区单弹头和多弹头导弹几乎放置在几乎同样的发射井里。人们不想吓坏美国人，只是简单地用旧的发射井放新导弹。但是，在发射井的混凝土盖儿被关闭之后，卫星

就不可能判断那里是什么导弹了。只是指挥所不同了。为新型分导多弹头导弹“УР－100Н УТТХ”（按北约的分类为“SS－19”）建立的制导站有圆顶形的天线。苏联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在谈判中吃惊的是，如果根据天线的外型立即就能判定发射井中的是什么导弹，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不放心。但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反驳他说：

“天线不能证明什么。我们知道，你们可以不用天线就发射这种导弹。我们已经测到这样的发射。

谢苗诺夫马上就不争论了。美国人自己后来才弄清楚：他们是否向俄国人泄露了自己卫星的能力？

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蒙大拿州的马尔姆斯特罗姆基地，也同时部署了“民兵—Ⅱ”单弹头导弹和“民兵—Ⅲ”多弹头导弹。美国人明白，把一个发射井和另一个发射井区分清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俄国人真的知道在那里有什么样的导弹，——他们在美国的地方报纸上看到了这一内容。

三驾马车

在最近几年，葛罗米柯成了一个说话很有分量的人——而且已经不仅是在国际事务上了。当时，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很差，国家的政策由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三驾马车决定。

在80年代初，葛罗米柯，一个缓和的拥护者突然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观点，而是因为他看到：缓和已经不时髦了，勃列日涅夫正在退去，应当继续前进，而依靠和平建议在党的机关中不可能得到尊重。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外交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国家的真相要比所有的军事基地或美国所依靠的军团更具有说服力。为了想使我们的思想把最广大的

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不需要通过炫耀武力和组织武装干涉来加强我们的思想。”

在有葛罗米柯参与通过的先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出兵阿富汗的决议的背景下，这些话似乎是一种讽刺。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是党的领导层决定的，但他是支持采取极端措施，即出兵的主张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不采纳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就有意识地决定采取极端措施的问题。”部长让政治局放心：“现在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采取极端措施也不会引起尖锐化，也不会发生大的战争。”

在 1980 年，葛罗米柯在对波兰的态度上持非常好战的立场。当时在波兰社会主义制度眼看着要崩溃。部长说，“我们不应该失去波兰”，他认为，应当实行“紧急状态以挽救革命成果”。

葛罗米柯也应对流血的阿富汗战争负责。在采取战斗行动的 9 年中，苏联军队损失了 13000 多人。每一年我国都要为战争支付 30 亿美元。不能认为葛罗米柯是战争的发起人，但他是 1979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政治局№П176/125 号决议决定出兵的决议的参与者之一。

这份手写的文件是这个样子的：

“关于阿富汗的局势：

1、赞同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所谈的想法和措施。

允许他们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的修正。

需要中央作出决定的问题及时提交政治局。

责成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来实行所有这些措施。

2、责成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拟定的措施的完成情况。

中央书记 列·伊·勃列日涅夫”

决议附有契尔年科写的一份情况：“1979 年 12 月 26 日（在别

墅里有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由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汇报了 1979 年 12 月 12 日 №П176/125 号苏共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况。

在对最近同志们制订的近期行动计划表示赞同后，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按照这样的组成和所汇报的计划方向行动是合适的，同时要仔细考虑自己行动的每一步……”

很吃惊的多勃雷宁问部长：

“为什么要出兵阿富汗，要知道这会同美国人大吵起来的?”

葛罗米柯平静地回答说：

“这只需一个月，我们很快就会完成一切并迅速离开。”

出兵的国际后果对苏联来讲是很严重的。这是他主持外交部工作时苏联政策的最大败笔之一。或许是年龄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警觉性迟钝了。无论是苏联军队的损失，还是阿富汗人民的命运，部长都不感兴趣。他丧失了一些最重要的人的品质，还逐渐学会了对其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

英国勋爵卡林顿回忆说，他一来到莫斯科就提议就阿富汗问题举行国际会议。葛罗米柯冷冷地回答，这是不现实的要求。卡林顿直接问他：他不认为阿富汗 1900 万居民中 300 万或 400 万因苏联的军事干涉而成为难民逃到巴基斯坦这一事实很可怕吗？葛罗米柯冷漠地回答说：

“他们不是难民。阿富汗人一向都是游牧民族。”

他说出了这种早就听不到了的鹰派的语言。他失去了同美国人协商的能力。也许，他感觉，他有什么事未做成，所以他很焦急。

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1981 年 1 月上任，他采取了莫斯科已经不习惯的非常强硬的立场。他任命亚历山大·黑格为国务卿，他是从欧洲的北约盟军总司令的位子上退下来的。黑格同苏联外交官的第一次接触就变成了吵架。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华盛顿工作了那么多年，他任外交使团的团长。基辛格曾同他

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为多勃雷宁安装了一个同美国国务院直接联络的设备。他是所有大使中惟一能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入口处进入美国国务院的大使，从那里进入要比从来宾入口处进入方便多了。

黑格上任后，这一特权被取消了，但忘记预先通知多勃雷宁的秘书处了。所以大使的大轿车被拦住了，并返了回去。多勃雷宁断定，这是有人有意让他遭受这样的屈辱。但他克制住了。正如美国人所说的，多勃雷宁善于“用仿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风度的迷人做法”征服华盛顿的观众。

大使总会说出令人喜欢的妙语。他握着黑格的手说：

“很高兴在华盛顿又见到您了，亚历山大，您任这职务很合适。”

但是，最为合适的奉承话也已经不能缓和紧张的对抗了。除了阿富汗外，苏联的新的中程导弹成了东西方关系中出现严重危机的原因。1981 年，在苏联军队开始装备两级阶梯式中程弹道导弹移动导弹综合体“先驱者”“РСД－10”。北约成员把新导弹称为“SS－20”。它带有分导多弹头。飞行距离超过了 5000 公里。

沿着西部边境线以极快的速度设置了“先驱者”。美国人注意到，每周都会出现两枚新的导弹。总共装备了 650 枚导弹。如此数量的现代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均势。军人们还想在楚科奇半岛部署“先驱者”，目的是使美国的本土处于打击之下。但是，那里是永久冻土层，是无人居住的地带，所以最后没有去花这笔对国家来讲过于繁重的开支。苏联瞄准西欧的中程核力量引起了气愤和恐惧。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院士写道：在莫斯科开始欢腾：看，我们多厉害、多聪明，我们限制、吓住了美国人和北约。

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试图向苏联领导说明，他们是在玩危险游戏：

“你们新导弹的目标大概只是联邦德国，我也应当采取什么措施。这些导弹破坏了欧洲的力量均势。如果你们继续部署导弹，我就要求美国人采取措施。”

施密特是在途经莫斯科在机场同柯西金和葛罗米柯说这番话的。柯西金感到总理是很认真的，就想继续谈下去，但葛罗米柯已经无法忍受施密特了，他转换了话题。问题是，早在1975年同勃列日涅夫会晤时，总理就含有嘲讽意味地指出：

“如果葛罗米柯灵活些，苏德关系的发展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那天，勃列日涅夫不知怎么感到特别疲惫，没心思对他开玩笑。他干巴巴地回答说：

“葛罗米柯受到了苏联领导层的绝对信任，他表达的就是他们的立场。”

出席了会谈的部长记住了德国人的话。法林写道，“施密特直到从联邦德国政府首脑的位子上退下来，都没有得到原谅，葛罗米柯把他列入了自己的侮辱者名单中，带有成见地理解总理提出的一切。”

这导致了可悲的后果。1979年12月，北约通过了决议，要在西欧部署464枚新的“战斧”陆基巡航导弹，并以刚刚研制出来的改进型的“潘兴—Ⅱ”导弹替换已经陈旧的108枚“潘兴”导弹。但是导弹还没有部署，北约国家就建议莫斯科进行缩减欧洲的核武器数量的谈判。

苏联外交官试图唆使西欧的社会舆论反对美国。说什么战争一旦爆发，苏联势必将对不恰当地允许美国人在本地部署新导弹的人口稠密的欧洲进行打击。但这只能引起新的反苏情绪的爆发。

施密特直到最后都希望说服莫斯科做点什么事情。法林从自己这方面想要让勃列日涅夫相信有必要采取行动。总书记以无望的声调回答说：

“瓦连京，你怎么总逼我呢。你去说服葛罗米柯呀。

法林从中感到勃列日涅夫承认：难道你没有看到，“对他们来讲”我再也不是权威了吗?

黑格和葛罗米柯1981年秋在纽约会晤。黑格后来说，葛罗米

柯显露出了某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带有“一个疲惫不堪的人的冷嘲热讽的语气，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活动中不得不与人的轻率冒失的各种表现打交道，他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

葛罗米柯从下到上打量了一下因个头很高而显得与众不同的出席谈判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特曼，愉快地说：

“他在家里大概比在莫斯科还要高。哈特曼一直都在长高。”

对此黑格也指着相当高的多勃雷宁说，两国在双方大使的身高上达到了均势。

在会晤开始时，美国人注意到葛罗米柯精神饱满，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但在会谈快要结束时，他显得老了很多，十分疲惫。他毕竟已经 72 岁了。他用手揉了揉额头，他显然是感到累了，也感到轻松了。

里根总统提出了“零解决方案”：即苏联撤走自己的“先驱者”导弹，美国不部署“潘兴”和“战斧”导弹。苏联军人非常气愤地否决了这一建议。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向受托研究导弹问题的外交官尤里·克维钦斯基解释说，“先驱者”的数量将要增加。此外，还计划增加几百枚近程战役战术导弹。克维钦斯基很吃惊：

“怎么，我刚刚根据政治局批准的指示宣布导弹的数量不增加，应当保持现有的数量。”

“关于这一点那时候不能说，而现在要说，”——元帅冷冷地回答，——“你今天说‘是’，而明天说‘不是’。你在那里宣布了也不要紧，你又不是勃列日涅夫。”

也就是说，勃列日涅夫公开说，暂时停止部署新导弹，所有的宣传机器也都行动起来以证明苏联热爱和平，而军人却狂热地在增加欧洲的核潜力。阿赫罗梅耶夫让克维钦斯基看了应当进行核打击的北约在欧洲的目标图，在图上共列了九百多个目标。为了准确击中目标，必须给每一个目标准备若干核弹头。

葛罗米柯对施密特总理的个人厌恶情绪和没有同军人进行争论的意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欧出现了新的美国导弹。这把苏

联置于了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欧洲的新的美国核武器增强了苏联极易被攻击的感觉。换句话说，部署大量的“先驱者”不仅不能加强国家的安全，相反，却破坏了安全。在苏联的报刊上开始谈论战争的危险性。

葛罗米柯最后岁月的外交政策——当时勃列日涅夫已经什么也不能参与了，在他去世后，已经是安德罗波夫执政——给人的印象是无法预测，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多余的、没有必要的强硬态度，证明了他对自己缺乏信心。外交政策几乎完全从属于武装力量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谢瓦尔德纳泽时期军人在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后对外交官的行为很气愤。

导弹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解决的。他最终接受了里根的完全合理的“零方案”。1987 年 12 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销毁中程和近程导弹的条约》。所有的“先驱者”不得不销毁。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就白白地浪费了。

在葛罗米柯时代的末期，由于阿富汗和人权问题，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消极防御状态。葛罗米柯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对国家有任何帮助。外交变成了对骂，就像在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时期那样。外交部长的工作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也许，有人喜欢敌对气氛，但正如常言所说的，这已经不是由于过分聪明了。

在葛罗米柯的一生中，最强硬的一次谈话，是在 1983 年清晨苏联的“苏—15”拦截机用两枚导弹击落了一架韩国“波音—747”民航机，269 名乘客全部遇难之后。

起初政治局完全否认飞机是被击落的。后来报导说有人射击飞机，但没有击中。只是在过了几天之后，在苏联政府的官方声明中“对无辜的人的遇难”表示了惋惜。

不幸事件加上苏联领导层胆小撒谎引起了反苏浪潮。9 月 8 日葛罗米柯和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坐到了谈判桌前。舒尔茨马上说，他受总统委托就被击落的飞机发表声明。葛罗米柯干巴巴地回答说：

“我对日程有自己的建议。不管您的总统吩咐您做什么事。而我想讨论的是确实决定星球命运的问题：世界的局势、苏美关系。在必要的时候我会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我也要对发生的事谈自己的看法。但我不会从您发表的声明开始讨论。”

舒尔茨坚定地说，他的任务就是要从这开始。应当指出，葛罗米柯实际上已不可能不会失去自制力。过去，他甚至在最紧张的时刻，面部表情也不会变化，但在这里他却满脸通红，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说：

“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用谈了。我回莫斯科就这样汇报，说美国人断然拒绝同我们一起行事，不想谈世界上真正迫切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再次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并站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继续会谈了。”

舒尔茨也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并迅速站了起来。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给人一种会打起架来的感觉。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不知道该怎么办：站起来还是不站起来。葛罗米柯和舒尔茨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坐下继续会谈。但正常的对话被破坏了。

同美国的关系完全遭到了破坏。部长毫无办法。在最后的岁月，他本人明白了这一点，表现焦躁不安。他感觉到他很累，已筋疲力尽了。

“不要同他争吵”

在一定程度上讲，葛罗米柯是一部机器。他一向按规定的程序办事。他想做的一切在他的时间表中都有位置。曾在他的机关中工作过的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夫大使讲过，在部长到来前，助手要把夜里来的最重要的电报和报道挑出来放在他的桌子上。9点钟部长就会把参赞叫来，参赞汇报一些通过情报机关获得的最重要的材料。

为了准备文件，部长常把几名外交官叫到他那里去，一起讨论问题的实质。然后，由司或管理部门去起草文件草案，过一两天就应当拿出初稿。再让某个工作人员朗读文件草稿，而部长则手拿蓝铅笔，一边跟着看稿子，一边作些修改，或者说该怎么改。最秘密的文件他或口授给自己的参赞，或口授给主要外交官中的某个人。如果他同意了某份文件，他就用铅笔写上自己姓名的打头的字母“安·葛”。如果他不同意，那么他就把它放到已经审阅过的文件的公文夹中。把公文退回。他的字迹很难认，但是，秘书、助手和打字员已学会辨认他的标注。

他一个人坐在休息室的一张小桌子旁吃饭，他的办公室的门正好通向这个休息室。在七层的办公室工作到晚上八九点，然后回家，在家里继续工作到半夜。他的家一开始在高尔基大街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旁，后来在普希金广场区，再后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

“作为助手，每天最后一次去他家收拾他审阅过的文件都是在半夜，”——自己后来也当上了部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曾对我讲，“他是典型的工作狂、埋头苦干的人。经常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一点。”

用法林的话说，部长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变成了拉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允许自己的助手或副手有任何独立性。尽管他网罗了能力很强的一帮人——科尔尼延科、沃龙佐夫、别斯梅尔特内赫、卡尔波夫、卡姆普列克托夫、克维钦斯基、阿达米申、法林、多勃雷宁。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他退职之后继续从事外交工作。

他的第一副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外交部人称“聪明老猫”。部长管大政方针，而库兹涅佐夫管日常事务。他不回避解决一些复杂的、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也不试图把有风险的事推给其他的副手。天生就忧郁的库兹涅佐夫外表很像葛罗米柯。但是，同事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仇恨斯大林时代，他曾讲道：

"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传来敲门声。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是在工作还是在监狱中。"

聪明而有学问的库兹涅佐夫竭力伪装成不学无术的样子。这是他幸免于难的惟一可能。他安慰那些经常抱怨不能顺利地向部长说明任何显而易见的东西的外交官说：

"不要与他争吵。如果他硬要作什么决定，你是无法令他回心转意的。"

在库兹涅佐夫进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后，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成了第一副手。他也承担了部里的全部实际领导工作。对自己的副手科尔尼延科，葛罗米柯有过高度的评价。部长办公室的一位外交官曾经讲过一位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曾如何给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打电话，想向他讨教。他要率代表团去美国，假如出现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问题，该怎么办。他正打算继续往下说……

葛罗米柯打断了他的话并说：

"不管您怎么说，您都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而这会使谈判复杂化。在苏联通晓这一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勃列日涅夫、我和科尔尼延科。"

部长——从莫洛托夫到葛罗米柯——对外交部的外交官来讲几乎是神人一样，绝对是难于见到的。有可能在外交部工作了一辈子，都一次没有见过部长。只有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才能接近他。部长的会客时间都是由他的第一助手、以粗鲁的举止而著称的瓦西里·马卡罗夫安排。但是，他令部长很满意，因为，作为一条很好的看门狗，他可以可靠地保证部长避开外界的会令他不高兴的事和一些意外的情况。在外交部，一些极为刻薄的人断言，博得第一助手对自己好感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给他一点能打动他的物质好处。这样部长办公室的门就可能不会关死。

葛罗米柯对任何人都不称呼名字和父称，只称呼姓。只有对政治局委员除外——他们都相互称呼名字。大概，这是他身上保留的

旧时代的东西，但对他的一些最亲近的助手来说，这是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有一次他的一个助手发现：

“大概，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在外交部的事务中，葛罗米柯是一位权力无限的专制独裁者。但是，一些为总书记本

人所熟知、因而自信的大使试图越过部长直接向政治局汇报。大使不仅有权向外交部发密码电报，而且也有权按“文件分发大名单”发，即发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他们能首先读到大使发来的密码电文。

显然，葛罗米柯不喜欢大使越过部长直接找勃列日涅夫，甚至于脆就禁止他们这么做。不过，有巨大影响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总是能对派驻在大国的任性的大使发号施令。一些大使的任命甚至没有葛罗米柯的参与。曾主持过塔斯社工作、后来负责国家广播电视台工作的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拉宾曾讲过，1965年是如何把他叫去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勃列日涅夫说到要寻找一名驻中国大使的问题——这是与北京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刻。勃列日涅夫逐一列举大使所需要的素质，然后突然说：

“我们认为，拉宾同志具有这样的素质。”

立即就作出了决定。

对总书记所钟爱的外交官，葛罗米柯对待他们就不那么简单了。瓦连京·法林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在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中发生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当时葛罗米柯和总书记的国际事务顾问叶夫根尼·萨莫捷伊金都在场。法林对勃列日涅夫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不知道上周我同德国总理会谈结果的电报您收到了没有。勃兰特邀请我到他那里是要提出抗议……”

“什么电报？哪天发的？”——勃列日涅夫转向葛罗米柯：“安德烈，为什么没向我报告？”

葛罗米柯用不高兴的眼光朝法林看了一下说：

“列昂尼德，我通过电话向你讲过电报的内容。”

法林没有看部长，重讲了一遍自己同联邦德国德国总理勃兰特的谈话，勃兰特指责苏联外交的不真诚不是没有根据的。

葛罗米柯打断了自己大使的话：

“在您看来，只有西德人说的是真话?”

法林转向总书记：

“列昂尼德·伊里奇，请允许我汇报完，然后再回答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问题。”

这简直就是挑衅，葛罗米柯对此不太习惯。用法林自己的话说，部长面色铁青，收拾起面前的文件，走到总书记的面前说：

“列昂尼德，我有会见，我晚些时候给您打电话。”

这次谈话之后，总书记的顾问萨莫捷伊金对法林友好地说：

“你在葛罗米柯面前不惊慌失措，这给列昂尼德·伊里奇留下了印象。不过他还是担心你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次事件。

但是，部长没有因为现眼的屈辱感而报复大使，这件事总的倒也证明了有利于葛罗米柯的一点情况。他能够超越自己的个人感情。而且，有一次，当勃列日涅夫对法林的行动感到很不满意，差点儿要免去他的工作时，葛罗米柯自己承担了责任，尽管他完全可以火上浇油。

“应当对部长作出应有的评价，但他会以最令人气恼的方式骂人，”——尤利·克维钦斯基回忆说，“有一次，他差点把我整哭了，说协议导语的措辞是错误的和不能接受的，尽管这措辞是他自己批准的，这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我默不作声地站起来，走出了部长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有人来对我说，部长又叫我去。我让他转告说，我不想去了，我请求他不要让我继续参加谈判了。接着来了他的高级助手马卡罗夫，他劝说我不要做蠢事。当我回去时，部长见我时嘴里嘟嘟囔囔的，可以听出这样一些话：‘不像个工作人员，倒像个大姑娘’，‘不能对他说话了呢’。但不再责骂了。”

他会因一些小错误而进行申斥。但是他发怒的时间不会持续很久，一般也不会影响与工作人员的关系。在说了粗暴无礼的话后，

有时他在第二天就会道歉。所有苏联的大官都脾气古怪和骂骂咧咧，但葛罗米柯毕竟还不经常放任自己——主要的是——他不是爱报复的人和爱记仇的人。他不贬低，也不踩踏自己的下属。

法林指出，他大概是惟一器重和尊重有才能和有文化的人的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也喜欢一些知识分子，但是纯粹是实用主义的——让他们给他写讲话稿和书。而葛罗米柯是在职务上提拔这些人。

在埃及工作过的彼得·阿科波夫回忆说，葛罗米柯尊重那些能够毫不胆怯地捍卫自己观点的人。在1973年近东的十月战争时，葛罗米柯经常给开罗打电话——在大使馆装有与莫斯科直接联系的电话。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是驻埃及大使。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通常在夜里接见他。有一天晚上，葛罗米柯找维诺格拉多夫，他每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而维诺格拉多夫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从萨达特那儿返回。不知什么时候，葛罗米柯忍不住了，对阿科波夫说：

“你能写吗？拿纸和笔过来。”

他开始口授：

“请转告萨达特，我们获得情报说英国人……”

而葛罗米柯后面说的是什么，阿科波夫怎么也听不出来。他重复问了几次。葛罗米柯很恼火，喊了起来：

“你怎么啦，是聋了吗？”

阿科波夫变得放肆起来，说：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这部电话经受不住叫喊声。”

部长平静了下来，开始清晰地说出每一个词。

而且，葛罗米柯的下属经常以更传统的方式博得他的好感。那个阿科波夫回忆起部长有一次飞到开罗时的一番情景。当时大使不在，阿科波夫是临时代办。葛罗米柯请他晚上一起吃晚饭。阿科波夫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但想出了该做什么，就开始引述葛罗米柯写的《美国的资本输出》一书中的话。阿科波夫写道：“我突然看

到他双眼发光，他变成了一个多么善良、和蔼的人。你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我感觉，我扣中了他的心。”

1961年，部长出版了《美元的扩张》一书——用的是笔名。而1982年用原名出了很厚的一大本《资本的对外扩张：历史与现实》。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因学术著作而获得了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在葛罗米柯看来，资本输出是很可怕的事——而他的继任者想的只是如何把外来投资引入俄国，因为没有外来投资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

“外交官用高脚玻璃杯为自己挖坟墓”

葛罗米柯在日常生活中是禁欲主义者。他自己几乎都不喝酒，尽管他能喝一大杯啤酒，但他在评价外交官时，对喜欢喝刺激性饮料的也持宽容态度。老葛罗米柯在送他到国外工作时，给儿子提的就是这样的建议：

“在招待会上不要喝酒，外交官是用高脚玻璃杯为自己挖坟墓。不要冒尖，要谦虚。要多听少说。听取交谈者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意见，这很重要。如果对该说的话没有把握，最好保持沉默。还有，不要与外国人建立友谊。对政治家和外交官来讲，这是累赘。”

他很注意锻炼，作哑铃操，经常散步，——每天必须要走十公里。在纽约，当他秋天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代表处工作人员不得不陪着他散步。从事外交工作的所有年轻人都因走这么多的路而哀叹——与部长走十公里是件痛苦的事。

在散步之后进餐时。大家想喝酒，但葛罗米柯不赞同喝酒。这时多勃雷宁就提议说：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们喝点东西来提神吧？”

如果葛罗米柯对多勃雷宁的话没有反应，喝酒的倡议也就取消了。有时葛罗米柯会说：

“我可不喝，谁想喝谁喝。”

于是，服务员就把伏特加和葡萄酒摆到了桌上。

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对这一切作了描述。舍甫琴柯 1978 年在美国请求政治避难。舍甫琴柯是在有人要他立即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大楼之后逃跑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大楼位于纽约室中心，在一个警察局和消防队对面。苏联代表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把他叫到自己那里，给他看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密码电报——要把舍甫琴柯调回国。电报令舍甫琴柯很惊慌。他回到了联合国大楼自己的办公室，给自己的联络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打了电话。

舍甫琴柯对妻子什么也没说——给他留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妻子只是在早上才看到。他把女儿的照片、自己的妻子同葛罗米柯的妻子一起照的照片以及与勃列日涅夫一起照的更大的团体照都放到了公文包里。夜里，舍甫琴柯是从消防安全楼梯下楼的，过了大街，上了等着他的车。他被藏到中央情报局的一所房子里。

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代表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要求美国人安排他们与舍甫琴柯的会见。但这是没有用处的谈话。两位大使劝他回国，而舍甫琴柯则重复说他决定留下——就打上了句号。

在他出逃后，葛罗米柯非常生气地对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说，他的助手很多，他根本就不记得舍甫琴柯这么个人。反间谍工作人员搜查了舍甫琴柯在莫斯科的住宅，给安德罗波夫拿来了一些照片，在照片上记录着外交部长和他的逃跑的助手在他的装修好的家里。

但这并不意味着舍甫琴柯与外交部长关系密切。他与部长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柯是好朋友。舍甫琴柯是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同他结识的。舍甫琴柯在外交部找到了工作，他很快就获得了升迁，1969 年成了葛罗米柯的一名助手。在出逃前的五年间，他一直担任没有权力，但受人尊敬的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

秘书长之职。

在他出逃前的一年多，他就已经申请在美国避难了。有人要他为美国政府工作，即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舍甫琴柯能够转交给美国人一些什么东西呢？来自莫斯科的有关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应持什么立场的指示，发给国外代表处的情报材料。他可能把与莫斯科来的一些地位较高的客人的谈话也交出去了。他把克格勃驻外间谍机关和军事情报机关的人员——他知道的所有人都列了出来。他没有接触到最主要的机密。

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很多年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当他准备出逃时，他已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他害怕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已怀疑上他，硬把他押上飞机，带回家枪决。他想的与实际差不多——人们可能是会这样对待他的，但对这个可疑的驻国情报人员没有及时进行窃听。当时苏联驻纽约的情报机关头子是尤里·德罗兹多夫，后来他成了地下情报机关头子。当时他确信，他立即感觉到在纽约的苏联人员中有叛徒。苏联的驻外情报机关已注意到了舍甫琴柯放纵的生活方式。警惕的特工人员认为，在境外的苏联人是不会像他那样生活的。

情报局局长、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没有注意驻纽约的情报机关头子发出的最初信号。在收到驻外情报机关头子的第二封信——德罗兹多夫将军在信中说舍甫琴柯经常酗酒，不与人交流，——最终决定把舍甫琴柯召回莫斯科。但是电报的文辞写得不巧妙，使舍甫琴柯害怕起来，去找美国人了。

舍甫琴柯为什么要出逃呢？他出逃的政治动机很难猜测。他不是那样的人。最可能的是他非常喜欢联合国副秘书长的生活方式以及与这一职位相关的荣誉、特权和舒适。他已经 47 岁了。男人在 40 岁后经常要经历一次危机。

美国人给他找了个女人，是职业间谍。后来她写了回忆录。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她对苏联外交官对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缺乏经验也很震惊。活了一大辈子却不知道生活的乐趣——她是真心同情

苏联的外交官。

所展现的生活乐趣使舍甫琴柯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但根据各种情况判断，他在美国的生活也很难称得上是特别幸福的。葛罗米柯的原助手害怕因背叛而被害。但在他曾喧闹一时的出逃整整二十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已摘不下来的假面具

与葛罗米柯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大多数人都深信，他在个人的私生活中也像在工作中一样是个十分乏味的人。他极缺幽默感。尽管有时他也想开玩笑。米哈伊尔·贾丕才讲，有一次，在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交谈时，葛罗米柯提议休息并问：

“您知道什么叫交流意见吗？”——他自己回答说：“这就是贾丕才同志带着自己的看法来找我，而带着我的看法离开。

他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贾丕才指出，也有正好相反的情况。

“但这是很少见的。”部长回答说。

葛罗米柯的强笑没有让任何人高兴过。部长的助手开玩笑说，他的笑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拘谨矜持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很不自然和很乏味的幽默，是礼貌的规则迫使他强颜欢笑。

不过，联合国负责政治问题的副秘书长布莱恩·厄克特在回忆葛罗米柯时也指出，“他突然并发出他的嘲讽时，就像阳光穿过冬天的云层一样，在很多艰难的讨论中也是有好处的。他喜欢说一些很短的笑话，比如，在对决议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之后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修改。在通过的条款上应当加上一个‘不’字。’当然了，决议因此就失去了意义，但玩笑同样能引人发笑。”

只有不多的苏联外交官敢开玩笑。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有一次

在莫斯科谈判开始前，美国外交官对摆在桌子上的一个很大的孔雀石匣子很感兴趣。他碰了一下盖子，立刻发出了响亮的声音。美国人震颤了一下。这是主持人用的铃。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一般不太开玩笑，突然大笑起来，并用英语开了句玩笑：

“这下华盛顿可完了！”

阿纳托利·杜勃雷宁接茬说：

“快给华盛顿打电话，说这是个错误！……”

葛罗米柯给了解他的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孤僻的、失去了人的热情的人。他的儿子回忆说：

“从来没看见他在沙发上躺着，从来没看见他不刮胡子。他是个德国式的非常认真的人。在巴尔维哈休养时，他跌了一跤，摔断了右臂。他是怎么签署文件的呢？定做了一个真迹图章。”

但是有一些人确信有两个葛罗米柯——非常不同的葛罗米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原外交部长秘书处的高级职员瓦列里·齐布科夫讲述了葛罗米柯是如何将外交部管理处的一位领导人任命为大使的。那个人去上任了，过了三年就死了。葛罗米柯在小圈子里说：

“在我们任命他当大使时就知道他得了不治之症。我们有意这么做，是想给他一个以苏联大使的身份结束仕途的机会。”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尼基季奇回忆说：当时，他姐姐得了重病需要美国医生帮助。怎么才能为她弄到签证呢？他试着给葛罗米柯打电话，因为他和葛罗米柯住在同一栋楼里。他建议他去他那里一下。他仔细听完后说：

“好吧，这是人道的事。我尽力帮忙。明天请给我打电话。”

经常能使丈夫避开各种不愉快事情的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插话说：

“安德留沙，你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应当进行商量。”

她明白，参与赫鲁晓夫家的任何事情，勃列日涅夫不见得会喜欢。但当第二天谢尔盖·赫鲁晓夫给葛罗米柯打电话时，得知发签证的指令已经下达了。

“应当理解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需要活下去，”——别斯梅尔特内赫说，“葛罗米柯极为谨慎。他用一层厚厚的保护皮裹着自己，在保护皮的后面隐藏的是一个有知识的、受到过伤害的人。这一保护系统使他避免了失败。在战后，与外界的任何交往都是极端危险的，因为最可怕的指控就是里通外国。外交部处于特别危险的地段。

因而，他戴上了假面具，所有人都把他的假面具当成了他的本来面目。在假面具的后面隐藏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给他当助手的一批外交官，在家里和别墅里都见过他，他们都认为葛罗米柯是当时知识最渊博、最有文化的人之一。在他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只有一块正方的空地方，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他懂艺术，对历史感兴趣，收集历史书籍。

有一次，别斯梅尔特内赫问，为什么他要把一些书长期放在桌子上。他回答说，他有这样一个规矩——没读完的书，不往柜子里放。书籍可以使他放松、放下工作、歇口气儿。

“我记得他任部长时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最后一次会见，”——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说，“我们到了日内瓦。我当时已经是部务委员会成员，负责美国司。在谈判开始前的十分钟，我找了一趟葛罗米柯。我满以为他或是在读给我们代表团的工作指示，或是在仔细阅读所谓的《说贴》，因为那里汇集了谈判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所有材料。但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埋头读一本侦探小说。甚至在谈判过程中他还找机会溜号……”

在一生中葛罗米柯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如果可以什么话都不说，最好不说，他避免单独与人会面，甚至在非正式场合他也要带着翻译。因此，他很平稳。他是在甚至禁止大使单独与外国人会见的时代开始自己的仕途的。他戴着假面具躲避外界的习惯，只让他在有的时候露出真面目。

“人们称他为‘不先生’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提醒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说。

“那个时代的外交就这样，”——他回答说，——“当时的部长相互之间很少有什么不同。‘冷战’完全限制了外交，要知道，会说‘不’被看成是外交官的主要优点。所以，‘不予答复’是当时文件上最常用的批示，也就是说小心谨慎和不采取任何立场的本领高于一切。”

对这一点，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有过准确的表述：

“他选择了求生存的公式——说‘不’。许多人说了‘是’就完蛋了。你说‘不’，就不会倒霉。”

葛罗米柯在那个对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都会抓住不放、都会加以分析的世界里，从来没有摘下假面具。但是，他一到亲近的助手中间，或在家中，在他可以与他们进行自由交谈的人中间，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买帽子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有名的反对吸烟和酗酒的狂热斗士。在招待会上他还能喝一两杯伏特加，但他根本不承认他吸过烟。他的助手们突然在他任驻美国大使的一张老照片上看到他正深深地吸一口烟。他们高兴地将照片放在了他的桌子上。他十分窘迫，因为他从未透露过，有时候他也用烟来解闷。

他对饮食很不讲究。他喜欢喝茶，吃小面包圈和果酱、荞麦粥。喜欢穿黑色和灰色的套装。喜欢乘火车去南方休养。在政府专列中有四个包房，一个大的——供部长和他的妻子用，三个稍小一点儿的供家庭成员用。到每一站——夜间除外——当地的州委第一书记都会来看望葛罗米柯。早餐的类型，葛罗米柯要征求所有人的意见。看来，他认为应当如此。在辛菲罗波尔，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邀请葛罗米柯全家吃饭。

在度假时，他没有离开过海洋。他用蓝铅笔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他在海里游了多少次泳，然后吹牛。在赫鲁晓夫之后，他也像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迷恋打猎。大家都说，应该给葛罗米柯送猎枪。

他没有朋友——对他来讲和家庭交往就够了。甚至在同儿子的交谈中他都极为谨慎，在他身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心中的检查员。有一次，他在家里讲了一个笑话——大家把它当作一件大事记住了。他狡猾地睁着眼睛，问家人：

“在开天辟地之前存在过什么?”——他顿了顿又自己回答说：“国家计划委员会。”

葛罗米柯对自己的妻子很忠诚，同她一生相依为命。有人说，她对部里的人事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维克托·苏霍德列夫曾亲眼目睹生气的妻子如何给部长打电话并抱怨说她的远亲的女儿想进为外交部培训速记打字员的培训班，但她们却没有被录用，因为，她们都得了 2 分。葛罗米柯把他的一个熟悉情况的高级助手叫来问道：

“怎么回事？为什么女孩子们的听写只得了 2 分？这真是岂有此理！真是令人气愤!”

助手开始解释：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她们做出了大量的错误，所以给她们的听写打了 2 分……”

葛罗米柯发起怒来：

“我现在也给你进行这样的听写！在我这里你也会得 2 分！你马上去办这件事!”

苏霍德列夫讲，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和部长一同去美国时，去为全家购物，找一些便宜的商品。葛罗米柯经常给政治局中的头面人物带礼物——帽子、衬衫和领带。当然了，他自己不去买，委托翻译去买。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经常申斥苏霍德列夫，申斥他选了太贵的商品。

买帽子特别复杂。政治局里的人戴的帽子的式样早就过时了，在纽约根本就没有卖的。但是，每年葛罗米柯都要苏霍德列夫去找“所需要”的灰色帽子。他选了样式带回来。葛罗米柯很挑剔，有时不得不去商店好几次。在商店里，给每个帽子上都标上了帽子的未来所有者—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波德戈尔内、契尔年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葛罗米柯时时都准备帮助政治局的同志。基辅的头头彼得·叶非莫维奇·谢列斯特指示乌克兰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给他的妻子伊林娜·谢列斯特弄一个去美国的私人邀请函。谢列斯特万不得已给葛罗米柯打电话：问外交部长怎么看这件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无限殷勤地说：

“好。去吧，去看看另一个世界。”

甚至建议让谢列斯特的妻子搭乘自己的专机去——他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葛罗米柯对亲人也热心帮助。他的女儿埃米利娅嫁给了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皮拉多夫。对他来讲这是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女儿。皮拉多夫很快就获得了大使的衔头，去巴黎任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代表。

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也想在外交方面试一下身手。年轻时就成了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但很快就明白了，大使馆的工作对他不适合，所以他转向了学术工作。他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的所长。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多年。他回忆他邀请葛罗米柯与妻子到自己家里吃晚餐的情景：“他向我们讲了他带到黑海度假的小孙子们。他开玩笑地根据他们划船的成绩给他们授予了海军军衔：小孙子是海军中士，大孙子是海军中尉。他讲了他们在别墅搞的一些恶作剧，比如，他们背着警卫打开了报警器。葛罗米柯说：‘您可以想象这在我们那里会导致什么后果。’”

充当主席角色的三年

勃列日涅夫的晚年使葛罗米柯确信，他领导国家可能并不会比别人差，而只从事外交对他来讲已经有点少了。他戴着没有摘下过的“为苏共工作50年”的荣誉徽章，以表明自己资深的党龄。在中央第二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去世后，他想接替他的位子。但是，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征求意见：葛罗米柯能否担任这一职位？这个谈话令安德罗波夫很不高兴，因为他早已认为这把交椅是他的，关于这一情况葛罗米柯很快就知道了。法林写道，有一次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狠狠地驳斥了葛罗米柯的意见。部长相当不礼貌地说到每个人都应当干自己的事，安德罗波夫对这句话相当不满地嘟囔着说：

“我们这里只有葛罗米柯同志一人通晓外交。”

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而且，如果说契尔年科在同外国人会见时只能读为他准备好的稿子并经常转向葛罗米柯，寻求他的赞同的话，那么安德罗波夫在与外国客人交往时就不需要部长的帮助。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没有使葛罗米柯感到不安。他不担心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估计会提升。但是，安德罗波夫没有让他往上升，尽管他提出了令人高兴的建议：

“当然，我是希望您继续当外交部长，但是如果您愿意，我推荐您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不怀疑，所有同志在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都会支持我的决定的。”

葛罗米柯回绝了。安德罗波夫很吃惊：

“我还以为您会喜欢这一提议。”

葛罗米柯后来对儿子讲：

“我知道，在我就任主席一职后的两三个月，尤里·弗拉基米

罗维奇就会对自己的提议感到十分后悔。”

葛罗米柯推测说，安德罗波夫需要这个位子来抓国际事务。事情的确就是如此。作为一种补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除部长一职外还获得了政府第一副首脑的职位。

在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葛罗米柯也已瞄上了总书记的职位了，但是大家推举了契尔年科。这是怎么回事呢，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后来对克里姆林宫的主治医生恰佐夫院士讲：

“我们晚上见了面——有我、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和契尔年科。当讨论开始时，我感觉到，葛罗米柯在觊觎这个位子，吉洪诺夫可能支持他。你自己清楚，把他放到这个位子上是不行的。你知道他的性格。看到了这种情况，我提议契尔年科为候选人，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我一直相信乌斯季诺夫，认为他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但是，在那一刻我感到他有点居心不正。”——恰佐夫写道，——“身体有病、性格懦弱、容易妥协、没有原则性的契尔年科未必能与主持军工综合体工作的固执、刚强、果断的乌斯季诺夫抗衡。”

有趣的是，葛罗米柯指责其他人谄媚逢迎。他对儿子讲过：他与安德罗波夫曾去看望病重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感到不舒服。他突然说：

“我是否该退休了？我经常感觉不舒服。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勃列日涅夫打算进行一次认真的长谈。但是安德罗波夫马上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只管好好休养，什么也不要操心，只管好好休养。您的战友很结实，我们不会令您不快的。”

勃列日涅夫很感动，眼含泪花说：

“如果你们都这样认为，那么我再干干。”

葛罗米柯谴责安德罗波夫阿谀奉承，但他自己实际上向已去世的契尔年科也说过同样的话。在去世前的三天，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给他打电话说：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现在感觉不好。我想我是该退休了。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葛罗米柯不想冒险：

“这会不会加速不符客观情况的事件的发展？要知道，据我所知，医生也没有这样悲观。”

“这就是说，不用着急？”——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以微弱的声音充满了希望地又问了一遍。

“是的！不用着急，这是没有根据的。”

契尔年科对谈话很满意。葛罗米柯证实了他作为一名大外交家的荣誉。对于国家来讲，这种外交当然是有害的了。

在契尔年科去世之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似乎又产生了领导国家的某些期望。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描写了 1988 年 1 月是如何授予他大将军衔的。葛罗米柯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签署了命令。他亲自给克留奇科夫打电话，表示祝贺，开始交谈。葛罗米柯想起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他发现大概他也很快就要退休了：

“我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在 1985 年，在契尔年科去世后，一些同志们建议我集中做党的工作，要求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我拒绝了，因为纯粹担任党的职务对我不适合。也许，这是我的错误。”

葛罗米柯对儿子说，他不想得到头号人物的位子：

“我很快就八十了。在经受了医生所说的‘轻度心肌梗死’之后，在还有动脉瘤的情况下，在作完了前列腺手术之后，还想挑书记这样的担子是极不理智的。考虑到我没有从事党务或国务的基础，更谈不上有企求这一位子的军方基础。我也就不想了……格里申、罗曼诺夫、戈尔巴乔夫——他们都要瞄着这个位子。”

不过，有传言说，葛罗米柯仍然试图和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达成协议。但与吉洪诺夫未能结成联盟，于是葛罗米柯也就明白了，他的希望已落空了。但是，他决定为他在政治局投出的

一票取得更大的报偿。经过幕后商谈之后，葛罗米柯同意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一职。3月1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恰佐夫院士讲述契尔年科死亡的医学结论之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发了言：

“当然，我们大家都对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离去感到十分悲痛。但是，不管我们在感情上多么难过，我们应当面向未来，一点也不应当失去历史的乐观主义和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的信仰。我要坦率地说，当你在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时，自然要想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我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葛罗米柯对未来的总书记唱了一通赞歌，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随声附和。而戈尔巴乔夫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留在了政治局，并让他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示感谢。这一问题1985年6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

“在现今的条件下，让苏共中央总书记集中负责党的领导工作是比较合理的。因此，我提议选举葛罗米柯同志为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党龄最长的党员之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国内及世界上都很有名望。这一切符合现在的形势，符合最为合理的力量配置情况。”

因此，葛罗米柯又在奥林匹斯山上呆了3年，而旧班子的其他成员都立即被戈尔巴乔夫打发走了。后来，在退休后，葛罗米柯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在任职期间，他一直忠顺地执行着当前主子的决定。外国客人指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葛罗米柯有时还参加谈判，但从来不主动参与谈话，只是在问他的时候他才开口。”可以说，他非常清楚，禁酒运动使苏联驻外大使处于一种尴尬可笑的境地，但要绝对服从政治局的决议。科尔尼延科准备了一个通报的草案，草案禁止在礼宾宴会上端上酒精饮料，要求对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否饮酒进行监督，而这一草案是葛罗米柯签署

的。当苏联大使馆不再上酒的时候，有人公开嘲笑我们的外交官，而一些记者在苏联人偷着买葡萄酒和威士忌的商店偷偷地守着他们。对到苏联访问的外国官方代表团也不再请喝酒，这也没有提高国家的威望。

1985 年 7 月 2 日，葛罗米柯最后一次去外交部自己的办公室。他没有同任何人告别，甚至都没有把全体负责人员叫到一起。他站起来就走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聚到窗前，看见他离去了。

他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当然了，他不喜欢他离开后所做的事。有一次葛罗米柯邀请自己的接班人谢瓦尔德纳泽带着妻子到自己的别墅去。但没有进行生动的交谈。大家都感到很拘谨。

戈尔巴乔夫派驻中国的大使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对葛罗米柯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说他的任务是使苏中关系正常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突然反驳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特罗扬诺夫斯基很是吃惊。

“他们已经在与美国人搞关系了。”

世界在变化，但葛罗米柯还生活在过去。他在快到九点的时候准时来到克里姆林宫，在助手的帮助下弄清楚了日程。对在 27 大上的发言，他改了 19 次。

葛罗米柯开始去全国各地巡视。所看到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令人难过的印象。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很少了解国内的生活，他也像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与现实是脱节的，没有料到商店里是空空如也，烦闷笼罩在人们心头，他们非常希望变革。

不当部长后，他成了多余的人。按习惯他要在每次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但也是驴唇不对马嘴。他讲话也近乎老年人的那种唠叨。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奇怪地说：

“我在高尔基大街散步，连汽水都找不到。”

戈尔巴乔夫迁就地看了看他，而新的政治局委员们则向他露出了嘲讽或气愤的眼光。

葛罗米柯坚决反对为斯大林镇压的死难者平反的任何尝试。他

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发言谈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里，想让我们对过去进行重新评价，重新提出斯大林问题、工业化问题、集体化问题的人还没有绝迹，对此不能视而不见，这是根本不容许的。我们不能作善人。这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诺夫向政治局提出了给被斯大林消灭的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和其他杰出的经济学家平反的要求。这令葛罗米柯特别气愤；给他们平反就好像把他自己的生活一笔勾销了一样。

“难道可以这么做吗？这是一些坏透顶了的富农阶级的捍卫者。我在教政治经济学时，一有机会就要揭露这些山岳派理论家，他们打的主要是捍卫富农阶级和自由的独立农庄经济。你们看到了吧，现在有人建议我们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假学者平反。”

1988 年，在假期之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打算对平壤进行访问。但是，在 9 月的一天，戈尔巴乔夫来最高苏维埃找他。他们谈了谈，访问被取消了，葛罗米柯提出辞呈。当让他退休时，他要求：请把别墅、汽车给我留下，并给我留一个助手——写回忆录。

退休后，在卧室的墙上贴了一个日程表，每天都要写回忆录。他的名为《永志不忘》的两卷本回忆录很快就出版了。读者们很失望。埃贡·巴尔后来写道：“他是在用自己的回忆录凌辱自己——要知道他的回忆无论如何不能像这样平庸和乏味。他对后代隐瞒了所有的思想财富，把只有他一个人能分享的经验、知识和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一些人物的评价都带进了坟墓。只能他一个人分享。遗憾的是，这位著名的人物最终也没能抛弃自己的鳞片，作为自己国家的奴仆，他认为超出了冷静和极端贫乏的叙述以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不值得提及的，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必要的。”

葛罗米柯也是外交文献出版委员会的主席。正如他的同事们后来回忆的，如果他们中有人“认为刊登某个文件具有我们的敌人有

可能利用这一文件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某种威胁”，葛罗米柯就会支持这样的同事的意见，文件就不会被刊载。葛罗米柯甚至不允许想看看自己亲手发出的电报的前大使接触档案。曾主持过历史档案管理局工作的齐赫文斯基院士回忆道：葛罗米柯甚至对原驻华大使、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局长、退休前一直领导苏共中央国外干部部工作的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潘友新也没有作出这样的许可。

非常气愤的潘友新去找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给葛罗米柯打电话，这才破了一回例。但是，葛罗米柯却没有给自己破例，在他的两卷本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新文件，没有任何发现。

在纪念葛罗米柯把八十华诞的文章中，英国外交部历史档案局副局长吉尔·本奈特这样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对葛罗米柯的看法："在苏联的机器上，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更专业、更勤恳、更彻底、更忠诚、更驯顺、更冷静、更谨慎、更忘我、更多灾多难的仆从了。"

他 1989 年 7 月 2 日在医院去世，差两个礼拜就八十周岁。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探望了葛罗米柯的家人，表示吊唁，提议选个地方安葬。7 月 5 日按国礼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葬在了新处女公墓。

几十年间他的带有沮丧的嘴角的忧郁的面孔代表了苏联的外交。莫斯科几乎一直在用他的口头禅“不”在讲话。对葛罗米柯来讲，主要是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即在世界上没有苏联的参与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轻视人权这样一些东西，也许他也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教条。他关心的只是在军事实力上已经体现出来的日渐增强的国家的实力，关心的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苏联生活的贫困和制度的腐败他都没有感受到。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外交部或境外度过的。他看到的只是那些从政府的大轿车的车窗中能够看到的东西。他遵循的是 18 世纪传统的外交，更喜欢秘密外交。秘密外交的基础就是要尽力把敌人引入迷途。葛罗米柯

曾对一位西方外交官说：

“先生，您说得可能很坦率，但一般来讲政府不会这么做。”

葛罗米柯后来非常遗憾，因为他推荐了戈尔巴乔夫。但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能够按其他方式行事吗？他具有天生的鉴别力。他始终都能正确无误地把赌注押在走红的人的身上。难道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突然背叛自己去反对掌权的人吗？他是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意志的忠实、可靠的执行者。这也帮助他活了下来。

他的生活信条是：“不抛头露面”。他一向很谨慎，避免了一些不理智的、不正确的和危险的举措。这是他能够长期置身于政治中的一个原因。努力、听话、顽强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后都是如此。

第四部分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九章

谢瓦尔德纳泽：当上总统的部长

当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之后，以前对这位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所有的仇恨终于得到了解释。是他接近西方，解散了华沙条约，匆匆忙忙把苏联军队从东欧撤出，没让德国花一个戈比就统一起来了。他的对手们欢天喜地：我们早就说过，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前天吹捧勃列日涅夫，昨天为民主而斗争，今天，这位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自己却把坦克开进了阿布哈兹。由于他的过错而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然而就是这个人在1989年因在驱散第比利斯非法集会时有人死亡而要求惩罚功勋卓著的俄罗斯将军们！

尚在戈尔巴乔夫任命谢瓦尔德纳泽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俄罗斯社会上有不少人就历数起历代的外交部长，从涅谢尔罗德起是不是领导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异族人太多了？

谢瓦尔德纳泽像莫洛托夫一样，任过两届外交部长。从1985年7月到1990年12月，当外交部长5年半，直到他提出辞职。他是托洛茨基之后第一个自愿离职的外交部长。

谢瓦尔德纳泽再次当外交部长是在1991年11月。这一次他没有干上3个星期，因为苏联消失了。

教师、教师之子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于1928年1月25日出生在兰奇胡季区马马季村的一个大家庭里。这个村庄位于格鲁吉亚西部一个叫古里亚的历史上有名的州。他的父亲阿姆夫罗西·格奥尔基耶维奇求学于巴统，在中学里教俄罗斯语言和文学。这个工作挣钱不多，因此还要种玉米、培育葡萄和养蜜蜂。

老谢瓦尔德纳泽不喜欢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在革命后夺取了独立的格鲁吉亚的政权，没有能力搞起有效率的经济。孟什维克中间的很多人来自古里亚。而他的弟弟与他正好相反，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在未来的部长的眼前，经常发生渗透着格鲁吉亚人暴烈性格的激烈的政治辩论。

还在家里的时候，大家常常回想起父亲的表弟——达维德·谢瓦尔德纳泽，他在1905年曾经领导过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但牺牲了。

爱德华十岁那年受雇当了邮差，把报纸和书信从区中心送到故乡的村庄。单程路程不近，12公里。后来，谢瓦尔德纳泽叙述过这些报纸对他产生的印象。他翻看的报纸登载的是，“连篇累牍的对斯大林的祝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再就是‘人民的敌人’和世界资本进行的破坏活动、恐怖活动和阴谋。我也听到我的亲人们的议论，说实在的，各有各的看法，各维护自己的主张，他们的议论引起我的不少怀疑，给我留下了很多难题，这些议论再加上我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对我产生了一种复杂和矛盾的效果。”

不过，对这些问题，谢瓦尔德纳泽自然不是在他十岁时幸福的童年时代，而是在后来才去思考的。早年时如表现有过多的怀疑，那是会妨碍他的政治生涯的。

在大规模镇压的年代，他父亲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下达了逮捕令。他以前的学生，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内务科的工作人员提醒了他的老师，于是老谢瓦尔德纳泽失踪了。但是爱德华作为被怀疑者的儿子却未被允许去参加少年儿童队的夏令营。这对于这位学校里最为积极的少先队员是个打击。但家庭却躲过了灾难。被捕的威胁过去了，阿姆夫罗西·格奥尔基耶维奇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爱德华在故乡马马季村念完了八年级。他的哥哥阿卡基战争中在保卫布列斯特要塞的战场上牺牲了。爱德华没有上前线，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的父母想让他当医生，于是他进了第比利斯的中等医科技术学校，并以优异成绩结业。这为他进入医学院打开了道路。但他在医科技术学校一年级的时候当上了团组织书记。当建议他去区团委工作时，他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这样一来，他没有去当医生，而成了区团委的一名指导员，尔后成了干部组织处处长。

他在第比利斯的运气不佳。他得了肺结核。战后的格鲁吉亚药品缺乏，于是让他到高山村庄治疗。那里新鲜的空气有益于健康。病好了，他回来又做共青团的工作。

1948年，他被吸收入党。第二年派他到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两年制党校学习。许多党和共青团的官员受到这种教育就感到满足了。但谢瓦尔德纳泽还进了以楚卢基泽（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楚卢基泽是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命名的库塔伊西国立师范学院函授部的历史系。谢瓦尔德纳泽于1959年在该学院毕业，那时他已经是共和国共青团的第一书记。和他的父亲一样，他得到了教师证书，但不是俄语教师，而是历史教师证书。可他从未在学校教过书。

1951年他在休假的时候，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纳努莉，并且爱上了她。朋友们劝他不要同她结婚，警告他说：

“履历表不好，前途就完了。”

未婚妻的父亲拉日坣·察加列伊什维利中校，是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的。纳努莉自己说，她爱爱德华，但不想毁掉他的生活。

然而他们还是结了婚，这是一桩少有的幸福婚姻。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在他的职务阶梯上青云直上。他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又善于言辞，在共青团内不可能不高升。确实，他年年都上升一个阶梯。

1951 年，他被批准为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翌年，他便当上了书记，之后，成为库塔伊西州团委第二书记。1953 年，任命他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库塔伊西州委指导员，同年批准他为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

在他的生涯中，1956 年 3 月 9 日开枪扫射第比利斯大学生示威游行的事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6 年的抗议活动

在那个年代，格鲁吉亚的“主人”是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他出生在库塔伊西，他 22 岁的时候离开格鲁吉亚，去军队服役。30 年以后，他才返回故乡。

姆扎瓦纳泽是军队的职业政工干部，1937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历任兵团政委、若干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战争结束时为中将军衔。战后，在哈尔科夫军区、基辅军区、喀尔巴阡军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基辅，他认识了战后在乌克兰工作的赫鲁晓夫。

斯大林死后，逮捕了贝利亚，开始为格鲁吉亚物色第一书记，这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想起了他。

在斯大林的晚年，格鲁吉亚特别艰难。在那里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进行了大规模逮捕，筹划了几个大案件，这都是对着贝利亚来的。领袖打算消灭他。

斯大林死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立即把自己的人安排在格鲁吉亚的领导机构中。他让 A. И. 米尔茨胡拉瓦当上

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米尔茨胡拉瓦是阿布哈兹部长会议前主席，之后在莫斯科做了半年的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指导员。他被调回到格鲁吉亚，但在 1952 年的 3 月的所谓的米格列尔人民族主义集团案件中被捕。这个案件是直接针对本人是米格列尔人的贝利亚的。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在 1953 年 3 月把他释放了。确实，米尔茨胡拉瓦领导格鲁吉亚总共只有几个月。当 6 月逮捕贝利亚的时候，米尔茨胡拉瓦匆忙地参加到谴责者的行列中去，但没有保住职务。

赫鲁晓夫不了解格鲁吉亚的干部，因此担心贝利亚的人还留在那里。他需要他信得过的人。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不知道共和国发生的事情，没有经济工作经验。但他做候选人能使赫鲁晓夫满意。他人可靠，是格鲁吉亚人，至于他早就失去了同共和国的联系，不是地方上层的人，这恰恰是好事，这样他将不得不需要依靠莫斯科。在 1953 年中央十月全会闭幕以后，姆扎瓦纳泽就被派往格鲁吉亚。他开始清理那些与贝利亚有联系的人，完全是按斯大林的方式干的。

姆扎瓦纳泽于 1954 年 4 月向莫斯科呈送了一份报告，说“被揭露出来的贝利亚、科布洛夫、戈格利泽和杰卡诺佐夫等党和人民的敌人的亲属继续呆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合适的”，并请求把所有这些人驱逐出去。尽管贝利亚的亲戚多年没有见过贝利亚本人，根本没有参与过他的犯罪活动，还是通过了这个决定。而且把所有的人都从家乡赶了出去。不但禁止他们住在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的土地上，而且禁止他们住在苏联的所有大城市。他们都处在安全机关的监视之下。

姆扎瓦纳泽让赫鲁晓夫感到十分满意。甚至 1956 年的流血事件也没有对他造成不利，当时格鲁吉亚是因斯大林而发生了骚乱。斯大林死后，格鲁吉亚每年的 3 月 5 日都要举行集会，向他的纪念像献花，孩子们要朗诵歌颂逝去的领袖的诗歌。1956 年也安排举行了这样的活动。是年 2 月召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 月 25

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大会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工作，已经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在非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讲话。这就是说，应当重新审视官方对已故领袖的态度。对他已不像以前那样尊敬。赫鲁晓夫的发言只有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知道。他拿着在最后一分钟还在修改的讲稿走上讲台。但在讲话过程中，脱离开讲稿，即兴讲了起来。他的演讲没有做记录。因此在代表大会之后对他已经做完的报告整理了一个星期，对它进行加工、润色，“充实”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句。

3月5日，中央委员会做了“关于介绍赫鲁晓夫同志做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决议：

“1. 建议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非党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介绍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2. 将注有‘不得刊印’字样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分发给各个党组织，将小册子上的‘绝密’字样取掉。”

在各个党组织宣读报告之前，有关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各种说法早就传到了格鲁吉亚，那里已经翻腾起来。谣言四起。党的机关还没有来得及制定出应如何对待斯大林的建议。赫鲁晓夫的讲话对于大多数上层官员来说是绝对意想不到的事。姆扎瓦纳泽不知如何是好，没有取消悼念的仪式，但采取了限制悼念活动的某种犹豫不决的做法。但这些模棱两可的做法反而激发了反政府情绪。

在领袖去世3周年那一年，第比利斯、哥里、库塔伊西、苏呼米和巴统的青年人走上了街头来捍卫民族英雄的名声。在第比利斯，有6000多人参加游行示威，主要是大学生和中学生。阿布哈兹的游行示威演变成了格鲁吉亚人和米格列尔人反对俄罗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民族冲突。

1996年的《大众报》刊登了当年就这个热点问题编写的题名《关于格鲁吉亚共青团现状》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纪念日活动的筹

备工作在2月底就开始了。反苏的民族主义的谣言，歪曲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流言蜚语传遍了第比利斯，而后传遍了共和国。但是对这一切没有给予应有的清醒评价。采取的某些措施不但没有使局势平静下来，反而引起居民的激愤和愤怒，使局势复杂化。不知是根据谁的命令，禁止花店制作和出售花圈，要学生们保证不去参加前往斯大林纪念像的游行，等等。

"3月4日傍晚，人们开始向斯大林纪念像聚集。纪念像旁边的仪仗队每隔两三分钟换一次，人们朗诵着歌颂斯大林的诗歌。

3月5日，有组织的游行队伍开始向纪念像进发。

3月6日，市内的形势像昨天一样。

3月7日7时左右，农学院和畜牧兽医学院的大批学生高举着斯大林的画像，捧着花圈，唱着歌，喊着'列宁和斯大林万岁'的口号，联合了许多市民，通过市中心向纪念像进发。

3月8日这一天早晨大学和农学院的大学生开始游行。8 000人到1万人的人群进发到格鲁吉亚共产党大楼，要求在市内悬挂旗帜，悬挂斯大林的画像，在3月9日的报纸上刊登斯大林生平的材料。在这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广播里播送起歌唱斯大林的歌曲。

在市苏维埃和外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上挂起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还是这一天，人群又围住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姆扎瓦纳泽向集会的人们发表了讲话，保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策略——不干涉和尾巴主义策略。

3月9日夜间，城市里挂起了旗帜、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街道上充满着节日的欢乐。上午9时，斯大林纪念像前和临近的街道上聚集了大约8万人。

上午10时，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书记谢赫尼阿什维利宣布，纪念斯大林的群众大会开始。大会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尔后宣布集会结束并在企业、机关、高等学校和中学举行群众集会。但是人们并没有散去。对群众大会的领导权转到了一个所谓'事务

主席团’手里。

‘事务主席团’让一些人发了言，这些人在发言中号召撤换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人，诋毁苏维埃政权，要求给党和国家的某些敌人恢复名誉，呼喊民族主义口号。晚上宣读了所谓的宣言，其中包含明目张胆地要求撤换苏联的现领导人和要求格鲁吉亚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号召。

党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试图控制主席台的愿望没有成功。晚上10点钟以后，在‘事务主席团’的建议下一帮奸细和破坏分子钻进邮电大楼，被那里的值勤士兵扣留（游行示威者在邮电大楼内寻找无线电发报室，想在那里报道第比利斯发生的事情。他们向莫斯科发了电报，要求不要触动斯大林。——作者）。

得知这些情况以后，聚集在斯大林纪念像的人们冲向邮电大楼，试图解救被抓的人。他们使用棍棒和石块对付守卫邮电大楼的士兵。士兵们向前来包围的人群开枪还击。邮电大楼附近有7人被打死，15人受伤。某些被击毙者的尸体和受伤者被人们抢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用汽车把他们拉走。

邮电大楼的射击声、喊叫声、受伤者的惨叫声、他们叫嚷要为流血向俄罗斯人复仇的呼喊声，使聚集在纪念像旁的人们困惑莫解、张皇失措和愤怒。一群人曾试图夺取放有枪支的警察局，乘车沿街呼喊：‘俄罗斯狗枪杀了我们的兄弟！’

两个摩托化步兵营和护卫部队已经开到那里。士兵们包围了聚集在纪念像旁的人群，据许多目睹者所见，曾用冲锋枪扫射纪念像旁的人群……”

军队开进了市内，允许他们使用武器。结果有21人死亡，60多个人受伤。安全机关抓走了400名示威者，给在群众集会上发言和向政府发出呼吁书的39人判了罪。

这是我国自1920年以来的第一次反政府骚动。起初，打算把这些活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定性为反革命阴谋。但后来认识到，这会造成不良印象：社会主义早就胜利的国家怎么会出现反革

命？而且在格鲁吉亚进行大规模审判会引起义愤和越来越与中央政权疏远。

苏联领导人对3月事件中爆发出来的激烈的反苏情绪，特别是号召格鲁吉亚独立，感到害怕。尤其是姆扎瓦纳泽转到莫斯科的那封他收到的匿名信。信中建议他召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根据宪法通过格鲁吉亚退出苏联的宣言，因为3月9日的流血事件已经使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永远分离开来了。

大批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派到了第比利斯。其中之一是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他后来写道，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简单地定性为格鲁吉亚人对赫鲁晓夫报告传闻的自发性反应。因为谁都没有告诉人们，赫鲁晓夫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作是损害格鲁吉亚的民族感情。

博布科夫摘录了哥里当地报纸一位女编辑的一段话。她说：

“你们要求我放弃斯大林，但是你们明白吗，我生在哥里，我在斯大林家对面的房子里长大，我毕业于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中学，后来又毕业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我上学靠的是斯大林助学金，我的论文写的是斯大林。最后，我现在是《斯大林时代的人》报纸的编辑。我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5月，苏共中央审查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56年3月5—9日事件的报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相当温和的《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错误和失误》的决议。建议共和国各级党组织把“深刻解释苏共二十大决议、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作为重要任务，建议党的机关采取果断措施消除贝利亚作风的后果，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

1956年的3月事件给共和国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这些事件在1989年驱散第比利斯群众集会时产生了令人痛心的影响。对于全国来说，第比利斯可怕事情的爆发是极其突然的。在共和国之外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理解和感觉到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情绪，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情绪，是被最高领导言论中的过分的乐观主义和东方式的冠冕堂皇所掩盖着的情绪。

亚历山大·特里福莫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①]在1962年4月到第比利斯旅行之后在日记中记了他所观察到的奇异情景："主要印象是某种朦胧的忧郁，内心中隐藏着的不可名状的东西，没有用语言和诗歌表达出来的东西。格鲁吉亚的爱国主义者（或者是民族主义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自己民族已经消逝的古老辉煌怀有历史性的悲伤，斯大林时代是对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的一种补偿。尽管斯大林对格鲁吉亚人也如同对其他民族一样进行了惩罚，甚至比其他民族惩罚得更厉害，而且他也已不想把自己看作是格鲁吉亚人。

"斯大林一死，突然就失去了自己在各个民族中的某种优越感，其后出现的是某种负罪感、忧虑感和内心的伤痛。接着就是沉默。我觉得，谁都不愿意去触动这个话题，但这个话题是摆脱不掉的……他们认为，在这个话题上已为他们设置了禁区。而要诗歌作品中装做什么事情也不曾有过，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那样，可又不行。当他们为了避免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而不敢说商店里没有肉卖的时候，那里哪能再去谈这个话题呢……"

在对斯大林的这种特殊的爱中，反映了潜在的受辱感和对自己地位的不满。这些情感在改革年代中出乎所有苏联人的意料之外爆发了出来，于是格鲁吉亚就首先要求退出苏联，要求独立。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1964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停在拉兹杰尔纳亚车站的12节车厢里，喝得酩酊大醉的格鲁吉亚退役士兵吵吵嚷嚷。他们公开表

①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苏联俄罗斯诗人、社会活动家、作有长诗《春草园》、《瓦西里·焦尔金》、《山外青山天外天》等。苏联《新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译注

述对赫鲁晓夫的不满，维护斯大林时期的一切行动和秩序，赞扬马林科夫的政策。”

这就是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在谈到斯大林时特别小心谨慎的原因。在1961年秋季召开的第22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再一次谈到斯大林的罪行。10月30日，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工作的那一天，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斯皮里多诺夫宣读了将斯大林的尸体从陵墓中迁移出来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切夫的支持。下一位发言的应该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预先给他交代了任务。但是姆扎瓦纳泽脖子上缠着绷带来到了10月30日上午的会议，他小声说，他嗓子发炎，说不出声来，不能讲话。于是派格鲁吉亚部长会议主席吉维·贾瓦希什维利代替他上台发言。他是姆扎瓦纳泽忠实的支持者，与他共事20年，应当搭救老同事。他相当模糊地说，格鲁吉亚同意把斯大林的棺材移出陵墓。代表大会表决赞成这一建议。10月31日夜，装有斯大林尸体的棺材被搬出了陵墓，埋在了克里姆林宫墙下。

清道夫的作用

在1956年3月的那些日子里，谢瓦尔德纳泽采取了有分寸的立场。他本人没有参加示威活动，但也不抨击示威活动的参加者。上边看中了这一点，于是把他从库塔伊西调到首都当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当时他28岁。第二年他就成了共和国共青团的领导人。

他颇得瓦西里·帕夫罗维奇·姆扎瓦纳泽的赏识，1956年事件对后者没有产生任何不利影响。1956年，当莫洛托夫、马林科

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试图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时，姆扎瓦纳泽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作为回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让姆扎瓦纳泽当上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这巩固了他的地位，也使他免受莫斯科监督员指摘的危险。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感到自己成了握有整个格鲁吉亚全部权力的主人，这种状况就为共和国机关中的大规模腐化提供了沃土。当时就有传言说，第一书记的家族与官员们大谋私利的活动不无干系。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忘记了他的仕途全是靠了赫鲁晓夫，1964年他积极参加了准备推翻他的前恩人的活动。他不仅自己热烈支持，还鼓动其他显要的党的书记们支持拿掉赫鲁晓夫的想法。现在该是勃列日涅夫欠姆扎瓦纳泽的情了，这也延长了他的执政年限。

同共和国第一书记的良好关系帮助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沿着共青团仕途上的每一个台阶上升。他的党内仕途则开始得并不太顺利。1961年，姆扎瓦纳泽让他当上了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而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却向朋友们抱怨说，让他感到不满的是，这个区虽然美丽，是历史圣地，但在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作用并不显著。过了两年，又把他调到第比利斯的一个区当区委第一书记。他在共青团的同事记得，就在那些年，谢瓦尔德纳泽已忧伤地诉说过共和国中大量的营私舞弊。他本人称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是个性格温和容易轻信人的人，而且宽容大度地认为，对共和国的各种丑事负有责任的是那些挑选不当的干部。但是，对这一点人们也有另外的看法。

正当谢瓦尔德纳泽试图让共和国的头头注意他周围的某些人的不轨行为的时候，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被调离了党的工作，先被任命为共和国社会治安部（在1968年该部改名以后他成为内务部长）第一副部长，一年以后提升为部长。这个对刚刚起步的政治家是危险的职位，并未妨碍他的高升。相反，莫斯科已经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忠诚的反贪污战士。有人说，他命令早晨不许出租

车出车，但是带有“棋盘格”标志的出租汽车照样在第比利斯的大街上奔跑，所有冒充出租车司机的私人汽车司机都被警察局逮个正着。他试图用他所有能用的一切手段同营私舞弊做斗争。他清查了侦察机关和监狱机关，从共青团里挑选青年人调进内务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确信，一切都无补于事。那套体制正在用自己的精神改变人们的思想。

他做了7年内务部长，获得了少将军衔。后来常常有人提及他，说他把不少人关押到监狱里。但谁也没有说他受过贿或与不体面的事有牵连。而对其前任，这种话大家是公开讲的。内务部长的职务有可能使谢瓦尔德纳泽未来的官运夭折。人们很愿意从党的工作转到内务部去，但是进了那个大门就没有退回来的路。他能抱有的最大希望就是调到联盟部，调到莫斯科。而且苏联内务部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谢洛科夫他的格鲁吉亚同行颇为赏识。形势对谢瓦尔德纳泽非常有利。

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开始撤换中央和地方的党的领导人。在有他的自己人的地方，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在乌克兰，勃列日涅夫的老友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尔比茨基于1972年当上了那里的第一书记，代替了赫鲁晓夫的人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也就在那一年，轮到了姆扎瓦纳泽。勃列日涅夫撤换格鲁吉亚第一书记的愿望逐渐形成了。

还是那个彼得·谢列斯特看到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1970年11月底，在埃里温庆祝苏维埃亚美尼亚成立50周年，各个民族共和国的所有第一书记都来到这里。勃列日涅夫也来了。晚上大家聚集在一起吃晚饭。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盖达尔·阿利耶夫举起杯来说：

“外高加索的共和国和睦相处，相互支持。带领我们的是我们的老兄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征求他的意见。

谢列斯特写道，“老兄”一词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大家都把它

当作玩笑。勃列日涅夫却警觉起来，说要警惕小集团主义和民族特殊性。谢列斯特认为，勃列日涅夫在人事方面把姆扎瓦纳泽看作一块鸡肋。但问题在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还挺健康，有精神，还想做点事，而姆扎瓦纳泽已经是快 70 岁的人了，需要一个新人来接替他。

有人说正是谢洛科夫让总书记关注很有前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内务部长。而谢瓦尔德纳泽则认为，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盖达尔·阿利耶夫向勃列日涅夫提到了他的名字。在这之前，阿利耶夫是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那几年，莫斯科特别尊重阿利耶夫。阿利耶夫当上阿塞拜疆第一书记之后，对干部进行了大量清洗，近 2 000 名干部被解职，其中部分人被逮捕。不少充公的财产列入国家收入。说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明白了，共和国贪污腐化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实际上，在阿利耶夫执政期间，共和国的高层只是换换班子而已。而新领导希望能够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米罗年科当时是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著名的工作人员，他来到阿塞拜疆进行检查工作，他谈了他到那里感到何等的惊奇：

"在商店，在国家的商业机构，都像在市场上一样，售货员自己独立定价，顾客同他们讨价还价。售货员的作为就像商店是属于他，而不属于国家的……"

人们期待谢瓦尔德纳泽能够做出像阿利耶夫那样的功勋来。勃列日涅夫做出让共和国内务部长当第一书记的决定是并不那么容易的。但谢瓦尔德纳泽第一眼看上去就能使人有好感，并相信他能对付任何事情。

按照各种规则进行了更换格鲁吉亚领导的工作。1972 年格鲁吉亚的党组织受到了严厉批评。谢瓦尔德纳泽当选为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然后让瓦西里·帕夫洛维奇·姆扎瓦纳泽退休。同年年底，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那一年，他才 44 岁。

谢瓦尔德纳泽是在苏共代表大会（指 1971 年召开的苏共 24 大—译者）闭幕以后当上第一书记的，因此，他要当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得等上 4 年。到了 1976 年，在 25 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人面对愤怒的人群

1978 年 4 月，格鲁吉亚几乎又爆发了 1956 年的 3 月那样的事件。那一年，命令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通过新宪法，因为苏联的新的基本大法已经制订完毕。在现实生活中这不会改变任何东西，对所有共和国来说只是一桩走形式的事情，但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除外，因为从 1920 年起，这三个共和国的宪法保留着民族语言为国语的规定。

莫斯科命令外高加索的共和国向共同制度看齐。取消这个独立自主象征的试图在青年中引起了广泛的愤怒。格鲁吉亚的大学生像 1956 年 3 月一样，举行了示威游行，尽管他们明白，这一切可能会以悲剧结束。谢瓦尔德纳泽企图向勃列日涅夫做出解释。后者不乐意地回答说："这是意识形态问题"，并让他去找党的主要思想家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但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什么也不想听，断定说这种共和国语言的反常现象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4 月 14 日那一天，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要对新宪法进行投票。在第比利斯的政府大厦附近聚集着上千名青年人。而在共和国领导人中，有人准备动用武力，使用军队进行还击。谢瓦尔德纳泽再一次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提醒 1956 年的流血事件并请求报告勃列日涅夫说，格鲁吉亚的形势极其严峻，他作为第一书记一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治安。总之，谢瓦尔德纳泽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善于说服人的办法，达到了目的——格鲁吉亚语仍然是

格鲁吉亚的国语。

他出来，走向聚集在政府大厦的大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说："弟兄们，一切都将是你们希望的那样。"

整个广场欣喜异常。谢瓦尔德纳泽成了共和国的英雄。

他既善于安抚青年，又善于做工作，因此，整个格鲁吉亚都感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同莫斯科争吵。而且，勃列日涅夫还珍重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治才能。过了半年，到1978年11月，让他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崇高的党的头衔不是所有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能取得的。

在那次11月全会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他同谢瓦尔德纳泽在做共青团的工作时就认识，但不是太熟。当戈尔巴乔夫当上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后，彼此就接近起来。戈尔巴乔夫来到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向他展示，如果不干涉农民的工作，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勃列日涅夫器重谢瓦尔德纳泽，在1981年奖给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他允许谢瓦尔德纳泽做不允许其他地方书记做的事情。格鲁吉亚的知识界生活得比较轻松，共和国保留着较多的思想自由。虽然这里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残酷，当格鲁吉亚获得独立时，人们在这点上还是没有忘记谢瓦尔德纳泽。

1983年11月18日，一个武装团伙，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年轻的格鲁吉亚艺术工作者、演员和医生劫持了第比利斯—巴统—基辅—列宁格勒航线上的一架"图—134"飞机，要求飞机飞往土耳其。由于气象条件不好，飞机快到巴统的时候不得不飞回第比利斯。当飞机降落时，国家安全委员会"阿尔法"分队的战士们突然占领了飞机。死了两名驾驶员、两名乘客和一名机上女服务员，领航员和另一名机上女服务员受了重伤。劫机者中的艺术家吉亚·塔比泽被击毙，艺术家达维德·米卡别里泽自杀，演员格恰·科巴西泽、艺术家索索·采列捷利和医生帕阿塔、卡希·伊维里耶利受伤。在兹

维阿·加姆萨胡尔季阿统治时期，劫机者被称颂为争取自由的战士……

谢瓦尔德纳泽当然是同首长搞好关系的行家。他忘不了给勃列日涅夫歌功颂德。很少有人能同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的那些笔杆子、年轻有为的助手们的东方式的能言善辩媲美。1981 年党的 26 大闭幕以后，谢瓦尔德纳泽回到了第比利斯，非常兴奋地向共和国积极分子会议的参加者们讲述自己的感受：

"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报告的每一个原则，每一个结论，他的每一个词都表现出列宁的实事求是、列宁的坚定的目的性、对分析当代事物的真正的列宁的科学态度。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站在讲台上，对每一个人是那么友好，那么亲近。而且每一个人都看到了，都全身心地体验到了他在代表大会上所思考和所做的事。"

在改革年代，有人多次向他提起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尖刻地问：您什么时候是真心实意的，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是歌颂他的时候，还是现在，号召彻底改革的时候？谢瓦尔德纳泽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必须的手段：

"我们对莫斯科不是俯首帖耳，我们只是想创造条件更好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不久以前大家才知道他那不怎么令人有好感的发言。1980 年 6 月 23 日，苏共中央全会事后讨论出兵阿富汗的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发言说，这是"对阿富汗所采取的大胆的，惟一正确的，惟一英明的行动，都会被苏联人满意地接受"。

自然全会的所有与会者都给予支持，但为什么这么热情地支持呢？谢瓦尔德纳泽没有放过颂扬列昂尼德·伊利奇的机会：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人能比得上列昂尼德·伊利奇，他是位很有威望、始终不渝的国务活动家，他得到大家深深的敬意和信任。作为列昂尼德·伊利奇·勃列日涅夫这位非凡活动家的见证人，你读着他的谈话记录，读着他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力作，听着他

就国内外问题发表的讲话，你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骄傲，会认识到，领导党和国家的是位把渊博的学识、列宁的原则性、无产阶级的坚定性、革命的胆略、高度的人道主义和少有的外交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的人。”

是的，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的发言稿是行家写的，而他确实是以真诚的热情发表这些讲话的。

应当承认，谢瓦尔德纳泽是一位有心计、非常敏锐，但不是胆小的政治家。人们讲着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可能是传闻，但正是在他的周围产生了这样一些传闻，这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97 年秋季，在第比利斯举行当地足球队“狄纳莫”与伏罗希洛夫格勒“曙光”队的比赛。结果为零比零踢平。当时出现了这样的形势，在观众看来，裁判应当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人的门前判罚点球。裁判没有这么做，“狄纳莫”队于是就失去了金质奖章。情绪激动的第比利斯足球队员们暴躁起来，为数不多的警察制止不了他们。那时，从政府包厢里走出了谢瓦尔德纳泽，使咆哮的人群安静了下来。

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摩托艇

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当选为总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赞扬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来了，并坚决支持他的尚未真正形成的路线。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说，整个世界都支持戈尔巴乔夫当选，他援引《华盛顿邮报》，狡黠地补充道：

“我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喜欢别人赞扬他，但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人说的。”

大厅里哄堂大笑起来。

谁都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会任命他当外交部长。戈尔巴乔夫需要的与其说是职业外交官，这样的人在部里有很多，倒不如说是志

同道合者、同盟者。有一次，他们在皮聪大[1]休假，谈到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时，谢瓦尔德纳泽以掩盖不住的苦恼说：

“一切都腐败了，一切都需要改变。”

戈尔巴乔夫在同已调到最高苏维埃的葛罗米柯谈话时问他，以他的眼光看谁当外交部长合适。葛罗米柯立即说出了他的第一副手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然后不情愿地又举出两个人选：一位是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另一位是驻法国大使沃龙佐夫。

戈尔巴乔夫听着没有兴趣，又问：

“您看谢瓦尔德纳泽怎样？”

即便是十分镇定的葛罗米柯也很惊奇：一个共和国的党的书记去当外交部长？但这时他克制住自己，说：

“不，不，我不反对。我也知道，这是深思熟虑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解释说，外交部长这个职位需要一位有声望的政治人物，需要一位能适应变革的人。葛罗米柯对新的总书记没有敢表示异议。

戈尔巴乔夫在做出最后决定的一两个星期以前，向第比利斯的谢瓦尔德纳泽打电话说：

“我对你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想法，有两个建议。眼下还没有具体定下来。但这两个建议需要你到莫斯科来。”

谢瓦尔德纳泽按照惯例说，对于他最重要的就是得到总书记对他现任职务的支持。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需要。1985 年 6 月的最后几天，戈尔巴乔夫又打电话给他，建议他当外交部长这个职务。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从内心感到惊奇，说：

“什么我都能猜想得到，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我需要考虑考虑。而您也应当再考虑考虑。我不是内行……我是格鲁吉亚人……

---

[1] 皮聪达，原苏联、现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城镇，位于黑海滨，是有名的疗养胜地。——译注

可能会出问题。”

第二天上午，他来到莫斯科。在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他摆出了所有“反对”的理由。外交是个职业，而他没有经验。但主要的，应当由俄罗斯人来担当这个职务。

“这个问题已经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已经同中央书记们商议过了。

“你这个人选，葛罗米柯是支持的。至于民族问题，是的，你是格鲁吉亚人，但你还是苏联人！没有经验？这也可能是好事。不是吗？我们的外交政策需要新鲜的观点，需要勇气、动力和创新精神……”

谈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召集政治局会议。

“我们找不到第二个葛罗米柯，”——他说，“他有经验，了解对外政策的问题。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当年开创自己的外交道路时也没有现在所掌握的经验和知识。我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交谈过推举谁担当外交部长的职务。资深外交官我们这里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工作者是科尔尼延科。契尔沃年科既可担任党的工作，又可做外交工作。多勃雷宁也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但我们有完全另外的想法。外交部长的职务需要有声望的人物担当，这个人要从我们中间，从你们中间出，对他，我们要有了解，要信得过。”

葛罗米柯试探着插了一句话：

“培养了一大批外交官。”

戈尔巴乔夫没有理他的话。

“结果是，我们决定推荐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他是位成熟的活动家，原则性很强，了解党的利益。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是位久经锻炼的人，坚定不移的人，善于解决问题的人。还必须指出这样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党的中央机关里必须反映这一点。我相信，同志们，这是正确的决定。”

而后葛罗米柯做了发言，他总是听从首长的意见。他说：

“我提议支持这个建议。谢瓦尔德纳泽同志是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一点对于外交部长来说十分重要。”

7月1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会。谢瓦尔德纳泽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顺便说一句，在这次全会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当选为中央书记。

葛罗米柯腾出办公室以后，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来到了斯摩棱斯克广场。在多层高楼的入口处，部长秘书处处长迎接他，把他送到7层楼，指给他706号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所有前任，从维辛斯基起，都在这里坐过。谢瓦尔德纳泽让把副部长们找来，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

“我的情况可不好。我对外交政策了解得太少。我只能向你们保证，我的工作不会让我在你们面前丢丑，不会让你们为我害臊。已经有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威望，我将会特别困难。我怎么能和他这个外交界的巡洋舰相比。我只是条小船，但是一条装有马达的摩托艇。

这个玩笑让大家很喜欢。

您晚上有什么安排？

当任命了谢瓦尔德纳泽之后，部里的精英们都消沉起来。他们认为，如果是论专业，应当是科尔尼延科当部长。如果是看政治，应当是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当部长。高傲的外交官们，大多数毕业于培养杰出人物的国际关系学院。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给他们派来了外省人，格鲁吉亚人。

职业外交官们具有抱成一团的兄弟情谊。他们为自己的专业知识自豪，不喜欢那些被提拔上来的人，认为他们如果做的是一般的外交工作，永远也不会得到这么高的职位。在吸烟室里的人们鄙视

地称新部长为“库塔伊西的共青团员”。他们说，他不但不知道世界，就连苏联也不太熟悉，不会讲外语，甚至连俄语说得也不怎么样……他们认为，对外政策将由新的总书记自己来管，而谢瓦尔德纳泽，这位过去的搞内务部工作的人，不过是用来改革部里的事情，把那些不干实事、只去外国走走的纨绔子弟轰走而已。他们等来的是总书记派来管他们的人。

前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嫉妒地看着自己的接班人，对他儿子发牢骚说：

“谢瓦尔德纳泽要惩罚专业干部，因为很多外交官没有给他唱‘赞歌’，他们维护尊严，对他没有卑躬屈膝。部里笼罩着消沉和恐惧的气氛。”

但一切并不是这样。谢瓦尔德纳泽没有进行清洗，连一个人也没有解雇。相反，部长办公室的门对本部的广大工作人员是敞开的。谢瓦尔德纳泽邀请他们来，不是要申斥他们，给他们下指示，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不管到哪个国家，总要对使馆的外交官们发表讲话，向他们讲述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对记者们也是坦诚的。

在他的领导下，有才能的人兴旺起来了，甚至那些持有其他政见的人也是如此。在一年的时间里，他深入研究新工作，把从事外交工作的全体人员都团结到自己身边来。他从第比利斯只带来一名助手——捷伊穆拉兹·格奥尔吉耶维奇·马马拉泽，他是位有才干的记者，后来到《消息报》工作。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塔拉先科、外交部美国司的一位领导人成了他的第二个助手。是的，部里进行了反对搞家属关系和任人唯亲的斗争。如果父亲和儿子都在外交部工作，就要求其中的某一位走人。但这是中央书记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的想法。他给部里派来了一位主管干部的新副部长，后者得到指示，要把更多的工农子女以及党员、团员积极分子招聘到外交部来。

谢瓦尔德纳泽同戈尔巴乔夫两个人制订的首要的行动计划是：

同美国进行正常对话；采取妥协办法，争取限制东西方的军事潜力；从阿富汗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最高任务是使国家从敌对包围中摆脱出来，减少对国家的压力，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以便进行改革，使戈尔巴乔夫有可能抓国内工作。

他对他外交部的助手坦诚地说：

“我本来可以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干，享受生活。但外交政策进入了死胡同，必须把国家从泥潭中拖出来。”

谢瓦尔德纳泽用于进行准备的时间显得太少了。就在 1985 年 7 月，他就去赫尔辛基参加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 35 国外长会议，庆祝最后文件签订十周年。在一定意义上，这还有让人们“认识一下”新部长这层意思。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谢瓦尔德纳泽的出现成为一大新闻，——在整个一代人的记忆里，除了葛罗米柯以外，未曾有过苏联的其他外交部长。

他的助手捷伊穆拉兹·马马拉泽有写日记的习惯，并将关于他的老上级的札记发表在《各族人民友谊》杂志上。谢瓦尔德纳泽在札记中是以谢多伊的名字出现的。

“1985 年 7 月 30 日，赫尔辛基。

我的天啊，他在笑！来自中欧小国某位阁下的脸上露出了神秘的惊奇。神秘的震惊掺杂着喜悦和不相信：天那，是新的苏联部长，他在微笑！何止是微笑，而且是开心的笑。甚至是俏皮的笑！

这是谢多伊部长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讲话内容一般，但赫尔辛基文件签订十周年却让他高兴。他是议程的主角，杰出的、锐敏的，经过良好锻炼的主角。

传说与期望同行，正在编写关于您的故事，您肯定是故事的主角。在赫尔辛基，谢多伊似乎当着舒尔茨的面把格鲁吉亚的尖刀插入贵重的刀鞘。”他说：

“——我已经放下了武器，现在轮到您了……

‘没有那回事，——谢多伊说，——说的是这个……’

舒尔茨为埃季克[1]引来一位个头不高但打扮精致、穿着鼠皮色紧身裤的姑娘。她满头蓬松茂密的头发，像一只老鼠。

——我想向您介绍我的最好的保镖，——舒尔茨说。

在他那里这叫‘量尺寸’。

谢多伊打量着被保护者和保镖的不相称的身材，紧紧地握着钢铁般的鼠皮色的手，说：

——我终于相信，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可靠的手里。

古里人[2]的幽默在欧洲舞台上的表演引起来量好了了哄堂大笑。在国际场合很久没有这么笑了。”

“如果有人要量您的尺寸，那就让他按您的口述来量好了——‘我的尺寸是多少’。

——同舒尔茨先生相比，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说他有经验，那么我们则有真理！

家庭聚餐。这是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上任这一天第一次举行这种活动。

——我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相比，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海洋上的一艘大邮轮，我是一只小艇，一只摩托艇！

谢多伊在世界公众、他的下属和同事们的轻松的笑声中走马上任了。”

前述笑话在复杂的外交战中及时给谢瓦尔德纳泽帮了大忙。再看一看他助手日记中的另一个片段。

“1988 年 3 月 23 日，白宫。

布什副总统：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安全问题非常让我们担心。

谢多伊：我相信，运动会将进行得很好。

里根总统：请多少给我们留几枚奖章。

---

① 爱德华的爱称。——译注

② 格鲁吉亚民族之一。——译住

谢多伊：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今天晚上的一轮谈判中进行讨论。如果贵方在战略防御倡议问题上将要做出让步的话（大笑）。”

谢瓦尔德纳泽有的是同人们打交道的办法，说一些让他们高兴的事，从而坚定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来到外交部会见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和从全世界召回到莫斯科的苏联驻外大使。据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回忆，当时驻瑞典大使站起来说，在整个国家的历史上总书记第一次来到外交部，这是给予他们的巨大荣誉。戈尔巴乔夫对此说，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应当过分夸张。谢瓦尔德纳泽微笑着说，他一定要执行总书记的建议，但现在他还是要宣读一下他自己已经写好的东西。大厅里的人们笑了起来。

部长遇到的时机真不轻松。同美国人限制核武器的艰苦谈判在等着他。必须在短期内掌握大量信息。当把这些问题分阶段给他介绍的时候，他简直陷入了绝望，说：

“我不应当答应干这个职务！这不可能弄懂。”

助手们对于他在瞬间能够弄懂所讨论的问题实质的能力感到吃惊。他的记忆力太好了，不亚于葛罗米柯。

谢瓦尔德纳泽没有装扮成无所不知的人。他在接见同美国人进行战略武器谈判的外交官时，不无羞涩地说：

“我是一年级的学生，你们不要不好意思，照实说。我想知道一切，想弄明白一切。”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他就要问，就要要求解释清楚。所有讲过的，他都记得住。天生的聪明和快速的反应，给他帮助很大。因此，他不害怕争论和“短兵相接”的谈判，不想与对手保持很大的距离。

谈判时，葛罗米柯不让使用同声传译，坚持要一句一句的翻译。这个办法使谈判拖延的时间过长，但却让葛罗米柯得到一定的时间进行思考。在使用同声翻译时要掌握细节、把握细微之处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如果给谢瓦尔德纳泽提供一句一句的翻译，他就要发怒：舍不得时间。他是外交部见到的惟一的一位最认真的听者。他在办案过程中既能抓住关键，又不漏掉一个细节，这种能力让外交官们感到吃惊。

外交部的首席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回忆说，谢瓦尔德纳泽改变了外交部的生活节奏。他工作到很晚，星期六也到斯摩棱斯克广场来上班。如果晚上有人不在办公室工作，他会感到奇怪。很快，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办公室，谁也不早于部长回家。

“工作以疯狂的办法和发疯的速度进行着，”——尤里·克维钦斯基写道。“部长给他们分派了工作，他自己的工作多得难以想象。会见和谈判，出国和接待，一个接着一个。谢瓦尔德纳泽丰富的政治经验，对人的了解，建立个人关系的艺术，评估和驾驭形势的艺术，产生了影响。”

由于同南韩的接近，与朝鲜的关系开始恶化，这时谢瓦尔德纳泽飞到了平壤。由于估计与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谈话不会轻松，他以极文雅的口气开始了谈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我说过：‘您在向我汇报之前先向金日成同志汇报’。”

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在同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初次谈判中谢瓦尔德纳泽镇定自若，把自己表现成倾听和尊重对方的新手，但十分小心谨慎。舒尔茨是主人，因此，他说：

“部长先生，您是客人，请您先说。”

谢瓦尔德纳泽面前桌子上摆着将要讨论的资料。他突然直截了当地说：

“您知道，我是新人。指望我对现在将要讨论的所有问题都了如指掌，从我这方面讲是愚蠢的。因此，事先请您原谅：给我准备好了材料，我可以读一读这些资料，这就是我现在能够做的一切。”

大家都喜欢，质朴、坦诚。美国人看到了，新部长是聪明人，自信，因此不怕承认有什么东西不懂。我们的外交官放心了：没有

发生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情。而谢瓦尔德纳泽完全意外地结束了第一次会见。大家要打算散去时，他突然说：

“我可以耽误你们一会儿吗?”

他说了几句舒尔茨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客气话。美国人高兴地摊开了两手，这时谢瓦尔德纳泽又补充了一句：

“在你们一方，舒尔茨先生，有经验，而在我们一方有真理。”

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一点。结果是苏联的部长讲了有决定意义的话。

他一下子改变了谈判的风格和气氛：我们同美国人有大量的问题和矛盾，我们现在激烈地进行争论，将来还要争论，我们为什么要以敌相待？在同舒尔茨进行第二次会晤时，苏联的部长说：

“我希望成为你们的诚实、可靠的伙伴，在取得对等愿望的条件下，还成为你们的朋友。”

这些话对舒尔茨产生了影响，他站起来，向谢瓦尔德纳泽伸出了手。

在谢瓦尔德纳泽当部长期间克服了苏联和美国之间存在多年的不信任。那时，对手迈出的任何一步都被看作是威胁，任何一次谈判都以相互指责和追究责任为开始，有时也以相互指责和追究责任而结束。

摆脱这条路线，看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年，1986 年 4 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名为“针对美国反苏路线的政治宣传措施”的文件草案。草案预定，在北美海岸的墨西哥湾举行军事演习，进行“示威行动，显示用苏联海军远程航空兵、火箭运载工具的力量打击美国的军事目标”。

戈尔巴乔夫划掉了这些建议，但是说了，“我们的宣传应当利用他们的痛点，揭露他们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展示他们如何掠夺世界……让他们坐立不安，让他们犯错误。”

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好，谢瓦尔德纳泽也好，都把这些话忘记了。

美国人为谢瓦尔德纳泽的魅力所倾倒。

“谢瓦尔德纳泽非常能干，”——他的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对我说。美国国务院的姑娘们都非常喜欢他，都为他做事，因为他非常殷勤周到，吻着姑娘们的手，说着恭维话。

他喜欢装作朴实忠厚的人，但却具有一般人看不出来的敏锐反应。有一次，在同国务卿结束谈判以后，他们走上大街，穿过记者们让出的一条小道走向汽车。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

“明天是休息日，您打算如何度过休息日？”

谢瓦尔德纳泽立即做出反应：

“您有什么建议？”

在两国的关系史上，两国的部长第一次相互到对方家里做客，与家人见面。但这不排除争论、气恼和相互的不愉快。但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却改变了——不愿意欺骗潜在的敌人，而愿意找到理智的妥协。

当谢瓦尔德纳泽同舒尔茨签署阿富汗文件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说，苏联即使是从阿富汗撤军，也要援助喀布尔。舒尔茨不同意这个立场，建议休会，以便同专家们进行磋商。助手们问谢瓦尔德纳泽：

“要是美国人不同意，我们该怎么办？”

谢瓦尔德纳泽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地说：

“我们就走，就再见。”

舒尔茨出来了，说，他十分遗憾，不能接受苏联的条件。谢瓦尔德纳泽对他表示感谢，行礼告辞。他在飞机上说：

“我有个感觉，等我们飞到莫斯科，美国人就会同意。”

说得真准。于是，我们就立即前往日内瓦，在那里签署了协议，并从阿富汗撤了军。

最初几次出国对于部长来说不是太愉快的，因为在飞机场、在大使馆附近遇到的是一些打着标语示威的人：阿富汗人要求从阿富汗撤军，波罗的海人要求还给他们国家的自由，犹太人要求允许苏

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到了华盛顿，谢瓦尔德纳泽突然从使馆大楼出来，走到示威者跟前，说：

“我知道有问题。请派三四个人来，我们去谈一谈。”

使馆的人惊奇地看着部长，因为这样做是不合理、不成体统的。

“外交部的人过去养成了另一种习惯，”——谢尔盖·塔拉先科对我说。“美国的外交公使有事来到了外交部。我迎接了他，在谈判结束后我送他出去。在告别时，他突然说：‘哎呀，我忘了转交一份重要文件’，并把文件塞到我手里。这是一份不允许出国的人员名单。美国人正在为他们折腾，在苏联时期同美国人根本就不谈这个问题，任何名单也不接受，不给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谈话的借口。如果你由于没有经验接下这个名单，那么你就要冒被解雇的危险。双手应当放在背后，不管如何也不要拿这份危险的文件。”

在第一次会晤时，舒尔茨小心地谈到不让某些人员出国的问题。谢瓦尔德纳泽责备地对他说：

“您为什么把人权问题放在第三等的次要位置。好，让我们每一次会晤先从讨论人权开始。”

舒尔茨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谢瓦尔德纳泽则心平气和地接过不让出国的人员名单。他没有做出空洞的允诺，在每一次同美国人会谈时，总要从国家安全委员会拿到允许下一批人出国的许可文件。本来，用愚蠢的原因不允许他们出国，主要是为了不要同统计出来的数字对不上。比如，某个研究所所长说：“没有任何人愿意离开我们的研究所”。或者地方党的大官承担了如下责任：“本州没有愿意出走的人”。任何人都没有认真严肃地承担保障个人享有自由进出国家权利的义务。这是苏联制度的特点：在大规模的隆重仪式上签署任何国际协议，可是根本不会根据签了字的国际协议去修改国内立法。

部长向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提出建议：让我们共同思考外交政策的新构想。往各个使馆发出了电报：我们期待着新的思想。弗拉基

米尔·斯图皮申大使回忆说，许多人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外交部为根据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修改立法同其他部门展开了斗争。外交官们确实是在哄骗苏共中央委员会，把向西方做出让步说成是取得的胜利，而后把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写进苏联法律。

谢瓦尔德纳泽是第一个认为外交部应当将世界发生的事情真实地告诉国家的人。他还认为，外交部应当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吸引到国内来，要利用世界的经验。

最要好的朋友关押在监狱中

正当新部长奔波于世界各地，会见各国总统、政府首脑，确立苏联外交的新风格时，在格鲁吉亚发生了可能毁掉他前程的事件。戈尔巴乔夫出于礼节问瓦尔德纳泽，他将推荐何人来担任自己家乡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提出田吉兹·尼古拉耶维奇·缅捷沙什维利。田吉兹·尼古拉耶维奇·缅捷沙什维利在谢瓦尔德纳泽那里当过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之后是苏共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近几年在莫斯科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但戈尔巴乔夫把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为年轻的农业书记准别尔·伊利奇·帕季阿什维利放在了共和国的首脑位置上。大概这是个错误。如果是别人在这个职位上，有可能使共和国免于灾难性的剧变。

帕季阿什维利毕业于格鲁吉亚农业学院，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上来的。他比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年轻 11 岁，但走着同样的由共青团到党的发展阶梯：领导共和国的共青团，担任斯大林的故乡——哥里——的区党委第一书记。1974 年，谢瓦尔德纳泽让他当上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帕季阿什维利做的第一件事是免除另一位中央书记——索利科·哈贝什维利。他们早就有矛盾，但在谢瓦尔德纳泽当政时，帕季

阿什维利保持着沉默。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一走，第比利斯的局势就变了。一位党的前区委第一书记被指控受贿，供出了哈贝什维利。

1985年的7月，谢瓦尔德纳泽刚坐进外交部的办公室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会在第比利斯就召开会议，解除了哈贝什维利的工作。索利科·哈贝什维利飞到了莫斯科，给谢瓦尔德纳泽打电话，请求帮忙。他们不但是同事，而且是亲密的朋友。索利科毫不怀疑，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能够搭救他——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是政治局委员，同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但谢瓦尔德纳泽连见都不想见他，在电话上说，他很忙。后来，当格鲁吉亚给他刑事立案的时候，他明白了，他有被捕的危险，再一次恳求谢瓦尔德纳泽见一见他，不过这一次是通过部长助理提出的。部长助理向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报告了索利科的请求，他自己又补充了一句说，应当帮帮忙，要不然这个人要遭大难了。谢瓦尔德纳泽沉默不语，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后来他说，他无权干涉，这是检察院和法院的案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谢瓦尔德纳泽明白，“哈贝什维利案件”是间接地对着他来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朋友。如果他要干预此案，要求戈尔巴乔夫过问此事，就会证明他与此案有关。人家就要不友好地问：为什么他干预？是想挽救无辜的人，还是企图掩盖案件，因为本人会受牵连？他不想同索利科见面。他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侦察此案的人肯定要向他的卢比扬卡的首长报告他们的会见。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研究哈贝什维利的案子。

从机关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谢瓦尔德纳泽做得是对的，要从人情的观点来看，则是恶劣的。他自己是得救了，可是却把朋友弃于灾难不管。而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索利科·哈贝什维利在莫斯科住进了医院。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还是直接把他从医院里抓走，带上了飞机，送到了第比利斯，关进了当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隔离审讯室。审讯进行了很长时间。大概是等着被告人支撑不住，为救

自己而供出谢瓦尔德纳泽。索利科支撑下来了，尽管他知道，他有被枪毙的危险。最后，判他 15 年徒刑。

真是令人惊奇，1989 年 4 月 9 日的悲剧事件拯救了哈贝什维利。这个事件之后，帕季阿什维利丢了自己的位子。第二年，格鲁吉亚最高法院哈贝什维利的刑期从 15 年缩短为 8 年。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基阿当上格鲁吉亚总统以后，宣布大赦，索利科获释出狱，但无事可做。当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以后，为老朋友成立了“民主和复兴”基金会。谢瓦尔德纳泽感到自己对不住索利科，想让他过上人一样的生活。

但索利科在劫难逃。他享受人生的时间不长。1995 年 6 月他被人打死。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谢瓦尔德纳泽的朋友的惩罚。另一些人则认为，杀人的原因比较简单——一个匪帮团伙想强占哈贝什维利在古达乌里建设的旅馆综合体。

出事那天，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正在外国访问。在回国途中，他在飞机上痛苦地说：

“唉，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他欠自己朋友的债太多了，现在他已是债台高筑，一辈子也还不清了，”——捷伊姆拉兹·马马拉泽写道，“索利科死的时候高声呼喊着：‘他们要杀死我!’他妈妈听到了这些喊叫声。他妈妈亲眼看着，他们把他杀了。当戴着挡风帽的杀手向他开枪射击的时候，她正好站在阳台上目送着儿子。”

“遗憾的是，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1986 年 6 月，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部会议上说，我们应当放弃以前的要求：苏联应当像任何可能与它对立的国家同盟一样强大。这种要求迫使它疯狂地武装自己，破坏了经济，从而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安全。整个世界都堆满了武器，然而却不能保障自己的公

民过上起码的生活。出卖石油给国家带来了1 800亿美元，但商店的柜台却空空如也，所有城市都实行票证，排队购买最必需的日用品。

谢瓦尔德纳泽的观点决定了他与军人的冲突。军人们看到，他们受到了威胁：部长呼吁实行合理的足够原则，这会导致限制军费开支。但这是军人们绝不能允许的。这是欧洲被称为战场的时代。人们被可能发生的战争吓坏了，不得不让自己生活在像是被包围起来的要塞里。

结束“冷战”的使命落在了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肩上。必须停止同美国的军事角逐，使国家摆脱国家承受不了的军备竞赛。了解实情的、受过良好教育、经验丰富的苏联外交官们不愿意考虑宏观问题，喜欢钻研细节。谢瓦尔德纳泽不是职业外交官。正是这一点非同寻常地帮助他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决定。

当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开始推行新的外交政策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对此却相当冷淡。美国人不相信莫斯科的政策会出现大转弯，认为俄罗斯人对他们又在玩把戏。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见改变了许多。著名外交官尤里·杜比宁发表他的回忆录说，这次会见是在1986年10月进行的。戈尔巴乔夫带着全面销毁核武器的庞大计划来到了冰岛首都，这是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他们还继续沉浸在过去的漫长争论之中。而戈尔巴乔夫以克敌制胜的姿态，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建议削减一半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同意在欧洲全部销毁中程导弹，冻结1 000公里以下射程的导弹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全部销毁这一级别的武器达成协议。最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进行停止核试验的谈判。这是为期5年的计划，这个计划应当导致全面放弃核武器。

美国总统对这么庞大的建议没有准备。里根需要时间以便同国务卿舒尔茨和专家们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希望，作为他让步的交换，里根应当放弃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是说，放弃在宇宙空

间搞反导弹武器的计划。里根的宇宙军事计划对苏联军队是个沉重打击。他们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武器库，足以消灭美国。如美国人真的能够把这些武器击毁在宇宙中，多年的努力不是真要化为灰烬？

“我将一直等着，”——戈尔巴乔夫意味深长地对里根说，“等着您对我做出让步。”

里根不想放弃自己的宇宙计划。他建议签署新的，哪怕允许在防御性宇宙武器领域进行研究工作的条约来代替 1972 年签署的反导弹防御条约。因为需要对发生另一方或者某个狂人突然想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的情况有个保证。

戈尔巴乔夫对此回答说：

“既然我们要大量削减核武器，那就应当相信，另一方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思想上，不想要破坏战略稳定的。看来，必须对反导弹防御条约的长期性树立信心。”

当谈判快要结束时，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准备甚至大量缩减核力量，但是不要决定反导弹防御条约的命运。否则缩减这些军备的全部战略将会落空。

“我们回到了原来的立场，应该结束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把双手一摊，说。

“莫非我们真要空手而回吗?”——里根苦恼地说。

“事实上就是如此，”——戈尔巴乔夫肯定地说。

当到了该告别的时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建议休会并延长会见，以便让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再试着考虑点什么。

“我们本来就有权利把会见延长一些，”——戈尔巴乔夫通情达理地说道。

苏方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是这样的。在未来 5 年内把进攻性战略武器缩减到一半。而在这之后的 5 年内双方完全放弃这类武器。在 10 年之内美国和苏联都不退出反导弹防御条约。禁止在宇宙中

试验反导弹防御武器，只允许进行实验室研究和实验室实验。

戈尔巴乔夫对里根说：

“如果经过10年你们仍然想继续制订你们的战略防御计划工作，那我们将来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就这么早解决这个问题?

里根再次要求休会。他同舒尔茨走开去讨论苏联的建议。美国人的讨论进行了很长时间。他们回到谈判室时，天已经开始暗了。

美国人做了两点修改。对第一个修改比较好研究，并达成了妥协。对另一个修改就比较复杂。美国人建议允许双方继续进行“反导弹防御条约所允许的研究、设计和实验”。这里的细节在于，苏联代表团认为只能允许不具危险的实验室中的研制——如不在宇宙进行实际试验，这种武器是造不出来的。

戈尔巴乔夫立即问：

“您的提法中没有指出实验室研究。这么做是有意还是无意?”

“是的，是有意的，”——里根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吗?”

“这使我非常不安，”——戈尔巴乔夫阐述自己的立场说。“这种表述让双方中的一方可以进行这些工作，并且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违反反导弹防御条约。我们不能从条约中去掉这一点说明，即试验只局限于试验室条件的试验。”

“您破坏了我们继续进行的我们通向战略防御计划的所有桥梁，”——里根说。“我不能同意您所要求的这种性质的限制。”

戈尔巴乔夫同样斩钉截铁地说：

“如果这是您在试验室问题上的最终立场，那么我们确实就得结束我们的会见了。”

“是的，是最终立场，”——里根予以确认。“但为了文本中的一个词您真要放弃达成协议的历史机会?”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一个词，而在于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同意在缩减核武器的时期，美国却扩展战略防御计划并把它带进宇宙。”

里根拿出了他的最后论据：

“我还是请您改变您的观点，劳驾，为了我，为了我们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走向人们。”

“请您同意禁止宇宙试验，”——戈尔巴乔夫坚持自己的立场。“其他东西我们不能同意。对于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同意了。对我们没有什么好责备的。”

“遗憾的是，我们就这样分手了，”——里根真诚地说。

“我也非常遗憾，”——戈尔巴乔夫非常失望地回答说，他本认为成功是唾手可得的事。“我希望达成协议，并为它做了能做的一切，甚至更多……”

不知去向的坦克

在雷克雅未克没有达到实际结果，但里根似乎相信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能够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试图一下子解决所有军事战略问题，这未必可行。但这次会见奠定了继续谈判的基础。谈判看来很复杂，因为谢瓦尔德纳泽不但要同美国人进行协商，还得同苏联军人们进行协商。同后者的协商有时更为复杂……谢瓦尔德纳泽的论敌一开始就出现在莫斯科。而且论敌不只在国防部有，在他自己的部里也有。

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是以前葛罗米柯路线的拥护者。科尔尼延科曾做过严厉的暗示，说有人提出了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建议，应当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他得到了总参谋部首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充分理解。后者在提到赫鲁晓夫缩减武装力量的错误决定时说，如果外交官们仍将执行危害国家的路线，总参谋部将停止同外交部的合作。

科尔尼延科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加以解决的。他已经失宠。在日内瓦同里根进行初次会谈时，科尔尼延科常常插话，攻击美国人，喧宾夺主，而戈尔巴乔夫不由得成了旁观者。这个脚色让

他不满意。他把科尔尼延科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当国际部第一副部长去了。从形式上可以认为这是升官，而实际上这意味着脱离实际的外交工作。

葛罗米柯同意军人们把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看作自己的助手的看法，认为不必要向进行复杂的裁军谈判的外交官们通报某些信息。谢瓦尔德纳泽则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

在戈尔巴乔夫当权时政治局就决定了把有关我国武器的某些信息提交给在日内瓦谈判的美国人，这当然是以相互提交为基础的。但国防部向日内瓦发了密码电报：向美国人介绍秘密资料，对我方代表团的非军人成员则不予通报。比如说，尤里·克维钦斯基就中程火箭进行谈判，但从来没有见过有关“先锋”火箭（“SS－20”）的资料。

不让外交官们掌握实际信息，这使得严肃的外交活动变得很复杂。苏联军人硬说，他们只掌握中程火箭的数量，而西方外交官指的是其他数字。戈尔巴乔夫要求国防部通报，有多少中程火箭部署在作战阵地，有多少放在弹药库里。结果发现，准确数据谁都没有，这是对外政策宣传局前局长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事后说的。有人向戈尔巴乔夫解释了是苏联怎样确定火箭的部署的。

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走近勃列日涅夫说：

“廖尼亚，应当在这个方向上再部署10枚携带核弹头的火箭。”

勃列日涅夫连看也没有看一眼送给他的文件，问道：

“怎么，真的应当这么做吗？”

“应当，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强大！”

于是勃列日涅夫就签署了关于扩大部署火箭的决定。

这种描述当然对苏联政治机制通过决定的程序有些夸大。但实际情况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军人们确实得到了他们几乎想要得到的一切。在这种形势之下，他们毫无顾忌地破坏了任何一个国际协议。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带有定向天线阵的

雷达站。在这里建设这个雷达站是违反莫斯科所喜欢的反导弹防御条约的。

苏联有权在东北方向设立导弹攻击预警雷达站。根据条约雷达站应当设在北冰洋海岸泰梅尔半岛的某个地方。但这需要巨资。因此决定在比较合适的地方设立雷达站。没有想到可能会出现丑事。只能由谢瓦尔德纳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翻转了托勒密宇宙体系①的整个画面。如果美国和北约不打算攻击我们，如果西方不是敌人而是朋友，那为什么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队和自己耗损自己的军事经济？为什么要用不可避免的战争来恐吓国家，号召人民勒紧裤带并更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

军人们抱怨起来。他们特别反对戈尔巴乔夫撤掉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的意图，那是著名的“先锋”导弹。美国人为对付这些导弹部署了自己的导弹，于是苏联的军事战略地位明显变坏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对克维钦斯基说，如果要撤掉这些导弹，就没有那么多核弹头来对付欧洲所有预定的目标了。总参谋部是认真地准备在欧洲进行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

在华盛顿，在签署了销毁中程核导弹条约之后，里根总统作为接待客人的主人，首先发表讲话。他没有放弃机会提到他爱说的那句谚语：“既要相信，又要检查”。他还用俄语用奇特的重音说出这句谚语，让人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译员重复了这些话。这时戈尔巴乔夫忍不住了，尽管在这种场合不应打断发言人的讲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无气愤地高声说道：

“您哪一次都重复说这句话。”

大厅里轰地一下响起一阵大笑。当把戈尔巴乔夫的话翻译给里根之后，他自己也笑了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

① 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的著作中完整阐述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体系。——译注

“怎么啦，我喜欢这句谚语。”

美国总统对俄罗斯民间谚语的热爱是可以理解的。美国人不相信苏联伙伴。在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之后，美国人提出了检查条约执行情况的问题：让我们相互派遣监督员。

在外交部，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管理局是由维克托·卡尔波夫领导的。后来他当了副部长。卡尔波夫来到导弹制造厂，他相信，可以让美国的检查员到那里去。在那之前，美国人已经说出了导弹的准确数字。卡尔波夫从工厂回来，大为震惊，向部长报告说：

“工厂仓库里还放着没有计算在内的导弹大约有 200 枚。”

原来，厂长掌握着一批数量不大的储备，以防万一。譬如说，计划突然完不成，备件供应出了问题，或者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就从储备中拿。但如何向美国人解释苏联经济体制的这种运行特点呢？

苏联军方把谢瓦尔德纳泽弄得糊里糊涂。他只能从西方伙伴那里了解苏联军方的事情。在签署限制欧洲大陆常规武器巴黎协议前夕，苏联军方公开宣布说，他们有 2.1 万辆坦克。而两年以前的数字比这多一倍！其他坦克跑到哪里去了？

对于西方来说，这已经不是秘密：国防部把一半坦克调到乌拉尔那边去了，也就是说形式上从欧洲撤走了。当军人们被逮个正着之后，他们说，8 000 辆坦克调到乌拉尔以外，还有 8 500 辆坦克封存起来，有 4 000 辆坦克当作废钢处理了。

谢瓦尔德纳泽不得不进行自我表白，而且伙伴们正在怀疑地看着他，他们不相信部长是后来才了解到这些诡计的。部长认为，签署了协议，就应当执行，如果欺骗了人家，就应当承认错误，如果什么事做错了，就应当道歉。在政治上利益是主要的，但道德和正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你要撒谎，那么别人也要欺骗你。

谢瓦尔德纳泽成了裁军、与周围世界相互理解、相互协作政策的化身。他向前走出的每一步都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把肩章有大星的将军们，把军工综合体的指挥官变成了无用之人。外交

部签署了与北约相互信任措施的第一批文件。苏联军人们极端害怕北约提出来的相互进行检查的建议。但是，外交官们证明说，在充分信任的条件下进行检查，无论如何不会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参加这些工作的大使斯图皮申这样写道。不过，在命令整理军营内务时还得再一次清扫厕所……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大胆地同国防部或者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对抗，如果他认为，它们的立场有害于国家的话。这种状况过去是没有过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局像是一个俱乐部，那里规矩是一切都事先商量，不进行争论。而谢瓦尔德纳泽则明确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请求支持我们的建议。当军人们断然拒绝改变苏联的官方立场时，谢瓦尔德纳泽采取了新的策略。外交官们制订了适合于我国的立场，同美国人达成了一致。之后，谢瓦尔德纳泽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说，有可能同美国人达成协议。于是戈尔巴乔夫就来协调同军人的关系。

被惹怒的军人们开始抱怨，说谢瓦尔德纳泽在他同美国人的谈判中超越了权限，他们干脆无视外交部长达成的协议。按瓦连京·法林的说法，谢瓦尔德纳泽与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将军（替代前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之间的争论极其激烈。气愤到极点的部长说：

"如果采用国防部的立场，那么你们自己跟美国去谈判好了。"

总参谋长对他的回敬也很激烈：

"如果偏重外交部的投降路线，我们就不为国家安全承担责任。"

尤里·克维钦斯基叙述了如何把他和总参谋长一起派往华盛顿消除当前同美国人的分歧。在起飞前，莫伊谢耶夫把大家召集到飞机旁意味深长地提醒众人说，他是团长，不允许外交官们向美国人泄露军方的思想和想法。据说，这种事情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而且军人们居然对美国人说，他们有好的谈判代表，而在我们这方面坐在谈判桌旁的外交部的"怪人"只会做出让步。众所周

知，将军们当然赞同只缩减别国的军队。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大明白，外交官们怎么还能找到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这件事情是这样结束的，在同美国人进行了多次艰苦的谈判后，莫伊谢耶夫将军信服了，在对话中很难再坚持他自己的立场，他举起双手，投降了，同意了美国人的所有思想。

谁丢掉了东欧？

有一种看法认为，精明的西方外交官很容易地愚弄没有经验的谢瓦尔德纳泽。但要知道，他进行谈判可不是单枪匹马，他的身旁始终都有职业外交官。

“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是我们大家的外交，”——接替他当部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对我说。“瞧，我们把外交政策人格化了，这减轻了历史学家的劳动……他同部里的全体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地工作，而基本思想，譬如“我国的安全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安全，都是我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是外交的辉煌时期，这使国家没有痛苦地走出了“冷战”，别斯梅尔特内赫这么认为。这是很强的创造性外交和积极外交的时期。随着谢瓦尔德纳泽到部里上任，新的机会开创出来了，很多外交官为之振奋。如果他受过外交教育，他可能看问题会更细一些，但是，职业的本质、职业的原则他掌握得很好。这是个复杂的职业。在外人看来，外交官的全部工作不过是在招待会上举杯祝酒、高谈阔论而已。外交是极其繁重的工作。

认识谢瓦尔德纳泽的很多人指出，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表现出了巨大的外交才能，这是没有料到的。他善于进行谈判，很有耐性，善于找到折中办法。他人很平常，但精明强干，带有高加索人的魅力。他利用这些品质得到了朋友，牵制了敌人。

“如果可以展示一下他的谈话记录，您会感觉到他的谈话是多

么细致,”——别斯梅尔特内赫说。“谢瓦尔德纳泽的风格完全不同于葛罗米柯。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有自己的说服对手的手段。我再强调一下，谢瓦尔德纳泽是 20 世纪下半叶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为我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指责他的政策没有产生成果是不公正的。”

“按照通常的说法，谢瓦尔德纳泽的政策是一连串让步的政策，他让出了东欧，因为俄罗斯的利益对于他是无所谓的。您同意这样的评价吗?”——我问别斯梅尔特内赫。

“不对。谢瓦尔德纳泽绝对是苏联的党务活动家。我想，他不会认为似乎他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故乡格鲁吉亚的利益。”

至于说到东欧，当时有两个方案：或者我们用强力办法不让东欧退出华沙条约，或者我们承认这些国家自己的利益，尽力确定他们同我们的利益关系。

“似乎我们能够领导东欧的一切，然而我们不能控制局势,”——别斯梅尔特内赫对我说。“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逻辑和动力。如果我们试图用强力干涉局势的发展，反对我们的将是整个世界。东欧迟早要爆炸，我国会遭到重大损失。”

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从东欧撤军。问题在于如何撤，是大吵大闹流血地撤，还是比较理智地不掀起新的仇恨浪潮、不要等到从背后开枪射击的时候撤。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把事情弄到头破血流的地步。没有破釜沉舟，给建立新关系留下了机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灭亡不是因为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当决定开放两个德国的边境的时候，东德人就大批涌进了西德，社会主义的东德实际上已不再存在。后来发生的一切只是在法律上将已出现的变革固定下来。

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敌指责他说，他过分频繁地向自己的西方伙伴说“是”，而应当常说“不”。但职业外交官却不认为部长过分迁就。当伙伴无论如何不同意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建议的时候，他表现得强硬、寸步不让。

“当进行关于德国命运的谈判时，德国人提出了我们不满意的方案，”——塔拉先科回忆说。“工作组在深夜还进行着谈判。早晨向部长报告说，关键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怎么办？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平静地说，请转告，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我不去参加会见。10分钟后，我们的建议被接受了。”

国家的地位不强大，甚至连打平手都难以达到，而他竟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但只有在确实必要时才采取这种办法。

“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存在时，埃里希·昂纳克要求我们，不要让苏联士兵走出军营，因为他们的穿着会让老大哥丢脸。”——谢尔盖·塔拉先科回忆说。“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要求粉刷军营和院墙。或者让我们的战士换上好的军装，或者让他们呆在军营里。”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以后，必须用外汇维持驻扎在德国的苏联军队。国家有这么多钱吗？

在谢瓦尔德纳泽之前，关于钱的问题，不管是外交部，还是国防部，谁都不操心：让政治局决定，就有钱了。谢瓦尔德纳泽开始问道：有用在这里的钱吗？有没有必要打造军人们想要的所有武器？为什么能够生产成千上万的坦克而不能为坦克手们建设住房？

苏联的外交官不习惯提这样的问题：为了什么和为什么？他们习惯执行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则要求说出，苏联的实际利益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知道，不花钱什么也得不到。他常常让他的助手陷入困境。他拿过文件，问道：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立场？”

助手们惊奇地耸耸肩说：

“是的，我们总是采取这种立场。”

谢瓦尔德纳泽摇摇头说：

“这不是答案。你们向我解释，这种立场有什么意义。这个立场对我们有利吗？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吗？”

谢瓦尔德纳泽的困难在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思考。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是容易搞糊涂的，但需要相好，什么事该怎么做。时间像快速列车一样奔跑。应当在幕布落下之前及时做出反应。在这里，谢瓦尔德纳泽十分小心谨慎。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他在行动中就自由得多。

譬如说，德国的合并正在进行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在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进行会晤时就同意统一的国家自己决定是否希望参加北约。人民有选择同谁在一起的权利。布什是满意的。谢瓦尔德纳泽和当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国际事务的书记法林担心起来。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把戈尔巴乔夫领到旁边，向他暗示什么。提醒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超出了初步协议的框架，——在莫斯科时双方是希望看到统一的德国成为中立国家的。当时，戈尔巴乔夫想把这个问题推给部长，说德国问题基本上应当由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贝克去进行研究。感到事情突如其来的谢瓦尔德纳泽公开反对起自己的总统来：

“这个问题应当由国家的首脑们去解决。这里需要政治决定。”

谢瓦尔德纳泽不愿意对这个决定承担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后来人们还是咒骂他，说他和戈尔巴乔夫没有要求统一的德国退出北约。但阻止德国的统一只能用坦克。试图阻碍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这意味着要对它进行恐吓和威胁。在恐吓和威胁的基础上是建立不起政策的，从这里反正是什么也不会得到的。反而会对两国关系留下沉重的烙印。

血腥的四月

1989 年 4 月的形势对于谢瓦尔德纳泽显得更为复杂。在半年之前，1988 年 11 月，格鲁吉亚已经发生过骚乱，那是对宪法修改案和有很大争议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的反应。当时谢瓦尔德纳泽

向共和国做了解释，紧张形势平息了下来。

1989 年春季的第比利斯事件更具严峻性。4 月 7 日，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准别尔·帕季阿什维利向成为中央书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报告说，格鲁吉亚正在举行群众集会，集会参加者们要求共和国退出苏联。

那几天戈尔巴乔夫正在国外。党内主持工作的第二号人物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召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在格鲁吉亚整顿秩序并为此向第比利斯派遣军队的决定。当天晚上，谢瓦尔德纳泽陪同戈尔巴乔夫从英国飞回来了。前来迎接总书记的政治局委员们直接在机场上报告说，在第比利斯的政府大楼前正在举行未经许可的群众集会，已经往那里派了内务部队。切布里科夫对戈尔巴乔夫说：

“帕季阿什维利坚决要求中央给予援助。”

他指的是第一书记从第比利斯发来的密码电报。电报称：“共和国的形势极其严峻。实际上正在失去控制。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采取非常措施。”

戈尔巴乔夫命令说：

“只能使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让谢瓦尔德纳泽飞到那里去。”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给第比利斯打电话。那边对他说：

“局势趋于正常。您没有必要来。”

4 月 8 日，中央委员会在切布里科夫的主持下召开新的工作会议。利加乔夫休假去了。这时帕季阿什维利发来了令人放心的电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控制着整个局势……现在不需要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政府以前所采取的措施做任何补充。”

于是做出决定，谢瓦尔德纳泽确实没有必要飞到那里去。这是个错误。如果他飞去，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电报是骗人的，因为军人已经准备了进行驱散群众集会的行动。

4 月 10 日，谢瓦尔德纳泽应当到柏林参加华沙条约参加国外交部长委员会的会议。但早上 9 时他得到通知说，第比利斯的群众集会被强行驱散，有人员伤亡。他取消了所有的日程，立即飞往第比利斯。驱散行动是在凌晨 4 时进行的。行动是外高加索军区司令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罗季奥诺夫中将、俄罗斯未来的国防部长批准的。

谢瓦尔德纳泽所看到的情况让他感到震惊。格鲁吉亚处于休克状态。集会的多数人为妇女和青少年。在驱散群众集会时使用了作战化学物质。而且军人们对一切都予以否认，甚至否认那些不可能否认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谁下达的命令。甚至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也不能弄清全部实情。他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说：

“我们面对死去的人们只有一个最崇高的义务，就是确定真相和决不让悲剧重演。这是极其重要的，是道义上的至高无上的命令。”

在 4 月 20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谢瓦尔德纳泽气愤地说，共和国领导的行动确实未经深思熟虑，没有同莫斯科商议就动用了军队。

“这是正当的吗？我认为不正当。必须考虑到格鲁吉亚的特殊情况。她的人民接受不了暴力。共和国的骚乱是在阿布哈兹开始要求独立以后才开始的。这引发了格鲁吉亚的愤怒：‘要分割我们的土地！’而帕季阿什维利没有把这个情况向莫斯科通报。”

5 月底，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第比利斯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塔马兹·加姆克列利泽提出了军人大规模屠杀和平集会参加者的责任问题，由于这次屠杀，死了 16 名无辜者。罗季奥诺夫将军回答了他：

“第比利斯的集会有反苏、反对国家和极端主义性质，散布反俄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对共产党员进行迫害的威胁。共和国领导做出了清理政府大楼前群众集会的决定。规定了不使用武器

驱散人群的任务。但是军人的队伍遭到了反抗。出现了拥挤，在拥挤中死了人。”

准别尔·帕季阿什维利也发了言。他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承认，中央委员会常委会要求再向第比利斯派遣军队，决定清理广场，并把这个事情委托给罗季奥诺夫将军。但军人们不是驱散集会，而是进行殴打。

在1989年12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例行会议上，人民代表调查委员会主席安纳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索布恰克详细地讲述了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格鲁吉亚当局决定动用军事力量驱散群众集会是非法的。但是，在他之后，会议又让总军事检察长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卡图谢夫发言，他称军队的行动是合法的。大厅里的掌声和在政府包厢里坐在旁边的人的鼓掌声让谢瓦尔德纳泽感到气愤。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第一书记吉维·古姆巴里泽，是从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调任这一职务的，根本不同意总军事检察长的发言。来自格鲁吉亚的人民代表们退出了会议大厅。

在会间休息时，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主席台后面的房间里休息。大家都坐在那里说话。气势汹汹的谢瓦尔德纳泽走进来说：

“我不能沉默！检察长的讲话是令人气愤的。这是耻辱。决不能这样歪曲事实。我应当讲话。这是我的名声问题，良心问题！否则我要辞职！”

戈尔巴乔夫试图安慰他：

“等一等，别着急，不要动气。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讨论所有的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会见了格鲁吉亚代表团，休息后发言说：

“格鲁吉亚事件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痛苦。我反对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委托最高苏维埃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

人民代表大会最终还是做出了决议，谴责使用武力对付群众集会的参加者。戈尔巴乔夫希望把所有这些事情尽快忘记，但他不明白，格鲁吉亚人是不会忘掉这些事情的。联盟当局不想调查清楚 4 月事件的做法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上起了致命的作用。1989 年 4 月 9 日的第比利斯事件，驱散游行示威，人们的死亡，这一切很快就导致了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上台执政。格鲁吉亚也就不再是统一国家的一部分了。

猎枪换鱼竿

里根之后，当上美国总统的是老乔治·布什。这时的苏联外交官日子就不好过了。新总统不急于迎合莫斯科。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持同样的看法。他给总统出主意说：

“我们应当避免仓促行事，不能着急。”

贝克认为，其前任舒尔茨对俄国人过于软弱，向他们做出了过多的让步。贝克不想显得那么软弱。具有鹰派名声的里根不害怕来自右的批评，而布什和贝克就没有那么自信。

这对谢瓦尔德纳泽来说不是件好事。他确实同舒尔茨相处得很好。他们的谈话非常坦诚，不弄虚作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好了，我再也不能让步了。于是另一方就把他伙伴的话信以为真。谢瓦尔德纳泽伤心地对戈尔巴乔夫说，贝克是个“冷漠的小子”，同他不容易建立正常关系。

谢瓦尔德纳泽同贝克的第一次会见是在维也纳。谈判结束后，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微笑着对他的助手说，美国人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背诵为他准备的资料。如果他不找到所需要的文件，那么他的讲话就听不懂。贝克是位新手，而谢瓦尔德纳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职务，忘了他自己是怎么起家的。

5 月，贝克来到了莫斯科。谈判结束以后，谢瓦尔德纳泽邀请

贝克及其夫人到家里做客，用制作精良的羊肉和格鲁吉亚葡萄酒招待客人们。他知道，美国人喜欢在家乡得克萨斯州打猎，因此送给美国人一支猎枪。但美国对允许政府官员接受的礼物的价格有严格规定，因此贵重的猎枪送到了美国政府的礼品仓库里保存了起来。

这是这样一个时期，此时世界各国都对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表示赞赏，而社会舆论，包括美国国内的社会舆论，认为布什和贝克是保守和不灵活的。人们把贝克同谢瓦尔德纳泽相比，称他是专业知识肤浅的人。贝克抱怨说，俄国人在要弄他，善于玩弄欧洲人和北美人的情绪。

9月，谢瓦尔德纳泽飞到了华盛顿，贝克把他领到怀俄明州自己的农场。他们去钓鲑鱼。谢瓦尔德纳泽拿起了一杆鱼竿，贝克立即明白，苏联部长钓鱼是外行。谢瓦尔德纳泽一条鱼也没有钓到，但他说感到非常高兴。他在贝克家里的晚宴上看到了新鲜的鲑鱼。

贝克逐渐充满了对谢瓦尔德纳泽的尊敬：

“与许多外交官不同的是，他善于听取反对他立场的合情合理的论据。他认真倾听你的讲话。如果同意，他就做出不轻松的决定，然后在家里，在戈尔巴乔夫和军人的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90年，谢瓦尔德纳泽同军方的关系相当紧张，甚至不得不放弃已同美国人达成一致的立场。贝克对此十分震惊，对他说：

“我不明白，如果你们的军人事后反对，而您又说我们的协议将不再存在，那我们为什么要会见，为什么要达成协议？”

贝克开始认真地怀疑起来：如果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在国内的地位已经这么弱，能不能同他签订裁军协议？

1990年5月中旬，贝克再一次飞到莫斯科。晚上，在一位格鲁吉亚艺术家的家里设宴欢迎他，客人中有时任总统委员会委员的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美国人发现苏联部长情绪压抑、愁闷。在吃晚饭的时候，谢瓦尔德纳泽说，他自己开始疲倦了。美国人把这理解为他可能辞去部长职务的迹象。普里马科夫的出席表明可能要安排他当部长，这是一个征兆。这个可能的换班并

不让美国人觉得高兴。

1990 年 5 月末，戈尔巴乔夫飞到了华盛顿。陪同他的是谢瓦尔德纳泽。他单独走到贝克跟前说，他急需签署贸易协定：

“这对于我们极其重要。否则的话，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向我们的人说什么呢？”

贝克冷淡地向他建议：

“您就照直对他们说，由于围绕立陶宛的一些事情，美国人不能签订这样的协议。”

立陶宛要求独立。莫斯科用经济封锁来回敬它，并试图在维尔纽斯搞什么政变。

谢瓦尔德纳泽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说：

“我很少跟你这样说话，但现在极其重要，必须要做成这件事。”

如果说有人责难谢瓦尔德纳泽按照美国人的指使跳舞，那么对于贝克，则有人说他拼命讨好莫斯科。在苏联部长深情的要求之下，贝克坚持要签订协定。总统布什同意了国务卿的意见。

伊拉克—科威特战争

1990 年 8 月 2 日，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在伊尔库茨克进行谈判，当时美国人得到了伊拉克军队越过科威特边界的消息。

“这不可能！”——谢瓦尔德纳泽说。“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他报告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开始进攻科威特。但是，他觉得一切都会过去。贝克飞到蒙古，谢瓦尔德纳泽返回莫斯科。他的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对我讲述过，外交部是如何要求军方通报，科威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侦察卫星发现了什么？伊拉克军队是不是真的已经占领了科威特？

军方回答说，他们没有这样的情报。可是记者们报道说科威特

已经被占领。自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军队在关键时刻不能帮助国家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为什么要给他们那么多钱去发展宇航?

1990 年夏侵占科威特的借口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同意降低石油价格。萨达姆·侯赛因声明说，这将给伊拉克造成大量损失，于是，把它的军队推向科威特边境。一个小国当然抵挡不住伊拉克的军队，就向阿拉伯兄弟求援。十分不安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飞到了巴格达。当他和萨达姆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穆巴拉克开门见山地问：他做军事准备要干什么? 萨达姆·侯赛因向穆巴拉克发誓说，永远不会进攻科威特。

“我所需要的一切，”——侯赛因说，“是钱。要让他们还我因他们而失掉的 10 亿美元。”

不再担心的穆巴拉克转告科威特人说，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是，伊拉克总统欺骗了埃及总统。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军队进入科威特，并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的第 19 个省。科威特的钱和石油落到了萨达姆的手里。伊拉克人简直要把科威特给抢光了。

萨达姆很早以前就想这么做。1961 年科威特刚取得独立时，伊拉克就不承认它的独立，认为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并试图把它划归伊拉克。顺便说一句，苏联作为伊拉克的忠实盟友，在 1960 年年初就不承认科威特，不允许它加入联合国。

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反对伊拉克的侵略。而萨达姆则坚信，美国和苏联会站在街垒的两侧，持对立态度。

贝克中断了对蒙古的访问，飞到了莫斯科。他在政府的弗努科沃—2 机场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贝克事先建议苏联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外交部的人对此十分怀疑：苏联早就同伊拉克结成了特殊关系，有友好合作条约。在伊拉克有 8 000 名苏联专家，他们的生命要受到威胁。

谢瓦尔德纳泽还是得出了结论，最为重要的是反对侵略。他同

在福罗斯休假的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总统没有反对，并委托谢瓦尔德纳泽同留在莫斯科的领导人——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协商起草文件。

苏联有些领导人像外交部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一样，反对这么做。怎么能同美国人一起对付自己的老朋友？是莫斯科把伊拉克武装起来的，正是因为它反美才支持它。

谢瓦尔德纳泽承担起了责任。他同贝克一起谴责萨达姆·侯赛因，他们一起呼吁宣布向伊拉克禁运武器。萨达姆没有料到这一点。美国和苏联第一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共同行动。意识形态思考失去了意义，重要的是制止侵略的意图，向所有潜在侵略者显示，他们不可能得逞。萨达姆·侯赛因的愿望落空了。他选择了不好的时间侵占科威特。稍早一些时候，或者稍晚一些时候，整个事情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的。

戈尔巴乔夫支持谢瓦尔德纳泽：

“其他反应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在我们提供的武器的帮助之下进行的侵略行动。我们同意卖给伊拉克武器是为了支持它的国防能力，而不是为了让它侵占他国的领土和整个国家。”

1990 年 9 月 9 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见。两个大国显示了他们的一致。正是在那时，布什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建立新的世界体系，联合国在这个体系中起着它应该起的作用，而美国和苏联将成为保障世界安全的伙伴。

叶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是东阿拉伯问题专家，同萨达姆·侯赛因有个人交往。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他能说服伊拉克领导人退出科威特。谢瓦尔德纳泽反对普里马科夫去伊拉克。他向戈尔巴乔夫论证说，萨达姆会把普里马科夫的此行看作是对他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幻想，说不定普里马科夫的出访会突然带来什么好的结果。谢瓦尔德纳泽生气地说：

"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个对外政策!"

结果正是如此。谢瓦尔德纳泽的路线是同美国进行战略合作,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侵略者享受胜利果实。而普里马科夫的路线是,试图在动武之前利用同伊拉克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莫斯科确实不知道如何是好。萨达姆当然是侵略者,但他是盟友和伙伴。美国想惩罚侵略者,但怎么能够为美国武器的胜利而感到高兴呢?从另一方面说,这是谁的过错呢?萨达姆除了武力的语言之外,别的语言他都听不懂。他实施了侵略行动,从而脱离了国际法的保护。苏联领导人在发生的事件中也承担着自己的一份错误。看到了没有,在巴格达确实存在着犯罪制度,绝不能同这种制度打交道。萨达姆屠杀共产党人和所有的反对者,用毒气毒杀库尔德农村的村民,同邻国伊朗打了 8 年的战争。但莫斯科有人认为,某种最高国家利益要求对这些视而不见,要求支持萨达姆,给他供应武器。

10 月 5 日,萨达姆在巴格达接见了普里马科夫。他说,科威特在历史上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因此,他永远不会撤出自己的军队。萨达姆同意只让合同期限在一年之内到期的苏联专家(大概为在伊拉克工作的苏联公民的 1/3)回国,其余的应当留下来。于是,这些苏联专家成了人质,成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活盾牌。

普里马科夫以为他的这趟出访会带来大的成功。当时他向戈尔巴乔夫建议:我们试着劝说萨达姆撤军,答应他立即去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委托谢瓦尔德纳泽同普里马科夫一起行动。部长不同意普里马科夫的意见,认为:对萨达姆的任何允诺会给他造成一种感觉,只要他固执己见,他就可以我行我素。普里马科夫带着自己的和平调解计划飞到了欧洲,之后又飞到美国。谢瓦尔德纳泽通过自己的助手向美国人传话说:

"普里马科夫带到华盛顿的建议我不感兴趣。"

普里马科夫劝说美国人给萨达姆撤军的机会,给他留点面子。

其中有，把科威特的两个岛屿和一个油矿留给他，这实际上是同科威特有争议的地方。普里马科夫劝布什总统说：

“不要把萨达姆赶逼得走投无路。应当帮助他找到政治解决的途径。”

布什果断地驳斥普里马科夫说：

“萨达姆犯下了同希特勒一样的罪行。怎么能向这样的人让步呢?”

普里马科夫明白了，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军事途径来解决。他立即飞往巴格达，对萨达姆说：

“您我认识已经很久了，您也知道，我对您说的都是实话。如果您不从科威特撤出，伊拉克将遭受打击。”

萨达姆回答说，只要美国军队从沙特阿拉伯撤军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只要伊拉克的出海口没有保证和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就不能撤出。普里马科夫除了摊开双手表示无奈以外，别无他法。萨达姆自己招来了军事灾难。但这是谢瓦尔德纳泽不当外交部长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辞职!”

国防部党的会议两次要求戈尔巴乔夫追究谢瓦尔德纳泽出卖国家利益的刑事责任。在最高苏维埃和报刊上，部长遭到的不仅是批评，而且是公开的侮辱。他成了替罪羊。他被指控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应该支持他的人却沉默不语。他抱怨戈尔巴乔夫不保护他，因为部长执行的是总统的路线。

经常有人要求戈尔巴乔夫处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有时也有明确的打算，可能他需要不是每天都要受最高苏维埃指责的新部长了。也可能戈尔巴乔夫萌生了嫉妒心。谢瓦尔德纳泽已成了世界知名人物。人们把国家的对外政策与他联系起来，人们不把他看成是

戈尔巴乔夫意志的执行者，而是看成政策的创造者。这是部长的荣誉，但也危及他的前程。谢瓦尔德纳泽是贪图功名的人，不喜欢位于次要位置。据说，戈尔巴乔夫曾想把葛罗米柯的方案推荐给他——去领导最高苏维埃。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1990 年 12 月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突然宣布辞职。他再也不能忍受很多代表和新闻媒体每天给他的侮辱。很多人认为他的辞职是意外的事，而我觉得部长的这个举动是非常自然的。那时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在代表大会开会前夕，我写了一篇文章，估计谢瓦尔德纳泽可能要辞职。之后外国记者给我打电话，天真地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消息来源。

12 月 20 日，在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在要求发言之后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简短和沉重的”发言。正好在开会前夕，有代表建议通过决议禁止国家领导派兵前往波斯湾地区。

“同志们昨天的发言让人无法忍受，对此我要开诚布公地讲，”——谢瓦尔德纳泽声明说。“波斯湾最终发生的是什么事？……我们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权利容忍侵略、吞并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小国。”

谢瓦尔德纳泽说，对他展开了真正的恶毒攻击，并提醒说：

“独裁将要来临……没有人能够知道，将要出现什么样的独裁、什么样的独裁者和什么样的秩序……如果你们愿意，那就让我以我的辞职来反对独裁的到来。我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表示深切的谢意。我是他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但我认为，这是我作为一个人，一名公民和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对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来说，部长的离去是令人极其不愉快的意想不到的事。他埋怨谢瓦尔德纳泽事先没有告诉他，并担心，轰动一时的辞职将对世界造成不良影响，世界正在判断部长离职之后会出现的巨大政策变化。

为此，戈尔巴乔夫给美国总统布什发去一封个人署名信件：

“他的声明对于我来说完全出乎预料。这确实如此。特别使我伤心的不止是破坏了对总统的忠顺。他不同我这个老朋友、老同事商议，不提醒便这么做，实在毫无道理。他劳累到极点，过量的工作让他过于疲劳，正像我们这里所说的，他不遗余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终于在一定的时刻离开了。所有的这一切就是这样。因此，我理解他的行为，但我不能赞同这种做法……我同爱德华谈过，虽然我理解他，但他不可能收回自己的声明。这是丢脸的事。他有自尊心，这样做不可能的……我非常需要他……”

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在一定的时间里继续履行部长职责。华盛顿担心普里马科夫成为外交部长。但戈尔巴乔夫选中了资深外交官，驻美国大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

1991 年 1 月 16 日，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别斯梅尔特内赫来到了外交部会见全体工作人员。在介绍新部长之前，总统说，谢瓦尔德纳泽有权离去，虽然事先不同总统商议是不可原谅的。

“但他始终和我在一起，他是我最为亲近的同志，在所有复杂形势下都是这样，而最主要的是对我过去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最后说。“我没有后悔，尽管有不足。”

谢瓦尔德纳泽说了几句话：

“总统做了相当独特的选择。但由于集体的支持我们没有让总统难堪。”

新部长认为必须感谢其前任的高度职业能力。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离开了部长办公室，他没有想到，还是在这一年中他又回到了高耸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这栋大楼里。谢瓦尔德纳泽走后，外交部机关中一位对他不友好的沉默寡言的人突然活跃起来，他在大会上说：

“瞧，我们的前任部长讲道德，讲品行。但在政治上是不讲这一套的。有的只是利益。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碰上了浪漫主义。”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塔拉先科回敬他说：

“在部里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有好多次感到良心有愧。我之所以能够摆脱有愧感，之所以能够为国家带来利益，没有感到自己是败类，多亏谢瓦尔德纳泽。同他在一起工作的5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如果历史能够重复，希望还要做以前那样的工作。

任期三周的外交部长

而谢瓦尔德纳泽不知道他应当做什么。他创建了对外政策协会，意在把它变成一个智囊中心，从独立的立场分析研究对外政策。但是，过惯了多年紧张政治生活的他显得百无聊赖。

1991年3月，美国国务卿贝克来到了莫斯科，在谢瓦尔德纳泽那里吃了晚饭。前部长绝望地说，存在着发生大乱和独裁的威胁，有可能发生政变，国家需要新一代领导人。他已对戈尔巴乔夫完全失望。谢瓦尔德纳泽的一位好友忧伤地说道：

“现在我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杀。”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当部长没有当上8个月，他在8月叛乱之后辞职走人。新部长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他是惟一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联大使。而且潘金在部长位子没有坐上3个月。那时，谢瓦尔德纳泽又重新当上了部长。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生存的最后日子里为什么要重新起用谢瓦尔德纳泽？他是对外交部门的工作不满意吗？希望外交官们另做其他什么事吗？那几个月克里姆林宫内发生的事情，是戈尔巴乔夫为数不多贴身人之一、他当时的新闻秘书安德烈·谢拉菲莫维奇·格拉乔夫告诉我的。

“邀请谢瓦尔德纳泽不意味着总统对外交部的工作不满，”——

格拉乔夫认为。“那时外交部能够做的仅仅是把破碎的瓦罐从外表黏接起来。戈尔巴乔夫明白，重新起用谢瓦尔德纳泽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信号，而对于所有的苏联官员们则意味着，他们应当各尽职守，因政变而出现的幕间剧，从政治上说已经闭幕。”

政变一结束，戈尔巴乔夫就想立刻把谢瓦尔德纳泽拉回到斯摩棱斯克广场。按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的话说，当着他的面，戈尔巴乔夫建议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外交部长。后者断然拒绝。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惘然地问。

“我信不过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强硬地回答。

是的，在政变之前，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的印象就不好：拼命抓权，贪图荣誉，自己还想当总统。

“他们的关系好像完全破裂了，谢瓦尔德纳泽终于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格拉乔夫说。“在8月政变的头几天，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做了语意双关的评价。他不完全相信，戈尔巴乔夫没有牵扯到所发生的事件中去。”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在电话中（切尔尼亚耶夫录音）直接问戈尔巴乔夫：

“您如何评价谢瓦尔德纳泽关于您好像知道打算政变的声明?”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解释，”——戈尔巴乔夫巧妙地回答说。

“但我们的报纸是这么写的。”

“我可查问一下。有可能这是为国外发的声明。”

“要知道，他是您的朋友。”

“我现在就想让他和雅科夫列夫回来。”

谢瓦尔德纳泽收回了自己说的话，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和解和接近过程是如此之快，他又很快当上了部长——当了只有3个星期的部长。

“谢瓦尔德纳泽为什么终于同意了？”

“他们有过长时间的几乎是私下的交谈，”——安德烈·格拉乔夫回忆说。“谢瓦尔德纳泽没有立刻同意。在他面前摆着的问题是：以后怎么办？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能指望成为叶利钦亲近的人，像对戈尔巴乔夫那样亲近？也没有人建议他在俄罗斯的机构里担当职务。除此之外，他满意地回想起自己当部长时的工作，于是做了让步。”

“他没有估计到，他的第二次任期这样短？”

“您想想，如果他能估计到，他能担当这个职务吗？当然不会的。所以，不光是戈尔巴乔夫相信有可能恢复统一的国家。”

1991 年 11 月，谢瓦尔德纳泽回到了斯摩棱斯克广场上高耸的大楼 7 层的办公室，只是他的职务换了名字——对外关系部部长。外交部在 1 月中旬，在潘金当部长的时候，与对外经济联系部合并，于是改了名。谢瓦尔德纳泽声明说，他的主要的优先活动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他说，取消一切对外出访。

“他的所有日程是出行到各个共和国，”——格拉乔夫回忆说。“他懂得，国家的恢复，他在这个职务上的任期，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好同各个共和国领导人的关系。”

谢瓦尔德纳泽害怕苏联解体。他在谈判中劝说自己的伙伴说，维护国家的统一对于全世界是多么重要。西方领导人依然像以前那样愿意同苏联打交道，而不愿意同 15 个新国家打交道，但这些国家自己的专家报告说，从整个情况来判断，苏联保存不下来。怀疑谢瓦尔德纳泽在担任莫斯科的所有职务时始终是隐秘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希望国家崩溃，这是荒谬的。

“我没有看到比叛乱分子更大的破坏者，”——格拉乔夫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是苏联体制的主要产物。他没有理由砍掉自己庄严端坐的干枝。”

可以明确地说，他在苏联外交部长位子上的生活至少要比后来当独立的格鲁吉亚的总统时强得多。

回到格鲁吉亚

苏联解体3个月后，谢瓦尔德纳泽放弃了莫斯科舒适安逸的生活回到了格鲁吉亚。他为什么这么做？想以当总统来结束他的仕途？帮助祖国度过难关？渴望进行积极的活动？任何一个答案都适用，或者这几层意思都有。

谢瓦尔德纳泽在戈尔巴乔夫手下施展不开。他有思想，但在部长的位子上施展不开自己的抱负。突然之间命运的神奇变化出现了：他成了第一号人物。虽然不是在苏联这样的大国，但却是在自己的祖国。

退职部长的脚色给了他舒适安逸的生活。莫斯科安静街道上的独门独院，对外政策协会——谢瓦尔德纳泽为自己设想的差事——安置在这里十分方便。挂着大使馆牌号和旗子的高级轿车来往不断。不止是派驻莫斯科的大使们，还有所有的外国贵客都急急忙忙地拜访谢瓦尔德纳泽。世界各国期待他去做酬谢很丰的演讲和演说。而他却放弃这种生活而投入前途未卜的事业。谢瓦尔德纳泽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如果我不回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将会消亡。”

如果这是夸大其词的话，那也不会太过。当谢瓦尔德纳泽回到与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分手的格鲁吉亚的时候，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之外的许多人都轻松地喘了一口气。当时觉得，格鲁吉亚将会树立起文明秩序。

人们期待着谢瓦尔德纳泽进行伟大的治理，但他却开始了同阿布哈兹的战争、同俄罗斯的争吵，他越来越不像一个由于不愿意参与拧紧螺丝钉和可能的屠杀而放弃权力和荣誉的人。这对于那些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是莫大的意外。但他自己则碰到了更大的意外。他自己大概也不知所措，怎么来到了完全不是他留下的那个国家。

1989 年 4 月 9 日悲剧之后，格鲁吉亚很快达到了沸点。他回到了为一点小事就要推翻总统，把昨日的偶像推进泥潭的国家，在这里人们用武器解决所有的争端。

独立运动谁都领导不起来。格鲁吉亚社会分散为众多小党派，他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执。格鲁吉亚的第一位首脑、过于执著的昔日的持不同政见者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起不了领袖的作用。在他不太幸福的生活里，他习惯于把人分成朋友和敌人，而且敌人总是多于朋友。加姆萨胡尔季阿注定要失败，是因为他不会成为所有格鲁吉亚人的领袖。他一开始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取消了南奥塞梯自治州。为具有本民族思想的格鲁吉亚人建立他们的自治州，这是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创造。南奥塞梯州出现于 1922 年，是在奥塞梯人支持莫斯科反对独立格鲁吉亚的斗争之后。

为了回报，南奥塞梯做出了退出格鲁吉亚的决定。加姆萨胡尔季阿向那里派去了自己的警察。战争开始了。格鲁吉亚正常的生活遭到了破坏。经济停止运转。人们开始逃难。5 年中共和国的居民减少了 25 万。

1991 年 3 月 31 日，格鲁吉亚举行了全民公决，格鲁吉亚人投票赞成独立。4 月 9 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格鲁吉亚为独立国家。

5 月 26 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在第一次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他坚持了仅仅半年。他的对手团结起来举行了武装起义。1992 年 1 月 4 日，他不得不离开了第比利斯。

贾巴去吃早餐

当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的时候，格鲁吉亚已经分裂为氏族和家族。谁都不工作。第比利斯的政权被几个强人分掉了，他们

有自己的军队——这是格鲁吉亚政治生活中最有说服力的东西。谢瓦尔德纳泽落入了军人头目的圈子中。这些军人头目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指控为土匪。他们这伙人为什么招来一个莫斯科的外来人？他们自己协商不出在他们这伙同起同坐的人中哪一个能当头，他们认定了一个没有自己的军队的人（自然不会有危险），但他能够尊重他们，能为他们争取到世界的承认吗？有趣的是，他同“姆赫德里奥尼”作战部队的头目贾巴·约谢利阿尼坐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此人在 1956 年因参与集团杀人抢劫案被列宁格勒市法院审判庭判决 25 年监禁。而且，这帮人要比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局中他周围的那帮人不是要无比地坏得多吗？在那里坐着的那些人所杀的人，要比贾巴·约谢利阿尼杀的人还多。

埃米尔·左拉[①]提醒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说，文学界是令人极端厌恶的，要想适应它，每天早晨得吞掉一只冰凉的癞蛤蟆。政界也是令人厌恶的。要想在政界飞黄腾达，首先要取得一伏叫做恬不知耻的免疫力良药。有经验有能力的谢瓦尔德纳泽逐渐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自卫的本能迫使格鲁吉亚人几乎是一致投票赞成谢瓦尔德纳泽，共和国没有其他选择。过了半年，他结束了南奥塞梯的战争。但在这时他犯了一个大错误——1992 年 8 月，同意了在阿布哈兹进行军事行动的疯狂想法。从格鲁吉亚跑出去的前安全部部长伊戈尔·格奥尔加泽向记者叙述了阿布哈兹战争的起始经过：

“下半夜，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国防部机关值班员基托瓦尼半醉的声音：

‘部长紧急召集全体会议。’

我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以前的办公室见到这样的情景。有 40 来人，有一半醉醺醺的，狂喊大叫，一片混乱。

基托瓦尼高兴地欢迎他说：

---

① 法国作家。——译注

‘啊，伊戈列克来了。来，伊戈列克，把你的人招集起来，你有多少人？明天我们去阿布哈兹。’”

对于前将军格奥尔加泽（下面我们还要谈他）所说的一切话要倍加小心，但格鲁吉亚转变成了无政府状态似乎是可信的。很多人认为，阿布哈兹行动是那个贾巴·约谢利阿尼和国防部长田吉兹·基托瓦尼搞的活动，实际上是把谢瓦尔德纳泽摆在了既成事实面前。在这种状况下，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为什么不谴责自己国务委员会的同事们，不立即提出辞职或者哪怕以辞职相威胁呢？1990 年在维尔纽斯流血事件之后的类似形势中，谢瓦尔德纳泽就建议戈尔巴乔夫这么做。

谢瓦尔德纳泽有自己的回答。他的辞职有可能把格鲁吉亚推入比严重的内讧更为强大的漩涡。

1992 年 8 月 14 日，谢瓦尔德纳泽下令他的军队“保障极其重要的铁路干线的安全和消灭阿布哈兹境内的恐怖主义窝点”。正像我们看到的，同恐怖主义的斗争将方便地被用来掩盖任何军事行动——阿布哈兹或者车臣的军事行动。

谢瓦尔德纳泽犯了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说不可原谅的错误，允许把军队开进阿布哈兹。但他的行动是对阿布哈兹决定恢复 1925 年宪法效力的回答，这种效力意味着阿布哈兹正式退出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害怕分离。于是决定在阿布哈兹还没有巩固之前对阿布哈兹实行打击。在那个时候，阿布哈兹人在阿布哈兹共和国人口中占 17%。格鲁吉亚人的数量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格鲁吉亚人输了，被迫背井离乡。

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小小的阿布哈兹战胜了强大的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人深信，俄罗斯军队援助了阿布哈兹人，因为阿布哈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两次做出决定要求俄罗斯接纳共和国为其成员。阿布哈兹人保证说，阿布哈兹是俄罗斯的一部分。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的一位代表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的土地上不管居住着多少俄罗斯居民，他们对我们都

没有妨碍，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对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有什么危险。而同格鲁吉亚殖民主义者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什么人具体地帮助了阿布哈兹，什么人在那里真正打过仗，什么人提供了武器，对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尚未找到答案。谁也不想讲述这些事。人们知道，一些“无法识别”的飞机射击过格鲁吉亚阵地。但阿布哈兹人没有任何飞机。普里马科夫认为，这事出自于“一小撮犯罪的受贿的俄罗斯军人”之手。这对于曾经领导过对外情报局和应该掌握确切情报的人来说，是非常模糊的说法……

那时，杜达耶夫将军的车臣部队帮助过阿布哈兹。沙米尔·巴萨耶夫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当时的联邦反侦察局局长谢尔盖·斯捷帕申事后好长时间承认，他的同事（看来是来自军事侦察部门）与巴萨耶夫勾勾搭搭，后者是共同事业所需要的人。

战争使格鲁吉亚社会的歇斯底里越来越强烈。谢瓦尔德纳泽看到了这些情绪。在阿布哈兹战争期间他几乎送了命，于是他说：

“如果我们大家都必须死，那我们就死。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土地让出去。”

这种热情不一定符合谢瓦尔德纳泽的真实愿望，但证明了格鲁吉亚社会的精神状况。当格鲁吉亚人呼喊着俄罗斯要把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分开时，谢瓦尔德纳泽的用词确实谨慎：

“我远不能肯定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同我们战斗。但我有权肯定地说：在阿布哈兹同我们作战的是红棕色的帝国复仇军队。”

在阿布哈兹战争期间，谢瓦尔德纳泽本人就在苏呼米指挥格鲁吉亚军队，一直呆到他们逃跑。后来他说，阿布哈兹军队和车臣军队目标准确地向他所在的大楼开火。他神奇般地活了下来。他认为，这是俄罗斯军人泄露了他的所在位置。他确实忘记了，是俄罗斯的直升机把他从阿布哈兹运了出来。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如此，阿布哈兹人才没有敢把飞机打下来——要是飞机上的俄罗斯士兵和官员死了，不会饶过他们。

可是谢瓦尔德纳泽任命的阿布哈兹的领导人没有来得及撤离苏

呼米，一直呆在共和国政府大楼里。他们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毒打和侮辱。在枪杀他们之前，强迫他们吃土——“你们想要我们的土地吗？那就把它吃了吧！”在被打死的人当中，有日乌利·沙尔塔瓦，他是谢瓦尔德纳泽最亲近的人之一，同他一起在格鲁吉亚共青团工作过。

两次谋害

1995年8月，在离谢瓦尔德纳泽很近的地方炸弹爆炸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负了伤。医生给格鲁吉亚首脑的头缠绷带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格鲁吉亚人相信，是当时的格鲁吉亚安全局局长伊戈尔·格奥尔加泽中将组织了对谢瓦尔德纳泽的谋杀。有人认为，安排格奥尔加泽担任这一职务是按莫斯科的要求进行的。他同俄罗斯外高加索俄罗斯军队司令有良好的关系。

他的父亲，潘捷列伊蒙·格奥尔加泽服务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边防部队。伊戈尔·格奥尔加泽也是起家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的军衔为上校）。在独立的格鲁吉亚，他面前展现了新机遇，他当上了军队反侦察局的局长、国防部副部长，而后是内务部副部长，最后，当上了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

谋杀谢瓦尔德纳泽的事件刚一发生，伊戈尔·格奥尔加泽立即失踪。在社会公众的眼里这就成了他参与杀害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的有力证据。在格鲁吉亚，人们都不怀疑，他跑到了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尔后用军用飞机把他送到了俄罗斯。

格奥尔加泽受到刑事调查。俄罗斯检察院在形式上也在追捕他。他的照片甚至刊登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警察搜捕”栏内。在格鲁吉亚有人开玩笑说，格奥尔加泽藏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一个秘密机构。不管怎么说，几个俄罗斯记者曾有机会去采访他。

格鲁吉亚人为此应当怎么样呢？俄罗斯军人把原先的格奥尔加泽将军隐藏起来，是因为他按他们的指示进行活动吗？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时，莫斯科对格鲁吉亚接待来自车臣的客人，不想关闭格鲁吉亚和车臣之间的边界，允许武装分子和武器穿过边界感到不满。但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相互原则进行的。如果在自己家里反对分立主义，那么就不要支持邻国境内的分立主义者。在格鲁吉亚，有人说，如果俄罗斯能向暴乱的车臣派遣坦克和空军去整顿秩序，那么格鲁吉亚人为什么就没有权力在格鲁吉亚的一部分、不承认格鲁吉亚法律的阿布哈兹做同样的事呢？如果俄罗斯要求第比利斯搜寻车臣恐怖分子，为什么隐藏被怀疑组织恐怖活动的人呢？

1998年2月，试图第二次杀害谢瓦尔德纳泽。攻击手显然是职业杀手，用火箭筒和自动武器扫射他乘坐的汽车。职业保镖和德国人赠送的《奔驰》防弹车救了他的命。谢瓦尔德纳泽说，企图杀害他的是那些不喜欢他、不愿意让石油从阿塞拜疆经过格鲁吉亚领土到达土耳其港口的人。这条线路将给俄罗斯的利益造成损害。俄罗斯希望阿塞拜疆的石油流到新罗西斯克。

有可能，要杀他的是毒品黑手党。毒品很久以前就经过格鲁吉亚运输。这是共和国的大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甚至公开检查过麻醉剂的使用情况，意在迫使自己的官员也要这么做。谢瓦尔德纳泽的个人卫队队长埃利达尔·戈戈拉泽上校丢掉了自己的官职，在阿扎尔，在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边界线上，他因被指控组织毒品过境而被抓。他曾把总统从阿布哈兹救出来。

当时的俄罗斯内务部部长安纳托利·库利科夫推测，车臣人参加了袭击谢瓦尔德纳泽的行动。车臣人站在阿布哈兹一方反对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的敌人——被推翻的格鲁吉亚总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在车臣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处。第比利斯的议员们认为，谋害工作是在俄罗斯组织的，因为俄罗斯从来都不容忍格鲁吉亚的独立。最后，俄罗斯的一些大众媒体认为，这完全不是真

正的谋害。

说这些话的人认为，谁都不想杀害谢瓦尔德纳泽，这是政治上的挑拨离间。这正像在 1995 年 8 月，谢瓦尔德纳泽利用假装的谋害来同自己的敌人算账，而同时迫使俄罗斯撤销它在格鲁吉亚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作为指控证人的邓尼金将军

奥塞梯的冲突，特别是阿布哈兹的冲突，对谢瓦尔德纳泽对车臣路线的不满，成了俄罗斯反格鲁吉亚情绪广为散布的理由，这可能使精神上密切联系的各族人民疏远。从对格鲁吉亚事件和对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本人的密切关注可以看出，有人不承认格鲁吉亚不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在对谢瓦尔德纳泽的辱骂中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了凌辱。

甚至把“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中将拿来当证人，引用他的话说：“1918 年，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在莫斯科是国际主义者，而在自己的第比利斯却变成了民族主义分子。”据他说，你们这些格鲁吉亚人，过去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不知是哪一位回忆起 1980 年发表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上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写的短篇小说《在格鲁吉亚钓鮈鱼》。这篇短篇小说真把格鲁吉亚惹怒了。小说把主人公与作者等同起来，这是愚蠢的，但在阿斯塔菲耶夫所写的主人公身上也可以看到作者的自传。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小说的主人公，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加格拉的创作之家遭受到了委屈：给他安排的房间是最差的，而且正对着公共厕所。他在格鲁吉亚休假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让这位主人公，即作家本人产生了对整个格鲁吉亚最为强烈的反感。说话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人情，所有的一切都让阿斯塔菲耶夫所写的主

人公感到恶心。他感到自己是落流在荒凉边远地区原始部落中的白人传教士，可怜地远离世界文明。“事情闹到了这种地步，在俄罗斯，任何非俄罗斯商人，特别是高加索人一类的商人，都遭到鄙视，都被诅咒为‘格鲁吉亚人’”，作为主人公的作家这样判断。

这位作者用什么理由不好，为什么非要用这样的理由来保护无论如何不可能只由“商人”组成的民族的荣誉呢？于是格鲁吉亚人不得不自己来保护自己的荣誉。那时，瓦连京·拉斯普京在例行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嘲笑“有病的格鲁吉亚”。之后，罗季奥诺夫将军下令整顿第比利斯的秩序。

并非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像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高傲。俄罗斯的优秀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扎博洛茨基、阿赫马托娃等人翻译了格鲁吉亚诗人的作品。格鲁吉亚的音乐、格鲁吉亚的电影难道没有成为我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在格鲁吉亚人面前显示自己的高傲自大，这在俄罗斯社会某些阶层中可以感觉得出来，这将迫使格鲁吉亚人背离俄罗斯。俄罗斯社会没有察觉到格鲁吉亚民族运动的出现，不懂得格鲁吉亚历史参与了它的现代政治的形成。

1991 年格鲁吉亚以比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脱离莫斯科更加高兴、更加解恨的心情脱离了俄罗斯。其原因不止是南方人易于火暴的脾气，还在于当时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及其周围的人，在于格鲁吉亚知识界的不少人对俄罗斯有深仇大恨。毕业于苏联学校的人们至今仍然相信，1801 年与俄罗斯帝国的联合对于格鲁吉亚来说是好事。而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却坚持另一种观点，这就是国家独立的消失。1919 年 3 月，格鲁吉亚共和国代表团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递交了要求承认新国家的备忘录。在宣言中把俄罗斯帝国与格鲁吉亚的合并称之为“吞并”。

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的父亲，作家康斯坦丁·加姆萨胡尔季阿在 1921 年曾向同胞们呼吁说：“古代格鲁吉亚的历史结束于 1801 年的灾难……当普鲁士教官培育出来的半欧洲式的叶卡捷琳娜二

世、保罗一世的国家机器与陈旧的格鲁吉亚国家机构对抗的时候，格鲁吉亚的国家机构崩溃了，倒塌了.....”

加姆萨胡尔季阿认为，俄罗斯人嘲笑格鲁吉亚人，说“俄罗斯19世纪的几乎所有文学都把格鲁吉亚人描述为淫棍和酒鬼……”

加姆萨胡尔季阿（在斯大林时期他本人也不得不当了廷臣）鄙视为俄罗斯服务的格鲁吉亚人，他说：“19世纪的格鲁吉亚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在100来年的过程中格鲁吉亚的贵族用自己的爱国主义和祖国换来了带穗的肩章……”

在十月革命之后，独立的格鲁吉亚再次出现了，不过只存在了4年。老加姆萨胡尔季阿对此事做了这样的解释：“在奴隶桎梏中，格鲁吉亚民族不习惯于对国家的忠诚。对国家制度的敌对态度从政治上败坏了民族。民族中对国家的敌对态度发展成为对抗国家的传统。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不会全面、协调地动员格鲁吉亚人民的力量来建设民族国家。”他提醒说，“格鲁吉亚是政治上激进的国家，甚至那里的神甫及其子女也要站到革命的第一线……”

小加姆萨胡尔季阿研究人智说、研究关于生存秘密意义的神秘理论，这对他的政治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按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想法，格鲁吉亚民族在遭受4 000年的屈辱之后，应当恢复和占据它在世界上原有的地位。格鲁吉亚在世界上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帮助加姆萨胡尔季阿在他参加的大选中获胜。他被推翻不意味着格鲁吉亚社会放弃了这个思想，这只是表明加姆萨胡尔季阿是一位不好的实践家。因此，不应当幻想将来会出现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政治友谊，特别是在未克服它自己的帝国式自负之前。

同莫斯科签署条约，同莫斯科建立同盟，是格鲁吉亚的被迫之举。大部分格鲁吉亚人是在阿布哈兹大败之后才决定走出这一步的。很多格鲁吉亚人被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轰炸第比利斯的威胁所震惊。但谢瓦尔德纳泽经常说：

“俄罗斯是这一地区稳定与和平的绝对的和不可争议的保障。格鲁吉亚是俄罗斯天然的、历史形成的盟友。”

有一次，还是在苏联时期，谢瓦尔德纳泽用他的美丽的辞藻说，对于格鲁吉亚，太阳是在北方升起。

“自然规律的更替，东西南北四方的更替，是在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定下来的，这在人民中间引起了静悄悄的心花怒放，”——捷伊姆拉兹·马马拉泽写道。“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原状。太阳重新从东方升起。而在北方升起了曾在阿富汗投过炸弹的鲁茨科伊和与爱德华之类的罪孽众多的同流合污的官员们。”

谢瓦尔德纳泽知道，格鲁吉亚离开俄罗斯哪里也去不了。但他的招数在不断变化。他允许俄罗斯建立军事基地，但经过几年之后又要求撤销这些基地。他在同莫斯科建立关系的同时，对俄罗斯说：请给予援助，要不我去找西方。而对西方他经常说：请给予援助，不然我去找俄罗斯。多亏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仅从美国那里就获得援助 10 亿美元。没有一个共和国获得过这么多钱。

“他懂得很多，”——聪明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说，“但在政治上有时不是你牵着套上笼头的马，而是它在你的背后推撞你的某个地方。”

第十章

别斯梅尔特内赫："不是我要担任外长的"

1991年6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在柏林同自己的老对手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进行谈判。谈判结束后，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到苏联大使馆。突然美国国务卿打来电话说，他们必须紧急会面。

"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应该告诉您，但不能在电话里讲，只能当面说。您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趟?"

别斯梅尔特内赫感到非常惊奇，"詹姆，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

贝克好像有点迟疑地说："我重复说一下，我这里有急事。非常想要立即见面。"

别斯梅尔特内赫认为，可能说的是他们在谈判时没有来得及讨论的细节。

"几分钟后我要会见塞浦路斯外长。难道不能稍等一下? 好吧，如果事情非常急，就请您到我这里来谈。"

贝克开始以较强硬的口气说："我的事情很微妙。如果我去您那里，那么我后面会有大量搭载保卫人员的汽车跟随，新闻界就会对此感兴趣。如果可能，还是劳驾您来我这里。我在旅馆恭候您，但是希望不要引起注意。"

别斯梅尔特内赫怎么也拿不定主意："难道真这么急? 毕竟我这里安排了同塞浦路斯外长会谈……"

贝克坚持说："我要是您的话，我会放下一切事情，立刻前往。

我有非常重要和紧急的情况要告诉您。请您一个人前来。”

叛乱前两个月

别斯梅尔特内赫向苏联大使要了一辆汽车，没有带保卫，也没有摩托车护送，悄悄地开车去了。他只带了美国加拿大司司长格奥尔吉·恩维罗维奇·马梅多夫前往，以为谈的将是双边关系的话题。

在洲际旅馆，美国人不让任何人乘电梯，以便让别斯梅尔特内赫到后能够立刻乘电梯上楼见贝克。国务卿见到马梅多夫后说，他想同别斯梅尔特内赫单独谈。当大家离去后，贝克向别斯梅尔特内赫通报说：

“我刚收到华盛顿发来的密电，可能是根据情报发的，说是有人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而且可能就在明天。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参与者有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

贝克是位谨慎的人，至少没有说出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个信息的，尽管他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同一天上午，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出现在美国驻苏大使约翰·马特洛克（他能讲一口漂亮的俄语）那里。波波夫指着天花板并用意味深长的手势示意他怕窃听。马特洛夫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他们互相匆忙地在上面写一些毫无关系的字句，而这时波波夫写下了这样的话：必须通知叶利钦（当时他在美国），有人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将领导国家的权力交给帕夫洛夫。波波夫指的是，或许叶利钦应该立即回莫斯科。

马特洛克写道：“除了帕夫洛夫外，参与的人还有谁？”

波波夫回答道：“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

马特洛克大使的副手用防窃听电话同美国首席副国务卿劳伦斯

·伊格尔伯格接通了电话。伊格尔伯格立即前往白宫，向乔治·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报告了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与此同时，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密电也传到了当时在柏林刚刚结束同别斯梅尔特内赫谈判的贝克。

美国人得出结论，他们有责任向戈尔巴乔夫及时通报。但是是否需要布什本人直接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因为保障两国首都之间的热线联系的是克格勃的通讯人员。

“可以通过别斯梅尔特内赫联系。”贝克建议道。

他征求了布什的意见，请苏联外长立即到他这里来。贝克对别斯梅尔特内赫说：“我们认为，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必须让您知道。至于怎么办，这就是您的事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紧急，您应该赶紧向戈巴乔夫报告。您有没有可靠的通信线路？”

别斯梅尔特内赫回答说，大使馆有政府长途通信用的保密电话，可是这种电话由克格勃监控。

当时贝克就建议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翰·马特洛克转达这个信息，他说：“这是可靠方案。没有人能截获这个信息。”

莫斯科晚上八点，美国大使馆给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助理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打来电话说：马特洛克大使请求接见，他收到布什的紧急密函。切尔尼亚耶夫报告了戈尔巴乔夫。他同意接见大使并请切尔尼耶夫也参加。切尔尼耶夫记下了这次会晤的情况：

马特洛克的神色惊慌，戈尔巴乔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开始表示遗憾，因为他马上要出差，并说他高度评价大使所做的一切。

等到马特洛克说话的时候，他说：“总统先生，我刚刚收到我国总统发来的由我亲收的密电，他要我立即同您见面并转告以下信息：美国的有关部门得到这样的信息，明天将会采取措施解除您的权力，总统认为有义务向您及时通报。”

戈尔巴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都哈哈大笑，在他们看来这完全不可能。马特洛克面露窘色，他说：“我不能不执行总统的委托。”

戈尔巴乔夫赶忙安慰他说："这绝对不可能。请他放心，但是我很珍视布什把他的不安心情告诉我。既然有这样的信息，发出警报是朋友的义务。我看到了我们在相互信任方面确实大大地前进了，这是极为珍贵的。"

当然，既然马特洛克没有将他知道得很清楚的信息来源说出来，戈尔巴乔夫就自己向大使解释这些令人担心的谣言是从那里来的：

"现在快要签署联盟条约，社会也倾向和谐。但是有一些力量，他们对此感到不高兴。他们感到正在失去权力。不排除这部分人中有这样的议论，你们的情报人员截听到了这种议论。"

就在这个时候，布什总统在华盛顿接见了苏联政治舞台上正在上升的明星一刚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布什向他转述波波夫通报的内容。叶利钦毫不犹豫地立即说，必须及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布什非常满意这个信息由叶利钦向戈尔巴乔夫传递。布什吩咐给他接通同莫斯科的电话联系。

苏联首都已接近午夜，戈尔巴乔夫已回别墅。总统接待室的值班秘书以疑惑的态度打电话给切尔尼亚耶夫说："美国总统希望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通话。怎么办？"

切尔尼亚耶夫坚定地说："把电话接到别墅去。"

电话转到了总统别墅，但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赖莎出去散步了。这是他们的惯例——每天傍晚当他回到别墅，他们必定去走上几圈。戈尔巴乔夫讲一讲一天发生的事情，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则注意地听并提出一些建议。

警卫人员不敢打搅他们，在他们散步回来后，才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报告了华盛顿来电话的事。戈尔巴乔夫命令给他接通白宫的电话，可是现在布什有事，已经无法通话。

第二天上午，戈尔巴乔夫严厉斥责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和总统办公厅领导人博尔金，说他们没有能安排他同布什通电话。戈尔巴乔夫命令博尔金把在接待室工作的值班秘书赶走并说："都是

些白痴、饭桶！他们中有一个直到现在有时还叫我列昂尼德·伊利奇。[①]”

最终同布什通了话，美国总统听到没有任何不安的根据后非常高兴。他甚至向戈尔巴乔夫道出了信息的来源是波波夫。当时戈尔巴乔夫非常平静地说：“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不可能比苏联总统知道得多。肯定是波波夫对帕夫洛夫总理6月17日在最高苏维埃非公开会议上的发言作了有些简单的解释。”

在会上帕夫洛夫批评了总统的无所作为，并要求授予他同总统本人权力相同的新权力。帕夫洛夫的强烈发言，还有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内务部长普戈都支持总理，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窘境。三位强力部长虽没有提到总统，但实际上都指责他在进行反对国家的活动。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出现在最高苏维埃，在他看来，似乎他已平息了三位强力部长突然发难造成的影响。

回到莫斯科后，别斯梅尔特内赫问戈尔巴乔夫，马特洛克是否向他转告了有人要搞阴谋的信息。

“是的，我都知道。”戈尔巴乔夫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就把谈话转到他认为更重要的话题上去了。

这发生在叛乱前两个月的时候。

给外长的私人便条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1933年11月10日生于远离莫斯科的阿尔泰边疆区的比斯克，但是他得以考入培养外交干部的熔炉——精英云集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于1957年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而3年之后就被派往联合国秘

① 列昂尼德·伊利奇是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和父名。——译注

书处工作。在联合国工作，这是对年轻外交官的最好锻炼。他在纽约呆的时间相当长，有6年之久。

回莫斯科后，他被分到外交部秘书处工作。葛罗米柯很赏识这个知识渊博、懂几国外语和镇定自若的年轻外交官，让他当上了自己的助手。后来批准他回到美国去——这一次让他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并从此一直注视着他。

别斯梅尔特内赫在大使馆连续工作了13年。这只是少数人才能得到的机会，因为对大部分外交官来说有一条硬性规定的工作周转原则，就是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必须调回国内中央机关工作，目的是不要过于习惯于外国生活。但是领导非常看重别斯梅尔特内赫，到任期结束时他已当上了公使衔参赞，成了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

1983年葛罗米柯把他调回莫斯科，把外交部的主要司一美国司交给他。别斯梅尔特内赫成了最亲近部长的人之一。除了同美国的关系之外，他还负责处理裁军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当了部长之后，马上重用别斯梅尔特内赫，让他当了自己的副手，而后来当了第一副部长。

别斯梅尔特内赫曾希望当驻美大使，谢瓦尔德纳泽不愿放他，不想让他离开莫斯科，不过部长理解，有才干的外交官需要鼓励。那时候戈尔巴乔夫把1985年去华盛顿工作的尤里·杜比宁召回国。杜比宁不是美国通，不会讲英语。但是他勤奋好学，终于得到美国人的好评。杜比宁回国之前，曾到白宫进行告别，布什总统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曾同他一起围绕白宫散步。当时杜比宁热泪盈眶。

戈尔巴乔夫在他1990年5月访美前一星期撤换了驻美大使，让别斯梅尔特内赫去替代杜比宁。但是别斯梅尔特内赫在华盛顿没有能够安排好他所心爱的工作。12月底，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辞呈。别斯梅尔特内赫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甚至给部长写了张恳请他不要辞职的私人便条。当时他没有想到部长的交椅正在等着他。

谢瓦尔德纳泽曾向戈尔巴乔夫推荐三个人来接替自己，这就是

自己的副手尤里·克维钦斯基、驻联合国代表尤里·沃龙佐夫和驻美大使别斯梅尔特内赫。戈尔巴乔夫也挑选了三个部长人选，但稍有不同，他们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雅科夫列夫当是戈尔巴乔夫的首选，但是仇视改革设计师的最高苏维埃肯定批不准。普里马科夫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正是在这个时刻他同侯赛因·萨达姆进行谈判，如任命他为外长会引起西方的戒心。别斯梅尔特内赫是驻美大使，当然美国人非常了解他，而且他是谢瓦尔德纳泽班子里的人，在政治上持中立立场，聪明而有教养，因此他自然就成了部长人选。

对别斯梅尔特内赫的任命在外交部使大家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是本部的人，是杰出的职业外交官，是谢瓦尔德纳泽之后最好的人选。这项任命对别斯梅尔特内赫本人也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尽管他宁愿仍当大使，同年轻的妻子马丽娅和刚出生的儿子阿尔谢尼温馨地呆在一起。他们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华盛顿。

1991 年 1 月 15 日，别斯梅尔特内赫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半小时后，总统把他介绍给了代表们。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最高苏维埃发表了他匆忙准备的讲话。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说一些赞美他的前任的最美好的话。

“当我走上讲坛，站在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面前时，”别斯梅尔特内赫给我讲述道，“我说我对出色的、卓越的外交家谢瓦尔德纳泽的离去感到惋惜。”

在会议休息期间，有人对他说，他完全用不着讲这个，需要对代表们讲点别的东西，何况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怎么样。

“我回答说，我才不管呢，”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道，“投票同意我也好，不同意我也好，反正不是我要担任外长的，驻美大使的职务对我来说完全合适……”

最后代表们几乎一致对别斯梅尔特内赫投了赞成票，只有 3 票反对。在批准后不久，部长同戈尔巴乔夫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出了

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这就是对外政策的所有好处都已得到，现在需要做搞好现实关系的具体工作。

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部务委员会上介绍新部长时说：

"我们不会放弃既定方针，需要做的是继续向前进。别斯梅尔特内赫一直同谢瓦尔德纳泽并肩工作，大家对他的业务能力、个人品质和素养都很了解。最高苏维埃刚刚对他进行了投票，总共只有3票反对，这证明了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几天之后，正好是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的生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前往祝贺，并为职业外交家谢瓦尔德纳泽的健康举杯。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举动在官场不太常见，官场是人一走茶就凉，不再理会原先的首长。

波斯湾风暴

别斯梅尔特内赫上任伊始，就碰上了维尔纽斯的悲剧事件，在那里克格勃和军队的特种分队企图掌握政权，镇压立陶宛人争取独立的要求。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和别斯梅尔特内赫不得不起来辩白，说没有发生任何向右转的情况。而在任命别斯梅尔特内赫的当日还爆发了波斯湾战争。正如他开玩笑地说："新部长连'初夜'都没有，没有能睡会儿觉，不得不处理所有这些事情。"

莫斯科时间凌晨两点，詹姆斯·贝克给别斯梅尔特内赫打电话通报说，波斯湾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戈尔巴乔夫请求把开始的时间推迟一点，哪怕推迟几个小时也好。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人已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不开始军事行动吧——意味着增强侯赛因·萨达姆不会受惩罚的信念；开始军事行动吧——则意味着会招来发动侵略的谴责，引起反美情绪。

1991 年 1 月 16 日夜，部署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多国部队对侵占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实施了首次打击。参加战役的有英国、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军队，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军。越南战争结束后 15 年，美国又在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苏联军队带着无法掩饰的惊异和嫉妒的心情观察着美国空军、炮兵和导弹是如何摧毁伊拉克购买的苏联军事技术装备的。

美国总统布什作出了在远离本国的地方使用武力、恢复正义和惩罚侵略者——另一个国家的元首的决定。他得到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支持。这两个人商议说，萨达姆必须严惩。如果他得以逍遥法外，不遭惩罚，那么其他人就会认为，他们也能这样做。

对于撒切尔的果断没有人会怀疑。非常了解女人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关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是这样说的，她的嘴唇像 60 年代性感象征玛丽莲·梦露，可是眼睛像残忍无比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1]

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原是不会采取冒险行动的。他多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当过驻华大使、驻联合国的代表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但是原先的军事飞行员乔治·布什知道会有需要采取果敢行动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驾驶鱼雷飞机的。1944 年 9 月，日军把他的飞机打了下来，两个机组成员阵亡，而他从燃烧的飞机上跳伞逃生，在水面上飘了两个小时，后来被美国的潜水艇救起。

周围的人都认为，必须用外交手段来制裁伊拉克，而只有布什同撒切尔商谈后，一开始就认为要解救科威特就必须动用武力。

顺便说一下，整整 10 年过去后，这个组织“沙漠风暴”战役

---

① 卡利古拉（公元 12－41），公元 37 年起为罗马皇帝，谋求无限的权力，要求尊其为神，因此激起元老院和御林军的不满，后被御林军所杀。——译注

严惩独裁者的指挥班子又重新出现在美国政府里了。这个班子是由2001年1月起担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组建的。他不仅外表像他的父亲，而且思想也完全同他父亲是相同的。在波斯湾战争时，国防部长是理查德·切尼。小布什选他当了副总统。当时切尼甚至准备用核武器来对付伊拉克军队，但是军方说服了他，说在广袤的沙漠条件下使用核武器是完全无效的。

作战行动由老布什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将军直接领导。在小布什当政后，他当上了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是牙买加移民的儿子，他在军旅生涯中奇迹般地一路顺风飞黄腾达。他领导的军事行动可能是在美国历史上进行得最成功的，因而赢得了自己同胞们的拥戴。他与其他职业军人不同，他不是在表面上，而是真正地关心士兵的，他还具有演说家的才能。他非常机智，善于以理服人。当他辞职后，大家相信他将参加竞选总统的角逐。他有争取到选民的一切条件，可是他拒绝了这种诱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听从了妻子的要求，他妻子希望他在服役35年之后应该同家庭在一起多呆呆了。

有好几年鲍威尔从事慈善事业，以修理旧汽车寻找乐趣——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回到政界是因为他无法拒绝布什家族的盛情邀请。以前的鲍威尔将军曾先后在越南服役过两次，通过切身的经历深知，行动迟缓和犹豫不决——这是致命缺点，他认为在危机形势下行动必须迅速果敢。

萨达姆投降了

老布什建议戈尔巴乔夫派苏军去波斯湾，哪怕完全象征性的也好。布什对戈尔巴乔夫说，美军士兵和苏军士兵并肩战斗将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看来，这也是可能的。但是苏联总统还是拿不定主意。他解释说，阿富汗战争还记忆犹新，这就不允许他再派苏联

士兵到国外去打仗，尽管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苏联政治家们对此感到不舒服。他们怎么也不能确定：过去他们支持那一方是否支持错了？相当一部分苏联人看不到在侯赛因·萨达姆的所作所为中有任何不体面的事，因此认为不可“出卖”盟友。

萨达姆喜欢玩弄外交手腕。这可让他拖延时间，指望大家变得疲惫不堪，就去关心其他问题。伊拉克人要弄花招，想让莫斯科同华盛顿闹翻。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说，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要撤出科威特，可是萨达姆根本不想这样做。戈尔巴乔夫接见阿齐兹时曾耐心地问他：你们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阿齐兹却抱怨说，这是在搞反对伊拉克的阴谋，而且傲慢地宣称，伊拉克既不怕美国人，也不怕世界大战。他还谴责戈尔巴乔夫同美国人一鼻孔出气。

联合国安理会给萨达姆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么他自己离开科威特，要么用武力将他赶出科威特，戈尔巴乔夫还安排了一次贝克同阿齐兹在日内瓦会晤。美国人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无条件地撤军。塔里克·阿齐兹傲慢地拒绝接受布什给侯赛因·萨达姆的信。

伊拉克人仍然不相信美国人会下决心进行打击和苏联会支持这种军事行动。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需要苏联，需要它作为武器的供应者和抗衡美国的力量。在意识形态上苏联同阿拉伯世界是合作不起来的。那里排斥共产主义思想，杀害或关押共产党人，对此苏共领导总是尽量装着看不见。后来阿拉伯国家自己看到了，莫斯科向他们提出的搞经济建设的建议使他们陷入了绝境，而苏联自己也缺少美金。

戈尔巴乔夫直到最后一刻仍希望能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说服大家把出兵问题放一放，还肯定侯赛因·萨达姆自己会从科威特撤军的。1月17日早晨7点钟，戈尔巴乔夫去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他的助手们早早就都到了。会上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报告了波斯湾目前的情况。亚佐夫说，美国人不会夺取巴格达，他们不需要巴格达。

美国飞机总共出动了4万架次，好几次是想炸死萨达姆本人，

但没有得逞。侯赛因·萨达姆极其谨慎，他既不用电话也不用电台，使美国人无法查明他的行踪。谁都不知道他下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过。每天晚上他的警卫人员总是一下子给他准备6处住房，只是到了最后一刻他本人才选一处过夜。有时他害怕，他就干脆在沙漠公路旁边睡在警卫森严和舒适的汽车里。

伊拉克向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几枚导弹。萨达姆希望以色列因受不了而开始回击，那时候这就将是伊拉克反对可恨的犹太国家的战争了。但是美国人说服了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要回击。何况伊拉克装备的苏联"斯科特"导弹没有给以色列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

别斯梅尔特内赫的妻子和小儿子仍留在华盛顿，可是他已经在处理波斯湾战争了。1991年1月26日，他飞到华盛顿后，连大使馆和家里都顾不上去看一下，就立即前去会见贝克国务卿。

戈尔巴乔夫和普里马科夫希望至少能保住伊拉克不受地面攻击。2月12日，在巴格达正遭轰炸时，萨达姆就在那里热情地接见了普里马科夫。他们互相拥抱。伊拉克人让普里马科夫看了遭轰炸破坏的建筑。伊拉克电视台摄下了苏联客人的每一个活动，全世界通过美国CNN电视台的转播都看到了这些场面。普里马科夫劝说萨达姆发表一个从科威特撤军的声明，这样就马上会停止军事行动，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谴责了美国人的行动："必须停止屠杀。我不是说以前的战争不对，但是把战争拖延下去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整个民族将灭亡。"

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并派苏联飞机把伊拉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接来莫斯科。萨达姆和阿齐兹说，如果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得到满足和联合国取消所有制裁，他们就准备分阶段撤军。戈尔巴乔夫建议：伊拉克先作出撤军的承诺，他再说服布什停止轰炸。两天后从巴格达来了回话——请带着您的建议去找美国人吧。萨达姆还不明白，等候他的将是什么。不过他根本不操心国家的灾难，而是认为人死得越多越好，这样人们就会更凶狠。萨达姆

在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他永远不会投降。

但是美国人不愿意让他体面地从这种局面下脱身，从而逃避惩罚。布什向萨达姆发出了最后通牒：一星期撤出军队。萨达姆拒绝了最后通牒。2月24日，波斯湾开始了地面战役。别斯梅尔特内赫责成外交部新闻司就“军事解决重占上风和失去和平调解的实际机会”表示遗憾。

但是应给予戈尔巴乔夫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应有的评价——他们没有再采取特殊立场同国际社会分庭抗礼。这就使得科威特摆脱占领和世界摆脱伊拉克可能使用核武器与化学武器造成的恐惧成为可能。其实，苏联和美国在近东的利益本来就不矛盾，因为两国都关心在那里保持和平与稳定，都关心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一切冲突。

伊拉克军队实际上两天就被消灭了。为了逃脱不可避免的劫难，丢尽脸面的萨达姆投降了。他对国家的毁灭倒没有感到心里不安，他害怕的是，他的将军们为了拯救自己会把他干掉。

2月26日夜，苏联驻巴格达大使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波苏瓦柳克应邀前去伊拉克外交部，波苏瓦柳克是位优秀的外交官和非常聪明的知识分子，他是阿拉伯通。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乐天派，性情急躁但心地善良，他经常写诗作曲。波斯湾战争期间，在巴格达遭轰炸时刻，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坐在大使馆的地下室，他不仅没有绝望，而且精神饱满。那时候他荣获了红旗勋章。后来波苏瓦柳克领导外交部近东司工作，当上了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于1999年患重病后去世，去世时还不到60岁……

当时波苏瓦柳克成了伊拉克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惟一渠道。外交部请他紧急向美国人转达以下信息：伊拉克已经开始从科威特撤军，伊拉克接受联合国的所有决议并保证给科威持支付给它造成的损失的赔偿费。老布什及其班子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别斯梅尔特内赫同意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安理会要求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草案。只要萨达姆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将保留政治和经济制裁并禁止伊拉克销售石油。

照本宣科也是可以的

在别斯梅尔特内赫当外长期间，苏联同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合作可以说极其富有成效。戈尔巴乔夫和别斯梅尔特内赫只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利益出发才这样做的。这是所有意识形态上的，甚至心理上的陈规旧套都退居次要地位的时刻。似乎，真正开辟了同西方明智地合作的新纪元，苏联和美国已能够推行统一的政策。

当然，别斯梅尔特内赫也同军人发生过冲突。虽然情况有时很复杂，但他极力用比他前任较冷静的方式搞好同军人们的关系。例如，布什总统就向戈尔巴乔夫抱怨说常规武器条约遭到明显违反。按照该条约，苏联武装力量应当裁减，可是总参谋部不想裁减，它就一下子把三个陆军师连同它们的大量坦克转到海军陆战队，而海军陆战队因人数较少，常规武器条约没有把它列入裁减之列。当戈尔巴乔夫问外长对此的看法时，别斯梅尔特内赫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公然的欺骗行为，同美国人要这样的手腕是不行的。

别斯梅尔特内赫之前和之后的外长，都热衷于政治，有时做得恰到好处，有时则不然。别斯梅尔特内赫在外交部长的岗位上是第一位不是政治家，而是纯粹的外交官。他肩负的是最繁重的外交工作——负责把在他之前发表的那些宣言付诸实施。

“在我当副部长或第一副部长时，”别斯梅尔特内赫讲道，“我负责处理的问题相当宽泛，基本上都是带关键性的问题，尽管对有些领域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我都清楚，但毕竟不如专家们。所以在处理任何问题时我都邀请专家参加。”

“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小秘密，”我问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参加谈判时，事先一定会对谈判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您准备各种资料，您真的能够对所有的资料都仔细研究并都记住吗?”

“给部长经常准备详尽的‘说帖’，里面写着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包括必要的礼节性用语，考虑到会谈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帖’附有详细的参考材料——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加起来总共五六百页。而这一切都是需要知道的，因为这样的材料完全可以满足谈判的需要。”

“顺便说一句，有些部长只是照本宣科。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要比忘记原来的计划背离既定的立场好得多。尤其是外交谈判的问题有时极其复杂，特别是在谈判战略军备或宇宙武器时，因此外交官常常邀请这些武器的制造者们来给参加谈判的人讲课，介绍必要的知识。所以说，现代外交要求外交官素养高，具有丰富的学识，掌握各种必要的资料。”

“我知道，外交部长的生活是愉快的苦役般的生活。部长应细致周密地准备谈判，可是哪里去找时间呢?”

“可以关在办公室里准备，但时间不能太久，因为世界上经常有事情发生。部长的工作之所以繁重，这是因为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他的生活中有所反映——如什么东西炸毁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越境了，所有这些事都得过问。当需要坐飞机去哪里谈判时，这是大好事，特别是去美国，因为在飞机上有 10 个小时可加紧做准备工作，必要时还可以加一个通宵不睡。就这样都养成了夜猫子的生活习惯。我近几年来每天至少工作 14 个小时以上，总是半夜才回家。”

“谈判时对手是否会提出在你们的‘说帖’中没有提到，因而您对此没有准备的问题?”

“这种情况很少。谈判通常都做百分之百的预测。此外，现代外交有一条规则，不应互相设陷阱，相反，通常都乐意事先向谈判对手通报，我们将提出哪些问题进行讨论。尽管这样，也可能出现我们没有准备的问题。这时候最好不要胡说，而以后再作回答。临时随意编造的外交辞令，犹如地雷场，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一句不谨慎的话会让您几十年难以忘怀。而接替您的部长就会因您的胡

说八道而遭殃。真的，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老实承认：我不知道!”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如果一个外交官开始编造某种事情，他就会无意中误导交谈的人，而这是非常危险的。现代外交是不能搞欺骗的。可以沉默，但搞欺骗是不行的。这是一条硬性规则——谈判中不能撒谎。必须牢记这一条，不然的话有人总会指责部长，说他有一次撒过谎。

有一件事直到今天人们经常提起，这就是我国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收到发来的电报，指示他向肯尼迪总统声明说古巴没有苏联导弹(其实美国人已经把苏联导弹拍了照)。

别斯梅尔特内赫说，当然两国的部长在私人交谈时还是非常开诚布公的。给对方悄悄讲的都是不能公开讲的内容。但是这也只有在坚信对方不会把秘密告诉对方的信息漏露出去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在部长之间甚至在他们事先没有就某事达成协议或双方持对立观点的情况下也应互相信任。

诚然，有的时候会采用这样的战略：在单独会晤时突然向对方部长提出他没有准备的问题。这一般发生在下列场合：同容易冲动和自负的外交上的新手打交道，他本能地不愿意承认他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或者希望利用对方部长爱面子的弱点，如果这位部长喜欢吹几句牛，如说没问题，这个我能做到，或说我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

也有使外交官担惊受怕的部长：没有经验的部长是否在钓鱼或打猎时候，或者在洗桑拿浴的时候头脑发热地评说一些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失的事情？但是拥抱和接吻不应该产生错觉。要知道，政治家永远是政治家。在这种会晤中是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激情的。担心被深深触动感情的部长会做出轻率的举动是没有根据的。部长有克制自己的能力。他们事先都知道，为了取得必需的妥协可以退让到什么地步。即使部长说了冒失的话，这也不会有什么实际后果。外交部的官方代表会马上推翻这种说法，说不能这样去理解部长的意思。

这种欺骗谈判对手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两国部长之间，因此也就是两个国家之间就会失去信任，而使关系恶化。只有专业知识肤浅的人才会认为，聪明的外交官应该对自己行动的动机给每一方都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当然，必须善于影响交谈者，以达到必要的结果，但方法要讲究。这就是外交技巧了。例如，在同阿拉伯人谈判时就不应该露出失望、悲观和不满的情绪，应该表示友好和乐观，甚至在谈判失败的时候也应这样。

谈判很像下棋，外交官应该会下象棋，如果不会，就不可能成效卓著。外交官应该要像象棋手那样去思考问题，把讨论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考虑清楚，以便取得需要的结果。要善于影响自己的交谈者，使他相信你的建议对他有利，这就需要外交技巧。

别斯梅尔特内赫说，在准备谈判时，必须合理安排，做到心中有数，设想会谈中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懂得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你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对方也要达到他的目的，结果就是达到妥协。仅仅是击败对手，这不是外交。这就是外交与下棋的不同之处，对我们来说，胜利——就是双方都满意。何况谈判也可能是非常开诚布公的，您直截了当讲我们的立场如何如何，而对方也同样开诚布公地讲他们的立场如何如何。在谈判开始时准确阐明自己的立场非常重要。如果要说到我们内部的做法，那我可以说，是在完全开诚布公和诚恳的情况下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可以把要求提得高一点，目的是为了以后可以作出一些让步。

“在您当部长的时候，对您来说有什么新东西？因为当时您已经在外交部工作了34年了。”

“对我来说新的东西就是高层交往，要同国王、总统、总理交谈，而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杰出人物。我习惯于同西方领袖人物交谈，东方领袖人物进行谈判的风格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在东方还必须学会读懂深奥莫测的脸部表情。例如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在我讲话时日本人总是闭着眼睛，他们是在睡觉吗？不是的，他们是闭着眼睛在非常专心听。假装睡着的日本人是警惕性高的日本人。”

“有想改变一切的革命外交官和避免重大变革的保守外交官。您认为您属于哪一类外交官？”

“搞外交革命的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外交官，他们非常危险。他们总想坐上更高的交椅，为此他们滥用权力。这样的外交官会做出蠢事来，造成无法挽救的灾难，革命性的变革是可能的，但只有在对方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职业外交官懂得，这种变革工作不仅在他们之前就开始了，而且在他们之后仍将继续下去。对外政策是由无数对源源不断的世界事件起作用的、细小而不起眼的倡议，改善措施和修正方案组成的。在对外政策中不可能有能摆平一切问题和解决一切问题的突如其来的出色的解决办法。外交——这是长时间、多套路和用计谋的对弈。

别斯梅尔特内赫从专门职业来讲是位美国问题专家，他懂得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但他是位眼界宽广的人。

别斯梅尔特内赫说：“我当上部长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曾说过，我们在北美问题上花的精力太多，那时候我建议要保证我们国家周围是友好国家。可实际上是我们同美国做了朋友，而同我们周围的国家却存在着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是我们绕过这些问题。这不是说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而同美国闹翻，而是说早该关注邻居，在欧洲占有自己的位置，同已经独立自主的东欧建立新的关系。”

“说谢瓦尔德纳泽交还了东欧，这是荒谬的，谁也没有夺占过东欧嘛！是东欧自己长时间以来没有能决定它应同谁一起前进。而我国的外交有错误，甚至在后来想要阻止北约东扩时，我们的外交官只是同美国、西欧以及其他国家谈判，就是不同东欧各国进行谈判。我们在东欧做了不少蠢事……在这方面苏联历届外交官都有过错。不过负责处理同东欧国家的关系的可不是外交部。过去对东欧的看法纯粹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讲究实效的。”

别斯梅尔特内赫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外交热衷于发表严正声明，这在决定北约东扩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

“起初，我们把一切都归结为‘决不允许’、‘绝对不准’东扩的声明上，认为这样讲就足够了。实际上我们浪费了时间，几乎把局势搞僵。”

我们的部长还处理了同中国的极其复杂的领土问题——这是要就长达 6000 公里的边界达成协议。1991 年 5 月，别斯梅尔特内赫成功地同中国签署了边界协定。谁都不知道，光标界工作就进行了很多年。

别斯梅尔特内赫曾为苏联首脑第一次出访日本和韩国做了周到的准备工作，结果是导致同汉城建立外交关系。在 1991 年同年，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第一次参加了七个最发达国家首脑的会晤。

最后，别斯梅尔特内赫还负责处理近东问题。他是第一位到过以色列的苏联外交部长。他懂得，如果不参加同以色列的谈判，苏联外交将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戈尔巴乔夫对他说，阿拉伯朋友将会闹腾。别斯梅尔特内赫冷静地回答总统说：“米哈伊尔·谢尔基耶维奇，一切将都正常。波斯湾战争刚刚过去，那些会闹事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阵地。”

最好不要在八月休假

照别斯梅尔特内赫的看法，对外政策是镇静地稳步前进的政策。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切都做得迅速、专业和无可指责。他完全忠实于戈尔巴乔夫，他根本不参与国内的政治斗争。那么，1991 年 8 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8 月 18 日下午 5 点 30 分，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给正在白俄罗斯休假的别斯梅尔特内赫打电话，请他赶快回莫斯科，但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由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的飞机专程送到了首都。8 月 18 日晚上，别斯梅尔特内赫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那里正在召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会议。

他身穿牛仔裤和夹克衫，困惑不解地环视了一下出席的人。克留奇科夫走过来同他进到另一间房间，匆匆忙忙地给他介绍了情况并建议他在刚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在那著名的不光彩的“苏联领导人声明”中讲道，由于健康原因，戈尔巴乔夫无法行使自己的职责并将其移交给了副总统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在苏联的一些地方实行戒严，为管理国家建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别斯梅尔特内赫请求将他的名字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中勾掉。

“哪能？要知道，这样一来外国政治家中就没有人同我通话了。”

他本人用蓝色铅笔把他的名字勾掉了，尽管他也担心，由于他不同意，会给他带来惨重的后果。他非常为自己的小儿子担心。不过当时放他回家了。

别斯梅尔特内赫没有支持叛乱分子，没有帮助他们，但也没有像谢瓦尔德纳泽那样起来反对。瓦季姆·巴卡京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写了抗议国家紧急委员会的声明。他们建议别斯梅尔特内赫作为安全会议的成员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拒绝了，借口是“必须实行外交方针的连续性”。

叛乱期间，美国人非常关注别斯梅尔特内赫的立场。布什曾给在位于红普别列斯尼滨河街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大楼的叶利钦打电话询问别斯梅尔特内赫的情况，叶利钦回答说：

“他持中立态度，看来是在观望谁将取得胜利。”

8月19日上午，别斯梅尔特内赫召见自己的第一副手克维钦斯基，指示他向各驻外大使发电报，委托他们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驻在国政府。结果外交部向所有苏联大使下达，指示在他们所在的国家散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一向守纪律的大使馆准备听命于新的领导。

别斯梅尔特内赫要求尽快地、用半个小时就草拟一份根纳季·

亚纳耶夫副总统关于所发生的事件致各大国首脑的信函，并在信中写上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将延续下去。部长带了这份草稿就去克里姆林宫开会了。

当天晚上别斯梅尔特内赫召集自己的副手们开了个会。据克维钦斯基讲，部长说他们有三个行动方案：一是辞职，二是什么也不干，三是继续工作，不要给国家的对外政策造成损失。后来部长就开车去了别墅。大家只是通过电话和他交谈。大家都说别斯梅尔特内赫得了外交病，他自己则再三说他肾结石病犯了。

“别斯梅尔特内赫不称职，”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后说。戈尔巴乔夫反对不明朗的骑墙态度，要么你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要么你忠于总统和合法政权。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伙人飞到福罗斯来见戈尔巴乔夫时，他在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在场的情况下曾对卢基扬诺夫说：

“如果你不能立即召集最高苏维埃开会处理叛乱分子，那你为什么没有和叶利钦站在一起？”

戈尔巴乔夫同外交部长的谈话也很严厉：

“我的印象是您在这三天里很消极。”

别斯梅尔特内赫表示不同意，说：

“这不对！这是有人在您面前污蔑我。我是您的战友中惟一经受住了这次考验的人。大家都去休假了，只有我在竭尽一切努力来捍卫我们的政策。”

“我得到的却是另一种信息，”戈尔巴乔夫说。

别斯梅尔特内赫提出辞职。要不是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定会当上很多年的部长。他召开了部务委员会会议，介绍了他同总统的谈话。大家都抱着惋惜的心情欢送他，部里大家对他都非常好。

在离开外交部之前，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给自己的主要对手贝克打了电话。当时华盛顿早晨 4 点钟。贝克表示遗憾，他说：“我对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已开始很好的协作。”

“您后来对什么事感到遗憾?”我问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我在位时推行的对外政策没有受到过怀疑。相反，大家都看到政界各方没有一个批评我的。至于我从部长职位上下来，这是新情况造成的。”

别斯梅尔特内赫辞职后当上了谢瓦尔德纳泽的对外政策协会的政治分析中心的领导人，而在谢瓦尔德纳泽回格鲁吉亚后，他主持了对外政策协会的工作。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保持着前外交部长典型的生活方式：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探讨对外政策方面的预测，同各国同行交往。但是不常与记者见面，在难得的一次报纸采访时他说：

“现在已不特别怀念过去在政府的工作。我是名职业外交官，现在仍旧是，实际上还是在做着以前做的同样工作。当然还应加上在我的一生中享受着不再受限制的自由，不再由并不总是有头脑的上司来指手划脚。”

第十一章

潘金："摔得头破血流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朋友面前丢脸"

1991年8月28日上午，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苏联驻当时还是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通了电话。大使馆里的政府专用长途电话机，按规定安放在单独的隔离室里，里面既闷热又憋得慌。

"你好，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说，"你现在能飞来莫斯科吗？"

"如果您叫我去的话，当然可以。"

"那么今天就动身，直接到克里姆林宫找我……从机场直接来……是谈任命你当外交部长的事……"

潘金明确地回答说：

"我可以这样答复：我立即飞莫斯科，但是在路上我要再作考虑。"

两个命令

为了让大使赶上飞机，苏联民航的飞机在布拉格机场耽搁了一会儿，潘金就乘这架飞机飞往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在到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助理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那里之前，检查了潘金好几次证件。切尔尼亚耶夫对潘金说，谁也没有向戈尔巴乔夫推荐他，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决定的。再说，戈尔巴乔夫还想起来，他同

潘金早在当共青团员的时候就已经相识。

当潘金被请进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已经在那里了。戈尔巴乔夫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夹，其中有两份文件，他用有点潦草的字体在第一个关于解除潘金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职务的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说：

“这个命令我们暂时放进抽屉里，在最高苏维埃批准这个文件以前让它在这里放一放。”

他签署了第二个命令并大声宣读了命令的全文。他说：

“这是任命外交部长的命令，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

“请注意，也可能批不准，”雅科夫列夫以警惕的口吻说道。“老弟，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会批准的，会批准的，”戈尔巴乔夫把握十足地说。“敢不批准，那就让他们试试看。”

这是鲍里斯·潘金的光辉成就。这几乎有点离奇。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名字遐迩闻名，飞遍全球。关于任命他为部长的命令在晚上9点钟的电视新闻里宣读。这时候他还在总统的接待室里。大家都赶来向他祝贺。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这时还不知道他今后会遇上走运的时候，不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他请求新部长把他派到好一点的国家去当大使。他说：

“可千万不要派我去近东，我已在那里呆够了。最好是例如派到英国去。”

后来，戈尔巴乔夫又接见了潘金一次，并讲了当前该做的工作：“改变目标，抛弃偏见”，同西方密切合作，不是同利比亚和阿拉法特，而是同富足安康的沙特阿拉伯搞好关系。戈尔巴乔夫对外交部在八月叛乱期间的表现非常不满。

“外交部的很多人都要撤换。叛乱期间他们袖手旁观，一声不吭，而且还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效劳……几乎是所有的大使都行举手礼，对叛乱表示拥护，所有这些事都应彻底调查清楚，我得到这样的信息：各国领导人不愿意同这样的大使打交道……真正支持

过叛乱的人，当然必须赶走……”

有七位大使因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遭殃。在外交部向潘金呈报了他们每个人的专案文件和把他们召回国内的建议。尼古拉·乌斯宾斯基——年轻外交官，仕途上一帆风顺，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他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瓦季姆·洛吉诺夫——驻南斯拉夫大使，原先是列宁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因此潘金非常了解他，他急急忙忙把大使馆内挂的戈尔巴乔夫的肖像摘了下来。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前苏共中央的一位部长，驻英国大使，他在同记者的座谈中主张戈尔巴乔夫下台。尤里·杜比宁——驻法国大使，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他只是向法国当局转交了来自莫斯科的信函……

紧接着潘金解除了第一副部长尤里·克维钦斯基的职务，此人曾主管同东欧的关系并在观点上同新部长有着根本的分歧。任命了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彼得罗夫斯基接替他的工作。这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外交官和杰出的专家。

戈尔巴乔夫吩咐将还是利加乔夫派来的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拿掉，出于人道的考虑，安排他去汉堡当副领事……

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实在忙得脱不开身，连个把小时也抽不出来，只好由总统办公厅主任、以前的基辅州委第一书记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列文科到外交部去介绍潘金同大家见面。部里的人对这项任命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他们推测谢瓦尔德纳泽将回到外交部来。叛乱后，克维钦斯基曾给谢瓦尔德纳泽去过电话，请他考虑回外交部的问题。谢瓦尔德纳泽曾关心地问，部里同仁们对此持什么态度。外交部的人甚至都派代表到他那里去，以此证明同仁们在等他回去，可是任命当部长的却是潘金。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选中潘金？他是惟一的一位对八月叛乱表示抗议并说他代表的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以戈尔巴乔夫总统为首的根据宪法选出来的国家领导的苏联外交官。8 月 20 日夜里，潘金和公使衔参赞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维奇·列别杰夫向捷通

社口述了抗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稿。8 月 21 日上午潘金在使馆外交官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声明，接着列别杰夫表明了坚定的态度。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很多外交官都支持他们，当然除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派驻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外，他们这些人已经准备改换门庭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效力。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马上要把挂在大厅里的戈尔巴乔夫肖像摘下来。

潘金早就建议削减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的数量，至少要把那些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军官正式介绍给捷克人的那些人减掉，布拉格的政权改朝换代了，在苏联使馆再拥有大量身份已公开的情报人员只会败坏国家的名声。

亚历山大·列别杰夫接替潘金当了驻布拉格大使，我同他在《新时代》杂志共过事，记得他是个思想敏锐和品行端正的人。他的相当一部分职业生活是在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机关里度过的，但是这丝毫没有毁了他。以后列别杰夫曾在联合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机构工作，而后来派往土耳其当大使。

"转瞬间当了外长，这对一个大使来说是否感到害怕？"当我们在圣彼得堡，也就是在从莫斯科到现在他居住的斯德哥尔摩的途中相遇时，我这样问鲍里斯·潘金。

"我想，我对此所做的思想准备不比谢瓦尔德纳泽差，他后来成了一位好外长。"潘金肯定地回答说。

"对新部长来说有什么是出乎意外的？"

"好像没有。这使得周围的人都感到奇怪，我熟悉新工作就像用刀子切黄油那样容易。"

鲍里斯·潘金对自己充满信心，不依赖别人，无私无畏和随时准备为了他认为是正义的事业而冒险。

从见习编辑到主编

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首先是出色的记者、编辑和文学批评家。他 1931 年生于伏龙芝市，中学毕业后考进莫斯科大学。中学毕业时他得了银质奖章，尽管考生很多，他还是考上了。他梦想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并在发行量很大的《莫斯科大学报》上第一次发表文章。

“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时，我简直高兴得晕头转向。”潘金回忆道。

赫鲁晓夫的女婿、后来当了《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的我国新闻史上有名的人物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注意到了他。阿朱别伊自己的报业生涯时间不长，他和赫鲁晓夫同一天被撤了职。但是有幸同他共事的那些人至今想起他来仍赞叹不已。

潘金大学毕业后，阿朱别伊介绍他进了《共青团真理报》社。他被聘为见习员——这对刚开始当记者的人来说是件莫大幸事。可是过了三个月他就面临被解雇，因为需要精简一些人。这时候当然不会把老人赶走。但是后来报社领导开了恩，把他留下了。这在《共青团真理报》社中简直成了经常给新分配来的人讲的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一个从边远省份来的小伙子被调来当见习员，差点被解雇，可后来却当上了主编。

潘金提升得很快，经历了记者、特派记者到部主任的各级阶梯。领导很珍视他的写作才能和出众的行政管理能力。阿朱别伊调到《消息报》社去时对自己的继任者说：“把鲍里斯提为你的副手。”

他 34 岁时当上了国内优秀报刊之一的《共青团真理报》的主编。这是《共青团真理报》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从见习员成长为主

编的编辑。谁都不会对这个明显事实提出异议——他在报社里不是在职务上，而是在才能上首屈一指。同仁们都承认这一点。而在那些岁月里，《共青团真理报》社里汇集了一大批有才能的新闻记者。

“在这个圈子里，谁的笔头好谁就会有威望，”那几年在《共青团真理报》社工作的著名的评论家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谢尔巴科夫对我说，“他是位好编辑，能把杂乱无章的条样编出引人入胜的版面。他对报纸的版面具有很好的审美感。”

在他的领导下，《共青团真理报》，既像是共青团中央这样的思想守旧的组织的机关报，同时又在持不同政见的团体中流传，勇敢地推行自己的路线和在读者中传播自由思想。

潘金回忆道：“在那些年月，当人们都爱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共青团的人’的时候，我总纠正说：‘对不起，我是《共青团真理报》的。’不过我应该说，和我在共青团一起共过事，而我当时对他们还有点看不起的人，后来的表现都比我的有些战友和我培养的人要正派得多。”

“要把报纸办得尖锐泼辣，同时又与共青团中央保持良好关系应具备哪些素质?”

“我不是在同他们搞好关系，而是在同他们开会，有时由于我在场，往往因意见不一而闹得不欢而散。总之，在我工作期间，我曾受过苏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的严重警告处分。有时候我写的文章被撤下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被吓倒，而有时我们也取得胜利。”

潘金是如何应付警惕性很高的共青团头头们的?

“他善于用他们的语言同这些人打交道，尽管这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康斯坦丁·谢尔巴科夫对我说：“他善于同他们打交道，他在团中央大楼的走廊里绝对不是异己分子……”

潘金生活中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

“功成名就，”谢尔巴科夫回答道。“他希望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不过，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职务，而

且是职务能提供各种机会。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迷惘不解，认为我们能够对社会有所影响。或许我们也没有迷惘不解，因为那时的《共青团真理报》可能已经使我们的思想产生某些变化，尽管是不大的变化。但是这对于鲍里斯·潘金来说是很重要的。”

潘金在观点上是自由主义者，他高额头，下颏向前突出，目光严厉，说话声坚定。

“他身上也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谢尔巴科夫指出。“但是至少在那些年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因素在他身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他是一个过于自信、态度严厉和以我为中心的人，但他完全是可以信赖的。”

“您的动机是什么?”我问潘金本人。“当上《共青团真理报》主编后，完全可以享受生活，而没有必要如履薄冰，冒极大的风险。”

“我的动机是希望做点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社会结构已经腐朽。我一生有两大爱好：创造和领导。所以我经常出头露面，正像我所喜爱的英雄所说的‘只有打起架来才能知道胜负’。我就是常常这样打架的。而在《共青团真理报》社里有的是这样的集体，要同这个具有持不同政见思想倾向的集体对着干，要比对上司开个玩笑更可怕。当跳伞时，首先要走上机翼，这时候两条腿显然会直打哆嗦。可是我不怕摔死，就怕在同志们面前丢脸。我一蹦就跳了下去。一切都正常。这种感觉伴随了我一生。”

潘金爱运动，结果有一次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脊椎骨，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在医院里他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交上了朋友，后来还写了关于西蒙诺夫的一本书。

瑞典模式

1973 年，潘金离开《共青团真理报》，当上了全苏版权协会主

席。全苏版权协会是个意识形态部门，它负责检查出口西方的文艺作品，砍掉不宜出口的作品。据说，当时有一个总编对此这样说道："任命当代别林斯基当了本肯多夫[①]。瞧着吧，会是什么结果。"

这是一个部长级的职位，而潘金是个虚荣心很重的人。这又是一个独立自主性很强的工作，而他正是一个爱发号施令的人，不欢喜听人摆布，而且这个职务必须同文化人士广泛交往，这正符合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学批评家鲍里斯·潘金的心意。像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时一样，他能想出办法让上司高兴，也为作家、戏剧家和艺术家做了很多好事，如使他们有机会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和展出自己的作品，并能从中得到一些钱，而过去全部稿费和酬金是都要上交国家的。

开头这项工作使他感到高兴，后来开始感到枯燥无味。他当时为在国外出版党的领袖们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著作操了不少心，因此在1982年他获得了驻瑞典大使的任命。潘金去了一个宁静的国家，突然换了个悠闲的环境。在他到任的前一天，一艘苏联潜艇出了事故，在瑞典海岸附近浮出了水面。突然爆出了丑闻：瑞典人本来就怀疑苏联潜艇经常闯入他们的领海从事间谍活动。莫斯科驳斥了这些指责。也可能不是撒谎，但是大家都已习惯，苏联外交经常撒谎，甚至说的是真实情况，也没有人会相信。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潘金。"是艇长出了差错，还是他在执行间谍任务？"

"我当了部长后才弄清楚，是出了差错。当时在潜艇上除了艇长以外还有一位来视察工作的海军将军。这位将军同艇长酒喝多了，两人吵了起来，结果把潜艇开到了不是想去的地方。"

潘金是对扮演时刻准备反击"反苏谣言"角色极为反感的大使

---

① 本肯多夫（1783－1844），俄国国务活动家。参与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1826年起为宪兵头子。——译注

之一。莫斯科不断来指示，叫他去解释，去辟谣，去抗议，去递照会……而他则希望国内更好的了解瑞典模式是什么一回事。

瑞典模式——这就是失业率低，工人和业主之间没有冲突，大部分是国营企业和高税收。瑞典的人口约 900 万，比莫斯科还少。瑞典人的生活不仅比我们好，而且比其他欧洲人也好。他们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结合得非常好。为什么瑞典模式，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模式？或许，整个问题是在于瑞典人的民族性格？

瑞典人喜欢什么事情都讨论讨论和商量商量。瑞典人守纪律，讲道理，不走极端。他们以讽刺的口吻称瑞典共产党是“啤酒俱乐部”，因为它的领导人只想在啤酒馆里消磨时间，不愿意为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去战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说过，如果斯德哥尔摩爆发革命，取得胜利的起义者会邀请被推翻的政府的大臣们吃饭并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

既然很多年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掌握瑞典，那么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在瑞典国家会干预一切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在瑞典当过 8 年大使的鲍里斯·潘金回想起，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与我们经常采取的做法相反，瑞典政府里任何人——无论是首相还是工业大臣——都不忙着去工厂、去造船厂、去农村，给生产者提宝贵的建议。而如果瑞典人看到自己的首相在大批随从、记者和保卫人员的簇拥下出现在工厂的话，他们是会感到惊讶的……

瑞典的政府由 30 个不大的部组成，主要从事起草法律草案的工作，每个部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和信差在内不超过 100 人。瑞典政府的任务是确定税率和汇率，发放补助金，监督遵守法律和不讲情面地收税。

已经好几代瑞典人享受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福利，如他们享受着一整套好的保健、社会保障和教育设施。瑞典人的养老金是他们最高工资的 2/3。所有家庭都领到 16 岁以前的子女补助金，如果孩子上学，可以领到学校毕业。还给工资少的人发放住房补贴。

普遍的医疗保险制度使得瑞典人看病几乎是免费的。为了能享受到这一切，瑞典人缴的税也是很高的——既缴全国的税，还要缴地方的税。收入最低的瑞典人上税的额度是两个月的基本工资，而工资高的人则要缴 3/4 的工资。什么都要上税，甚至工厂里免费的午饭或出差费也都要上税。高税收虽使国家摆脱了贫困，但是富不起来。

潘金不断地宣传瑞典经验，特别是在改革开始以后。但是瑞典经验在俄罗斯的遭遇不好，尽管在我们和瑞典人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想向美国人学习如何赚钱，但是都保留了社会保障制度。在瑞典也好，在俄罗斯也好，人们都习惯于获得国家的帮助，因此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投那些允诺政府一定会关怀他们的政党的票。

布拉格市中心的献身者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把潘金调到布拉格去当大使。当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韦尔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潘金要比一般的外交官更容易同哈韦尔找到共同语言。这个想法是谢瓦尔德纳泽在 1990 年 2 月哈韦尔访问莫斯科后想到的。送走哈韦尔之后，部长给斯德哥尔摩发去一封密电："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现在欧洲方向已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特别是东欧各国的事态发展迅猛，而且情况独特。无须隐瞒，在这些国家的苏联使馆目前的工作水平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决定要派最熟练最有经验的外交官去那里当大使，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国领导制定并实施这个重要方向的政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想提议任命您当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

在布拉格也和在斯德哥尔摩一样，潘金做着他认为必须做的

事。他乐意同人们会见，接受采访，大胆地同记者们交谈，这倒不是因为他当过记者，而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此毫不担心。他始终同外交部的头面人物格格不入。他经常因偏离惯常的做法而受到批评。

“我尽可能地不理睬他们，”他带着有点满意的心情回忆道。“我给莫斯科写报告说，我不知道你们所有的‘禁令’，因此也就违反了某些未经明文规定的规矩，可是事情我还是做了，如果是好的，那你们还要怎么样？”

驻布拉格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也对大使非常恼怒。问题不仅在于思想上有分歧，而且人数众多的苏联大使馆里的许多人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制度已崩溃和舒适和不愁吃穿的生活已结束的事实。这些人在别人的国家里曾经感到自己是全权主人。一个喝醉了的苏联外交官，当布拉格的警察拦住他的时候，他会向他叫嚷道：

“这里有我们的坦克，而你敢拦阻我？”

当潘金已经是大使的时候，已作出了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苏联军方则请求不要匆忙撤军：

“我们需要时间来做在苏联境内接收和部署军队的准备工作。”

捷克人回答得通情达理：

“我们理解你们的困难。但是当你们一夜之间把军队开进我国的时候，难道你们想到了你们将把军队部署在什么地方吗？而现在你们撤军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潘金同驻军司令员、现在的国家杜马代表爱德华·阿尔卡季耶维奇·沃罗比约夫上将一样，赞成尽快撤军。

“当时您对从斯德哥尔摩调到布拉格感兴趣吗？”我问潘金。

“那还用说！首先我有可能为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表示道歉。”

“似乎您的道歉没有多大帮助。反正捷克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提心吊胆地瞧着俄罗斯。”

“如果这一切这样容易就好了，只要道歉一下，就好像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过，就可以忘记一切。不会有这样的事。不过我觉得，发自内心的歉意，人家还是会觉察得到的。”

1990年8月21日上午，苏联大使前往查理大学的大学生扬·帕拉赫自焚的地方，并献上了花束。他是第一个认为自己有责任这样做的苏联官方代表。

大学生扬·帕拉赫是为了抗议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于1969年自焚的。1月26日，20岁的帕拉赫买了一个带盖的白色塑料桶，在他平时吃午饭的大学生食堂的那条街上的加油站灌满了汽油。他在邮政总局发了几封信，然后大约在下午2点，带了灌满汽油的塑料桶前往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的国家博物馆。他打开了汽油桶的盖子，将汽油浇在头上和衣服上，接着就划着了火柴。无法忍受的疼痛使他从马路上奔向人行道。过路人吓得目瞪口呆，只看见一个火球在滚动。在转弯角上扬·帕拉赫倒下了。交通指挥员首先清醒过来，他把大衣扔向浑身着火的青年身上把火扑灭了。

在扬·帕拉赫去世的岁月里，捷克的新闻记者曾详细地报道过他的短暂的一生。他是单身汉，不爱说话，懂礼貌，对周围的人特别关心。在去世前的一年，他曾和一个大学生工作队去过苏联，在那里他争取到让工作队能得到良好的膳食和使夏令营的头头们不再嘲笑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们。这些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去做的，从来没有召开过会议，要求同学们支持他。他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封信中曾提到有个志同道合的小组，可是当时和后来从来找不到这个小组的蛛丝马迹。是否是他虚构的，是想要使他提出的要求具有更重的分量？

这些要求其实也不高。要求中最主要的是取消书刊检查和关闭曾对华约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欢迎的报纸。扬·帕拉赫没有要求占领者立即离开捷克斯洛伐克。他的抗议不是针对别的大国的政府，因为这一点他无能为力，而是针对本国国内的消极惰性心理，对极其可怕的事情无动于衷。他对国内的抵抗抱有信心。他深信，如果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工人们联合起来，那么人民的统一意

志将会迫使占领者撤军。

他百分之八十的皮肤都烧伤，但他还活了 4 天。当他的母亲和兄弟来看他的时候，他还强颜欢笑，尽管他讲话已经非常困难。在他去世以后，护士证实，扬・帕拉赫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谁都不要学我的做法。"

这句话是讲得太随和了，不过它倒使政府当局感到满意。在葬礼上，大学校长和文化部长对大学生发出恳求："国家需要你们活着。"

可是，在扬・帕拉赫去世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其他国家里，都有一些人重复他这种抗议占领国家的做法。扬・帕拉赫在临死时曾想知道，他的举动改变了什么没有？人们和政府是否有所触动？

"这太少了。"当护士给他读报上的消息时，他低声地说道。

他曾期待出现某种变化，可是白等了。国家领导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政府首脑奥德日克・切尔尼克对他的母亲表示深切的慰问，但是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他们虽还在台上，但已经屈服投降，扬・帕拉赫的举动只是使他们虚惊一场。他们真诚地，相信国家惟一需要的是秩序、安全和正常化。不久，他们就丢掉了自己的职位。

书刊检查越来越严，坐镇各报编辑部的已经是与占领者合作的人。苏联军队被舒适地安置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很多便宜的水晶制品、桶装啤酒和鲜美火腿的地方。"正常化"将继续 20 年……

我对扬・帕拉赫在病床上死去和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的 1969 年一月份的日子记忆犹新，我 12 岁上 5 年级的时候，我们下课后常去武装力量博物馆。参观博物馆是免费的，博物馆的电影厅也免费放映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的纪录片，这些反革命分子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德复仇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准备搞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武装叛乱。

苏联报纸关于帕拉赫的事没有任何报道。我们关于帕拉赫的事

什么也不知道，有些人虽然知道，但都若无其事，并说："帕拉赫是个疯子。"

大门旁停着"吉尔"轿车

戈乐巴乔夫让潘金兼任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成员并任命他当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潘金喜欢权力的象征，如大门旁停着"吉尔"轿车，经常护送部长的警卫员，在部长专用电梯门口迎接部长的秘书。他也十分欣赏克里姆林宫的警卫人员向他举手行军礼，周围的人也都显得格外殷勤周到。他是从专门供正副部长进出的大门到外交部上班的。上午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用打字机打印的工作日程表，表上列着同部长、总理和总统谈话的安排。这种飞黄腾达的景象对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影响，这就很容易使人得意忘形。

当潘金还是大使的时候，他在外交部的自我感觉不怎么好。科班出身的外交官看不起从外面调来的干部，而他正是委派来外交部的。现在他得到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观察外交生活的极好机会。尽管当大使有优越性，但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他不太了解中央发生的事情，也不熟悉大政方针的秘密。所以大使们都抱怨说，你给莫斯科不断地写电报，可是你得不到回电……突然不久前的大使得到了知道并看到如何执行他的电报的机会。

但是部长的工作是繁重的，需要一天进行 10 多次的会见，而且还要保持感觉敏锐，反应要快，善于说几句笑话并能不失常态，因为一天内要多次会见记者并回答他们的问题。

当他上午一坐上自己的"吉尔"轿车去上班时，车内已有了一份综合情况报告在等他，而更详细全面的报告则已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在一旁放着厚厚的各位大使发来的电报、塔斯社通讯、情报资料和外交部各司的备要报告文件夹。在接待室又有大使和资深外交官在等待接见。在紧靠着办公桌的柜子上放着几排电话机，最主要

的是总统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的直通电话机。协助部长工作有一大批机关工作人员，他们仔细审核大量信息，从中挑选出最主要的信息，帮助弄清楚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样，部长还是要每天掌握和消化大量信息。

八月叛乱以后，戈尔巴乔夫想要挽回自己以前在社会上的地位，恢复同民主力量的关系。但是为时已晚。大家对他都不信任了。他企图通过经常同外宾的会晤来确立自己的形象，为此他不断给潘金下达任务，一天要同他通几次电话。

“同不止一年担任外长职务的死硬派同行进行谈判是不是很困难?”

“倒没有感到特别，因为那时他们非常同情苏联。”鲍里斯·潘金对我说。“那时他们不是对我们说恭维话，但对我们确实是表示了特殊的而且是真诚的关系。所以似乎在同西方以至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出现了黄金时代。”

潘金对美国国务卿贝克说：

“让我们就一些重大问题商谈一下。我希望我们能达成共识，但是我事先对您有一个请求，就是即使我们的最后协议不是接近我们以前的立场，而是更接近你们最初的立场，请你们不要对新闻界讲我们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只说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改变。”

潘金已经以部长的身份准备了同东欧各国的崭新的条约。在最初的条约草案中曾有限制它们参加同第三国结盟来反对另一方的权利的条款。潘金坚持，应该给所有国家保证由它们自己决定同谁友好和同谁结盟的权利。所以潘金的敌对者也都说，他是第一个为东欧打开通往北约道路的人。

他说过：“渴望加入北约的想法是后来当出现对俄罗斯的惧怕时产生的。光下禁令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奥洛夫·帕尔梅[①]曾这样说过，如果一个国家不关心邻国的安全，那么这个国家自己

① 原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译注

也不会是安全的。”

潘金当部长以果断大胆出名——他不是逢事就跑克里姆林宫去请教，而是自己做决定。潘金在总结自己时间不长的部长生涯时给自己定的是什么功劳呢？

在叛乱后没有几天，潘金就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讨论人权问题的国际会议。当时很多人觉得时机不合适，但是潘金坚持召开并证明他是对的。当时人权、个人的权益高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提法取得了胜利。而苏联当局则是常常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掩盖自己最卑鄙的目的。

潘金同美国人签订了停止向阿富汗对抗的各方提供军援的协议。这没有救得了纳吉布拉，可是使俄罗斯摆脱了额外的开销。潘金是第一位会见阿富汗圣战者的人，圣战者在出现塔利班之后变成了俄罗斯的盟友。

潘金做了在外交上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准备工作，当时它们已得到 50 个国家的承认。不再承认现实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就没有意思了。

他争取到了作出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潘金用会议主持者的声槌宣告了马德里近东问题国际会议的开幕。通过这次会议，他勉勉强强地激发了调解近东问题的使人坐卧不安的政治气氛。

在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后，叙利亚外长对潘金寻机找碴儿。潘金对这些人如此放肆大为气愤，好像不是我们给他们供应武器，而是他们给我们供应武器，派遣顾问和提供各种援助。

潘金在联合国大会上，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己的倡议，对 1975 年通过的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臭名昭著的提案，提出否定看法。当时苏联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曾提出不同意见，说穆斯林国家不会理解我们。潘金经过思考后仍然说：

“必须一劳永逸地抛弃像这个令人反感的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为种族主义的提案的这种‘冰河时代’的遗产。”

不久，联合国大会就投票否决了这个提案。

潘金认为必须改变同古巴的关系

“我不喜欢我们应该供养古巴。我们曾一度为古巴的浪漫主义精神狂热捧场，而结果是我们只是供养了古巴。何苦？我们把导弹旅撤出了古巴。它在那里做什么？苏联导弹旅成了人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打算既极自私，也很简单：只要岛上部署有苏联部队，美国人就永远不会进犯古巴，因为美国人怕苏联士兵在战斗中伤亡。冷淡同古巴的关系，或者确切地说使这种关系转到比较现实的基础上的做法，使很多人感到愤慨。但是，这显然是由于完全不了解现实形势造成的。”

政治局委员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早在 1970 年初就在日记里气愤地写道：“我国在古巴身上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每天大约要花掉 150 万卢布。而古巴的实际情况远不是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给我们讲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宣传。古巴的经济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政治形势也非常不稳定。目前古巴完全靠我们苏联养活。我们每年要给古巴调拨 90 万吨，有时是 100 万吨粮食——平均每天给每个家庭发一个白面包。为了养活 900 多万古巴人，每天要往那里运去黄油、肉类、土豆、鱼、洋葱、植物油及其他食品。根据我们的合同，1971 年我国必须给古巴提供 7·5 亿到 8 亿卢布的商品。古巴给我国提供 2 亿卢布的商品，而且条件是提供给我国的糖按每吨 120 卢布计算——这比世界市场的平均价格要高出一倍。仅仅在这上面我们每年要损失 3·2 亿卢布。古巴尚未偿还我国的贷款就有 3·5 亿卢布，到 1975 年这项债务已增加到 600 亿到 700 亿卢布……我们一直在纵容古巴，古巴人在许多问题上的表现简直是不负责任，而我们又找不到智慧、勇气和胆量，果断地停下来慎重地思考一下我们该怎么办？……”

鲍里斯·潘金认为自己当部长时有什么事做错了？

“我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自己做了些什么事和怎样做的，逐个检查了一遍，我没有发现我做过什么蠢事。”

你要往何处去？

潘金被迫为保护好自己的部门而进行斗争，因为叶利钦提出要裁减外交部十分之一的人员，而俄罗斯财政部根本就停止了给外交部的财政拨款。事情发展到需要戈尔巴乔夫出面干预。

叶利钦以和解的口气对潘金说：

“这方面我们的财政部长确定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给我打了电话，我已纠正了财政部长的做法。但是，还是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信号……”

潘金建议成立由所有加盟共和国和外交部长参加的外交部长理事会，让各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大使馆的工作，而外交部的人员编制缩减三分之一，办法是利用“邻居”，即安全部和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工作。在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支持了潘金的这个计划。

11月，从精简人员的考虑出发，将外交部同对外经济联系部合并，改名为对外关系部，合并后的部应该协调各加盟共和国外交部的工作。

不久，潘金的外交部长的生涯也就结束了。戈尔巴乔夫还是说服了谢瓦尔德纳泽回来当外长。11月18日下午4时左右，戈尔巴乔夫用直通电话给潘金打电话说：

“没有开会吧？能来我这里吗？”

当鲍里斯·潘金到达克里姆林宫后，戈尔巴乔夫用不太肯定的口气说：

“你听我说，我们仍旧考虑必须让谢瓦尔德纳泽回来。”

他不想让潘金受到委屈，所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建议他担任安全事务顾问的职务，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基辛格的角色。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安全事务助理是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他成天忙于文件起草工作。潘金既不打算接替切尔尼亚耶夫，也不想同他分担这个对自己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他立即拒绝了这个能使人引以为荣的建议。

"当然，"戈尔巴乔夫愉快地表示同意，"也可以去当大使，这就随你的便了，是去华盛顿还是去巴黎……"

"去伦敦，"潘金马上说道。

但是戈尔巴乔夫让他晚上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再作肯定地回答，是决定当顾问还是当大使。第二天上午，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请潘金到他那里去一趟。他到的时候，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坐在总统办公室里了。戈尔巴乔夫再一次问了潘金本人的意见，听完答复后，要求立即让他同英国首相梅杰取得联系。当时没有能马上联系上，因为梅杰正好在路上。他们三个人一直坐等了 40 分钟，情况有点尴尬。

这时，梅杰来了电话，并请向新的外交部长表示祝贺和对新大使表示欢迎。但是他解释说：

"我必须征得女王的同意。我相信，她不会有任何不同意见，她将非常高兴见到鲍里斯·潘金来当自己宫廷的大使，尽管这样，我还是必须得到她的同意。"

戈尔巴乔夫解释说，他希望在莫斯科时间晚上 9 点发布有关新任命的消息。梅杰说没有问题，两个小时以后，女王同意了新大使鲍里斯·潘金上任。

在戈尔巴乔夫重新引见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潘金在向大家告别时说，他一生都会为他在国家处于艰难危险时刻就任外交部长一事感到自豪，他希望不辜负对他的期望。很多人感到惊奇的是，戈尔巴乔夫竟会如此轻松愉快地与刚刚还为当外长而感到自豪的潘金分手和推荐不久前曾在接受报纸采访时严厉批

评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

一些职业外交官指责潘金不是当外长的料，他在叛乱时期的勇敢表现并不能保证他会善于掌管一个大国的全部外交工作。但是，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潘金当外长的时间比他的所有前任都短，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样指责他是不公正的。

不友善的邻居

在伦敦的工作是愉快的，因为当时的首相约翰·梅杰对鲍里斯·叶利钦有好感。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却不喜欢俄罗斯总统，对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做法有意见。

但是，鲍里斯·潘金在英国没有呆多久，上任一年半以后，他就调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了。调任的电报用词极其恭维：只有您及您的才能能够胜任……

潘金在复电中写道："谢谢给我的荣誉，但是南斯拉夫的局势好坏，很少取决于大使。"在这个答复之后，刚过两个星期，莫斯科来了电报："总统建议您退休"。

这两个星期内发生了什么事呢？

1993 年 9 月，在总统委员会会议上鲍里斯·叶利钦突然宣布，必须立即免去潘金的职务，但是没有说明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

"有人给他递了一份小报告，"潘金给我讲道，"说什么驻伦敦大使不知在搞什么鬼名堂，说是在写书，而且经常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大使的职责是执行中央的意志。"

一个深受俄罗斯知识分子尊敬的人突然间不仅变成了被流放的政治家，而且变成了不知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使自己名誉扫地的人。既没有直接指控的证明，又不让申辩。

好几个月过去了，潘金仍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有传闻说，关于他被撤职的总统令已经收回，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好像在

一些场合曾向大使道歉，建议他仍留在伦敦。但是在外交部里这些传闻都遭到了驳斥，说是潘金大使自己请求部长让他继续工作到1994年初。那么到底什么是潘金被撤职的真正原因呢?

鲍里斯·潘金在1991年讲了有大量情报人员躲在大使馆工作，这给了原先的克格勃和情报总局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当了部长以后，一直想不让情报人员用外交官身份做掩护。所以他有根据认为，他的去职是特工部门的报复。政治和军事情报部门派驻每个俄罗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直通莫斯科的渠道。不仅大使而且外交部长也都不知道，有两位派驻人员从伦敦不断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自己对大使活动的监视情况。叶利钦总统关于收拾潘金的决定会不会是他对向他呈报的关于大使的“黑材料”一时冲动所作出的反应?

潘金同特工部门的关系问题，早在他去瑞典当大使时就产生了。在不同的部门中有如此多的特工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是第一次才知道，所以对此毫无思想准备。

根据政府的秘密决议，在全苏版权协会里450个职位中9个归克格勃。可是在驻瑞典大使馆里几乎是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不是来自克格勃就是来自情报总局。

“在大使馆的生活中最复杂的是，”潘金讲道，“同这些人搞好关系。他们笃信不疑，所有其他外交官以至整个大使馆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掩护他们。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派驻的情报员：‘您以为使馆是作为你们的掩护所存在的?’他像瞧白痴一样瞧了瞧我说，你不这样看吗?”

或许潘金当了部长有可能看到情报材料后，他对情报工作会有恰当的看法?他会看到，为了情报工作没有什么可舍不得的?

“不是的。”潘金坚定地摇了摇头。“他们是弄到了个别的有价值的材料，但常常是转抄大使馆的资料作为自己的报告。这我很了解，我是在3个国家当过大使的。那里的情况是一切都在衰败。”

大使们通常是不同派驻的情报人员争吵的，可是鲍里斯·潘金

始终是好斗的性格。

“于是我就开始同特工部门的这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干起仗来了，特别是当我弄清楚，所有这些人都是某某人的亲戚或朋友，或是某某人安排到好的国家来的很要好的熟人的时候。”

潘金在大使馆工作的时候，经常自由地安排会见，随时接受采访，上街散步，这使派驻使馆的情报人员感到吃惊。他们很快感到，他是个带有抵触情绪的危险分子。潘金对他们也礼尚往来，毫不示弱。他对“奴隶贩子”的招募活动是这样讲的：“他们把人招募来之后，强迫他们洗脑筋换思想，对他们进行恫吓，抓住他们的某些问题大做文章，毁坏他们自己的以及他们家族和亲人的生活……他们的这种活动同黑社会或盗窃集团的犯罪活动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潘金到莫斯科后去见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当时的情报侦察机关的头头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并对他说，驻瑞典的大使馆里的情报工作人员太多了。从此之后，军事情报机关和克格勃就变成他的敌人。

“要知道，他们想任意摆布大使，监视我去了哪里，和谁谈话。强迫我的司机要向他们汇报我的所有行动。他们简直是头脑发热，这一点后来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当时潘金就发觉，大使馆的真正主人不是大使，而是克格勃的军官。

“大使什么事也办不了。来使馆工作的人员任期一到就回国。只要任期没有结束，大使是不能打发他回国的。可是安全部的军官却能让任何一个人提前回国，所以大家都怕他们。”

潘金没有被选为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党委会的委员，理由是失去集体对他的信任，通常的后果是将大使召回国内。不过潘金没有遭到这种厄运，相反把他从斯德哥尔摩调到了布拉格，在那里他又同人数众多的“邻居”发生了冲突。他们本来会严重地毁坏他的生活，但是八月叛乱事件把他推上了这些人望尘莫及的职位。

潘金当了外交部长后，他靠自己的权力解决了削减利用外交官

身份作掩护的情报工作人员的数量的问题。

“来到外交部之后，”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说道，“我发现这里的怪事简直多得吓人。还有像干部局的这种怪物，他们在那里研究您的祖母是谁，祖父是谁。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解散了外交部的干部总局，把所有的克格勃工作人员从那里赶走。当时的苏联情报局长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来见潘金部长，是在他自己被解职的前两天来的，他说：“您是对的，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的情报人员。我们自己也吃了他们的不少苦头，应该把他们赶走。”

他给部长看一些文件，并说：

“您瞧，我们已经削减了多少人。”

潘金对舍巴尔申说：

“我已经下达了让所有你们的人离开外交部的命令。命令是两天前下发的，可是他们仍在原地没动。”

舍巴尔申一切都明白了。一个小时之后，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彼得罗夫斯基来到潘金这里说：

“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所有的人像被一阵风吹跑了似的！”

潘金答应制订一个关于情报人员在驻外代表机构工作的文件。但是随着潘金的下台，所有这一切也就寿终正寝了。穿便服的“外交官”又回到了外交部。据说现在在外交部的中央机关里，在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情报人员的数量一点也不比苏联时期少。

* * *

潘金没有从英国回莫斯科。退休后，他移居瑞典，他非常喜欢那里，那里的人对他十分尊重。他在瑞典经商和给瑞典和俄罗斯报纸写文章。他说对自己过去的事业还较满意，但是对创作工作不满意：

“如果我在我的领导欲望上少化一点精力，那我就会写更多的

东西。”

我问他：

“有时还邀请您去您在那里工作多年的俄罗斯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吗？”

“不邀请了。”

朋友们对他在瑞典定居一事没有任何指责，但是对他没有能和他们在一起都表示遗憾。尽管在国内他的生活很可能会较困难些和不太愉快些，不过受到的指责可能会少一些，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不在场的人总是罪责难逃的人！”

第五部分

叶利钦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十二章

科济列夫：铁石心肠的毛烘烘小熊

1995 年 10 月，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在会见记者时突然粗暴地说，独立俄罗斯首任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该换了。在那之前，科济列夫刚刚庆祝完他担任部长的五周年纪念日。很多人认为，多年任职不动的原因是科济列夫全心全意忠实于自己的总统。

当叶利钦决定把他忠实的部长革职的时候，很多人感到震惊，因为他的部长为了总统牺牲了自己政治上的朋友和名声，顺从地改变了政策，成了众矢之的。但事情的发展非常奇怪。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没有提出辞职，而总统似乎对自己的话做了纠正，说可能有充足的理由为科济列夫任命一位强有力的副手。莫非他改变了主意？

当上部长是一场灾难

那些天，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似乎在证明，人死后仍有生命。整个世界在听到叶利钦的话之后，事实上都已同作为部长的科济列夫告别，然而他仍在继续领导俄罗斯的外交工作，试图让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相信，什么特殊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在 1995 年 11 月的最后几天，我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他的办公室见他，在进行了近 2 个小时的谈话之后，我可以确认，矜持的科济

列夫像以前一样镇定自若，充满信心。他希望再一次当上杜马代表（正在进行选举运动），并为取得总统的关爱再努一把力。安德烈·科济列夫像往常一样，小声说话，带着俏皮的微笑，直接看着您的眼睛，对任何问题都寻找外交式的答复。

我带来绝对不能不提的问题：

“叶利钦总统宣布解除您的部长职务，这伤了您的自尊心，在这之后，您为什么没有立即提出辞职呢？”

“在第二天早晨，我们应当一起飞往美国。在机场我对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大概我去就没有意义了，应当辞职了。”

但是，叶利钦不希望出丑闻后开始他的访美之行，也不能不带外交部长去。总统气愤地把两手一摊，说：

“是啊，他们根本没有那么理解我。我本人这就对记者们说清楚。”

总统走出去，来到聚集在弗努科沃—2政府机场空荡荡的大厅里的记者们跟前说，他根本不想辞退科济列夫。他只是需要强有力的副手来办理部里的事情……叶利钦叫上了科济列夫，就向飞机走去。科济列夫把双手一摊，向记者微微一笑，就跟着总统走了。

“难道您自己辞职不是更好吗？”我再问科济列夫。

他略微摇摇头，说：

“我认为，在总统出访前夕提出辞职，意味着削弱国家在谈判中的立场。这就像在派军人们出发进行侦察时给他们讲清他们的关系一样。”

“您把对美国的访问看成是作战行动？”

“我非常忠实于伙伴关系与合作关系，但我把伙伴关系看成是坚持民族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在出访中我同总统的交往密切，非常友好，我决定在返回的时候再做解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生病了，我们的谈话是在中央门诊医院里进行的。结果是总统发表了他支持外交部长的声明。”

“也就是说，你们得出了结论，总统的话是失言，而不是斩钉

截铁撤销你职务的决定?”

“我应当冷静地分析，那些话里含有什么意思，而后表示支持我的话里又含有什么意思。这需要时间。”

科济列夫被解职的传闻已有好几次，他大概也不相信总统这一次意图是认真的。安德烈·科济列夫说，他当然早晚要离开他那间布置着维辛斯基时期留下的家具的昏暗的办公室。他当然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得越晚越好，这是明摆着的事。他大概找到了大量的理由来促使作出留他担任部长职务的决定。尚不清楚，将把何人安排到他的座位上。但只要他还是部长，他就仍然能够影响政治走向理智的方向，防止国家做出明显的蠢事……

“大概您同外国伙伴打交道困难?他们不知道您在这个位子能干多久?”

“说我们现在外交战线上软弱，这是不正确的。伙伴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有正确的理解。”

不单单科济列夫本人希望知道，为什么鲍里斯·叶利钦突然之间宣布，要把他革职。有可能这只是俄罗斯第一任总统所特有的经常发作的古怪脾气的表现?

但是，总统尽管脾气古怪，却深知：没有人保护科济列夫，他得不到支持。民族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总是仇恨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是那届政府中首次任命的最后一位民主派人士，而且是有文化、有素养的西方派、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科济列夫对我说：

“西方民主国家是俄罗斯的天然伙伴和盟友。我永远不会放弃这个思想，我死了也要带着它进棺材。”

虽然如此，近两三年他却与同情他的人发生了争吵。

“您退出‘俄罗斯选择’之后，同以前在车臣战争问题上的志同道合者分了手，您作为政治家完全孤立了起来。这没有使您害怕吗?”

“这没有让我担心，也没有让我犹豫不决。我孤立于莫斯科政治生活的各个派别。但这是些在国家中没有牢固基础的上层集团。

那些不投我票的某些小集团，很少使我担心。最重要的是，在我的选区内，选民们如何投我的票。”

科济列夫给我上了一小课，他说，政治不可能是凝滞的、教条的东西，它应当考虑到现实，对现实做出反应。他补充说：

“而我的政治观点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

的确，科济列夫的观点没有发生变化。他只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年复一年地“校正”自己的政治路线和词汇。他已更经常他把自己成为“强国派”，而不是“民主派”。他的新词汇把他的老朋友赶跑了，可似乎也没有结交到新朋友。人们把科济列夫称做叛徒，对他来说官位比什么东西都宝贵。他为什么没有像叶戈尔·盖达尔那样离职呢？坚持原则才能赢得尊重。答案是有的：他留下来了，是因为他不想扔掉已经开始的事业。阿纳托利·丘拜斯不是也留下来了。这是一种干不成大事的理论。而且不知道，是因为无原则而受到谴责，还是因为前后一贯而受到赞扬。

安德烈·科济列夫在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了自己职业的顶端。他要不当部长，他做什么呢？我问了他这个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当建设者、工程师和数学家从政的时候，他总能回去干自己的本行。我的事业是外交，但我不可能重操旧业。因此，对于职业外交官来说，当上外交部长，这不是仕途的顶峰，而是灾难。”

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关上了录音机，安德烈·科济列夫似乎完全松弛下来，瞬间不是部长了。我觉得他更加可爱，更具有人情味。我怜悯地看到，他哪里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人。

我对部长讲述道，当我准备例行的电视转播的时候，我查看了老的录像记录片。当他刚走进政府大楼的时候，作为新上任的部长看上去是个善良、乐观，但明显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为“铁石心肠的毛烘烘的小熊”。过了没有几年，部长再也不像小熊了。

“陡山累死瘦马，已经没有精力了，”部长忧郁地说。“有谁能

够知道，一切会这样变化。”

他指的多半不只是自己的命运。

1995年12月17日，科济列夫在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在摩尔曼斯克获胜，取得了代表资格。代表不能当部长。如果他要保留自己的职位的话，应当放弃代表资格。科济列夫等到了最后的期限：总统是否暗示，他应当留在政府？这个暗示他没有等到，于是发表了转入国家杜马的声明。

总统的更替、政府首脑和部长的更替，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民主社会即使是最好的部长们，经过一定的期限也要离职。好让别人在这个舞台上显一下身手。退职在原则上是正常的事。但我们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长大的，在这里离职意味着政治上的死亡、被遗忘、耻辱和贫困。因此，我国的任何一位国家官员总是像害怕火一样害怕离职。因此安德烈·葛罗米柯几乎当了30年的外交部长。

时代变了。我懂得，科济列夫放弃心爱的事业是多么困难，但他应当知道，这事是早晚要发生的。他可能会安慰自己说，总统是不会同这样忠于职守的人分手的。但是鲍里斯·叶利钦大概会像任何一位政治家一样，会很容易地同他所不再需要的人分手。遗憾的只是，近来发生的事件把科济列夫所做的一切一笔勾销。多年来他一直是新俄罗斯的脸面，而且这是一张充满微笑好看的脸。

在“收容所”里服务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于1951年3月27日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其父在比利时的苏联商务代表处工作。小科济列夫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被录用到外交部工作。他与后来当上外交部副部长的基干外交官的女儿结了婚。这次婚姻时间不长。如果说，科济列夫需要庇护和扶持的话，那也只是在很早的阶段。那时，上司对他不器重。

他来到了外交部的国际组织司，这个司主管联合国、裁军、各种国际会议。司里的工作给他形成一种概念，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必须同美国伙伴、西方伙伴建立紧密的合作。他碰上了一位好上司。葛罗米柯委托喜欢提拔年轻人的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彼得罗夫斯基领导这个司。谢瓦尔德纳泽任命彼得罗夫斯基为自己的副手。

我认识科济列夫是在 1989 年夏天。外交部副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在外交部别墅设宴欢迎联合国副秘书长亚苏西·阿卡西。我想同他谈一谈。在外交部别墅设宴是墨守成规的苏联外交活动，邀请外交部的几名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代表"作陪。彼得罗夫斯基以他特有的客气向我介绍出席宴会的人：这是国际组织司（后改称为局）的一些领导人。在场的人中，科济列夫年龄最小，职位最低。而彼得罗夫斯基却是特别介绍了他，暗示这个人有远大的前程。

科济列夫表现得自然沉着，说话声音很低，他相信，人们能听到他的话。年轻的科济列夫在改革年代曾因"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而遭到大骂，当时他建议重新考虑以前的苏联外交政策方针。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支持了年轻的外交官。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很快就当上了他所在的司的领导人。从这个职务一下子当上了部长。在那个时候，这看起来不算是提升。

1990 年夏季，开始组建第一届叶利钦政府，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机构中列有无足轻重的外交部。如果说，挑选其他部长是政府首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本人要做的事，那么挑选担任主要外交官职务的适合人选的工作要请领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卢金来做。

科济列夫怀疑，卢金是在寻找不是有独立政治见解的、在必要时可以挤走的职业外交官。卢金本人驳斥了这种推测。而且，还有其他人选，如阿纳托利·阿达米申，他从谢瓦尔德纳泽的副手卸任后满意地到意大利当大使去了。他被从罗马召回来，同叶利钦谈了

话。他在莫斯科呆了几天。但叶利钦选中了科济列夫。

1990 年 10 月 11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轻而易举地批准了代表们不知晓的科济列夫为共和国外交部长。事后，代表们后悔起来，本来可以投票反对他。

部长才 39 岁。他的任职几乎不被觉察。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自己回忆说，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在一家饭店庆祝了他的任职。翌晨，他从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车库里要了一辆车直奔自己的工作地点。他替代了前部长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时同维诺格拉多夫有过一次争论。

维诺格拉多夫对我的一篇关于死胡同的文章做出了反应。这篇文章说，同日本的关系由于领土问题陷入了僵局。我写道，如果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两国关系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人认为，斯大林于 1945 年侵占了他们的部分领土。赫鲁晓夫在 1956 年允诺给予改正，但岛屿依然是苏联的。

维诺格拉多夫部长坚持葛罗米柯以前的立场："岛屿"问题不重要，因为这个问题只是日本人臆想出来的，最为重要的只是"尽量扩大"接触，到那时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我逐条分析了维诺格拉多夫没有说服力的论据，很不客气地补充说："现在正在组织未来的俄罗斯内阁。俄罗斯外交部长是现实的人物。希望在这个位子上看到的不是对以前的'尽量改善和扩大'这一神秘提法的心地善良的崇拜者，而应是新式政治家。那些帮助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上，其中包括同日本的关系上向前推进的人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我的预测没有错，尽管那几天大概只有我一个人高度评价这个部长职务的意义，而科济列夫本人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他……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坐落在和平大街上一座不大的独立的楼房里。部里的工作人员不多，比科济列夫领导的联盟外交部国际组织局多 10 个人。共和国外交部被看作是官运不好的外交官的"收容

所”。这个部负责办理签证和接待二等外国代表团。科济列夫甚至懒得为他的这个叫起来好听的职务说上几句赞赏话。在联盟部等着他的是不错的差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可能当上副部长，有可能到一个好的国家当大使。而在这个“收容所”则有可能石沉大海。积极性差一些的人还真就有了这样的结局。

新的俄罗斯领导对外交政策不关心，他那里摆满了其他的操心事和问题。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可能只是在签发了科济列夫的任命状之后才知道，他还有个外交部。科济列夫甚至打不通给俄罗斯政府首脑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的电话。他没有资格安装直拨电话，而“第二部专线电话”（政府的市内自动电话局）的话筒是由西拉耶夫接待室的秘书拿起来听的。他客气地回答说，部长会议主席忙得不可开交，并答应报告打电话的事。

但科济列夫表现出了他的坚强性格和主动精神。当他为叶利钦的出访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他成了叶利钦有用和必需的人，因为叶利钦出访的组织工作做得太马虎了。除此而外，他还对西方当时存在的“戈尔巴乔夫狂”进行了斗争，西方认为，他们在莫斯科只能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科济列夫证明说，西方该是同叶利钦打交道的时候了。

1991 年 4 月，叶利钦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参加欧洲议会会议。出访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那边对他的接待也不好。科济列夫回忆说：“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来到我这里，介绍了访问细节，而主要是谈法国方面由谁来安排这次访问，当说道显然是由一些二流企业家和政治家来安排的时候，我简直是火冒三丈”。

科济列夫给叶利钦写了一封十分冲动的信，并对出访的准备工作绕开外交部而且准备得完全不内行表示了困惑。部长建议推迟访问，因为不用说，一定会出现一系列重大的组织工作的漏洞和政治上的不愉快。但总统还是去了。不祥的预言被证实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议会会议，对叶利钦的接待不好，称他为“恶意的煽动者”，指责他老是干扰戈尔巴乔夫。

在这次访问之前，部长同叶利钦的交往是通过书信进行的。在不成功的访问之后，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接见了他并说：

“下一次访问由您按您认为必要的方式进行准备。”

科济列夫认为，叶利钦需要对美国进行圆满的访问——要建立最高级联系。但叶利钦正准备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他周围的人认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竞选活动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本人怀疑，有无必要这么做，要是突然选不上呢？他问科济列夫：

“您在大选之前为我的出访做准备，这有多大的合理性？如果我在选举中失败了，将如何呢？

科济列夫坚定地回答：

“我对您的胜利没有怀疑。”

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去了美国。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成功出访。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接见了他，并十分尊重地同他进行了谈话。

1991 年 8 月政变时，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飞到了法国，动员世界舆论支持俄罗斯政府。因为政变很快失败，他的努力就用不上了。政变之后，莫斯科出现了两个政权的局面。俄罗斯领导人不喜欢联盟机关继续像以前那样企图控制国家，而以鲍里斯·潘金为首的苏联外交部仍以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名义进行活动。

科济列夫建议把主要工作转交给俄罗斯外交部，加强其他加盟共和国外交部门，把协调职能留给联盟外交部。这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引起了争吵。那时的科济列夫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私，由于疏忽，对联盟外交部的领导人说，他不会抱着自己的位子不放，潘金本人可以占据他的位子，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这事传到叶利钦那里，说科济列夫不重视自己的工作，希望离开部长的职位，他把这一职位让给各种人，而他自己想得到在国外的职务。那时，这种行为被视为叛徒和逃兵。这是科济列夫在机关生活中的一个沉痛教训。但幸运的是，部长已经博得总统的喜欢。

“没关系，您留下来吧”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90%的被询问者赞成乌克兰独立。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乌克兰独立。讨厌服从莫斯科的利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总统。他想成为独立国家的元首。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写道，12月2日晚上，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通了电话：“叶利钦曾去过某个什么地方。已经喝醉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劝说他俩会见，要是3个人会见，就加上克拉夫丘克，要是4个人，加上纳扎尔巴耶夫。那一位醉醺醺地不同意说：

‘不管怎么样也不会有结果，乌克兰是独立的国家。’

‘而你，俄罗斯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反驳说。

‘我是什么！我是俄罗斯，我们能行。同联盟在一起，什么也干不成……要回到4方联盟的思想：俄罗斯加乌克兰加白俄罗斯加哈萨克斯坦？’

‘那我的位子在哪里？如果是这样，我就辞职。我不在冰窟窿里闲呆了。我不是为了自己。但请你明白：没有联盟那么必定要失败的，那么要毁坏所有的改革。’

‘哪能没有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叶利钦醉醺醺地‘劝说’着。

‘如果没有联盟，那我的位子在哪里？’

‘没有关系，您留下来吧，’叶利钦发慈心地答应下来……”

叶利钦告诉戈尔巴乔夫说，他要去明斯克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谈一谈，就顺便也同克拉夫丘克谈谈，了解一下他对苏联未来的想法。在动身出发之前，叶利钦对记者们说：“必须尽一切努力说服乌克兰人加入联盟条约。”是的，

他做了一个那天没有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补充说明："如果这一点达不到的话，那就必须考虑其他方案"。

叶利钦带上科济列夫去了别洛韦日森林。

我问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

"在别洛韦日森林发生的事情，是临时动议，还是事先就有准备？"

"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明显，苏联作为统一的国家是保留不下来了。9月还有各种可能能够保留住它。10月的时候，还有一个可能能够保留住它。但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可能性就失掉了。我不认为谁的皮包里有后来实现的准备就绪的现成方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方案。有好多具体方案，后来把它们合成了一个方案。但就在那天早晨，谁也不知道，事情竟搞成这样，结局竟是这样。对于我来说，有一个问题：这会不会是南斯拉夫方案的翻版？要知道，这样的联邦国家就是在我们的旁边垮掉的，但它垮在了血泊中。避免悲剧事件的重演是主要任务。南斯拉夫情景使得我日夜不得安宁。我们站到了悬崖的边上……"

科济列夫回忆说，白俄罗斯比其他人更想保留住联盟。但是就是在这里也有明显地有利于独立和完整的主权的情绪。从明斯克把俄罗斯代表团送到了别洛韦日森林。叶利钦到了那里已是晚上。克拉夫丘克来的早，打猎去了。他尽可能地溜边。

别洛韦日森林的不眠之夜

当3位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次见面将以什么告终。但大家都显得如此轻松。当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克拉夫丘克说乌克兰将不签署联盟条约。如果他签的话，那么叶利钦可能也会签的。

"克拉夫丘克来的时候十分紧张，"安德烈·科济列夫回忆道，

“他预料，叶利钦可能要进行威胁，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要求他服从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三方谈判的想法本身就要破产，那么事情就要以莫斯科和基辅断绝关系而告终……在这之后，在混乱中解体的联盟就会遭受痛苦，相互的不信任，甚至可能是相互的仇恨就会增长。

“我们带来了民主共和国共同体或者民主共和国联盟的方案……乌克兰像白俄罗斯一样，长时间没有透露自己的想法。”

俄罗斯代表团来到别洛韦日森林已是下午，立即坐下来吃晚饭。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开始了谈话，谈到不管以后事情怎样发展，三个斯拉夫共和国都要站在一起……

乌克兰的代表从侧厅里出来走近盖达尔、沙赫赖和科济列夫，问道：小伙子们，你们带什么来了？如果你们打算施加有利于联盟的压力，那克拉夫丘克就走，因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要求独立。聪明的办法是走把独立国家联合起来的道路，但不能服从统一的中央。

叶利钦建议委托专家们通宵研究这类兄弟国家联盟的思想。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法律政策顾问的盖达尔、科济列夫和谢尔盖·沙赫赖单独去了为俄罗斯代表团准备独立小楼，开始研究可能的协定方案的主要内容。那天夜里，他们应当回答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没有其他共和国的参与，三个加盟共和国如何签订条约？

谢尔盖·沙赫赖找到了出路。安德烈·科济列夫回忆说：“下述方案是由他提出来的。苏联是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联邦等四个独立国家在1918—1921年期间建立起来的。由于高加索联邦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三个主体是很久以前组建联盟的主体，它们的自决权原样不动地保留在各类联邦条约和苏联宪法中。

“因此，从法律观点说，集合在别洛韦日森林的是组成称作苏联的联盟的三个全权主体的享有全权的领导人。因此他们有权通过决定来解除把它们至今仍然联系在一起的锁链。”

沙赫赖的思想是盖达尔和科济列夫所没有预料到的，他们如获至宝。白俄罗斯人同意俄罗斯代表团的意见。制订方案的时候，乌克兰人却在新鲜的空气里散步。当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坐到了桌子旁边。

清早，文件草案交给了各位总统和总理。总统们喜欢“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个提法。他们非常珍重“独立”这个词，尽管它在这个文件中没有什么意义。

12月8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明斯克（别洛韦日）协定，其中说，“苏联正在停止自己的存在”。戈尔巴乔夫没有国家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里在文件上签字以后，他的情况如何？”

“签字以后，都讲了话，像往常一样，喝了香槟酒，”安德烈·科济列夫叙述说。“他们说，联盟没有保存下来，但主要的是我们留在了一起。有一个荒谬的说法，似乎是给美国总统布什打了电话，询问能不能这样做。实际上是后来才将所发生的事情向布什通报的。这个电话是必须打的。作为行家的我那时就提了这个建议，现在我还是认为这是正确的。即使是由于我们关系中的核参数，我们也必须相互通报类似的形势。这是政治上负责任的表现，让人们放心，核按钮处在控制之下。”

“戈尔巴乔夫生气了，因为没有先给他打电话。”

“他白生气。首先曾试图同他进行联系，但没有联系上。绝对是这么回事。”

战争与和平之间

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天，安德烈·科济列夫醒来时，成了大国的外交部长，但这个国家还没有外交政策。而且谁都绝对不知道，这

个政策应当是个什么样子。他本人为自己规定了任务：在短期内为国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给他翻出来斯托雷平[①]的几句话，他很感兴趣："国家将拥有健康、牢固的根基，请相信，俄国政府的话在欧洲和整个世界面前将完全是另一种声音。"

尚且不清楚的是如何建立同西方的关系：争吵还是友好？如何同乌克兰交往：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还是不承认？

"我们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忙得浑身是汗，"科济列夫回忆说。"我记得，那几天这里简直成了疯人院。大家都拿着文件急急忙忙地走来走去，急着解决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相互之间见面只能打个招呼。我跑到叶利钦那里说：这里有一件事，那里有一件事，立即需要您的决定。"

"我也有自己的难题——如何摆好同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任何人对他们都一无所知。除了苏联的统计数字以外，什么都没有。请不到一位能够知晓现代乌兹别克斯坦是个什么样子的专家。而在这时塔吉克斯坦爆发了国内战争……

"那时我还担当着我们如何保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位子的工作。我深知，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特权，这是特殊的责任。但如何才能证明，只有俄罗斯而不是所有的 15 个共和国都有权占据这个位子。当时有一个理论说，这要在所有共和国之间来划分。这不是平均的划分。不可能 15 个人来坐一把椅子。接受这个理论将导致失掉在安全理事会的位子。

"我深信，只能与那些已经得到民主、自由和财富的国家结成联盟，我们才能摆脱自己的问题，而这些东西也正是我们想得到的。从逻辑上说正是需要同这些国家紧密合作。"

安德烈·科济列夫坚持同以前参加苏联的 14 个国家平等关系的原则。他重申：只要你同他们用强力的语言谈话，表现出高傲，

---

①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 年），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 年起任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译注

那么14个邻国转眼就会成为14个敌国。按科济列夫的意见，对外政策思维必须有一个变革。上百年形成的提法是：对国家有利，对它的公民就有利。而实际上，一切正好相反。

科尔扎科夫将军是联系人

安德烈·科济列夫成为俄罗斯多年来能够独立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戈尔巴乔夫不允许它的外交部长这么做。叶利钦在头几年很少管国际事务，把全权交给了科济列夫。

整个世界都凝视着这位新人物。部长说话声音低，嗓门不大，说话总是心平气和。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位年轻人是全优生，有前途的外交官，他与世无争，喜欢妥协，而实际上，他性格刚强，而且他能够并善于变得强硬。

他到过战争地区——波斯尼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富汗，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了他个人的勇敢。他没有那种机关官员所特有的书呆子的胆怯，没有在关键时刻不敢说个“不”字。他只对一个人——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不说“不”字。

起初，总统为科济列夫派了名叫费奥多尔·舍洛夫－科韦佳耶夫的作政治委员，他是俄罗斯联邦国际关系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成了第一副部长，主管同原苏联共和国的关系。但不久叶利钦便确信，他的部长是可以信赖的。

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之间确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

“我是相信第一印象的人，”科济列夫对我说，“这个印象没有欺骗我。在我第一次同叶利钦进行详细谈话时，我看到了他是自我克制的人，有时较为顺利，有时较为不顺利。我看到了他是旧时代的人，但力争进入新生活并带着我们一起走。他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向前走，走改革之路。我懂得，对这个人必须进行大量的解释，而且要用他所明白的语言。但我要解释某些东西的努力取决于

他的状况。当他处于高度的改革情绪的时候，你稍一暗示，他就明白。在钟摆往回摆的时候，那就复杂得多了。”

“他对世界的看法，对世界的认识如何？”

“他这个人有一定的习惯，具有党的官员的一定的陈规旧习，由于处于呆板权力之下而信息不通。他是整个一生都在党和经济机关工作的人。但他同这些进行了斗争。在第一次谈话时，我就确信，试图对他进行过深过细的解释是不合适的。在他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生活经验，明白这一切是困难的。顺便说一句，对于总统来说，这是正常的。琐碎的事情应当由其他人来干。”

叶利钦非常信任自己的部长。在 1993 年危机的日子里，科济列夫是被告知解散最高苏维埃这一大秘密的人之一。叶利钦知道，科济列夫任何时候都会支持他。科济列夫有可能是叶利钦最忠诚的部长之一。他无保留地坚持那些甚至他明显不喜欢的总统决定。安德烈·科济列夫自己甘冒风险做了很多事情。有时这么做是因为必须立即决定，而与总统又联系不上。

“我的桌子上放着近 40 部电话，其中我用两三部，”科济列夫对我叙述说。“其中一部是专门交换台，是非常需要的一部。只要你把想要与之谈话的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就能给你接通，千方百计把你需要的人找到。这非常方便。刚刚离职时我无论如何不能习惯，还要自己拨号，还要记住号码。简直惯坏了……”

如果叶利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事情就简单了——部长有直通电话。如果他不在克里姆林宫，不管他在哪里，专门交换台的接线员都能找到他，如果是在汽车或飞机上，则通过闭路宇航通讯线路进行通话。我国为 30 多位高级官员配备了专门交换台的机器。

“如果他不想同您说话，那专门交换台的姑娘怎么回答您呢？”

“姑娘就说接不通。”

“那您就知道，他现在不愿意同您说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尽量不去知道。我知道接不通，就开始寻找转达信息的其他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几次给萨沙·科尔扎科

夫拨了电话。我同他关系很好，就直接说，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怎么做，但形势这么急，我必须让总统知道。因此，我现在就对你讲发生了什么事。你好好听着，或者做一下记录。有时他做记录，你可以听到他做记录的沙沙声。他这样地位的人应当知道某些人的名字。有一半人分不清卡拉吉奇和姆拉季奇，分不清米洛舍维奇和图吉曼。就是总统也难以记清巴尔干戏剧中的众多人物……于是，萨沙就得记录下，那里出了什么问题。应当说，他事后总要回电话，并转达说：哎，好好干吧。我对此事是按我向总统报告的情况理解的。”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邀请吃晚饭

同叶利钦交往可不简单。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变化无常，常常可判若两个人。任何时候都无法事先确定，你今天要与怎么样的叶利钦会见。

“我对此观察了多年，”安德烈·科济列夫回忆说。“有可能早晨电话铃响了，电话里说话的人讲话很慢，有点困难，给你的印象是他头脑中似乎有一些磨盘在转。而晚上您会遇到一个对一切事情反应敏捷，有说有笑的人。而且，这种变化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发生。

“我们同他一天至少通一次电话。每一次我都试图在第一秒钟判断出我在同怎么样一个人讲话。很多事情取决于这一点：如何做报告？用什么形式做报告？或者说得简单一些，慢慢地、稳重地、一字一句地讲，或者以另一种方式，以有说有笑的方式讲。”

“这与什么有关系？”

“我说不好。”

“这里有什么规律？”

“说不出来。我只是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在电话中谈话时，

懂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在见面时，你立即就能看到他的状况怎样。但在电话里这就复杂多了，你看不见人。要是他打电话，问题简单。根据第一句话，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情绪。要是你打电话，他回答说：是，你好！下面就得讲事情了，但你现在不知道，两个人中你碰上的是哪一个。而很多事情还不取决于这里。如果同你谈话的人情绪不佳，你一开始就劈里啪啦地讲起来，连说带笑，夹杂着组合词，那他什么也听不懂。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同你讲话的那个人精神状态很好，什么都能听明白，那么你一开始就可慢慢地解释，当你阐述的问题还不到一半时，他就全明白了。"

"叶利钦的情绪中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会突然从克里姆林宫消失，几天、一个星期不露面，把事情、国家扔给了助手，这只有一个解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喝多了烈性酒。"

"当着您的面，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喝得多吗？"我问安德列·科济列夫。

"我们这里有一定的宴席交往传统。"前外交部长巧妙地回答。

"这对工作有影响吗？"

"没有什么，我没有看到出格的事，"接下来的仍然是巧妙的回答。"在这种场合，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控制住自己，不侮辱、不压制下属。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对我，对其他人有老爷式的、苏维埃式的蛮横无理。他总是称呼'您'，只有在工作之外，在私人交往的极个别的情况下除外。他总是叫你父名。他从不骂娘。我们这里多半使用技术性语言，而他却受不了。和他一起工作有很多令人愉快的事，笼罩着比苏联时期更多的文化气氛和知识分子气氛。"

"他是不是在工作单位一个样，在非正式场合，在别墅什么地方是完全另外一个样？"

"不是的。他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样。据我所知，叶利钦下班回家，从不停止工作，总是研究政治。除了在打网球的时候，他从来不干别的。就是在网球场上，他还继续谈着白天开始的话题。"

看来，安德烈·科济列夫不管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气质上，都

不会加入鲍里斯·叶利钦亲密朋友的那个狭小圈子里。但总统常常说：

“安德烈是职业行家，是外交官。”

这是缺乏文化的外省人对首都的机灵鬼，对精通外语、经常出国，懂得同外国人如何说话的人表示尊重的用语。总统把部长叫到自己身边。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到他的别墅去。

“他为什么叫您到他的别墅去？您同他是如此不同的人。”

“他认为，他常常交往的那些人，相当于某个政治局，是由最为重要的部长组成的。他同他们应该不但有官方关系，而且还要有朋友关系。于是后来就有了同人交往的习惯。这与其说是心灵的冲动，倒不如说是理智的考虑，这种思考告诉他，同这些人也要有非官方的，同志式的关系。”

叶利钦积极同自己的亲信交往。只要他身体健康，就同他们一起打排球，后来是打网球，一周有四五次。如果他输了，他的情绪自然不会好。他喜欢节日酒宴，常常在列宁山上的单独的小楼里的总统俱乐部举行招待晚宴。

俄罗斯权力上层的生活安排得有些不一般。科济列夫打算晚上下班以后回家，总统给他打来电话：

“怎么样，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今天打网球，在一起吃晚饭，好吗?”

可能是另一种情况。部长已经坐进了汽车，他的警卫员低声问道：

“怎么，是去总统俱乐部吗?”

“为什么去俱乐部?”

“因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在那里，”警卫员带着加重的口气说。

科济列夫放下所有事情，就去了俱乐部。是不好拒绝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总统不想见某个人，那么警卫员是不会向他提醒去俱乐部的。

在叶利钦时期，网球是健康的象征，是新政治上层活跃的象征。打网球的都是总统最亲近的人——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瓦连京·尤马舍夫、维克托·伊柳辛、安德烈·科济列夫……

当叶利钦开始生病时，坐在一起吃饭痛饮的日子就停止了。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利于肝脏的健康。但同时，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失去了同他人的交往，向他多少讲点周围发生的事情的一帮人散伙了。

外交部的换班制

科济列夫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外交部的部长办公室里坐稳了以后，没有进行清洗，仅换了上层的几位副部长。他建立起了非常强大的阵容。后来，几乎他的所有的副部长都去当了大使。

掌管俄罗斯驻外人员的人事工作的谢尔盖·拉夫罗夫，他被任命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阿纳托利·阿达米申是负责独联体内部关系的第一副部长，被派往伦敦当大使。维塔利·丘尔金是外交部部长之下最显赫的人物，由于他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进行的穿梭外交而获得去比利时的任命。亚历山大·帕诺夫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去了东京。谢尔盖·克雷洛夫研究欧洲问题，当了驻德国大使。没有出去的只有伊戈尔·伊万诺夫，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上了部长。

为了升迁，为了争着出国当大使，外交官们经常变换位置，在斯摩棱斯克广场的高耸大楼里从这间办公室换到另一间办公室。副部长的职务高一些，而大使的生活舒适有趣。大多数高级外交官都做出当大使的选择。这当然是在如果不给他们提供部长的位子之后的选择。

在填补大使空缺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其他地方——

外交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干部流失。外交官们，特别是年轻人快速地离开了工资少的地方。1992 年，外交部走了 300 多个人，第二年走得更多。他们走了，去做生意，因为需要钱。部里的主要机关发的工资同外交官们的期望和他们很高的技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俄罗斯的外交官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在举世闻名的高楼里工作。过去，他们同对外经济联系部把这栋大楼给分了。由于大楼的地方不够，负责近东和远东的专家们被安排在邻近的一座大楼里，这个地方曾是著名的“斯摩棱斯克”美食店，因此这栋大楼在外交部通称“美食外交部”。

新建的独联体事务司的工作人员工作的地方绝对令人厌倦，这是老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一座楼，那里有家药店。这座楼在外交官们中间就叫“药店外交部”。

外交官们坐在拥挤的办公室里，过着十分枯燥的生活：阅读各个使馆发来的密码电报，在小吃部排队买饭，编写资料，在专门为他们拨出来的地方吸烟（只允许首长在办公室里吸烟），在首长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大家都立即站立起来，他们期待着到国外出差机会的到来。

外交官是诱人的，令人羡慕的职业。招待会，上流社会隆重的接待，男人穿燕尾服，女人穿夜礼服，拿着绿皮护照到国外出差，不进行海关检查，好东西，汽车，外汇，普通人得不到的满足……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成了另一个样子。还在苏联时期，外交官们感到自己是特权阶层，特权氏族，在他们的生活中展现了旁人得不到东西。过去，他们可以出国挣大钱，外交工作的荣耀满目生辉。但俄罗斯外交官的生活中就没有留下多少特别令人羡慕的地方。外交部的办公室令人震惊的糟糕：天花板摇摇欲坠，房门年久失修，家具破旧不堪。房间不够，外交官们挤得一塌糊涂。学习外语的人被直接安置在走廊里办公。甚至到国外出差也成了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编制缩减了。

贫穷的外交官员们需要给点补贴，于是让他们每3个月一班轮流到驻外使馆出差。出差的人省吃俭用给家人储存点外汇。然后买些东西，回到莫斯科。之后，下一班人再去使馆。人们当然希望成为使馆的长期工作人员，在3个月的时间里进入不了工作状态，但大家都明白，人们都得需要生活。

1990年年初，外交部没有钱用来修缮摇摇欲坠的天花板，没有钱为部长办公室添置新家具，甚至没有钱支付电梯费。我记得，1994年秋季，高高的大楼里有一半电梯因支付不起费用而关掉，俄罗斯的外交官们因而到不了自己的办公室上班。

外交官们不喜欢这种生活。他们顾不得外交官特有的谨慎、沉着，开始诅咒不能给他们支付够用工资和把已失去的优越感返还给他们的当局。外交官的不满有其纯粹的心理原因。还是在谢瓦尔德纳泽时期，他们就被指责为缺乏爱国主义，对西方低三下四。俄罗斯的外交官怎么会落成个不愿意维护国家利益、跟着别人的调子转的缺少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呢？

这种作用是完全不符合俄罗斯的基干外交人员的。他们毕业于杰出的国际关系学院，其亲属关系和可疑观点受过严格检查。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他们是国家强力政权的支持者，是强大国家的支持者。他们又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通晓外语的人。他们在外国工作过，因而他们知道，他们的批评者所不了解和接触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外交部成了充满自由思维和最积极主张改革的部。

但在科济列夫时期，外交官们开始发牢骚了。反对派对部长的仇恨也影响到了整个部。而俄罗斯的外交官大多数都不是部长的志同道合者。

“您对这点考虑过吗？”我问科济列夫。“或者他们在同您谈话时表现出另一个样子？”

“对此我有了解。我们在外交部没有进行过干部革命。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虽然政变之后民主派的弟兄们要求过进行清洗。但

从哪里找懂外语、懂外交工作特殊性的专业干部？我们把主要的专业人员全部保留了下来。苏联外交部的所有副部长都当了大使。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伙人是我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在克里姆林宫，在总统周围有这么一帮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消失了。”

分割蛋糕的时候

使科济列夫最头痛的是，新组成的国家机关一片混乱，一些完全没有料到的人物利用同总统的接近钻进了国际事务，未同任何人商量便签署政令，或就对外政策对科济列夫指手画脚。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外交部的琐事，这涉及对外政策的大政方针。

有些人把同美国友好的愿望看成了科济列夫的罪过，指责他对东方尤其是近东问题不感兴趣。诚然，对此他坚定地回答说，这是无稽之谈，似乎是他只管同美国的关系，而把世界的其他部分丢之脑后。

当然，苏联解体之后，莫斯科对前盟友的政策实际上完全改变了。例如停止了同好斗的伊拉克的友好关系，但莫斯科却恢复了同富有、稳定的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科济列夫认为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他的重大成就。1992年科济列夫提出：让我们忘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让我们不要再做意识形态的兄弟和意识形态的敌人，而我们只是承认有一个伟大的中国和一个伟大的俄罗斯，让我们建设正常的关系，中国人迅速与俄罗斯接近。

科济列夫确实是同西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从俄罗斯民族国家利益观点出发最好的选择。最初，这个观点大家几乎都喜欢。1991—1992 年，我国实际上没有反美情绪，大家都希望同西方建立紧密的合作。之后，出现了失望、疑惑和怀疑：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他们大量允诺，而实际上却很少援

助我们？总起来说，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是引导我们走向衰败的经济方针。

人们指责科济列夫说，由于他的政策，俄罗斯失掉了盟友，失掉了对世界局势产生影响的能力。俄罗斯实际上不再让周围世界感到恐惧，但很多人觉得，正是这一点意味着它失去了大国的地位。

我问科济列夫：

“您的反对者说，西方伙伴实际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而我们也在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愿意为我们付出，如果他们除了援助我们以外还有其他事，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么想，就是没有理解伙伴的实质。如果我同您是伙伴，那您大概不会去想，我比您富得多，我是兰博①，而您是软弱无力的人。而您也不会想，我是软弱无力的人。您所需要的伙伴多多少少是像您自己那样的人。他们不希望我们成为对整个世界发号施令的超级大国。而我们也不希望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您的反对者有这样的论据。当科济列夫显示自己的亲西方方针时，西方在想，这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的人，对他要客气，是这样吗？如果部长说：我还要做考虑，值不值得同您达成协议，那么伙伴就被迫做出让步。”

“当分割蛋糕的时候，必须坐到桌子旁边，尽量为自己多切一小块。如果你站在那里袖手旁观，表面上只是显得姿态很高而已。但任务是吃蛋糕。”

喝热汤

俄罗斯外交部长直接听命于总统，但在部长会议的会议上却坐

① 指美国演员史泰龙在《第一滴血》电影中扮演的越战中勇敢无比神通广大的独行侠约翰·兰搏。——译注

不到前面的位子上。很多副总理和第一副总理的职位都比他高。

在美国政府里没有什么副总理。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长，在政府中实际是总统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是科济列夫的伙伴。他干巴巴的，沉着冷静，在旁观者看来，他就像个远离人世的套中人。高级政治家和外交家谈话时称“你”，是为了在相互谈话时可以当面说一些不愉快的事而不至于把事情弄僵。能同克里斯托菲尔建立这样的个人关系吗？

“同他的交往完全正常，”安德烈·科济列夫说。“有个人关系。我同克里斯托弗一见面就立即称呼‘你’，也就是说相互称呼名字。有意思的是他要你称呼他为克里斯，而不是华伦。因此，他叫我‘亲爱的安德烈’，我叫他‘亲爱的克里斯’。顺便说一句，克里斯托弗是网球迷，尽管他上了年纪，但打得很好。”

克里斯托弗是法学家，多年在法律公司工作。做法律工作要有独特的思维，要结构严谨、非常准确和非常有条理的思维。向左一步，向右一步，对于法学家来说就意味着跑走了。这是积极的方面。他的话非常可靠。他是习惯于对自己的话负责任的人。但另一方面，当必须试图理解美国人的内部动机时，我就感到了某些复杂。克里斯托弗的表现就像法律咨询处的严格的法学家，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以免客户抱怨说：瞧您给我说的，我按您说的话作出了错误的结论，瞧这结果。因此，克里斯托弗认为，最好是说得少一些，但要准确一些。

“我同他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似的，”科济列夫回忆说，“当一切倒塌下来的时候，我当上了部长。当他来的时候，世界的景观已经变了，不知道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动作。他不得不喝热汤，因为没有时间把它吹凉、放凉。有什么就喝什么吧。”

比尔·克林顿在 1992 年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他允诺，除了美国的内部事务以外，任何事情都不做。自然，他必须研究对外政策。克林顿对俄罗斯的路线取决于他个人帮助叶利钦的愿望。不管做什么，主要是为了保住叶利钦。这就保证了俄罗斯享有优惠条

件。譬如，在1995年科济列夫当部长时，俄罗斯和美国签署了秘密协定，允许莫斯科完成尚在1980年答应的对伊朗的武器供应。

出售武器给德黑兰是有利的事，但伊朗被列进了美国列入了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美国在1992年就通过了戈尔—麦基恩法案，该法案规定，制裁任何一个向列入这个名单中的国家提供武器的国家。

俄罗斯政府保证不再签订新的合同，而克林顿答应给予关注，不使俄罗斯因出售武器给伊朗而受制裁，也就是为俄罗斯做出了法律上的例外。

这段历史于2000年秋季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浮出水面，当时，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候选人艾伯特·戈尔（该法案的共同编写者）说，他同俄罗斯做成这笔交易，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对安德烈·科济列夫总是估计不足。他不是强有力的独立人物——过于年轻，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的阵地显得软弱。尽管总统对他一向友好，他也仅只是上层政权的单枪匹马。安全会议秘书尤里·斯科科夫公开不喜欢他。示威性地不把外交部长列入安全会议的首要成员。虽然这个机关是从美国照抄过来的，在美国的安全会议里，国务卿是最为重要的角色。

安全会议在尤里·斯科科夫的领导下试图把外交部给挤出去，并试图制订所有基本的对外政策文件。有时邀请科济列夫参加安全会议的会议，有时不邀请。有时事先给他送交例行会议的文件，有时忘记……

俄罗斯的头号外交官参加了1992年夏季的政治斗争。科济列夫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较量起来。后者跑到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拿起武器要脱离摩尔达维亚，在那里发表了反对摩尔多瓦

领导人的煽动性讲话。科济列夫不得不立即赶到基什尼奥夫和蒂拉斯波尔，在那里反驳了副总统的声明，对《消息报》发表了著名谈话，其中说存在着“战争党”。安德烈·科济列夫声明说，有可能发生新政变，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侦察、军事侦察、反侦察）在向叶利钦总统递送虚假情报以蒙蔽总统。这个声明之所以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强大反响，还在于谁都没有预料到外交部长有这么大的勇气。

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这么做。但在投入政治以后，就不再害怕了。他很快感触到了对大政治的兴趣。在安全会议的会议上，尤里·斯科科夫站起来说，外交部无权发表这样的谈话，这些谈话将会给国家造成损失。鲁茨科伊醉醺醺的，他威胁科济列夫说：

“我不允许您把俄罗斯变成擦地板的拖布!”

科济列夫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说：

“您指的是，我不让您把俄罗斯推进兄弟相互残杀的战争深渊，不让您把南斯拉夫方案强加给我们。”

叶利钦呼吁大家同心协力工作，禁止安全会议成员之间进行公开辩论，并给科济列夫以形式上的处分，但是，似乎他对外交部长攻击副总统和情报部门感到满意。

受过传统外交思想教育的安德烈·科济列夫以后不会忘记重申那句话：他只是执行了总统的意志。在现实中，他则尽力起着独立的政治作用，因为他知道，这将会增加他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倾轧中的分量。

1992 年 12 月 14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参加国外交部长理事会的会议上，科济列夫走出了冒险的一步。他的讲话使在座的部长们大为震惊：

“我要对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进行修改。前苏联的空间，实际上是后帝国空间，俄罗斯在这里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坚持，前苏

联的各个共和国立应即加入到新的联邦或者邦联，对此，将要进行强硬的交谈……”

当科济列夫结束了讲话，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戈尔贝格请他走出大厅谈一谈。惊惶不安的伊戈尔贝格立即问道：

“安德烈，我们能为您本人做什么？”

美国外交官相信，莫斯科已经建立了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因此科济列夫必须阐述他们的新思想。

但科济列夫重新要求发言并解释说，如果反动势力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这将是俄罗斯的政策。他只不过是提醒世人关注，有这样的可能性。

很多人称部长的举动是不能容忍的，是政治把戏。但斯德哥尔摩的这段历史发生在例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在这次大会上从各个方面向叶利钦发起了攻击。科济列夫像往常一样支持总统，向世人描绘了他的政敌的战略意图。

安德烈·科济列夫轻而易举地加入了叶戈尔·盖达尔的“男孩帮”，盖达尔从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领导政府。“男孩们”懂得，在掌握权力的那些人中，他们属于另类，因此尽量抱成一团。在那时，科济列夫经常找叶利钦的左右手、首席顾问和改革的战略家根纳基·布尔布利斯和与总统有个人关系的新闻部部长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商量事情。

经济改革之父叶戈尔·盖达尔和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创造者安德烈·科济列夫对于世界来说，体现了国内所发生的变革。似乎他们不可能离开政府。但以盖达尔为首的“男孩帮”的大部分人被迫逐渐地离政府而去。布尔布利斯和波尔托拉宁也被革职。只有科济列夫留在政府里并取得了总统的信任。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离职以后，科济列夫成了反对派攻击的主要目标，反对派经常要求他辞职。鲁茨科伊、最高苏维埃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很多军人、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们对他展开

了真正的战争。安德烈·科济列夫的主要敌人总是那些认为俄罗斯的危险来自西方、美国和北约的人。对于反对派来说，具有知识分子风度、自由主义观点、高水平思维和教养的科济列夫是不可接受的。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不接受他的路线，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他的路线开始同意对伊拉克进行制裁。这是一条与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反对使自己与世界为敌的路线。极端的反对派认为外交部长是民族利益的叛徒、罪犯，应当把他从政府里赶出去。

政敌们怀疑安德烈·科济列夫是犹太人，尽管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让犹太人在苏联外交部工作过。

安德烈·科济列夫很自信，他在侮辱他的、要求他辞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沉着冷静、面带微笑地发表讲话。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很固执。对他的压力越大，他固执的支撑能力就越强。

胜利与失败同在

在 1993 年 10 月事件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叶利钦与试图把外交部压在身下的安全会议秘书尤里·斯科科夫分了手。而且经过例行改组之后的安全会议，不再是外交部的竞争对手了。

但高兴对于科济列夫来说还为时过早。1993 年 12 月 14 日，国家杜马第一论选举结果出来了。农业党和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多数票，他们占党团票数的 1/3。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党在杜马提出了蛊惑人心和民族主义的口号，获得了胜利，这是选举中轰动一时的主要事件。

事隔几年才明白，日里诺夫斯基这种人不是特别危险。他愿意不无个人打算地同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合作。但当时 59 人组成的俄罗斯民主自由党党团的出现是令人惊愕的事件。日里诺夫斯基的成功，说明反民主的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不能同民主派联合是一个愚蠢的玩笑。那时科济列夫说：

“我对谢廖扎（沙赫赖）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说，小伙子们，为进行总统大选建立自己的党吧，但现在我们要以统一的联盟进行行动……”

没有丝毫成功。科济列夫不同于按党团名单参加杜马选举的同事们，他在单席位选区战胜了对手，当上了代表。是的，他似乎只参加了一次议会的会议，但代表委任状给了他信心。科济列夫以其充沛精力和乐观主义向世界发送了一个信号：莫斯科的政策是总统的政策，而不是杜马的政策。

“总统称职，”科济列夫说，“这是幸福，因为有他在克里姆林宫，这就向我们保证，在大街上不会出现黑衫党。”

但对外政策总是国内政策的继续。正是国内政策决定着，俄罗斯外交官应当说什么。安德烈·科济列夫时刻注意社会舆论和人们思潮的变化，使对外政策适应国内政策。他不得不对国内政策的曲折、对大选结果、对日里诺夫斯基的获胜、对共产党阵地的增强做出反应。前外交部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非常准确地发现了这一点：

“很多人侮辱性地谈到安德烈·科济列夫，把他担任部长期间的发生一切都推到他身上。是的，他缺少经验，缺少外交阅历。但是他能以最快的速度从一个失火地区奔向另一个失火地区，而且地面上时时冒着烟。他的最大困难在于他受到国内政治勾心斗角的破坏力极大的掣肘……”

科济列夫部长一方面要同自己的反对者进行厮杀，又要目不转睛盯着克里姆林宫的内政游戏，对政治斗争过分地投入。他开始思考如何同自己的政治对手继续玩下去，打掉他们手中的“亲美”、“亲西方”的指控。而在这精心设计的游戏中，很快感到力不从心，经受不住打击，坚守不住自己的阵地。可是部长还要从其反对者的浩瀚辞海里借用部分词汇试图在“可以接受”的民族主义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之间划分本来就不存在的界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

已经弄得连以前支持他的人也反对自己。

科济列夫心平气和地经受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老生常谈的批评。但对来自民主派和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却感到了莫大委屈。看来他认为，对他应当这样理解：他改变的是词汇而不是政策。在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民族主义党获得胜利的选举之后，科济列夫开始对有大量俄罗斯居民居留在的前苏联共和国制订新的更为强硬的路线。

俄罗斯居民的问题，是莫斯科外交最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把叶利钦政府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反对派正是在这个叶利钦绝输无赢的方面攻击叶利钦：遗留在俄罗斯外的俄罗斯人是由于您才受罪。但指责叶利钦—科济列夫的政策忽视了俄罗斯居民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们碰到的这个问题，正如历史证明的，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的。

单纯的外交活动、谈判、联合国的决议、向国际组织、向人权问题的两位最高专员（欧安会欧洲专员和联合国专委员）呼吁，都不能根本扭转局势。因为真正能给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人以安慰、把他们丢失了的精神上的安逸还给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恢复苏联。其他办法不能给所有在国外的俄罗斯人带来所期望的轻松。即使是俄罗斯外交官最勇敢的行动能够成功的话，譬如说争取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政府做出让步，也不会改变那里的气氛，因为在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人被认为是异种人，最好的情况不过是同意容忍他们。

“早期的”和“后来的”科济列夫

科济列夫政策的演变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变化和执政上层的重大变革，在这里，被称为强国论者的拥护者的人替代了百分之百的真正的民主派。他们向科济列夫提出了严厉的责难：俄罗斯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丢掉了盟友，失掉了影响世界局势的能力。

在国内，以前的思维方式重新占了上风——对周围世界采取敌视态度，本能地试图以核导弹网与世界隔绝，寻找国内外敌人。这是对抗中反映出来的自卑综合症的产物。为了赢得人家的尊重，你就得与全世界为敌，对每一种理由都说“不”。

科济列夫在国内寻找支持，但没有找到。国家发生了急剧转变，而他体现的是执政上层已经放弃了的政策。结果出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摇摆不定的感觉，它就像那疯疯癫癫的小姐。莫斯科时而同意签署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时而拒绝。时而向美国人发出威胁，时而同他们拥抱。时而说，我们的士兵在波斯尼亚不会接受北约人的领导，时而又变卦。

新路线要把科济列夫本人引向何处呢？他的强大的反对者不会同他和解。他们在方针路线的改变中看到的多半是退却，顶不住打击。科济列夫新的强硬政策为他在对美国人和西欧人的关系上制造了难题。他们认为，外交官不应当进行威胁，而应当关起门来进行谈判，尽量说服伙伴承认自己正确并寻求折中方案。

我写了“早期的科济列夫”和“后来的科济列夫”两篇文章，发表在《消息报》上，90 年代中期我在那里工作过。这两个时期的科济列夫共同点越来越少。早期的科济列夫是笑容可掬的亲西方的外交部长。后来的科济列夫是给西方带来意想不到的不愉快事情的不带笑容的外交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认为，他过去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顺便说一句，他抱怨我在《消息报》上发表批评文章。

别人对他的评价更多。在科济列夫为车臣的军事行动，包括对城市的地毯式轰炸进行辩护之后，美国记者都称安德烈·科济列夫是安德烈·葛罗米柯精神的再现。按美国记者的看法，两个安德烈的区别在于，葛罗米柯把克里姆林宫的行动解释为国际主义，而科济列夫则辩解为俄罗斯的民族利益……

当然，一方面，只有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是没有变化的。另一方面，人们把政策的 180 度的转弯称之为方针路线的转变。部长

确实失掉了那些总是支持他的人对他的喜爱。科济列夫落得个孤家寡人。于是，叶利钦总统考虑他应当牺牲外交部长的时刻到来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批评他。

响亮的男人吻

据知情人说，总统喜欢简单明了的报告，做这类报告的能手是国防部长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我们一定这么做，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用长篇大论的解释，说明在外交政策中什么事情为什么能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能做，看来，听起来枯燥无味。

雄壮威武的男子按苏联人的习惯，见面时走上前去接吻、拥抱，在这样的人中间斯文的安德烈·科济列夫就显得不合群。而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或者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维尔·博罗金是自己人。他们同叶利钦谈话用的是叶利钦听得懂的语言，不反对，不争论，时不时夹杂一些笑话。而科济列夫则一开始就无聊地解释，为什么这一点如何，为什么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做。这些东西就是头脑清醒的人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弄明白……

"有时产生一种感觉，您独立行动，没有让总统知道，他因此而不快。"

"当我有事情找他时，他有时可能说，什么事，您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用一些小事打扰我？尽管他和我都知道，我应当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从不就完全属于我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给他打电话。他的反应表明，他希望自己的行动自由一些，以便事后事情发展不利时可以说，您看，我信任您，而您却犯了错误。这是他的权利。而我必须打电话向他报告。而他希望行动自由，这是他的权利。

"有没有这种情况：您同叶利钦就某个问题已经商量好。当您

回到部里时候，他已改变了主意，或者被别人说服了，改变了想法?”

“没有。他对已经做出的决定，是坚持一贯的。他是可靠的人。但有时别人把没有准备好的文件塞给他，后来这些人奇怪起来：为什么文件没有生效？这种情况是另一回事。因为马上来了其他的人报告说文件错误。我在收到签过字的命令时，我曾碰到过上千次这种情况。但我明白，这是由于总统对整个情况不清楚，没有向他报告。某些人塞给他的是对自己有利的文件，是悄悄塞给他的。这是冒险。这正像来得容易的钱：既可以挣得来，也可能把所有的钱都丢掉。”

如果你解释自己的建议，证明它正确，那么他一定支持你。他为人正派。他不会忘记做出的决定，并同你一起对决定承担责任。我没有想他会背叛我：我们两人做出了决定，而后由你一个人来收拾烂摊子。

另外一件事是：他希望批评的火力都打到你身上。我对此从不反对，并常常向他暗示这种方式：让对这种决定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所有批评都冲着我来吧。不应当让总统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遭到批评。到那时可以假装决定是没有经过总统做出的。发生过这种情况，人们说，外交部或者科济列夫做出的决定，总统连知道都不知道。对此，我们没有反驳。

在老虎笼子里

了解叶利钦的人发现，他具有一个很强的品质：善于听。那些善于让人信服地说话的人从总统那里得到的东西要比给总统提供最准确、最合理的书面分析的人所得到的要多。叶利钦不愿意读而愿意听。但正如大家知道的，这是他的缺点，也是我们优点的继续。那些能够骗取总统信任、能够学会说服总统的人，则利用自己的本

事为自己谋取好处。当叶利钦听取了这些人的建议之后，那就导致悲惨的后果。人们的如下说法不是偶然的：叶利钦的主意是最后一个来访者的意见。

“是的，您知道，那个时候是临时现做决定，没有时间去做分析。”安德烈·科济列夫反驳说。“历史没有给你时间去进行长时间思考。常常是，有人来到总统那里，带来的不是思想，而是最近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新闻。这能改变局势，可信吗？如果房子着了火，应当把东西搬出来。而早晨来的人，不可能知道房子将要着火。因此建议进行大修。决定改变了，而局势也在改变。因此，为此而责备他就不太正当。”

“人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向总统报告？又必须说服他相信显而易见的道理？”

“我感觉到，谈话将不会简单。我总是在考虑，如何组织论据，怎样使问题简单明了，如何才能明白易懂地进行表达，怎样找到合乎他心意的转变。有些同事说，他们到他那里去，就像走向笼子里的老虎，心里忐忑不安：老虎会不会向你扑来？我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即使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出现分歧时，也没有这种感觉。是的，我们有多年来非官方关系的交往。我们即使是在政治上有分歧，我们的关系最终还是友好的。同他在一起工作时间少的人可能会复杂一些。”

“能够说服他吗？”

“可以争论。但最好不要公开争论。在会议上不要非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可。不要让总统起初说的是一种看法，而后承认道，好，科济列夫想得完全正确，而我错了。但是，可以同他争论。我同他争论了一共 5 年。另一件事是，1995 年我们的争论陷入了僵局，他开始倾向普里马科夫的观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科济列夫多次抱怨说，情报部门给总统报告假情报。在 1991—1992 年的短暂停顿之后，他们又开始将周围世界描绘成俄罗斯的敌对世界。

“他们劝说总统，如果我们持强硬立场，那么北约就会全部垮台，”科济列夫叙述道。“这是幻想！有一个信息来源肯定地说：如果克瓦涅夫斯基在波兰总统选举中能够获胜，那么波兰就根本不想参加北约。好闹事的领头人莱赫·瓦文萨将下台，而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了解他，某些人甚至暗示地说，尽管所有这些还没有得到证实。”

科济列夫本人也了解克瓦希涅夫斯基，并重申说，波兰不会放弃参加北约。结果就是这样：克瓦希涅夫斯基立即说，他将争取参加北大西洋集团，而且越快越好。

指望东欧不再争取加入北约的打算让我国做出了巨大付出。谁为这些假情报负责？谁为他们得到了某种特殊情报的暗示负责？根本没有人负责。断言这种说法的人，现在还向上送情报，并附加各式各样的暗示，这是些都没有经过验证的情报，而主要的，是对后果不负任何责任的情报。

周围都是敌人

总统得到的情报歪曲地描述了周围世界。向总统灌输的是，存在着反对俄罗斯的阴谋，国家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

“克里姆林宫有一段时间，在总统周围的是一伙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科济列夫说。“但这伙人渐渐消失了。来了一些只有总统自己知道的按其他标准任命的人。这些人用怀疑的态度看待周围世界。他们看不到外国伙伴代表着另一种文明、另一种文化和传统。”

譬如说，在同外国总统吃饭时一般是只举一次杯致辞。我们的人充满了良好的感情，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举杯，就像工会举行的酒会。他们看到，外国人惊奇地望着他们，不是平等的与他们对着喝。产生了疏远。我们的人抱怨：瞧不起我们！他们不愿意像常人那样对待我们！这就是说，他们是敌人。

在抓到了总统的不了解实情和怨恨之后，反西方文件、反美文件开始从各个方面一件接一件地送来。在克里姆林宫里有人靠此来升官。当反对北约东扩的斗争开始的时候，多少人在为此兴高采烈！

在科济列夫辞职之后，尚为政府总理的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直接对前部长提出了责难，说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北约才逐步接近俄罗斯边境。

“您承认自己有错吗?”我问科济列夫。

“是的，我感到自己有错。在我还当部长的时候，我没有利用所有机会像对总统那样对政府首脑解释某些简单的事情，而主要的是没有向俄罗斯社会进行解释。不管我们对北约喜欢不喜欢，北约都要扩大。让我惊奇的是，对于我们的总理来说，这竟成了新闻。北约的决定说，集团的扩大是必须的，这个决定是早在1992—1993年做出的。奇怪的是这件事没有人向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报告。要想给以对抗，这就意味着开始第二次‘冷战’。但是，这也不能制止他们。我也挺奇怪，没有人向总理报告说，北约本身也在变化。”

“北约在哪些方面发生变化?”

“首先，它的参加国在缩减武装、减少军事预算。他们的主要变化就是与俄罗斯合作。当他们与我们进行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我们要求北约进行变革，但几年来我们自己却拒绝同他们进行有关这些变革的谈判。要不然，我们早就签署了条约、高枕无忧了。问题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有人说，只是莫斯科的强硬立场才迫使北约同意谈判。”

“应当明确地说，不是北约拒绝，也不是我们用什么秘密手段破坏它，迫使他们同意谈判，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坐到谈判桌旁。我国需要投资，需要克服对我国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的歧视性壁垒。这就是我们需要同西方进行斗争的地方，我们的实际利益所在。而这一切被北约扩大的议论推到了旁边。在苏联时期，也是这么做的：

国内经济状况越复杂，同北约的斗争就越激烈。

“我们对北约惯常的不满是：你们不同我们协商。如果我们自己不建立这个协商机制，不创造信任环境，人家怎么同我们协商。如果我们希望北约知道我们的观点、考虑我们的观点，那我们应当在同样程度上考虑北约集团的立场。我们的任务是学会同北约搞好伙伴关系，深入北约，从内部影响它的决策程序。用不着偷他们的文件，那是情报机构的事。争取在这些文件中反映我们的观点。

“我早就进行过试探：我们可不可以参加北约的政治决策？譬如，按法国模式，法国参加北约，但不参加它的军事组织。如果我们参加了政治决策，那么我们还能害怕北约吗？让新成员加入进来，我们就在那里坐在桌旁通过最为重要的政治决策。所有其他的甚至军事的措施，都只是执行政治意志。”

“是什么东西妨碍您把事情进行到底？”

“和我协作的同事给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信，说科济列夫打算同北约进行什么条约谈判。我们需要条约吗？我们需要同北约厉害起来，那他们就该害怕了，就不再扩大了，要不然就全部垮台……”

“北约这个军事组织什么时候能对俄罗斯构成危险？”

“在原则上，俄罗斯和北约两大军事机器当然能够相互构成危险。由于克服了莫斯科的各式各样的干扰，我们于 1994 年 6 月同北约签署了“和平伙伴关系”的庞大计划和特殊备忘录。该备忘录赋予俄罗斯的权利比该计划赋予其他参加者的更为广泛，并承认我国的崇高地位。但这个计划没有实施。这又是因为我们的过错。”

“我们的军人错过了北约司令部举办的包括核问题在内的研讨班、会晤和会议。这是除了同北约司令部的军官们和将军们例行的会见以外，能使我们相信北约根本没有准备反对我们的惟一办法。为什么不进行联合演习？而这也可以克服对抗和消除两大军事机器对抗的危险。”

“北约扩大，这是不可避免的进程吗？”

“华沙条约是在已被人民推翻的那些政府建立起来的。这些政府倒台了，华沙条约也同这些政府一起崩溃了。而北大西洋同盟是民主政府建立的。当然北约存在的一个目标已经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苏联再也不存在了，共产主义威胁再也没有了。但他们手中仍然留下了军事合作的常规机制。他们用不着放弃这一有用的工具。”

“为什么需要北约？”

“世界充满了危险。顺便说一句，我们的危险根本不是来自西方。请您看一看，近几年俄罗斯士兵在哪里流血：这些对抗区域在独联体国家内部，塔吉克—阿富汗边界、车臣。要知道，这里的事与北约完全无关。为什么我们在没有危险的地方，完全是文明国家的地方看到了危险呢？”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您不认为北约扩大是危险，这是因为您亲西方？”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生活得像西方一样。我不希望生活得像东方。您把西方和东方的生活水平做一个比较。我指的不是日本。按我们的看法，它也是西方。问一问正常的家庭主妇，她希望到哪里买东西？到西方的超市还是到我们的集体农庄市场？还是到东方的自由市场？那里可以买到东西，但完全不是那种质量。我希望，我们的家庭主妇到西方市场购买东西，希望我们的生活水平能像他们一样。”

移交事业

他在外交政策的争论中失败的时刻到来了。叶利钦决定，该摆脱科济列夫了，因为他总是挨批评。科济列夫已用不着了，1996年年初，他写了辞职书。1月10日，在部务会议上，叶利钦向外交官们介绍新部长——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这么容易地就同他最亲近的人们分手，给人造

成一种感觉，似乎他完全没有常人的感情。

“在他那里，个人的眷恋不会控制他所理解的政治上的合理性，”科济列夫认为。“为此可以批评他，但这一级的政治家应当放在第一位的不是个人关系，而是事业。我则可以说：我们在一起艰苦共事5年多，而他突然把我抛弃了……但是，我明白，他只能遵循政治利益，绝不能因他把政治意图置于个人关系之上而批评他。叶利钦需要战友、盟友和助手，是为了完成一定的目的。目的一旦达到，他就要同这些人分手。”

“当您向普里马科夫交代工作的时候，您讲了什么？”

“我们见了面，交换了意见。我力图向他讲了部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提了一些问题。说好了，如果有什么需要，他随时都可以找我，而我也可以随时找他。这是一次完全正常的谈话。”

“他没有找您吧？”

“他没有找。我同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可以庆幸的是避开了苏联的那种做法，即离任者诽谤其继任者，而继任者也中伤其前任。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这么做。”

“如果那时问您，您看谁来当部长，您会说出谁的名字呢？”

“我不会提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他已经有职务。当我知道总统已经任命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理由充分、合理的选择。”

“您不想说出那些人的名字，是为了不让他们受影响？”

“当然。”

“您见过这些人吗？”

“当然，有很多候选人。”

“有这样的领导人，他们环顾四周说：不行，没有人能够替代我。”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悲剧，人一旦占据了某个位子，就成了不可替代的。这是个不幸，天才如此众多的国家竟然不能产生自己的牛顿和柏拉图。”

令人羡慕的未婚夫

部长们在辞职、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以后，怎么样了？他们辞职以后在做什么？是挣钱？是休息？是写回忆录？还是玩多米诺骨牌？

首先，那些前任部长会被瞬间忘掉。对科济列夫也是这样。他辞职之后的头半年是在杜马办公室和自己的选区里度过的。辞职对科济列夫有好处：他得到了休息，放松了身体，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结了婚。

“在经过5年的部长生活之后，您怎么与日常问题打起交道来了？”

“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这实际上是休克。由你当上部长，到你不再当部长，特别是你当了5年部长，更是这样。我的朋友詹姆斯·贝克安排得很好。当他不当美国国务卿的时候，他说：‘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停在家门口的黄色汽车（出租车），司机问，你要到哪里去’。”

“在美国，一切都会安排的好好的，我们国家就不可能这样。”

“毫无疑问。贝克辞职后回到了自己的农场，这个农场是他爷爷100多年以前建立的。在这里挣大钱，他在华盛顿有漂亮的公司。他从这个生活中来到了国务卿的位子上，然后又回到了这个生活中。而我，没有地方来，也没有地方去。这也就为某些人一旦当上了官，就尽力利用这段时间为自己捞取好处，以便于为自己以后的生存创造前提。这是腐败的基础。如果部长看到他掌管着一定的款额（我没有这种款额），要是把这些款额分配后他可以坐上更好的汽车，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想劝说他不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我现在就遇到了十分不好的生活状况，这种状况是大家都遇到的，不过，有时也在心里对自己说：活见鬼，要是当时想点办法，现在就好办多了……”

科济列夫所说的詹姆斯·贝克在商业上没有少挣钱。他创建了“凯莱尔集团”，这个集团几乎是世界上利润率最高的公司。贝克把成功的企业家和以前的国务活动家所有这些大明星集合在了一起。他公司总共有110人。那都是些什么人啊！譬如说，贝克请来了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担任顾问。他的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购可以现代化并经过转卖之后赚大钱的公司。梅杰一个星期上两天班，一年的工资将近50万美元……

一瓶白兰地

“您的脸面大家都熟悉。当人们见到您时，他们用什么眼神看您?”

“到处都在看我，有在国内看我的，奇怪的是还有在国外看我的。我哪里都不能去，别让人家对我指指点点。很多人跑上前来问好。有些人还想用手抚摩一下。这是让人难堪的，尽管他们是善良的人们。我从未遇到什么敌意的表现、试图屈辱的行为。”

“怎么会这样? 如果读一读众所周知的报刊，那上面写着，您是反人民的政治家，亲西方的政治家。”

“我也奇怪，没有任何人走过来说：‘你这个坏蛋，你把俄罗斯出卖了?’人出了名，有时也有方便。没有出入证，到处都为我放行。有时开车送我，不要钱，尽管我要拿钱。”

令人羡慕的性格使科济列夫摆脱了一半的难题。

“我实际上从来没有长久的令人烦恼的情绪。别墅着火烧毁了，是伤心事，而且又没有钱修复，但我不能长久的伤心。让我郁闷不乐，这不是我的性格。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强烈的感情和爱好，比如说政治爱好。我认为，必须控制住自己。”

“您天生是安静的人? 您小的时候淘气吗? 或者这是自我修养的结果，善于控制自己，不放纵自己?”

——我的行为方式是安静。这是有意识的，我十分尽力这么做。最近几年至今让我羞愧的发泄脾气只有一次。还在当部长的时候，我到了摩尔曼斯克市。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规矩：当一定级别的人物到来的时候，整个街区都要停止活动。前面的车带有警灯，后面的车也带有警灯。这总是让我生气。而当你到摩尔曼斯克进行选举活动时又会怎样呢？……人们会这样看你——你为什么不能正常乘车来？你为什么要有护卫？在选区内，对于你来说，这会丢掉多少票。我第一次解释说，不要这样做，第二次又解释，这一次还是平静的。但毫无用处。最后，我让车队停下来，从汽车里出来，相当粗暴地训斥了有关机构的代表，坚决要求他们把车队解散，然后我安静地在自己的选区里行驶，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而不是像香蕉国的总统那样。我对我表现的粗暴心里是不愉快的，因为这些人是没有错的，他们有自己上级的指示。这就是说，有时我也发脾气。

“对于辞职的部长来说，您很年轻。您想过继续您的政治生涯没有？”

“我确实要从我生活刚刚开始的地方出发。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在我之后当上部长时已是65岁。这样算的话，他前面的日子，同我已过的日子至少还一样多。”

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安德烈·科济列夫建议拿一瓶白兰地就一个问题打赌，说我国很快又会出现推行他所执行的开放的、自由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性。眼下很难说清这瓶用于打赌的白兰地的命运会如何。不过，我有可能拿到它。1999年，科济列夫没有参加人民代表的竞选。他离开了政治，开始在跨国制药集团在莫斯科的代表处工作，这家集团属于南斯拉夫出身的美国百万富翁米兰·帕尼奇。

在南斯拉夫决定性的日子里，帕尼奇当上了国家总理，参加塞尔维亚总统的竞选。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失败了，他由于进行了几场战争而把塞尔维亚引向灾难。在科济列夫还当外交部长的时候，就力图证明，绝对不能支持米洛舍维奇——因为他对自己的国家十分危险，但没有听他的意见。

第十三章

普里马科夫：院士拒绝当将军

深刻了解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的人不多，只有他的密友圈里的那些人除外。在电视屏幕上，普里马科夫常常显得有点忧郁，仿佛总是不满意。他当上外交部长后，第一时间当众露面时戴着一副令人神秘莫测的墨镜，给人一种不十分愉快的印象。看来，有人跟他说了这件事，他很快就换了一副眼镜，好让人可以看见他的眼睛。

他看似阴沉，实际上却是一个乐观愉快的人。他作抒情诗，喜欢以酒会友，知道许多趣闻，对同志忠诚。好多事他做起来好像闹着玩似的。做过学术论文答辩，但是，又不打算一心一意献身学术事业，结果却是学术生涯成为主要事业。离开研究所，并非有意将来在政府里谋求高位并最终主持内阁。

他学的是阿拉伯语，是中东问题专家，后来曾任《真理报》驻当地记者。从新闻界转入学术界，先是领导东方学研究所，后是领导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并被选为科学院院士。

戈尔巴乔夫把他召到身边参与大政方针，让他当上了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总统委员会和安全会议成员……

不知什么缘故普里马科夫竟被认为毕生供职于克格勃。然而，这显然是误解。据知情人说，普里马科夫不是克格勃的人，也不在国家安全“志愿协助者”之列。相反，克格勃的领导不赏识他，而且阻挠他升迁。究竟为什么有人把普里马科夫当作克格勃的人呢？

可能是因为他从事过某些微妙的事业，如处理过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件秘密使命，特殊任务，并非情报工作，而是苏共中央委派的。

还曾有人向戈尔巴乔夫提议让普里马科夫出任副总统，但是，戈尔巴乔夫当时看上了亚纳耶夫，铸成了一个错误。普里马科夫——不同于根纳季·亚纳耶夫——永远也不会出卖自己的总统。普里马科夫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人。可能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因此而成为一位既得到戈尔巴乔夫，又得到叶利钦赏识的惟一大政治家。须知叶利钦是根本不要戈尔巴乔夫的人进入他的班底的。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岁月，叶利钦甚至曾反对任命普里马科夫为情报局长。为此曾不得不劝说叶利钦。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充分评价普里马科夫。

失子之痛

看似平步青云，实则是才高八斗的见证，虽然其中偶然性因素、确切点说运气的因素也有作用。可是，他个人的生活中曾有过真正的悲剧——他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这种不幸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对热爱家人的普里马科夫来说尤其如此。然而，他从不诉苦，从不表现出他是如何地痛苦，没有愁眉不展。虽说他官运亨通，事业有成，但是，对他来说，生活中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家。他很早就与劳拉结了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却不减当年。他们不仅是夫妻，而且是知音，互相取长补短。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亚历山大和纳娜。

所有了解亚历山大的人都说，萨沙·普里马科夫十分聪明能干。

“萨沙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孩子，”普里马科夫的老友、《真理报》

的同仁托马斯·科列斯尼琴科回忆道。“对我来说，这是个理想的孩子。我没有这样的孩子，也没有见到过谁家有这样的孩子。他像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

亚历山大是一名硕士研究生，但已经发表了著作，并被人引用。曾经既有人建议他去开罗当记者，也有人建议他进入学术界。然而，命中注定这都不能实现了。萨沙·普里马科夫离开人世时十分年轻，猝死在朋友怀里。

“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瓦连京·佐林说道。后者是普里马科夫的朋友，他们年轻时曾在对外广播总局一起工作。“萨沙是我的研究生。三个研究生去担任节日值班，——那是 1981 年‘五一节’，那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突然萨沙抓住同志们的手说：我要死了。转瞬间他就死了。”

心脏不行了，就像后来他的母亲劳拉一样……萨沙·普里马科夫年仅 27 岁。他的心脏有病，但是，死得如此意外，谁都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件事发生时，普里马科夫正在墨西哥公干。瓦连京·佐林在大使馆的协助下终于在宾馆找到了他，只是对他说：“今天，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明天你务必要回到莫斯科。”

“他问：发生了什么事?”

“不，不过他大概猜到了……”

朋友们在飞机舷梯旁迎接了他。他下舷梯时脸色惨白。大家告诉他：

“萨沙不在了。”

托马斯·科列斯尼琴科说：

“就这样，我们乘车离开了机场，后面跟着一辆急救车，万一热尼亚[1]不好，可以进行急救。”

瓦连京·佐林说：

---

①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爱称。——译注。

“我们把半昏迷状态的他送到了家，儿子的遗体停放在那里……热尼亚五内如焚，悲痛欲绝。要不是女儿和孙辈，他会经受不住。”

托马斯·科列斯尼琴科说：

“对他来说，至今仍是一个悲剧。当时不言而喻，是无法忍受的悲痛。至今我们常去萨沙墓前，我们忘不了他……”

普里马科夫周围的人获悉这一悲痛的事后，都理解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的心情。

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阿列克谢·马拉申科说：

“我记得，刚好在他的儿子去世后，我们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开会。全体到齐后，会场一片肃静。令人敬重的学者们坐着，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才好。而普里马科夫则很好地控制了自己，无论是一举一动，还是谈吐，都不露出他当时的心境。”

托马斯·科列斯尼科夫说：

“他继续工作。是啊，这正表现出热尼亚的意志。他照常上班，用工作来拯救自己。”

瓦连京·佐林说：

“萨沙去世后两年期间，普里马科夫每天早晨去公墓，在儿子墓前坐上个把小时，然后才去上班……他的工作日就是这样开始的。”

儿子的死是突然落在普里马科夫头上的两个悲剧中的第一个。

只有心脏移植她才能得救

凡是熟悉劳拉·瓦西里耶夫娜·普里马科娃的人都对她怀有最美好的回忆。她是一位有魅力的女性，杰出的母亲和能干的家庭主妇，做得一手美味佳肴，非常好客，对人关怀备至。钢琴弹得妙极了。她一切都干得干净利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一家人过得十分

愉快，充满乐趣。

劳拉·普里马科娃善于交际，有好多女友。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不仅不厌烦妻子的女友，而且还以一定的方式喜爱她们。每逢劳拉生日，他都邀请她所有的女友到家里来。同样，近些年来，每逢来到第比利斯，他必驱车前往母亲和岳母人士的公墓，以及与老朋友聚会……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布拉科夫斯基是普里马科夫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是一位最优秀的心脏外科医生，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医学科学院院士，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的获得者，最后一位从勃列日涅夫手上接过金星奖章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布拉科夫斯基也是在第比利斯长大的，不过，他比普里马科夫年长 7 岁，这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有作用。以后这个差别就不再明显了。只是在 70 年代初普里马科夫从中东回国以后，他们才成为好友。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的遗孀利利安娜·布拉科夫斯卡娅回忆道：

“我们去过费斯曼路普里马科夫的家，他们住的房子很小。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奢侈的东西。的确，他们也不习惯奢侈的生活。不过，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个出色的会讲故事的人。后来，我们这一伙人全都常在我们家聚会，他妙语连珠。劳拉也是一样。这一家人无法不叫人喜欢，也无法不让人跟他们亲近。”

他们严肃地对自己，从不过分，绝不妄自尊大，经常彼此开玩笑。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不徒虚名，也不傲慢。只有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才经常吹嘘自己。然而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又何必如此呢？这样的人都是以批判的态度、带点诙谐的味道对待自己。当然，劳拉对丈夫如此功成名就从内心感到骄傲：

“我可说过，我的丈夫是天下第一号！”

劳拉是这样一个乐观愉快的人，朋友们都不知道她有病。她感觉不好时，布拉科夫斯基总是第一个跑到她家里，因为普里马科夫

家就在列宁大街上他的研究所隔壁。病情稍有缓解，人们就催促她去检查。多位医生诊断为心肌炎，这令人心情沉重。她的身体渐渐虚弱，不再工作。这是一种不治之症。顺便说一句，萨沙·普里马科夫死于心肌炎。

在这种情况下，移植心脏是有效的。布拉科夫斯基曾想着手为她做心脏移植手术，但是，当时的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本人是一位心脏外科医生，不准他做。可是，药物对心肌炎无济于事，无法恢复心肌的工作能力。

有一天医生说，劳拉·普里马科娃只能再活 5 年。当然，医生没有告诉她，而是告诉了她的丈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后来到布拉科夫斯基家里。他显得十分沮丧，愁容满面，陷入沉思。他只能同布拉科夫斯基夫妇交谈。这不仅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是医生。他们也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悲剧——他们的女儿在一次车祸中罹难。她的墓就在萨沙·普里马科夫墓的旁边。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把诊断结果告诉妻子了吗?”我问利利阿娜·阿尔贝托夫娜·布拉科夫斯卡娅道。

“没有，没有！谁也没有说。大家全都装作一切正常的样子。普里马科夫应邀偕夫人访问日本。他与我们商量，她能不能去？我们商定，让劳拉去，分分心。好在她去了……后来，她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好，躺在别墅时，十分虚弱……劳拉连 5 年也没有活到。”

托马斯·科列斯尼琴科说：

“我们知道，劳拉心脏不好。她住院期间，我们常去探望。不过，我们中间任何人当然都未能料到一切会发生得那样快。”

1987 年 6 月的一天，劳拉和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走到院子里，她突然说：

“热尼亚，我的心跳停止了。”

叫了急救车，但是，已经迟了。她死了，年仅 57 岁，比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小 1 岁。这是数年内发生的又一场悲剧。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始终不渝地爱着劳拉，怀念她，经受着痛苦……

也许，普里马科夫因此失去了他年轻时展现的那种特有的愉快心情。这种情形怎么能不使他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呢？……

“不过，他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托马斯·科列斯尼琴科说道。“这个品质使他达到自己提出的所有目标。就是在悲伤时刻他也能控制自己。”

“甚至旁观者都能看出，他总是控制住自己，自制力很强。但是，这是否意味他是一个冷漠、玩世不恭的人呢？”

“不，不。你得啦！相反，他憎恨冷漠无情玩世不恭。——他最憎恨这些态度，更不要提背叛了。我们的圈子里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他看到一个人冷漠无情玩世不恭，那他绝对厌恶这些东西。每逢劳拉和萨沙忌辰，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一定邀集朋友一起扫墓，然后请他们共赴悼念亲人的宴席。”

利利阿娜·布拉科夫斯卡娅说：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孤身一人后，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与女儿分开住了。年轻人的家庭需要单独生活，他就把别墅让给了女儿住，自己则在市中心获得了一套不大的两居室的房间。我们常到他那里去，房间里全是书和劳拉的照片。然而，要知道，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使人高尚起来。他始终是一个高尚的人。也许，他更深沉了。”

他没有颓丧，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利利阿娜·布拉科夫斯卡娅说道。他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布拉科夫斯基也一样。

“你在这些人身上永远也看不到有丝毫的脆弱。这是古老的梯弗里斯教他们的。在丈夫入土时，我没有流一滴泪。他们是这样教我的：不能在人面前流露自己的痛苦和不幸。这是你的问题，也仅仅是你的问题……”

保健医生

普里马科夫再婚的妻子是他的保健医生——伊琳娜·鲍里索夫娜·博卡列娃。伊琳娜·鲍里索夫娜原来在“巴尔维哈”疗养院工作。该疗养院曾是苏联卫生部第四司系统最舒适、声誉最好的一家疗养院。虽然对首长们来说，疗养院和休养之家很多，——从里加海滨到索契，从库尔斯克州到瓦尔代，到处都可以疗养。不过，在苏联时代，全都更愿意去“巴尔维哈”。

俄罗斯中部地带气候温和，实际上对不论患什么病的人都适宜，距离莫斯科又近，房间宽敞，膳食好，符合营养学的要求，医疗条件十分好，这些都吸引人们甚至在非疗养季节前去疗养。拿到去“巴尔维哈”的疗养证是特殊的荣幸。在这里休养的都是高级领导。地位稍低的高级官员则无缘问津。如果乘车沿鲁布廖夫公路前往，那么，不到茹可夫卡别墅村和政府别墅区就可以看见一块普通的指路牌，上面写着“巴尔维哈”。由此应该转弯离开公路，开上一条美丽的林间道路。于是，很快就会又出现一块指路牌：“巴尔维哈疗养院”。

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医院。医生未能救治的那些人就葬在附近——一座军人公墓仍保存至今。疗养院大门边有一间石砌小屋，从里面会走出一个威武的值班员。如果您是来休养的，那就必须出示疗养证。如果是来访客，那么在主任医生提交的名单上就应该有您的姓名或汽车号码。如果有人在等候您，那么大门就会打开，可以把车开进疗养院。一条大路直通主楼，路边竖立着“楼旁严禁停车!”的牌子。主楼的门是自动门。门内有值班员坐在一张小桌旁。他们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前来疗养的人。携带的东西有小推车给送到房间。这是为了千万不能让客人亲自动手搬动。

疗养院里休养的人很少，几乎彼此见不到面。相比之下，身穿

白大褂的、毕恭毕敬的人却比比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不会要态度，对休养人员总是有求必应。对每个人都称呼其名字和父名。休养人员的姓名不仅保健医生记得，而且连护士、食堂服务员、女护理员和那些为病人送饭到病房的人统统都记得。每一位休养人员如果没有偕夫人前来，按规定住一间舒适的单人套间，内有卫生间和不大的浴室更衣间。房间里有衣橱、电视、冰箱、写字台、小杂志台和电话号码属莫斯科的电话。家庭套间则要大一些，里面一定有放茶具、餐具的玻璃橱和电茶炉。过去还向每个人无偿发给内衣、运动衣和运动鞋。

在疗养院里人们比较自由，可以在冰箱里放葡萄酒和伏特加，请值班护士送来开瓶器。虽然这是疗养院，但是，谁也不会感到奇怪。疗养院有几座楼，楼与楼之间有通道和冬季花园相联。这里的建筑风格奇特别致。休养人员住一层和二层，三层是行政办公室和电影厅——每天晚上都放电影。每层都有医生办公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小阳台，一层也有。

食堂里自助餐桌上放着各色蔬菜，其余皆按菜单预订。疗养院自办了一个养禽场。可以吃减肥餐，有人直接送到房间里，以免愿意减肥者自己去食堂看到别人大快朵颐而眼馋。

夏天，人们可以骑自行车，打乒乓球，下池塘游泳。不过，骑车和划船只有经过医生允许方可。除了船夫外还有一名护士值班，以防休养人员中有谁突然感到不适。院里建有一座雅致的茶室，可以在清新的空气里就着蜂蜜、果酱和糖果（需付费）品茗。有兴致者可以去游泳池和洗桑拿。但是，在“巴尔维哈”是以治疗为主。

休养员到来后半小时，保健医生就来到房间，他，更多的是她，每天将在早餐和午餐之间方便的时候前来，休息日除外（届时仅留下值班医生）。所有的人都规定了许多治疗措施，因此，午饭前大家都有事可干。疗养院以理疗驰名：磁疗、电离子透入法、贝尔纳电流、涡流浴、水按摩、碳酸浴以及许多其他疗法。

下午4时，医生们准备下班回家，但在这之前先要探望病人，

问一声：

“有没有问题？今天您还需要我吗？”

疗养院总是设法挑选内行能干的、殷勤的、医术高明且又能让休养员生活愉快的医生来院工作。伊琳娜·鲍里索夫娜·博卡列娃在改革时期是巴尔维哈疗养院的保健医生之一。这位年青的女士举家来自斯塔夫罗波尔，是戈尔巴乔夫的同乡，当年她谈起这一点时不无骄傲。

她的前夫——一个高高的男士，蓄着麦粒色的小胡子，性格有点孤僻——也在“巴尔维哈”工作，是一个X射线医生。女儿在上学，夏天就把她送到祖父母身边去。

伊琳娜·鲍里索夫娜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迷人的女性，聪明而有教养的医生。她待人和气，凡是与她交谈的人，都对她产生好感。早晨，她心情愉快地看望自己的病人，并用这种心情感染他们：早安！您睡得怎样？问的口吻十分真诚体贴。对休养员的所有请求和愿望都一一牢记在心。她不谈自己，只谈病人，这在医生中实不多见。休养人员都喜爱她，服务人员和领导都器重她。

普里马科夫就是在“巴尔维哈”与未来的妻子相识的。

1989年，普里马科夫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请伊琳娜·鲍里索夫娜担任他的保健医生。于是，她从“巴尔维哈”调到莫斯科，在位于格拉诺夫斯基路一所专为高级领导人而设的门诊部工作。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那里就诊，按规定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一名医生。

劳拉去世后，普里马科夫久久未再续弦，甚至想都没有想。然而，伊琳娜·鲍里索夫娜正是他所需要的那种女性。1994年他们喜结连理，普里马科夫可以说从此获得了新的活力。倘若他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他未必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利利阿娜·布拉科夫斯卡娅说：

“他的新夫人十分迷人美丽，真诚可爱，是个聪明又谦虚的女人。她对他的所有老朋友也很好。对我们的态度很感人。”

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说：

“他的老战友十分高兴，现在他身边不仅有女儿纳娜，而且还有一个贴身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他的损失。当然，并非每一个人都能经受得住命运的这种打击的……”

幼年丧父

普里马科夫身边挚友众多，这是对他一切悲痛的一种补偿。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高加索，他都有很多同志。他爱朋友，朋友也爱他。这就是高加索的、第比利斯的风格。

普里马科夫多年的知交、塔斯社社长维塔利·伊格纳坚科如此说道：

“他的刚强表现大概是他从童年时代形成的性格特点。他在艰难时期长大，况且又是幼年丧父。但是，他在第比利斯生活成长的院子环境很好，朋友都很诚实。因此，他有很好的后盾。这非常重要——感觉同志们就在你的背后。至于你的身份，坐的是什么汽车，或者有没有汽车，在朋友们之间，这都无所谓。这赋予你生命力……”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在1929年10月29日生于基辅。然而，年幼的普里马科夫在乌克兰生活的日子屈指可数。他被带到第比利斯（当时俄文名称是梯弗里斯），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一直到1948年去莫斯科学习为止。

他的出世，大概伴随着什么非同寻常的家庭变故。是什么促使他的母亲赶快离开了基辅？只能设想，在安娜·雅科夫列夫娜怀抱哺乳的婴儿风尘仆仆几乎横穿全国来到第比利斯落户的决定背后，有什么重大的悲剧。

关于他的父亲，实际上众人皆一无所知。他最亲近的朋友说，普里马科夫从未提及过他的父亲。据说，他的父亲成为斯大林镇压

的牺牲者而辞世。此事是不便向他打听的。

普里马科夫在自传中写道："我出生 3 个月后（这时我们已迁居梯弗里斯）就丧父。是母亲抚养我成人。她是医生，生前最后 30 年一直在第比利斯纺织联合厂门诊部工作，1972 年在第比利斯去世。"

不言而喻，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的家事纯属他的私事。这只在一个方面引起公众的关注，即他的童年对他后来的生活，对他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他的性格、观点和行为方式有什么影响？

在第比利斯，普里马科夫家住在列宁格勒路 10 号一幢房屋里，有两个房间。他的母亲安娜·雅科夫列夫娜终生以医生为业，市里的人都对她很好。她是一个和蔼可亲、善良和谦逊的女性，把许多好的品质传给了儿子。然而，她孤身一人抚养他必定着实不易。跟任何一个处境不佳的孩子一样，普里马科夫无疑曾因幼年丧父而感到痛苦和艰难。他的朋友的父母都对他特别关爱，这多少弥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普里马科夫幸运的是，他所在的第比利斯恰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以气候温暖宜人（特别是当年）而著称的城市。当年的第比利斯是为数不多的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古老遗风的城市之一，人们不会感到孤单，周围都是新知故交、熟人与邻居，因而，归属于某个集团、群体。这里人们尽力互相帮助已习以为常。

后来，所有了解普里马科夫的人都赞叹他善于交友和对众多朋友忠贞不贰之情。这个品质是当年在第比利斯养成的。他懂得周围都是朋友是多么重要，并且学会了珍惜亲近的人。

可是在莫斯科，普里马科夫却碰到了他所不习惯的把人按民族特征划分的做法。他的朋友都不爱谈这个话题。他们共同用一句话去敷衍："在我们的圈子里，他的民族成分对谁也无关紧要"。对此无论谁也不怀疑，正派人不可能不这样为人。但是，莫斯科并非仅仅是由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的朋友组成的。

在 1991 年 8 月以后公开的苏共中央档案里，保存了一些警惕性强的学者的信件，他们向党的领导发出了关于普里马科夫不是雅利安人种的信号，希冀免掉不合心意的所长的职务。信中写道："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共产党员请求你们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反对所长叶·马·普里马科夫（真实的姓氏为基尔申布拉特）'院士'在我们研究所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和滥用职权的行径。这个露骨的投机分子、研究所犹太复国主义黑手党魁滥用职权，几乎整年到国外出差，从所里出国人员那里收受贿赂，用非劳动收入在'小地'上为自己盖起了宫殿气派的别墅。普里马科夫—基尔申布拉特不择手段，大把大把地挥霍国家资金，为自己发财致富，贪得无厌。他彻底瓦解了研究所，把研究人员分成两部分：博得他欢心的犹太人和其他不合意的人……"

这封文理不通的信（纯属无稽谰言）——并非匿名信，落款的人都有名有姓——竟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写的，于 1985 年 10 月送到苏共中央。这封告密信证明，类似可耻的看法甚至在有教养的学术界也如此广泛地存在。

"关于普里马科夫是隐藏的犹太人的说法在我们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也流传过。"曾在该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拉兹梅罗夫说道。"这样的流言是经常的。甚至前任所长伊诺泽姆采夫都被认为是犹太人。我们的第一任所长阿尔祖马尼扬也被说成是犹太人，因为他仿佛只录用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

我们的国家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摆脱反犹太主义和别的"反……主义"，也不可能摆脱对"异族人"的蔑视态度。只要我们还有这种恶习，我们的社会就不可避免有这种言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领导人的家谱撕碎，干脆点把火把它烧掉，并且记取某种教训。能这样做的人多的是，包括我们研究所在内。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回忆道："在改革初期，'纪念'协会的头头瓦西里耶夫在群众大会上散发传单，其中说苏联存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除了我这个苏联犹太人首要分子

外，其中必定还有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他们用的是另一个姓，我忘了是什么姓。后来，也把叶利钦列入了这个名单。”

操心犹太人问题的人断定，普里马科夫的俄罗斯姓氏不是真姓，而是假的，不仅他的母亲，而且还有他的父亲，都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注意，依旧只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即这个情况对普里马科夫生活影响的程度怎么样？应该从他接受的是纯格鲁吉亚的教育这一点出发来探讨问题。普里马科夫是在格鲁吉亚人中间长大的，从一切征兆来看，他在青少年时期连想也没想到过，他与周围的格鲁吉亚孩子有什么区别。

当普里马科夫来到莫斯科时，他说话的口音就同第比利斯人一样，也就是说，带着浓厚的格鲁吉亚口音。后来，他的口音变得纯正，操起了纯粹的莫斯科话，非常文雅。不过，就是在现在，在他心灵极其激动的时刻，他谈吐中还会冒出典型的格鲁吉亚口音来，为此他的朋友常常取笑他。反犹太主义在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人们不把犹太人与格鲁吉亚人区分开来，许多犹太人在更大程度上自认为就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犹太人。

其实，普里马科夫在政治上开始高升已经到了改革时期，那时履历表上的第 5 项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至于左翼反对派，他们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反对犹太人在政府部门、实业界和媒体的权势的口号基础上，普里马科夫则善于立身处世，使他们不敢就此事对他进行纠缠。

当普里马科夫成为外交部长，后来又出任总理时，左翼反对派不论其真实想法如何，在公开场合则高度评价他的立场——与美国对抗，反对北约东扩，批评货币主义者和愿意支持本国生产者。

正如一位州长所说，“我们认为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是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

交友之道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许多人的生活中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热爱朋友，对同志诚恳——这些品质使普里马科夫大不同于一些别的政治家，这些人奉行的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朋友，这就是在某时某刻对你有用的人。

就在国家杜马批准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职务的当天，他的朋友瓦连京·佐林因怀疑患腹膜炎而被送进了医院。晚间，普里马科夫听到妻子谈及此事后，便前往医院探望。

当弗·伊·布拉科夫斯基心脏外科科学研究所在鲁布廖夫公路与乌斯片斯基公路交汇处的新楼举行落成典礼时，普里马科夫前往祝贺，并发表了简短热情的讲话。摄像机录下了普里马科夫的面部表情，当时他正悲伤地注视着自己故友的半身塑像，该研究所正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这幢楼还在布拉科夫斯基生前就已开始兴建，后来终于建成，这中间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起了不小的作用。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过75岁生日时，普里马科夫当然也来了。所有的人离去后，剩下他们俩坐在丰盛的餐桌旁畅谈。当时，普里马科夫面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米歇尔·康德苏进行艰难的谈判。这并没有妨碍他频频举杯，为这位寿星的健康不知干了多少杯伏特加。——结果也没有给俄罗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杂的关系造成损失。

在国家杜马一读通过预算草案的次日，普里马科夫上午9时来到特维尔路《消息报》社，祝贺老友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70寿辰。他们在一起饮了茶，坐了个把小时，然后才去政府大楼，那里等待他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会见。

如果他信任某个人，形成了友谊关系，那就不管怎样，甚至此

人被解了职，名誉被诋毁，普里马科夫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不会改变。有一位政治家，不久前还名震一时，可是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他在谈起普里马科夫时说道：

“我认清了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当他来到我们这一带，他也要来看望我。这总是愉快的会见。普里马科夫是一个视野广阔的人。他接受并尊重别人的意见，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他是一个愉快的、真诚的、朝气勃勃的人。很容易与他相处。”

按照普里马科夫的交友之道，朋友之间不仅仅是握握手和相互为健康干杯。他珍惜地缅怀故友。通常人们终日碌碌，不见踪影，而他却不是这样。他总是与故友的家庭很亲近。对他来说，这十分重要。

伊诺泽姆采夫院士的遗孀玛加丽塔·马克西莫娃说：

“我的孙女儿真的快要没命了。她住的医院没有需要的儿科医生，但需要紧急把脓吸出来。可怎么也没法把她转到儿童医院。我急得忍不住给普里马科夫的助手罗伯特·瓦尔干塔诺维奇·马尔卡良打电话。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当时在最高苏维埃主持联盟院的工作。过了 15 分钟，医院接到立即与儿童医院联系的指示，把孩子送到了那里，吸出了脓，捡了一条命。我至死都感激他。”

他保持了与所有朋友的友谊，其中包括早在中小学时代结交的旧友。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他对朋友的态度。他同他们患难与共，丝毫无损。现已故去的列昂·奥尼科夫曾同普里马科夫保持了 40 多年的友谊，生前曾说：

“我们有自己的交友之道。无论是民族出身，还是宗教信仰，跟友谊都没有关系。年长的应该受到尊敬，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这就是普里马科夫从童年起就汲取的一切。”

凡是他呆过的地方，他都与人们建立起牢固的、长久的友谊。在普里马科夫任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时，他就同罗伯特·马尔卡良结为好友。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格里戈里·莫罗佐夫——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前夫——成了他的朋友。在广播电视委

员会时——瓦连京·佐林。在《真理报》时——托马斯·科列斯尼琴科。

伊诺泽姆采夫院士的遗孀玛加丽塔·马克西莫娃说：

“很难碰上他在家。星期六晚上他去祝贺某个朋友的生日，星期天上午去医院看望同志，然后去公墓悼念某个故友。”

他广交朋友，因此，他经常为人们所包围。玛加丽塔·马克西莫娃回忆道：我与他一同去格鲁吉亚，在第比利斯他长大的地方挨家挨户地走访，人们全都记得他。他把老熟人都召集到一起。我喜欢他什么呢？对他来说，朋友就是朋友，不分贵贱，是否身居高位，则无关紧要。他既不骄傲自大，又不高人一等，每逢大的红白喜事，他都必定邀请格鲁吉亚的老朋友。他们纷纷前来，围席而坐。这位是院士，那位是工人，没有任何区别。

“他有时天真得出奇”

普里马科夫似乎把对待朋友的诚挚也用于对待所有其他人。后来，当他成为情报局长、外交部长时，他周围的人有时惊讶地发现，他在人事上有明显的失误，用人不当。

普里马科夫的原配劳拉，生前曾经为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过分轻信别人而十分不安。他们曾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常到他们家里来，但是，并非所有朋友她都喜欢。有的人她一点都不喜欢。劳拉认为，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不善于识别人们身上不好的东西，因此，担心这会给他造成损害。

他的助手们有时的确感到惊讶：他竟会任命这个人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曾在对外情报局与普里马科夫共事的塔季扬娜·萨莫利斯说道：

“我有时觉得，天知道我比他大几岁。他对人有时天真得出奇。

他总是从任何人都是正派的推断出发。反正我是这样判断的。人可以相对地分为两种：一种人评价一个人的出发点是，每个人，只要目前没有明显看出他不好，那就是好人；另一种人则认为，每个人，在他没有证明自己是好人之前，那就是坏人。可是，对普里马科夫来说，所有的人绝对都是好的，全都聪明能干而且出色。然而，一些纰漏日积月累，一桩又一桩。而他却长时间地勉强凑合着。他不愿意明说，这个人实在不怎么的。不过，后来他屈服了，该分手了……”

塔季扬娜·萨莫利斯继续说道：“不论我怎么劝导他，他都很不以为然，直到他自己看清楚他对这个或那个人的看法不正确时为止。对我来说，这真不可思议。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某种阴谋在他周围紧锣密鼓地策划着，天知道还会有什么不测，并且那些人全身心投入这当中时，他仍然这样天真。”

“那么，是不是他不能够与不中用的工作人员分手呢?”

“这取决于这个人使他厌弃的程度。塔季扬娜·萨莫利斯说道。如果这个人的干扰使他重任在肩的每一天都有危险，这就会很快发生。他会迅速把他拿掉。普里马科夫完全能做到毫不手软。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否则，他的生活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不过，他完全能够与他本人不喜欢的人共事。譬如说，普里马科夫发现某人有一些缺点，但认为他是一个行家里手，这样的人普里马科夫会容忍。不但如此，还为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不让别人利用他的缺点进行投机和挑唆自己反对这个人。他会竭力阻止这种做法。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既然他是我们需要的人，事情做得好，那么，所有的人，同事们，就少说废话。”

“他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我的一伙人，对所有其他人则不屑一顾。”曾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与普里马科夫共事的格尔曼·季利根斯基说道。“我想不出在普里马科夫主管时研究所里有什么具有特权小集团或部门。但是，他信任的人是有的。而且这与个人偏心无关。我知道他极力一再提拔跟他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同

事。只不过是因为赏识他们的业务素质，相信他们的判断。”

然而，无需因为他表现软弱或迁就而对他产生怀疑。对那些起来直接反对他的人，未必可以羡慕。那会是一场春梦。有人说得甚至更厉害：不能挡着普里马科夫的道路。他有钢铁一般的性格。

“研究所里人们的看法如何呢？他青云直上是因为与他的个人优点有关呢，还是因为某个人显然赏识而提拔了他呢？”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这个人具有绝妙的赢得人们好感、特别中上层好感的天赋。我想，他官运亨通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

“这种天赋的奥妙何在呢？是不是表现在能说会道，会出好主意呢？”

“我想，在于他善于表明自己的用处，其中包括出主意。这既是业务素质，又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能力，如善于与人交际，特别是与上级。”

“为那些在我们不在场时为我们干杯的人干杯”

普里马科夫是多血质的人的体质，而面部却是忧郁质的人的表情。这使人产生一种普里马科夫是一个虚胖而萎靡不振的人的想法。

“这绝对是虚假的印象。”——凡是了解他的人都异口同声肯定地说。他行动敏捷而且精力充沛。至于他的智能，那就更不必说了。

普里马科夫甚至在童年时代也不从事体育活动，没有以体格强壮表现出众。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拉兹梅罗夫回忆道：“我在研究所工作时继承了普里马科夫用过的大写字台。给他分了一间配备了新家具的办公室。他原来的办公桌就给了我。我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抽屉里放满了药。可怜的他吞服各种各样的

药。但是，他支持得住。知道吗，靠什么支持？在一次出差时我看到了，他像丘吉尔，可以在任何时间利用片刻睡一会。我想，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弥补自己的弱点和过度紧张的。”

普里马科夫在任对外情报局长时做过甲状腺手术，成为外交部长后做过胆囊手术，从政府首脑位置卸任退休后又做了一次复杂的髋关节手术。但是，他从未因自己身体不适而取消或耽误过一件公务。每天早晨他要在游泳池游上 500 米，严守制度，任何人都不敢说他是不能胜任自己工作的。

看上去，普里马科夫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是这样吗？

“嘿，这是误解。”维塔利·伊格纳坚科说。“他是一个十分果断的人，在贯彻自己的思想和政策方面意志十分坚定。可以说，他谈吐温文尔雅，不会提高嗓门。但是，他是个异常果断和有原则的人。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忧愁苦闷吗？”

“从来没有。”伊格纳坚科肯定地说。“当然，他同任何人一样，可能也会有疑问、忧愁和悲伤，而且他的生活中有许多忧愁和悲伤的理由。然而，他在人面前总是乐观的，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自己的任何挫折都是如此微不足道，有他在身边就好。”

“他是不是强制自己这样？”

“不，这是他的性格的特点，他相信一切都可以克服，都可以扭转。我想，这个性格特点有助于他的所有工作和任何创举。而且我相信，这也会有助于他现在的工作。”

他的一个个人品质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如此稳健、安详而庄重的人。想必他就是这样的。但他是一个有钢铁般主心骨的人。如果他对一种事物坚信不疑，那就无法折服他。

普里马科夫是少有的集两种品质于一身的人——一方面，他很严肃，另一方面，像通常说的那样，他又好交际，乐观愉快。

塔季扬娜·萨莫利斯说：

“他在与朋友交往中排忧解闷。他交往的人多得不可思议。他

仿佛也不疲倦：在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后，本应回家看看电视，休息休息，他却去剧院或去看朋友。”

列昂·奥尼科夫说：

“在沃洛佳·布拉科夫斯基生前，我们在他那里聚会最多。傍晚大家用电话联系，相约在布拉科夫斯基的研究所会面，一周两三次。他喜欢喝酒。小灌肠就放在小的、曾经用于消毒的长搪瓷盆中煮。”

每当有人从第比里斯来时，大家总是在一起聚会。而时常来的是他上中小学时的朋友。许多人就在他家落脚。如果有人到他那里，他就通知我。如果到我这里，我就通知他。

普里马科夫是个笑话大王。下面就是他讲的一个笑话：

“两个老头子相遇了。一个说：

“我真糟糕！完全失去了记忆力。知道的东西全都忘记了。”

另一个安慰地道：

“嘿，你别怕。我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可是，从美国给我寄来了一种药丸，现在一切都好了。”

前者说：

“哦，谢天谢地，那叫什么药？”

后者想了一下说：

“你知道，有一种花，茎高高的，顶端是白色或红色的花……那叫什么花呀？”

“石竹花。”

“不，不是石竹花。茎有刺……”

“那是萝扎（俄文玫瑰花的音—译者），是不是？”

“正是，萝扎！”

他转过头去，对着厨房喊他老婆说：

“萝扎，萝扎（俄人名，同俄文玫瑰花一词相同—译注）！让我恢复记忆力的药丸叫什么来着？”

年轻时他只喝葡萄酒。不过，现在放在他身边的却是伏特加

酒。即使放着很多各种各样的酒——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和葡萄酒，他喜欢的是伏特加。

据普里马科夫的朋友说，他对钓鱼不感兴趣，对玩从未有过癖好。击棒游戏、桥牌、跳棋、象棋——这些都与他无缘。他到南方休养，爱大海。毕竟差一点成为海军军官。

交友和读书——这就是他的爱好。他自己会写诗，这也曾帮助他度过生活中艰难的时光。他可以抒发自己的感情。须知写诗可以排忧解闷。

总统紧急召见

1996 年 1 月 5 日，对外情报局长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的办公室里特别交换台的电话响起了铃声：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要和您说话。"

总统问道：

"可以到我这里来一下吗?"

叶利钦请普里马科夫到他那里去，不是听取例行的报告，无须携带文件资料。而且，不是去克里姆林宫，而是去别墅。要谈什么事，事先也没有告诉普里马科夫。不过，也不难猜到。关于科济列夫已经离任的消息，普里马科夫已有耳闻。当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出现在总统别墅时，鲍里斯·叶利钦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想任命您为外交部长。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普里马科夫坚决拒绝，说道：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觉得您大可不必这样。原因很多。对西方来说，我会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人物。他们认为我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朋友，老牌官员，保守派，特工头子，等等。"

普里马科夫拒绝这项任命还有个人原因。他喜欢情报工作。对外情报局就政治影响程度而言，几乎与外交部不相上下，而在外交

部长的岗位上必不可少的抛头露面，却使普里马科夫感到不安。离总统选举剩下不到6个月了，叶利钦一门心思放在竞选上，因此，普里马科夫补充道：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在选举前的形势下这样任命不妥。”

叶利钦认真地听他说完后回答道：

“我以为您说的不利方面可以变成有利方面。您没有说服我，不过，也可以说，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暂时悬而未决。”

1月9日，对外情报局长来到总统处做关于世界形势的例行报告。叶利钦狡黠地看了看普里马科夫，问道：

“唉，怎么样？改变主意了吗？”

普里马科夫用坚定的语调企图再次表示拒绝：

“没有，我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

叶利钦不再啰嗦，说道：

“可我却再一次做出了决定。”

普里马科夫请求准许他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再呆几个月，以便善始善终。叶利钦点了点头，但是，那天他对情报局方面事并不感兴趣。

普里马科夫回到了亚谢涅沃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工作。秘书推开了门，轻轻地走进了办公室。在情报局，秘书历来按惯例由男军官担任，这从克格勃时代起就一直如此。秘书说道：

“对不起，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电视新闻刚才报道，您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这样，普里马科夫就成了外交部长。

次日，1月10日，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被请到克里姆林宫。叶利钦向大家介绍了新的部长：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无须特别介绍。无论是在我们俄罗斯，还是在国外，人们都很熟悉他，在国际事务上，他也不是新手。”

叶利钦说，曾经考虑过几个人选。

“必须找到一个人，他既要有国家工作经验、专业素养、善于组织工作，又要有开阔的视野，为人正直，作风正派。”

隔日，1月12日，普里马科夫举行了首次记者招待会。

“对于自己的任命，我只从一个立场来考虑，就是必须加强外交部的工作，以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利益。”

对于广大公众和全世界来说，普里马科夫的任命是意外的。鲍里斯·叶利钦有意选择了一个与安德烈·科济列夫完全相反的人。

大选前的一着好棋

叶利钦想改变外交方针，以便跳出抨击的火力圈，可是，苦于找不到一个能这样做的人。合适的人选刚找到，科济列夫就下台了。普里马科夫比自己的前任大22岁，也比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内阁中大多数部长年长许多。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早就被看中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他的名字曾经数次列入部长人选的名单，先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后来是叶利钦年代。第一次是在1990年底，当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部长出人意料地卸任。但是，有关普里马科夫与像萨达姆·侯赛因这样不受欢迎的中东领导人过往太密的议论，使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安。叶利钦也远非一下子就接受普里马科夫这个人选的……

为什么总统恰恰选择普里马科夫来取代科济列夫呢？首先，叶利钦观察普里马科夫已经几年了，看清了他。其次，叶利钦考虑了一个关键因素，而这个因素是其他人不知道的。5年来，科济列夫和普里马科夫在同一个领域工作。不过是一个在明处，另一个在暗处。科济列夫的观点是尽人皆知。普里马科夫则是有意识地竭力不事声张。然而，叶利钦每周接见情报局长，批阅他的报告，十分清楚普里马科夫的想法和提出的建议。

大概从1993年起，科济列夫与普里马科夫之间开始出现严重

的意见分歧。当然，把情报局称为影子外交部是不对的。但是，归根结底，情报局干的工作是相同的：搜集关于世界形势的情报，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估，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起初，在评估上的分歧是策略性的。情报局侧重的是这一面，外交部侧重的则是另一面。后来，分歧加深了，以至最后科济列夫和普里马科夫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直接对立。叶利钦任用的是一位早就与科济列夫论战的政治家，不过，其论战不为广大公众知晓。

当时，大家都祝贺普里马科夫，但是，许多人却感到不解：为什么他在总统选举前数月接受部长任命？1996 年 2 月，叶利钦再次当选连任的把握不大。政治学家们依据民意测验的结果，几乎一致预言，共产党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将要获胜。他已经被看成是下一任总统了。怀疑论者和实用主义者感到诧异：普里马科夫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候“出山”呢？在情报局长的位置上，即使久加诺夫当权，他也可能留任，可是，当上外交部长，新政权肯定要把他拿掉……

关于这一点，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当面询问普里马科夫：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您在今年 6 月将不得不卸去部长职务，这并非秘密。

“感谢你作出这个预测。”普里马科夫微微一笑。

记者哄堂大笑。

普里马科夫的真才实学和稳重扎实博得人们的好感。一两个月过后就证明了，对他的任命是国内政治的一着妙棋。正如前任外交部长之一——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所说，这是从非职业外交家中挑出的最好的人选。普里马科夫巧妙而天衣无缝地掩护了总统的“后院”，使得反对派无法批评其外交政策。甚至叶利钦的死敌——共产党人也不好说普里马科夫有什么不好。而且西方对任命普里马科夫为外长十分反感这件事，对叶利钦来说，反倒也是件好事。在大选前夕，对美国人的意见他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选票，所有

选举人的选票，包括那些憎恨西方的人的选票。

在 1996 年的总统竞选运动过程中，叶利钦遭到了种种指责，惟独挑不出外交政策上的毛病。

在国内，普里马科夫获得了完全的支持。他常常与议员会面，实际上没有遭到过批评。无论是支持叶利钦的人还是反对派都赏识他。许多议员说，普里马科夫知道如何在杜马说话，知道如何使议员们高兴，但是同时又贯彻自己的路线，决不偏离。对这个现象，普里马科夫的故交，《消息报》政治观察家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这样解释道：

"为什么他赢得社会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呢？他在国内不同任何人对抗。他从自己的词汇中排除了政治标签，他没有把社会分为民主派和共产党人两派。社会虽然不是一致的，但是在寻求和谐的动力并准备接受这种动力，而且是以感激的心情接受……"

普里马科夫对我说，在部长的岗位上他原则上不搞国内政治。

"我像任何人一样也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外交部长和整个外交部应该撇开好恶。我从不让自己把谁说成是绿色的、粉色的、红褐色的或蓝色的，——我指的是政治色彩。"

"难道外交部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吗？"

"外交部当然搞政治，不过，仅仅是对外政治，"普里马科夫再次说明，"因此，外交部是国内最非政治化的一个部……"

午餐便宜了

随着普里马科夫的到来，对外政策已不再是严厉批评的对象，外交官不再受干扰了。他在克里姆林宫和政府中的威信及处理行政事务的经验，让人可以指望外交人员的切身问题会得到解决。

普里马科夫当部长时，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经常见到总统的政治人物之一。这使他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还使他在与其他

部长的关系里中具有某种地位。这些部长们总是用嫉妒的眼光看着外交部，不便与普里马科夫争高低。而总统则很愿意对普里马科夫的请求作出反应。

在任命普里马科夫以后两个月，叶利钦签发了关于外交部起协调作用的命令。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如未与外交部协调，不得就涉及对外政策的问题发表意见。只有三个人，即总统、总理和普里马科夫本人，可以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发表正式声明。他争取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各种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安全会议秘书等人，时不时发表与我国对外政策不一致的言论，以致外交部不得不紧急出面澄清。这并不意味着，普里马科夫的生活平静了。不时有一种传闻，说总统可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一度还盛传谢尔盖·亚斯特任布斯基将取代普里马科夫的外长职务。前者是一位年轻活跃的政治家，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对叶利钦有一定的影响。

1997 年 10 月，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谢尔盖·亚斯特任布斯基，想当面问他这些传说有几分可信。他真诚地驳斥了关于很快要任命他为外长的传言，并说“应该让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放心”。从普里马科夫本人对这些传闻作出的并不高兴的反应来看，外长自己心里明白，令人捉摸不透的总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做到了其前任们（甚至连葛罗米柯和谢瓦尔德纳泽这样有影响的人物）都没有能做到的事：他为外交部争取到了斯摩棱斯克广场上整个一座大厦。这座大厦建于 1952 年，从来就不曾完全属于外交部。昔日实力雄厚的外贸部的后继者们从这栋大厦里搬出去了，大厦里开始了期待已久的装修。先是副部长们分别迁入比较宽敞的办公室。外交部原来的办公室都很小，而别的部委负责人则要宽敞得多。现在副部长们都有了休息室，他们自然不是在那里休息，而是接见外国使节。接下来是装修各楼层的房间，普通工作人员也觉得舒服多了。

此外，外交部工作人员又开始给分配住房了，还有像普里马科

夫自豪地声称的那样，外交部食堂的午餐也便宜了。普里马科夫第二件令大家惊喜的事是增加退休金额。在他到来之前，甚至大使（与将军的职级相当！）的退休金也少得可怜。决定基于外交人员的退休金为其最后职务薪金的约80％。

“不坏，”部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在评论这一决定时高兴地说，“可以干下去。”

普里马科夫赢得了部属的心，采用的是在对外情报局已经成功地博得大家好感的同样的办法——改善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普里马科夫在外交部工作的头一年就引来了青年人。

1998年5月，叶利钦总统本人来到外交部，这是外交部生活中一件少有的事。

他在外交部按照为他写的稿子做了报告，并且特别提到了普里马科夫的作用。

“我们的外交有了新的气息，变得积极起来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原则性和善于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总统说，“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威信，各国都要加以考虑。我可以从自己方面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巩固和加强外交部这个具有高度业务素养的集体。”

鲍里斯·叶利钦重申，世界应该是多极的。他号召大家认清非正式的、“不打领带”的总统个人外交的重要性，并保证俄罗斯不会躺到美国的身子下面去。这种用性爱语言表述俄美关系的方式大概是总统讲话中最鲜明的表述方式了。

叶利钦授予了普里马科夫本人以及另外几位外交官勋章。除了装着勋章的盒子以外，他还给外交部带来了一些更有分量的东西。他指示总统办公厅主任研究解决外交部人员的生活待遇问题，命令国防部长不要征召年青外交人员服兵役。叶利钦还同意了普里马科夫关于给保守国家机密的外交人员以奖金的请求。

此外，叶利钦还签署了关于授予“俄罗斯联邦功勋外交工作者”荣誉称号的政令。这一称号授予那些终生在外交部服务的老外

交官和大使。

不喝酒的大使不能很好地为祖国服务

外交生涯的顶点是大使职务。现在外交部共有大使级外交官150人。但是，就连这个职位也不像以往那样吸引人了。

“现在找大使难了，”几年前外交部的一位领导人曾这样对我抱怨说。“而要找一位到缅甸或尼泊尔这类国家当大使的人，就更不容易了。那些在知识、经验和能力上能当大使的人，都在商业或国际组织找一份更有吸引力的、报酬高的工作了。”

普里马科夫做到了使大使职位比较有吸引力。我看了一下最近几年任命的大使名单。这些大使基本上都是职业外交官。实际上没有别人，没有想做外交官的政客。总统过去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去梵蒂冈当了大使，可是，他的外交生涯并不顺利。前车臣首脑多库·扎夫加耶夫在高级外交人员培训班结业后，去了坦桑尼亚当大使。其实，这不过是出于需要让他远离其愤怒的同胞的考虑而已。前鞑靼斯坦的主要立法者、原联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瓦西里·利哈乔夫则被派往欧盟做代表。原文化部长叶夫根尼·西多罗夫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当代表。不过，这不完全是个外交职务，因为西多罗夫是有名的文学评论家，去那里倒完全适得其所。尼古拉·博尔久扎曾任安全秘书和总统办公厅领导人，去到丹麦当大使。

在大国任大使的全都是职业外交官。院士尤里·雷若夫是鲍里斯·叶利钦在议会中的跨地区代表小组里结识的老熟人，在法国做了几年大使，但还是被基干外交官所取代。

现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外交部工作的那些人信誓旦旦地说，不愿意长期去国外工作：

“在莫斯科多有意思呀，这里生活热火朝天。”

但是，如果同我们的大使推心置腹地交谈，那么，他们就会老实地承认：

"倘若当不上部长或副部长，那么，最好还是去当大使。"

可是，有一位大使——维塔利·丘尔金——却甚至对我说，当大使比当副部长好得多。丘尔金本人曾任副部长，因此，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大使生活的好处局外人无法理解。不干不知道。这是一项独立的、抛头露面的、愉快的工作，它能满足人们对权力的欲望。大使的薪金根据驻在国的消费物价决定。驻独联体国家的大使月薪为1500—2000美元不等。驻欧洲国家的约为2500美元。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但物价十分便宜的大国，大使可以拿到2000多美元。驻日本的大使则要多得多，因为东京的生活费贵得不得了。大使还有一笔用于举行招待会、宴请和到驻在国各地旅行的费用。不过，这不全归大使使用。别的高级外交官也要举办鸡尾酒会和晚宴，就从这笔费用中支出。所有的账单都要报送外交部，中央机关还要派监察员去各地查清每一个戈比的下落。

外交官每两年发一次所谓的置装费，用于购买深色的西服晚装，这是外交工作必不可缺的。诚如普里马科夫所说，这是工作服。大使配有厨师或膳食管理员，这根据编制决定。大使还配备一名清洁女工，由使馆一般工作人员的妻子中挑选。给大使开车的是使馆最有经验的司机。不主张大使自己开车。一旦在路上出了事，让警察找司机，而不是大使。大使可别在马路上撞了人，如出了这样的事，国家声誉要受到损害，大使本人也得被召回。

此外，大使应该能够在招待会和宴会上喝点什么，而这种机会差不多是天天都有。倘若大使站起来推开向他敬的酒，那么，他的官运就不会亨通了。不喝酒的大使不能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不喝酒的大使不能很好地为祖国服务。

原则上大使应有官邸，一座带花园的小楼，不过，并不是在每个国家都能做到。譬如在英国，大使只能安于住在使馆楼内整个一

层宽敞的套间里。没有官邸是一大缺陷，这倒不是从大使舒适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上考虑的。驻在国的总理或总统不能常去别国的使馆。这是一条严格的规矩。可是非正式地到大使官邸拜访，那就自当别论了。这种接触是可以的。而外交工作基本上就在于保持接触，不论是正式的抑或非正式的。功夫全在大使个人了。

例如，曾几何时在斯洛伐克首都，美国大使馆没有什么人光顾，而当地社会精华却经常与俄罗斯大使谢尔盖·雅斯特任布斯基聚会。他是一个朝气蓬勃、有魅力和自信的人，当时他是我国最年轻的大使，还不到40岁就被任命为驻布拉迪斯拉发大使。在雅斯特任布斯基任内，大使馆不像刻板的俄罗斯驻外机构。外交官清一色是年轻人，朝气蓬勃，而且总是面带笑容。

“我们许多外交官还不到30岁。”大使当时对我说，“整个使馆朝气蓬勃，这更为重要。集体洋溢着健康的爱国主义和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的精神。我们毕竟是在一个新的国家的第一个大使馆。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将奠定什么样的基础。”

在布拉迪斯拉发，谢尔盖·雅斯特任布斯基的举止与一般大使迥然不同，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自己开车。他甚至为自己选择的一间办公室也是不大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它“符合我的适度观念”。遇事总是亲临使馆各科室，而不是把属下叫到自己办公室。他鄙视等级观念。他是有意如此，还是不能不这样呢？

“在我们的集体里没有狎昵行为，却有正常的民主，这有益于工作。据我耳闻，趋炎附势和作风傲慢在某些驻外代表机构里屡见不鲜，这恐怕不会使整个集体团结。”

谢尔盖·雅斯特任布斯基不久就被调到莫斯科总统办公厅，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这样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大使馆……

在普里马科夫时期，开始要求大使发回的电报简明扼要，可以呈送最高领导，即总统批阅。大使所有电报呈送的地址都十分简明——中央。这些密电在译出后送到部长秘书处，再决定呈报哪一级领导。最重要的呈报部长、政府和总统。此外，大使还向莫斯科发

送所谓的信使邮件，不言而喻，这也是保密的。这些信件发送给谁，则由大使自己做主了。

越过部长直接呈报总统的事十分罕见。遵守纪律和尊重上级是外交官的特有品质之一。不过，有一次，驻英国大使阿纳托利·阿达米申直接给总统叶利钦写了一封信，建议对外交部进行彻底的改革。叶利钦把阿达米申从伦敦召回谈了话。谈话没有实际结果。但是，过了一些时候，阿纳托利·阿达米申被任命为独联体国家合作部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任期不长，诚然，是由于他无法左右的原因。

普里马科夫在各种会议上都说，期待大使的不仅是要向中央报告驻在国发生的事件，而且还要独立作出决定。大使应该看得更清楚——他就在现场，与人们会面，整个使馆都在为他工作。不过，某些大使通讯联系方面会遇到问题。新的使馆没有译电系统。添置这种设备是一件昂贵而复杂的事。驻立陶宛首任大使尼古拉·奥别尔特舍夫告诉我，当初为了向莫斯科发密电和接收给大使的电报，他不得不从维尔纽斯乘汽车去加里宁格勒。

驻非洲小国的大使也曾有同样的问题——每周一次到邻国有译电设备的我国大使馆去，阅读发来的指示和报告一周的工作。电文用手写在专用的、每页有编号的密电本里，交给译电员——使馆最秘密的人物。译电员及其家属固定住在使馆内。他被严禁单独一人进城。收买译电员是任何情报部门的梦想。有时候这竟能梦想成真。译电员的工作枯燥无味，薪金又少。外交官们可以享受到国外生活的乐趣，而他们则与此无缘。

外交部门如同军队一样也有职衔。设置职衔是为了鼓励人们不断的上进心。

“第一次授予我外交官衔时，上级郑重地说：‘你在自己的事业上迈出了第一步，要记住，你最后的一步应该是在新昆采沃公墓。’”一位大使回忆道。

不想当大使的外交官不是好外交官。未来大使的仕途始于科员

或译员。首次到国外任职多半不是去大使馆，而是去领事馆。签证和信访工作是一项极其烦人而枯燥无味的工作。不过，天长日久，对于一个有才干的年轻人，外交部总会报之以令人心情激动的有意思的工作。

在苏联时代，为获得首个外交官衔，得要工作 2 至 4 年。现在，出于鼓励年轻人的愿望，授予首个官衔——随员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是，升迁的阶梯依次是：随员，三等秘书，二级二等秘书，一级二等秘书，二级一等秘书，一级一等秘书，二级参赞，一级参赞，二级特命全权公使，一级特命全权公使，以及最后达到顶峰——特命全权大使……

从随员衔到参赞衔由外交部长命令授予。公使和大使衔由总统授予。可以说，这已经相当于军队的将军衔了。授衔的时间每年分别安排在春秋。以前，这总是要安排在 5 月 1 日和 11 月 7 日前，以便在节日前高兴一番。

外交官衔不仅令人高兴，而且还有实惠。外交官按规定应享受基薪 25％的衔金。此外，还随服务年限的增加以及掌握外语的多少和机密工作的程度发给津贴。如果工作没有出纰漏，上级满意，在升任一等秘书之前，每两年将晋升一级。此后进入高级外交官的行列，晋升的进程慢了下来：只有每 3 年才可以指望得到晋升。官衔的晋升预示着职务也随之晋升。

高级外交官就已经是人物了。他们往往以监护人的身份看待中下级外交官，并且更多地与同级外交官交往。在使馆，高级外交官分配单独的办公室和汽车。中下级外交官数人分配一辆车，轮流享用。只有情报人员才一人一车，甚至级别最低的——也是如此。别国反情报部门正是这样来计算使馆情报人数的。

外交官中有一小部分人终生在一个地区工作。这大多是少数东方语言通。例如，已故的维克托·波苏瓦纽克通晓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始终在阿拉伯东部国家工作。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夫杰耶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只管欧洲事务，会法语、意

大利语、英语和保加利亚语，曾先后出任驻卢森堡大使和驻保加利亚大使。伊戈尔·罗加乔夫（罗高寿——译注）是汉学家，毕生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亚历山大·帕诺夫是个日本学家，只在远东地区——日本、朝鲜和中国工作。格奥尔吉·马梅多夫是个美国通，负责对美关系。

不过，这非常少见。现在，外交官越来越多地从一个方向调到另一个方向。现驻美大使尤里·乌沙科夫过去曾负责欧洲安全问题。格里戈里·卡拉辛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掌握新问题轻而易举，善于交际，当副部长时主管整个亚洲事务。后来出任驻英国大使，而所受教育是非洲学，曾在塞内加尔工作。亚历山大·列别杰夫曾先后任驻捷克大使和主要从事欧洲事务，现去土耳其赴任。

大使时常设法不放那些任期已满的、能干而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回莫斯科。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谁情愿放走得力的干部呀。不过，照例都是干部司在这场较量中获胜：任期届满的调回不误。普里马科夫认为，轮换原则必须无条件地贯彻，虽然在局外人看来这似乎不合理：为什么要把通晓驻在国语言的专门人才调走，换上没有这种长处的人呢？然而，普里马科夫的出发点是，一个外交官必须变换职务和驻在国，以便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这是外交部干部政策上若干重大改革之一。以往，着重培养国别专家。于是，朝鲜问题专家就一辈子在平壤度过，学习过难度不亚于朝文的匈牙利语的专门人才则终生在布达佩斯工作。普里马科夫及其继任伊万诺夫都认为，一个外交官必须具有广阔的眼界。汉学家，即中国问题专家，到一定时候要到华盛顿去，而非洲问题专家则要接受到某个欧洲国家去工作的任命。

普里马科夫这样说明自己的主张：

“整个说来，必须放弃那种一个人只在一个国家工作的做法。头一次他去法国，后来回到部里，然后又去法国，如此一直到退休。需要轮换。”

高级外交官（一等秘书及以上）必须每 4 年调动一次，中下级

外交官则每 3 年调动一次。大使的任期不限，但是，不能总让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因为有别人在斯摩棱斯克广场等着轮到自己头上。外交官调动计划应预先制订，并分发外交部各部门。譬如，计划安排明年驻某国大使馆替换 1 名参赞和两名一秘。

每个外交官有权向干部司申请参加空缺职务的遴选竞争。申请人名单也寄给大使馆。大使总是请求向他们派遣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过去，对大使的请求并不在意，干部部门认为，什么人应在什么地方工作，它更清楚。根据新的大使馆章程，在任命高级外交职务（参赞及以上）时，应考虑大使的意见。

竞争由外交部一位副部长领导下的委员会主持。候选人要进行面试。委员会的决定应公布，这样竞争胜出的外交官便可安心工作，知道自己一年后将被派往某个使馆。

可以被任命为一个不大的国家的大使，但没有大使衔，仅仅是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也可以有大使衔，但是在外交部机关一份不那么起眼的职位上工作。任命大使的程序要花去不少时间。先是外交部部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然后报送总统办公厅以及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审议。

议员们有审议权。在应有准备的条件下，议员们照例会同意提出的人选。也有一两次议员们表示反对，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外交部重新提出这些人选，这一次议员们变愤怒为宽恕。如果无论是两院议员还是总统办公厅，即总统外事助理（季米特里·留里科夫曾任该职数年，后由谢尔盖·普里霍季科接替，直到普京任总统时仍留任）不反对，那么，像官僚们说的那样，就呈报总统批准。

我知道只有一次叶利钦没有签署命令。普里马科夫曾建议任命自己的副手尼古拉·阿法纳西耶夫斯基为驻法国大使。但是，叶利钦主张推迟这项任命，批示如下：让尤里·雷若夫院士在巴黎再干干。普里马科夫没有坚持，不与总统个人意愿相争。一年后，普里马科夫已经当上了总理，尼古拉·阿法纳西耶夫斯基出任驻巴黎大使。

通常如果总统不反对，那就要征得驻在国的同意，也就是秘密询问对方，是否不反对任命该外交官为大使？因此，只有在得到同意后，方才签署任命大使令。是否同意是一件秘而不宣的事，一个国家有权拒绝而不说明原因。在苏联时代，有过这种事，是由于政治原因。现在拒绝接受某人为大使，是极为罕见的事，不过，无论谁也不想派遣一个明明不受驻在国欢迎的人去当大使。

获得大使衔也不简单。通常要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以上，成为司长或副司长以后，才授予大使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要作出授予大使衔的决定，并报送总统办公厅。该决定由总统外事助理负责审核，然后呈送总统签署。一些职务也可授予大使衔。副部长和部长本人都可以这样。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被任命为部长后过了半年获得了大使衔。他在对外情报局工作期间谢绝了将军衔。顺便提一提，这在情报局受到了好评。那里吃这行饭的人干多少年才能盼到一颗星，而他一下子就被授予将军衔。处于他的地位，将军肩章不过是孩童嬉戏的玩意儿，可是，对于别人，却是求之不得的东西。

有时候可以等到早晨

外交官们很快就对普里马科夫给予了好评。可是要知道，这是一个抱成一团的山头，外人插不进去的派系、帮派。这种派性还在国际关系学院就形成了。职业外交官们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不喜欢外来户和政界提拔起来的人。就连对外交部长本人他们也会以傲慢的态度相待，如果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假如要做普通的外交工作就永远也爬不到这个职位的人的话。但是，他们接受了普里马科夫，而且对他感恩戴德。

对普里马科夫本人来说，转到外交部工作并不轻松。在情报局工作好歹比较平静。而外交部长却总是风尘仆仆。最痛惜的是没有

业余时间，甚至连正式规定的星期日和节日也没有。即使去了别墅休息，电话铃声照旧是一个接着一个响个不停，因为世界上冲突时起，需要外交部长亲自参与解决。

我问过部长的助手们：

“冲突发展到什么火候才需要不分昼夜和节假日打电话到部长家里报告?”

“冲突一爆发，部长就要知道。部长应该知道并且当机立断，要采取什么行动，以扑灭冲突于肇始，或者如果事态已发展到难以收拾的程度，则要设法消除其后果。”

甚至在夜间，值班小组也要工作，他们研究收到的电报，并且必须决定：是否要叫醒部长？当然，并不总是必须在半夜叫醒部长，有时也可以等到早晨。可是，常常发生诸如伊拉克问题这样的严重危机，这时不断发生种种事件，凡是最紧急的情况都要向部长本人报告。其余的等一大早部长一到办公室就报告。

“我知道每天都会有厚厚一摞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要全都看，部长是无能为力的。这个信息流必须加以过滤。谁来干这件事？谁来决定，什么必须报告部长，什么必须转呈副部长？否则，部长会为这么多信息而发疯。”

“部长有秘书处，负责报告收到的文件内容。秘书处工作人员还要分清轻重缓急。正式的标准是没有的，这要靠直觉来判断。必须在外交部工作相当长时间才能明白，什么文件需要立即报告，什么文件可以等一等再报告。”

在外交部工作第一年，这简直不可能判定，需要自己体会。除了其他的一切以外，还需要知人：谁转来这份通报？它从哪里来的？在部长秘书处工作的人中，有的后来本人当了大使。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和伊戈尔·伊万诺夫都曾是部长的助手。而副部长中有多少人是经过这座洪炉出来的，就很难计算了。

供部长用的一摞材料中，还包括各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当危机爆发，主管这项工作的部门就要看 CNN 和 NTB 的节目，收听

"莫斯科回声"或"灯塔"的广播。仅仅依靠发回的密电是不行的。这些密电来得迟。

电话成了工作的工具，它要求快速作出反应和当机立断。最近所有的危机局势都是通过与介入调解的部长同行的电话交谈来解决的。现在外交工作和对外政策都很个人化。先前，外交工作的工具是冗长的、字斟句酌的电报、照会和备忘录，这些文件被转送到大使馆，在那里翻译成当地语言，打印在上乘的纸上，然后，大使打电话到驻在国外交部要求紧急接见。这样时间太长而又复杂。现在，部长拿起话筒，在2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解决问题。工作变得简便了，不过，当部长却更难了。

"部长与外国同行交谈是用普通电话吗?"

"不，有专门的通信线路可以与各主要国家的外长秘密交谈，不用害怕窃听。"

"怎么通话呢? 是普里马科夫亲自拨打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电话号码吗?"

"不，这由助手干。譬如，接到信号说，德国外交部长要与普里马科夫谈话。但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当时不在办公室。我们就回答说，一小时后可以通话。德国人表示同意。于是，两位部长准时在约定的时间拿起了话筒。"

"他们是通过翻译谈话吗?"

"如果对对方语言没有把握，也可以通过翻译。双方的译员也拿着话筒。这在技术上是个复杂的程序。"

"普里马科夫给部机关的印象如何?"

"当你汇报时，他都要问：'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接受你的建议。但是，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了解专业人员、专家的想法。"

普里马科夫勇于负责，所有的决定他都自己做，决不委托别人。这是一个智者和高效率的管理者十分可贵的品质。

普里马科夫憎恨在一些官员中流行的一条原则：凡事能推就

推，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而他奉行的是另一条原则：一切都靠我们，让我们一起商量，作出决定，需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这就是普里马科夫十分可贵的品质。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对工作抱着完全同样态度的人，不是这样的人根本就呆不下去。普里马科夫建立起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他同自己的副手一起共同商量，集体作出决定。其副手之一伊戈尔·伊万诺夫最后也当上了部长。

就普里马科夫的外交风格而言，其特点是什么呢？据他的助手们说，他很少提出过高的要求，不像外交官们时常这样做的那样，以便随后好作出让步以及要对方同样作出让步。如果普里马科夫认为，他的论据正确而合理，那么，他就坚持这项决定。然而，他并不故步自封。倘若对方提出的论据在他看来具有说服力并能接受，那他也可以修正自己的立场。

普里马科夫的助手们以钦佩的心情说道，所有为他准备谈判的材料他都看，送还时他都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凡是呈送给他的文件，他都仔细阅读。

当文件送给他以后，他就着手修改。他从来不会把写得不称心的公文生气地扔给助手，说：重写！不，他会划掉，亲自动手去写。有一次，他已经拿起了笔，助手急忙拦阻他说：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请别改了！这份文件已经付印了。”

普里马科夫明显不满地放下了笔。

他同样聚精会神地倾听部里专家们的报告，并且能记住很多东西。

生活经验、院士的智慧和简直是出色的理智，使他能够在大脑里清晰地列出一个谈判腹稿。在形成一个逻辑链条后，就根本无需再去悄悄看那个谈判备用的小纸片了。自然，他把所有的材料都摆在自己的面前，虽然原则上各种数据、事实和日期部长们也可以不用牢记。普里马科夫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深知应该如何去说服人。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关心手下的工作人员，乐于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但更喜欢坚强、独立和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外交部的一位司长说：在要晋升他的职务之前，普里马科夫把他叫去了。部长坐在桌旁，脸色阴沉。旁边坐着他的主要助手罗伯特·马尔卡良，脸色也差不多一样阴沉。普里马科夫看着公文，说道：

“我们想任命您……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务，将很困难。您认为如何，能胜任吗?”

这项重要职务的人选颇有勇气地回答说：

“倘若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我就不会同意接受这个职位了。”

“好，”普里马科夫说，“您被任命了。”

后来有人告诉这位司长说，普里马科夫喜欢他的回答。那么为什么部长脸色阴沉呢？原来是他想考验一下新手，看看他是否能经得住打击。

工作人员去向普里马科夫报告时，总有些担心。倒不是因为害怕挨剋或遇上部长心绪不佳，而是因为知道他经验丰富、知识渊博、才智出众，知道是与一位颇有权威的人士谈话，所以害怕出错。

普里马科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申斥人。一旦知道事情没有办妥，他会感到痛心。

“怎么竟会这样呢？本来明摆着应该会办好的……”

如果他答应谁什么事，他必定做到。因此，当他交办的事而没有办时，他感到痛心，像任何人一样很不愉快。

什么事他都能记住。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交办的事自己记得特别清楚。过了一两个星期，他可能突然问，我交代您的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而且，甚至那些完全没有重大意义的事，他也记得一清二楚。

第九位主人

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一座大厦第七层一间不太大的、形似铅笔盒的办公室里，普里马科夫是第九位主人。

外交部长一任接一任，相互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但是，办公室里的陈设都几乎没有变化。也许是出于俭朴，也许是由于迷信（只要着手搞装修，你就会下台），历任部长都没有打定过主意进行室内装修。陈设朴实无华，都是办公用的。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绿色呢绒桌毯，一侧台子上放着传统的一整套电话：部内的电话；普通的市内电话；两部政府通信用的电话（其中 ATC－2 是与中层干部通话用的，另一部比较重要的 ATC－1 是与各部部长及某些副部长通话用的）；一部笨重的长途高频电话机（可与各州州长、军区司令、联邦安全局、地方机构首脑和驻前苏联各共和国的大使通话）；以及最后，一部标明“秘密”二字的电话机、特别交换台，这是属于国家最高官员小范围用的。

在桌子后面是通向休息室的门，我去见普里马科夫时，他就是从那座门里出来的。

“您看，您身在外交部长的办公室里，坐进了这把圈椅，一定会对自己说，啾，现在我终于能做那些早就想做的事了……”

普里马科夫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我并没有想当部长，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想法。也许，这是我的性格特点。此前，我曾在《真理报》工作过，也曾在广播电视委员会工作过。后来在科学院，领导两个大的研究所。还在最高苏维埃工作过。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到处都觉得，我是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工作。当然，包括在情报局。因此，当外交部长，这不是我生活的目的。但是，我来到这里并非新手。我有经验，开始工作时没有摇摇晃晃。”

"在部长的位置上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也许，这是一种达不到的东西，那您想做些什么呢？"

"不，一切都可以达到。我认为，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完全是能胜任的。总统交代任务，我们与同事们共同去完成。我们有一个十分团结的班子在领导外交部。我们大家都同心同德。我们要协助国家解决所有国内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途径——在国际舞台上担任主要角色之一，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我们正努力实现这一点，并且现在已有所成就。"

"那就给您举个例子，"普里马科夫说道，"当我们不得已请求各种贷款时，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仍受到重视，而且许多事还要依靠我们，这难道不令人高兴吗？所有的人都明白，不能轻视我们。这种反差对于国家、对于让我们的人认清自己是一个大国的公民，难道不重要吗？可见，我们可以取得某种成就。"

"您认为对外政策中哪些方面是主要的？"

"我不想明确提出什么目的。"普里马科夫答道，"对俄罗斯来说，对外政策的哲学在于捍卫本国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但是同时竭尽全力避免滑向对抗。'冷战'结束了，有人认为我们输了。可我不这么想。民主的俄罗斯并没有因'冷战'而失势。因此，我们不会让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受制于人，跟着惟一的超级大国走，也不会为了被文明世界接纳而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可能。我认为那是不正确的。

"无疑，我们需要修正与过去的'冷战'敌人的关系，把这种关系转变为伙伴一类的关系。我们有大量相一致的利益。存在着一些新的危险，我们应该一起奋力制止它。一切就是这样。不过，让我们说说代价吧！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应该不顾你们的利益，不顾你对形势的看法，不顾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照着北约建议的那样办，那我决不干。我的行动绝不能不顾一切。"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社会舆论对您有意义吗？"

“我们当然要考虑。在决定对外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普里马科夫说道，“我同议会各党团领导人保持接触，向杜马各党团、委员会发表演说。我们不能实行一条与社会舆论相悖的路线。”

他不喜欢美国吗？

任命普里马科夫为外交部长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件不愉快的出乎意料的事。西方知道他是情报局长和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与伊拉克首领萨达姆·侯赛因拥抱的人——就在海湾战争前夕。美国对他这次伊拉克之行感到恼火，并把他列入反美的政治家行列，虽然普里马科夫飞去见萨达姆并非他自己主动要去，而是受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委派。在阿拉伯世界，拥抱是一种礼节。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在公共场所相遇，也可能互相拥抱。

普里马科夫不能也不想回避拥抱，因为其用意就是让伊拉克首领倾听他所熟悉的人的意见，从科威特撤军，以避免一场军事行动。萨达姆·侯赛因拒绝了普里马科夫的游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伊拉克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然而，记录萨达姆与普里马科夫友好会见的镜头，美国人记住了。

在西方，普里马科夫的任命甚至与尤里·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一事相提并论，这不仅因为两人履历相似（普里马科夫也出自特工部门），而且还因为预料他准备用同样强硬和残忍的手段为俄罗斯帝国服务。美国人对普里马科夫口诛笔伐，说他主张恢复苏联的一统天下，企图恢复莫斯科对周边国家的控制；说他会损害与西方的关系，努力复活与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伊朗……的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与普里马科夫的个人交往使西方政治家稍许放了心。更不必说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展开了自己的全部魅力。

在普里马科夫任外长的那两年半时间内，整体上对外政策发生

了什么变化呢？普里马科夫认为自己主要的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俄罗斯是个大国，它不过是遇到暂时的困难，想乘机捞好处和不考虑俄罗斯的意见，是一种极其短视的行为。普里马科夫表明，凡是在俄罗斯有分量和影响的地方，他都不允许降低其分量和影响。这是其一。他将为到处扩大这种分量和影响而奋斗。这是其二。普里马科夫开始谈论起多极世界了。他指的是什么？当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即美国，而大家又全都围着它转的时候，那就糟了。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既要与西方发展关系，又要与东方发展关系，既要与我们喜欢的人发展关系，又要与我们不喜欢的人发展关系。

俄罗斯的外交恢复了与老朋友——伊拉克、伊朗、塞尔维亚的合作；公开表明了与美国有摩擦和矛盾。美国是俄罗斯喜欢把自己与其相提并论的惟一国家。在明斯克，普里马科夫说：对俄罗斯来说，白俄罗斯是“特殊的盟友，特殊的伙伴，特殊的兄弟”。

普里马科夫去了伊朗，在那里声明反对在波斯湾地区加强军事存在。谁的军舰在那里呢？美国的。普里马科夫认为必须到古巴去。他的前任根本就回避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俄罗斯在古巴没有经济利益可言，而同卡斯特罗进行空谈是浪费时间。

普里马科夫完成了长时间的中东之行，既访问了阿拉伯国家，又访问了以色列。于是，开始明显恢复过去的棋局了：美国更多地支持以色列，而俄罗斯重新开始更倾向于阿拉伯世界的老朋友，首先是同情叙利亚。

在普里马科夫成为外交部长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他打算用什么方式纠正科济列夫的错误？普里马科夫回答道：

“任何一个政治活动家对自己的前任匆忙公开作出评价，我都不认为是合适的。这不是我的作风。”

关于科济列夫的路线，普里马科夫十分婉转地进行了评论。他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演说时，就同过去“冷战”的敌人和解的问题说道：

“毛泽东喜欢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我们这里也有追随他这样

的人。”

他想说的是，在戈尔巴乔夫后期和叶利钦时期，曾经无条件地交出阵地，但是，今后不会再这样了。美国人认为，普里马科夫不论怎样都对美国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普里马科夫是否真的不喜欢美国呢？

“把他称为反美主义者不免太简单化了，而且也不正确。”前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对我说，“在普里马科夫任命为部长后，我对美国人说：任命他很好。他们气鼓鼓地说：‘好什么，他又要挑起‘冷战’了！’我回答说，不会的。然而，你们今后在决定自己的立场时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存在。不然你们一会儿认为它存在，一会儿又认为它不存在。普里马科夫可要坚定地提醒你们，俄罗斯是存在的。”

究竟为什么普里马科夫仍然被认为是反美路线的推行者呢？

“他根本不是在‘反’什么。”格尔曼·季利根斯基教授说，“如果想起‘外交政策非意识形态化’的提法，这恰恰符合他的精神。他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地区偏见，更不必说跟谁作对了。他是一个心平气和遇事三思而行的人，在政治上也是这样。不过，我想，在那里温情脉脉毕竟不多。”

就这个问题我还同一个人谈过，他非常了解普里马科夫，而且几乎毕生研究美国问题。此人就是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他曾任《消息报》驻美国记者。普里马科夫真的没有某种反对西方的综合心态吗？

“没有。”孔德拉绍夫当即答道，“综合心态，这是某种无意识的东西。而他是根据完全有意识的动机行事的。他在埃及工作时有机会分析西方的中东政策。他从中得出结论，深信西方并非那么干净。西方有自己的利益。并且使用种种手段去获取这些利益，而且这些手段并不总是那么光彩。这就使他有理由对西方的政策作出言之凿凿的批判性的评论。”

“他不喜欢美国。莫非他更喜欢像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东方

政治首领吗?"

"是什么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国家利益至上的人决定他对待同一个美国的态度呢?"孔德拉绍夫反问并答道,"是美国对待我国的态度。美国人认为,凡是对美国好的,就对全世界也是好的。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他们情愿损害别国的民族利益。这不可能让人喜欢。"

"然而,对普里马科夫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选择——倒向这一边还是倒向那一边。对他来说,一切决定于每一个具体情况。萨达姆·侯赛因不可能成为普里马科夫喜欢的对象。他是一个需要与其搞外交的人物。而且,还要讲究方式,以捍卫我国的利益。这里存在一种误解,似乎只要能与萨达姆·侯赛因保持良好的关系,普里马科夫情愿牺牲一切。这不是事实。他不过是不愿意事先事事不分青红皂白就同意美国的路线。也许,他比其他人更多地看到中东领导人的合理成分。鬼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可怕。不过他很了解这个鬼,也知道他不是天使。"

"您不认为普里马科夫所以对美国人持更多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是因为他在中东呆过几年的缘故吗?那里的人是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的。"

"美国人不喜欢普里马科夫,喜欢科济列夫。但是,科济列夫太亲美了,纵容坏了美国人。在这种背景下,普里马科夫很难与美国人建立关系,但是他建立了关系……"

普里马科夫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从事中东问题研究的。许多苏联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接受了自己的阿拉伯朋友对美国、西方、以色列、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憎恨。指责普里马科夫也这样,是荒谬的。事实是,他在中东有很多关系。他了解这些人,懂得应该如何跟他们打交道。至于普里马科夫没有许多人对萨达姆·侯赛因的那种恶感,则是另一回事。

与“铁娘子”一对一

作为一个外交家和外交部门的领导人，普里马科夫在大国的怀旧倾向与还是戈尔巴乔夫开始做的那些事之间寻求一条中庸之道，普里马科夫并不主张疏远西方。或者，确切点说，在他所理解的国家威望要求时，他才需要这种疏远。然而，美国的繁荣、走运和咄咄逼人使他下意识地受到刺激。他希望在他坐到谈判桌前时，他的背后也有这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美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俄罗斯的主要伙伴。这是客观现实。从葛罗米柯起，我国所有的外交部长都明白这一点。但是，跟美国人打交道并不简单。原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有一次说：

“我们几乎没有人善于与美国人进行富有成效的谈话。”

普里马科夫首次与美国外交官的会晤不在莫斯科，也不在华盛顿，而是在赫尔辛基，可以说是在一个中立国的地方。飞到那里与普里马科夫晤面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首次会晤中，克里斯托弗与普里马科夫制定了相互关系的四项原则：

——彼此不搞突然袭击，彼此也不使对方面对既成事实；

——相互协商；

——谋求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如果未能找到解决办法，不使事态导致对抗。

然而，普里马科夫未能与克里斯托弗长期共事。1997 年初，克林顿为普里马科夫选了一个新的伙伴——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有声望的、自信而又有些傲慢的奥尔布赖特在被任命为国务卿之前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她比普里马科夫年轻 8 岁，出生在布拉格，原名玛丽亚·扬娜·科尔别洛娃。她喜欢称自己为马德琳卡。她全家逃出了纳粹占领区，战时在伦敦度过。在那里她学会了说英

语。她的父亲约瑟夫·科尔别尔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顾问，战后被任命为驻南斯拉夫大使，后又任驻联合国代表。在马德琳年满 10 岁时，被她父亲送到瑞士学习，在那里又学会了法语。但是，过了 1 年，1948 年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科尔别尔携眷属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

奥尔布赖特是“冷战”的产儿。关于两次逃难（先是逃离纳粹分子，后是逃离共产党人）的事，她终生难忘。

在移民中，她并不是惟一攀上顶峰的人。亨利·基辛格出生于德国，也当上了国务卿。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出生于波兰，坐上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交椅。然而，她是第一位达到这种职位的女性。奥尔布赖特有一次说：

“我的一生很神奇。11 岁来到美国，我的面前展现了种种机会。我就是美国梦想的明显体现。”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稍许有点卖弄地说，她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自己在外交方面有什么天才或大才智。

“我并不怎么聪明。我不过是苦干。”

她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她在撰写题为“苏联外交界：精英史略”博士论文时，每天早晨 4 点半钟就起床。

奥尔布赖特对克林顿很忠诚。1996 年 11 月一天的深夜，当得悉克林顿竞选连任获胜时，她竟在联合国安理会自己的办公室里跳起了当时流行的“马卡连那”舞。

人们发现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有某种共同之处。两位女性都被报刊描绘为“铁娘子”。奥尔布赖特同撒切尔一样，也嫁给了一个富翁，早早就生了两个孩子，后来也都从政。她还跟撒切尔一样，在对外政策和外交这个传统的男性行业里十分自信。

《华盛顿邮报》探寻出了奥尔布赖特的犹太人的根，并报道，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 3 人、叔父母和一个堂兄弟被纳粹杀害。奥尔布赖特说，她的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是犹太人。她的父亲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出身，生怕这会影响她的外交前程。奥尔布

赖特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1959 年嫁给了约瑟夫·奥尔布赖特以后皈依了新教圣公会。

阿拉伯国家断定，她肯定站在以色列方面。而以色列却担心她相反跟亨利·基辛格一样，故意严厉对待以色列人，以表明自己不偏不倚。事实上，奥尔布赖特只忠于美国的利益。同事们把她比做斗牛犬：

“她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对手撕咬成碎片。”

她竟会说出一些很不礼貌的话，特别是对古巴人和卡斯特罗。她从内心鄙视卡斯特罗。在古巴武装力量击落两架民用飞机后，奥尔布赖特公开说菲尔德·卡斯特罗身上没有任何男子的东西。——她使用的词汇异常严厉，对男人来说是极端侮辱性的，特别是对拉丁美洲人。这使那些过于拘礼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但却让克林顿感到高兴。他称赞她在外交上有原则性。然而，奥尔布赖特并非“铁娘子”，不如说她是“铝娘子”。铝是一种坚固的金属，经受得住巨大的超负荷，用以制造飞机，但又有足够的弹性。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是绘画的鉴赏家，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绘画艺术。她乐于与人交往，但保持距离。她是个知识分子型人物，教授的女儿，自己是哲学博士。因此，对普里马科夫院士来说，是一个合适的伙伴……

当时，我问过普里马科夫，同奥尔布赖特搞好关系他是否感到困难？美国人如此不友好地对待他的任命，他是如何与美国人建立关系的？

“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办法。”普里马科夫答道，“我同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有着很好的关系。她不设城府，因而是个可以揣度的人。最坏的是，你不知道一个人明天会说什么和做什么，今天是一个样，明天又是一个样……常有这样的人。但奥尔布赖特是个规矩人。她为美国的利益而斗争，这是自然的。但是，她懂得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重要性。我同她保持密切的接触。”普里马科夫指了指紧挨着的台子上的一排电话机说。“我常同她电话交谈，也

常会面。”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普里马科夫不仅在谈判室与她晤谈，而且还设家宴晤谈。在非正式场合设宴殷勤款待女国务卿，并不意味着愿意赞同奥尔布赖特的立场。

不仅普里马科夫的上任意味着方针的变化，随着奥尔布赖特的就任，美国政策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先前似乎给予了莫斯科优惠待遇。现在，这个阶段结束了。俄罗斯社会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有点歇斯底里。这好像是一个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对什么都恐惧的人的心理状态，害怕北约，害怕西方，害怕大鬼小鬼。不论美国人做什么，反应只有一个——这是反对我们！

对此国务院奥尔布赖特的副手斯特劳布·塔尔博特（此人是克林顿的朋友，当过记者，曾翻译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是俄罗斯问题专家）说明了美国人的看法：

“俄罗斯的精英认为，克林顿政府的真正战略是力求弱化俄罗斯，乃至分化它。俄罗斯存在一种倾向，认为处处都是针对它的阴谋。鉴于这种猜疑的心态，我们确实变得合作少了，而竞争多了。可是，反过来才符合我们的利益。俄罗斯政治家可能成为这样一个概念的人质，这一概念认为凡是能刺激美国人或给美国造成麻烦的事实际上都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萨达姆的宫殿

普里马科夫与美国人之间的争论有几次似乎越出了通常辩论的范围。这是由伊拉克和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引起的。这是普里马科夫在外交部长职位不得不花最大力气解决的两个热点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在1991年通过决议禁止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销毁其储藏的这类武器及其生产手段。联合国组成了国际核查小组，对伊拉克全境进行搜查，以便找到这些武器及其生产地

点。核武器和导弹装置的问题比较简单，较快就找到了。但是，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生产设施如此之多，伊拉克人又把它藏得如此隐秘，以致联合国核查人员的工作拖延了数年。从一开始就作出了决定，在核查工作未结束之前，对伊拉克的制裁就不能取消。

当几个大国行动一致时，萨达姆·侯赛因忍耐着。而当普里马科夫成为外交部长后，又看出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发生了矛盾，萨达姆立即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宣称，联合国核查人员从事间谍活动，必须将他们驱逐出境。美国和英国立刻就说，必须使用武力迫使萨达姆就范。在他们看来，对萨达姆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就是对伊拉克的军事目标实施空中打击。

普里马科夫不仅不支持美国人，而且还激烈反对。他竭尽全力反对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普里马科夫实际上承担起了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的调停人的职责。

鲍里斯·叶利钦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去了私人信。后者派了自己的老战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到莫斯科。塔里克·阿齐兹英语说得相当好，貌似教授，在外部世界面前代表萨达姆。在萨达姆的圈子里，他是一个例外。他是基督教徒，不属于统治伊拉克的提克里特帮。可能正因为这样他在血腥的清洗中才幸免于难。他不是总统的竞争对手。一个基督徒永远也不会成为伊拉克天字第一号的人物。萨达姆可以不用怀疑塔里克·阿齐兹企图推翻他。也许，这是他惟一可以信任的人。

塔里克·阿齐兹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耳目。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说，阿齐兹是一个高级信使，而不是受权作出决定的人。尽管这样，为了强调俄罗斯的立场的严肃性，叶利钦总统亲自接见了他。

普里马科夫的建议在于让伊拉克不要阻挠核查小组的工作，作为回报，俄罗斯将争取逐渐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普里马科夫的逻辑是，应该对伊拉克不仅仅是制裁，还要给以鼓励。既然大部分核查工作已经完成，这就是说，可以放松对伊拉克的制裁了。否则，

伊拉克人就看不到与联合国合作的任何意义了。在同塔里克·阿齐兹谈判之后，普里马科夫建议英国、法国、美国和中国（即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举行紧急会议。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为了及时赶到日内瓦，打破了自己所有的计划。俄罗斯的计划被采纳了。普里马科夫表现出他有能力调解最复杂的国际危机。

但是，美国和英国不愿意提前解除制裁。他们认为，首先是萨达姆必须彻底履行联合国的所有要求。1998 年 1 月，萨达姆·侯赛因又要求赶走联合国的所有核查人员。于是，俄罗斯的外交又忙起了伊拉克事务。

谁也不喜欢萨达姆·侯赛因。在俄罗斯外交部里任何人都会说(非正式地!)，他的制度是伊拉克的不幸。但是，如果说美国人认为，迟早会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那么，普里马科夫及其阿拉伯问题专家的看法则相反：任何对伊拉克的压力只会巩固他的地位，因此，应该对伊拉克独裁者的存在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

同伊拉克的谈判持续了数周，终于谈成功了。核查人员回到了伊拉克。然而，1998 年 10 月下旬，一切又反复了。这次，克林顿总统失去了耐心，坚决要惩罚萨达姆·侯赛因。

普里马科夫又设法对自己的伊拉克朋友施加影响。萨达姆一直坚持到最后。只是在美国最后通牒的期限即将过去，美国携带巡航导弹的轰炸机已经腾空的时候，他才准许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回到伊拉克。于是，克林顿下令返航。不过，克林顿警告说，下一次要是打击伊拉克，他就事先不发出警告了。1998 年 12 月 17 日，这样的事果真发生了。在萨达姆·侯赛因再次阻挠联合国核查人员工作之后，美国和英国连续 3 天，用巡航导弹轰炸了伊拉克，空军也参加了袭击。

美国人和英国人试图炸毁生产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工厂，还袭击了军队的指挥所、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营房以及他的宫殿。为了建造那些宫殿，大概耗尽了国家财富。波斯湾战争之

后，萨达姆用了20亿美元建造48座总统宫。这些宫殿有比凡尔赛宫还出色的瀑布和人工湖。

有人认为，对伊拉克的打击没有任何军事意义，萨达姆只会对此感到高兴。这并非如此。这对萨达姆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绝望地看着他的战争机器在粉碎，他心爱的宫阙在倒塌。

俄罗斯就对伊拉克的打击一事作出了异常强烈的反应。叶利钦总统和普里马科夫总理不惜使用强烈的措辞，并且多年以来第一次从华盛顿和伦敦召回了俄罗斯大使。

北约东扩

普里马科夫的政治路线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并造成许多人崇拜他。

普里马科夫一到外交部，就提出了必须阻止北约扩大的口号。这是普里马科夫和对外情报局首先敲响的警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接近俄罗斯的边界！早在1993年，情报局就发表了“北约扩大的前景与俄罗斯的利益”的公开报告。普里马科夫的意见与当时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的意见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科济列夫抱怨说：“有人向总统灌输说，存在反对俄罗斯的阴谋，国家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围了。我设法做的是，外交部发出的信息细流不同于这股湍流，不过，我失败了。”

安德烈·科济列夫认为，特工部门向总统呈报的情报是失真的。对外情报局不同意他的意见。

“普里马科夫是要警告西方：你们要扩张，那就请你们注意，这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对外情报局的新闻秘书塔季扬娜·萨莫利斯说，“我不认为，情报局是想要跟外交部的意见对着干。我亲自听到过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在人家议论科济列夫时说了许多恭维他的话。总之，普里马科夫不是那种说同事坏话的人……”

科济列夫任外交部长时劝总统说，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再把北约设想为敌人，因为以后必须要同北约共处并成为伙伴。而情报局则说，北约接近俄罗斯边界是危险的。

"情报局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报告其分析人员所考虑的那些东西。"塔季扬娜·萨莫利斯说道。"当然，他们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总统自己说过，他有11个情报来源。总统作出了抉择，赞同情报局的意见。我要是处于外交部的地位，要怪罪的不是其观点占了上风的人，而是接受了这个观点的人。我不完全清楚，他们为什么怪普里马科夫，而不是去怪总统……"

关于东欧国家申请加入北约组织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他们得以摆脱莫斯科的监护之后立即就提出来了。比尔·克林顿总统认真地考虑北约扩大的问题，是在1993年4月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揭幕的时候。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和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利用尚未开始致辞的一点时间，简直是把克林顿逼到了墙角，千方百计说服他接受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

前任总统乔治·布什没有顺从他们的愿望。克林顿入主白宫才3个月，就比较关爱起东欧客人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原则上都不反对扩大北约。国防部则不愿意为此破费，而国务院主要的苏联问题专家斯特劳布·塔尔博特警告说，这会使莫斯科愤怒。

经过几个月的考量以后，美国人决定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1994年1月，克林顿宣称，原则上北约将要扩大，但这是个未来的问题。到了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时，东欧国家大失所望：所有盼望加入北约的国家的申请全都被拒绝了。

美国不愿意激怒俄罗斯。西欧不希望承担起保卫年轻的民主国家的责任，无论是对俄罗斯的防范，还是他们彼此之间的防范。更不必说还要拿出一笔数字惊人的金钱来使东欧的军队及其装备（苏联式的）符合北约的标准。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面临在最近3年饱尝嫉妒和民族自尊心受

到伤害的痛苦。他们苦恼地认识到，无论是对西欧还是对俄罗斯来说，更不必说对美国，与东欧的关系并不摆在优先之列。西方的主要伙伴仍然是俄罗斯，因此，西方明白，向俄国人表明没有人企图孤立他们是何等重要。

以鲍里斯·叶利钦的名义向西方一些国家领袖发去了一封抗议北约东扩的密信。俄罗斯外交官在私下的谈话中对西方伙伴说，北约向东扩大将导致俄罗斯国内反民主势力的加强。这暂时起到了作用。美国政治家对以下说法表示同意，即战争威胁不会来自于俄罗斯，东欧国家需要的不是军队现代化，而是发展经济。他们急需加入的不是北约，而是欧洲共同体。

然而，一切还仅仅是开始。在美国居住着 2100 万东欧移民。他们开始用电报“轰炸”白宫，要求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就选票而言，这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势力。恰恰总统大选临近了。

克林顿在第一次竞选时说，他对外交政策不感兴趣，他要改善美国人的生活。第二次竞选时，他已乐于谈论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成就了。他需要一个响亮的竞选口号，于是，白宫里的人就绞尽脑汁想出来了：

“里根摧毁了柏林墙，布什统一了德国，而克林顿将统一欧洲。”

舞会上的灰姑娘

主要的不是克林顿的竞选战略。人们说，这是北约在扩大。但是，事实是东欧国家简直是要破门而入。他们要求接纳他们。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没有理由对他们说“不”。

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可以遇见 3 种主要职业的人士：一种是外交官，他们力图保持沉默；一种是军人，他们只说准许他们说

的话；三是情报人员，他们总说让对方悦耳的话。对于莫斯科来的客人，所有北约总部的人都众口一词地反复说：

“我们最不情愿的是让俄罗斯以为北约扩大是挑战。我们十分关心的是俄罗斯不致陷入孤立。不过，如果东欧国家请求接纳他们，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而在俄罗斯，许多人认为北约扩大是直接的战争威胁：“敌人已经到了斯摩棱斯克附近！”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之后，西方为什么还要保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是分明为了摧毁强大的俄罗斯吗？还在1991年，北约领导人就曾说过：“大规模进攻的威胁真正消失了……”但是，欧洲国家的安全还没有保证。存在着地区性的、小规模的战争危险。例如，众所周知，土耳其与希腊处于经常的冲突之中，只有他们的北约成员国地位才能遏制彼此之间的战争。北约视防止冲突和克服出现的危机为己任。

北约的许多成员国都是较小的国家，如果置身于集团之外，就会感到自己易受伤害。北约集团保证其参加国不得彼此动武，并且保证任何一个参加国不致在没有取得全体同意的情况下冒险进攻某个国家。北约保障西欧的稳定与安全。那些认为北约扩大不是灾难的人说，危险根本不是来自西方。为什么我们在没有危险的地方，在完全是文明国家的地方看到危险？

同时，俄罗斯还同在大国博弈中充当小卒的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争吵。他们为了争取北约接纳他们而花费了多少时间？可是，北约让他们排队等候，还故意拖延（其中也有应莫斯科请求的原因）时间。他们切盼加入北约的心情，就像“灰姑娘”认为会遇到心爱的王子而想参加舞会的心情一样。他们认为北约就是那个能遇到王子的俱乐部。终于，他们拿到了入场券，高兴得双手直抖，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说：我可不许你们……

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会说，我们过去的华约盟国加入北约，这个集团接近我国的边界，纯粹是一件坏事。为什么是坏事？可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因人而异，这要看他的政治观点、个人气质、经

历和对世界事务的了解程度而定。反对北约的人说，它破坏常规武器的平衡，使美国的核武器部署在靠近俄国领土的危险地方，重新瓜分欧洲，使俄罗斯在欧洲孤立，以及不论怎么说都存心不理会俄罗斯的意见，而这被看成是一种明显的侮辱……

在比较严肃的讨论中澄清了一个问题，即北约扩大毕竟不会对俄罗斯构成战争威胁，因为：第一，莫斯科拥有足够的核武器；第二，只有天生病态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设想，幸福的欧洲人会卷入一场大战。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同，北约集团本身及北约各国自身都渴望理顺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直到建立起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一种经常有效的磋商机制。

那么俄罗斯究竟为什么如此坚决反对北约扩大呢?

答案应该在政治心理方面去寻找。这是长期对西方不信任，再加上对西方、对美国人极度憎恨的结果。这种憎恨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不买我们的账!"对苏联是买账的，因为怕它；而对新的俄罗斯则是不买账的，因为现在不怕我们。在以前，如果某个东欧国家因为某种奇迹而获得决策自由……的话，北约也是不敢把它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的。

西方世界过去对苏联的恐惧曾让俄罗斯社会不小一部分人感到高兴。由于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地位的变化而产生的下意识的愤怒，正是反对北约扩大的心理基础。在围绕北约扩大问题展开讨论之初，许多人兴高采烈地参加进来，因为他们在东西方对抗结束后感到寂寞。因北约而引起的争论，可以说使他们恢复了生机。凡是他们在苏联时代学会的东西又用得上了。

俄罗斯的信息流重新用对抗的线索来报道周围的世界。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众多报刊的普通读者，获得的信息都是说，没有人愿意俄罗斯强大和繁荣，我们的朋友并不是那种真朋友，我们的伙伴实际上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莫斯科真心地认为，如果西方要谈伙伴关系，他就应该一切按照莫斯科希望的那样行事。没有人想到，东欧国家的民族利益是什么，他们想走获得巨大成就的西欧国

家的道路，他们想加入欧洲各种机构不过是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而已。北约各国也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利益，他们愿意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但是，不想也不可能把中欧和东欧的小国从自己身边推开。北约组织不是封闭性的集团，并且从一开始就对新成员开放。

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广大的公众不愿意换一种眼光看待北约，也不愿意看见北约的存在对俄罗斯是有利的。首先，北约集团限制成员国的政治和军事野心，遏制欧洲的军备竞赛。天知道，如果不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不知什么非常可怕的事会在欧洲爆发哩。而且，北约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约的兵力裁减了三分之一。过去准备在边境迎战苏军的、在前沿部署的强大兵力已经后撤和解散。北约已大大削弱了。北约走的是同俄罗斯军队一样的道路，摆脱庞大而昂贵的军队，大力转向建设精干的、机动的快速反应部队。如果要简单地说，那就是在与北约的争论中，俄罗斯用不假思索的强硬而浮夸的空谈把自己逼到了墙角。这是一个错误。对俄罗斯的威胁不再来自西方。惶恐不安的原因应该在别的地方寻找。

美国人对俄罗斯政治家的论据抱怀疑态度。他们不认为北约扩大是孤立俄罗斯，而一切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则建议和睦地协商解决。至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后果，美国人则感到全然困惑不解。当时的政府首脑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公开承认，匈牙利或波兰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并不危险。他说，危险在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会责怪总统和政府在制止北约方面无能。

美国人回应说，对我们而言，这不是论据。总统和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帮助社会舆论形成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如果总理明白北约接纳匈牙利和波兰不会危及俄罗斯的安全，那他为什么不向自己的同胞说清楚呢？相反，总统和政府却参加民族主义分子的大合唱，实际上采取了与他们同样的立场……

在对北约的政策上，莫斯科曾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减少与西方的关系，武装起来和寻求新的盟友。譬

如，号召建立反北约组织，即与北约集团对抗的国家联盟。虽然很难想象，同谁可以建立这个组织。加入独联体的国家立刻就拒绝了。中国更早就声明过不参加任何集团和联盟了。第二种方案是：在反对北约扩大的同时发展与该集团的伙伴关系。

普里马科夫否定了第一种方案。如果断绝与欧美的关系和企图复苏军工综合体，受害最大的会是俄罗斯自己。

指望西方自己放弃北约吸收新成员国的主张而发动的宣传攻势没有奏效。应该开始谈判，以期通过讨价还价争取到最有利的条件。

在莫斯科开始展开反对北约扩大的运动时，我在布鲁塞尔与当时负责对北约关系的大使维塔利·丘尔金谈过话。他惊讶地说：

“为什么我们国内有如此悲观的情绪？说谁也不买俄罗斯的账是不对的。首先，是买账的。其次，可不能当真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依照我们的愿望行事！需要在布鲁塞尔蹲下去，钻进任何一个细节，深入体验才行。而且，北约的人愿意这样。问题出在莫斯科，无论怎样也决定不了怎么办。外交工作应该是积极的，进攻性的。绷着脸简直是荒唐。抱怨整个世界，这是什么世界外交史上的先例？

“对北约主要不满的是：你们不同我们协商！如果我们自己不建立这个协商机制，不创造信任气氛，那人家又如何跟我们协商呀。然而，这是一条双行道。如果我们想让布鲁塞尔了解和考虑我们的观点，那就应该准备好以同样的尺度考虑北约的立场。”

“这对我们有压力”

普里马科夫与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会谈了整整一年。北约秘书长——这是一个负责协调各成员国利益并代表他们说话的政治人物。身为物理学教授的索拉纳过去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80

年代积极参加过反对西班牙政府决定加入北约的斗争。是一个变节者吗?

“那是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情况,”我与他在布鲁塞尔交谈时,他如是说,“自从那时以来,无论是世界,还是北约自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合理的东西,现在就不再那样了。”

他承担了北约整个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任务。他必须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北约组织起初就是为了对抗它才成立起来的。

索拉纳有用之不竭的精力,在社交中颇具魅力,善于妥协与和解。索拉纳令其伙伴十分喜爱,因为他有惊人的工作能力和天赋的魅力,对凡是需要赢得其心的人他都愿意登门造访。

“形象地说,你得让谈判对手触摸到你。”索拉纳说道。

他能记住所有人的脸,并且不吝惜时间与人交谈和讨论。他不是通常的、喜欢发号施令的国际组织的官僚。他喜欢自己的事业,为人和善,且有耐心。似乎没有人不对索拉纳产生好感,同时,他又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当他说“不”、表示拒绝时,也没有使任何人觉得他伤人。索拉纳比自己的俄罗斯伙伴活跃和热情。这些俄罗斯外交官在同来自美国和西欧的过于拘泥礼节和细节的人交谈时,通常具有优越性,但在索拉纳面前则丧失了这种优越性。在第比利斯长大的普里马科夫与西班牙籍的索拉纳是一对合适的对话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普里马科夫没有任何王牌。

普里马科夫自己叙说当时的情况是:

“俄罗斯不可能也不想否决别国加入北约组织。然而,俄罗斯有权说明不利的地缘政治形势。”

阻止北约扩大未获成功,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经过六轮谈判之后,普里马科夫与索拉纳就可以谈妥的问题取得了共识。北约组织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即不在自己的新成员国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不将作战部队推进到俄罗斯边界附近,以及削减欧洲的重武器。同时,建立同俄罗斯的经常磋商与合作机制。

1997 年 5 月 27 日,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在巴黎签署了关于俄

罗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的基础性文件。叶利钦在巴黎演讲话时说道：

“俄罗斯仍然对北约扩大持否定态度，但是，对各国准备考虑俄罗斯合法利益的意愿则给予应有的评价。”

一年后，就俄罗斯与北约的伙伴关系进行了初步总结。1998年5月底，在卢森堡举行了俄罗斯北约联合常设理事会外长级会议。普里马科夫出席了会议。他在讲话中说道：

“在走向基础性文件的道路上，我们走了很久，磨合双方的立场，终于签署了各方都满意的文件。第一次双方军人开始经常举行会晤。他们彼此之间甚至比政治家容易商谈。目前，我们正努力使北约的军事战略与我们的国防战略对接起来，以免互相冲突。是的，合作正在进行。现在，甚至我与索拉纳的会晤也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尖锐的问题了。既可以在政治领域又可以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不过，对我们来说，这是把北约扩大的后果减至最低限度的一种办法。我们对北约扩大仍旧持否定态度。如果不是北约东扩，整个合作会更富有成果得多……”

晚上，在谈判和会议之后，在普里马科夫下榻的宾馆房间里，我问这位部长：

“北约即将扩大使局势趋向恶化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部长显得疲倦，脸色阴沉，微笑不如平常那么多。身边还有他忠实的助手罗伯特·马尔卡良和负责北约事务的副部长尼古拉·阿法纳西耶夫斯基。

他回答说：“有现实的东西。也有心理因素，这也需要考虑。这件事对我们有压力。虽然我们有了基础性文件，稍许缓和了局势，但是，扩大在进行，北约正在接近我们，这对我们是个压力。如果不是北约扩大，我们本来可以更多地谈维护和平，谈防患于未然的外交，以及谈如何消除热点的紧张局势。如果不是北约扩大，我们本来也可以不必彼此盯着……”

普里马科夫的回答很确切：北约扩大——这不是军事问题，而

是心理问题。

北约仅次于秘书长的第二号人物是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国将军克劳斯·诺曼，他经常参加与普里马科夫的谈判。我同他谈过两次话。

“当您同俄罗斯的将军握手时，您是怎样想的：是潜在的敌人，还是伙伴，乃至是可能的盟友?”我问诺曼将军。

“关于敌人，再也说不上了。这是以前的事了。你们过去也是这样看我们的。也许，以前你们会看我有没有长着犄角和尾巴。你们的将军跟我们一样，也在关心如何使世界更安全一些。”

“俄罗斯许多军官现在仍然不相信北约是爱好和平的。”

“这我知道。我们西方也有人还认为你们的国家至今还像苏联一样。然而，苏联没有了。有的是一个民主的俄罗斯。你们的军官应该看到现实——北约对俄罗斯不是威胁。我们也不认为俄罗斯对我们是威胁。”

“西方的军人真的不再认为俄罗斯是潜在的敌人了吗?”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你们的政治家的和平意图。自然，我们记得，你们有摧毁世界的能力。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应该说，这个威胁从来还没有变得如此之小。”

在北约总部，东欧国家的代表高朋满座，他们在讲述本国的事。北约人士也在考虑他们的意见。北约总部走廊里少的是俄罗斯人，他们本来应该来此诉说俄罗斯现在发生的事。俄罗斯军界抱怨北约孤立俄国。他们曾指望能够在北约内部影响决策，并且为没有获得否决权而气愤。然而，协商和合作恰恰可以从内部影响北约。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的积极性。

他为什么同意了?

普里马科夫在外交部长的职位上自我感觉非常好，并且认为，这一职务将是他的政治生涯完美的终结。然而，这项工作干了还不到3年。在1998年8月爆发的最尖锐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后，他接任了总理的职务。

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对我说：

“如果在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当上总理前一个月有人告诉我，他将领导政府，那我会哈哈大笑的。我对他同意出任这项职务感到惊讶。当任命他为总理时，我甚至吓坏了。我替他害怕。在如此不恰当的时候，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从来还没有一个真心诚意拒绝这项职务的人成为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不愿意当总理。他从来不追求最高权力。而且，在被任命为总理一个月后，他将年届69周岁。他认为这个年纪已不适于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了。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明白，不能再拒绝了。1998年9月，政治危机加深了经济危机，国家在走向崩溃。在任命他之前的半年里——从3月底至9月初，俄罗斯的事态迅猛发展，但是，在8月17日这个星期一以前，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国内实际发生的事却傻乎乎地全然不知。

大概一切都始于1998年3月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突然下野的时候。接替他的是一个任何人都还不了解的谢尔盖·弗拉季列诺维奇·基里延科。他向我叙说了3月23日他受命的那一天他与叶利钦有过如下一番谈话：

“您明白国内发生的事吗?”总统问道。

“明白。”基里延科答道。“我们正在陷入债务危机。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后果将十分令人忧虑。”

“您认为能够摆脱危机吗?”

“能够。但是，为此将不得不采取最强硬的行动。”

“您就负起责来干吧，谢尔盖·弗拉季列诺维奇。”

基里延科认为需要预先说明惟一的一个条件：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不管政治，而且我也没有管政治的愿望。”

叶利钦赞许地点了点头道：

“对，而且也不需要嘛！上届政府的主要错误就是过分干预政治。而政府的事就是抓经济。您抓经济计划，把政治留给我。”叶利钦对新总理作了如此嘱咐。

基里延科下野后作出的结论是：他的主要错误绝不是作出的8月17日的决定，而是有意不管政治。他说：

“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无法纯粹从经济上去解决，只能用政治手段去解决。”

借贷度日

任命基里延科对反对派来说是一件不那么愉快的、意想不到的事。谢尔盖·弗拉季列诺维奇用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获得杜马对他的任命的批准，因为杜马不愿意看到又一个年轻的改革派坐上这把交椅。国家在没有政府、期待解散国家杜马和举行新的议会选举的情况下度过了一个月。

5月21日，基里延科完成了组阁。就在这时爆发了一场轨道战，矿工们断绝了铁路交通。于是，全国几乎立刻就进入了债务危机的最后阶段。谢尔盖·基里延科总理在国家杜马作施政纲领报告时警告说，俄罗斯的经济遭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沉重的打击。这场危机的后果全国简直还没有看到。人们耳闻但不相信：他谈论什么亚洲危机？人家泰国、印度尼西亚出了点事，这关我们什么事？实际

上局势比基里延科当初想的还要糟。当他在白宫总理办公室坐定以后，他才发现，国家收入甚至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

基里延科认为，出路只有一个——大力削减国家开支。他请杜马代表要么批准限制使用预算，要么准许政府在这方面自行其是，如果他们不愿承担这种责任的话。杜马否决了政府的反危机计划。西方拒绝援助：你们请我们援助，而你们自己彼此都无法取得一致。倘若7月通过反危机计划，就不会发生8月17日的事了。国家就会用紧缩预算的办法度日，而不会迟迟由普里马科夫政府来编制这样的预算，也不会有国家在秋天所经历的那些痛苦。

1998年8月初，由于卢布汇率下跌，银行濒临破产的边缘。私人银行和公司无法偿还硬通货贷款。基里延科决定挽救银行和保护国库，后者本应按时对国家短期债券还本付息。

政府允许私人借款者在最近90天内不向外国贷款者偿还任何债务，同时决定延期偿付国家短期债券和公债券。延期3个月本应能挽救经济。

8月16日，星期日，基里延科来到总统面前说，政府准备辞职，并承担一切责任。

"如果有可能由一个获得更多政治支持的政府取代我们……政府就不必为已经作出的不受欢迎的决策承担责任了。"

叶利钦说，不要辞职，要照常工作。他无法设想第二天国家会出什么事。

切尔诺梅尔金东山再起

8月17日，星期一，政府决定公布之后，国内出现了一片恐慌。这种恐慌将政府的良好愿望尽付东流。人们全都急忙抢购外币，当然，这是有钱可买的人。兑换点都关了门。存户纷纷跑到银行提取存款，而银行却无法返还全部存款。8月21日，星期五，

国家杜马各党团表示不信任政府，要求基里延科辞职。在奥伦堡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紧急回到了莫斯科。他正确地算计到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在总统周围正为寻找一个能挽救危局的人物而急得团团转。切尔诺梅尔金第一件事就是亲自直奔国家杜马去与代表们商谈。他对他们说：

“是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基里延科同志不知所措了，他的小伙子们也各奔东西了。”

切尔诺梅尔金建议成立联合政府，各党派都放弃政治斗争，派遣精兵强将进人政府，共同努力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据切尔诺梅尔金说，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支持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也支持他。“人民政权”议会党团的这位领导人说：“切尔诺梅尔金好就好在他不需要从头学起，他全都知道。”

8月22日，星期六晚上，总统办公厅主任瓦连京·尤马舍夫到总统别墅给叶利钦送来两项总统令草案——一项是关于基里延科辞职，另一项是对切尔诺梅尔金的任命。8月23日星期日上午，叶利钦召见基里延科。基里延科在去见总统的途中明白过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返回时已经不再是政府首脑了。叶利钦在与基里延科道别后，立即请来了住在邻近的切尔诺梅尔金，提议由他组建政府。切尔诺梅尔金愉快的接受了提议，但是，提出了条件。他要得到比过去大得多的权力，而总统则要同意限制自己的权力。切尔诺梅尔金努力以求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必须得到杜马的支持，着手为反对派争取多年来尚未争取到的东西——要总统放弃无限权力。他以为，反对派的最大夙愿就是修改宪法，给杜马和政府分配更多权力。切尔诺梅尔金建议杜马的主要党团起草一项政治协定，一旦总统签署这项协定，杜马就自动批准切尔诺梅尔金任总理。

总统处于一种什么都会同意的状况。那些日子好像总统重病缠身，十分虚弱，眼看着就要自己提出辞呈了。叶利钦真的签署了政

治协定。杜马一片兴高采烈：我们胜利了，总统屈服了，危机结束了。然而，8 月 30 日星期日晚上，共产党人突然拒绝了这个协定，因而也就是拒绝支持切尔诺梅尔金。

8 月 31 日星期一，在国家杜马表决时，切尔诺梅尔金才获得 94 票，有 251 个代表投了反对票。

叶利钦随即再次提请杜马批准他为总理。9 月 7 日星期一，杜马又一次拒绝批准这项任命。投票结果是：138 票赞成，273 票反对。

美元汇率一下子猛涨。外汇交易所不得不停止了交易。看来国家正在陷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混乱之中。后来，在批准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后才清楚，先前卢布暴跌的客观原因并不存在。起作用的只不过是非经济的因素——社会陷入了恐慌状态。

对切尔诺梅尔金任命的表决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即第三次表决。如果杜马再说“不”，根据宪法总统即可解散杜马，提前进行杜马选举。作为对策，杜马代表们狂热地准备动用弹劾总统的程序——这将剥夺总统解散杜马的权力。

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知如何是好。究竟是冒险坚持己见，还是另行物色一位新的人选呢？一些人认为，应该第三次提名切尔诺梅尔金，因为代表们在最后一刻一定会害怕解散杜马而投赞成票。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代表们不愿意杜马被解散，因为在拥有强大的杜马机构即代表特权的条件下准备选举是一回事，而在决定性时刻沦落街头，一切从零开始，则是另一回事。代表们春天的时候已经手下留过情，在一片抗议和愤怒之后，还是在第三次表决时投了基里延科的赞成票。然而，他们害怕再次表现出有害的缺乏原则性，害怕再次在选民面前蒙受耻辱。因此，第三次反对的风险太大。

为了对付解散议会，代表们可以启动弹劾程序。那时国家会陷入各权力机构互不承认的非常可怕的状态。而叶利钦已经不是 1993 年那样的人物了。

“劝说劝说普里马科夫吧!”

有人建议叶利钦考虑莫斯科市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为总理人选，说他会管理，能胜任政府首脑的角色。国家杜马表现出了主动性，向总统提出了一长串总理人选名单。他们是：议会经济政策委员会负责人尤里·马斯柳科夫，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著名银行家维克托·格拉先科，联邦委员会主席叶戈尔·斯特罗耶夫，以及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议会“亚博卢”党团领袖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在杜马讲坛上突然说，有一位人选会让各种政治力量都觉得合适，他就是外交部长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这个建议确实是皆大欢喜。

9月8日星期二，普里马科夫发表声明：

“感谢所有提议我为政府总理人选的人。但是，恕我坦言，对此我不能应允。”

国家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银行关门。工资无从支付。人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购买食品、药和各种东西。全国一片悲观失望的情绪。所有的人都面临失业、空荡荡的货架、寒冷难熬的冬天、社会动荡和独裁。截至8月17日的生活，令人觉得尽管不是美好的，但至少也是完全正常的。人们情愿任何一个人来当总理，只要他开始行动起来。

切尔诺梅尔金在第二次提名未获批准后曾建议普里马科夫和马斯柳科夫出任他的两位第一副手。普里马科夫答应了。总统办公厅主任瓦连京·尤马舍夫、安全会议秘书安德烈·科科申和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亚斯特任布斯基来到了叶利钦别墅。亚斯特任布斯基建议提名卢日科夫为总理人选，说道：

“卢日科夫一向拥护总统，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复杂的情况，都一贯如此。有人说，他现在反对您。依我看这是诽谤。我亲

自同尤里·米哈伊洛维奇[1]谈过。他请我转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他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概念。不过，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卢日科夫还是下届大选时一个现实的总统候选人。”

安德烈·科科申支持亚斯特任布斯基的意见。尤马舍夫则不同意。他说：

“卢日科夫权欲熏心，咄咄逼人，对任何荒唐的事都无所顾忌。此外，一旦卢日科夫当上总理，难道他在2000年大选前会克制自己不企图夺权吗？当然不会。”

叶利钦说考虑考虑，然后就请他们全都打道回府。可是他几乎马上又给坐上汽车里的尤马舍夫打电话说：

“劝说劝说普里马科夫吧。”

不管怎样，这是叶利钦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总统的马拉松》中说的，该书由瓦连京·尤马舍夫代笔。对亚斯特任布斯基和科科申来说，这次别墅之行的结局是丢了乌纱帽，因为叶利钦怀疑他们充当卢日科夫的“密探”。

叶利钦玩了一个三重游戏：对杜马施压（“我没有别的人选了，这是一个已决定的问题，有没有你们，总理都是切尔诺梅尔金”）；说服切尔诺梅尔金不要坚持提名自己（“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不能第三次提名您作候选人了，在今天的政治局势下我们无权解散杜马”）；通过尤马舍夫劝说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

尤马舍夫曾数次会见普里马科夫：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关于我们怎么办您有什么建议？”

普里马科夫答道：

“提名尤里·季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吧，他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家。”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您一定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一个共产党人当总理的。难道我们去解散

---

[1] 卢日科夫的名字和父名。——译注。

杜马吗?”

事实上叶利钦苦于无奈曾准备接受任何一种方案。尤里·季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后来曾告诉记者，他曾应邀直接从休假地赶去见总统。9月10日上午，他抵达克里姆林宫。先是总统的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跟他谈了话。她说：

“现在爸爸要提议您出任总理。无论如何，请不要推辞。”

叶利钦确实曾建议过马斯柳科夫当总理。他回答说，由于他是共产党，国内政界有部分人士不会欢迎这项任命。马斯柳科夫说，现在需要像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这样的人物，而他愿意出任负责经济的第一副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总之，叶利钦先后3次建议普里马科夫领导内阁。最后一次面谈是在9月10日上午。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诚恳地推辞。他不愿意承担实际上无法解决的任务。他对叶利钦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这样的重担不是我这把年纪能挑得起来的。您应该理解我。”

这时，在总统会客室里向他走来的有尤马舍夫、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和总统礼宾司司长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后者特别性急地说：

“您怎么能考虑自己哩！难道您不清楚，我们面临什么？8月17日一下子毁了经济。没有政府。杜马要解散。总统身体会受不了。我们濒临完全失去稳定的边缘!”

同一天，普里马科夫、切尔诺梅尔金、马斯柳科夫和尤马舍夫都在叶利钦那里。他们全都又劝说普里马科夫。最后，他答应了。叶利钦签署了普里马科夫的任命令。此事立刻通知了各通讯社。外交部里一片伤感的情绪，全国则普遍松了一口气。

普里马科夫还必须得到杜马的批准，组成政府，提出施政纲领，但是，主要的——解散杜马、弹劾总统、无政府状态、在经济崩溃的背景下吉凶未卜的政治搏斗等种种危险都已经过去了。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在杜马诚恳地说：

“我甚至不知道，哪样对我更好：是你们批准我好，还是不批准我好。”

有趣的是，劝说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最多的恰恰是后来把他赶下台的那些人。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全都依靠普里马科夫，因为如果当时他不答应的话，他们就会完全失去权力。然而，感谢之情不是人主克里姆林宫的人最强烈的心情。普里马科夫的预感是对的：他离开白宫也不会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不会在掌声中离开……不过，在那个时刻，这样的结局谁也没有想到。推举普里马科夫看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全国都信任他。

普里马科夫做了什么？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做到了使俄罗斯的政局稳定。随着他的上任，对解散国家杜马、总统又对议会动武、家家户户沿街兜售自家的东西以及对独裁统治的恐惧感消失了。紧张气氛在某种程度上顿时也消退了。政府得到了几个月相对安定的时期，可以做点事情了。

在普里马科夫向公众介绍了内阁成员后，人们称这届内阁是粉红色的、红色的、共产党的。部长们上任伊始关于控制货币发行、国有化和支持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谈话简直吓坏了人，而且普里马科夫还表示要倾听自己的故交经济学家院士们的意见。院士们的建议令了解现代经济的人忧心忡忡。如果政府听从这些建议，国家又会大祸临头。院士们建议大胆印制钞票。看来，他们以为，如果人人发给大量纸币，定会皆大欢喜……

然而，这毕竟不过是一张张纸而已，用它什么也买不到。通货膨胀——这是国家对个人的一种掠夺。结果，造成一种感觉，就是普里马科夫的谋士不懂得货币在现代经济中是如何发挥功能的。这当中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一辈子学的教的都是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然而，这样的科学简直就不存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米歇尔·康德苏按照自己的方式对普里马科夫政府的计划作出了反应："现在向俄罗斯提供贷款不仅不可能，而且还有害。现在我们能够为俄罗斯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帮助政府弄清楚，他们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做什么。"

可是，在莫斯科有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故作固执姿态，钱反正总是要给的。第一副总理瓦季姆·斯托夫竟然说：他们的钱往哪儿放呀！斯托夫曾多年在铀矿工作，后来成为一个中级党务工作者，最后被选为列宁格勒州州长。普里马科夫在电话上同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后就让他当上了两个第一副总理中的一个。

共产党人、反对派感到满意：终于出现了一个抛弃货币主义妄想而从事发展生产部门的政府。然而，才过了几个月，连院士们的计划也无声无息地忘记了。普里马科夫政府的经济方向标根本转变了。部长们上任时说的是一套，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如果闭上眼睛，那么，好像听见的是盖达尔或基里延科的声音，而不是普里马科夫或马斯柳科夫的声音。

州长、军工综合体、大的生产企业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们要求的是货币，并且相信，正是这届政府会迎合他们。可是，错了。普里马科夫政府并没有印钞票。正如普里马科夫的一位同事说的那样：在你当上部长后，不能不成为货币主义者。发行多于国库现有的钞票是不可能的。发放显然收不回来的贷款，是不可思议的。在群众集会上或杜马讲坛上答应给选民人人一座金山，是一回事。懂得一着不慎会使全国遭殃，则是另一回事。

与起初的承诺相反，普里马科夫政府并不那么大力干预经济，不妨碍人们工作。有人曾预言普里马科夫政府会面临种种灾难，结果一个也没有应验。10 年来他的内阁第一次编制了诚实的岁入大于岁出的预算。而且实际上稳定了卢布，几个月后国内局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好转，生产开始增长。卢布贬值帮助了国内生产厂家，农村和生产厂家集中的中小城市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经过长时间的

争论之后，那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都是些一点都不了解俄罗斯事务、穿开裆裤的毛孩子的思想在政府里消失了。原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理的建议与政府的目标不谋而合。整体上看，全国还是形成了市场经济，它已不那么厉害依赖政府的决策和决定了。

普里马科夫十分小心谨慎，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如履薄冰，因此，在总理任内犯的错误比任何别的总理任内所犯的错误都少得多。不过，同时有人责怪他没有采取果断而激进的、惟一能使我们摆脱危机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是不得人心的。

自由派经济学家骂普里马科夫消极。如果一个长了脓疮的病人来找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当然应该关心最大限度不痛地做好手术。但是，必须揭开脓疮，否则，血液会感染。他们责备普里马科夫，说他借口按照病人的愿望，不去揭开脓疮，只是给了点止痛药。而病人却会死掉……

1999 年 5 月，总统叶利钦向全国解释说，他与普里马科夫分手是因为后者的政府在经济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同意总统的看法。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提醒道，普里马科夫就任总理时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人们纷纷恐慌不安。他力挽狂澜，拯救了国家，使经济得以恢复。而外省也感谢他，因为他们开始比较好过了。此外，在普里马科夫时期工资和退休金都按时发放了。这与他有关系。

普里马科夫大概只是与新闻记者没有找到共同语言。他说他们对待政府不客观，从而引起了大众传媒对他的反感。他由于认为报章对他的批评不公正，所以经常对其批评的反应过于尖锐。他的出发点似乎是认为新闻记者对待事业的态度不够严肃。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在任外交部长时，新闻司司长弗拉基米尔·奥列戈维奇·拉赫马宁（罗满宁）对他帮助很多。后者就任这项职务时年方 39 岁。他是中国问题专家，是著名汉学家之子，其父曾多年参与制定苏联对华政策。弗拉基米尔·拉赫马宁本人不是新闻记者出身，但却能够与新闻、电视界建立很好的关系。记者

们对他的诚恳、坦率和乐于助人倍加赞扬。在他身上丝毫没有那种只想逃避不愉快的事的官僚气息。普京总统把弗拉季米尔·拉赫马宁抓到了自己门下。

最光荣的引退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怀着人们对他的空前巨大的信任开始了工作。任何一届政府首脑都没有获得过这样广泛的支持。这让他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中拥有极大的稳定性。普里马科夫十分策略和明智，决不触犯总统的特权，纵然后者有病在身。在工作中一分一秒也不给别人以说他是想取代总统的把柄。他竭力不引起叶利钦的忌妒，知道此人不喜欢别的政治家获得成功。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几乎总是巧妙地搞好与上司的关系。他有一种值得庆幸的举止十分自然的天赋。

起初，叶利钦依靠普里马科夫，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巴结他。在他受命后两周，总统突然意味深长地以信任的口吻对他说：

"让我们考虑考虑战略问题吧。我想让您登上国家最高职位!"

普里马科夫理智地避免进一步谈及这个话题：

"我无意谈这样的事。既无意谈，也不愿意谈……"

鲍里斯·叶利钦称普里马科夫是"最强、最可靠的总理，总统支持他，政府支持他，国家杜马支持他，各地地方当局都支持他"。叶利钦说，看到普里马科夫谋求适当的妥协办法解决问题，感到很高兴……

那时，叶利钦的日子不好过。1998 年 10 月，他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但自我感觉很不好。在飞机场，在电视摄像机的直接瞄准下，他差点儿跌倒。幸亏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扶住了他。总统于是缩短了行程，提前回到了莫斯科。医生通报说，总统患的是支气管炎，并发高烧。莫斯科大街小巷盛传

最坏的消息，说他的帕金森氏病加重了。

然而，危机刚刚过去，人们就看清楚了，叶利钦对普里马科夫感到不悦。人们谈论，说曾有一只黑猫在叶利钦与普里马科夫之间穿过，说总统抱怨总理背着他跟国家杜马商议使政府摆脱总统的监督。众所周知，叶利钦是多么不喜欢他的圈子里有人搞独立的政治……

熟悉克里姆林宫生活的人明白，就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也不会稳坐总理这把交椅。1998 年，更换了 3 位总理。举凡更换政府首脑的事，总统在任何场合都不患无能为力。事实就是如此。1999 年又换了三位总理。

在叶利钦的《总统的马拉松》一书中是这样解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下野的原因的："对实业界大部分人来说，也就是对中产阶级、大众传媒来说，对许多政治家和杜马各党团来说，普里马科夫日益成为令人恼怒的因素。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周围聚集反市场的、反自由的力量，自觉不自觉地向言论自由进攻，这不能不令新闻记者焦虑不安。"

"那年春天，许多俄国公民普遍开始收拾行李……莫名其妙的刑事诉讼被提了出来。无辜的人们遭到了逮捕。一部分特工人员在对工商界人士进行审讯和搜查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等着清算陈年旧账吧……"

"普里马科夫继续执政有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危险。即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这是一个严重的倾向。如果听任这个过程拖延下去，渐渐走向过去苏联的领导方法，那就可能使他的下野变成一场真正的国内冲突。因此，十分清楚，等到秋天，尤其是等到我原先计划的 2000 年，实属不能。"

叶利钦的这些话现在读来真令人奇怪。向言论自由进攻，特工的报复，莫名其妙的刑事诉讼，逮捕与搜查——这一切说的都是在普里马科夫已经下野之后开始发生的，当时叶利钦的接班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已成为总统。

普里马科夫领导政府8个月。1999年5月12日，当政府首脑来到叶利钦处作例行报告时，精神饱满劲头十足的总统通知他说，要解散内阁。

普里马科夫在那几周自我感觉很不好，受神经根炎折磨，需要动手术。但是，这时他并没有失去镇静，坚定地说：

“我觉得，您是在犯错误。”

叶利钦建议他自己写一个请辞书，并说道：

“这样大家都简单一些。”

普里马科夫拒绝道：

“这个我不干。您可以总统身份签发一道命令嘛。”

叶利钦有意和解地说道：

“让我们仍然做朋友吧。”

《总统的马拉松》一书中还有下面这样一段话：“我又一次看了看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遗憾。着实遗憾。这是我见过的所有退隐中一次最光荣的引退。一次最勇敢的引退。这在政治意义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范例。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权力通道上的争斗

那么，叶利钦究竟为什么要普里马科夫下野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总理的独立性。这不是指那种本原意义上的独立性，譬如普里马科夫不听叶利钦的话，或者作出的决定与总统的指示相抵触，而是指总理简直就是自行其是，遇事不急于向克里姆林宫低头，不与总统周围的人商量。普里马科夫的脊梁骨就其本义或引申义而言都太硬。神经根炎的手术救了他一命，但他的性格依旧。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从来就不是叶利钦的志同道合者。普里马科夫惋惜苏联解体，对叶利钦在别洛韦日森林签订的协议感到

遗憾。普里马科夫不赞成盖达尔的改革，而且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只是他的意见那时无人理会，因为他是对外情报局长。普里马科夫不同意叶利钦十分热烈地与西方接近和修好的愿望。普里马科夫对共产党人、对左翼反对派领袖也没有那种憎恨。一句话，普里马科夫是第一个非总统的人的总理。他可不是叶利钦选择的，而是政局把他强加给叶利钦的。那年秋天，总统面临一个抉择：要么解散杜马，要么接受普里马科夫这个人选。叶利钦同意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他的状态十分糟糕，重病在身。

普里马科夫亲自组成的政府既在他以前未曾有过，在他之后也不会再有。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与总统办公厅保持的关系是最低限度的，尤其是在下面这件事之后。1998 年底，总统新宠爱的人尼古拉·博尔久扎——一个严肃的、穿得笔挺、神态端庄、令人产生好感的军官接替了瓦连京·尤马舍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久扎将军一生相当长时间在克格勃军事反间谍部门工作，从事过干部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后来接替尼古拉耶夫将军担任联邦边防局长，从此定期到克里姆林宫报告工作，被叶利钦看上了。先是让他担任安全会议秘书，随后又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利钦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已经在为自己物色接班人了……

可是，博尔久扎在权力的通道上辨别方向的能力很差，对普里马科夫很尊重。这就断送了他的锦绣前程。叶利钦在自己的书中说明了原委：

“我召见了尤马舍夫，对他说道：‘瓦连京，您相信博尔久扎没有错误吗？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

“尤马舍夫感到诧异。表面上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博尔久扎尽心尽力，想做一个好总管。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看出他有点不是那么回事。

稍后，我弄明白了，博尔久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在严格的军事系统青云直上的军官，他不怎么明白现在的政治生活体制，

不会掌握分寸，看不见水下的暗流。在他看来，办公厅主任的整个工作都是不合逻辑的，没有规矩，令人奇怪。于是，他不知所措了……博尔久扎觉得惟一适意的人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

尼古拉·博尔久扎也没有总统所要求的其他素质——铁石心肠。看来，他也缺乏政治视野。这就是为什么博尔久扎在克里姆林宫干了总共才 4 个月。1999 年 3 月 19 日，他不再是办公厅主任了，4 月 13 日又丢了安全会议秘书的职位。前副总理奥列格·瑟苏耶夫是如此解释尼古拉·博尔久扎丢官的原因的：

“走进政权的人都必须明确认识，在最高层起作用的机制往往是与人的逻辑和道德标准背道而驰的。基本的原则是政治需要……”

普里马科夫立即就把博尔久扎调到自己的政府里，担任海关委员会主席。1999 年 4 月 14 日才任命，而一个月后，普里马科夫不再当政府首脑，于是，博尔久扎递上了辞呈。

弗拉基米尔·普京当上了新一任安全会议秘书，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沃洛申则当上了总统办公厅主任。后者彻底摧毁了政府的经济政策。

普里马科夫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依靠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这是因为：第一、左翼反对派在国家杜马中是多数；第二、他本人不同于总统，看不出共产党有任何危险。有人说，总理让反对派利用自己，他给他们以极大的方便。克里姆林宫认为，普里马科夫是故意与总统最凶恶的敌人结成同盟。怎么竟这样呢？共产党人准备弹劾总统，而普里马科夫却仍然同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

共产党人手上有一张有力的王牌，就是如果把叶利钦赶下台，那么，根据宪法就要由像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这样受人爱戴的人来管理国家。在局外人看来，这一次早就准备好的弹劾可能获得成功，至少是杜马代表会赞成认为叶利钦是车臣战争的罪魁祸首。

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弹劾总统的企图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因而总理与反对派接触在克里姆林宫里被看作是含有敌意的。

总统冒险赢了

最高权力层中有几个人告诉我，曾有人反对要普里马科夫下野。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怕人民愤怒。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很得人心。事后才知道，在普里马科夫离任之前曾有人试图组织反对总统的起义。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告诉《独立报》，在普里马科夫政府卸任前夕，曾与议会党团领袖、国家杜马领导举行过会议。

“然后，我们（我、雷日科夫和哈里托诺夫）留了下来，又花了两小时与普里马科夫及其副手讨论国内局势。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叶利钦和他的班子定会解除普里马科夫的职务……普里马科夫的机会不多了。我们告诉他，明天叶利钦就要他下台，我们已要求举行联邦会议与政府的联席会议来讨论已形成的局势。遗憾的是，政府缺乏这样做的勇气。我们曾邀请他们到杜马来，然而，他们没有来。后来也没有到联邦委员会去。如果他们下定决心，我相信，议会两院和普里马科夫政府是会找到办法的……”

久加诺夫相信，如果立法机构和政府共同号召所有强力部门保持平静，不受人挑拨，那么，任何一个士兵、任何一个将军都不会起来反对人民支持的政府……那时就真正有可能审议修改宪法，重新分配权力，以及把政府置于议会两院的监督之下了……

有人问久加诺夫，到底为什么共产党人没有把人们带上街头，以示抗议要普里马科夫下野？

这个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可以做到。如果普里马科夫说：“好的，我到杜马来。如果他正式向全国呼吁的话。可是，在他说了他离任是应叶利钦的要求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曾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但是，那里也缺乏对正在发生的事实事求是地进

行评估的勇气。当要被甩掉的人自己不采取任何步骤去配合杜马时，号召人们上街是没有意义的”

叶利钦又冒了一下险，并且又赢了。绝对不得人心的总统甩掉了异常得人心的总理，国内竟没有出任何事——既没有游行示威，又没有罢工，也没有群众性的愤怒！普里马科夫感到极大的侮辱，默默离任了。杜马乖乖地对新总理谢尔盖·斯捷帕申投了赞成票。

叶利钦拿掉普里马科夫是对左派一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弹劾总统流产，左派简直不知所措了。他们昨天还在高喊使俄罗斯向左转，说全国支持共产党反对派，一下子突然沉默起来了。共产党人甚至没有下决心反对任命斯捷帕申为政府首脑，虽然后者是总统的人，一个完全效忠于他的人。

对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来说，被解职未必是个意外。普里马科夫记得所有自己前任的不妙的命运，并且肯定明白总统不太喜欢他。他的卸职被搞得令人难堪，不但如此，他在 1998 年秋天紧要关头实质上救了的人也没有拿出勇气说一声在这种场合理应说的谢谢。

对普里马科夫的下野只有 2%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全国许多人感觉对待他不公道。还没有过一位政府首脑在深受人民爱戴的情况下下台的。民意调查表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是全国最得人心和最有影响的人。于是，那时开始议论起他可以换下叶利钦当总统的话题。普里马科夫本人对推举他作为总统候选人一事则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任何不理智的举动都应该有个尽头。我同意出任总理后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一切……”

在他被解职之前，他确实没有打算过参加竞选。被解职后，一切都变了。

“为普里马科夫——俄罗斯的希望干杯!”

人们曾坚持不懈地劝普里马科夫竞选国家杜马代表，后来又劝他竞选总统。他没有匆忙作出决定。首先，他卸任后去瑞士做了置换髋关节的手术，使他得以摆脱极度的痛苦。但是，他不愿意拄着双拐在公众面前露面。他想等到可以不用双拐乃至不用手杖的时候。其次，他不想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

不过，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就不想参与政治活动。他本来就不属于彻头彻尾的政客之列，那些人没有别的生活打算。他有的是政治以外的兴趣：读书，交友，享受天伦之乐。的确，他有一种可能从高加索带来的品质。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在第比利斯长大，他可不容任人欺侮。他感到欺人太甚，竟如此无礼地要他下台。在以往所有的职位上，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从来都是一路高升。他几乎整个一生都是飞黄腾达。可是现在，突然竟这样被撵下台。如果不是复仇之火，至少也是扳回一局之念，以及当然毕竟还有高层政治的吸引力，这些大概就是促使他决定参加竞选的原因。

许多人曾暗自注视着普里马科夫的一举一动，因为他可能有力地帮助他所参加的竞选联盟，也可能有力地阻碍别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他决定参加竞选总统的话。首先向他提议结成联盟的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后者自己曾考虑参加竞选总统，但是，在实事求是地估计自己成功的机会之后动摇了。尽管这样，他在 1999 年建立了自己的“祖国”运动组织。当普里马科夫下野时，卢日科夫当即表示，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与“祖国”运动非常相近。卢日科夫与普里马科夫结成联盟会十分强大。但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不愿意单纯成为莫斯科的候选人。那时，一群有影响的州长在创建了“全俄罗斯”组织后，提议与卢日科夫结成联盟，以便让普里马科夫居于共同的竞选名单之首。

全国的地方领导人都情愿站在莫斯科的旗帜下，认为这样可以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而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是不能耽误。当时，人们已把叶利钦彻底排除在外，认为他重病在身，什么也不行了，对任何人也构不成威胁了。据说，叶利钦脑血管出了严重问题，在谈话时有时突然不知所云，断了线，然后再也无法想起说过的话。社会上都相信，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是下台的时候了。共产党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深信不疑地说：

“这个政体已经彻底过时了，它在垂死挣扎。叶利钦已经无法照老的一套发号施令，而新的一套他又不会。最近，‘我们的家园’会把他孤立起来，以免他碍事。总统办公厅已不知所措，被大大削弱了，没有威信了。自由派的时代过去了，人民憎恨他们。”

不错，总有人记得以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正是在他被逼到墙角的紧急情况下表现出色。不过，他的飞黄腾达，频频旗开得胜，这一切看来都已成为过去。现在，他已无力整天坐在克里姆林宫里，越来越多的时间呆在郊外的官邸了。他在电视屏幕的露面给人一种奇怪的、可怜的印象。他似乎不仅远离人民，而且也远离自己的政府。许多部长只有在电视上看到他。他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小圈子里，其中演奏主要小提琴的是他的小女儿和一个为他著书立说及办理私事的记者。传说他小圈子里的人尽背着他干事。他们不问总统就盖上叶利钦签字真迹复制的橡皮图章，发出命令。这个图章保存在办公厅主任的保险柜里。

对于新的总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上任，谁也没有认真地当回事。人们说：嘿，就连这一位，过个把礼拜也要把他给捋掉的。在杜马，人们完全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投了赞成他的票，心里问，有什么区别呀？在大选前反正得忍耐着看叶利钦的把戏……

在 1999 年 8 月乃至 9 月，很少有人怀疑，以前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为首的、强大的“祖国一全俄罗斯”联盟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他就是在卸职后仍然是全俄罗斯最受欢迎的

政治家。从民意调查看，人们想要看到登上总统宝座的正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认为他也没有有力的竞争者。

9 月的一天，在一个大的友谊晚会上，我看到普里马科夫的朋友和战友十分真诚地频频举杯：

“为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俄罗斯的希望干杯！”

1999 年 8 月初，车臣的好战分子侵入毗邻的达吉斯坦，随后又在莫斯科和别的城市制造了爆炸事件。这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些事件会根本改变俄罗斯的政治生活。我国的整个政治空间随着车臣战争也变成了战场。如同车臣一样，这里也是烽火连天，明枪暗箭。对手们已经尝到了政治血腥的味道，并且当着感到惊讶，也许还相当多的公众的面，互相把对方撕咬成碎片。

这也落到了普里马科夫的头上，有人指责他企图组织暗杀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这个呓语大概会有人觉得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谢瓦尔德纳泽打算让格鲁吉亚参加北约组织，也就是说要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而普里马科夫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对他来说，让某一个总统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去泡泡水根本费不了什么……

还有人说，普里马科夫手术后一直也没有恢复健康，还在等待做下一次手术，最后会以变成残废告终。在这同时，电视屏幕上展现了一滩滩的血，这必然引起一定的联想。在国内流传普里马科夫行动困难的那些日子，我曾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注意观察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他精神抖擞，宴席上什么都吃，宴后与一些友好的伙伴引吭高歌，轻轻舞动双脚。然而，看到这种情形的也就是二十来个人，全国相信的可是电视。更不必说电视上出现的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的面孔通常都是郁郁寡欢的。这不会增加崇拜他的队伍。

普里马科夫始终未能搞好与新闻界和电视界的关系，致使许多记者反对他。尽管如此，不应说是电视赢得了 1999 年 12 月国家杜马的选举。尤里·卢日科夫以绝对多数票再次当选为莫斯科市长。

可是，投票支持“祖国—全俄罗斯”政治联盟的人却比预期的少得多，虽然他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原来似乎明显被人看好的“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失败的原因何在呢？答案有很多。主要的竞选口号“让克里姆林宫摆脱叶利钦”到投票选举时已经过时了。任何人也不怀疑鲍里斯·尼古拉耶奇很快就要下台。可是，在他之后是谁上台，又怎么办呢？猛烈攻击叶利钦和“我们的家园”，抨击种种腐败现象，并没有争取到选民。人们期待政治家的不是猛烈的批评，而是积极的行动纲领。这时，一个新的、年轻的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突然成了这个纲领的代表。

人们看到普京是一个年轻、自信、不怕承担重任的人。他展示了人们苦苦盼望看到的国家领导人身上的那些品质——果断和坚强。在车臣大规模使用武装力量被看成是重振国家雄风和社会团结一致的见证。这种团结一致至少是有反对共同敌人的基础。这产生了意外的效果：社会学家看到了人们对国家发生积极变革的期望。虽然经济没有真正的进展，人们已开始比较乐观地看待正在发生的事了。而人们在普京身上，已看出他是一个应该给予支持的领袖和强有力的人物。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成了国家杜马“祖国—全俄罗斯”党团的领袖。他无意竞选总统了。

第十四章
伊万诺夫：新方针

自从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进入俄罗斯政府后，他是惟一一位是在美国庆祝自己生日的外交部长。但是不应当对他的爱国主义感情有什么怀疑。每年九月外交部长必须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所以出生在九月的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甚至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能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度过，而只能和那些也许他并不喜欢的人在缺乏欢乐和温情的谈判桌前度过。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得面带微笑，握手问好，讲一些客套话。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是一个既不属于圣彼得堡派，也不属于新总统普京的老朋友圈内的人。很多人认为他是普里马科夫的人。早在1998年9月，当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同意领导俄政府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的第一副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将会成为新一任外交部长。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伊万诺夫是普里马科夫的人，是他安插的亲信和老相识。完全不是这样。人们本可以把伊万诺夫看作是科济列夫的人，因为最先任命伊万诺夫为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是科济列夫。伊万诺夫不属于那种因政治上受人提拔而得到发迹的人，他是一个专业人士，是职业外交家。虽然他进入外交部比较晚，也没有毕业于外交家的摇篮—国际关系学院，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的仕途。

伊万诺夫亲自对我说过："一个人不可能生来就是一位好的外

交官，外交官只能在取得经验的同时成长起来。可以生就一位好的国际象棋手，但外交官只能逐渐成长，而且不能迅即成长，而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工作。"

伊万诺夫从葛罗米柯开始共在六任外交部长手下做过工作，他们中每个人都对他表示赏识并加以提拔。

对伊戈尔·伊万诺夫的任命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俄外交部大楼所在地—译者）得到了普遍的赞许。所有认识伊万诺夫的人都认为，他是位出色的职业外交家。而在国际上人们都认为，对伊万诺夫的任命表明，在复杂的情况下，当人们不知道俄罗斯国内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时候，至少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在苏沃洛夫军校受训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 1945 年 9 月 23 日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个基干军官，退役时获上校军衔。母亲毕业于汽车公路学院，曾在内务部工作，甚至还当过莫斯科一个区的交通检查站站长。

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受到军事教育。11 岁的时候，小伊万诺夫进了苏沃洛夫军校，在那里学习了七年。他曾参加过红场上的阅兵式。高强度的体育课程后来对他帮助很大。这位外交部长常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起那段时间，并且每年都与自己的同班同学聚会。他的这段人生经历同普里马科夫的人生道路有点相似。

1944 年，当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 15 岁时候，他来到巴库，考上了国防部下属的巴库海军预备学校，成为该校的一名学员。但是，当战争结束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战时准备奔赴前线是一回事，在和平年代，当士兵和军官摘去肩章开始复员回家的时候，选择军事生涯是另一回事。1946 年，他离开了海军学校。

不论是普里马科夫，还是伊万诺夫，都没成为军人。从他们后

来的经历来看，这显然是件好事。我们的武装力量从来都不缺少军官，而外交部长却是屈指可数的。

1969 年，伊戈尔·伊万诺夫从以莫里斯·多列士命名的莫斯科国立外语师范学院毕业。他在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对这位未来的外交官来说这算不上是最好的教育，因而有很多东西他后来得靠自学来学习。后来他被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接收为进修生。也就在当年，他转到了一个更大的科研机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成为那里的一名初级科研人员。他一边做研究生，一边充当研究所所长、科学院院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伊诺泽姆采夫的个人助手，伊诺泽姆采夫在未来的两位外交部长的生活中曾起了特殊的作用。

伊诺泽姆采夫是位极富天赋而又不平凡的人。在他的领导下，研究所发展起来了。伊诺泽姆采夫把普里马科夫聘为自己的副所长。他给予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很高的评价，帮助他成了通讯院士，然后成了院士。但是，学术生涯并没有深深地吸引伊戈尔·伊万诺夫。1973 年他被苏联外交部接受，到第一欧洲司任二秘。也许，他与著名的外交家谢苗·帕夫洛维奇·科济列夫（与俄未来外交部长同姓）的女儿结了婚这一并非不重要的事实，促成了这一切。谢苗·帕夫洛维奇连续 17 年当葛罗米柯的副手。这里伊万诺夫的经历又与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的经历有些相似。安德烈·弗拉季米洛维奇也同另外一位副部长的女儿结了婚。但是对于两位未来的外交部长来说，联姻只对他们迈人外交生涯的第一步起了作用。

也就在 1973 年，伊万诺夫被安排到了西班牙工作。在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时期，苏联和西班牙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马德里设立了一个商务代表处，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连续四年任商务处的工程师，当时在编制上就是这么写的。伊万诺夫承认，从他踏上西班牙的那一刻起他就爱上了西班牙。伊戈尔·伊万诺夫常面带微笑、态度善良和易于与人交往，他置身于西班牙人之中感觉

十分良好。

1977 年，佛朗哥去世后，苏联与西班牙建立了外交关系，开设了苏联大使馆，伊万诺夫又留在马德里工作了 6 年，他在那里从一秘成长为参赞，也就是成了使馆里的二号人物。换句话说，伊万诺夫总共连续在西班牙工作了 10 年，这在外交部里是极为罕见的。

1983 年，他回到了莫斯科后，就在外交部机关里工作，先在欧洲司，第二年被调到部长秘书处，并且很快就成了葛罗米柯的助手，众所周知，葛罗米柯在身边是容不得工作能力弱的人员的。从他的秘书处的人员中出过一位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和几位副部长。

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曾说："一个好的外交官，是能写东西的外交官，是善于思考和写东西的。有的人能思考问题，但不善写东西。有的人能写，但不善于思考。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

伊万诺夫被认为是百分之百有希望的人。人们都知道，他有把好几页文件都背出来的能力。他讲话非常简洁明了，从不走题出错。

谢瓦尔德纳泽把伊万诺夫调到了外交部办公厅，他在那里工作了 5 年，直到成为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十分辛苦的职务，它要求几乎整天都守在工作岗位上。部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当世界上什么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大胆地给伊万诺夫打电话：他准在岗位上。

在他身上看不到高层领导周围的人骄傲地走在走廊上时流露的那种神气的表情：我每天都要和那些你们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大人物打交道。伊戈尔·伊万诺夫总是很认真、沉着、专心。在那些年里，他的工作就像安装了程序的计算机那样准确无误。在周围的人看来伊万诺夫显得有点枯燥、封闭和不可接近。

"我认为这与心理因素有关，因为经常要与领导打交道，在他们面前，你必须衣着整齐。"他以前的领导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

内赫说，“这种因素会不由自主地扩散到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上。”

总的来说，伊戈尔 伊万诺夫是个天性快乐和合群的人。他不过是善于把工作和非工作场合区分开来。在工作场合他是一本正经的。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1990 年伊万诺夫坚决地强调，在外交部不应当有政党的组织，因为外交部的职能是贯彻国家的政策。1991 年，在结束了多年艰苦工作之后，他被派往西班牙任大使。他安排了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参加的讨论近东问题的马德里峰会，此次会议是为在该地区寻求和平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 1993 年科济列夫把他召回莫斯科，同年 12 月任命他为自己的第一副部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后来承认：

“当然把他召回国内是有点可惜的，因为伊万诺夫有权利在任何国家任大使。但是，这里更需要他。”

“你怎能与这么多不同的部长成功地合作呢?”我问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

伊万诺夫笑了：

“总的说来，这对于外交官来说，是很自然的。我的确与六位外交部长工作过，但并不巴结他们。我认为坚持自己的观点是自己的职责。或许，他们喜欢的正是这一点。”

伊万诺夫从未公开地对自己的前任讲过任何责备的评价，虽然他比其他人更了解他们。

已消失的靠山

普里马科夫在当外交部长的时候，并不对外交部工作的各项细节都事必躬亲，所以在几年时间中，日常事务，其中包括一些干部问题都是由伊万诺夫负责处理的。外交部——这是个庞大而又复杂的集体，有上百个大使馆，上百个分支机构，几千号人，伊万诺夫

却比人事司更了解所有的人。虽然在外交部工作的有上万人，他能即时叫出所需要的人的名字并能对他作出一个准确的评价。

第一副部长和部长在形式上的差距并不很大，但事实上这一原则性的差距却非常重要。第一副部长常常可以把责任推卸到部长的头上，自己躲在部长的背后。担任第一副部长的角色，伊万诺夫自我感觉很好，他从未想过什么时候会取代普里马科夫，他认为部长是个政治人物。当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成了斯摩棱斯克广场上那所高层建筑里的头号人物的时候，他已没有必要再躲在谁的身后了。但是，也就必须对所有的一切都由自己来做决定。在那些日子里伊万诺夫曾说过：

“是的，站在像普里马科夫这样一个人的身后，你会觉得很舒服。而如今这样可以依靠的背脊没有了。我身上的责任更重了。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减少了。”

他还得独立处理好与政府机构和总统办公厅中的一些强人的关系。这也是一门特殊的艺术。

所有了解伊万诺夫的人，都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和百分之百可靠的人。他以自己的勤奋，有组织性和准确性而令人称道，这些品质在国家机关里是很少有的。新的部长们上任后往往喜欢改变前任们所做的一切，按照新的方式开始生活。而伊戈尔 伊万诺夫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强调，他将继续执行普里马科夫的路线。

“如今你是外交部的主人了，”我曾经问过伊万诺夫，“你想改变些什么？也许，您有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很早以前就想加以实现，但是没有机会?”

“还在普里马科夫任职期间我们外交部就已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氛围，”伊万诺夫回答说，“所以不存在我那时不能提出来，而现在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我讲政策的继承性是真诚的，我要把我们过去一起做的一切都继续下去。”

最后一颗子弹

安德烈·科济列夫总是轻声地讲话，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给公众留下的总是紧锁眉头、满脸愁容的形象。而伊戈尔·伊万诺夫却很会微笑，他的微笑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在外交上也是不错的武器。因此人们背地里称他为“微笑和可亲的部长”，当然不能把彬彬有礼和坦率开朗等同于在谈判桌上的让步。

伊戈尔·伊万诺夫是这样一个有礼貌、有教养和有文化修养的人，而他却不得不跟那些强硬的美国外交官们打交道。对他来说这会有困难吧……

“不应当把强硬和有文化修养对立起来，”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拉甫罗夫对我说，“外交就应当是外交。强硬的立场应表现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形式上。”

伊万诺夫部长的谈判风格又是怎样的？有这样一些非常强硬的谈判能手，他们很能固执己见，把自己藏在堑壕里，直到射完最后一颗子弹。伊万诺夫是属于他们中的一个？或者是由于他活跃的个性不愿呆在堑壕里而能找到从侧面进攻的办法？

伊万诺夫略加思索后这样回答我：

“不应当成为或者强硬或者软弱的谈判手。应当利用所有外交的方式。这完全要看当时的情景和对手的状况而定。所以外交官是如此需要有经验。”

伊万诺夫是有经验的 。近年来他的主要外交考验是参与了原南斯拉夫境内的和平调解工作。作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参加了导致波黑战争结束的代顿和平协议的准备工作。

在巴尔干进行谈判——这可以说是现代外交史上最复杂和最折磨人的事情。在巴尔干是没有轻松的对手的，和他们商讨问题是一

种苦差事。谈判进行了多年，直到最后时刻才意识到，不会有任何结果，毫无希望。难道没有产生过抛开这一切，不去做毫无希望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想法吗？

伊万诺夫说："我是以另一种观点看这一切的。我常常为不能达到目的或是说服别人而感到不安。这说明，我对此还没有准备好。这就意味着，我应该读更多的书——历史上有很多事情会重演，从中可以找出新的论据。"

美国方面主持波黑问题谈判的是当时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他是克林顿总统个人的朋友。当时美国给霍尔布鲁克配备了专用飞机，配有最现代的电子装置。他瞬间不仅就能与自己的总统和国务卿取得联系，而且可想跟谁联系就联系。他还有齐全的计算机文档。和他一起飞来的有一个研究巴尔干问题的专家小组。这是一个真正的微型外交部。

而俄罗斯的代表团什么也没有。俄罗斯的外交官是顺路能搭上什么交通工具就搭什么去的。而迟到是不行的。如迟到的话，他们没有你们参加就会达成协议。代表团没有得到进行必要开支的费用，因为没有给财政部解释伊万诺夫要完成什么特殊的任务。财政部有自己的规定。出差费也少得可怜。

俄罗斯代表团甚至和莫斯科进行联系以便汇报情况和取得指示都有困难。外交部拿不出几百万美元来安装一条能防窃听的通讯线路。所以伊万诺夫同莫斯科通话时候只能用普通电话，而讲一些暗话……

流血的解体

伊万诺夫成为部长后，他就忙于处理已经充满了战争硝烟的巴尔干问题。苏联的解体是悲剧性的事件，但解体时没有发生战争和流血。然而，南斯拉夫的解体却伴随着战争、屠杀和民族清洗。南

斯拉夫事件证明，如果 1991 年在我们的国家里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话，俄罗斯同样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南斯拉夫这场戏的所有演员们都令人感到厌恶；他们狂热的民族主义和过分膨胀的野心摧毁了一个繁荣和幸福的国家。他们在一瞬间使旧仇复燃，在一个曾经是统一的国家里人们全都互相憎恨。

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曾因教会的分裂而分离。受拜占庭影响的塞尔维亚人，成了信仰希腊东正教的民族，使用基立尔字母，倾向东方。而克罗地亚人则忠实于罗马天主教会，使用拉丁字母，倾向西欧。但是在建立第一南斯拉夫之前，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第一南斯拉夫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大国建立起来的。他们希望恢复民族公正，让东南欧和中欧的人民取得独立，首先是在巴尔干。20 世纪初的自由主义者们信奉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以为他们可以克服民族和宗教的分歧，在一起过共同的生活。但是，这些希望并未实现……

塞尔维亚的政治家们试图弄明白为什么统一的南斯拉夫会解体，他们得出了结论，最主要的原因是联邦的软弱：各个共和国拥有太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反过来就导致了分离主义。贝尔格莱德应当把所有共和国都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二次大战前的第一南斯拉夫刚好就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啊！于是就由中央严酷地统治了全国，把分离主义压制下去了。但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在单一制的南斯拉夫时期，塞尔维亚人认为自己是把各民族团结起来的民族，是其他民族的老大哥，所以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不珍视他们所做的努力呢？而其他民族感到不满意的是：塞尔维亚人在军队中占据了所有指挥员的岗位，他们强迫克罗地亚人使用基立尔字母，禁止马其顿人在学校里学习自己的母语，把阿尔巴尼亚人赶出科索沃，而把塞尔维亚人迁到那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残酷地互相

屠杀。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施分子尤为残酷。然而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又重新在一个国家里联合起来了。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建立了第二南斯拉夫。比起南斯拉夫国王来，铁托以更强硬的手腕统治了国家，但是所有共和国都取得了一切特权和独立的标志。铁托建立了经济运转良好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人过了其他东欧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生活。

铁托最关心的是如何保全南斯拉夫和同民族主义做斗争。他对民族主义者采用的手段极为残酷。铁托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各个民族的领袖。他以为靠经过缜密思考而制定的邦联制能够消灭民族主义。但是他错了。原来各个民族对独立的渴望要远远超过其他的情感和情绪。在铁托去世后的 10 年时间里，南斯拉夫联邦是靠融为一体的共产党、国家安全部门和军队机构的盔甲般的紧身衣维系着的。当这身紧身衣削弱的时候，联邦就开始散架了。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上百万的塞尔维亚人就处在自己国家之外，其中也包括处在那些不欢迎他们的国家内。塞尔维亚人像生活在原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一样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适应自己的新生活，或是离开自己所在的国家，或是为争取并入塞尔维亚而战斗。塞尔维亚人选择了第三个方案。

塞尔维亚是个不幸的国家。它处于一些政治家的手中，这些人把这个国家从一个灾难引向另一个灾难。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所做的一切变成了对塞尔维亚的一场悲剧。他承诺要巩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却毁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受难最多的是塞尔维亚人。首先退出联邦的是斯洛文尼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洛文尼亚人害怕残忍和专横的米洛舍维奇会把自己的强权强加给他们。

当南斯拉夫开始崩溃的时候，米洛舍维奇试图用武力加以阻止并把情绪激烈的塞尔维亚人推向了战争。他说：

“我们应该做出决定，我们是要战斗，还是要下跪变成巴尔干

的新殖民地。我们决不交出塞尔维亚。”

然而米洛舍维奇只是口头上讲得漂亮，实际上他交出了他能交出的一切。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希望得到原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居住过的所有领土。而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则希望拥有自己的国家，在他们的国家里塞尔维亚人最多只能是一个少数民族。可是塞尔维亚人是这样看问题的：“当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国家里成为少数民族的时候，为什么要让我们在你们的国家里成为少数民族。”

实际上，民族清洗意味着另一种逻辑的胜利：“在我们这个民族纯洁的国度里不允许有任何少数民族”。在南斯拉夫的领土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开始失去作用。当克罗地亚人宣布自己独立的时候，那里的塞尔维亚人就认定，等待他们的将是二战时期乌斯塔施分子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的重演。米洛舍维奇的军队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共同夺取了克罗地亚的一块不小的领土，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谁都不承认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深刻铭记着 1991 年失败教训的克罗地亚人很久没有下决心用武力来解放自己的领土。他们建议给塞尔维亚克拉伊纳的领导者们提供广泛的民族自治权。为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是在俄罗斯驻克罗地亚大使馆内举行的。

在南斯拉夫的这条战线也把俄罗斯外交官的队伍分成了的两派。我有机会证实，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的两个大使馆对发生冲突的原因和为什么战争会持续下去的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从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发回来的密码电报有点像处在战线两方的战地指挥官发来的战报。然而俄罗斯的外交没有屈服于不同的政治力量施加的任何压力，没有支持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

如果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与俄罗斯调解人一起制定的计划，那么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就有机会取得几乎是完全的自主权——自己的纳税体系、自己的货币、警察、学校、甚至自己的国旗。塞尔维亚人就有可能留在自己的领土上并正常地生活。在某个时刻塞尔维亚克拉伊纳的领导人曾准备接受妥协方案，但是米洛舍

维奇坚决说“不”。米洛舍维奇开除了“妥协主义者”，用坚决拥护他的顽固的权势分子替换他们。结果是，克罗地亚军队于1995年夺回了失去的土地，约50万塞尔维亚人不得不从那里逃跑。而当需要拯救他们的时候，米多舍维奇连一个指头都没动一下，他简直就是出卖了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

生活在克罗地亚的政权下，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也许是不很愉快的，但是如今他们却落得一无所有。他们不太可能在某个时候再回到图季曼总统建立的克罗地亚去。二战时期图季曼曾在铁托领导的游击队里打过仗。他不到40岁就成了将军。1961年他退役了。在研究二战的历史时，图季曼得出结论，乌斯塔施分子的罪行是被夸大了的，克罗地亚成了共产主义者和塞尔维亚人由来已久的反对克罗地亚人的阴谋的牺牲品。在铁托时期图季曼曾被判刑并被关押在监狱里。

1989年图季曼建立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并在选举中获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警察和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了清洗。总统发誓要摆脱共产主义联盟机关里的权势分子。但是，实际上他摆脱的是塞尔维亚人。

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米洛舍维奇是个赤裸裸的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人，他可以毫不在乎地拿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来取代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而图季曼则是个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者。波黑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曾经承认，可以把在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之间作出选择比做在白血病和脑瘤之间作出选择。

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形成了同一模式的半集权统治的体制，其特点就是自满、自夸、自我中心主义，而缺乏应有的自我批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领袖们坚持的是托勒密的宇宙观，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围绕他们而转的。无论是在萨格勒布还是在贝尔格莱德都出现了一整套沙文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统治下，科学，首先是历史学、文学和新闻学，所从事的工作只是创作民族主

义的神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他们的知识界的影响下都忠于自己的民族。在巴尔干文化中历史与民歌谣和民间口头创作是分不开的。文学中的一些陈说旧话被历史学加以神化。

对外国人和异族的憎恨、复仇心理和对本民族的自吹自擂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不进行争论和质疑。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将军姆拉季奇的军队做出的残暴举动，塞尔维亚人在过去的巴尔干战争中就曾在波斯尼亚的领土上这样做过。但是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在塞尔维亚的科学著作中，还是历史教科书中都是只字不提的。在这些书里，塞尔维亚军队的角色是高尚的，值得人们崇敬的。塞尔维亚人只是受害者，是残暴的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牺牲品。

在萨格勒布人们不愿只去回忆二战时期半法西斯化的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的犯罪行径，和一战时期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居民的迫害。萨格勒布的历史学家还证明说：克罗地亚人是一个有别于没有文化的塞尔维亚人的、具有民主传统的欧洲民族。

南斯拉夫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时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和铁托时期——并没有改变边远乡村的状况。相反，那些逐渐移居到大城市里的农村居民随身带来了边远地区的心理特征。在南斯拉夫不是边远农村地区获得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反倒是城市受到了边远地区的影响。

波斯尼亚战争

当克罗地亚的战争结束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又开始了另一起战争。这里居住着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波黑共和国原本打算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邦联，但是米洛舍维奇却下了最后通牒：或者加入我们的联盟，或者把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土地归还我们。于是开始了这场战

争，战争由残忍而自负的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领袖拉多万·卡拉季奇领导。

他是这样一个人，一部分人认为他是罪犯，另一部分人认为他是英雄。拉多万·卡拉季奇是一个诗人、心理学家、肖洛霍夫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生于小黑山共和国。他的父亲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时期曾被捕入狱，因为在二次大战时期，他参加了既同纳粹，又同铁托领导的游击队打仗的游击队伍。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卡拉季奇成了萨拉热窝一支很受欢迎的足球队的医生，他的责任是提高运动员的士气。据说，病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心理医生。而卡拉季奇却抱怨自己一无所成，因为萨拉热窝不是他自己的城市。80 年代中期由于被指控假造文件，他在监狱蹲了近一年。卡拉季奇本人认为，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塞尔维亚人。

当南斯拉夫开始解体的时候，狂热急躁的卡拉季奇投奔了政治。这个好斗的心理医生在塞尔维亚人眼里成了真正的英雄。在重型武器装备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的塞尔维亚人采用了通常的战术：他们包围了一个又一个城市，有计划地用炮兵摧毁这些城市。塞尔维亚军队占领了大约 70%的波斯尼亚领土，从那里赶走了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并建立了自己不被承认的国家。卡拉季奇命令自己的枪炮手和狙击手猛烈地轰击和扫射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首都稠密居民区的扫射，使上万人丧生——而且被打死的完全是那些试图去面包房买面包，或去井边打水的和平居民。我曾到过这个被摧残的城市，当时要在市里行走必须穿上防弹背心和戴上钢盔。城里没有军事目标。塞尔维亚的炮手们摧毁的都是波斯尼亚人居住的民宅，而波斯尼亚人在种族上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只是他们的祖先信奉了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时的一位俄国大使曾经这样写道：“波斯尼亚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斯拉夫血统，但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民族。”

卡拉季奇希望他周围的人把他看作杰出的医生、伟大的诗人、震撼人心的情人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经常与他在一起出入的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队司令拉特科· 姆拉季奇将军。姆拉季奇的

父亲是被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施分子杀害的。所以对于姆拉季奇将军来说，当代的克罗地亚就是他的敌人。而对穆斯林的波斯尼亚的生存权，姆拉季奇则根本不予承认。

米洛舍维奇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了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战争进行了好几年，米洛舍维奇向他们提供了武器和资金。这是一场血腥的和建立在民族和宗教清洗基础上的掠夺战争。

波斯尼亚战争导致了二战后一次最大的民族大迁移。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土地上已不再有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而塞尔维亚人都离开了萨拉热窝。他们不想和穆斯林们生活在一起。当时阿利亚·伊泽特贝科维奇领导着波斯尼亚。像克罗地亚的总统图季曼一样，他曾两次被起诉。但是与图季曼不同的是，他在二战期间站在了另一方。铁托时期他曾因招募穆斯林青年组建党卫队而被判处三年囚禁。伊泽特贝科维奇第二次被起诉是因“民族主义和宣传伊斯兰教”，这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被认为是罪大恶极。他被称为“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根据伊泽特贝科维奇的观点，“伊斯兰教有权独立统治世界”。

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在波斯尼亚实现和平的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对塞尔维亚人有利的，因为按照这些计划相当大的一部分共和国领土将留在他们手里。但是，米洛舍维奇仍然说“不”，而卡拉季奇和姆拉季奇相信，他们能够夺取整个波斯尼亚。当你能轻易地征服波斯尼亚人的时候，为什么要同他们讲和呢？然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的联合力量得到了加强并开始进行反攻，塞尔维亚人连遭失败，战争的喜悦已不再有了。

而在这个时候米洛舍维奇却在自己的政治中来了个重大的转弯，他努力同西方搞好关系，迫使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同意接受代顿和平计划，其条件要比他们能够得到的更坏。塞尔维亚人不得不同意北约的维和部队开进波斯尼亚。米洛舍维奇让步的理由很简单：在那一时刻，作为塞尔维亚的总统，他需要做的是不遗余力地争取解除联合国对其实行的经济贸易制裁。

制裁对于习惯于过富足生活的塞尔维亚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售货员不卖东西了，整天都忙于在货物上粘贴新的价格标签。贝尔格莱德人在商场之间来回奔走，以寻找哪儿还在采用昨日的价格。夜间人们都要把汽油从汽车的油箱里倒出来，所以开车行驶的时候油箱几乎是空的，只能从存放在紧锁着的后备箱中的油桶中少许给车加点油以继续前进。甚至连孩子们谈论的也都是有关联合国禁运的事：由于禁运电视台无权播放迪斯尼的动画片。所以米洛舍维奇面临的选择是：或者争取解除制裁，或者失去自己的位置……

铁托曾想把科索沃交出去，但是改变了主意

科索沃的形势同我们所熟悉的问题十分相似。如果从塞尔维亚人的角度来看，这很像我们的车臣问题。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但那里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不愿意生活在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之下，而塞尔维亚人则不愿将自己领土的一部分交出去。如果从阿尔巴尼亚人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被分离民族的悲剧。一条国境线把二百多万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与阿尔巴尼亚分隔开来。情况是，阿尔巴尼亚是在 1912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的，但是当时有一半阿尔巴尼亚人留在了新的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国土之外。

在塞尔维亚的神话里科索沃占有特殊的位置。塞尔维亚人把科索沃称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摇篮、塞尔维亚的耶路撒冷、对塞尔维亚的历史自我意识具有特别意义的圣地。在这里，斯拉夫人于 1389 年与土耳其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遭受了失败，从此便开始了长达 500 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而阿尔巴尼亚人则认为科索沃是他们的领土，这块土地是不公正地与阿尔巴尼亚分割开来的。1946 年，铁托确曾说过，科索沃应当回归阿尔巴尼亚，但是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目前还

不能这样做。铁托曾答应阿尔巴尼亚领袖霍查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居民中进行全民投票并将科索沃归还阿尔巴尼亚，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塞尔维亚人始终认为，在这块土地上阿尔巴尼亚人是外来者，他们到20世纪才出现在这块土地上。而阿尔巴尼亚人回答说，他们不是外来的，他们也是本地人。所以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冲突之火本来可以扑灭的，但结果却是越烧越旺。

科索沃——是南斯拉夫一个最落后和贫穷的地区。1974年科索沃曾取得了广泛的自治权。很多塞尔维亚人坚信，这是克罗地亚族人铁托故意这么做的，目的是造成对塞尔维亚人的损害。虽然实际上铁托只是想使阿尔巴尼亚人与统一的南斯拉夫融合在一起，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当时出现了阿尔巴尼亚语的报纸和电视。阿尔巴尼亚语成了官方语言，重要的职位都由阿尔巴尼亚人担任。从1974年新宪法的出台到米洛舍维奇上台这段时间里，阿尔巴尼亚人经历了他们自己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不满。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人比黑山人要多好几倍，但是，黑山却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的独立的共和国，而科索沃仅仅是一个自治州。这完全是不同的权利和待遇。就连在婚礼上演唱那些歌曲，阿尔巴尼亚人也得请示自己的领导批准。阿尔巴尼亚人想教自己的孩子学阿尔巴尼亚语，而不是塞尔维亚语，他们想有自己的教材和教学大纲。但是，他们未被允许。于是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就相互疏远。为了互相不见面，他们甚至去不同的商店购物。

在铁托去世后一年，即在1981年，科索沃开始出现骚动。阿尔尼亚人要求给予他们完全自主的共和国的地位。但是游行队伍被用坦克驱散了。

夺取科索沃的第二次战斗

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是少数民族，他们不能适应这种环境，他们生活在阿尔巴尼亚人的政权下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间感到不舒服。塞尔维亚人认为提拔阿尔巴尼亚族干部是对他们的歧视。于是他们开始纷纷离去。而塞尔维亚人都是高级专家，是学者、医生，他们的离去对科索沃的状况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族感情的复兴导致了塞尔维亚人民族运动的崛起。塞尔维亚人对自己发誓："这是我们的土地，如果科索沃不是塞尔维亚的土地，那么我们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土地。"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主要是穆斯林。500多年土耳其的桎梏和重压形成了塞尔维亚人特有的政治心理，首先是在穆斯林面前的惧怕心理，这种惧怕感曾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塞尔维亚的科学艺术科学院在乔西奇院士的领导下撰写和提出过一个备忘录。塞尔维亚的知识界要求当局对科索沃实行非阿尔巴尼亚化，他们建议的做法是使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成为多数民族。曾作过这种尝试。派了许多塞尔维亚人到科索沃去工作，以便使当地人口的民族比例保持平衡。给派去的塞尔维亚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开始出现塞尔维亚人的游行示威，他们打的口号是"打倒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的民族清洗!"。

在塞尔维亚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以中央第一书记斯坦鲍利奇为代表的较为自由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以第二书记 米洛舍维奇的强硬路线，后者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共和国级别的党的官员。1987年4月米多舍维奇来到科索沃接见当地的党的领导人。当听到人们抱怨塞尔维亚人在当地受排挤时，他大肆火上浇油。米洛舍维奇发表了一篇使整个南斯拉夫为之震颤的讲话：

"已到了不是哀叹，而是战斗的时候了。我们定能赢得争取科索沃的战斗！虽然塞尔维亚的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勾结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仍然定能获胜。

他讲话时群众中发出了群情激昂的呼喊声："斯洛博（系米洛舍维奇的小名—译者）！斯洛博！塞尔维亚！"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在群众面前好像出现了1389年在科索沃战场上同土耳其人进行的那场历史性战斗的一位传奇般的参加者。米洛舍维奇本人看到对他表示如此欢迎的盛大群众场面而深受感动。一次讲话使他成了民族英雄。就在那年年底，米洛舍维奇踢开了斯坦鲍利奇——一个曾把米洛舍维奇当作自己的朋友，而米洛舍维奇则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的人。米洛舍维奇转眼就成了塞尔维亚的主人。

米洛舍维奇当权后修改了宪法，收回了阿尔巴尼亚人手中的自治权。在科索沃推行一种特殊的制度。解散了地方的政权机构。让塞尔维亚人占有行政部门的职位。使用阿尔巴尼亚语的学校被关闭。米洛舍维奇对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胜利不仅埋下了日后的血腥冲突的种子，同时也摧毁了南斯拉夫本身——其他的共和国都感到害怕，会不会也把他们的宪法权利给剥夺掉。

不被承认的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人感觉自己像是在被敌人占领的领土上生活。1990年夏天阿尔巴尼亚人宣布科索沃为"独立的并与南联盟成员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共和国"。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了两次全民公决，并进行了议会和总统的选举。阿尔巴尼亚人由希望回到以前的自治权很快转向要求完全的自治权。

很长一段时间科索沃是平静的，该地区也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当1998年3月塞尔维亚的特种部队开始清剿该地区，试图消灭当时人数很少的科索沃解放军中的起义者的时候，一切都

炸开了锅。这是当时已任南斯拉夫总统的米洛舍维奇犯下的致命的错误。阿族青年拿起了武器。阿尔巴尼亚战斗人员冲进城里开枪扫射塞尔维亚的警察。米洛舍维奇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阿尔巴尼亚人的抵抗温床彻底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受害的首先是和平居民，而不是手拿武装的、要求给予科索沃独立的战斗人员。村民们从作战地区，从被烧毁的阿尔巴尼亚人村庄逃出来，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西方要求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停止战争行动，让难民回家，并与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进行谈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决议。米洛舍维奇无视这些要求。于是北约开始准备用军事行动制止塞尔维亚特种部队的行动并帮助难民。

伊戈尔·伊万诺夫号召北约保持克制，同时试图对米洛舍维奇进行劝说。但是，米洛舍维奇固执己见。这时北约的军事机器已准备好进行打击。俄罗斯坚决反对在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外交部对米洛舍维奇抱有好感。当然，我们的外交官没有像克林顿表达得那么绘声绘色。克林顿说：

“米洛舍维奇破坏了承诺，使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墓地都塞得满满的。”

然而，俄罗斯的外交官们也承认——不言而喻，同样是非正式地——在南联盟垮台的问题上，在波斯尼亚战争，和点燃科索沃危机等问题上，米洛舍维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这不是说，极其复杂的科索沃问题可以用轰炸的手段来解决。伊万诺夫说道：

“轰炸为难民们提供国际主义援助需要路经的道路和桥梁难道能拯救科索沃的难民么？在炮筒下是不能使不同民族的人讲和的。这只能采用细心的治疗，而不是外科手术的办法才能做到。”

为了进行磋商，从布鲁塞尔召回了俄罗斯的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和俄罗斯派驻北约的军事代表维克托·扎瓦尔津将军。这是在外交实践中很少采取的步骤。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局长列昂尼德·伊瓦绍夫上将声明：

“如果北约对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将把它视为对南斯拉夫的侵略。”

诚然，叶利钦总统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亚库什金立刻请求新闻记者们：

“不要在乎有些军人发表的要对贝尔格莱德提供军事援助的声明。”

俄罗斯的外交官在那几个星期里完全忙于只处理科索沃问题了。而当北约理事会在一个夜间的会议上仍然作出如果米洛舍维奇不接受联合国的要求，他们将对南斯拉夫的目标进行轰炸的决定的那一刻，一切都结束了。第二天米洛舍维奇总统就投降了并接受了一切条件。他答应美国人，他将停止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从那里撤走军队，帮助 20 多万难民重返家园，并开始与阿尔巴尼亚人谈判。他同意向科索沃派遣国际观察员并同意北约派飞机在科索沃上空进行侦察飞行。

伊戈尔·伊万诺夫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说：

“我们解除了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威胁，在我们的合作伙伴中认为应当通过纯粹的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观点重新占了上风。”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米洛舍维奇的投降，是因为他被北约的轰炸吓怕了。如果他想听俄罗斯的话的话，俄罗斯的建议有什么是他不能接受的呢？而他却宁愿向西方投降……

我们应该支持谁

1999 年春天，围绕科索沃又爆发了新的危机。那里在继续采取军事和警察行动。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电视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越过边境逃离的阿族难民和在燃烧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村落。世界对这一悲剧不能无动于衷。

重新开始了关于科索沃命运的新一轮谈判。不可能找到理想的

解决方案。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利益与塞尔维亚领导人的利益是相对立的。给他们提出了妥协办法，这一办法没有得到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接受，因为该计划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米多舍维奇也不喜欢该计划，因为该计划要求向科索沃派遣维和部队，该部队应当保障在该地区不再有任何军事行动。然而阿尔巴尼亚人还是签署了这个调解计划。米洛舍维奇则断然拒绝。

然而这一次北约国家要自己解决科索沃问题了。在这之前几年，由于北约在波斯尼亚对塞尔维亚阵地的轰炸而在那里制止了波斯尼亚的战争。当时谁也不能阻止波斯尼亚的流血事件——无论是联合国，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还是俄罗斯都不能。只有北约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波斯尼亚的军事行动结束了这场造成了 27 万人丧生的残酷的流血战争。当俄罗斯的军队被派驻波斯尼亚同北约的军队一起进行维和行动的时候，曾有过多少怀疑和警告，多少悲观和不满！人们长时间地在问，能听命于北约将军吗？同北约一起行动对俄罗斯难道不感到难堪吗？人们在议论，在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一定会失败，北约部队到时候将不得不可耻地从那里逃跑。

悲观的预想并未变为现实。持续几年的战争结束了。北约和俄罗斯的指挥官们从一开始就相处得很好。在波斯尼亚，俄罗斯和美国的军人不仅接触交往，一起开会，一起交换经验，而且他们一起执勤，一起做计划，一起准备和进行军事行动。

曾领导了俄罗斯国防部在北约总部行动小组的阿纳托利·克里沃拉波夫中将对我说："代顿计划的军事部分得到了出色的完成。"

参加波斯尼亚维和部队的俄罗斯旅就归他指挥。克里沃拉波夫将军是搞火箭专业的，曾指挥过战略火箭团和火箭师，近年来担任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克里沃拉波夫曾在北约工作过几个月，他深有体会地说，同该集团要密切合作，要从内部影响北约的人，而不是要把他们当作敌人：

"我们现在成功地同美国人和北约相互合作，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它必将在今后对我们有用。"

我问他，在莫斯科的总部里人们对他的观点有何反应？难道人们不会说你出卖给了美国人？

他笑着说：

“有人对谁都这么说。这是‘冷战’的残余，北约在变，这是现实。我看到这一点，我不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一辈子在部队，曾在核按钮前值班。只有合作，别无选择，要不又会进行对抗，又会说北约是不好的。”

将军是对的。

1999 年 3 月北约开始空袭南斯拉夫的军事目标，要求米洛舍维奇停止在科索沃的军事警察行动。这在俄罗斯引起了极大的愤怒。那些对科索沃问题没有任何概念的人们，认为西方进攻南斯拉夫是想奴役不愿屈从北约的一个斯拉夫国家。当时把俄罗斯与北约的所有联系都冻结了。从布鲁塞尔召回了俄罗斯的代表。在莫斯科关闭了北约的文献资料中心并要求其工作人员离开莫斯科。俄罗斯停止参加“和平伙伴计划”。在近代 85 年的历史中俄罗斯第一次明确支持塞尔维亚对抗西方。有人建议把核导弹移向更接近北约的白俄罗斯领土，向南斯拉夫提供先进武器或者甚至给予塞尔维亚人以军事援助。

在俄罗斯有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有责任站在南斯拉夫和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盟友的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一边。然而历史却更为复杂。1914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致电塞尔维亚王位继承人亚历山大：“敬请陛下相信，俄罗斯不会对塞尔维亚人的命运无动于衷。”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宫廷里表现的对塞尔维亚人的同情，是两国良好关系的象征。对于沙俄来说塞尔维亚仅仅是它的势力范围，不过现实的私利上披着的却是那许诺精神上的团结和相互的爱慕的华丽外衣。沙皇尼古拉二世给塞尔维亚的电报的后果却是十分可悲的，包括对发电报的人自己。因为正是为了塞尔维亚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在俄国发生了革命，后来沙皇全家被枪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塞尔维亚，人们都

不再提到他们的特殊关系和斯拉夫民族的兄弟情谊了。1941 年 4 月德国纳粹向南斯拉夫发动了进攻。德国飞机轰炸了贝尔格莱德，试图将它从地球上抹去。这是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后短短的几个小时后发生的。因此，莫斯科取消了庆祝晚宴，只限于在签约后喝香槟酒。南斯拉夫人想在该条约里加入相互提供军事援助的条款并要求武器援助。但被斯大林拒绝了。当希特勒占领并肢解南斯拉夫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提出抗议。他没有召回驻柏林的大使，没有停止与纳粹德国的合作，没有想过要派苏联红军去援助塞尔维亚兄弟。战后，斯大林同南斯拉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苏联曾把南斯拉夫的领袖铁托叫做“血腥的走狗铁托”。甚至当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彼此之间仍保留着相互的芥蒂。

社会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以西方为导向，曾经生活得相当不错。只有当他们那些不明智的政治举措导致了南斯拉夫完全孤立的时候，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才想起了与俄罗斯的精神团结。按照贝尔格莱德领导人的意见，泛斯拉夫主义应当保证使他们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但是为什么斯拉夫民族的团结一致只涉及到塞尔维亚人，而不涉及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捷克人呢？他们也都是斯拉夫民族啊。

泛斯拉夫主义在今天来说——说得好一点是浪漫主义，说得不好就是蛊惑宣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这个问题曾这样说过：“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吹嘘起来的、目空一切的、毫无用处的泛斯拉夫主义呢?”

在开始对南斯拉夫实施轰炸后，伊戈尔·伊万诺夫讲话异乎寻常地严厉，甚至与军方人士一起出现在新闻招待会上。然而谁要是就此把外交部长归为鹰派人物，那么他还没有真正看清他的外交手腕。外交部决定把科索沃问题从反对派那里抓到自己手里来，不让激进分子使国家陷入巨大的不愉快事件之中。最初几天，由于杜马议员们的情绪激烈，所以是最困难的。然而在莫斯科没有做出任何危险的决定。伊万诺夫与军方人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目的是为

了不让那些将军们去讲威胁北约和误导公众的多余的话。为数不少的政客们在这场战争中为自己捞到了政治资本。他们既不同情塞尔维亚人，也不怜惜他们准备派去赴死的我们的战士。

那些自己丝毫也不感到有任何危险，却想把我们的国家拖入这场战争的人是何等的轻率啊！他们挑唆青年们，号召他们加入支持塞尔维亚的志愿者队伍。青年们当然不明白，阿富汗战争也是从小事情开始的。最初只是提供了武器。然后是派顾问去教阿富汗人怎样使用武器。再后是陷在那里 10 年也不能从那里摆脱出来，无缘无故地牺牲了我们 1.5 万名青年小伙子。

当时理智的声音非常少。比如说，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不能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把自己牵进去，我们自己的麻烦就已够多的了。我们应当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有人想把我们推向对抗，推向相互进行打击……

俄罗斯政府落入了一个陷阱之中。要敦促米洛舍维奇接受妥协吧，莫斯科由于内部政治原因是有困难的。而要帮助米洛舍维奇吧，又会把我们国家拖进与西方的军事对抗中去。因此叶利钦、普里马科夫、伊万诺夫玩了一场很复杂的游戏。他们发表了一些严厉的声明。按照他们的观点，这应当得到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家们的喜欢，与此同时又争取最终不破坏与西方的关系。同时，伊戈尔·伊万诺夫确信，莫斯科的原则性路线——谴责轰炸和倡议和谈——是惟一正确的路线。按照部长的看法，西方明白了，没有俄罗斯他们是解决不了科索沃问题的。

就在俄罗斯和北约达成协议并制定了共同计划的时候，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明白了，他应该投降。如果在莫斯科那些要求不仅给予米洛舍维奇完全的政治支持，而且给予军事援助的政客们和将军们占上风的话，那么米洛舍维奇还可以再坚持得久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战争就会继续，还会有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丧生。

当米洛舍维奇投降的时候，清醒的时刻在塞尔维亚也就来到

了。人们都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打仗？许多人是为什么死的？现在该如何恢复被摧毁的一切？

是战争罪犯？

在米洛舍维奇执政期间，塞尔维亚人还能在其上面感到自由地和自信地生活的领土日渐缩小了。在米洛舍维奇之前，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民族，而如今落得一场空——有的只是由于不断蒙受失败而产生的受侮辱的民族自豪感和悲痛感。塞尔维亚人变得零散的，实际上完全被孤立了，他们没有希望能得到他们的邻居们可望得到和正在得到的援助。所以米洛舍维奇在2000年的10月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权。

很多阿尔巴尼亚人在军事警察行动中被击毙，85万人逃离了科索沃。他们所以逃离，当然不是因为要逃避北约的轰炸，而是要逃避塞尔维亚的军队、警察，或者是什么土匪——他们已经不愿意生活在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之下。而如今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却又成了难民，他们害怕遭到报复而逃离，很快在科索沃就不会有塞尔维亚人了……

进入科索沃的国际军事力量所遇到的不是人们担心会对北约的人进行复仇的塞尔维亚游击队，而是那些不肯缴械的科索沃解放军和阿族战斗人员。

用什么来解释米洛舍维奇的行动呢？每一次当他把国家拖入战争的时候，他都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为了使国民团结起来反对外部敌人，他开始了打击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军事——警察行动。为了使国民团结起来反对外部敌人，当美国和西欧要求他停止武力镇压阿尔巴尼亚人的时候，他采取了强硬的立场。米洛舍维奇是个自持不凡和精于算计的政客，他知道他是保不住科索沃的。显然，他是这样盘算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接受调解的计划，那么他就会被

说成是个懦夫，不是爱国者，而是叛徒。而在他断送了多少人的生命和毁掉了大半个国家的时候，他接受和平计划——这似乎会被看成是国家英明的决定。

俄罗斯有很多人不喜欢联合国成立国际法庭来审判在原南斯拉夫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把米洛舍维奇总统列入战犯名单。但是应当公正地承认，没有一个政治家像原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那样给塞尔维亚人带来了如此大的不幸和灾难。

贝尔格莱德的官老爷

我曾在贝尔格莱德会见过米洛舍维奇。可以这样说：我很少见到如此冷漠的人。他长着一张臃肿的微胖的官老爷的脸，和向前突出的显示性格固执的下巴。向米多舍维奇提的问题都像橡皮球碰到石墙上那样被弹了回来。他在自己的杯子里面加了点威士忌，并注视着杯子里的冰块如何渐渐融化。他呷了一大口威士忌，让秘书去取一盒雪茄烟来。秘书弯着腰跑了出去。由于他几乎从不与人交往，所以人们真的把他称为从货舱里出来的人。他只有当接见外国客人的时候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但是这多半也是处于他的周密的算计：领袖不应该离开他的奥林匹斯山。

这位未来的南斯拉夫总统于1941年出生在一个离贝尔格莱德不远的小城市。他父亲是来自黑山共和国的一位神职人员，母亲是中学教师，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他的父母经常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吵架。父亲后来抛弃家庭回到了黑山共和国，在那里自杀了。米多舍维奇的叔叔是位军人也是自杀的。最后，他的母亲也于1974年自杀身亡。

米多舍维奇在进入生活时遭到如此悲惨的境遇，不可能不在他的心理上打下病态的烙印。有人做出这样的结论，说南斯拉夫总统与生俱有倾向自杀行为的基因。但这是个可疑的结论。

他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问题，处事很清醒。他是个讲究务实的和自命不凡的人。在学校里读书时，他被认为是个守纪律和用功的学生。从幼年时起他就喜欢独处，特点是缺乏幽默感。

他与一个童年时代相爱的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叫玛丽娅娜·玛尔柯维奇。她后来成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授。总统的妻子出生于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人的家庭。当她只有一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被铁托的游击队打死：她被怀疑为叛徒并被指控给纳粹送了有关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情报。

人们说，玛丽娅娜对衣着品味粗俗。她穿得土里土气，因此常常成为人们的笑柄。她梳头的时候，谁也不允许看，即使是她的丈夫。有一次她在梳头的时候，米洛舍维奇走了进来，结果她哭了起来。在学校里上学时如没有得到高分，她也会哭。她很少笑。

作为一名专业的党的干部，米洛舍维奇是在统一的南斯拉夫开始瓦解的时候踏上他的上升的仕途的。从一个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他很容易地转变成为了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狂热捍卫者。说他教条主义也是不确切的。他并不拘泥于任何信仰，他只相信他认为在此时此刻的实际情况下宜于相信的东西。当南斯拉夫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人们在贝尔格莱德是以西方为导向的。塞尔维亚的领导人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之后才开始谈论与俄罗斯的精神团结。当西方由于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的战争和米洛舍维奇翻脸后，他开始要求俄罗斯援助。当西方重新承认米洛舍维奇，并向他提供援助以调解波斯尼亚危机的时候，米洛舍维奇又忘记了俄罗斯。这一点在米洛舍维奇总统轻鄙地对待来自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援助时候，就已经很明白了。他当时说：

“这是什么样的援助？我们得到的肉，是应当把它埋掉的肉，因为这种肉是有放射性的，而饼干是30年前生产的。”

而当科索沃危机开始的时候，米洛舍维奇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使俄罗斯与西方迎头相撞。而且他几乎争取到了这一点……

在巴尔干半岛人们喜欢讲好听的话，尤其喜欢讲关于爱情和友谊的美好的话，然而看重的只是金钱。而能给予塞尔维亚金钱的不是俄罗斯，而是西方。

不是进餐，而是谈判

外交部长的生活在人们眼里是令人羡慕地显得愉快和丰富多彩的。实际上外交部长的生活却像是一条永无尽头的会议和谈判的传送带。如果翻看一下部长的外交护照，真是让人羡慕：外交部长什么地方都去过，但是实际上他什么东西也没看见。所到之处都是一样的装有防弹玻璃的小轿车，一样的宾馆，同样的礼节，同样的谈判室，那里坐着的是衣着相同的人，合乎标准的成套的午餐和晚餐，和事先就已知道的祝酒词。如果能有机会和自己的同行部长们在郊外或是在桑拿浴室里谈谈话，那简直就是天赐的礼物了。

外交部长要经常保持仪态合乎理想——胡子要刮整洁，头发要理得一丝不苟，衬衫和西服要被熨烫得平平展展，领带的颜色要与西服搭配，皮鞋要擦得锃亮。所有这一切部长在出差的时候都得自己做。外交部长不是将军，既不给他配副官，又不配通信员。他只有一个警卫，他可作为朋友请警卫做点事，但不是所有的事情。清洗和熨烫衣物，这是宾馆招待员的事。

伊戈尔·伊万诺夫就连公文包都是自己拿的。他的一位副部长实在看不下去说：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让我来替你拿吧，我都不好意思了。”

他还是没有给，自己拿着。

对于外交部长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体魄，能睡短觉，能在飞机和汽车上工作，一般说要随时随地都能工作。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每年9月，部长都要

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他要同几十位外交部长谈话，对于那些小国的外交官来说，这是能见到俄罗斯外长的惟一机会。

工作从越洋的专机上开始，到在同一架飞机上在莫斯科降落时结束，虽然有时在返回的路途中在宽敞的部长舱里可以找到与人聊天的机会。为外交部长提供服务的飞机是来自俄罗斯政府的飞行大队的。与部长同机飞行的有他的副职和助手，他们的任务是不间断地与莫斯科保持联系并且连续不断地起草各种文件。

在纽约的一个星期的日程主要是同各国的同行部长们进行没完没了的会晤。联合国俄罗斯代表处办公楼的一层有两间谈判室。第一位客人通常被领进右边的房间，在那里部长等着他呢。当谈判进行的时候，下一位客人已到了，通常他会被领进左边的房间。半小时后部长就会告别第一位客人，同他握手，然后从右边房间来到左边房间，那里新的客人已经在等着了。其后不经休息接下来就是下面的谈判。在会谈中要能从中近东的冲突立刻转到阿富汗问题，从围绕科索沃危机的爆炸性事件立刻转到被分离的塞浦路斯的老问题上。

谈判经常在饭桌上继续，这时候与其说是在吃饭，倒不如说是在谈话。

伊万诺夫说："我们同欧盟成员国的部长们共进过一次午餐。也就是说，这对他们来说是午餐。大家一起就餐，并向我提出问题，我做回答。"

外交部长们是不宜多吃多喝的。伊戈尔·伊万诺夫还年轻，所以能比较容易地承担这一重荷。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大会上可允许立刻讨论所有的热点问题。在联合国有很好的民主气氛，在这里人们能很快就相互认识，可免于传统的外交礼节。

现代外交的实践本身就是谋求寻找妥协的办法。俄罗斯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当然可以否决任何一个决定，对它不喜欢的决议行使否决权。然而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谢尔盖·拉夫罗夫只

使用过几次否决权。他这样对我解释说：

“是的，我们可以第一次否决，第二次否决。可接下来怎么办？这样做会使其他国家对联合国感到不满，并会避开我们采取行动。以后为此生气又会有什么好处呢？需要争取达成妥协。”

伊万诺夫是多年来第一位坐上了部长位置的欧洲问题专家。人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以为他将主要关注与欧洲的关系，而把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放到第二位。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他很容易地就把欧洲事务交给别人去做，因为他对这一领域是太熟悉了，即使凭一点迹象，他便清楚什么时候需要他亲自介入。最重要的是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伊万诺夫对我说：“美国人是很讲求实际的，他们尊敬那些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我奉行的正是这样的路线。”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同美国人谈判——这是一项特殊的艺术。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思想心理状态，特别是当你代表的国家正处于较复杂的状况下的时候。美国人不喜欢那些总是抱怨的和希望得到更多理解的谈判对手。同欧洲人那样谈判是可以的。美国人会把这看作是你的软弱。不必摆出公鸡斗架的架势，而要直率和坚定。美国人尊重强有力的对手。你可以代表一个弱国，但是在谈判中可以是强大的。美国人喜欢明确性。他们不喜欢耍弄游戏。对他们采用经典式的外交是不合适的。他们需要的是明确性。

经典式的外交是主张不要把话讲完的：我对你讲真话，但不是全部真话。而现代外交是如此快节奏的，它没有时间让你把未说的话去说完。需得有话直说，否则，将会失去宝贵的时机。

在同美国的关系中首先需要的是信任。当失去信任的时候，就会出现猜疑，这种猜疑常常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消除的。这会导致谁对谁都不相信。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在有意进行对抗，搞诡计。

外交部和安全会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交部是国家政治经济方针的人质。具有天赋的、高明的外交官可以做出很大成绩，但归根结底一切取决于国内所发生的事情。

伊戈尔·伊万诺夫不同于自己的前辈们，他从不着重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甚至从不谈论这些话题。在他出任部长的最初阶段，他得到普里马科夫总理的完全支持，这使他在与总统办公厅和其他部长们的复杂关系中得到了保护。之后，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白宫，对外交部长的业务水平和可信赖程度都有了较好的评价。

我问过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

“在俄罗斯不同的党派很希望不同的外交政策。新部长将贯彻什么样的外交路线?”

“我会尊重各党派的意见，”部长这样回答我，“但是国家将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路线。不需作任何回避，我们只有一条外交路线。”

“但如果社会上没有一致的意见，如果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怀有反西方和反美国的情绪，又如何能推行统一的外交政策呢?”

“我非常想做到使我们没有‘反’这个字眼。不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政策上。我们已经经历了把世界分为好的和坏的世界的阶段。无论是在杜马中，还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上，我都要讲，我们应当摆脱谁坏，谁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的旧观念。”

不明智的政客们直到今天还在用怀疑的目光看待现任外交部长：他为什么没有能力争取在杜马和克里姆林宫里使问题得到解决呢?

外交事务同国防和经济问题的区别在于搞外事得考虑其他国家

的利益。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的。做出决定要推行一项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政策，并要求外交部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这是不行的。外交政策是要与其他大国协商的。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除了考虑彼此的利益以外，别无其他的办法。把不友好的邻居逼到墙角里，让他们去积累仇恨，并拟订出愤恨的计谋来，那是愚蠢的……

在总统的班子更换之后，伊戈尔·伊万诺夫的日子并不好过。伊万诺夫是个视野开阔、机智敏锐的人。可是，由国家安全部门，当然还有军方的人员在其中定调的国家安全会议又一次试图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国、北约，还有整个西方，都是敌人。还在叶利钦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开始很少过问政事的时候，军人对政治的影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

俄罗斯的空降兵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科索沃并出乎北约司令部意料地占领了机场的呢？

总参谋部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打电话给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说，“我们的部队应当尽快在科索沃安营扎寨：请叫醒总司令？”沃洛申回答说：“不值得叫醒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既然你们认为该做，那就去做做吧。”

一切就这样发生了，甚至没有得到最高总司令的批准。也没有通知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当俄罗斯的队伍已经接近目的地的时候，他还真诚地、很有把握地对外国记者说这是不可能的。

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这些人比外交部长更接近总统。结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重大决定不是像理所当然的那样由外交部的行家们制订的，而是由国家安全会议中的前将军们制定的。尽管如此，以伊万诺夫为首的外交部的工作在最初几年里还是做得很出色的。

伊万诺夫开始少谈多极世界了。这是普里马科夫的思想，它带有明显的反美色彩，更适合于中国，而不适合于俄罗斯

普京撤换了被认为是普里马科夫的人的对外情报局局长维亚切

斯拉夫·特鲁布尼科夫，可为什么没有撤换伊万诺夫呢？也许，是在总统周围的人中没有合适的人选。也许，普京对自己这位外长有较好的评价。

当普里马科夫担任政府总理的时候，人们把伊万诺夫看作是他的影子。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为人很忠诚，但是他同普里马科夫是不同的人。我非常了解普里马科夫的观点，我也有机会亲自与伊万诺夫进行过坦诚的交谈。从原则上讲，外交部长是比任何人都更难表现坦率的。可以说，伊万诺夫却不喜欢这样。他认为外交政策应该是十分清楚和明确的。

新构想

2000 年 6 月，在普京签署了相应的文件之后，伊万诺夫提出了一个外交政策新构想。可以说这是从苏联时期的全球目标向俄罗斯作为一个有着有限可能性的国家的现实政策的过渡。

伊万诺夫说这一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务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当国家资源有限的时候，应当把它集中起来用在最主要的方面：比如保证国家安全，创造有利于发展国家经济的条件，保护俄罗斯企业和公民在国外的利益。然而什么是实践中的普京的外交政策呢？

一方面这就是与欧洲保持密切的接触，希望与英国和德国的领导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放弃反美和反西方的姿态和言论。另一方面有意识地接近中国，并向它提供大量武器，对格鲁吉亚显示严厉姿态，对古巴进行访问，与伊拉克保持接触，准备向伊朗出售武器。

出现了外交政策中有矛盾的感觉，这意味着，对国家利益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去要求人们在国际上把俄罗斯当作超级大国的代表看待。然而美国人并不认为俄罗斯是个超级大国。当今世界上国家的强大已不是用核导弹武器摧

毁另外一个国家的能力来确定的。称得上大国的首先是经济效率高的富裕昌盛的国家。

乔治·布什的新总统班子已不再通过俄美关系的棱镜来看待世界了，并且也并不装作认为俄罗斯对美国来说要比它在实际上更重要。

对臆想的美国贬低俄罗斯，企图采取报复措施，这在外交上是愚蠢的动机。尽管最近我们有不少反美和反西方的言论，但是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外交 仍然是相当平衡的。由于伊万诺夫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努力，这些言论没有给外交本身造成损失，也没有造成与西方的对抗。

当钓翁的时间还没有来到

伊戈尔·伊万诺夫是俄罗斯政治家中为数不多的没有任何不良声誉的人。几乎没有人对他有什么意见。人们都喜欢他。2000 年 10 月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36%的居民认为这位外交部长是好的，23%持无所谓态度，只有 3%持否定态度。接受调查的人对伊万诺夫的一些品质有很高的评价，如专业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他们在评价时使用了以下一些词汇，如“高级专家”“总是在需要的时间里出现在需要的地方”，“解决难题的能手”等。

他是为数不多的有擅长语言表达美誉的政治家人之一。人们赞誉他“掌握精美的俄语”，“不用讲稿就能讲得很好”，“讲话简明扼要”，“善于与人交谈”。人们注意到，伊万诺夫是平静的、有意志力的、诚实的、很有分寸的，有教养的人（“执著追求的人”，“不做出过激步骤的平静的人”，“坚持不懈，善于达到既定目的”，“为人正派，无懈可击，从他的眼睛里就可看到他是诚实的”，“端正、公道”，“正直”，“风度得体”，“很有耐心”）

众所周知，曾考虑过伊万诺夫是否可作为政府首脑的候选人，

可是他坚决拒绝这一诱人的职位。他喜欢外交部长的职位。但是当代的外交难道不是由经常发生的让人失望的事件之链组成的吗？一件冲突刚被平息，二件其他的冲突就又爆发了。

伊万诺夫笑了笑说："恰恰相反，现在给外交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舞台。这一平台是如此的宽广，可使你在上面充分表现自己的外交艺术，这使我们得到很大的满足，也锻炼了我们的胆量。有时候只有几个人能够对外交成就作出评价，那是另一个问题。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人并不多……"

当然，他也有困难的时候。从事他这项职业的人随时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然而伊万诺夫善于控制自己，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总而言之，他给人的印象是始终积极乐观和具有充沛的精力。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自我努力的结果？

"应当把握好自己，要克制。我总是努力保持你们看到我时的这个样子。"

也许在尖锐的危急时刻，当情绪激动的时候，部长是否会斥责自己的下属，或是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稿件写得不好？

伊万诺夫回答我说："不应当这么做。我会很激动地发表意见，那是另一回事。那些跟我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我这样说话，是因为我感到不安。"

难道外交部长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我们很多人都熟悉那种感觉？——早晨醒来不想去上班，因为又要去解决那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不想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就去处理另外一个问题。问题多的是。以前问题要少得多。而如今每天早上都得摸着脑袋想一下：从哪件事开始？

伊戈尔·伊万诺夫在谈判、讲话和开会之间的暂短间隙时刻是否梦想过暂时忘掉一切，把电话切断，躲到什么僻静的地方去钓钓鱼呢？

"唉，我现在还没有进到想离去和忘掉一切的状态。我是以工

作为生的。甚至在休假时也不断往莫斯科打电话，问事情怎么样，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是很自然的。要知道医生是不能忘记自己的病人的。如果有了想去钓鱼的想法，那就意味着结束仕途生涯的时刻到了，应当离开了……